

出版者说明

17-80/3/01

托洛茨基曾经写过许多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如《俄国局势真相》、《列宁逝世以后的第三国际》、《被出卖了的革命》、《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等。《斯大林评传》（原名《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是最后的一本。这本书没有全部定稿，托洛茨基在写成前七章及附录后，就在1940年8月被暗杀了。留下的几章都是些未完成的手稿及札记，后由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默思加工编辑成现在这个样子。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该书就已全部印好，当时美国政府没有立即让它出版，到1946年才在纽约出版，1947年又在伦敦加印了一版。该书出版后，西方各通讯社曾大为捧场，轰动一时。

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和诬蔑，而且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

本书根据查尔斯·马拉默思从俄文编译的纽约—伦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46年英文版译出。

此书再版时，对原译名均未作改动。

原编者的话

本书前七章和附录俄文原稿是列夫·托洛茨基撰写并且经过他修改的。托洛茨基校阅了英译本前六章和附录，但没有校阅第七章。前面七章原定全书脱稿时予以删节压缩。像大多数作者一样，托洛茨基对脱稿日期估计得比较乐观，然而并不准确。他的情况比其他作者更为严重，不仅因为他具有一个革命家和军事领袖的过分乐观，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不断遭到袭击和覬覦，所以脱稿日期一再延宕。最后，他决定以1940年8月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截稿时间”。但是当他在8月20日被暗杀者击倒于地的时候，手稿并没有完成。两天后他去世。因此，编者对前面七章和附录均未予修订，仅删去个别材料重复之处。

托洛茨基遇害时，他有一部分未完成的手稿正放在书房里，许多页贴在一起，首尾联缀，接成很长的纸条。在他与暗杀者搏斗的过程，手稿的某些部分不仅溅满血迹，而且毁坏无遗。此外，作者身后遗留的手稿只是经过初步汇集、准备进一步加以利用的尚待发挥的札记、他人著作的摘录、各种文件和未经作者订正的口授材料，任何部分都没有写成定稿。一部分手稿已经大体上分成几章，加上了暂定的标题。大部分手稿是未经消化的材料，按照81个小标题分藏于超过两倍于此数的文件夹里。序言、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和两份补遗就是根据这些基本上还是原始材料的手稿编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编者不得不做许多修罅补漏的工作。但是，只要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明白流畅，编者就只作最低限度的修补。凡有所添补，即使只增加一个字，也都用方括号〔 〕和作者原文分开。当然，标题、卷首照片和其他全部插图的安排和挑选、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完全是编者的工作。^①作者一部分札记是经过编者概括的。这部分札记排印较密，以便和本文主体有所区别。^②托洛茨基文件夹内发现的关于斯大林传记的引用材料，凡非托洛茨基原文组成部分者，均用星形符号（*）标明。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材料都有托洛茨基手写的标记，可资识别。

关于手稿未完成部分的编辑方针是：除删去重复的和完全与本题无关的材料以外（作者本人如果未遭到暗杀，显然也会这样做），一律全文发表。这里有许多文件是初次问世，既没有经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审查，也没有经过斯大林主义者的审查。

编者感谢作者的遗孀娜塔莉娅·伊凡诺芙娜·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对这本书的贡献。还要感谢下列诸君的帮助：列夫·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让·范赫伊努特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主任凯斯·德·梅特卡夫先生、哈佛图书馆注册组组长爱德华·古金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哈佛威登纳尔图书馆贵重书籍室珍本部主任威廉·杰克逊先生、麦卡锡先生、弗里济·奥尔达什女士和丽塔·菲兹帕特里克女士。他们的慷慨合作和无限耐心使编者能够方便地看到托洛茨基身后遗留的手稿。编者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霍伊尔·蒙逊、亚历山大·巴明和马克斯·伊斯特曼，他们曾经

① 照片、插图、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在中译本中都已略去。——译者注

② 在中译本中，这部分文字都加【 】形的括号表示区别，字体、排法同本文相同。……译者注

在本书出版前阅读过原稿并且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批评性意见，尽管编者并没有全部接受他们的意见。

查尔斯·马拉默思

序 言

读者将会注意到：我对斯大林预备阶段的发展情况比对他较后的政治活动谈得详细得多。后期的事实是所有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而且各种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我对1923年以来斯大林政治态度的批判。这本政治传记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种人物是如何形成的，说明这种人是如何通过篡夺担任这样一个非凡的角色的权利而当权的。因此，在描写斯大林在这个默默无闻或近乎默默无闻的时期的生活和发展情况时，作者对各种孤立的事实和细节以及证人的叙述都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而在评价斯大林后期活动的时候，则仅限于综合说明，假定读者对事实——至少是主要事实——已经具有足够的了解。

为克里姆林宫效劳的批评家们，就像他们谈到我写的《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所做的那样，这次也会说：由于缺乏参考资料，不可能核实作者的论断。事实上，把汗牛充栋的俄国报纸、杂志、回忆录、文集和诸如此类的资料编成一份参考目录并不能给具有批判眼光的外国读者提供多少材料，只会使书的内容累赘不堪。至于俄国批评家，他们拥有苏联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全部资料。如果我的任何著作中存在事实错误、引用失实或其他任何资料运用不当的地方，早就会有人指出来了。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著作曾经在什么地方提到我引用材料失实的任何例证。我不揣冒昧地认为，对外国读者来说，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我的材料的真实性。

在撰写《〔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我曾经避免利用个人的回忆，而主要依靠已经发表、从而可以核实的资料，其中我自己的叙述仅包括过去已经发表而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驳斥的部分。在写现在这本传记时，我大胆地对这种过分严格的方法作了一点改变。这本书的叙述的基本脉络同样是根据文件、回忆录和其他客观来源编成的。但是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作者自己的回忆作为证据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根据个人的回忆——其中有许多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来补充一两个事例。每次都清楚地表明：在这种场合中，我的身份不仅是作者，而且是证人。除此以外，我写这本书的方法和写《俄国革命史》的方法是相同的。

很多反对我的人承认后面这本书是按照学者方式用事实写成的。诚然，《纽约时报》一位书评家曾经否定这本书，认为它是有偏见的。但是他的文章处处表明，他是对俄国革命感到愤怒而迁怒于为这场革命写历史的作者。这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者惯有的离奇作法。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发展总是不断挑刺找碴。他们对某个历史过程的结局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就把揭示这种结局的必然性的科学分析当做发泄愤怒的对象。归根结蒂，和对作者的方法的评价比较起来，作者的结论的客观性是全部还是部分地得到承认是无关宏旨的。而在方法问题上，作者并不害怕批评。这本著作是用事实写成的，有文件作为坚固基础；个别地方可能发现局部性的、次要的错误，也可能发现强调得不够适当和解释略有偏颇的情况，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这本著作里，任何人都不会找到对待事实缺乏光明正大的态度、故意撇开书面证据或仅根据个人偏见武断地作出结论的情况。作者并没有忽视对本书主角有利的任何事实、任何文件或任何细微证据。如果辛辛苦苦、寻根究底、严肃认真地搜集事实（即使是无关宏旨的事实），用历史和传记批判的方法核实验证人的叙述，最后并按照本书主角

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采用个人生活中有关的事实——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叫客观，那么请问：怎样才叫客观呢？

新的时代又带来了新的政治道德。真是奇怪，〔历史钟摆的摆动〕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其残酷无情和缺乏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则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又有了政治佣兵队长，争权夺利又成了冠冕堂皇的事，斗争的任务是帮助某个人攫取权力——一种抛弃〔原来已经形成并且一直被认为必要的一切制约的〕赤裸裸到残酷程度的权力——从而得到当时可能得到的一切。有一个时期，马基雅弗利^①煞费苦心阐述的政治力学规律曾经被人认为是无耻之尤。马基雅弗利认为，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手没有道路问题、会计也没有道路问题一样。他的任务是根据曾经在两个大陆的政治中受过严峻考验的经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奉行什么政策才最切合实际，并且说明应当怎样通过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方式贯彻实行这个政策。这种态度不仅可以从任务本身，而且可以从提出这种任务的时代性质中得到解释。这种态度主要是封建主义发展到一定状况的产物，是受两个时代——垂死的封建主义和即将呱呱坠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争夺权力的严酷斗争决定的。

但是在整个 19 世纪——（如果撇开少数国际和国内战争不谈）这个世纪是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改良的世纪——马基雅弗利已经被认为陈腐不堪。政治野心局限在议会范围内，这种野心的过分冒险的倾向也同样受到约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和他的侍从公然抢夺权力的问题，而是在尽可能多的选区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以玩弄权术不择手段著称。——译者注

里赢得委任的问题。在角逐部长地位的时代，马基雅弗利似乎是一个属于朦胧而遥远的往昔的古怪思想家。新时代的来临已经带来新的、更高尚的政治道德。但是，奇怪的是，20世纪——19世纪曾经满怀希望梦寐以求的新世纪——却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方式方法。

对于一个直到昨天还宽慰地相信人类历史是沿着物质和文化进步方向前进的人来说，重新堕落到最残酷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当然，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想法更远离真理。这在今天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事，无需多费唇舌加以证明。但是，无论我们提出什么保留或异议，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有什么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残酷，这样无情，这样无耻。和文艺复兴时代甚至更遥远的时代的标准比较起来，从政治上说，道德状况丝毫没有改进。〔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是在度完自己有用的日子的时候安安静静、心甘情愿地死去的。一切过渡性时代都是不受传统道德约束的、激烈的社会斗争的时代，都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是两个世界斗争的时代。社会敌对极为剧烈，因此政治斗争也是剧烈的。

到19世纪后半期，政治道德所以能够代替唯物主义（至少在某些政客想像中是如此），只是因为社会敌对暂时有所缓和，政治斗争已经微不足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基础是整个民族的福利普遍提高，工人阶级上层人物的状况有所改进。但是我们所处的时期，我们的时代，在下述意义上和文艺复兴时代有其相似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一个是正在受临死的剧痛折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即将代替它的新世界。社会矛盾重新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政治权力，和道德一样，并不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10

年期间人们想像的那样毫无波折地日趋完美。政治和道德都苦难重重，必须沿着非常复杂曲折的轨道前进。和道德一样，政治直接从属于阶级斗争。作为一般规律，可以说：阶级斗争愈尖锐、愈激烈，社会危机愈深刻，政治性愈强烈，国家权力也就愈集中、愈残酷，而且愈加率直不讳地〔摒弃道德的外衣〕。

有些朋友认为，这本书提到材料来源的地方和我对这些来源的批判占去太多篇幅。我完全了解这种阐述方法的呆板滞涩。但是我别无选择。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深信不疑地接受像我这样一个作者、一个和他不得不为之立传的人关系如此密切而斗争又如此直接的作者的论断。我们的时代首先是一个撒谎的时代。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人类历史上其他时代的特点是比较真诚。撒谎是矛盾的产物，是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是压制个性的产物，是社会秩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讲，它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属性。有些时候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撒谎的程度就会超过一般水平，就会成为社会矛盾尖锐性本身的属性。我们的时代就是如此。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和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谎言制造工厂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这座工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新传记。……有些来源是斯大林本人捏造的。……不批判日积月累地伪造事实的细节，就不可能使读者对莫斯科审判这一类现象有所准备。……

希特勒特别强调栩栩如生的口才，认为这是领袖的惟一标志。据他说，任何著作都不能像演说那样影响群众，至少是不能使领袖和他的千百万信徒结成巩固的、有血有肉的纽带。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不会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从来不依靠演说的艺术，就得到了千百万追随者。诚然，他们

是经过多年努力才产生影响的。归根结蒂，写作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因为它可以使深度和高度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除擅长演说以外，一无所长的政治领袖总是肤浅的。一位雄辩家并不能造成著作家。相反地，一位伟大的著作家却可能激励千百个雄辩家。当然，为了和群众保持直接联系，生动的口才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列宁在有机会和群众面对面讲话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党的领袖。1905年，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露面也没有引人注目。在1917年以前，作为群众演说家的列宁并没有出场，就是在1917年也只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时期（4月、5月和7月）。列宁首先是作为一个著作家，作为宣传家的指导者，而不是作为演说家而取得权力的。这些宣传为他培养了干部，其中包括擅长演说的干部。

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一个完全例外的现象。他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说家。当举行凯旋式的队伍通过红场时，群众还不能在人群中认出他的形象。而这时他已经取得权力。斯大林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一个与人无关的机构取得权力的。而且并不是他创造了机构，而是机构创造了他。机构以及它拥有的力量和权威是布尔什维克党长期英勇斗争的产物。党本身又是思想的产物。这个机构本来是思想的体现，后来机构本身却成了目的。斯大林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间的脐带，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这个机构的首脑。列宁通过经常联系群众的办法创造了这个机构——如果不是直接地、通过话语保持联系，就是以他的信徒作为媒介、通过印好的文字保持联系。斯大林并没有创造、而是占有了这个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非常特殊的才能。然而，这不是历史创造者、思想家、著作家或演说家的才能。机构是从思想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才能首先就是蔑视思想。思想已经……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阅读暗杀者带来的一份手稿的时候，暗杀者用鹤嘴锄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打在脑后，使他脑浆迸裂。因此，本书这一部分和其他某些部分没有写完。〕

目 录

原编者的话	(1)
序 言	(1)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1)
第二章 “职业革命家”	(33)
第三章 第一次革命	(77)
第四章 反动时期	(120)
第五章 新的高潮	(178)
第六章 战争和流放	(230)
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	(262)
第八章 人民委员	(337)
第九章 内战	(379)
第十章 内战(续)	(429)
第十一章 从默默无闻到三巨头统治	(469)
第十二章 上台的道路	(512)
补遗一 热月式的反动	(539)
补遗二 “金托”当政	(576)
附 录 三种俄国革命观	(591)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如果我没有弄错，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而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值得争论的种族属性，而是被认为亚洲政治家共同具有的强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等特点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已经发展到野蛮程度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不是按照旧的含意使用这个名词，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是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所谓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但是，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显著。

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

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 250 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锅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安排适当的地位。早在公元 4 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辅罗斯要早 600 年。公元 10 世纪、11 世纪、12 世纪和 13 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的频繁的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入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18 世纪初，格鲁吉亚沙皇承认了莫斯科的宗主权，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保护，使他可以不受传统敌人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犯。他达到了眼前的目标，他的生命有保障了。沙皇政府修筑了必要的战略通道，对城市进行了局部的整顿，初步建立了学校系统，主要目的是使这些属于异族的子民俄罗斯化。当然，彼得堡的官僚政权不可能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用它本国也极为缺乏的欧洲文化来代替古老的亚洲的野蛮无知状态。

格鲁吉亚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却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建筑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因此具有亚洲家长制——包括亚洲的残忍——的特点。工业几乎一无所有。农业和房屋建筑事实上停留在两千年以前的水平上。酒是用脚榨出来的，保存在大泥潭里面。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不过是整个人口的 1/6。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这些城市仍然是官僚统治的军事和商业城市，只有少量工业。在基本农民群众头上兴起了一个士绅阶层。大部分士绅并不富裕，而

且缺乏文化素养。有些士绅和上层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显赫的头衔和矫揉造作的风度。由于格鲁吉亚过去曾经拥有小小的“威力”，由于它现在的经济停滞，由于它和煦普照的太阳和葡萄园，由于它缺乏责任心的习性，由于它拥有大量囊空如洗的地方绅士，人们把它叫做高加索的西班牙是不无道理的。

年轻一代的贵族敲打着俄罗斯高等学府的大门。他们抛弃了本阶级的陈腐传统——中俄罗斯对这种传统本来就不怎么认真看待——而参加到俄罗斯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集团里去。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市民渴望使自己的子弟在政府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军官、律师或教士，也纷纷效法贵族家庭的榜样。这样一来，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散布在俄国各地，在所有进步的政治运动和三次革命中都崭露头角。

1844年在梯弗里斯担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德国作家博登施太特曾经作出结论，认为格鲁吉亚人不但懒惰无能，而且没有其他高加索人那么聪明；他们在学校里研究科学、学习外文和表达能力方面都赶不上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雷克吕·埃利塞引用这个十分笼统的意见，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推论，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民族性，而是社会因素——由于格鲁吉亚学生来自落后的乡村，而亚美尼亚人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当然，后来的发展很快就消灭了教育上的差距。到1892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①在正教小学二年级念书时，在高加索人口中约占1/8的格鲁吉亚人在学生总数中却差不多占1/5（俄罗斯人占一半以上，亚美尼亚人约占14%，鞑靼人不到3%……）。但是，作为最古老的文化工具之一的格鲁吉亚文的特殊性对学习外语似乎的确是一种

① 这是斯大林原来的姓名。全名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译者注

障碍，在发音上留下了明显的标记。然而，这并不是说格鲁吉亚人都缺乏口才。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在沙皇制度下，他们只能三缄其口。但是在俄国日益“欧洲化”的过程中，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为司法界、后来又为议会的讲坛提供了大量——如果不是第一流的、至少是出色的——演说家。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当中最能说善辩的大概就是格鲁吉亚人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因此，把斯大林的民族血统作为他缺乏演说才能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体格上看，也很难说他是代表格鲁吉亚人的恰当的典型。格鲁吉亚人是以高加索最漂亮的民族闻名于世的。

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谢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搀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谢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谢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性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以外，还可以碰到淡漠中揉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例外，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领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要在民族形而上学

这个无法得出结果的领域里冒险跑得太远吧。

哥里县城位于库拉河畔，景色优美，距梯弗里斯 76 公里，在外高加索铁路上。哥里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根据传统的说法，哥里城是公元 12 世纪为了躲避土耳其人而逃来的亚美尼亚人建立的。这座小城后来多次遭到袭击，因为当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形成一个从事商业的城市阶级，以家资万贯闻名，是掠夺者垂涎的对象。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哥里是一点一滴扩充起来的，逐渐把来自格鲁吉亚和鞑靼乡村的移民吸收进来。约莫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鞋匠从故乡吉第里洛村搬到哥里的时候，这座小城已经拥有 6 000 左右的人口，各族人民杂居在一起，还有好几座教堂，许多商店和更多的供邻近地区农民留宿的客店，一所设有鞑靼系的师范学校，一所女子古文预备学校和一所初级中学。

梯弗里斯省的农奴制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未来的总书记约瑟夫诞生前 14 年才废除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仍然反映出农奴制的影响。斯大林的父母是否能够读书写字尚可怀疑。诚然，外高加索当时出版五种格鲁吉亚文的日报，但是它们的发行量总共不到 4 000。农民的生活仍然不见经传。

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呎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没有。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

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

关于朱加施维里一家和约瑟夫的童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表任何确凿的文件。这种文件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他们的环境文化水平极为原始，没有关于生活的记载。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斯大林本人已经 50 多岁以后，才开始出现追叙他父亲家庭情况的材料。通常都是第二手材料，作者不是满怀仇恨而又非一贯严肃认真的敌人，就是按照官方党史委员会的建议——差不多可以说是命令——写作的十分勉强的“朋友”，因此大部分都是按题作文，照本宣科。要想从这两种歪曲之间用折衷的办法找到真理当然过分简单化。但是，如果把两种材料加以排列对比，既考虑到它们故意沉默掩饰之处，也考虑到它们夸大之处，借助于后来的发展情况，用批判性眼光来衡量叙述本身内在的脉络，就有可能接近真理。我并不想牵强附会地描绘出完整的画面。在写作过程中，我将努力为读者提供我的推测或结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的基本内容。

前面提到过的〔约瑟夫·〕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包括的具体细节最丰富。这本回忆录是 1932 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的，书名是《Stalin und die Tragödie Georgiens》（《斯大林和格鲁吉亚的悲剧》）。由于作者过去是孟什维克，后来又迹近国社党人，他的政治记录不能使人深信不疑。但是也不能把他的文章完全撇开不管。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具有十分明显的说服力，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甚至有些初看起来值得怀疑的事情也在几年以后发表的官方回忆录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明。我还要作点也许不是不恰当的补充：我根据苏联出版物故意保持沉默或闪烁其词的地方作出的某些猜测，从伊雷马什维利的书里得到了证实（我直到最后一

分钟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如果认为，作为一个流亡者和政敌的伊雷马什维利力图贬损斯大林的形象或者是把它描写得一团漆黑，那就想错了。情况刚好相反，他对斯大林的才干几乎是津津乐道，而且明显地给他加油添醋；他承认斯大林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牺牲个人利益；他多次强调斯大林对母亲的依恋，并且用最扣人心弦的笔触描绘斯大林初婚的情况。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位原梯弗里斯中学教师的回忆录就会使人感到这是一本由几层不同内容组成的文件。它的基础无疑是遥远的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基本内容必然经过记忆和想像的事后加工，受到斯大林后来的命运和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影响。而且必须指出：回忆录里有些细节描写是暧昧不清的（虽然从本质上说这是无足轻重的），其原因应当归诸某一类型的回忆录作者经常会有的缺陷——就是企图使他们的叙述达到“艺术上的”完整。在事前提出以上警告以后，我认为，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可以用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作为一种依据。

早期的传记材料总是说斯大林是一个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斯大林直到1926年才第一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但是这个矛盾是表面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和俄国大部分工人一样，朱加施维里父亲的护照仍然把他写成农民。然而困难并没到此为止。人们总是把这位父亲说成是：“梯弗里斯阿利哈诺夫制鞋工厂的工人”。可是他的家庭住在哥里，而不是住在高加索的首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和家庭是分开住的呢？如果家庭仍然留在乡村，这种假设可能说得通。然而家庭和养活家庭的人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却是极不可能的。此外，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同伴、和他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戈戈希亚以及经常拜访斯大林的伊雷马什维利都肯定无疑地说，维萨里昂在邻近的教堂街上一座漏雨的泥屋里做工。因此我们推测，这位父亲在梯弗里斯的工作

是临时性的，可能他的家庭当时仍然住在乡村。但是在哥里的时候，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已经不是鞋厂工人——县城里根本没有工厂——而是一个独立的小手艺人。在这一点上故意含糊其辞无疑是为了避免削弱关于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血统的印象。

和格鲁吉亚大多数妇女一样，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母亲。最初生的三个孩子都在襁褓时期夭折。在1879年12月21日第四个孩子诞生的时候，她还不过20岁。斯大林7岁时患过天花。这场病为他的余生留下了证明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和环境的痕迹。法文斯大林传作者苏瓦里纳说，他除脸上有麻子以外，左臂还有恶病质。据他说，这种病和两个脚趾长在一起的情况证明，斯大林受到父亲嗜酒的遗传影响。一般地说，鞋匠，至少是中俄罗斯的鞋匠，是以酗酒著名的，所以“醉得像鞋匠”成了一句谚语。苏瓦里纳从“各种人士”（极可能是孟什维克侨民）那里知道的关于遗传的种种推测有多大真实性是很难判断的。沙皇宪兵在列举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明显特征”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萎缩了的手臂，倒是并连的脚趾曾经一度在1903年被沙贝尔斯基上校提到过。可能宪兵档案和其他所有文件一样，曾经在发表以前经过检查官不够彻底的删削。但是不能不指出：斯大林后来甚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也习惯在左手上戴一只温暖的手套。当时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有风湿病。不过归根结蒂，无论是真是假，这种次要的身体特征现在来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远比这重要的，是分析他的父母的真正性格和他的家庭气氛。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官方搜集的回忆录很少提到维萨里昂，对他的情况几乎保持完全沉默，然而同时却用同情的语调大谈叶卡特林娜从事家务劳动的艰苦生活。戈戈希亚说：“约瑟夫的母亲为哥里有钱人家洗衣服或烤面包，收入非常微薄。她每月得付1.5卢布房钱。然而她并不是总能省下1.5卢布的。”我们因此知道付房

租的责任落在母亲而不是落在父亲头上。此外，“贫穷和母亲辛苦劳碌的生活都在约瑟夫的性格里留下了印记……”——仿佛他的父亲根本不是家庭的一部分。只是到后来，作者才附带捎上这句话：“约瑟夫的父亲维萨里昂整天做工，缝补鞋子”。但是父亲的工作并不是和家庭生活或家庭谋生问题联系起来谈的。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提到父亲完全只是为了避免留下空白。

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另一同学格卢尔吉泽完全没有提到他父亲。他写道，约瑟夫的母亲“靠剪裁和缝洗内衣为生”。这种并非无意的沉默所以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并不认为妇女是家庭的主角。相反地，按照因循守旧的山民极端顽固地保持着的古老的格鲁吉亚传统，妇女一贯屈居家庭奴隶的地位，几乎完全不准在她的威严的老爷兼主人的面前出现，对家庭事务毫无置喙余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责罚。甚至在教堂里，母亲、妻子和姊妹都得坐在父亲、丈夫和兄弟的后面。回忆录的作者们把母亲放在通常应由父亲占据的地位上，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完全避免谈到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性格，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在评论格鲁吉亚极端节约粮食的情况时补充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格鲁吉亚人喝那么多的酒。”诚然，维萨里昂迁往哥里以后很少可能独自维持一片葡萄园。但是作为补偿，城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有 dukhans（小酒店），店里出售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同样吃香。

在这一点上，伊雷马什维利提出的事实特别令人信服。和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然而比他们早五年，他在描写叶卡特林娜的性格时是满怀同情的。叶卡特林娜对自己的独养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对和他一起玩耍和念书的同伴也和蔼可亲。卡佳（人家都这样叫她）是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虔诚信教。她劳碌一生，为牛为马，从未间断：为上帝服务，为丈夫服务，为儿子服务。由

于经常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做针线活，她的目力衰退，很早就戴上眼镜。不过当时格鲁吉亚所有年逾 30 的已婚妇女都被人看成和老太婆差不多。她的生活变得如此艰苦，使邻居们对她更为同情。据伊雷马什维利说，作为一家之长的维佳（维萨里昂）性情严厉，是一个毫无心肝的酒疯子。他把自己赚的一点点钱大部分都喝光了。所以付房租和养活家庭的双重负担都落在母亲头上。她束手无策地、悲哀地看着维佳虐待儿子，“从他内心驱走上帝和人的爱，使他充满对自己的父亲的憎恨”、“无缘无故的痛打使孩子变得和父亲一样冷酷无情。”约瑟夫在苦痛中开始思索永恒的人生之谜。父亲的早死并没有使他伤心，只是使他感到更为自由。据伊雷马什维利推断，这个孩子很小就开始把他对父亲的满腔怒火和渴望报复的心情扩大到一切对他拥有或可能拥有任何支配权的人身上去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实行复仇计划就成了支配他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即使承认这句话是根据事后的评价说的，也丝毫不能降低它的重要性。

1930 年，叶卡特林娜已经 71 岁。当时她住在原梯弗里斯总督府几间普普通通的下房里。她在通过翻译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沙夏（约瑟夫）一向是一个好孩子。……我从来没有机会处罚他。他刻苦学习，不是念书就是讨论，什么都想了解……沙夏是我惟一的儿子。当然，我很宝贵他。……他父亲维萨里昂希望沙夏成为一个能干的鞋匠。但是沙夏 11 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我不想让他做鞋匠。我只有一个希望——他会成为教士。”苏瓦里纳从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人当中搜集来的消息的确完全不同：“他们认识沙夏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冷酷，毫无感情，对母亲缺乏尊敬。他们还提出一些‘微妙的’事实，来证明自己记得不错。”但是这位传记作者自己也说，他的消息来自斯大林的政敌。这批人当中还流传着不少传奇性故事，只是内容恰好相反。另一方面，伊

雷马什维利在谈到沙夏对母亲的热烈依恋的时候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当然，孩子对家庭的女恩人和在他父亲面前维护他的女保护人不可能有别样的感情。

我们时代的宫廷人物画家、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克里姆林宫又找到一次机会来运用他的提启发性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较好的心里洞察力和政治敏感结合在一起。墨索里尼先生，你爱好大自然吗？马萨里克博士^①，你对叔本华^②有什么看法？罗斯福先生，你相信将来会比现在好吗？在类似这样的质询中，斯大林在这位鼎鼎大名的外国人面前显得局促不安，不停地用颜色铅笔画小花小船。至少路德维希是这样说的。这位作家曾经根据威廉·霍亨索伦的萎缩的手臂，用心理分析方法为这位前德皇写了一篇连老弗洛伊德都冷嘲地感到难以理解的传记。路德维希没注意斯大林的萎缩的手臂，更不必去说他并生在一起的脚趾。但是他企图从斯大林幼年遭受父亲痛打这件事上找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革命生涯的起因。在熟悉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以后，不难了解路德维希这种想法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③如果认为这些话具有任何文件价值就未免有些轻率，因为不仅斯大林的肯定和否定回答——正如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样——容易毫不费力地发生变化，而且在类似情况下，任何其他的人也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无论如何，人们不能责备斯大林拒绝公开抱怨他早已去世的父亲。令人惊讶

① 托马斯·加里古德·马萨里克 (Tomas Garrigud Masaryk) (1850—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② 叔本华 (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国悲观哲学家。——译者注

③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中文版第305页。——译者注

的倒是这位恭谨的作家的缺乏体贴。

但是，痛苦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形成这个孩子严厉、任性和复仇心很重的个性的惟一因素。广泛得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促进了这种性格的形成。斯大林传记作者之一曾谈到无上显赫的阿米拉赫维里亲王不时骑着高头大马到这个穷鞋匠家来修他刚在狩猎中扯破的靴子；也谈到鞋匠的儿子，一头蓬松的头发覆盖着低矮的额头，紧握小手，如何用利剑似的充满仇恨的眼光瞪视着亲王。我们认为，这个写得活灵活现的场面本身属于幻想的领域。然而他的贫苦环境和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封建主的相对的奢侈豪华间的对比不能不在孩子心灵中留下尖锐持久的印象。

哥里市民本身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高踞在下层居民头上的是以沙皇和他的高加索总督戈利津亲王——一个普遍受到罪有应得的憎恨的阴险毒辣的酷吏——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县吏。土地所有者和亚美尼亚商人同县政当局狼狈为奸。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平民，虽然他们大家的地位都很卑微——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分裂成森严的等级壁垒。一切曾经略微出人头地的人都兢兢业业，惟恐有失自己的身份。吉第里洛村的农民对城市的疑虑在哥里就变成了穷手艺人对卡佳不得不为他们缝缝洗洗的比较兴旺的家庭的敌视。社会等级在学校里表现得同样露骨。教士、小绅士和官僚的子弟不止一次让约瑟夫显著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从戈戈希亚的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鞋匠的儿子很小就开始感到——而且是尖锐地感到——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屈辱。“他不喜欢拜访生活优裕的人。尽管我一天去看他好几次，他却很少来看我，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我的叔父生活很阔绰。”这就是社会抗议的最初源泉。当时抗议仍然出于本能。后来，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气氛中，这种抗议就把这位正教中学学生改造成为一个革命家。

在小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天赋不凡的儿子或者是独生子只有两种高尚的职业：文官或教士。希特勒的母亲梦想自己的儿子会成为牧师。在她以前大约 10 年，在一个比她还要卑微的环境中，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也怀着同样愚蠢的梦想。希望看见儿子穿上教士法衣的梦想附带也说明鞋匠维佳家庭里的“无产阶级精神”是多么稀薄。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未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结果。

尽管正教教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低，但是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不缴人头税，……不挨皮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只是在废除农奴制度以后，农民才有可能进入教士阶层。然而这个特权受到警察当局规定的限制：农民的儿子必须得到总督特许才能得到教会的职务。

未来的教士是在几十所正教中学里培养出来的。正教小学是预备阶段。在政府教育系统中，正教中学的地位相当于普通中学，不同的是正教中学里的世俗课程按说只是神学的一根细弱支柱。在旧俄时期，大名鼎鼎的 boorsy（神学校）以野蛮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习俗、中世纪的教育学和暴力统治法则而臭名远扬，更不用说其中的齷齪和挨饿受冻的情况。圣经谴责的一切罪恶在这些虔敬的温床上得到繁荣的发展。作家波米亚洛夫斯基作为无情揭露真相的《神学校随笔》〔《Ocherki boorsy》，1862 年出版〕的著者而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永垂不朽的地位。这里不能不直接引用波米亚洛夫斯基传的著者在谈到波米亚洛夫斯基本人时说的一句话：“这个时期的学校生活在他身上造成了怀疑、弄虚作假的习惯、敌对情绪和对周围环境的憎恨。”诚然，亚历山大第二统治时期进行的改革给宗教教育最腐臭霉乱的角落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改进。然而迟至 19 世纪最后 10 年期间，正教小学——特别是位于

遥远的外高加索的正教小学——仍然是俄国“文化”地图上最黑暗的污点。

很久以前，沙皇政府已经通过并非不流血的手段摧毁了格鲁吉亚教会的独立性，使它从属于彼得堡宗教会议的统治。但是在格鲁吉亚的下层教士中，对使他们俄罗斯化的人的敌对情绪仍然在隐隐燃烧。对他们的教会的奴役动摇了格鲁吉亚人传统的宗教虔诚，在城市和乡村都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铺平了道路。正教小学里的恶劣气氛尤为显著，因为这些学校的任务不仅是使学员俄罗斯化，而且要培养他们为教会充当灵魂警察的角色。师生关系充满尖锐的敌对。讲授用的是俄文；格鲁吉亚文一星期只教两次，而且经常遭到轻视，被认为是一个劣等种族的语言。

1890年，显然是在他父亲去世不久以后，11岁的沙夏就夹着洋布书包进入正教小学。^①按照他的同学的说法，这个孩子在学习教义答问和祈祷中表现了巨大的热情。戈戈希亚说，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沙夏从教师的讲授中就能把功课记住，不需要复习。事实上，斯大林的记忆力——至少是对理论的记忆力——是非常平凡的。但是无论怎么说，要当堂记住功课必需格外专心。毫无疑问，僧侣的职务当时是沙夏本人的最大野心。决心对颖悟和记忆力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同学卡帕纳则证明说：在他13年的学习和以后35年充当教师的整个时期，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像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样具有天赋和才干的学生”。甚至在柏林而不是在梯弗里斯写书的伊雷马什维利也认为，沙夏是正教小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其他人提供的证据投下了许多阴影。格卢尔吉

① 按《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79页）和《斯大林传略》（1949年莫斯科版第5页）说法，斯大林是1888年进哥里四年制正教小学读书，1894年毕业的。——译者注

泽说：“最初几年，在预备班的时候，约瑟夫成绩很好。随着时序推移，他显示了愈来愈灿烂的才华，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奉命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在这样一篇文章里出现“最优秀之一”这种谨慎说法，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约瑟夫并不是最优秀的，并不比全班同学高明，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另外一个同学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回忆具有同样的性质。他说，约瑟夫“是最贫苦、最有天赋的人里面的一个。”换句话说，并不是最有天赋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猜测：要不就是他在不同班级的成绩水平有所不同，要不就是某些本身学习成绩就很落后的回忆录作者在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时缺乏眼光。

戈戈希亚没有明确说明约瑟夫在班上的具体名次。他说，约瑟夫在发展上和知识上都“大大超过他的同学”。沙夏阅读学校图书馆里可以得到的一切书籍，包括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古典著作。当然，这些书籍是经过当局仔细筛选的。毕业考试以后，约瑟夫得到了奖状。这份奖状在“当时是一个不平常的成就，因为他的父亲得到了奖状。”这份奖状在“当时是一个不平常的成就，因为他的父亲不是牧师，只是一个鞋匠”。真是画龙点睛！

整个说来，在梯弗里斯写的关于“领袖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录是相当枯燥无味的。“沙夏把我们拖进合唱队，用他那嘹亮愉快的歌喉领我们唱心爱的民族歌曲。”在打球的时候，“约瑟夫懂得如何挑选最优秀的球员，所以我们的球队总是打胜仗。”“约瑟夫学会了绘画，画得好极了。”但是所有这些特点一个也没有发展成一种才能：约瑟夫既没有成为歌手，也没有成为运动员，也没有成为艺术家。像下面这一类报道听起来更难令人信服：“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具有惊人的谦逊，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多情善感的同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觉得他高人一头”，等等。倘若这些话都是真的，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时光流转，约

瑟夫变成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人。

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更生动，而且更接近真实情况，是其他回忆录望尘莫及的。他把和他同名的人^①描绘成一个身材瘦长、肌肉发达和满脸雀斑的孩子，非常顽固、难于接近和任性。无论是指挥游伴还是扔石子或爬山，他总是能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尽管沙夏显然是大自然的热烈爱好者，他对自然界的生物却缺乏同情。对人或动物的怜悯是和他格格不入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沙夏对于同伴的喜怒哀乐只会挖苦嘲弄。”和激流冲击过的石块一样，所有这一切可能经过记忆加润饰，然而并非虚构。

伊雷马什维利说，约瑟夫的反叛行为早在哥里念书时就已经开始。他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据说，沙夏因为领导学童抗议，特别是用嘘叫起哄来反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受处分。然而官方回忆录的作者们——这次并没有任何预定的目的——却说约瑟夫在整个这些年代甚至在态度上都是一个足资楷模的学生。戈戈希亚写道：“他一般是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不喜欢胡作非为和恶作剧。他一做完作业就赶忙回家。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埋头读书。”据同一位戈戈希亚说，学校每个月都给约瑟夫发津贴。如果对上级、特别是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有任何不恭敬的地方，这种津贴是十分不可能的。其他所有回忆录作者都认为，约瑟夫的反叛气质是他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书时期形成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没有人提到他参加激烈的抗议风暴的任何事例。伊雷马什维利和其他某些人对个别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记忆错误，显然是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认为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是正教小学的直接继续。除伊雷马什维利以外，

^① 指斯大林。伊雷马什维利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叫约瑟夫。——译者注

任何人都没提到约瑟夫领导嘘叫起哄的事。这一点较难解释。这纯粹是记忆的偏差吗？是否约瑟夫的确曾经在某些“音乐会”上起过一种隐蔽的、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作用呢？这种做法和这位未来阴谋家的性格也是毫不矛盾的。

约瑟夫是什么时候和他父亲一辈的信仰断绝关系的，现在还无法确定。据同一位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暑假期间和另外两个学童喜欢在乡村教堂里唱歌，虽然当时——即在学校高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超过虔信宗教的年龄。另一方面，根据格卢尔吉泽的回忆，13岁的约瑟夫有一次曾经对他说：“你知道，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约瑟夫在回答他的谈话对方的惊叫时，暗示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从中清楚看出“关于上帝的谈论完全是胡扯”。这是什么书呢？“达尔文。你一定得读读这本书。”提到达尔文就使这件轶事带上了令人怀疑的阴影。生长在一座落后城镇里的一个13岁的孩子不大可能读到达尔文的书并从中得出无神论的信念。根据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他是15岁走上革命思想的道路的。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梯弗里斯。诚然，他可能在此以前就和宗教脱离了关系。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和斯大林同样从正教小学升入正教中学的格卢尔吉泽把日期搞错了，提前了几年。对学童的残暴行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干出来的。否定上帝的存在无疑并不困难。无论如何，把教员和整个当局的道德依据从他们脚下抽掉，就使为否定上帝所必需的内在力量得到了报酬。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力气大就横施残暴。无论这次谈话发生在什么地点和时间，是在哥里还是一两年后的梯弗里斯，沙夏的生动的说法——“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

至于约瑟夫何时考入正教中学，各种官方出版物提出了三种

不同说法：1892年、1893年和1894年。他在正教中学念了多久呢？《共产党人历书》的回答是6年。斯大林的秘书为他写的传略说是5年。他过去的同学戈戈希亚断然说是4年。从正教中学原址的一张照片可以依稀辨认出来，那里有一块纪念牌上写着“伟大的斯大林”在这座房里念书的时间是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7月21日；也就是5年。是否有这种可能：官方传记避免提到后述日期，是因为这个日期说明朱加施维里已经远远超过正教中学学生应有的年龄？无论如何，我们宁愿依据纪念牌，因为纪念牌上的日期很可能是以正教中学本身的文件作为基础的。

书包里夹着哥里学校颁发的品行良好的证件，15岁的约瑟夫在1894年秋天首次来到格鲁吉亚历代帝王的古都梯弗里斯。这座大城市必然使他感到惊异不置。如果说这座半亚洲、半欧洲式的城市给年轻的约瑟夫造成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种说法不算夸大。梯弗里斯在它将近1500年的历史里曾经多次沦于敌人统治之下，遭受过15次摧毁，几次被夷为平地。用武力一路杀入梯弗里斯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对当地的建筑和人民风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在俄罗斯征服格鲁吉亚以后，原来的首都成为外高加索地区的省会和行政中心，这座城市的欧洲部分得到了发展。在约瑟夫进正教中学的那一年，梯弗里斯的居民已经超过15万。占人口1/4的俄罗斯人不是外高加索为数颇多的被放逐的异教徒，就是军人和文官。工商业自古以来就集中在人数最多（占38%）而且最富裕的亚美尼亚人手里。和乡村联系在一起的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一样，约占人口的1/4。他们属于由手艺人、小商小贩、低级职员和军官组成的下等阶层。1901年出版的一篇描写这座城市的文章说：“除了具有现代欧洲风味的大街以外……还有错综复杂、令人辨不出方向的狭窄、弯曲而骯髒的纯粹亚洲式的胡同、小广场和市场，周围是东方式

的门面完全敞开的铺子、小摊子、咖啡室和理发店，到处是脚伕、运水工人、信差、骑者，成群结队的骡驴驮子和骆驼商队等等，摩肩接踵，喧闹不堪。”缺乏污水排泄系统，供水不足，夏季酷热，街道上灰尘呛人、无孔不入，市中心用煤油灯照明，偏僻街道则一片漆黑——这就是 20 世纪开始时外高加索的行政文化中心的特点。

和约瑟夫一同到达梯弗里斯的戈戈希亚说：“我们得到许可，搬进一栋四层楼房，搬到我们宿舍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大房间里去。这座建筑物就是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由于他在哥里正教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正教中学录取，并且得到包括衣服、鞋子和课本在内的全部供应。必须再次指出，如果他曾经表现反叛性格的话，这些待遇都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谁知道呢，或许当局对他可能成为格鲁吉亚教会的装饰品这一点是寄予厚望的吧？和预备学校一样，正教中学也用俄文授课。大多数教员从民族上说是俄罗斯人，从职务上说是俄罗斯化的执行者。只有表现加倍热心的格鲁吉亚人才能担任教员。校长赫蒙格尼斯教士是俄罗斯人；督学阿巴希泽教士是格鲁吉亚人，也是正教中学里最阴险最可恶的人。最早谈到正教中学的情况、而且谈得最全面的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

“学校生活既悲惨又单调。昼夜锁在兵营似的屋子里，我们感觉自己像丝毫没有触犯刑法却得坐几年牢的囚徒。我们大家都垂头丧气、愁眉苦脸。青年的欢乐受到把我们和外界隔绝起来的房间和走廊的窒息，几乎从来得不到表现。青年人的气质偶尔冲破樊笼，也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长的压制。沙皇政府对学校的监督禁止我们阅读格鲁吉亚文学和报纸。……他们害怕我们受到我国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鼓舞，担心我们年轻的灵魂会受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感染。甚至世俗当局允许我们阅读的少数文学作品，也受到

教会当局的禁止，因为我们是未来的教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著作和其他古典作品都是我们难以到手的。”

正教中学的日子过得和监狱或兵营里一样。学校生活从早晨7点开始。祈祷，喝茶，上课，然后又是祈祷。除课间休息以外，讲课一直继续到午后2点，然后是祈祷，晚餐。食物又坏又少。只有3—5点的间歇时间才准离开正教中学监狱的大门。5点以后门都上了锁。点名。8点吃茶。准备功课。10点钟——在再次祈祷以后——全体上床就寝。戈戈希亚证实：“我们感觉自己仿佛陷进了一座石牢。”在星期天和假日的宗教仪式中，学生们一连得站三四个钟头，而且总是站在教堂地面的同一块石板上，一只脚站麻木了就换另一只，不断受到教士们的监视。“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仪式的影响下，甚至最虔诚的信徒也会被弄得不知如何祈祷是好。我们装出一副虔诚的鬼脸，不让值班的教士发觉我们的思想。”

虔诚的精神照例和警察镇压的精神密切结合在一起。满怀敌意、疑心重重的阿巴希泽督学监视着寄宿生，注意他们的思想状态和消磨时间的方式。学生们吃罢晚饭回到房间不止一次发现，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房间曾经遭受搜查的新证据。教士们还经常搜查正教中学学生的身体。惩罚的方式包括粗暴的斥责、坐黑房（黑房很少有空闲的时候）、扣操行分数（从而可能使一切希望尽成泡影），最后就是把学生从这个圣中至圣的地方开除出去。体弱的学生直接从正教中学进入坟墓，得救的道路可真是崎岖难行、充满荆棘！

正教中学的教学方法具有耶稣教徒为了箝制儿童的灵魂而创造的方法的一切特点，然而采取的形式更原始、更粗暴，因此更无效果。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很难培养忍气吞声的驯服精神。在俄国几乎全部60所正教中学里面，都有些学生——多数是在大学生影响下——甚至还没有机会穿上教士法衣就拒绝充当教士。他们对经院哲学充满蔑视，阅读富有教育意义的

小说、俄国激进报刊和阐述达尔文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从民族主义和一般政治源泉得到滋养的革命激情已经具有一定的传统。这种激情过去曾经通过和教员发生尖锐冲突、公开表示愤怒、甚至打死校长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斯大林进正教中学的10年前，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曾经殴打教员，因为这个教员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格鲁吉亚的语言。季布拉泽后来成为高加索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老师之一。

1885年，梯弗里斯出现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正教中学的毕业生在这些小组中立刻取得了领导地位。除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以外，还有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未来的领袖诺·饶尔丹尼亚、未来的杜马代表和1917年2月革命期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尼古拉·齐赫泽和注定后来要在高加索和全国的政治运动中起显著作用的其他一些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处于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阶段。正教中学所以成为高加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温床，纯粹是因为梯弗里斯没有大学。在格鲁吉亚这一类落后的非工业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即使不能说是学究式的，也是极为抽象的。正教中学的学生至少受过某种逻辑推理的训练。但是，促使人们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对社会和民族状况的深刻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迫使豪放不羁的青年人沿着革命的道路寻找出路。

约瑟夫根本没有机会在梯弗里斯开辟新的道路，虽然苏联的历史大师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季布拉泽打出的一拳在正教中学校园内还可以听到它的余响。正教中学过去的学生当时已经是左翼舆论的领袖，他们和自己的后娘——正教中学——并没有失去联系。对于那些只需要一声号召就会醒悟过来的心怀不满、满腔激愤的骄傲的年轻人，任何机会、一次个人会晤或极为轻微的

推动，都足以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走上革命的轨道。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必然是弃绝宗教。如果这个孩子有可能从哥里带来残余的信仰的话，那么一到正教中学，这种信仰无疑就消灭殆尽了。从此以后，约瑟夫对神学肯定毫无兴趣了。

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的野心已经达到如此高度，所以他的成绩远远超过我们。”倘若真是如此，这句话也只适用于一个很短的时期。格卢尔吉泽说，在正教中学的课程中，“约瑟夫爱好普通历史和逻辑学”，对其他课程的研究只求考试及格。他对圣经的感情冷淡下来以后，就对凡间的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得到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戈戈希亚说：“他们发现了能干而且勤学好问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开始和他交谈，并为他提供书籍杂志。”格卢尔吉泽也说：“书籍是约瑟夫形影不离的朋友，他甚至吃饭时也手不释卷。”一般说来，如饥似渴地读书是萌芽时期的显著特点。等到晚间最后一次检查结束、教士们熄灯以后，这些年轻的阴谋家就拿出暗藏的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把整个心灵浸沉在书里。约瑟夫熬夜读书的时间很长，开始露出病容和睡眠不足的样子。伊雷马什维利说：“当他开始咳嗽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夺过他的书来，把他的蜡烛吹熄。”格卢尔吉泽曾经追述正教中学学生暗中狼吞虎咽似地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雪莱、里别尔特的《文化史》、俄国激进主义宣传家皮萨列夫……的情况。“有时我们在教堂做礼拜时也躲在椅子后面读书”。

格鲁吉亚民族文学作品当时给沙夏的印象极为强烈。伊雷马什维利曾经描写这种革命气质最初爆发的情况。在这种气质里，清新的理想主义揉杂着陡然觉醒的野心。伊雷马什维利追忆说：“沙夏和我经常谈论格鲁吉亚的悲惨命运。我们被诗人肖塔·鲁斯塔维利的作品弄得如醉如痴……”《卡兹别克》的格鲁吉亚作者写了一篇传奇故事《努奴》。这篇故事的男主角柯巴成了沙夏模仿的对

象。受压迫的山民在反对沙皇当局的斗争中由于叛徒出卖而失败，丧失了他们仅剩的一点自由。山民起义的领袖为祖国、为妻子努奴牺牲了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从那时起，柯巴“就被沙皇视若神祇……他希望成为另一个柯巴，一个和‘柯巴’同样闻名的战士和英雄……”约瑟夫把这位山民领袖的名字当做自己的名字，不愿意别人用任何其他名字叫他。“当我们把他叫做柯巴的时候，他脸上容光焕发，充满自豪和快乐。沙皇把这个名字保持了许多年。他开始为党写文章和进行宣传时用的第一个笔名也是柯巴^①……甚至现在，格鲁吉亚所有的人还把他叫做柯巴或柯巴—斯大林”。官方传记作者丝毫没有提到年轻的约瑟夫对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热烈兴趣。在他们的著作中，斯大林一出现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初期那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里面，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柯巴”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和平共处是不难理解的。

据戈戈希亚说，约瑟夫在这一年里已经发展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成为正教中学一群同志的领袖。如果相信贝利亚^②这个最正统的历史学家的话，“斯大林在1896

① 《斯大林全集》中第一次出现“柯巴”这个笔名是1906年7月13日《新生活报》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一文的署名。在这以前，斯大林用过“依·贝索什维里”的笔名。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3—225页。——译者注

②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苏联政治警察头子，曾经多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脑。过去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肃反委员会分子。在《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讲话发表以后，他陡然获得历史学家的声誉。这个讲话原来是在1935年7月21日和22日的两次会上对梯弗里斯共产党积极分子发表的。在讲话中，他为斯大林创造了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早期革命生涯的故事。贝利亚是斯大林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原编者注

年至 1897 年期间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领导了两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领导。伊雷马什维利的故事可能比这个说法真实得多。据他说，包括沙夏·朱加施维里在内的 10 个正教中学学生组织了一个秘密的社会主义小组。“年龄最大的学生杰夫里亚尼被选为领袖，工作态度极为严肃”。他拟订了——毋宁说是从校外的推动者那里拿到了——一个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小组成员必须在 6 年以内把自己训练成熟练的社会民主主义领袖。这个纲领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秘密的小组会上要宣读论文并热烈交换意见。戈戈希亚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小组的工作并不限于进行口头宣传。约瑟夫“创办和编辑了”一份手写的、供大家传阅的格鲁吉亚文半月刊。十分警觉的阿巴希泽督学有一次曾经在约瑟夫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篇为我们的手抄杂志写的文章”。类似这种刊物，无论内容如何，不仅在神学校、甚至在普通学校也是严加禁止的。阿巴希泽的发现结果只带来一次“警告”和扣操行分数的处分。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这份杂志是无伤大雅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一切事情都讲得很详细的伊雷马什维利对这份杂志居然只字不提。

约瑟夫在正教中学一定比在预备学校甚至更尖锐地感到自己的穷困。戈戈希亚有次附带提到“……他囊空如洗，而我们可以收到父亲寄来的包裹和零用钱”。在学校准许外出的两个钟头里，境遇较好的家庭的子弟可以买的东西约瑟夫一样也买不起。这使他对未来的幻想和打算更加荒唐，对他处理同学关系的本能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伊雷马什维利说：“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是一切接受他专横跋扈的意志支配的人的好朋友。”但是仅限于这些人。在教师面前愈有必要约束自己，在小组同志当中就愈加任性地作威作福。和

整个世界完全隔绝的秘密小组成为约瑟夫考验自己的力量和其他人的耐心的天赐的场所。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认为由任何其他同学担任小组的领袖和组织者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大部分论文都是他宣读的。”无论是谁，只要胆敢驳斥他，甚至只要胆敢企图对他做什么解释，就会立刻引起他“无情的仇视”。约瑟夫懂得如何迫害人，如何进行报复。他懂得如何打击弱点。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开始时的团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柯巴的“刚愎冷酷、恶毒嘲弄在他的朋友当中引起了个人纠纷”。对柯巴的“恶毒嘲弄”、粗暴和喜欢报复的性情的这一类指责，在他的一生中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

在埃萨德贝写的一本多少有些捕风捉影的传记中，据说年轻的约瑟夫在梯弗里斯的时候（大概是进正教中学以前）曾经和“金托”——街头英雄、碎嘴子、歌者和无赖汉——厮混在一起，过着流浪生活，并且从他们那里学到粗暴的习气和满嘴粗话。这一切显然是捏造。约瑟夫一离开正教小学就直接进正教中学，因此中间根本没有时间使他可以过流浪生活。不过问题在于，“金托”这个绰号在高加索字典中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字眼。它的意思是一个善于出谋划策的、愤世嫉俗的、能够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拿这个名字来指斯大林是在1923年秋天，说这句话的人是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菲利普·马哈拉泽。约瑟夫或许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得到这个称号的，因此后来引起了他曾经在街头流浪的传说。这种情况是否不可能呢？

同一位传记作者谈到“沉重的拳头”，大概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和平手段失效时曾经利用“沉重的拳头”取得胜利。这一点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按照斯大林的性格，他从来不会冒险采取“直接行动”；即使在早年，他十之八九也不会这么干。碰到需要真刀真枪的时候，他宁愿而且善于驱使别人去干；他自己即使不

是完全躲在幕后，也只是暗中行事。伊雷马什维利说：“人们是因为害怕他的粗暴的怒火和刻毒的讽刺才追随他的。他的党徒觉得受他控制就可以相安无事，因此他们服从他的领导。……只有精神空虚而又好勇狠斗的人才能和他交朋友……”不久以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结果。有些人离开了小组，还有些人对讨论愈来愈缺乏兴趣。“不过几年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柯巴，另一派反对柯巴；为一种事业进行的斗争变成了令人作呕的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这是约瑟夫生活道路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勾心斗角”，然而并不是最后一次。这种情况后来还发生过许多次。

这里不能不提到下面这件事，虽然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后。当时已经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各地党委当中滋生的个人明争暗斗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然后出人意料地插出这么一句话：“但是，这些争执也有它们积极的一面，因为它们能够使领导像磐石般地团结起来。”听众惊讶得面面相觑；而演说家却不动声色地继续作他的报告。即使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所谓的“磐石般的团结”从本质上说也是名不符实的。伊雷马什维利说：“他关心的并不是发现真理、作出判断；他可以对自己过去肯定过的东西表示反对，也可以为自己过去谴责过的东西进行辩护。对他来说，胜利比这一切都宝贵得多。”

约瑟夫当时的看法属于什么性质现在已无法考察，因为这些看法并没有形诸笔墨。据和他同名的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主张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并且主张“少数人专政”。在这里，回忆中显然故意掺杂了想像：在19世纪末期，根本还不存在“专政”的问题。伊雷马什维利接着说：“柯巴的极端看法并不是‘客观研究’的结果，而是支配着他整个身心的个人权力欲和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自然产物。”这位过去的孟什维克的判断无疑是带有偏见的。人们必须懂得如何从这种偏见后面找出真实的核心。在斯大

林的精神生活中，个人的实际目标的永远比理论上的真理重要，意志比理智起着无可估量的更大的作用。

伊雷马什维利还对约瑟夫的心理状况提出了虽然带有事后评价性质的、然而非常贴切的看法。他说，约瑟夫“随时随地只看到消极的、坏的一面，根本不相信人们有理想主义的动机或属性。”青年时代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一般总还蒙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观点在约瑟夫的青年时代已经表现出来，后来更成为贯穿他整个生活的中心思想。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的性格还有其他显著特点，在历史进步时期，当群众的大公无私和英雄主义等最优秀的品质被唤醒的时候，斯大林总是默默无闻的。相反地，在自私自利、背信弃义等品质得到体现的反动时代，斯大林的冷眼看人的、多疑的性格和他善于迎合人们最恶劣的天性的特殊能耐就得到了充分施展的余地。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但没有像他母亲梦想的那样成为教士，而且连一张可以为他敲开某些省立大学的大门的文凭也没有拿到。关于这种情况发生的经过和原因，现在有几种难以调和的说法。显然是为了消除自己在1923年写的回忆录造成的不利印象，阿维尔·叶努基不泽在1929年写的回忆录中写道，约瑟夫在正教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具有不良倾向的禁书。他的违法行为没有逃脱督学的目光，所以这个危险学生“逃离了正教中学”。官方的高加索历史学家贝利亚告诉我们，斯大林是“因为不可靠而被开除”的。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类似原因开除的情况并不罕见。看来奇怪的是正教中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至今尚未发表。前面提到的纪念碑至少是一种迹象，对文件的命运绝口不提则是更显著的证明，说明这些文件既没有焚于火警，也没有在革命年代的风暴中散失。把文件扣压起来不予发表是因为这些文件包含不幸的事实，还是因为它们会驳倒后来制造的某些传说呢？

最常见的说法是，朱加施维里因为领导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而遭到开除。斯大林在正教中学的同学、一位不很可靠的证人叶里萨贝达施维里告诉我们，“在斯大林指示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有“100名到120名”正教中学学生参加。如果这种说法指的是洪水遍野、整个当局已经完全仓皇失措的1905年和1906年，也许还是可信的。但是就1809年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完全是想入非非。如果这个组织真拥有这么多的成员，问题就不可能仅限于开除，宪兵的干涉将很难避免。然而约瑟夫不仅没有立即被捕，而且在离开正教中学以后还保持了将近三年的自由。因此，对所谓斯大林被开除是因为组织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说法必须断然予以拒绝。

一向注意不和事实基础距离太远的戈戈希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谨慎得多。他写道：“约瑟夫不再注意功课，只求分数及格，考试过关。性情暴戾的阿巴希泽教士猜测到天赋聪颖、智力成熟而又具有难以置信的良好记忆力的朱加施维里只求分数及格的原因……设法使当局作出决定，把他开除出正教中学。”至于教士究竟猜测到什么，现在只能再加猜测。从戈戈希亚的话里得出的必然的结论是，约瑟夫和神学的超级智慧脱离关系以后，学习成绩不及格，因此被正教中学开除。从卡帕纳则关于这种“脱离关系”的叙述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脱离关系”发生在正教中学时期。卡帕纳则说：“他不像从前那样用心读书了。”值得注意的是卡帕纳则、格卢尔吉泽和叶里萨贝达施维里对约瑟夫在正教中学遭到开除的问题完全避而不提。

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的母亲晚年——当御用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开始对她感兴趣的时候——曾经矢口否认开除的事。据她说，当这个15岁的孩子进正教中学的时候，身体十分健壮，但是他读书非常用心，身体消耗过度，以致医生们说他可能

患了结核病。叶卡特林娜接着说，她的儿子不愿意离开正教中学，是她硬把他“领”出来的。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很真实。由于健康不佳而暂时停学是可能的，但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完全离开学校并且使一个母亲完全放弃她为儿子安排的如此诱人的前途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在1899年，约瑟夫已经20岁。他不是以驯服出名的人。他的母亲不大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他的命运。最后，约瑟夫离开正教中学以后，如果真是患病，最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回哥里去享受母亲的照顾。但是他没有回哥里，而是留在梯弗里斯，一无职业，二无钱财。年迈的卡佳和记者谈话时并没有完全讲真话。可以设想的情况是：他的母亲当时认为儿子被开除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由于这件事发生在梯弗里斯，所以她对哥里的邻居们说她的儿子并不是被学校开除的，而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自动退学。此外，这位老妇人一定认为，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学校开除这件事对国家的“领袖”说来是不光采的。几乎不必再寻找其他更深奥的理由来说明卡佳为什么一再坚持说“他不是开除的，是我自己把他领出来的”。

但是，也许从严格意义上说，约瑟夫的确不是被开除出校的。这种说法来自伊雷马什维利，可能最符合实际情况。据他说，学校当局在失望之余，开始对约瑟夫愈来愈不喜欢，经常挑他的错。“柯巴深信认真学习是毫无好处的，所以逐渐成为正教中学最坏的学生。教师如果责备，他就用恶毒的、蔑视的眼光瞪着教师。”学校当局在他从第六班升到最后一班去的时候给他的证书写得非常不佳，所以柯巴自己决定在毕业前一年离开正教中学。为什么叶努基泽说他“逃离了正教中学”，而避免使用“被开除出校”或“离开了正教中学”等比较明确的说法；为什么约瑟夫的大多数同学都绝口不提他正教中学生活中这个重要时刻；为什么文件都没有发表；最后，他的母亲虽然给这件轶事涂上了一层不同的色彩，

把责任从儿子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但是为什么她感觉自己有权利说她的儿子并没有被开除呢？考虑到伊雷马什维利的解释，所有这些问题就立刻清楚了。从描绘斯大林个人的性格或为他写政治传记的观点来说，他和正教中学脱离关系的细节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些细节很好地说明集权主义的历史学甚至在这种次要问题上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

约瑟夫是1890年他11岁的时候进正教预备小学的。四年后，他进入正教中学，1899年离开这个学校。因此他在正教学校总共住了九年。格鲁吉亚人成熟得很早。戈戈希亚写道：约瑟夫离开正教中学时已经成年，“没有文凭，但是对生活已经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看法。”研究神学的九年对作为一个人的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他的性格、思想方式和作风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影响。

朱加施维里一家和他们周围的人都说格鲁吉亚语。他的母亲甚至到老还不懂俄语。他父亲的情况不大可能有什么两样。儿子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念俄语，而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又都是格鲁吉亚人。俄语的精神、他的自由奔放的特性和它内在的节奏是约瑟夫从来没有学到的。此外，他是在正教学校那种矫揉造作的气氛中被迫学习这种异话语言来代替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的。他把俄语的表现方法和经院哲学的信条一同吸收进去。俄语本身他是学会了。但是对他说来，这种语言并不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精神上的器官，而是用来表达属于异族的、令人憎恶的神秘主义的一种人为的、外来的工具。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对这种语言更不可能熟悉起来或融会贯通，准确地运用这种语言或加以发挥，因为他习惯于用语言掩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俄语对他来说不仅永远是一种夹生的、当做权宜手段使用的语言，而且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糟得多，拘泥而刻板。

不难理解，约瑟夫从内心和宗教断绝关系时起就感觉学习讲道和祈祷式是无法忍受的痛苦。难于理解的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长一段时间里过着双重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沙夏早在13岁的时候就曾经用达尔文的学说反对圣经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从那时起整整七年期间他研究神学的耐心是很大的，虽然热情愈来愈低。斯大林本人认为，他是15岁或16岁开始具有革命世界观的。他抛弃宗教的时间完全可能比他转向社会主义的时间早两三年。然而即使我们承认两种变化发生在同时，我们仍将看到，这位青年无神论者对正教的神秘观点的钻研整整继续了五年。

诚然，沙皇的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被迫过着双重生活。但是这主要是指大学，而大学的管理制度是以颇为放任自由出名的，官方的伪善已经减少到礼仪需要的最低限度。在中学里，这种表里不一的生活更难忍受，但通常只是在青年们已经看到具有相对的学术自由的大学的门的时候，为时不过一两年的事。年轻的朱加施维里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在世俗学校里，学生每天只有一部分时间受到监视，所谓“宗教”实际上是一门次要课程。但是他念的不是世俗学校，而是一所闭关自守、整个生活必须服从教会的要求、一举一动都受到教士监视的学校。对这种制度忍受七年，即使是五年，也需要超人的谨慎和异乎寻常的弄虚作假的能力。当他在正教中学念书的几年里，谁也没见过他提出任何公开的抗议或者有过任何大胆表示愤怒的行为。约瑟夫在背后嘲笑教师，当面从来不冒昧行事。他从来没有像季布拉泽那样打过任何发表沙文主义言论的教师的耳光；他最多不过用“蔑视的眼光瞪着”他们。他的仇视是有节制的、秘密的、小心谨慎的。我们听说，波米亚洛夫斯基在正教中学做学生的时候“对周围的人”充满“猜忌、鬼祟、敌视和憎恨”。伊雷马什维利说，

柯巴几乎具有所有这些特点，甚至表现得更尖锐。他说：“1809年，他离开正教中学的时候，对学校当局、对资产阶级、对这个国家里存在的一切体现沙皇制度的事物，怀着恶毒的、刻骨的仇恨。对一切权威都表示憎恨。”

第二章 “职业革命家”

1883年，沙夏四年级的时候，高加索油都巴库和黑海港口巴土姆通了铁路。高加索脊背上除了山脉以外又增加了铁道。锰矿工业继石油工业之后开始发展起来。1896年，当沙夏已经开始对柯巴这个名字产生幻想的时候，梯弗里斯铁路工厂里爆发了第一次罢工。

高加索在思想发展和工业方面都是跟着中俄罗斯走的，在90年代最后五年里面，从彼得堡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已经在激进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当柯巴还在正教中学发霉的神学气氛中消瘦憔悴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广泛展开。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遭受逮捕和放逐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起初不过数百，后来则数以千计。革命运动揭开了新的一章。

1901年，当柯巴成为梯弗里斯委员会^①委员时，外高加索共有9000个企业（不包括手工作坊），其中雇用产业工人共约4万。考虑到这个地区位于二海^②之滨、面积辽阔、物产丰富的情况，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的基石已经接近奠定。巴库泉涌的石油、契图阿里开始采掘的锰矿，给这个地方平添无限生气的铁路的活动，所有这些不仅给工人的罢工运动、而

①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梯弗里斯第一届委员会。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82页。——译者注

② 指黑海和里海。——译者注

且给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理论思想活动带来了推动力。自由主义的报纸《犁沟报》^①用毋宁说是惊讶而不是敌对的口吻记录了这个新运动的代表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情况。它说：“从1893年以来，代表一种奇异的倾向并鼓吹一种独特的纲领的青年人一直在给格鲁吉亚的出版物投稿；他们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人们给马克思主义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麦撒墨达西”，意思是“第三集团”，以便同前十年占支配地位的进步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有所区别。“麦撒墨达西社”里面为首的是诺·饶尔丹尼亚^②、高加索孟什维克的未来领袖和昙花一现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未来元首。

由于俄国的发展开始极晚，希望逃避警察统治压迫和摆脱像一堆没有个性的蚂蚁似的旧社会的落后状态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超越中间阶级。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革命高举的基督教和民主的旗帜早已变成保守的理论。自由主义的抽象理论对高加索半靠乞讨为生的波希米亚人毫无吸引力。他们对特权阶级的仇视已经自然地带上了社会色彩。为了准备迫在眉睫的战斗，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一种还没有沾上污点的理论。他们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从这种学说的最高的、科学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这种理论。当时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在上帝前平等或法律上平等的问题，而是经济平等

① 《犁沟报》是格鲁吉亚文周报，自由民族主义派的机关刊物，一度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后来又成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机关报，1904年被政府封闭。——译者注

② 诺伊·尼古拉耶维奇·饶尔丹尼亚（1840年—），又名安恩、柯斯特罗夫等等，1907年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护国派，后来担任格鲁吉亚第一共和国（1918年至1921年）第一任总统。在红军攻入这个国家以后逃往法国。——原编者注

问题。事实上，由于提出了遥远的社会主义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就得到保证，使他们反对沙皇的斗争不致过早地受到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经验所引起的悲观怀疑情绪的威胁。这些条件和情况决定了俄国，特别是高加索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种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是极为原始的，因为它必须适应落后的地方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不现实的，但是它鼓舞了知识分子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从而对这一斗争提供了非常现实的帮助。

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批评的锋芒指向言之无物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迷信地恐惧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为俄国找到“例外的”特殊历史道路。因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使命辩护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题。他们经常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纲领置于次要地位。诺·饶尔丹尼亚在合法刊物上孜孜不倦地鼓吹“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结成反对专制政体的联盟。这种联盟思想后来成为孟什维克政策的基石，也是他们最后遭到覆灭的原因。苏联御用历史学家直到今天还在审判饶尔丹尼亚的思想，用各种方式加以描绘，虽然这种思想早已在战斗中湮没无闻。同时，他们闭着眼睛故意不看这个事实：30年后斯大林把这种孟什维克政策不仅运用到中国，而且运用到西班牙，甚至运用到法国，而当时的情况比处在沙皇制度铁蹄下的封建的格鲁吉亚普遍存在的情况为实行这种政策提供的理由要小得无法衡量。

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饶尔丹尼亚的思想也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895年，后来成为杰出的左翼宣传家之一的萨沙·楚鲁启

则^①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他在1905年29岁的时候死于结核病，身后遗下的报刊著作证明他具有颇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文学才能。1897年，拉多·克泽霍越里^②也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和柯巴一样，克泽霍越里在哥里正教小学和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过书，但是比柯巴大好几岁，在柯巴参加革命最初几个阶段里对他起过向导作用。1923年，当回忆录作者还享有足够自由的时候，叶努基泽追述说：“斯大林曾经多次惊叹地强调已经去世的克泽霍越里同志的非凡的才能，指出他在那个时候就懂得如何按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正确地提出问题。”这段证词，特别是里面提到的“惊叹”，驳斥了后来编造的所谓柯巴当时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而楚鲁启则和克泽霍越里只是他的“助手”的故事。此外，还可以指出：楚鲁启则青年时代写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比柯巴两三年以后写的任何东西高明得多。

克泽霍越里在参加“麦撒墨达西社”左翼以后的第二年，把年轻的朱加施维里也吸收进去。“麦撒墨达西社”当时并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以合法报纸《犁沟报》为中心结合起来的、由思想接近的人组织的一个小组。1898年，这家报纸从自由主义者手里转入以饶尔丹尼亚为首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

伊雷马什维利说：“我们暗中经常到《犁沟报》办公室去访问。柯巴和我们一齐去过几次，但是后来却拿该报编委开玩笑。”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营垒中的意见分歧虽然也许只是初露端倪，然而在性质上是十分严重的。温和派并不当真相信革命，更不相信革命迫在眉睫，他们指望的是旷日持久的“进展”，渴望和资产阶级自

①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楚鲁启则（1876年—1905年），死于1905年6月10日。——原编者注

② 弗拉基米尔·查哈里也维奇·克泽霍越里（1877—1903年），1903年8月17日被监狱看守枪杀。——原编者注

由主义者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左派则真诚希望来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变革，因此主张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从本质上说，左派的成员都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半自由主义者天生是互不相容的。由于早年环境的影响和自己的个性，沙夏倾向于左派是出于本能、理所当然的。他是一个以颇为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地方局限性的平民民主主义者——他是作为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参加革命运动的；从本质上说，直到最后他仍然是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个人的命运经历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轨道。

在这两个区别还不很显著的派别之间，意见分歧暂时集中在宣传鼓动问题上。有些人主张在人数很少的小组中进行审慎的教育工作；另外一些人主张领导罢工，并通过散发传单来进行鼓动。当赞成群众工作的人得到胜利以后，他们的分歧就转到传单内容方面。比较审慎的人主张完全从经济要求出发进行鼓动，坚决“避免吓倒群众”。他们从反对者那里得到“经济派”这个表示鄙视的称号。另一方面，左派认为必须毫不迟延地过渡到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鼓动。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国外侨民中采取的立场。这也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在俄国国内采取的立场。

一位先驱者曾经写道：“梯弗里斯涌现出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早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这个城市就有了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小组。这些小组起初纯粹属于教育性质。……小组数目不断增加，到1900年已经有好几十个。每个小组有10至15人。”随着小组数量的增加，他们的活动也愈来愈大胆。

1898年，柯巴还在正教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和工人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一天晚上，柯巴和我暗地里从姆塔茨明达的正教中学溜到紧靠悬崖

的属于梯弗里斯铁路局一个工人的小屋子里去。后来，其他一些和我们具有共同思想的正教中学学生也偷偷溜来了。和我们一齐开会的还有铁路工人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组织。”1926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一次集会上谈到这件事。他说：

“我想起了1898年，当时我第一次接受一个铁路工厂工人小组的工作。……我想起了我在司徒卢阿同志的家里，在季布拉泽（他当时也是我的一个老师）……以及梯弗里斯其他先进工人面前，怎样受到实际工作的初步教育。……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战斗的革命洗礼。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学徒。”^①

1898年至1900年期间，铁路工厂和梯弗里斯一些工厂爆发了罢工。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地参加了这些罢工，有时在罢工中起着领导作用。一个地下印刷所用手和擦皮鞋的刷子印出了宣言，在工人中间散发。运动仍然按照“经济主义”的精神发展下去。一部分秘密工作落在柯巴肩上；具体是什么工作现在不容易肯定。但是，他显然已经进入地下革命活动世界的大门。

1900年，刚刚结束西伯利亚流放生活的列宁怀着创办一家革命报纸的明确目的到国外去了。他想利用这个报纸把零碎分散的党组织集中起来，使党明确地转上革命斗争的轨道。与此同时，一个已经暗中被告知这些计划的老革命家维克托·库尔纳托夫斯基工程师从西伯利亚到梯弗里斯。和现代的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断言的不同，使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摆脱“经济主义”的局限性、并且使它的活动具有比较革命的倾向的并不是柯巴，而是库尔纳托夫斯基。

^① 参看《对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欢迎词的答词》。《斯大林全集》第8卷，中文版第155页。——译者注

库尔纳托夫斯基是和恐怖主义的民意党一起开始革命的。19世纪末叶，在他第三次流放期间，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和他周围的人很友好。列宁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他的追随者开始被人称为火星派。《火星报》在高加索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库尔纳托夫斯基。梯弗里斯的老工人回忆说：“在发生争辩和举行讨论的时候，所有同志总是转向库尔纳托夫斯基。他作出的结论和判断总是毫无异议地得到接受。”从这段证词可以推断得出，这位毫不倦怠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对高加索的重要意义。他个人的命运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英雄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

1900年，无疑是根据库尔纳托夫斯基的倡议，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完全是知识分子。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柯巴显然很快就被库尔纳托夫斯基的魅力所征服。柯巴当时还不是委员会的成员。附带说一句，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存在多久。从5月直到8月，梯弗里斯企业中发生了罢工的浪潮。在铁路工厂罢工工人名单中有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主席、锁匠加里宁和另一个俄国工人、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阿利路也夫。

在这个期间，在大学生的倡议下，北方开始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1900年，哈尔科夫一次声势浩大的五一节游行使全城大多数工人站立起来，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惊叹和欢欣鼓舞的回声。其他城市也学习它的榜样。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写道：“社会民主党懂得上大街的巨大鼓动意义。从那时起，它就把发动示威游行视为己任，吸引愈来愈多的工人参加。街头游行经常是罢工的结果。”梯弗里斯的平静没有保持多久。1901年4月22日——我们不要忘记俄国当时仍通行旧历——将近2000人参加了为庆祝五一节而在市中心举行的街头游行。在同警察和哥萨克骑兵发生冲突时，14人受伤，50多个参加骚动的人遭到逮捕。《火星报》并没有忽视梯弗里斯这次游行的重大象征意义。“从这一天起，高加

索开始了公开的革命运动。”^①

负责筹备工作的库尔纳托夫斯基在3月22日晚上，也就是举行游行示威的一个月前，被逮捕起来。同一天晚上还搜查了观象台。柯巴在观象台工作；但是他当时已经外出，所以没有被抓住。宪兵当局决定“……要找到上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并对被告进行审讯”。这样一来，柯巴就转入“非法状态”，成为长期的“职业革命家”。他当时22岁，离取得胜利还有16年。

在逃脱逮捕以后，柯巴在梯弗里斯隐藏了几个星期，设法参加了五一节游行。贝利亚对这一点说得斩钉截铁，并且照例加上一句，说斯大林“亲自”领导了这次游行。不幸的是，贝利亚的话是不足为凭的。但是伊雷马什维利也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证词。诚然，伊雷马什维利当时不在梯弗里斯，而是在哥里当教员。他说：“柯巴作为领导人之一而受到搜捕。他在即将被捕以前设法离开市场，隐蔽起来。……他逃回故乡哥里，但是不能留在他母亲的住处，因为这是搜捕他的人首先要去的地方。因此他甚至在哥里也必须藏匿起来。晚上，他经常暗地里到我的住处看我。”

梯弗里斯的游行示威给柯巴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伊雷马什维利“不无惊讶地”注意到，正是这次冲突带来的流血后果使他的朋友得到了鼓舞。“运动将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按照柯巴的意见，流血斗争必然会带来最迅速的结局”。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想到，他的朋友不过是在重复《火星报》鼓吹的意见。

离开哥里以后，柯巴显然又秘密回到梯弗里斯，因为根据宪兵当局的情报，“朱加施维里于1901年秋天当选为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两次委员会会议 并且在1901年底被派往巴士

^① 引自1901年7月第六号《火星报》。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71页注22。——译者注

姆进行宣传活。……”由于宪兵除抓革命党人以外并不具有其他任何“倾向性”，而且在内部机构的帮助下一般是消息灵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认为柯巴在1898年至1901年期间并没有在梯弗里斯起近年来归到他身上的那种领导作用；在1901年秋天以前，他甚至还不是当地委员会的委员，而只是一个宣传工作人员，即小组领导人。

1901年底，柯巴从梯弗里斯迁往黑海沿岸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巴士姆。这次迁移可以用两种必要性来解释——躲避梯弗里斯警察的监视，并在各省开始革命宣传。但是孟什维克的出版物提出了另一个理由。据他们说，朱加施维里从开始在工人小组中进行活动的第一天起，就因为阴谋反对梯弗里斯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季布拉泽而受到注意。他不顾警告，继续散播毁谤性言论，“目的是要中伤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得到公认的代表，取得领导地位”。在提交党内审判时，柯巴被认为犯有进行违反同志关系的毁谤罪，经过一致决定，被开除出这个组织。对这种说法几乎无法加以核实。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说法来自斯大林不共戴天的反对者。梯弗里斯宪兵当局的文件——至少是至今已经发表的文件——丝毫没有谈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开除出党的事，相反地，倒是谈到他被派往巴士姆“进行宣传工作”。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他去巴士姆是某种不愉快事件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把孟什维克的说法抛在一边，不再纠缠下去。

描写高加索劳工运动的最早的也是最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之一特·阿尔科梅德的书是191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他在书中谈到1901年秋天梯弗里斯组织在吸收工人选举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问题上爆发的激烈斗争。他写道：“发言表示反对的是一个事事‘起劲’、样样聪明的年轻的同志。他用地下活动条件、缺乏准备和工人缺乏阶级觉悟等作为理由，挺身而出反对让工人参加委员

会。他在结束发言时转身对着工人说：‘他们在这里奉承工人。请问你们当中有谁——即使是一两个也罢——适合当委员呢？把手按在心上，说真话吧？’”但是工人们不理睬这位演说家，投票时仍然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委员会。阿尔科梅德没有提这位“事事起劲”的青年人的名字，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容许泄露。1923年苏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也没有透露名字。我们倾向于认为，它这样做并不是由于疏忽。但是这本书本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间接的线索。阿尔科梅德接着说：“前面谈到的那位年轻同志把他的活动从梯弗里斯转移到巴土姆。梯弗里斯工人从巴土姆得到消息，说他行为不得体，说他进行反对梯弗里斯组织及其工人的敌视和瓦解组织的鼓动。”据这位作者说，这种敌对态度并不是出于以原则作为基础的动机，而是“出于个人的反复无常，想夺得独断独行的权力”。所有这一切和我们从伊雷马什维利那里听到的正教中学小组里的争吵如出一辙。这个“青年人”的模样很像柯巴，无疑是指他，因为许多回忆录证明，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只有他是1901年11月到巴土姆去的，因此，他所以改变活动地区可能是因为在梯弗里斯的处境非常困难，呆不下去了。即使不是真的被“开除”，他所以被调走也可能只是为了使梯弗里斯的气氛可以更健康一些。另一方面，这就引起了柯巴对梯弗里斯组织的“不正确的态度”和后来的关于他被开除出党的谣传。同时，我们要注意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柯巴是在保护“机构”〔政治机构〕，使它不受来自下层的压力。

巴土姆在20世纪开始时拥有将近3万人口，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是高加索一个重要工业中心，差不多有1.1万名工厂工人。当时习惯的工作日制度每天超过14小时，而工资少得可怜。所以毫不奇怪，无产阶级对革命宣传的响应是极为强烈的。和在梯弗里

斯一样，柯巴并不需要从头做起：巴士姆从1896年以来就存在着非法的小组。柯巴和工人坎杰利亚基合作，扩大了小组网。这些小组在一次除夕集会上统一为单一的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并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权力，仍然从属于梯弗里斯。这显然是造成阿尔科梅德隐射的新的磨擦的原因之一。柯巴通常是不能忍受任何人对他发号施令的。

1902年初，巴士姆的组织设法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设备非常原始。印刷所设在柯巴住处。这种直接违反地下工作规定的做法无疑是物质拮据的结果。“一个拥挤的小房间，里面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斯大林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写稿。他一旁是印刷机，几个排字工人正在忙着。铅字摆在火柴匣和香烟盒里，或者摊在纸上。斯大林经常把刚写好的材料递给排字工人。”这是一位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回忆的情景。必须补充一句：宣言的内容差不多和印刷技术处在同样的水平。后来不久，在亚美尼亚革命者卡莫的协助下从梯弗里斯搞到一部类似印刷机的东西、一个现金出纳机和一套铅字。印刷所扩大了，提高了效率。宣言的文字水平却依然故我。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宣言的影响。

1902年2月25日，路特希尔德煤油工厂经理部门贴出通知，开除389名工人。工人们在27日开始罢工。这次骚动也影响到其他工厂。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者发生了冲突。警察局长要求总督调兵来支援。3月7日，警察逮捕了32名工人。第二天早晨，路特希尔德工厂将近400名工人在监狱前集合，要求或者是释放已经逮捕的人，或者是把其他的人全都逮捕起来。警察把他们全都关进流放营。当时，息息相关的感情正使俄国劳苦大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新的团结在俄国最偏荒凉的角落里每次都得到新的表现；当时离革命爆发的时间已经只有三年了。……就在第二天，3月9日，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据起诉书说，

“一大群工人，由领导者带头，一边唱歌、喊叫和吹着口哨，一边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进”，走近了流放营。这群人将近 2000。工人希米里扬茨和戈戈贝里泽代表大家发言，要求军事当局释放已被监禁的人，或者是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法庭后来承认，群众“情绪是和平的，而且手无寸铁”。但是当局却设法破坏他们的和平情绪。士兵们企图用枪托把他们赶出广场，工人们就朝士兵扔石头作为回答。军队开始开枪，打死 14 人，打伤 54 人。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国。在 20 世纪初期，人们的神经对集体屠杀的反应远比现在敏锐。

柯巴在这次游行示威里面担任了什么角色呢？颇为难说。苏联的编纂人员被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弄得左右为难：既要把斯大林说成是参加过尽可能多的革命事件，同时又要尽可能拉长他坐监和流放的时间。大家知道，宫廷艺术家们在描写两桩同时发生的事件时，既要把斯大林说成是街头上的英雄，同时又要把他说成是监狱里的烈士。1937 年 4 月 27 日，莫斯科官方出版的《消息报》刊载了艺术家叶·胡齐施维里作的一幅画的照片，把斯大林描绘成 1902 年梯弗里斯铁路工人罢工的组织者。第二天，编辑部不得不为这个错误做检讨。编辑部的声明说：“从斯大林同志的传记知道，他……从 1902 年 2 月直到 1903 年底都关在巴士姆和库泰依斯的监狱里。因此，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是 1902 年梯弗里斯罢工的组织者。当斯大林同志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从历史真实来看，把他描绘成 1902 年梯弗里斯铁路罢工的组织者完全是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在巴士姆的监狱里。”但是，如果斯大林真是从 2 月开始就在监狱里，那么“从历史真实性来看”，他就不可能领导巴士姆的游行示威。这次示威发生在 3 月。但是，这次不仅那位勤快的美术家、而且《消息报》的编辑部都犯了一个大错，虽然这家报纸引证了原始资料来源。柯巴事实上是在 3 月

而不是在 2 月被逮捕的。他不可能领导梯弗里斯的罢工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在坐牢，而是因为他当时身在黑海沿岸。他参加巴士姆事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需要探讨的只是这种参加的性质。

斯大林的法文传记作者巴比塞是严格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写作的。他断言，柯巴走在巴士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把自己“当做靶子”。这种阿谀奉承之辞不仅和警察档案提供的证据、而且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发生矛盾。斯大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出面充当靶子（附带说一句，也根本没有这种必要）。直接处于斯大林指挥之下的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 1937 年用整整一本书来描写巴士姆的游行示威，说得更准确些是描写斯大林在游行示威中起的作用。但是洋洋 240 页文章把问题搅得更糊涂起来，因为照本宣科的“回忆录”和过去已经发表的片断叙述完全碰不上头。托德里亚恭敬如仪地写道：“沙夏同志经常在现场指挥中央罢工委员会。”戈戈贝里泽肯定地说：“沙夏同志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巴士姆的老工人达拉赫维利泽说，沙夏“在像海一样汹涌咆哮的工人群中直接领导这次运动；他亲自把枪击时手臂受伤的工人格·卡兰达泽从混乱的人群中带领出来，把他送回家去。”领袖为抢救一个受伤的人而放弃职守是不大可能的；参加游行示威的任何普通群众都能够尽一个担架队员的责任。其他 26 个作者，谁也没提这件令人怀疑的轶事。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个细节问题。法庭审判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次游行示威根本没有任何领导。这就无可争辩地驳倒了所谓柯巴直接领导这次游行示威的说法。尽管检察官坚决反对，沙皇法庭仍然承认甚至真正走在队伍前面的工人戈戈贝里泽和希米里扬茨也不过是参加游行的普通群众。整个审讯过程有大批被告和证人出庭，然而丝毫没有提到朱加施维里的名字。神话不攻自破。柯巴在巴士姆事件里扮演的角色显然是黯淡无光的。

据贝利亚说，柯巴在游行示威以后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写宣言，组织宣言的印刷和散发，把为3月9日死难者出殡的行列变成“一次轰轰烈烈的政治示威”，等等。不幸的是，这些奉令夸大的说法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当时警察正在搜捕柯巴。据同一个作者说，他在这以前曾经在游行示威的群众、警察、军队和旁观者众目睽睽下在大街上起过显著作用。在这个小城里，他不大可能再进行“巨大的”活动。4月5日晚间，柯巴在党的领导集团会议上和其他同谋者一齐被捕，关进监狱。令人厌倦的日子开始了。岁月漫长。

已经发表的文件透露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极其有兴味的事。柯巴被捕三天以后，在囚犯正规的会客时间里，有人从窗口把两张便条丢到监狱院落里去，料想探监的人会拾起来送往指定地点。有一张纸条的内容是，请人去探望哥里的教员沙夏·伊雷马什维利，告诉他“沙夏·朱加施维里已被逮捕，请他立刻通知他母亲。如果宪兵问她‘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她就可以说‘他整个夏天和冬天都在这儿，3月15日才离开’。”第二张纸条是写给教员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谈到需要进行革命活动的问题。两张纸条都被监狱看守截获。宪兵骑兵上尉札克利毫不费力就得出结论，知道这些便条的作者是朱加施维里，认为他“在巴士姆工人闹事中起了显著作用”。札克利立刻通知梯弗里斯宪兵队的头子，要求搜查伊雷马什维利的住处，讯问朱加施维里的母亲，并且搜查和逮捕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结果如何，文件里完全没有谈到。

从一份官方出版物上看到我们已经熟悉的名字沙夏·伊雷马什维利，使我们如释重负。诚然，贝利亚已经提到他是正教中学小组的成员，但是对两个沙夏之间的关系谈得很少。然而警察截获的一张纸条的性质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这位

回忆录作者和柯巴的关系的确很亲密。柯巴入狱后给他母亲的指示正是托他童年时期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代转的。同时，这件事证明，伊雷马什维利也得到卡佳的信任。据他说，在他童年时期，卡佳把他叫做她的“第二个沙夏”。这张便条驱散了关于伊雷马什维利的非常宝贵的回忆录是否可信的仅存的疑云。苏联历史学家对他的回忆录是完全置之不理的。柯巴本人在审讯中提出的口供证实，他企图传递给母亲的指示的目的是欺骗宪兵，使他们弄不清他到达巴库^①的时间，从而使他不受即将举行的审判。当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个企图有任何陷害人的目的。在被称为革命阴谋的十分严肃的把戏中，欺骗宪兵是习以为常的。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柯巴居然如此漫不经心地使两个同志陷入危险境地。纯粹从政治方面考虑，他这个行动同样值得注意。对于一个曾经协助筹备游行示威的革命者，人们自然期望他的游行示威以悲剧告终以后会希望和普通工人一起坐上犯人席。这样做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为了说明事件的政治意义，为了谴责当局之所作所为——也就是说，为了利用法庭的讲坛来进行革命宣传。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对柯巴缺乏这种愿望的惟一解释是，他目光短浅。十分明显，他并不了解这次游行示威的政治意义，他的主要目的是逃避游行示威引起的后果。

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柯巴真的领导了街头游行，走在群众前面，把自己当做“靶子”，那么欺骗宪兵的计划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在那种情况下，不可避免会有几十个证人认出他来。只有在他参加游行示威是秘密的、隐姓埋名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不受审判。事实上，只有一个名叫契克纳则的警察在初审时作证，说他曾经在监狱前面的“人群中”看见过朱加施维里。但是仅仅一

① 疑为巴上姆之误。——译者注

个警察提出的证据是无足轻重的。无论如何，尽管有这个警察作证，尽管截获了柯巴自己写的便条，这次游行示威案件中并没有对他起诉。审判是一年以后举行的，历时九天。法庭辩论的政治方向完全受自由主义律师的随意摆布。这些律师的确使 21 名被告得到的处分减轻到最低限度，然而不得不付出缩小巴士姆事件的革命意义的代价。

逮捕巴士姆组织领导人的警察在报告中是这样描写柯巴的：“哥里居民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曾为正教中学开除，住在巴士姆时既无书面证件，又无具体职业，也无自有住处。”关于正教中学开除的说法并无文件价值，因为一个警察个人并无档案可查，他的书面报告显然是转述的传闻。比这一点远为重要的是，他提到柯巴一无身份证，二无具体职业，三无住处，这是地下革命者的三个典型特征。

柯巴在巴士姆、库泰依斯，然后又是巴士姆的年久失修的地方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当时这是在押等待侦讯和放逐的通常期限。监狱制度和全国的制度一样，是野蛮和温情的混合体。和监狱管理当局相安无事、甚至混得很熟的关系可能突然以暴风雨似的抗议告终。囚徒举起皮靴乱踢牢门，大吵大嚷，吹口哨，摔盘子，毁家具。等到雨过天晴又暂时恢复平静。洛卢亚简单谈到过库泰依斯监狱里爆发的一次抗议的情况——当然，是“斯大林倡议和领导的”。柯巴在监狱的冲突中起过显著作用，在和监狱管理当局打交道时，他善于维护自己和其他的人。对于这一点没有理由加以怀疑。

35 年后，卡兰达泽写道：“他在狱中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很早，做完操就开始学习德文和经济学的书籍。……他喜欢和同志们讨论他对刚读过的书的印象。……”不难想像他读的是一些什么书：自然科学通俗读物，少量的达尔文著作，里别尔特的

《文化史》，或许还有 70 年代翻译过来的巴克尔和德莱柏的著作，巴甫连科版的《伟人传记》，俄国西贝尔教授阐述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关于俄国历史的某些著作，贝尔托夫（侨居国外的普列汉诺夫在合法刊物上用的笔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作品，最后还有弗·乌里扬诺夫即未来的尼·列宁在流放地用弗·伊林这个合法笔名写的考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著作（出版于 1899 年）。所有这些书监狱里大体上都读得到。这个年轻革命者的理论知识当然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他在反对宗教教义、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民粹主义偏见方面似乎拥有不坏的武器。

在 90 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战胜了民粹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成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起了支持作用。然而，工人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促进了乡村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使城市知识分子里的民粹主义思想死灰复燃。因此，20 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种杂拌似的革命倾向颇为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倾向吸收了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拒绝了“Zemlya: Volya”（“土地与自由”）和 Narodnaya Volya（民意党）等罗曼蒂克的名称，而给自己起了一个比较欧洲化的名称：“社会革命党”（埃塞尔党）^①。1902—1903 年冬天，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基本上已经结束。政治鼓动和街头示威的成功使《火星报》的思想得到十分令人信服的证明。1902 年开始，《火星报》用愈来愈多的篇幅攻击社会革命党人的折衷主义纲领和他们鼓吹的个人恐怖手段。“灰

① 埃塞尔 (Essar) 是社会革命党英文译名 Socialist—Revolutionists 缩写字母 S-R 的音译。俄文社会革命党人 Социал-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的缩写 С Р 的音译亦同。——译者注

发”和“灰色”^①之间的激烈辩论在全国每一个角落展开，监狱当然包括在内。柯巴不止一次不得和他的新对手交锋。可以相信他在交锋时是颇为成功的。《火星报》为他提供了卓越的论据。

柯巴并没有在游行示威案中被起诉和提交审判。对他的法律侦讯是由宪兵进行的。秘密侦讯使用的手段和监狱制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地制宜的。首都的宪兵比较文明，也比较谨慎；各省的宪兵就比较粗暴。在风俗古老、社会关系有殖民地气息的高加索，宪兵们使用了各种最野蛮的暴力手段，特别是在对付愚昧无知、缺乏经验和意志薄弱的犯人时是如此。

“压力、威胁、恐怖、拷打、伪造证人供词、收买假证人、捏造和夸大案情、把特务道听途说来的报告当做具有决定意义的绝对证据——这就是宪兵处理案件时使用的手段的特点。”

这段话是阿尔科梅德写的。他说，宪兵拉夫罗夫惯于使用宗教审判的手段来逼取“供词”，虽然他事先知道这种“供词”是假的。这种警察诉讼程序一定给斯大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他在30年后大规模使用了拉夫罗夫上尉的方法。我们从洛卢亚狱中回忆录中附带知道“沙夏同志不喜欢用‘您’来称呼同志”，他说，沙皇的差役在把革命者送上断头台去的时候就是用“您”来称呼他们的。事实上，革命队伍里特别是高加索习惯用“你”这个称呼。几十年以后，柯巴把不少老同志送上了断头台。和“沙皇的

① “灰发”的俄文是 Sedoy，“灰色”的俄文是 Sery。把两个字每个音节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就是 S-d 和 S-r，分别代表 Social-Democrat（社会民主党人）和 Socialist-Revolutionists（社会革命党人）的缩写。——原编者注

差役”不同，他和这些人很早以来就用“你^①相互称呼。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柯巴第一次被捕的警察侦讯记录和关于他以后几次被捕的全部记录至今尚未发表。火星派组织一向要求自己的成员拒绝作证。革命者通常是这样写的：“我长期以来就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我拒绝并否认对我的控告；我拒绝作证或参预任何秘密侦讯。”只有在法庭公开审判时，火星派才旗帜鲜明地挺身而出。然而当局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举行公开审判，从整个党的利益来看，拒绝作证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拒绝使被捕者的处境颇为困难。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柯巴在1902年4月曾经用使其他的人不得不因此遭受连累的策略，企图证明他当时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可以设想，他在其他场合也宁愿依靠自己的机灵而不愿按照对所有人都具有强制性的准则办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对警察作的整个一系列口供不是一种非常令人钦羡的——至少不是“英雄的”——记录。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明斯大林的警察侦讯记录至今未予公布的原因。

绝大多数革命者都受到所谓“行政命令”的处分。由内务部和司法部四名高级官员组成的彼得堡“特别会议”根据地方宪兵的报告，可以不讯问被告就作出判决，由司法大臣予以批准。1903年7月25日，梯弗里斯总督从彼得堡接到这样一份判决书，命令他把16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置于警察直接监视之下。名单次序习惯是按照罪名轻重或犯人责任大小排列的，为他们指

① 同法语和其他许多语言一样，俄语第二人称多数的“vy”（相当于汉语的“您”。——译者注）用于比较客气的谈话中，可直译为英语的“you”。俄语第二人称单数的“ty”（相当于汉语的“你”。——译者注），是一种比较亲密的称呼，在对仆人、动物和下级讲话时，一般也用“ty”，可直译为英语的“thou”。——原编者注

定的西伯利亚具体流放地点也相应有好有坏。名单上列在头两位的是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弗兰切斯基，各判处四年。其他 14 人流放三年，其中第一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名单上是第十一位。宪兵当局还没有把他当做一个重要革命家。

11 月，柯巴和其他流放犯人一起从巴士姆监狱解往伊尔库茨克省，从一个罪犯中转站到另一个罪犯中转站，辗转走了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革命正在沸腾高涨，每个人都想尽快逃出。到 1904 年初，流放制度已经漏洞百出。在多数情况下，逃走并不十分困难：各省都有提供伪造护照、钱和通信地址的秘密“中心”。柯巴在新乌达村呆了不过一个月，刚好是进行打听、找到必要联系和拟订行动计划必需的时间。斯大林第二个妻子的父亲阿利路也夫说，柯巴第一次企图逃走时把脸和耳朵都冻伤了，不得不回去找比较暖和的衣服。一个可靠的马车夫赶着西伯利亚结实的三驾马车迅速驶过雪封的公路，把他送到最近一个火车站。回来的旅程穿过乌拉尔地区，只用了一个星期左右，不是三个月。

这里需要把库尔纳托夫斯基的故事讲完。这样做是恰当的，也只有这样做才是公平合理的。20 世纪初期梯弗里斯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在他的鼓舞下发展起来的。他在军事监狱里关了两年，然后被流放到雅库特地区。从雅库特地区逃走比从伊尔库茨克省逃走要困难至极。库尔纳托夫斯基途中曾经在雅库次克参加流放犯人对当局暴行的武装反抗，被法庭判处 12 年苦役。1905 年秋天大赦以后，他来到俄日战争参战人员泛滥成灾的赤塔。他在赤塔成为工、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主席——所谓“赤塔共和国”的首脑。1906 年初，库尔纳托夫斯基再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西伯利亚的镇压者伦南坎普特将军把这个已定死刑的人带在他的火车上，使他可以亲眼目睹每个车站处决工人的情况。由于第一届

杜马选举带来的新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的死刑减为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库尔纳托夫斯基设法从涅尔琴斯克逃往日本，然后又到了澳大利亚。他在澳大利亚困窘万状，做了伐木工人，积劳成疾。库尔纳托夫斯基病了，感染了耳炎，然而设法到了巴黎。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极端颠沛流离的命运终于损害了他的健康。1910年秋天，在他到达以后，伊里奇和我曾经到医院去探望他。”两年以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已经迁往克拉柯夫，库尔纳托夫斯基就与世长辞了。革命踏着许多库尔纳托夫斯基的肩头，跨过他们的尸体向前迈进。

革命向前迈进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第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是80年代初期开始批判和宣传活动的。先驱者为数无几，后来者数以十计。由比普列汉诺夫小14的列宁领导的第二代在90年代初期走上政治舞台。社会民主党人数以百计。第三代的成员比列宁年轻10岁左右，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参加革命斗争的。这一代人已经数以千计，其中包括斯大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本书作者和其他一些人。

1898年3月，九个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在省城明斯克开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立即遭到逮捕。当时正在考虑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正教中学学生朱加施维里所在的梯弗里斯人可能很快就收到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斯克代表大会是由列宁的同时代人筹备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仅仅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然而还没有把党建立起来。党的联系仍然很薄弱，只需要沙皇警察强有力的一击就足以破坏这些联系，使它们长期陷于瘫痪。在后来几年里面，这个主要属于经济性质的运动在各地生了根。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只在本地活动，直到遭受逮捕和放逐。党的工作者在各城市间辗转奔走的情况是罕

有的。为了避免逮捕而转入地下是几乎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在这方面，他们既无经验，又没有技术，也没有必要的联系。

从1900年起，《火星报》开始建立集中的组织。列宁是这个时期毫无疑问的领袖，他理所当然地使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老头子”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劳工运动已经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蓬勃展开，唤醒了新一代革命者。这一代革命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列宁那一代。建党工作得到了这个运动的支持。火星派的当前任务是从各地工人中挑选一批精力最旺盛的人，利用他们来创立一个能够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央机构。火星派的追随者为数很多，而且不断增加，但是真正属于火星派的成员，能够充当这个位于国外的中心的可靠代表的人，为数必然有限：不超过二三十人。火星派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建党而和自己的本乡本土脱离关系。在火星派的字典中，“地方主义”是落后、狭隘，甚至倒退的同义语。宪兵司令斯皮里多维奇写道：“他们结成精干的职业革命家阴谋团体，到一切设有党的委员会的地方去，和他们的成员建立联系，递交非法文件，帮助它们建立印刷所和搜集《火星报》需要的情报。他们深入各地委员会，进行反对‘经济主义’的宣传，铲除思想上的对手，从而使这些委员会处在他们影响之下。”这位退伍宪兵对火星派特点的这种描写是相当正确的。他们是一个行止无定的机构的成员，位于地方组织之上，把地方组织当做施加影响的阵地。

柯巴没有参加这种负责工作。他起初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员。后来是巴土姆社会民主党员——换句话说，是一个影响很小的地方革命家。高加索和《火星报》以及中俄罗斯的联系是通过克拉辛、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保持的。把各地委员会和小组统一成一个集中领导的党的整个工作是在没有柯巴参加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的往来信件、回忆录和其他文件已经证明这一

点，丝毫没有令人怀疑的余地，这种情况对估价斯大林的政治发展是很重要的；斯大林前进得很慢，踌躇不决，还在摸索道路。

1900年6月，克拉辛以一个年轻知名的工程师的身份到达巴库，担任负责工作。他写道：“在一个新的领域中，活动同样紧张。这指的是巴库本地和整个高加索——梯弗里斯、库泰依斯、巴士姆等地——的社会民主党地下工作。我不时到这些地方去和当地组织保持联系”。克拉辛在巴库一直住到1904年。由于正式身份的限制，他不能直接参加群众工作。工人们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后来甚至企图坚决要求撤销他电站经理的职务。克拉辛只和组织上层领导人打交道；他是当地领袖们的领袖。在他有机会直接接触的革命者中间，他提到叶努基泽兄弟、拉多·克泽霍越里、阿利路也夫、谢尔古诺夫、哈尔佩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从1900年到1904年一直在高加索担任领导工作的这个人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迟至1927年国家出版社印行克拉辛自传时既无注释也无更正，完全没有注意这种遗漏。在那些年代里曾经和高加索的运动发生任何关系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里，同样没有给斯大林任何地位。不言而喻，这只是指官方开始修改党史以前，即1929年以前写的回忆录。

1902年2月，代表设在国外的中心的火星派成员原定在基辅召开秘密会议。皮亚特尼茨基写道：“俄国各地都有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受到监视，于是匆匆离开这个城市，朝不同方向而去。但是全体代表都被抓住，有的在基辅，有的在途中。几个月以后，他们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越狱活动，逃出基辅监狱。当时在巴士姆工作的柯巴并没有得到参加基辅会议的邀请，毫无疑问，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柯巴和国外中心的关系，说得更正确些是他和国外中心完全缺乏任何关系的情况，最有启发意义地说明了他的政治活动的地

方性。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国外侨民几乎一成不变地继续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由于沙皇俄国经常不断的逮捕、流放和处决，由最卓越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者组成的侨民是运动中惟一能够不断积极活动的队伍，因此自然而然地在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火星报》编辑部在 20 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为社会民主党无可争辩的中心。不仅政治口号，而且具体指示也都来自《火星报》编辑部。每个革命者都热烈希望能够尽快到国外去住上一段时间，见见领导人，听人们谈谈，鉴定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和《火星报》建立永久性联系，并且通过《火星报》和俄国本土的地下工作者建立这样的联系。由于国外工作而一度与列宁关系密切的弗·科热夫尼科娃谈到人们如何“从流放地和去流放地途中普遍开始逃向国外，到《火星报》编辑部来……然后回到俄国参加积极的工作”。从许多例子当中举一个来说，青年工人诺根在 1903 年 4 月从流放地逃往国外。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这样做是“为了迎头赶上生活，为了读书和学习”。几个月以后，他作为《火星报》代表秘密回到俄国。参加上述基辅越狱事件的 10 个人（其中包括苏联未来的外交家李维诺夫）不久以后都到了国外，后来陆续回到俄国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关于他们和其他得到信任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火星报》和所有这些人都积极保持通信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阅读每一封信。我们对《火星报》每一个代表在做什么了解得极为详尽，并且和他们讨论他们全部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我们把已经中断的联系恢复起来，并且把某些人已经被捕和其他类似情况通知他们。”这些代表里面有列宁的同时代人，也有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但是，当时的上层革命者、集中制的传播者和统一政党的缔造者中间尚不包括柯巴。他仍然是一个“地方工作者”，一个高加索人，一个土包子。

1903年7月，火星派筹备的党代表大会终于在布鲁塞尔开幕。在沙皇外交官和屈服于这些外交官的比利时警察的压力下，代表大会不得不移到伦敦去举行。大会采纳了普列汉诺夫拟订的党纲通过了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但是在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在大会处于控制地位的火星派本身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强硬”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派双方起初都认为这些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因此，这些分歧引起的尖锐冲突更令人惊讶。最近才统一起来的党，陡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分裂的边缘。

“早在1903年斯大林还在坐牢的时候，他通过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回来的同志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的十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就坚决站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这是按照斯大林本人的命令写的一本传记的说法。这本传记属于给党内历史学家的指示的性质。但是过分相信这种指示则未免太不谨慎。有三个高加索代表参加了这次导致分裂的代表大会。柯巴究竟会见了其中哪一个代表呢？当时他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又是怎样会见这位代表的呢？他是怎样、是通过什么方式表达自己和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的呢？斯大林的说法的惟一证明来自伊雷马什维利。他写道：“一贯热烈支持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柯巴当然立刻站到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成为这种主义在格鲁吉亚的最热烈的辩护者和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但是，这段话虽然说得十分肯定，在时间上却铸成大错。在代表大会以前，任何人，包括列宁本人在内，都没有提倡过“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和后来成为孟什维主义领袖的编辑部成员主张的手段相对抗。代表大会本身争论的不是革命手段问题；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当时还没有出现。伊雷马什维利显然搞错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整个1903年柯巴都关在监

狱里，伊雷马什维利不可能对他有任何直接的印象。一般说来，虽然他的心里观察和具体事件的回忆相当令人信服，而且几乎总是得到证实的，他对政治方面的意见却不那么可靠。看来，他在了解互相冲突的革命倾向的演变方面缺乏必要的本能和素养；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根据他后来的观点作出的事后猜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争论事实上是在党员资格问题上爆发出来的；问题是党应当仅仅包括参加秘密组织的成员，还是应当包括一切有系统地参加各地委员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人。在讨论过程中，列宁说：“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①在代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也引起了争论。意见分歧一次也没有超出这些狭小的范围。列宁企图使党具有尖锐明确的界限，使编辑部的组成十分精干，并且要有严格的纪律。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则宁愿有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更接近一个家庭的类型。但是双方都只是在摸索前进。虽然冲突很尖锐，然而还没有人认为这些意见分歧“十分严重”。按照列宁事后提出的明确的说法，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属于“预兆”性质。

苏联教育界的第一位领袖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写道：

“那次斗争的最大困难在于：使党陷入分裂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还没有探测出以马尔托夫主义者为一方和以列宁主义者为一方的深刻分歧的真正症结。当时这些分歧似乎还是围绕党章上的一段话和编辑部人选问题产生的。许多人感到惶然，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会导致分裂。”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5 在讨论党章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7卷，中文第2版第269页。——译者注

皮亚特尼茨基后来在共产国际担任过显要的职务，但在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工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法了解为什么由于细微的分歧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工作。”在那些年代里非常接近列宁、后来曾经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工程师回忆说：“对我个人说来，关于马尔托夫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想法特别显得牵强附会。”这样的话还有许许多多。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都表示抗议和哀叹。谁都不愿承认火星派在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分裂。分道扬镳是后来发生的事，过程很缓慢，不可避免地有东摇西摆的情况。第一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继续共事、相安无事的情况并不少见。

高加索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状况都很落后。所以在高加索甚至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难理解代表大会上出现的问题。诚然，参加伦敦大会的三个高加索代表在热情冲动中都站在多数人的一边。值得深思的是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托普里则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已经脱离了多数派；朱拉博夫和克努尼扬茨在后来几年里面也投奔孟什维快了。布尔什维克倾向占优势的著名的高加索秘密印刷所在1904年还继续翻印形式上仍为党中央机关报而实质上已受孟什维克控制的《火星报》。叶努基泽写道：“我们的意见分歧绝对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中。”只是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说，不早于1905年年中，印刷所才转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之手。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所谓关在遥远偏僻的监狱里的柯巴立刻就把分歧估计得“十分严重”的说法。他从来就缺乏先见之明。而且，即使是一个不像他那么谨慎多疑的青年革命者，如果在动身去西伯利亚以前没有对党内斗争表明立场，也是很难予以责备的。

柯巴从西伯利亚直接回到梯弗里斯。这个事实不能不使人惊

讶。稍微有点名气的逃亡者也很少有回到自己的老窝去的，因为在老窝里最容易被日夜警惕着的警察发现，特别是在梯弗里斯这样的小省城，而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但是年轻的朱加施维里还没有割断他和高加索的脐带；格鲁吉亚语仍然是他进行宣传工作时使用的几乎惟一的语言。此外，他并不感觉自己是警察注意的焦点。他还没有下定到中俄罗斯去一试身手的决心。他在国外是一个无名小卒，也不想到国外去。看来还有一种比较属于个人的原因使他留在梯弗里斯：如果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把年代搞混的话，柯巴当时已经结婚。他在坐牢和流放期间把年轻的妻子留在梯弗里斯。

1904年1月爆发的日俄战争起初使工人运动受到削弱，但是到该年年底却使它得到空前的推动。沙皇政府的军事败绩迅速驱散了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学生在战争开始时感染的爱国情绪。不仅在革命群众中间，甚至在资产阶级反对派中间，失败主义日益严重，虽然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尽管情况如此，在大动荡即将来临的前夜，社会民主党却一连几个月处在停滞和内部失调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尚未明朗化，所以更令人焦虑。这些分歧开始徐徐渗出党的总部的狭小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整个革命战略问题。

斯大林的御用传记家说：“斯大林在1904年至1905年期间是在和孟什维克进行激烈斗争的旗帜下工作的。”叶努基泽在最近经过修改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实际上把从1904年开始到1908年结束的和高加索孟什维克进行的整个斗争的主要担子挑在自己肩上。”贝利亚断言：斯大林从流放地逃走以后，“组织了并领导了对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同志不在期间变得特别活跃的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些作者希望证明的事太多了。如果大家相信斯大林早在1901年至1903年已经在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

作用，相信他早在1903年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且相信他从1904年2月起就开始和孟什维主义进行斗争，那么所有这一切努力产生的如此可怜的效果——1905年革命前夕，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实际上还寥寥无几——不能不使大家惊奇莫名，相对无言。贝利亚说，孟什维克“在斯大林不在期间”特别活跃。这句话听起来几乎是讽刺。任何人在也好、不在也好，小资产阶级的格鲁吉亚，包括梯弗里斯在内，20年来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在1905年革命中，格鲁吉亚的工人和农民一致拥护孟什维克派；参加四届杜马^①的格鲁吉亚代表都是孟什维克；1917年2月革命期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派为俄国各地提供了全国水平的领导人——策烈铁里、齐赫泽等等。最后，甚至在格鲁吉亚已经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后，孟什维主义仍然发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后来在1924年的起义中得到表现。“整个格鲁吉亚必须犁平碾碎！”这是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也就是在他“和孟什维主义展开激烈斗争”的20年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格鲁吉亚起义的教训时说的话。因此，比较正确而且对斯大林也比较公正的办法，还是不要夸大柯巴在20世纪初年所起的作用。

柯巴从流放地回来时是高加索委员会^②委员。他是在坐牢期间在外高加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缺席当选的。在1904年开始的时

① 前两届杜马是根据1905年12月24日（旧历11日）选举法选举出来的。第一届杜马从1906年5月10日（旧历4月27日）开到7月22日（旧历9日），第二届杜马从1907年3月5日（旧历2月20日）到6月15日（旧历2日）。最后两届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16日（旧历3日）颁布的限制性更大的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届杜马度完了自己任期，从1907年11月14日（旧历1日）到1912年6月22日（旧历9日）。第四届杜马也差不多度完任期，从1912年11月28日（旧历15日）到1917年3月10日（旧历2月25日）。——原编者注

②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译者注

候，八个委员中的大多数可能已经同情伦敦代表大会中的多数派；但是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柯巴自己同情哪一方面。高加索的地方组织显然倾向于孟什维克。由克拉辛领导的党的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反对列宁的。《火星报》完全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高加索委员会仿佛悬在半空中。但是柯巴宁愿脚踏实地。他对机构比对思想更为重视。

关于柯巴在1904年的活动，官方提供的消息特别简单，而且不可靠。他在梯弗里斯是否有任何活动？如果有活动，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活动？对这些问题现在还一无所知。一个从西伯利亚逃回来的人不大可能在有许多人认识他的工人小组中出头露面。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柯巴在6月间就搬到巴库去了。关于他在巴库的活动，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老一套：“他领导了巴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他揭露了孟什维克”。没有任何事实，没有任何具体的回忆！如果柯巴在那几个月里写过任何东西，现在也扣下未予发表。这可能并不仅仅是出于疏忽。

另一方面，后来想把斯大林说成是巴库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的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在这座烟雾弥漫、阴郁凄惨、被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世仇弄得乌烟瘴气的城市里，早在1896年就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小组。三年以后，阿维尔·叶努基泽和几个从莫斯科驱逐出来的工人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刚开始时，正是这位叶努基泽和拉多·克泽霍越里合作，组织了倾向火星派的巴库委员会。1903年，由于和克拉辛关系密切的叶努基泽兄弟的努力，在巴库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地下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在为第一次革命准备基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到1905年年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在同一个印刷厂并肩工作，融洽无间。曾经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阿维尔·叶努基泽年迈时失宠于斯大林。1935年，他被迫对自己在

1923年写的回忆录进行修订，删去早经确认的事实，而代之以无凭无据的空话，说沙夏曾经在高加索、特别是在巴库起了鼓舞和领导作用。叶努基泽的屈服既没有使他自己免于毁灭，也没有给斯大林传增加任何生动的笔触。

1904年6月柯巴第一次出现在巴库地平线上的时候，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拥有八年革命活动的记录。在此以前，这座“黑色的城”曾经在工人运动中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春天给巴库带来了总罢工，结果在整个南俄引起了势如雪崩山倒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浪潮。维拉·查苏利奇是第一个认为这些新出现的现象意味着革命已经开始的人。巴库的无产阶级性较强，特别是比梯弗里斯强，所以布尔什维克得以在巴库比在高加索其他地方更早地获得一个更巩固的立足点。曾经用“金托”这个梯弗里斯名词来形容斯大林的那位马哈拉泽说，1904年秋天，“在沙夏直接领导下，一个在落后的石油工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的特殊组织”在巴库建立起来。如果马哈拉泽在他的回忆录的初版而不是在10年以后才说这段话，可能比较令人信服。10年后，他在贝利亚的驱策下重新改写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他一步步接近官方规定的“真象”，每次改写都要大骂前面一版，把它说成是魔鬼的产物，并且停止发行。

柯巴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无疑会见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

生于梯弗里斯^①，是列宁在梯弗里斯的最早的青年信徒之一。帮助柯巴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能正是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加米涅夫。但是在加米涅夫由于一个异想天开的罪名而被枪决的前几年，他的名字已经从党史上一笔勾销。无论如何，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历史是1904年秋天而不是柯巴从流放地回来以后才开始的。这个日期已经得到各方面的证实，甚至官方作者在不需要具体提到斯大林的时候也是这样说。1904年11月，梯弗里斯举行了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有来自高加索各地组织——大多数

①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年7月31日（旧历18日）生于莫斯科。但是他和梯弗里斯断断续续有过10年左右的联系。1865年，加米涅夫的父亲在外高加索铁路局找到差事，全家迁往梯弗里斯。年轻的列·鲍·加米涅夫从维尔诺中学转到梯弗里斯第二中学，1901年毕业。他在梯弗里斯中学的最后两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毕业以后被禁止上任何俄国大学或工程学校。他向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鲍戈列波夫请愿，最后终于得到批准，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他在大学里继续“为非作歹”，先后坐过布蒂克和塔干卡的监狱。他被剥夺了回去上大学的权利，在警察监视下被送回梯弗里斯。作为一个活跃的火星派，他在梯弗里斯一个铁路工人小组和一个制鞋工人小组里做过教育工作，直到1902年秋天他去巴黎时为止。他在巴黎会见了火星派的许多领导人，并且为《火星报》写关于学生运动的文章。几个月以后，列宁从伦敦到巴黎来演讲。加米涅夫会见了列宁，为他的魅力所征服。当列宁从伦敦迁往日内瓦时，年轻的加米涅夫也从巴黎搬到日内瓦去住，在列宁指导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和马尔托夫辩论时第一次以演说家的面貌出现——当时马尔托夫正拿着加米涅夫的护照在欧洲旅行。加米涅夫在巴黎认识了托洛茨基的姐妹奥尔加，后来和她结婚。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列宁立即派加米涅夫回梯弗里斯担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他在梯弗里斯还参加了外高加索铁路工人一次罢工的组织工作。1904年1月18日和19日，警察搜查了他的寓所，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梯弗里斯。他在莫斯科坐了五个月牢，于1904年7月28日被送回梯弗里斯。他除了因组织工作到过外地，一直在梯弗里斯住到1905年春天作为代表去伦敦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为止。——原编者注

是微不足道的小组——的 15 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决议，赞成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这个举动不仅对孟什维克而且对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都等于公开宣战。如果柯巴曾经参加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话，贝利亚和其他历史学家一定会说，这次会议是“在斯大林同志倡议和领导下”举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沉默意味着当时身在高加索的柯巴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组织派他当代表。会议选出一个常务局。柯巴并没有成为这个重要机构的成员。如果他在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当中享有任何比较突出的地位，这一切就是无法想像的。

代表巴士姆参加这次会议的维克托·塔拉图塔后来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无可争辩的暗示，说明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领袖究竟是谁。他写道：“在 1904 年底或 1905 年初举行的高加索地区会议上……我还第一次见到以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领袖身份出现的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同志。在地区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被选为赴各地游说的宣传者，派往全国各地为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广泛的鼓动。同时，他还得到委托，要他访问全国各地的委员会，并且和我们当时在国外的中心取得联系。”这位富有权威性的证人丝毫没有谈到柯巴参加这种活动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柯巴包括到全俄布尔什维克中心“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里面去。常务局有 17 名成员，目的是召开代表大会。加米涅夫作为高加索的代表成为常务局委员。在后来成为苏联著名领导人的常务局委员中，我们可以找到李可夫和李维诺夫的名字。再说一句也许不是不适当的：加米涅夫和李可夫都比斯大林年轻两三岁。整个说来，常务局是由“第三”代的代表组成的。

柯巴在1904年12月，即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会议举行以后不久，再次来到巴库。在他到达前夕，油田和工厂工人爆发了一次总罢工，使整个俄国都感到意外。党组织显然还不能理解群众想造反的情绪的性质。由于战争^①第一年的情况，这种情绪更加激烈起来。1905年1月22日，工人们在加邦牧师的率领下向冬宫发动了悲剧性的进军，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事件。巴库的罢工正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有一本在1935年捏造的“回忆录”含糊其辞地提到斯大林曾经领导巴库罢工委员会，并且说一切都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但是根据同一个作者的说法，柯巴是罢工开始以后才到达巴库的，而且在这个城市里总共只住了十天。事实上，他到巴库来负有特殊任务，可能和筹备代表大会有些关系。当时他可能已经选择了布尔什维主义。

斯大林自己企图倒填他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日期。对于他在狱中得到释放以前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他感觉不满意，所以在1924年克里姆林军校学生一次纪念会上宣称，他早在第一次流放期间就和列宁开始取得联系。他说：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上的创建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的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

^① 指日俄战争。——译者注

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个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1903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短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作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①

这篇故事从心里状况和风格上说都是幼稚的，很能代表斯大林的特点。倒填时序绝不是这篇故事仅有的错误。柯巴在1904年1月才到达流放地；因此他不可能在1903年在流放地收到他所说的那封信。不仅如此，他究竟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写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的，也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以前在监狱里已经蹲了一年半了。被流放的人从来无法事先知道自己会流放到什么地方去；因此柯巴不能把他在西伯

① 参看《论列宁》。《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74—175页。
译者注

利亚的通信地址事先通知国外的朋友；而且柯巴在流放地只度过一个月，这段时间肯定不够他从流放地寄出信去又从国外收到回信。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列宁的信不是属于私信性质，而是纲领性的。这类信的副本照例由克鲁普斯卡娅经手寄到一些地点去，而原件则保存在党在国外的档案里。为一个不知名的年轻的高加索人而出现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档案里没有这封被柯巴“按过去一个老的秘密工作者的习惯”烧掉副本的信的原件（当时柯巴整整 24 岁）。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到他给列宁的回信。从他自称敬若神明的领袖那里收到一封信以后，柯巴按理是会立刻复信的。然而斯大林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偶然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档案里没有柯巴的复信。当然，复信可能被警察中途截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部门案卷里应当保存一份副本，并且早就会复制出来刊载在苏联报纸上了。而且这种关系不会仅限于一封信。一个年青社会民主党人必然认为和党的领袖、党的“山鹰”保持永久联系是最宝贵的。至于列宁，他把和俄国的一切联系都看得很宝贵，对每一封信都详详细细地回答。然而近年来并没有发现列宁和柯巴来往的信件。这段故事的一切方面都令人费解——一切方面，故事的意图在外。

1904 年或许是列宁一生当中除最后生病的几年以外最困难的年头。违反他自己的意愿并且出于他自己意料地，他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卓越的领导人断绝了关系，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都找不到可以代替他原来的战友的人。布尔什维克招募文人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很费劲。新补充进来的人也赶不上《火星报》编辑的水平。当时最活跃的布尔什维克之一、1904 年和列宁一起住在日内瓦的利亚多夫在 20 年后回忆说：“奥里明斯基来了，沃罗夫斯基来了，波格丹诺夫来了……我们在等待卢那察尔斯基，波格

丹诺夫保证他一到就会参加我们的行列。”这些人都是从流放地回来的。他们人还未到，名已先行。人们期待着他们。但是在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调集编辑人员的时候，谁也没有提出柯巴作为可能的人选。而现在柯巴却被描绘成那个时期的一个卓越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2月22日，《前进报》第一期终于在日内瓦出版。这是布尔什维克派生命中一个重大事件。可是柯巴和这个事件毫无关系。他甚至和报纸的编辑毫无接触。报纸上既没有他的文章，也没有他的新闻报道。如果他当时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领导人，这种情况是不可想像的。

最后，我们根据旁证作出的结论还得到直接的文件证据的支持。梯弗里斯秘密警察厅的头子卡尔波夫在1911年写了一篇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包罗甚广而且极有趣味的材料。在这篇材料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

“从1902年以来，他就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很活跃，起初是一个孟什维克，后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就我们所知，卡尔波夫的报告是明确指出斯大林在分裂以后某一段时间曾经是一个孟什维克的惟一文件。梯弗里斯出版的《东方曙光报》粗枝大叶到如此程度，居然在1925年12月23日的一期发表了这个文件，不是没有想到就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解释。为了这个错误，这位主编后来无疑受到残酷的惩罚。最耐人寻味的，是连斯大林本人也感觉不便否认这个说法。后来再也没有任何党的御用传记家或历史学家提到这个重要文件，而同时他们却永无休止地转载、辗转引用和照相复制大量无足轻重的材料。我们暂且假设梯弗里斯宪兵（他们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应当是消息最灵通的）提供的情报是不正确的。那么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附带的问题：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个错误呢？如果柯巴真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秘密警察厅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对某些刚入

门的新手或某些三等角色，它才可能在描写他们的政治特点时犯这样露骨的错误，对一个“领袖”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这个出于偶然得到发表的文件一下子就把官方呕心沥血经营的神话粉碎无遗了。而现在还保存在防火的保险库里、或者刚刚相反地已被迫不及待付之一炬的类似文件还多得很哩！

看来，我们为了证明一个细微的结论似乎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柯巴究竟是在1903年年中还是在1905年前夕参加布尔什维克的难道真有什么不一样？然而，除了附带使我们了解克里姆林宫史学和偶像学是怎样在工作以外，这个细微的结论对正确理解斯大林的政治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写文章谈到斯大林的人都接受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他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是他的性格先天决定的，理有固然，势有必至。但是这种看法肯定是片面的。诚然，一个人必须坚定果断才能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不过这些特点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中有许多性格坚强的人。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当中性格软弱的人也并不十分罕见。布尔什维主义，按照它的性质来说，不只是心理状态和性格的问题。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是一种历史哲学，一种政治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工人们是被他们所处的那个类型的整个社会环境推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的。个人的性格是坚强还是软弱，对这一点几乎不发生影响。在布尔什维主义还只是一种历史预言的日子里，一个知识分子需要在政治上具有非凡的直接洞察力，在理论方面具有非凡的想像力，对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具有异乎寻常的信心，才能够严肃认真地、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党联结在一起。绝大多数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兴起时期参加这个党的知识分子后来都抛弃了它。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对柯巴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脱离这个党对他也同样比较困难，因为他既没有理论的想像力，也没有直

觉的历史洞察力，也没有先见之明，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轻率冒失的人。他的智力一直远逊于他的意志力。碰到错综复杂的情况需要做某些新的考虑时，柯巴宁愿等待时机，保持安静，或者退却。凡是有必要在思想和政治机构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他总是倾向于选择机构。必须先建立一套执行纲领的机构，然后柯巴才可能对这种纲领表示任何尊重。他的本性是建立在对群众、对个人都缺乏信任的基础上的。他的经验主义经常迫使他选择抵抗力最小的道路。这就说明，这个目光短浅的革命家为什么在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转折点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和孟什维克极为接近，有时比孟什维克更右。与此同时，在解决他已经熟悉的问题时，他总是倾向于赞成采取最坚决的行动。照他看来，在一切情况下，组织得很好的暴力是达到目标的最迅速的捷径。这里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作一种类比。俄国的恐怖主义者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然而他们极为坚决大胆。马克思主义者习惯把他们叫做“玩弄炸弹的自由主义者”。斯大林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在政治上采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战略上，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战术上，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种玩弄炸弹的机会主义者。

柯巴离开正教中学不久就到梯弗里斯观象台担任类似会计性质的工作。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尽管“薪俸微薄”，柯巴仍然喜欢他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使他有許多余暇可以进行革命活动。“他最不在乎自己个人的福利，对生活毫无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他的品质相当完美，能够为理想作出牺牲。”所有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青年人都闷声不响、毫不张扬地作过保持贫困的誓言。柯巴是忠于这个誓言的。此外，和其他许多起誓的人不同，他从小就不习惯享受。任何人也无法代替的沙夏

第二^①说：“我曾经到米哈伊洛夫斯克街他住的那间狭隘肮脏、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去拜访过他几次。他每天穿的是一件朴素的俄国黑上衣，打着当时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特征的红领带。冬天他加上一件旧的褐色的短披肩。头上从来只戴俄国式的鸭舌帽。虽然柯巴在离开正教中学的时候和学校里大多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远非友好，但是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仍不时凑些钱帮他解决最迫切的需要。”巴比塞告诉我们，1900年，也就是离开正教中学的第二年，约瑟夫发现自己已经一文莫名，“靠同志们的帮助，他才有可能得到食物”。警察文件表明，柯巴在观象台一直工作到1901年3月他不得不隐匿起来的时候为止。正如我们已经听到的那样，他的职业很难使他维持生活。“……他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保持衣冠端正”，伊雷马什维利接着说。“然而他的确也没有做任何努力使自己的衣服至少保持整洁。他总是一件脏外衣，一双没擦过油的鞋子，从来没有看见他穿过别的。他打从心底里讨厌任何使他想到资产阶级的东西”。脏外衣，不擦油的靴子，蓬松的头发也是所有青年革命者、特别是各省的青年革命者的普遍特点。

柯巴在1901年3月转入地下，成为职业革命家。从那时起，他使用过许多名字，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在不同时期，有时在同一时期，他被叫做“达维德”、“柯巴”、“尼扎拉泽”、“契日柯夫”、“伊凡诺维奇”、“斯大林”。同样地，宪兵们也给他起了各种绰号，其中用得最久的一个绰号是“里雅博依”^②，影射他脸上长着麻子。柯巴从此只有在监狱和流放地，即两个地下活动时期之间的间歇，才恢复合法地位。

叶努基泽在经过纠正的回忆录中写到年轻的斯大林的时候

① 指伊雷马什维利。——译者注

② 俄文 рябой有“麻脸”的意思。——译者注

说：“他一贯目标专一。”叶努基泽又说：“他的一切行动、冲突和友谊都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目的。……斯大林从来不追求个人声誉”，这样就把他的联系限制在“先进工人和职业革命者”的圈子里。许多官方回忆录一再重复这种限制，目的是想说明斯大林在掌握权力以前为什么在全国群众当中、甚至在一般党员当中一直默默无闻。但是，说他不追求声誉是不真实的。他非常贪图声誉，但是得不到。缺乏众望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刺痛了他的心。正是由于无法通过正面攻击取得荣誉，才驱使这个性情激烈的人采取曲折隐蔽的手段。

柯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就一直追求驾驭别人的权力，认为大多数人都比他软弱。然而他既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受的教育多，也不比别人更善于辞令。他不具备任何引人同情的属性。但是，他在顽强冷酷方面超过别人，具有比别人丰富的切合实际的常识。他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相反地，他懂得如何使冲动的感情服从自己的打算。这个特点在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格卢尔基泽写道：“约瑟夫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般是从容不迫的。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他的答案的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据，他就回答；否则他多少要磨蹭一个短时间再回答。”完全抛开所谓他的回答“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据”的夸大之辞不谈，这段话里面提到斯大林年轻时代一个相当带根本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在大多数胸襟开阔、性情急躁而幼稚无知的青年革命者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甚至在这样早的时期，柯巴就毫不踌躇地挑拨他的对手相互火并，诬蔑他们，并且对在任何方面似乎比他优越、或者似乎对他是一种绊脚石的每一个人施加阴谋。青年斯大林这种完全不顾道德的做法造成了对他疑心重重的气氛，引起了许多关于他的恶毒的谣言。许多他没有犯的罪名也开始归到他头上来。和斯大林

在监狱里有过密切接触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 1928 年在侨民的报纸上谈到，可能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已被正教中学开除以后，校长从他那儿收到一份告发他的革命小组中一个原来的同志的材料。当约瑟夫不得不在梯弗里斯组织面前就这件事加以说明时，据说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告发材料的作者，甚至还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功劳。据说他是这样考虑的：这样一来，那些被开除的人就不得不成为革命者，而不致被改造成教士和教员。某些容易上当的传记家一下就抓住这一点不放。然而整个故事带有明显的捏造痕迹。一个革命组织只有对任何带有丝毫告发、挑拨或出卖的气味的事予以无情的严格处理才可能继续存在。在这方面表示丝毫宽容都意味着这个组织已经开始腐烂。如果沙夏已经证明胆敢采取这种 1/3 属于阴谋、2/3 属于出卖性质的手段，而党在这以后还容忍他留在自己队伍里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当时和柯巴在正教中学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伊雷马什维利丝毫不知道这件事。他本人顺利地 from 正教中学毕业出来当了教员。然而这样恶毒的捏造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并非偶然。对其他所有的老革命家，从来不曾出现任何类似的谣言。

苏瓦里纳写的斯大林传是最有文件根据的。他企图用斯大林属于“职业革命家”这种危险人物之列的事实来说明他的道德品质。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苏瓦里纳的概括极为肤浅。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个在非法的、被迫进行隐秘活动的条件下完全献身于工人运动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品质最恶劣的人是做不到的。文明世界的工人运动出现过许多职业官僚和职业政客；这个阶层绝大多数以保守、自私和思想偏狭著称，他们不是为运动而生活着，而是靠牺牲运动的利益生活的。和欧洲或美国的一般工人官僚比较起来，俄国的一般职业革命家要比他们具有大得无法比拟的吸引力。

这一代革命者的青年时期和工人运动的青年时期是一致的。这是 18 岁至 30 岁的人的时代。超过这个年龄的革命者为数很少，看起来都像老头子了。运动在当时还丝毫没有职业性。它是依靠对未来的信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而存在的。当时还不存在常规，没有确定不变的公式，没有戏剧性的姿态，也没有现成的演说伎俩。从性质上说，这种斗争充满悲怆动人的事件，行动起来还有些胆怯，笨手笨脚。“委员会”和“党”这些字眼本身在当时还是崭新的，还带有清新的气息，使年轻人听起来像一首既令人不安、又令人着迷的乐曲。参加一个组织的人，谁都知道不出几个月他就可能坐班房，继之以流放。雄心壮志的准绳是：在被捕以前要尽可能长期地坚持工作；在宪兵面前要坚定不移；要尽可能改善同志们的处境；在监狱里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念些书；尽快地从流放地逃往国外；在国外要增加智慧；然后回俄国进行革命活动。

职业革命者对自己鼓吹的东西是信仰的。他们选择耶稣受难的道路不可能出于其他的动机。在迫害面前保持团结不是一句空话；对懦夫和背叛行为的鄙视更增加了这种团结。叶夫根尼娅·列维茨卡娅在描写 1901 年至 1907 年的敖德萨地下活动情况时写道：“我对我有机会遇见的大批同志反复思考，我回想不出任何值得非难的、可鄙的行为，任何欺骗或说谎的事例。磨擦是有的。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有的。但仅止于此。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道德品质，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越变越好，越变越亲切。”当然，敖德萨并不是例外。把自己全部献给革命运动而不要求任何报酬的青年男女决不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最恶劣的代表。和任何其他社会集团比较起来，“职业革命家”这一批人决不会相形见绌。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是这批人里的一个，也具有他们的许多特点；许多，但不是全部。他认为，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推翻当权者。在他的灵魂中，对当局的憎恨远比对受压迫者的爱来得活跃。

监狱、流放、牺牲和艰苦生活并没有吓倒他。他懂得如何面对危险，毫无惧色。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智力迟钝、缺乏才华以及自己仪表和精神面貌的平凡黯淡等等特点非常敏感。他的狂妄的抱负带有嫉妒和恶意的色彩。他的顽强坚定和打击报复心理纠缠在一起。他那闪烁着猜忌的眼神使敏感的人无法不予注意。早在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善于抓住人们的弱点，无情地、刺刺不休地加以数落。事实证明，高加索的环境对滋长他天性中这些基本特点是极为有利的。和狂热者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随波逐流，和忽冷忽热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没有冲昏头脑，他从小就懂得冷静大胆、谨慎小心、特别是精明伶俐这些优点的可贵。而在他身上，这种精明伶俐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诡谲狡猾。特殊的历史环境将使这些基本上是次要的属性具有首要的意义。

第三章 第一次革命

据我们推测，柯巴是在梯弗里斯十一月会议以后隔了一个时期才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决定积极参加为召开新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而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贝利亚说，柯巴在12月离开巴库去各地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宣传。我们接受了贝利亚未加说明的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不是不可能的。当时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党已经分裂成两半。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已经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它在组织上已经处于比孟什维克对手优越的地位。在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柯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我们提出柯巴在1904年底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的肯定的证据，我们就会感到为难了。贝利亚甚至从当时发表的传单上引用了一系列的话，然而他不敢说这些传单当中有任何一张是柯巴写的。关于传单作者的可疑的沉默是比文字更响亮的证据。贝利亚引用柯巴以外的人写的传单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填补斯大林传记中出现的明显的空白。

在这个期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从党章的领域转到革命战略的领域。1904年秋天，主要由于心慌意

乱的沙皇当局过分疏忽以至毫无作为，地方自治局^①人士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发起的宴会运动^②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运动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关系问题。孟什维克的方案要求把工人变成一个为自由主义独唱家伴唱的民主合唱队，一个体贴入微、谨慎周到的合唱队，不仅要“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而且更有甚者，要全心全意提高自由主义者的自信心。列宁立刻发动了攻势。他嘲笑了这种方案的根本思想——耍弄外交手腕支持一个毫无办法的反对派，用这种办法来代替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只有在群众压力下，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只有大胆的社会纲领才能唤醒群众来采取行动；而这正是自由主义

① 地方自治局——由地主士绅监督管理，表面上为公众谋福利的半官方地方自治机构，主要设在中俄罗斯各省（俄罗斯西部各省、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哥萨克地区、高加索、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都没有地方自治局）。这个机构是沙皇——解放者亚历山大第二（1864年1月1日的通令）解放农奴以后不久建立起来的，使专制警察统治有所放松，朝立宪制度进了一步。从一开始，地方自治局就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是依靠各省总督和沙皇专制制度指定的其他官员的善意。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统治下，1889年设立了由贵族担任的地政官，作为管理农民的法官，加强对地方自治局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权的控制，从而使地方自治局受到进一步限制。除了这些重要限制以外，地方自治局表面上类似县政会议，管理道路修建、公共卫生、火灾保险、贫民救济、公共教育及其他文化经济事务。同时，地方自治局还以极其有限的、相当畏首畏尾的方式起了反映自由主义政治情绪的讲坛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地方自治局的领袖们一直对沙皇保持忠诚。他们主张在俄国实行立宪政体。沙皇利用地方自治局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革命者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有时也利用地方自治局的个别成员，至少是把他们当做一支辅助力量。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工程师、统计员、文书及其他雇员越来越多地成为革命者，或者成为革命政党的同情者。——原编者注

② 据《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当时是所谓“自由派的春天”，自由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可以在宴会上高谈立宪。——译者注

者害怕的。“如果我们考虑他们的惊慌情绪，那我们可真是傻瓜了。”^①在长期沉默以后，列宁在1904年11月发表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鼓起了他的同志们的精神，在发展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否有可能正是这本小册子把柯巴争取过来的呢？我们不敢回答说是。在后来一些年代里，凡是当他有机会自行考虑对自由主义者采取什么立场的时候，他总是乱碰乱撞地倾向孟什维克的概念，认为“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是很重要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中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就是例子）。然而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这位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对这种甚至在孟什维克的普通党员中也激起很大不满的机会主义方案似乎真正感到愤怒。必须指出，激进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保持鄙视态度的传统，整个说来，还没有来得及消逝。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仅仅由于彼得堡的“流血的星期日”^②和接踵而至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才把这个谨慎多疑的高加索人推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无论如何，这个转变的里程碑还没有载入史册。

斯托帕尼和列赫曼这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写的详尽细致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他们在1904年底和1905年初在巴库和梯弗里斯有机会打过交道的所有革命者的名字：柯巴不在其中。列赫曼

① 《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64—65页。——译者注

② 1905年1月22日（在俄国，一般叫做1月9日），忠实的、手无寸铁的彼得堡工人在加邦牧师率领下，列队去向沙皇呈递陈述疾苦、要求伸冤的请愿书。沙皇尼古拉二世用排枪对付请愿群众，打死数百人。这个日子从此以“流血的星期日”载入俄国史册。这种惊人的残暴行为比其他任何一个因素都更彻底地摧毁了俄国老百姓对他们的“小父亲”的善良意图的信心，驱使大批俄国工人成群结队地加入革命政党，这一天标志着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开始。——原编者注

举出了高加索联盟中“占领导地位”的人：柯巴不是其中之一。斯托帕尼举出了和孟什维克共同领导 1904 年 12 月著名的巴库罢工的布尔什维克的名字：柯巴仍然不在其中。然而斯托帕尼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对他写的材料应当是了解的。两个作者写的回忆录都发表在官方的共产党历史杂志上，两个人都远非“人民的敌人”，而是良好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回忆录是 1925 年写的，也就是在根据上级指定、有计划地进行伪造的做法成为制度以前。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塔拉图塔在迟至 1926 年写的一篇讨论“1905 年革命前夕的高加索”情况的文章中还丝毫没有提斯大林。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高加索组织书信集整整 50 页的注释里一处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1904 年底和 1905 年初，根本找不到今天被描绘成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的这个人曾经进行活动的任何痕迹。

这个结论和最近关于斯大林曾经和孟什维克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的连篇累牍的断言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只需要把人进行斗争的时间往后推两年左右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矛盾。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既不需要引用文件也不必害怕反证。另一方面，没有理由不相信柯巴一旦作出抉择以后就用最严厉、最粗暴、最肆无忌惮的方式进行了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当他还是正教中学小组的成员、梯弗里斯委员会的宣传工作者和巴士姆组织的成员时，已经有人说他喜欢使用偷偷摸摸的阴谋诡计。这种倾向在当前的派别斗争中得到了远为广泛和大胆的表现。

贝利亚列举了梯弗里斯、巴士姆、契图阿里、库泰伊斯和波季等地，说斯大林曾经在这些地方同诺·饶尔丹尼亚、伊拉克利·策烈铁里、诺阿·拉米施维里和其他孟什维克领袖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展开辩论。但是贝利亚对所有日期都敷衍地含糊放过——这种遗漏绝非出于无意。事实上，贝利亚多

少比较明确地谈到的第一次辩论发生在1905年5月。从柯巴发表的著作来看，情况完全一样。他写的第一部表达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作品，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于1905年5月。这本小册子的题目颇为古怪，叫做《略论党内意见分歧》^①。贝利亚认为有必要说明这本小册子是“1905年初”写的，然而没有提出任何根据。这就比任何时候更露骨地暴露了他企图把两年差距缩小的作法。有一个记者——显然就是后来的李维诺夫，他根本不懂格鲁吉亚语——自国外报道，说梯弗里斯出现了一本小册子，“造成了轰动”。对这种“轰动”只能有一个解释：格鲁吉亚群众过去只听到过孟什维克的意见，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其他意见。小册子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学生根据列宁著作写的一篇摘要。这本小册子从来没有再版，这是毫不奇怪的。贝利亚煞费苦心地从小册子里挑出一些引语。一看这些引语就知道作者本人为什么宁愿让这本小册子和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其他文章同样湮没无闻。

1905年8月，斯大林重述了列宁写的《做什么？》一书中企图说明自发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相互关系的一章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运动在听其自然发展的情况下，不可挽救地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革命的阶级觉悟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这儿不是批判这种观点的地方。这种批判完全属于列宁传的范围，而不属于斯大林传的范围。《做什么？》的作者本人后来承认他的理论带有偏见性质，从而承认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他是在反对“经济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的斗争中附带提出这种理论作为斗争武器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决裂以后，对《做什么？》进行了为时已晚、然而更激烈的批判。“从外面”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阶级觉悟的问题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79页。——译者注

再次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记载了格鲁吉亚报纸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关于“从外面灌输阶级觉悟问题的绝妙提法”^①。今天，有人把这种赞美当做说明柯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家的证明。其实这不过是国外中心习惯使用的表示鼓励的话。无论何时，如果某些省的出版物公开出来保卫自己所属派别的思想或领袖，照例会得到这种赞美。至于这篇文章的质量，从贝利亚俄文译本中引用的下面一段话就足以清楚地看出来：

“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②等等。这种文章本来早就会被人置诸脑后的，只是由于作者后来的命运才使它们免于湮没。然而，事情本身十分清楚，这些文章本身并没有说明作者的命运；相反地，倒是使这种命运更加费解了。

整个1905年，柯巴根本没有出现在高加索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通信的人的名单中，即使在这以前也没有出现过。3月8日，

① 这是列宁在《无产者报》上关于斯大林这篇论文的提法。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70页注46。——译者注

② 《答〈社会民主党人报〉》。《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144—145页。——译者注

有一个名叫塔里的人在一封寄自梯弗里斯的信里，用下面这句话综合了高加索某些孟什维克的反应。他说：“列宁对我们时代的意义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早，而且更清楚”。同一位塔里写道：“列宁被看成是这些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中间一个类似巴扎罗夫的人物”。不言而喻，这儿指的是屠格涅夫书中的主角：属于踏实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巴扎罗夫和思想主义空谈家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历史杂志的编者在塔里的名字下面写的注解是“作者不详”。但是这种明确的文学类比本身就足以说明斯大林不可能是这封信的作者。列宁在1905年下半年写的文章和信里面——至少是在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信里面——提到曾经在俄国工作过的30多个社会民主党人；其中19个人和列宁的年龄最接近，还有12个人和斯大林的年龄最接近。斯大林本人没有在信中出现过：无论是作为直接的通信者还是作为第三者。因此我们不能不和从前一样坚持我们已经宣布的结论：斯大林关于他在1903年已经收到列宁一封信的说法完全是捏造。

列宁和《火星报》编辑部断绝关系的时候大约是34岁。在断绝关系以后，直到他深信自己的追随者为数较多、自己年轻的威信足够强大的时候为止，列宁经历了几个月的动摇犹豫——这种情况和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使他感到倍加困难。安排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工作的胜利结局毋庸置疑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的优势。以克拉辛为首的调和派中央委员会终于向“非法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投降，参加了它无法阻止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召开于伦敦，孟什维克故意不出席，而宁愿在日内瓦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的代表大会。24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和14名仅有发言权的代表，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自第二次代表大会造成分裂以来一直忠实于列宁、并且鼓动各地党委

反抗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的联系权威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和他过去的老师以及《火星报》时期最亲密的合作者进行坦率的斗争过程中发挥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观点得到合法地位。从那时起，这个观点就比和孟什维克共同制定的党的正式纲领具有更实际的意义。

和日本进行的命运多舛的、丢脸的战争加速了沙皇统治的崩溃。在第一阵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大浪潮以后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反映了革命结局即将到来的形势。列宁在给参加大会的代表作报告时说：“最近一年的全部历史表明，我们对起义的意义和必然性估计不足。”^①代表大会在土地问题上坚决地往前走了一步，承认有必要支持当时的农民运动，甚至不惜没收地主士绅的土地。它比以前更具体地概叙了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前景，特别是在临时革命政府作为内战组织者的问题上说得比以前具体。用列宁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占领了彼得堡并且绞死了尼古拉，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好几个旺代。”^②代表大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勇敢地着手为起义进行技术准备。列宁说：“关于成立专门的战斗小组问题，我可以说，我认为它们是必要的。”^③

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越重视，柯巴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

① 《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09页。——译者注

②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32页。旺代是法国一个省，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里爆发了落后反动的农民反对革命的国民公会的暴动。暴动是在宗教的口号下进行的。领导暴动的是反革命的教士和贵族。——译者注

③ 《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12页。——译者注

事实就越引人注目。到那时为止，他已经拥有将近七年的革命活动历史，经历过监禁、流放和逃亡。如果他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具有任何重要性，可以肯定这段历史将使他至少得到代表候选人的地位。不仅如此，柯巴在整个 1905 年都可以自由活动。据贝利亚说，他“在组织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如果真是如此，他就应当是高加索代表团的团长了。那么，为什么不是呢？倘若是由于生病或者是任何其他特殊原因使他不能出国，官方的传记家肯定不会不告诉我们。他们的沉默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可以说明这位“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袖”为什么没有出席那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任何令人相信的理由。贝利亚所谓柯巴曾经“最积极”地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不过是苏联御用历史学中连篇累牍的言之无物的空话之一。消息灵通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在一篇纪念第三次代表大会 30 周年的文章里丝毫没有谈到斯大林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事；宫廷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含糊其辞，实质上是说没有阐明这种意义具体属于什么性质。但是，从我们现在已经设法了解到的一切事实来看，情况似乎十分清楚：柯巴经过一段很长的动摇犹豫时期，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久才参加布尔什维克；他根本没有参加高加索十一月会议；他从来不是这次会议成立的常务局的成员；而作为一个初入门的人，他根本不能妄想得到担任代表的委托。代表团的成员是加米涅夫、涅夫斯基、齐哈卡雅和查帕里泽；他们才是当时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们后来的遭遇和我们的叙述不是毫无关系的：查帕里泽在 1918 年被英国人枪决；加米涅夫是 18 年后被斯大林枪决的；涅夫斯基被斯大林下令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从此无影无踪；只有年迈的齐哈卡雅幸存下来，设法比他应当活的时间活得更长。

布尔什维主义权力集中倾向的消极面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

次代表大会上开始得到明显的表现。政治机构的特殊习惯在地下工作时期已经在逐步形成。年轻的革命官僚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类型。一点也不错，秘密工作的条件为实行选举、责任制和监督等等民主形式提供的余地是很少的。但是，委员们无疑也不必要地增加了许多限制；他们对革命工人远比对他们自己更坚决、更严厉，甚至在迫切需要注意倾听群众呼声的时候也宁愿独断独行。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代表大会本身和各地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一样，几乎没有工人参加。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所谓委员通常是一个自信心十足的人；他充分了解委员会的活动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委员’照例是不承认任何党内民主的；对于雷厉风行、大吵大嚷和引起争端的‘国外中心’，‘委员’从心里就瞧不起。他说：‘他们应当来尝尝俄国的条件，换换空气。’……同时，他不希望有任何革新。‘委员’既不希望也不懂得如何适应变化万千的条件。”这种含蓄然而十分精辟的描写对了解柯巴在政治上的心理状况极有帮助，因为他就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委员”。早在1901年刚开始在梯弗里斯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他就反对吸收工人参加他的委员会。作为一个“实践家”——即政治上的经验主义者——他对侨居国外的人、对“国外中心”表示冷淡，后来更表示轻蔑。由于他自己缺乏直接影响群众的才能，他就加倍顽固地紧紧抓住政治机构。他的宇宙的轴心就是他的委员会——梯弗里斯、巴库和高加索委员会，最后是中央委员会。他对党的机构的盲目信仰后来异常有力地发展起来；委员变成了超级机器人、党的总书记、官僚制度的化身及其举世无双的领袖。

在这方面很容易使人作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斯大林主义当时已经植根于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说得更概括些是已经植根于职业革命家的地下活动体系。但是一经分析，这种推论就化为粉碎，说明它惊人地缺乏历史内容。当然，在严格挑选思想先进的人、并且把他

们团结在一个紧密的集中领导的组织里的过程中是会出现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但是在集中制的所谓“原则”中绝对找不到这种危险的根源；根源还是应当从劳动者缺乏一致性和他们的落后性中去找——也就是说，应当从使阶级受它的先锋队集中领导成为必要的一般社会条件中去找。了解领导机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机构和党之间、先锋队和阶级之间、集中和民主之间实际存在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从它们的性质上说，不可能是先天决定、一成不变的。它们决定于具体历史条件；它们的不稳定的平衡是通过各种倾向之间的殊死斗争加以调节的。各以其极端分子为代表的这些倾向也在政治机器的专制和软弱无力的空谈之间摇摆不定。

我在1904年写的《我们的政治问题》^①这本小册子里对列宁作了不少成熟的、错误的批评，但是也为当时那些“已经从集中制‘原则’中找到支持，所以不再感到有必要依靠工人”的“委员们”的思想倾向勾画出颇为准确的形象。第二年，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不得不对身踞高位、大权在握的“委员们”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充分证明我的批评是公正的。大会代表之一李亚多夫追叙说：“辩论带上了比较激烈的性质。开始出现了理论家和实践家、‘文人’和委员等明确的小集团。……在争论过程中，李可夫这个相当年轻的工人崭露头角。他成功地把大多数委员都聚集在自己周围”。李亚多夫是同情李可夫的。列宁在最后发言时大声指出：“有人说，能胜任委员会委员的工人是没有的，我听到这话感到很不安。”^②让我们回想一下柯巴曾经何等坚决地用挑战的口吻要梯弗里斯工人——“把手按在心上”——承认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

① 原文如此，疑为《我们的政治任务》。——译者注

② 《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几个决议草案时的三次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69页。——译者注

适合担任属于教士阶级的神圣职务。列宁坚决认为：“问题挂起来了，显然党内出了毛病。”^①问题在于政治机构采取的高压手段，在于开始萌生的官僚主义。

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中领导的组织；但是他认为这个组织首先是提高先进工人活动水平的一个杠杆。把政治机构当做偶像来崇拜的想法不仅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而且使他感到深恶痛绝。他在代表大会上立刻就发现了委员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倾向，并且对这种倾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证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委员们也非常激动。”委员们那次取得了胜利。他们的领袖就是后来继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列宁建议每个委员会里面工人必须占多数。他提出的决议案没有通过。委员们还决议把位于国外的编辑部置于中央委员会控制之下。这也是违反列宁的意志的。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列宁宁愿分裂也不会同意使党的指挥工作依俄国中心转移，因为国内中心常受警察袭击，所以在组成上是不稳定的。但是现在列宁深信自己已经掌握决定权。他在和我国社会民主党富有威信的老领导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觉得自己远比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更有把握，因此也就更为沉着。倘若在辩论中他真像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那样“激动”，或者毋宁说是似乎很激动，那么他在组织方面采取的步骤就更显得谨慎了。他不仅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默然承认失败，甚至还帮助李可夫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革命这个伟大的导师在培养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党的政

^① 《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几个决议草案时的三次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69页。——译者注

治机构内初步萌生的、尚不稳定的保守思想。

除列宁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工程师列昂尼德·克拉辛和博物学家、医生兼哲学家亚·亚·波格丹诺夫（两个人都是列宁的同时代人），有不久以后就抛弃了党的波斯托洛夫斯基，还有李可夫。候补委员是“文人”鲁米扬采夫和两个实践家：古谢夫和布尔。无需说，根本没有人想到提议让柯巴担任布尔什维克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1934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贝利亚报告的基础上宣称：“到现在为止已经写出的材料都不能反映许多年以来实际领导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斯大林同志的真正作用”。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代表大会未予说明。但是所有旧的回忆录作者和史学家立刻遭到排斥，其中某些人后来被枪决。然后，为了纠正过去的一切罪过，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斯大林研究所”。随即又对所有的故纸堆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它们立刻焕然一新。普天之下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规模的杜撰捏造。但是传记作者的处境还不是毫无希望的。

〔我们知道，〕柯巴在1904年2月从流放地回到梯弗里斯，一直总是胜利地“领导着布尔什维克的活动”。1904年和1905年，除了短期离开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梯弗里斯。根据最新的回忆录的说法，工人们习惯说“柯巴正在活剥孟什维克的皮”。然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似乎并没有因为这种外科手术而受到什么损害。梯弗里斯的布尔什维克迟至1905年后半年才进入“整顿队伍时期”，才“考虑”出版报纸的问题。那么柯巴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和1905年上半年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呢？倘若他并不是完全置身于工人运动之外（这是不大可能的），那就无论贝利亚对我们说什么，他一定是孟什维克组织的成员。到1906年初，列

宁在梯弗里斯的追随者已经增加到 300 人。但是孟什维克有 3000 人左右。仅从力量对比来说，柯巴在革命发展高潮中注定只能当一名文字上的反对派。

斯大林说：“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两年（1905 年至 1907 年）革命工作使我坚强起来”。在煞费苦心经过一再编辑加工的演说辞里，演说者肯定不可能纯粹出于偶然地把自己在全国正在经受革命的火的洗礼的那一年以及全国尚处于动乱痛苦中、对动乱的结局经常感到恐惧的第二年——即 1906 年——究竟在什么地方搞混淆了。这种事情是忘记不了的！这使人不能不产生这种印象：斯大林故意不提第一次革命是因为他对这次革命根本无话可说。由于用巴库作为背景比梯弗里斯更容易使人产生英雄的联想，他就在事后把自己到巴库去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半，虽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诚然，他用不着害怕苏联历史学家会表示反对。然而“柯巴在 1905 年究竟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案。

革命的第一年是以彼得堡枪杀向沙皇请愿的游行工人开始的。柯巴就 1 月 22 日事件的呼吁书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恳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乐园’……”^①

诸如此类。这位“委员”的口气是多么自信！就在那几天里，碰巧的话或许就在那几个小时以内，在遥远的日内瓦，列宁对起义群众提出了下列恳求。他在一位同事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让几百年来受剥削、受苦受难的生活在你们心头积下的愤怒和仇恨发泄出来吧！”

^①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 1 卷，中文版第 69 页。——译者注

这句话里完完全全地表现出列宁和群众一起仇恨，一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并不要求起义的群众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在对待从政治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件事的态度上——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这两个人物的对比不可能表现得更简单扼要、更剝切有力了。

在柯巴无缘参加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隔了五个月，苏维埃就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是孟什维克发起的，但是他们从未梦想到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会导致什么结果。孟什维克派在苏维埃里面处于支配地位。孟什维克普通党员卷入了革命发展的洪流；领导人对自己这一派陡然向左摆的趋势感到茫然，沉思起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对已经摆好阵势的群众建立不分党派的代表机构这种新创造起初是感到害怕。他们找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要它立刻通过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否则立刻解散。整个彼得堡苏维埃，包括参加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工人队伍，眼皮也不眨地就把这份最后通牒丢在一边去了。直到11月列宁到达以后，“委员们”对待苏维埃的政策才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那份最后通牒肯定已经削弱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各省都按照首都的榜样行事。当时对苏维埃的历史意义的估计已经开始出现深刻的意见分歧。孟什维克企图把苏维埃说成只是工人代表机构的一种偶然出现的形式——一种“无产阶级议会”，一个“革命自治机构”，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极为暧昧。列宁却恰恰相反，他懂得如何彻底地从旁聆听彼得堡群众的意见。群众把苏维埃叫做“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以列宁立刻作出评价，认为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杠杆。

柯巴在1905年写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很贫乏。从这些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苏维埃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格鲁吉亚没

有建立任何苏维埃，而且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苏维埃，把它们忽略过去了。这岂不令人惊讶？苏维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机构的意义本来应当使这位未来的总书记第一眼就会得到深刻印象的。但是他认为苏维埃是直接代表群众的、外来的政治机构。苏维埃不服从委员会的纪律，需要比较复杂、比较灵活的领导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苏维埃是委员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1905年革命期间，柯巴对苏维埃置之不理。从实质上看，他对革命本身也是置之不理的，恍惚是在和革命生气似的。

他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革命道路。莫斯科的传记家和艺术家总是设法把柯巴说成是这次或那次游行示威的领导人，“一个靶子”，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家，一个民众保护者。所有这一切都是撒谎。斯大林甚至在后期也没有成为一个演说家；谁也没有听见他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演说。在整个1917年，党的一切鼓动工作者，从列宁开始，都在到处演讲，弄得声嘶力竭。斯大林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共集会上讲过话。1905年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不同。高加索有些年轻的革命者，例如克努尼扬茨、朱拉博夫、加米涅夫和策烈铁里等，是一些平凡的演说家；而柯巴连这样一个演说家也说不上。在党的秘密会议上，他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思想还能够阐叙得比较好，但是他完全缺乏鼓动者的力量。他强迫自己讲话，讲得十分吃力，既不成调，又无热情，也无抑扬顿挫。在他的力量的反面，他性格上固有的弱点在于他完全不能感受激情。他只会在枝节问题上唠唠叨叨纠缠不清，不能超过这水平。他不能使自己和听众融而为一，息息相通，不能激发听众的高尚的情操。他本身就激动不起来，因此也无法使别人激动。单凭狠毒是不足以掌握群众的心灵的。

1905年把所有封住的嘴都打开了。这个沉默了一千年的国家第一次开始讲话了。一切稍微能够表达自己对官僚制度和沙皇的

憎恨的人都找到了毫无倦意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听众。柯巴无疑也曾经试过身手。但是和其他能够当场发表演说的人比较起来，情况对他是十分不利的。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柯巴对别人的感情虽然麻木不仁，对自己的感情却极为敏感，非常容易感到不愉快。看来或许令人吃惊，然而他的确郁闷到喜怒无常的程度。他的反应是原始的。凡是感到自己被人置之不理或冷淡的时候，他都倾向于撒手不管，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他会蜷在一个角落里郁闷地抽着烟斗，做着复仇的梦。他在1905年怀着闷气退入幕后去做一种类似编辑的工作，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柯巴远非天生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思想迟钝，思路狭隘，风格笨拙单调。当他希望造成强烈效果时，他就使用粗鲁的语言。他当时写的文章是任何稍微有点头脑、要求比较严格的编辑部一篇也不会采用的。一点也不错，地下出版物通常并不以文字出色著称，因为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大部分是由不以耍笔杆为职业而是出于必要才使用笔杆的人写的。无论怎么说，柯巴并没有超出这个水平。他的著作说明他试图有系统地阐述问题；但是这种努力通常表现为图解式地排列材料，列举论点，矫揉造作地提出修辞性问题和臃肿重复地大量堆砌说教的词句。他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独特的风格，缺乏生动的想像——这一切使他写的每一行都带上陈腔滥调的烙印。他是一个从来不畅快快发表自己的思想、而是腼腼腆腆地重复别人的思想的作者。用“腼腆”这个词来形容斯大林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但是这个词最恰当地说明了斯大林从高加索时期直到今天还在摸索写作道路的样子。

当然，认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导致行动就错了。当时非常需要这种文章。它们满足了一种迫切需要。它们从这种需要中得到力量，因为它们表达了革命的思想，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对于大批读者来说，这些文章是新鲜的，朝气蓬勃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从

资产阶级报刊上找到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这些文章是为一部分人写的，它们转瞬即逝的影响也仅限于这些人。现在来读这些枯燥无味、笨拙沉重，有时还文理不通的句子，加上那些令人吃惊的矫揉造作的修饰点缀，不能不令人感到压抑、混乱、厌烦，有时会由于文章不知不觉造成的滑稽印象而放声大笑。所以毫不奇怪，甚至当时也没有人把柯巴当一个新闻工作者看待。1905年10月，在列宁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办的第一个合法报纸《新生活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所有作家，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首都的和地方的，都给这家报纸投稿。然而斯大林的名字不在其内。以编委身份代表高加索参加这家报纸的是加米涅夫，不是斯大林。柯巴既不是天生的作家，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作家。他在1905年比平常更勤快地耍弄笔杆只能说明和群众通声息的另一种方法对他是更陌生的。

在各种集会令人应接不暇的时期，在罢工浪潮汹涌的时期，在街头游行示威的时期，许多委员都显出了自己的渺小。革命者必须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中高谈阔论，大声疾呼；必须能够当场作文，一挥而就；必须能够当机立断地作出严重的决定。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才能，都是斯大林所缺乏的；他的声音和他的想像力一样软弱无力；倚马千言的才能对这位头脑迟钝的、一直在暗中摸索的思想家是无缘的。在高加索的天穹上，有比他灿烂得多的星辰使他相形逊色。他以惊羨的、几乎是仇视的眼光注视着革命：这不是他擅长的一行。叶努基泽写道：“除了出去开会和照顾党的地方支部的许多事务以外，他一直都坐在自己堆满书报的小房间里，要不就是坐在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同样‘宽敞’的编辑室里”。只要具体设想一下那个“疯狂的年头”天翻地覆的情况，回想当时的悲壮雄伟的气氛，就可以充分玩味这样一个孤独而又抱负不凡的青年人的形象：埋头躲在一间小房里——很可能

是一间不十分整洁的房间——手里拿着笔，枉费心机地搜索枯肠，想找到略微符合时代精神的句子。

一连串新的事件接踵而至。柯巴仍然是一个旁观者，不满意所有的人，也不满意自己。一切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包括那些年里领导高加索的运动的许多人——拉克辛、波斯托洛夫斯基、斯托帕尼、列赫曼、哈尔佩林、加米涅夫、塔拉图塔等等——都忽视斯大林，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而斯大林自己对他们也无话可说。某些人——像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在革命活动中无疑曾经和他有过接触。其他的人也可能见过他，但是并不认为他和一般“委员们”有何不同。他们谁也没有把他挑出来说半句赞扬或同情的话，谁也没有提供丝毫根据，使未来的官方传记家可以说他们对斯大林有过好感。

1926年，官方的党史委员会发表了有关1905年的原始材料的修订本——按照列宁逝世后出现的新的倾向修订的版本。在一百多篇文件中，列宁的文章将近30篇，其他作者的文章在数量上几乎也不相上下。尽管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已经接近爆发点，属于正统派的编辑部仍然不能不把我的四篇文章包括在文集里面。然而全书455页，没有一行是斯大林的手笔。字母索引表里包括好几百个名字，把在革命的年代里稍微有点名望的人全部列举出来。斯大林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仅仅提到伊凡诺维奇，说他是1905年12月党的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值得注意的是，迟至1926年，编辑部对伊凡诺维奇和斯大林是同一个人这个事实还一无所知。这些公正不阿的细节比后来所写的一切歌功颂德的文章要令人信服得多。

斯大林和革命的1905年似乎毫不相干。他的“学生时代”是革命前在梯弗里斯、巴上姆以及后来的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据他自己声称，他在巴库——即1907年至1908年——成为一个

“学徒”。这样一来，第一次革命时期就被作为这位未来的“工匠”的训练时期而一笔勾销。斯大林在谈起自己的历史来的时候，从来不提这个伟大的年头，这个曾经使老一代最出色的革命领袖出现在世界上、使他们得到锻炼成长的年头。这一点应当牢牢记在心头，因为这绝非出于偶然。在他的自传中，第二个革命年头——1917年——几乎和1905年同样暧昧不明。我们又会发现柯巴（现在叫做斯大林）坐在一间简陋的编辑室里（这次是彼得堡《真理报》的编辑室），不慌不忙地为那些灿烂辉煌的事件写一些黯淡无光的评论。他是这样一个革命者：一次真正的群众革命就会使他失去常态，把他踢在一边，使他狼狈不堪。他既不是民众保护人，也不是战略家，也不是起义的领袖，他从来只是一个革命官僚。因此他注定只能糊糊涂涂地等待时机，直到汹涌的革命浪潮平静下来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殊才能。

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孟什维克是“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①，从而认可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分裂。党当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1905年秋天事态的发展带来有益的压力，使派别敌对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1905年10月，在等待已久的从瑞士流亡地回到革命的俄国的前夕，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热情的、和解的信，把他这位从前的老师和敌手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优秀的力量”，呼吁他进行合作。列宁说：“革命本身以惊人的速度扫除我们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②事实确是如此，然而为时不久，因为革命本身并没有维持多久。

毫无疑问，在开始的时候，孟什维克在建立和利用群众组织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2页。——译者注

②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列宁全集》第45卷，中文第2版第129—131页。——译者注

方面比布尔什维克更有办法。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几乎被浪潮淹没。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对蓬勃的运动适应得比较缓慢。但是人们用自己响亮的口号——这是他们对革命力量作了现实的估计的结果——使运动充实起来。孟什维克在苏维埃里面占优势；然而苏维埃的政策的方向基本上是符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孟什维克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甚至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暂时适应形势；然而他们既不能在革命高涨时期指导它，也不能在革命退潮时期忠于它的历史任务。

十月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了立宪宣言^①，同时也使工人地区产生了乐观和大胆的情绪。这次总罢工以后，两个派别内部都出现了不可抗拒的统一趋势。各种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纷纷成立统一委员会或联合委员会。领袖们也屈服于这种趋势。作为走向完全合并的一个步骤，两派分别召开了预备性会议。孟什维克的会是11月底在彼得堡召开的。当时在彼得堡，新标榜的“自由”还受到尊重。但是等到布尔什维克在12月开会的时候，反动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所以他们不得不到芬兰国土上——塔墨尔福斯——举行秘密会议。

按照最初的想法，布尔什维克是会议本来的党的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但是铁路工人的罢工、莫斯科的起义和各省出现的一些意料不到的发展使许多代表必须留在当地，所以出席的代表非常缺乏代表性。到达塔墨尔福斯的41位代表来自26个组织，他们投的票总共只代表4000左右的人。对于一个考虑推翻沙皇制度和参加即将成立的革命政府的革命政党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是微不

^① 指1905年10月7日宣言。这个宣言表面上答应实行“保证公民自由的坚固不移的原则；切实保障个人身体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同时答应召集立法杜马。……译者注

足道的。但是这 4000 人已经懂得如何表达千万人的意志。尽管如此，代表大会由于人数不足而自动变成一次代表会议。化名为伊凡诺维奇的柯巴和工人捷里亚作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梯弗里斯当时逐渐出现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并没有阻碍柯巴离开自己的编辑部的职守。

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在莫斯科遭到炮击的时期举行的。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至今尚未发现。代表们被当时发生的雄伟的事件吸引住，对会议的进程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克鲁普斯卡娅在 30 年后写道：“真是可惜，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一次多么热烈的聚会！开会的时候正处在革命的顶点，每个同志都跃跃欲试地想显一显身手。他们在开会间歇的时候练习射击。……参加会议的代表谁都忘不了这种情况。有洛佐夫斯基、巴兰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人。我记得这些同志，因为他们关于各地情况的报告非常令人感到兴趣。”克鲁普斯卡娅不曾提到伊凡诺维奇：她不记得他了。在会议主席团成员戈雷夫的回忆录里有一部分是这样讲的：“代表里面有斯维尔德洛夫、洛佐夫斯基、斯大林、涅夫斯基和其他的人。”这些名字排列的次序不是毫无意义的。现在还知道，发言赞成抵制国家杜马选举的伊凡诺维奇被选入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

当时的浪潮还十分高涨，所以连已经被自己最近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吓得胆战心惊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完全站到前途未卜的议会制度方面去。为了便于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建议只参加选举开始阶段的活动而不参加杜马。布尔什维克当中大多数人主张“积极抵制”。在 1920 年为列宁 50 寿辰举行的简单朴素的庆祝会上，斯大林用他特有的方式谈到列宁那时采取的立场。他说：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1905 年 12 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

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①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

① 1905年10月30日，沙皇政府根据斯·伊·维特的建议发表了一个宣言（一般按照旧历称为“十月十七日宣言”）。这个宣言除形式上答应举行民主选举和尊重基本人权以外，还宣布了俄国今后不经杜马同意不得颁布任何法律的原则。专制政府实际上等于宣布投降。这是在维特怂恿下采取的一个策略，其目的是把自由主义集团争取到政府这边来，取得他们的支持，借以阻止迫在眉睫的革命。维特被任命为首相，并且得到甚至可以从反对派集团中挑选内阁阁员的特权。第一届杜马的选举就是在1906年3月维特执政期间举行的。专制政府在投票时遭到毁灭性失败，因为政府党只得到极少数席位，在杜马中占大多数的是反对派的代表。杜马里面势力最强大的是以地方自治派著名领袖伊·伊·彼得隆凯维奇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因此，沙皇撤除了维特的职务，用反动的、唯命是从的戈雷注金代替他。沙皇在5月10日宣布第一届杜马开幕，7月21日下令解散杜马。当时政府和反对党争论的主要关键是土地问题。激烈的辩论是围绕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个法案展开的。这个法案规定要征用大庄园，为庄园主提供补偿，把征用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迎合贵族要求、解散杜马以后，尼古拉第二对自由派也作了让步，解除了戈雷米金的职务，任命斯托雷平担任首相。所以“维特杜马”是指由维特发起而他自己却没有机会领导或操纵的第一届杜马。

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没有抵制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在这届杜马里，反对党的力量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强大，其中左派的力量也增加了（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共有180名社会主义者，而第一届杜马只有85名温和派工党人士）。反对党和政府的冲突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尖锐。这个冲突的顶点就是政府指控55名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阴谋反对沙皇。于是，在1907年6月15日，沙皇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这届杜马是3月5日开幕的，总共存在了三个月。

第三届杜马开幕于1907年11月14日。在这以前，政府修改了选举法，使反对和保守派的代表在杜马中占多数，自由派和社会党人处于少数地位。这届杜马度完了法律规定的任期，于1912年结束。同年，第四届杜马成立，一直继续到1917年。——原编者注

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①

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提到“电击”般的印象，也没有提到50双手如何“雷鸣般地鼓掌”。尽管如此，斯大林关于当时情况的说法可能实质上是正确的。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还没有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既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将来的“实践家”尤其如此。列宁本人可能动摇过；他可能把来自地方抵制派的压力看成是来自革命分子本身的压力。但是，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会议的决议是“努力破坏这种警察式的杜马，完全拒绝参加”。惟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直到1920年斯大林还认为，列宁起初准备参加选举是一种“错误”；在那里，列宁本人已经承认他屈服于抵制的主张才是他真正的错误。

关于伊凡诺维奇参加抵制杜马选举问题的辩论的情况，有一个名叫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人讲过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纯粹是捏造的。他写道：

“斯大林起初很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在党的领导集团的会议上讲话，也是他第一次在列宁面前讲话。但是列宁用充满兴趣的眼光看着他，表示赞许地点着头。斯大林的声音坚定起来。等他讲完话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示同意。他的观点被接受了。”

作者和会议毫无关系。他的消息从何而来？德米特里耶夫斯基过去在苏联做过外交工作，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曾经短期参加斯大林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后来在国外的時候当了逃兵，投入白俄右翼阵营。耐人寻味的是，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甚至作为一个赤裸裸的法西斯活动分子的时候还

^① 参看《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80—281页。——译者注

非常敬佩斯大林，憎恶斯大林的一切敌手，并且转述克里姆林宫制造的一切神话。但是现在让我们听他把故事讲下去吧。在开过讨论抵制杜马的会以后，他说，列宁和斯大林“一起走出开会地点——人民宫。天气很冷。寒风怒号。他们在塔墨尔福斯街道上继续走了很久。列宁对这个人很感兴趣，他曾经听说这个人是在外高加索最坚决、最讲究实际的革命者之一。他要逼近地仔细瞧瞧他。他专心致志地、非常详细地问到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碰见过的人和他读过的书，问了很久。列宁有时会提出几点简单的意见……声调是满意的，赞许的。这正是他需要的那种人。”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当时不在塔墨尔福斯，他不可能偷听到列宁晚间在街上和斯大林谈的话。从他的书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从来没有和斯大林本人谈过话，也没有把斯大林作为消息来源。然而从他这篇故事里，可以感觉到某种生动而且……熟悉的气味。经过一番苦苦的回忆，我发现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不过是把关于我自己和列宁第一次见面和1902年秋天我和列宁在伦敦街头散步的情况的叙述改头换面地搬到芬兰去了。把一个神话人物的辉煌事迹移植到另一个神话人物身上去的做法在民间传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官僚制度在创造自己的神话时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当柯巴终于从地方狭小的壳里脱颖而出、进入全党这个广阔的天地的时候，正好是26岁。诚然，他的出现几乎无人注意，他是在七年以后才成为中央委员的。尽管如此，塔墨尔福斯会议仍然是他生命中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他访问了彼得堡，会见了党的工作干部，看到了党的机构，把自己和其他代表进行了比较，参加了讨论，被选进一个委员会，并且（如他的官方传记所说）“和列宁建立了明确的关系”。可惜的是，关于所有这些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

直到1906年4月才有可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统一代表大会^①。在那个时候，彼得堡苏维埃的人已经遭到逮捕，莫斯科的起义已经被粉碎，镇压的炮车辘辘碾遍全国。孟什维克向右翼溃退了。普列汉诺夫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状况。他说：“我们本来不应当动用武器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忠实地坚持起义的道路。在革命的尸骸上，沙皇召开了第一届杜马。从这届杜马选举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者将战胜赤裸裸的反动保皇党人。几个星期以前还主张对杜马采取半抵制手段的孟什维克，现在把自己的希望从革命斗争转到用宪法手段取胜的道路上来。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间，他们认为争取自由主义者支持是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则等待农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期望这种发展会帮助无产阶级的斗争，使它重新展开攻势，同时把沙皇的杜马抛在一边。和孟什维克相反，他们继续支持抵制。就如失败后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意见的分歧立刻就带有激烈的性质。统一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恶兆下开幕的。

参加代表大会的拥有投票权的代表共计113名，其中孟什维克占62名，布尔什维克占42名。从理论上说，每300个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选举1名代表，所以可以说全党大约共有3.4万名党员，其中1.9万名是孟什维克，1.4万名是布尔什维克。考虑到竞选的激烈程度，这些数字无疑有很多夸大的成份。无论如何，在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已经不是在增长，而是在缩小。在113名代表中，梯弗里斯占11名，其中10名是孟什维克，1名是布尔什维克。这个惟一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化名伊凡诺维奇的柯巴。力量的对比在这里是用简单的算术数字准确地表现出来的。而贝

^①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旨在把党内两派统一起来，故称“统一”代表大会。——译者注

利亚却胆敢说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领导下”，使孟什维克在群众中陷于孤立。这些数字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此外，组织紧密的高加索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那一支派中间起了巨大的作用。

伊凡诺维奇相当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一点在记录上有案可查。但是，人们在读这份记录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伊凡诺维奇就是斯大林，那就丝毫也不会注意他的讲话和评论。迟至十年以前还没有人引用过这些讲话。甚至党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注意到伊凡诺维奇和党的总书记是同一个人。伊凡诺维奇被放在为审查大会代表选举资格而成立的一个技术性委员会里。这件任命尽管微不足道，然而具有象征性意义：柯巴对机械性的技术问题是十分在行的。顺带说一句，孟什维克曾经两次指责他在报告过程中说谎，现在无法证明，提出指责的人本身是否客观。同样地，现在也不能不再次注意到这个事实：这种事件总是和柯巴的名字发生联系。

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农民运动的发展几乎完全出于党的意料之外。旧的土地纲领几乎完全不侵犯大地主的土地。这个纲领根本垮台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成了当务之急。孟什维克为“市有化”纲领而斗争——也就是说，把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的民主机构。列宁主张在一切权力交归人民的条件下实行国有化。孟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提出：不能信赖未来的中央政府，不能用国家的土地基金使它武装起来。他说：“列宁梦想的那种共和国，一旦建立起来，也不会永远维持下去。我们不能在俄国不久就会建立和瑞士、英国或美国同样的民主秩序这个基础上办事。考虑到复辟的危险，国有化是危险的。……”这就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期望是多么谨慎、多么有限！他认为，只有在国家本身属于工人的情况下才能把土地转为国家所有。普列

汉诺夫说：“……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既然即将发生的革命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有义务拒绝夺取政权。”普列汉诺夫使争取政权的问题——这是他的整个教条主义战略中的致命弱点——从属于预先为革命作出的社会学定义，说得更准确些则是从属于革命这个术语，而不是从属于革命固有的力量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

列宁主张由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夺取地主的土地，并由立宪会议通过国有化法律来批准这种剥夺。他在文章中和讲话时都指出：我的土地纲领“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①在基本论点上，他仍然和普列汉诺夫是一致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这位领袖不仅认为俄国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在1924年以前，甚至任何人都还没有想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相信如果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甚至连那将取得的民主性质的胜利也无法保持。正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列宁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俄国革命可以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②如果按照斯大林后来的解释，认为列宁考虑的是外来军事干涉的危险，那就错了。不，他谈的是内部复辟的必然性，因为在土地革命后，作为小业主的农民会回过头来反对革命。列宁坚持说：“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

①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0页。——译者注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327页。——译者注

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①

列宁认为，俄国民主主义的命运直接随欧洲社会主义的命运而转移。但是对于他说来，所谓“最后目的”和民主革命之间并不是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历史时期。早在争取民主的斗争时期，他就渴望带领支援的尖兵以最迅速的方式朝社会主义目标推进。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户。他说，在民主革命和农民起义时代，不能仅限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必须比这走得更远——要给土地私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清除道路。

伊凡诺维奇在这个革命关键问题上和列宁有不同的意见。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坚决反对国有化，主张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这次意见分歧，记录里面已有充分的记载。然而直到今天，苏联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次分歧，因为谁也不准引用或评论伊凡诺维奇在辩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但是，这篇发言肯定是值得注意的。斯大林说：“既然我们和战斗的农民结成暂时的革命联盟，既然我们因此不能不考虑这些农民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些要求，只要这些要求大体上不和经济发展趋向及革命进程相抵触就行了。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并不和上述现象相抵触(?)，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完全没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从这个观点看来，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都是不能采纳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327页。——译者注

的。”^①〔若干年以后，〕斯大林〔又说〕，列宁在塔墨尔福斯就土地问题发表了极为精彩的演说，引起了普遍的热情，〔而不说明〕他不仅发言反对列宁的土地纲领，而且宣布这个纲领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不仅如此，他在1924年还冒充在1906年就从这个纲领得到了强烈的印象。〕

首先，列宁在土地问题上的权威被认为是特别不可轻侮的，而一个对俄国情况一窍不通的高加索青年居然胆敢在土地问题上毫不妥协地出面反对自己一派的领袖，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惊讶。生性谨慎的柯巴照例既不喜欢在不熟悉的问题上冒险从事，也不喜欢居于少数地位。他通常只有在感觉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时候，或者像若干年以后的情况那样，无论多数意见如何，他掌握的机构都保证他可以得到胜利的时候，才参加辩论。因此，他这次发言支持并不十分受人欢迎的土地分配一定有更强有力的、使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动机。按照现在，也就是隔了30多年以后所能作出的解释，斯大林的动机有两个，都是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的。

柯巴参加革命时是一个平民民主主义者，一个土包子，一个经验主义者。列宁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思想对他是不着边际的、陌生的。他希望找到近在眼前的“保证”。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向往在格鲁吉亚农民身上比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显得更强烈，而且得到远为自发的表现，因为格鲁吉亚农民缺乏直接的村社土地占有的经验。因此，这位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肯定认为使这些小财产所有者得到一份额外的土地是防止反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在他的境况下，“分配主义”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信念——说实在的，他对从学说中得来的信念会毫不

^① 《论修改土地纲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6页。中间的问号是引者加的。——译者注

在乎地加以拒绝——而是和他的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他的教养、他的社会环境完全合拍的有系统的纲领。事实上，20年后，我们还会在他身上发现这种“分配主义”故态复萌的现象。

柯巴的第二种动机似乎也是同样明白无疑的。在他看来，十二月起义的失败肯定使列宁的威信有所降低；他一向认为事实比思想更重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柯巴和列宁站在一边不可能取胜。仅仅这个事实就大大减少了他对国有化纲领的兴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认为和对方的纲领比较，分配土地的害处较小。因此，柯巴有理由希望在最后决定时，代表大会中的多数会就危害较小的方案达成协议。这样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天生的气质就和阴谋家的策略考虑合而为一。但是柯巴的算盘打错了，孟什维克拥有很大的多数，所以当他们宁愿采取为害较大的方案时，不必选择危害较小的方案。

为了将来参考，必须指出：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效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仅限于完成共同的民主任务。他连想也没有想到应当指出，处于这种地位的农民将来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20年后，对农民的这种“不信任”将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邪说。当然，20年后，许多事情都将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斯大林曾经在1906年宣布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认为分配土地“并不和经济发展趋向相抵触”。他心目中想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当时他对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革命丝毫没有认真考虑。他十分肯定地认为，还得过几十年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这个期间，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将执行使农村经济结构集中和无产阶级

化的任务。柯巴在他的传单^①中用圣经上的字眼“乐园”来形容遥远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没有理由的。

代表主张分配土地的人作主要报告的当然不是实际上不见经传的伊凡诺维奇，而是较有权威的布尔什维克苏沃罗夫。苏沃罗夫相当详尽地发挥了这一派的观点。他争辩说：“据说这是资产阶级措施；然而农民运动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我们能够给农民什么支持，也只有按照这个方向才有可能。和农奴制比较起来，农民的独立经济是进了一步；然而进一步的发展将会超过它。”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超过”——即摧毁和剥夺——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独立农民以后，才能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然，土地分配纲领的原作者并不是苏沃罗夫，而是革命前不久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派历史学家罗日柯夫。他之所以没有以报告人身份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只是因为当时他还在监狱里。罗日柯夫的观点在和本书作者论战时有了发展。按照这种观点，不仅俄国，甚至最先进的国家也远没有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还可以起进步作用，这种作用何时可以完成则还遥遥无期。为了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中最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无产阶级必须以分配土地作为代价和农民结成联盟。然后，资本主义就会逐步使土地集中在更强大、更进步的地主手中，从而一举摧毁平均地权之类的幻想。列宁把这种直接鼓吹依靠农业资本家的纲领的支持者按照他们的领袖的名字叫做“罗日柯夫派”^②。指出下面这一点

① 指斯大林写的《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原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用传单形式印发的。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7—70页。——译者注

②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4页。——译者注

来不能说是多余的：对理论问题采取严肃态度的罗日柯夫本人在反动的年代里投奔到孟什维克那一边去了。

列宁在第一次投票时参加了分配派，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为了不致分散反对土地公有的票数。他认为，分配土地的纲领危害性较小。但是他接着指出，虽然分配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地主和沙皇复辟，不幸的是它也可能为波拿巴式的专制奠定基础。他指责主张分配土地的人“片面地看待农民运动，只考虑到过去和现在，没有注意到将来”^①，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所谓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任何人的”，这种农民观点十分混乱，而且用神秘的外衣掩盖着浓厚的个人主义；然而这种观点也包含一种进步倾向，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抓住这个倾向，利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土地分配派对此一无所知。“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于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②。列宁所说的“实践家”在这里指的是眼界狭隘的革命家、只会按照短小精悍的公式进行宣传的人。当我们考虑到下述情况，这种批判就显得更为中肯了：在后来25年里，斯大林骄傲地把自己专门称为“实践家”，以别于“文人”和“侨民”。只是在政治机构保证他实际上可以取得胜利、使他不会受到批评的时候，他才把自己称为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认为，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列宁也了解这种联系的性质，而且大概比普列汉诺夫了解得更为深刻。根据他的提法，为了使国有化成

①②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5—26页。——译者注

为可能，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他对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作了严格的区别。和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认为土地革命将由老百姓来完成，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来完成，否则就根本不能完成。但是，他鼓吹的“民主专政”还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据列宁说，如果小业主的代表在革命政府中占了统治地位——在20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政府就有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的危险。然而如果接受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以后必须会接管政府的论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因为一个革命会自然而然地转为另一个革命，这就成了“不断”革命了。列宁对这种论点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不用说，柯巴这个“实践家”和“分配派”对不断革命的前景是极端蔑视的。

在和孟什维克辩论和维护革命的农民委员会是夺取地主土地的工具这一论点时，伊凡诺维奇说：“如果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农民的解放也只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①事实上，这个四平八稳的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浅薄的模仿。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农民以武装分遣队、地方委员会等等形式积极参加，是不可能进行农民革命的。然而农民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乡村，而是决定于城市。农民阶级在现代社会中是缺乏定形的中世纪的残余，它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它需要外来的领袖。两个新兴的阶级在夺取对农民的领导权。如果农民跟着自由资产阶级走，革命就会半途而废，结果还会倒退。如果农民以无产阶级作为领袖，革命就

^① 《论修改土地纲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7页。——译者注

会不可避免地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不断革命的前景正是建立在历史发展比较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特殊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没有人为这种前景辩护。我在彼得堡监狱里的时候，曾经再次企图阐明这种前景。当时，起义已经被打退，革命在退却中。孟什维克渴望和自由主义者结成联盟。布尔什维克处于少数地位，而且已经分裂。不断革命的前景似乎受到了损害，必须等待 11 年才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代表大会在 62 票赞成、42 票反对和 7 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市有化纲领。这个事实对未来事件的发展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农民仍然不理睬这个纲领，自由主义者则敌视它。1917 年，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同样也接受了土地国有化。

伊凡诺维奇在代表大会上的另外两次发言仅仅是扼要转叙了列宁的演说和文章。在总的政治形势问题上，他理直气壮地攻击了孟什维克努力使群众运动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从而削弱群众运动的行为。他重申了人所共知的公式：“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①但是这个演说家远没有了解这种选择的全部历史含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意味着无产阶级对全国一切革命力量，首先是对农民握有无上的政治权力。在革命彻底胜利的情况下，这种“领导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专政所包含的一切后果。然而伊凡诺维奇坚决保持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俄国革命只能为资产阶级政权扫清

① 《论目前形势》，《斯大林全集》第 1 卷，中文版第 220 页。——译者注

道路，此外就不能起什么作用。他以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农民奉行独立政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农民可以用把土地分成小块的办法使自己得到解放。

这次所谓“统一”代表大会的确使党内两个主要派别以及民族组织——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犹太崩得派——统一起来。因此代表大会是名符其实的。但是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如列宁所说，倒在于这个事实：它“大大帮助了我们更清楚地划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①。如果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不过是一种“预测”，后来就得到克服，那么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统一”则只是通向六年以后彻底分裂的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在代表大会过程中，列宁远没有想到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905年几个月动乱的经历和孟什维克当时急骤向左转的情况记忆犹新。尽管他们后来，就像克鲁普斯卡娅写的那样，“十分清楚地把牌摊了出来”，据她说，列宁仍然希望“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他对这种高涨是毫不怀疑的——将会压倒他们，使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但是，革命的新高潮并未到来。

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立即写了一份给党的呼吁书，对通过的决议进行了克制的然而毫不含糊的批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纸面上已经解散的“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代表大会的42个布尔什维克里面，只有26个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伊凡诺维奇不在其中，正如他这个集团的领袖苏沃罗夫没有签一样。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显然认为他们和列宁集团的意见分歧如此重要，所以尽管呼吁书在土地问题上措辞十分谨慎，

^①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60页。——译者注

他们仍然拒绝和列宁集团联名出现在党的面前。在今天的党的官方出版物上寻找对这件事的评论是枉费心机的。然而，列宁在他印发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内容包罗很广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到伊凡诺维奇的任何演说，虽然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辩论的情况，提到了既包括孟什维克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一切重要发言人。列宁显然并不认为伊凡诺维奇的演说对辩论具有30年后人们企图赋予的那种重要意义。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改变。没有人提出让他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包括七个孟什维克和三个布尔什维克：克拉辛、李可夫和杰斯尼茨基。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一样，柯巴在会后仍然只是“高加索范围”的一个党的工作者。

在革命年代的最后两个月里，高加索处在翻滚沸腾的状态中。1905年12月，已经取得外高加索铁路和电信管理权的罢工委员会开始调整梯弗里斯的运输活动和经济生活。郊区掌握在武装工人手中。但是为时不久。拥有武装的当局迅速击退了他们的敌人。梯弗里斯省宣布戒严。库泰依斯、契图阿里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格鲁吉亚西部在苦痛中孕育着农民起义。12月10日，高加索警察局长希林金向彼得堡主管部门负责人报告说：“库泰依斯省处于紧急状态。……宪兵已被解除武装，叛乱分子已经占领铁路西段，自行卖票和维持公共秩序。……我尚未收到来自库泰依斯的报告。宪兵已经撤离铁路线，集中在梯弗里斯。传递报告的信使遭到革命分子的搜查，文件遭到没收；那里的局势是不能容忍的。……总督由于思虑过度，业已病倒。……详细情况将邮寄上，如不可能，则派信使送上。……”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觉悟过来的群众的集体主动性当然是主要原因；而每走一步，这种集体主动性必须以某些个人作为它的代表、组织者、领袖。柯巴不在其列。他是在事

件明朗化以后才不慌不忙地加以评论。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离开当地到塔墨尔福斯去。他离开了没有人注意，他回来了也没有人注意。

莫斯科起义遭到镇压使危机达到顶点。那时候，彼得堡的工人被前些日子的战斗和停工关厂事件弄得精疲力竭，已经处于消极状态。在莫斯科起义被压制下去以后，外高加索、外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伯利亚的革命也相继遭到镇压。反动派开始恢复常态。虽然周围整个潮水已在涌退，后起的浪头却仍在涌进，所以布尔什维克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有的革命政党都坚决相信最大的浪头即将涌至。列宁有些缺乏信心的追随者对他暗示，反动可能已经开始。他答复说：“我将是最后一个承认这一点的！”俄国革命的脉搏继续从工人罢工中得到最有力的表现。罢工一直是动员群众的基本方法。1905年，罢工人数达到275万；1906年也将近100万人。这个数字本身是巨大的，然而也说明罢工人数已急骤减少。

根据柯巴的解释，无产阶级的失败属于插曲性质。这种失败，“首先因为人民没有武器或武器太少——不管你怎样觉悟，赤手空拳是挡不住枪弹的！”^①这种解释显然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用赤手空拳“挡住”枪弹自然是很困难的。但是失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农民并没有全部起来；俄国中部起义的农民比边远地区少。军队只有一部分被争取过来。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力量，也没有真正了解敌手的力量。1905年是作为“总排演”的一年而载入史册的——它的无可估量的意义正在于此。但是列宁只是在事后才能指出这一点来。在1906年，他自己也在等待迅速摊牌。是年1月，柯巴用他照例是过分简单化的方式转述了列宁的意思。

^① 《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47页。——译者注

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消除任何动摇，反对任何犹豫，坚决执行进攻政策……一句话，团结的党、党所组织的起义和进攻的政策，这就是我们今天保证起义胜利所需要的条件。”^①甚至连孟什维克都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说革命已经完结。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伊凡诺维奇得到机会可以无需害怕驳斥地宣称：“总之，我们是处在新爆发的前夜……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②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爆发”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进攻的政策”越来越变成进行游击冲突和零散打击的政策。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所谓“没收”的洪流——武装抢劫银行、财库和其他储金机构。

革命的瓦解正在失去进攻的主动权。主动权正在转到政府手中去。当时，政府正在设法弥补自己已经受到打击的神经。在秋冬两季，革命政党开始从地下转入公开。戈矛未停而面盔已去。沙皇的警察代理人可以直接看到敌人的面孔了——所有的敌人和其中每一个人。1905年12月3日，随着彼得堡苏维埃成员的被捕，恐怖统治时期开始了。一切曾经使自己遭到怀疑、而又没有设法隐藏起来的人都一一被捕。杜巴索夫海军上将战胜了莫斯科的战士。这只是使当时的镇压行为更显得险恶。从1905年1月到1906年4月27日〔旧历5月10日〕召开第一届杜马时为止，根据大略估计，沙皇政府屠杀了1.4万多人，处决了1000多人，打伤了2万人，并且逮捕、流放和监禁了大约3万人。牺牲者主要是在1905年12月和1906年最初几个月遭到杀害的。柯巴并没有挺身而出，把自己“当做靶子”。他既没有受伤，也没有流放，也没有被捕。他甚至不需要躲起来。和从前一样，他仍然留在梯弗里斯。

① 参看《两次搏斗》。《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185页。——译者注

② 《论目前形势》。《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9页。——译者注

这绝对无法用他个人办法高明或幸运的巧合来解释。他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去参加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可能的。但是偷偷摸摸地领导1905年的群众运动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小小的梯弗里斯，任何“幸运的巧合”也无法保护一个活跃的革命家。事实上，柯巴对重要的事件采取了如此超然的态度，以至警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1906年年中，他仍然在一家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编辑室里过着悠闲的生活。

与此同时，列宁隐匿在芬兰的考卡拉，和彼得堡以及全国各地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其他成员也在那儿。各地秘密组织被割断的联系就在这个地方重新连接起来，经过重新组织。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和来自俄国每个角落的同志讨论了我们的工作。”她提到一些名字，其中包括在乌拉尔地区“拥有很大影响”的斯维尔德洛夫。她附带还提到伏罗希洛夫和其他的人。但是，尽管官方的批评进行了不祥的谴责，她在这个时期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这并不是因为她避免提斯大林的名字；相反地，只要有任何微小的事实根据，她总是努力突出斯大林。她在记忆中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

1906年7月8日，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左翼政党呼吁的抗议罢工没有实现：工人们已经懂得单靠一次罢工是不够的，而他们现在没有进行比罢工更进一步的任何斗争的余力。革命者阻止动员新兵的企图遭到惨败。斯维阿波尔格堡垒的起义有布尔什维克参预其事，结果证明只是一次孤立的发动，迅速遭到了镇压。反动势力增强了。党愈来愈深地转入秘密状态。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伊里奇事实上从考卡拉指导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活动。”她又提到一些名字和轶事，但是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谈到党在11月间在帖里奥基召开的讨论第二届杜马选举问题的会议时，也没有提到他。柯巴没有到考卡拉去。据说，他和列宁在1906年通过信，但是现

在一丝痕迹也没有保存下来。他们尽管在塔墨尔福斯见过面，然而并没有建立个人联系。斯德哥尔摩的第二次会晤也没有使他们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近。克鲁普斯卡娅谈到在瑞典首都作的一次散步，参加者有列宁、李可夫、斯特罗耶夫、阿列克辛斯基等等，其中没有提到斯大林。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由于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个人关系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变得紧张起来：伊凡诺维奇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所以列宁在报告中也没提到伊凡诺维奇。

按照塔墨尔福斯和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决议，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了。柯巴没有成为统一区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如果贝利亚的话值得相信，他的确成了1906年暗中和党的正式委员会平行存在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常务局的委员。然而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常务局的活动以及柯巴在其中起过什么作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梯弗里斯—巴士姆时期的“委员”对组织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是实质上、至少是表现形式上有了变化。柯巴再也不敢要求工人承认他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资格担任委员。苏维埃和工会使革命工人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他们往往证明比大多数地下工作知识分子更能领导群众。正如列宁预见到的情况一样，“委员们”不得不颇为突然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至少是改变自己的论点。现在柯巴在报纸上为党需要民主进行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实行由“群众自行决定问题、自行采取行动”的民主。仅仅通过选举实行民主是不够的：“拿破仑第三是普选产生的；然而谁不知道这位选举出来的皇帝是人民的最大的奴役者呢？”倘若贝索什维里（这是柯巴当时的笔名）能够预见到自己的未来，他是不会提到波拿巴式的公民投票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都没有预见到。他的预见的才能只适用于很短的距离。我们以后将会知道，这一点不仅是他的弱点，而且是他的优点——

至少在某个时代是如此。

无产阶级的失败迫使马克思主义退居防守地位。在雨骤风暴的几个月里沉默下去的敌人和反对派重新抬头了。左翼和右翼都认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当为反动派的猖獗负责。站在右边的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民粹党人；站在左边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对1905年的运动没有起任何作用。彼得堡苏维埃里面只有三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苏维埃垮台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气氛中得到了更响亮的共鸣。这次退潮在落后的高加索也留下了印记。高加索许多方面的条件比俄国其他地方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作为维护当时已经受到攻击的马克思主义阵地的作用的一部分，柯巴用自己故乡格鲁吉亚的文字在报纸上就“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①这些文章证明，作者用意是良好的，然而并不值得转述，因为它们本身不过是别人作品的转述。要从这些文章里寻章摘句也殊非易事，因为它们都是平铺直叙，浅露板直，而要想挑选任何带有个性的句子则更为困难。他的这部作品从来没有再版；指出这一点已经够了。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右边出现了联邦主义者的政党——一个部分地模仿社会革命党、部分地模仿立宪民主党的地方组织。贝索什维里十分有理地谴责了这个党喜欢玩弄懦弱的手段和妥协的倾向。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使用了相当大胆的形象性的语言。他写道：“大家都很清楚，每一种动物都具有明确的颜色。但是变色蜥蜴的性格对这一点感到不满足；和狮子在一起它就带上狮子的颜色；和狼在一起它就带上狼的颜色；和青蛙在一起它就带上青蛙的颜色，视什么颜色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63—337页。——译者注

对它最有利而定……”对变色蜥蜴的这种污蔑，动物学家可能会提出抗议。但是，既然这位布尔什维克批评家基本上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没有当成乡村牧师的人，他的文笔是可以原谅的。

柯巴—伊凡诺维奇—贝索什维里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活动，这里已经全部谈到了。即使纯粹从数量上说，也是不多的。然而作者已经作了很大努力，避免遗漏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问题在于柯巴缺乏想像力，智慧并不十分丰富。脑力劳动的锻炼对他格格不入的。只有无法抗拒的个人动机才能促使他对一件工作锲而不舍、持之以恒。革命把他撇在一边了，他没有从这次革命中找到使他奋发的动机。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革命的贡献和革命使他个人得到的利益比较起来显得少得可怜。

第四章 反动时期

地下革命者的个人生活总是被放在次要地位、受到抑制的。然而生活继续存在。和迪耶戈里维拉风景中的棕榈树一样，爱情从沉重的石头底下挣扎出来，迎向太阳。爱情和革命几乎总是合为一体的。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斗争、同样的危险以及与世隔绝的共同处境结成了强有力的纽带。夫妇们在地下活动中碰在一起，为监狱所分离，在流放中又相互寻找，重新聚首。我们对斯大林青年时代的个人生活情况知道得很少，但是由于这一点点情况为我们了解斯大林这个人提供了帮助，因此更值得宝贵。

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他是1903年结婚的。据他自己看来，他的婚姻是幸福的。诚然，在他自己的家里，找不到他所鼓吹的作为新型国家基本婚姻形式的男女平等。但是，和任何其他的人分享平等权利都是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他的婚姻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妻子的一般智力赶不上他，把他当做半仙似的人物看待；而且作为一个格鲁吉亚女人，她是在迫使妇女侍候男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中长大的。”尽管伊雷马什维利自认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却几乎像信仰宗教似地赞成实质上使格鲁吉亚妇女成为家庭奴隶的那种传统。他认为柯巴的妻子和柯巴的母亲卡佳具有同样的特点。他说：“这位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全心全意地关怀她丈夫的幸福。无数的夜晚，她都是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的，等待着忙于参加秘密会议的沙夏。她祈祷着，希望柯巴会抛弃得罪上帝的思想，回到勤恳劳动、安分守己的宁静的家庭生活中来。”

从这些话里，我们不无惊异地知道，在13岁就拒绝宗教的柯

巴居然娶了一个天真幼稚、虔信宗教的妻子。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环境里，这种情况可能不足为奇。在那种环境中，丈夫自认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把参加共济会仪式当做娱乐，而他的妻子在刚和别人通奸以后可以规规矩矩地跪在忏悔席向神父忏悔。但是在俄国革命者当中，这类事情被看得极其严重。他们的革命哲学的核心根本不存在贫血的不可知论，而只有战斗的无神论。宗教和他们经常冒着危险与之斗争的一切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怎么能够在个人生活中对宗教表示任何容忍呢？在早婚的劳动人民当中，可能发现不少丈夫结婚以后变成了革命者而妻子仍然固执地抱住旧的信仰不放的例子。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导致戏剧性的冲突。丈夫将会对妻子保守秘密，不让她知道自己的新生活，会和妻子愈来愈疏远。还有些例子是丈夫会把妻子争取过来，使她赞成自己的观点，离开她的亲属。青年工人经常抱怨，说他们很难找到不受旧的迷信束缚的女孩子。在青年学生中，选择伴侣要容易得多。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和一个宗教信徒结婚的例子几乎是不存在的。并不是说，关于这一点有任何规定。但是这种情况和这些人的习惯、思想和感想是不符合的。柯巴无疑是一个罕有的例外。

思想观点的分歧似乎并没有导致戏剧性的冲突。“这个精神上处于坐立不安状态、感觉自己一举一动都有人窥察、都受到沙皇秘密警察不断监视的人，只有在自己穷苦的家里才能找到爱情。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母亲以外，他对其他所有人都充满蔑视”。伊雷马什维利描绘的这幅田园风味的家庭景象使人们可以得出推论，认为柯巴对自己的亲密伴侣的信仰已经容忍到放纵的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和他的专横的性格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容忍，实际上一定是精神上漠不关心。柯巴并不希望在妻子身上找到一个可以分享他的观点或至少是他的雄心壮志的朋

友。他只需要一个百依百顺、忠心耿耿的女人就满意了。在思想观点上，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感情和精神需要上，他是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奥谢第亚人维佳的儿子。他对妻子的要求并不比他的父亲已经从长期受苦受难的卡佳身上得到满足的要求为多。

伊雷马什维利在年代方面并非一贯无懈可击。他在谈个人生活时比谈政治时记的年代较为可靠。但是他讲的斯大林结婚的日子有点令人怀疑。他说是1903年。可是柯巴于1902年4月被捕，1904年2月才从流放地回来。婚礼可能是在监狱里举行的。这种例子并不罕见。然而婚礼也有可能是1904年初他逃出流放地以后才举行。如果是这样，对于一个处于“非法”身份的人来说，在教堂举行婚礼是有一定困难的；然而从当时、特别是高加索的原始方式来看，来自警察方面的障碍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柯巴是流放以后结婚的话，就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在1904年政治上消极的原因。

柯巴的妻子——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①——死于1907年；据某些报道说，是患肺炎死的。当时，两个沙夏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伊雷马什维利抱怨说：“他从此把斗争的矛头对着我们——他过去的朋友。每次开会和讨论的时候，他都对我们进行最野蛮、最放肆的攻击，到处设法散布对我们的恶感和仇恨。如果可能，他一定会用火与剑把我们连根拔掉。……但是格理吉亚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和我们站在一起。这种情况只是使他更生气、更恼恨。”然而格鲁吉亚的风俗是难以改变的。尽管政治上有分歧，伊雷马什维利在柯巴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仍然去看他，对他表示安慰。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十分郁郁不乐，但是用友好的态度接待我，和往昔的情况一样。这个冷酷的人面容苍白，反

① 叶卡捷琳娜·斯瓦尼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同志的姊妹。这个同志后来成为苏联外贸银行行长。——原编者注

映出他忠实的生活伴侣的死给他带来的深心的痛楚。他情感上的苦痛……一定很深刻，历时很久，因为他已无法对外人掩盖了。”

死者的葬礼是完全按照东正教规定的仪式举行的。她的亲属坚持要这么办。柯巴也没有反对。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当人数不多的送葬行列到达墓园门口时，柯巴紧紧握住我的手，指着棺材说道：‘沙夏，这个人使我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她死了，而我对整个人类的最后一点温暖的感情也随她一起死去了。’他用右手按着心口说：‘整个心里都如此寂寞，说不出的寂寞！’”这些话可能使人感觉悲伤中带有戏剧性，显得矫揉造作，然而也可能是真的，因为这里指的是一个第一次遭受深心痛苦打击的青年人，而且我们将来还会在斯大林身上发现同样的喜欢故意做出沉痛样子的倾向——这是性情严厉的人当中并不少见的特点。他表达感情的笨拙方式则是正教中学练习讲道时遗下的影响。

柯巴的妻子给他留下了一个漂亮柔弱的小男孩。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这个男孩在梯弗里斯中学念书，伊雷马什维利在那所学校当教员。不久以后，他父亲就把雅沙转到莫斯科去了。将来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还会碰到他的。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这次婚姻的全部情况。从时间上说，这次婚姻（1903年至1907年）和第一次革命的时间正好吻合。这种吻合并非偶然：革命者个人生活的节奏总是和伟大事件的节奏十分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偶然的吻合。

伊雷马什维利坚决地说：“从埋葬妻子那一天开始，他就失去了最后一点点人的感情。他的心里充满了无法描叙的恶毒的仇恨——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残暴的父亲就使他开始产生这种仇恨了。他带着嘲弄地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这种冲动愈来愈少出现。他对自己冷酷无情，对所有的人也都冷酷无情。”这就是他在反动时期的情况。在此期间，反动势力已在全国展开攻势。

90年代后半期间开始的群众罢工意味着革命已经临近。但是每年罢工人数平均还不到5万。1905年，这个数字激增到275万；1906年减少到100万；1907年减少到75万，包括重复罢工的数字在内。这就是三年革命期间的数字。世界上过去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罢工浪潮！反动时期开始于1908年。罢工人数立刻下降到17.4万；1909年减少到6.4万；1910年更减少到5万。但是，当无产阶级正在迅速紧缩自己的队伍的时候，被他们唤醒的农民不仅继续进攻，而且还加强了自己的攻势。在第一届杜马存在的几个月期间，破坏地主田庄的事件特别普遍。出现了军队哗变的浪潮。在1906年7月斯维阿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企图被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的胆量更壮了。它建立了军事法庭，并且在参议院帮助下使选举法归于无效。但是它并没有得到它希望得到的结果。第二届杜马结果比第一届杜马更激进。

1907年2月，列宁用下面这段话说明了俄国政治局势的特点：“最野蛮最无耻……；选举法在全欧洲最反动；而最落后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的成员却是欧洲最革命的！”^①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②这个结论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尽管革命还有力量影响沙皇的冒牌议会制度，革命已经支离破碎了。它引起的动荡愈来愈微弱。

社会民主党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党员人数继续在增加，但是党对群众的影响缩小了。一年以前10个社会民主党人就能领导许多工人走上街头，现在100个社会民主党人也带不动那么多工人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作为具有继续存在价值的演变——的革命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在内容上或行动

^{①②} 《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列宁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384、385页。——译者注

上并不是一致的，也不是协调的。不仅工人，而且连小资产阶级在被沙皇政权打败以后，也企图在公开的斗争中用投左派的票的办法进行报复；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进行一场新的起义了。失去了苏维埃的机构并且失去了同群众的直接联系——群众已经迅速陷入心情黯淡、漠不关心的状态——，比较积极的工人们感觉需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因此，这一次，杜马的向左转和社会民主党的扩大是革命走下坡路的征兆，而不是革命高涨的征兆。

毫无疑问，列宁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经验最后证明以前，他仍然以革命的预测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础。这就是这位战略家的根本守则。他在1906年10月写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最直接的斗争道路上，应当最后一个采取较为迂回的斗争方式。”^①直接斗争包括游行示威、罢工、总罢工和警察冲突以及起义。迂回的方式是利用合法机会，包括议会制度，来动员力量。这种战略必须意味着这样的危险：在采取战斗性的手段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具备时，仍旧采取战斗性的手段。然而在革命政党的天平上，战术上的危险远小于在战略上赶不上发展以及看不见革命形势的危险。

1907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参加人数之多著称。在“社会主义的”教堂大厅里，有302名有投票权的代表（每500个党员选出一个代表），50个左右的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有不少客人。在代表当中，90人是布尔什维克，85人是孟什维克。民族代表团站在这两派的“中间”。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代表是1.3万个布尔什维克和1.8万个孟什维克选举出来的（每300百个党员选1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

^① 《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列宁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73页。——译者注

代表大会之间的12个月里，党在俄国的党员从3.1万人增加到7.7万人，即增加了一倍半。派别斗争愈激烈，数字必须愈夸大。但是，无疑的是，先进工人们在这一年里的确不断入党。与此同时，左翼以比它的对手迅速得多的速度壮大起来。在1905年的苏维埃里，孟什维克占着优势；布尔什维克处在微弱的少数地位。1906年初，两派在圣彼得堡的力量大约不相上下。在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之间的间歇时期，布尔什维克开始领先。到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先进工人中取得完全控制地位。从通过的决议的性质判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的大会，而伦敦代表大会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

党向左转的趋势受到当局的密切注意。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警察厅曾经对它的地方机构解释说：“处在目前这种思想状况的孟什维克集团所能带来的危险不像布尔什维克所能带来的危险那么严重。”关于代表大会的进程，警察厅的一个外国代理人在例行报告中有下列评语：“讨论过程中发言为极端革命观点辩护的有斯坦尼斯拉夫（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波克罗夫斯基（布尔什维克）、提斯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为机会主义观点辩护的有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领袖）”。Okhrana^①的这个特务接

① Okhrana 是 Okhrannoye Otdyelyeniye（保安部）的简写，是属于帝国警察厅的一个政治特务组织，从1881年以来一直是内务部最重要的机构。在这个机构成立前50年里，它的职能属于帝国法庭第三科。因此，Okhrana、Okhranka、第三科、政治警察、警察厅这几个名词可以通用，都是指沙皇政府针对革命者进行的特务活动。Okhrana 根据所用侦察方法不同而分为外务局和内务局两个部分。前者由侦稽队组成，后者由安插在革命组织内部的密探和挑拨者组成。Okhrana 在活动中得到警察厅所属另一部门即特种宪兵队的协助。除在俄国各重要城市设有分局以外，Okhrana 还在国外俄国革命者聚居的一切地方设有国外代理机构。——原编者注（Okhrana 一般译为沙皇暗探局。——译者注）

着说：“情况清楚说明，社会民主党人正趋向于采取革命的斗争手段……由于杜马而得到发展的孟什维克，当杜马表现无能的时候就衰落下去，使布尔什维克、或者毋宁说是使极端革命倾向得到充分发展的余地”。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内部情绪的转变远较复杂和不一致。因此，当先锋队受到自己的经验的鼓舞而向左转的时候，由于失败而灰心丧气的群众却向右转了。反动的气息已经笼罩在代表大会头上。列宁在5月12日的会议上说：“我们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①

有一个法国传记家写道：“斯大林在伦敦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但是后者几乎没有注意他。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不是对人一见如故或者不需要真正情投意合就可以混得很熟的那一种人。”无论这种说法是对还是不对，事实上我最初是从苏瓦里纳的书上知道柯巴出席过伦敦代表大会，后来才从正式记录中得到证实。和在斯德哥尔摩一样，伊凡诺维奇不是302名拥有投票权的代表之一，而是作为仅有发言权的42名代表之一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的力量还如此薄弱，以致柯巴在整个梯弗里斯还搜罗不到必要的500票！伊雷马什维利写道：“甚至在柯巴和我的故乡哥里，连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在代表大会辩论过程中，柯巴的竞争对手、高加索主要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未来的中央委员邵武勉证明，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处于完全支配地位。他抱怨说：“高加索孟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在高加索的压倒多数和正式的统治地位，尽一切努力阻止布尔什维克当选。”在同一个邵武勉和伊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5卷，中文第2版第338页。——译者注

凡诺维奇签署的一个声明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高加索的孟什维克组织几乎全部是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在高加索1.8万名党员中，工人不超过6000人；但是，甚至大多数工人也追随孟什维克。

柯巴被指派为一个仅仅具有发言权的代表，这件事还引起一个不是没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插曲。在代表大会轮到列宁担任主席的时候，他建议不加讨论地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给四名代表以发言权，其中包括伊凡诺维奇。毫不倦怠的马尔托夫在他的座位上喊道：“我希望知道得到发言权的人是谁。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列宁回答说：“我的确不知道，但是代表大会可以信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马尔托夫可能已经拥有关于伊凡诺维奇的历史的特殊性质的某些秘密情报——这一点我们以后要比较充分地谈到——，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列宁才赶忙提到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借以结束这个不祥的暗示。无论如何，马尔托夫认为，把“这些家伙”当做微不足道的人是适当的，所以他才问道：“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而列宁不但没有反对这种提法，而且证实了它。在1907年，不仅在普通党员中，甚至在出席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中，斯大林还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是通过了。许多代表没有投票。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柯巴一次也没有利用给予他的发言权。代表大会开了将近三个星期，讨论极为广泛和充分。发言人数很多，然而伊凡诺维奇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他的签名也只出现过两次，这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关于他们和当地孟什维克的冲突的两个简短的声明。甚至在这两个声明上，他的签名也排在第三位。此外，他在代表大会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充分了解这种情况的意义，必须了解代表大会幕后活动情况。在正式会

议休会期间，各个派别和民族组织都分别开会，制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和指定自己的发言人。由此可知，在三个星期的辩论中，一切比较令人注意的党员都参加了辩论，然而布尔什维克派并不觉得应当委托伊凡诺维奇发一次言。

在代表大会最后几次会议过程中，有一次会快开完的时候，彼得堡一个年轻的代表发言了。所有的人都匆匆离开自己的座位，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演说者不得不站到椅子上去，以便吸引大家注意。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极为不利的情况，他终于设法把愈来愈多的代表吸引到他周围来，不久以后会场就安静下来了。这次演说使这个初出茅庐的人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注定只能一语不发的伊凡诺维奇对这位年轻的新来者——季诺维也夫当时只有25岁——的成就可能并不同情，然而决非毫无妒嫉的。任何人都丝毫没有注意这位没有利用自己的发言权的雄心勃勃的高加索人。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普通代表、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冈杜林在回忆录中写道：“休会期间，我们通常都围住这个或那个重要工作人员，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在代表当中，冈杜林提到李维诺夫、伏罗希洛夫、托姆斯基和当时还不大出名的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然而他的回忆录是1931年写的，当时，要忘掉斯大林比记住他要困难得多。

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有麦什科夫斯基、罗日柯夫、泰奥多罗维奇和诺根。候补委员有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尚切尔、萨麦尔、列切曾、塔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这一派最卓越的领导人被选为候补委员是为了把能够在俄国国内工作的人放在最前线。但是伊凡诺维奇既不是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如果用孟什维克玩弄阴谋诡计作为理由来说明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候选人是各派自行挑选的。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布尔什维克，像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塔

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同伊凡诺维奇属于一代，实际年龄甚至比他还小。

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布尔什维克派在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选举了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中心，即所谓“B. C.”^①，共有 15 名委员，其中有当时的以及后来的理论家和“文人”，例如列宁、波格丹诺夫、波克罗夫斯基、罗日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有最卓越的组织工作者，例如克拉辛、李可夫、杜勃洛文斯基、诺根等等。伊凡诺维奇也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件事的意义十分清楚。斯大林并不是全党知名的，所以他不可能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另一个障碍——让我们暂时承认这一点——在于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对他特别仇恨。但是，倘若他在自己派别内部具有任何重要性和影响的话，他一定会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心的成员，因为这个中心迫切需要在高加索有一个权威性的代表。伊凡诺维奇本人一定梦想在布尔什维克中心得到一席之地，但是结果并没有找到任何地位。

从这一切情况来看，柯巴究竟为什么到伦敦去呢？他既不能以拥有投票权的代表资格举手，也不需要他来发言。他在布尔什维克派的秘密会议上显然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如果说他此行完全出于好奇——见见世面——是不可想像的。他一定担负着另外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任务呢？

代表大会于 5 月 19 日结束。早在 6 月 1 日，斯托雷平首相就对杜马提出挑战，要求杜马立刻开除 55 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并准予逮捕其中 16 名。警察不待杜马授权就在 6 月 2 日晚上进行了逮捕。6 月 3 日，杜马宣布闭会。在这次政府改组的过程中颁布了新

^① B. C. 是布尔什维克中心 (Bolshevik Centre) 的缩写。——译者注

的选举法。全国各地同时发生了经过事前仔细策划安排的大规模逮捕。被捕入狱的人里面有铁路工人，这是为了预防总罢工。黑海舰队和基辅一个团企图哗变，也以失败告终。专制政权胜利了。当斯托雷平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了圣乔治胜利勋章的影子。

革命的明显的瓦解给党以及布尔什维克派本身都带来了几次新的危机。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几乎是对政府暴力行为的本能的反应，然而同时也是企图用激烈的姿态掩饰自己的无能。列宁在开过代表大会以后在芬兰休息的时候，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结果决定坚决反对抵制。他在自己派别中的处境变得相当困难了。从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转入枯燥乏味的平凡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马尔托夫写道：“除了列宁和罗日柯夫以外，布尔什维克派的一切卓越代表（波格丹诺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沃尔斯基等等）都出赞成抵制。”这段引语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不仅把卢那察尔斯基、而且把久已被人遗忘的沃尔斯基都包括在“卓越代表”之内，但是没有提斯大林。1924年，当莫斯科官方历史杂志重新发表马尔托夫的证词时，编辑部还没有想到对斯大林投票的情况表示什么兴趣。

然而柯巴是属于抵制派的。诚然，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证据来自孟什维克。然而在直接证据以外，还有一点最令人信服的间接证据：关于斯大林在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上的立场，现在的官方历史学家当中没有任何人说过任何一句话。革命后不久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是为参加投票辩护的，而加米涅夫则提出了抵制派的观点。由于在1907年任何人没有想到要柯巴出面写文章，因此他更容易隐蔽自己的观点。老布尔什维克皮里耶科回忆说，抵制派曾经“谴责列宁同志具有孟什维克思想”。柯巴在自己亲密的圈子里也是不落人后的，他会用格鲁吉亚语和俄语说些十分刻薄的话。对

这一点没有理由加以怀疑。至于列宁，他要求自己一派的人敢于而且善于面对现实。“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冲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①很久以后，在1920年，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抵制杜马“是错误的”^②。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不可能期望在短时期内发动革命进攻；因此，拒绝利用杜马的讲坛来动员革命队伍是愚蠢的。

7月间在芬兰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除列宁外，所有九个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赞成抵制。伊凡诺维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抵制派以波格丹诺夫作为发言人。在是否参加投票的问题上，决议是肯定的。这个决议，唐恩写道，是“孟什维克、崩得分子、波兰代表、一名拉脱维亚代表和一名布尔什维克”联合投票通过的。这“一名布尔什维克”就是列宁。克鲁普斯卡娅追叙说：“在一座避暑的小别墅里，伊里奇热烈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克拉辛骑着脚踏车来，在窗口停了一会，仔细听伊里奇讲话。然后，他没有进屋子就若有所思地走开了……”克拉辛离开窗口一去就是十余年，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回到党内来，而且甚至在那个时候也不是立即回来的。在新的教训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逐渐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转过来了——我们以后就会知道。柯巴不声不响地也拒绝了抵制主义。他在高加索发表的赞成抵制的文章和演说都被慷慨地置诸脑后了。

11月1日，第三届杜马开始了自己的可耻的活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事先就得到可以在杜马中占多数的保证。接着就开

① 《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6卷，中文第2版第9页。——译者注

② 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中文第2版第42页。——译者注

始了“革新后的俄国”的生活中最阴暗的时期。工人组织被解散了，革命报刊遭到扼杀，军事讨伐和军事法庭接踵而至。但是比外来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内部的反应。脱党达到规模很大的程度。知识分子抛弃政治，去研究科学、艺术、宗教和充满色情的神秘主义。使这种图景更为刺目的是自杀之风盛极一时。对一切事物，首先对革命政党及其领袖作出了新的评价。情绪的骤变在警察厅的档案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警察厅检查可疑信件，从而把最令人感兴趣的信保存下来，成为历史档案。

列宁在日内瓦接到一封彼得堡来信。信上说：“从上到下是一片沉默，但是下面的沉默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沉默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将使人们大声号叫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号叫，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承受了这种愤怒的锋芒。……”有一个名叫札哈罗夫的人给他在敖德萨的朋友写信说：“我们对过去一直非常尊敬的那些人绝对丧失了信心。……请想一想，托洛茨基在1905年底曾经一本正经地说政治革命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接着立刻就要开始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鼓吹得天花乱坠的武装起义策略又怎样啦？……实在的，我对我们的领袖们和一切所谓革命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信心。”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报刊对失败者也毫不留情地加以讽刺。

党的中央机构再一次转移到国外。它从地方组织收到的消息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革命已经瓦解。甚至在苦役监狱里，参加过起义和恐怖行为的男女英雄们也仇恨自己的过去。他们使用“党”、“同志”和“社会主义”这些字眼的时候完全出于讽刺。

脱党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不仅是那些朝秦暮楚、把运动当着暂时歇足的客栈的人，甚至还有许多年来一直是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先进工人。在工人阶级的落后部分，信仰宗教以及酗酒、赌博等等倾向日益增加。力图使自己的个人地位、文化地位和经济

地位超过和自己一伙的工人群众的个人主义者开始决定上层的风气。孟什维克从这些人数很少的工人贵族阶层中找到了支持。这些工人贵族大多数是五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中间阶层的工人在革命中养成了阅读报纸的习惯。他们表现得更稳定。但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进入政治生活以后，现在忽然要独自行动，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犹豫不决。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革命。但是，不愿意投降的革命者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个秘密组织需要周围有人同情，需要不断补充后备力量。在颓废的气氛中，遵守秘密工作必需的规定和保持革命联系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地下工作若断若续。1909年，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秋明、彼得堡，党的印刷所遭到了袭击……”。遭到袭击的还有其他地方的印刷所，“彼得堡、别洛斯托克和莫斯科储藏的宣言传单，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的档案。在所有这些逮捕中，党都损失了优秀的工作者”。这是退伍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的话。他几乎是用一种痛苦的口吻讲这一段话的。

1909年初，克鲁普斯卡娅用隐形墨水给敖德萨写信说：“我们根本没有人了。都分散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去了。”宪兵使隐写的信显了出来，从而把更多的人投入了监狱。革命队伍的人数稀少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委员会的水平。由于挑选得不够，使特务有可能窃据地下组织的领导地位。挑拨者动一动指头就可以使任何妨碍他往上爬的革命者遭到逮捕。从组织中清除可疑分子的尝试立刻会引起大规模逮捕。怀疑和互相不信任的气氛使一切主动性遭到挫折。经过一连串计划周密的逮捕以后，挑拨者库库什金在1910年初成为莫斯科地区组织的领袖。有一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写道：“沙皇暗探局的理想正在实现。所有的莫斯科组织的领袖都是特务。”彼得堡的情况好不了多少。”领导机构似乎已经完全被击溃，

没有办法能够使它恢复起来。特务的渗入蚕食了我们的要害部门。组织垮台了……”在1909年，俄国还有五六个积极活动的组织；但是，甚至这些组织不久也都无所作为了。1908年底，莫斯科地区组织的成员多达500人，第二年年中就减少到250人，半年后又减少到150人。1910年，这个组织就不再存在了。

前杜马议员萨莫伊洛夫谈到直到不久以前还是相当有影响的、积极活动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组织在1910年初垮台的情况。紧接着，工会组织也销声匿迹，被黑帮集团取而代之。在纺织工厂里，革命前实行的制度逐渐卷土重来。这意味着降低工资、严厉的惩罚、开除等等。“保住了饭碗的工人沉默地忍受着。”但是，恢复旧有秩序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国外引用了工人写来的信，信上谈到厂主又在压迫和迫害工人的情况时说道：“等一等吧，1905年又会到来的！”^①

除了来自上面的恐怖以外，还有来自下层的恐怖。已被击溃的起义者〔的斗争〕在长时期内以分散的地区性爆炸、游击队袭击、集体和个人恐怖行为等形式时起时伏地继续着。关于恐怖行为的统计数字很清楚地说明了革命发展的趋势。1905年有233人被暗杀；1906年有768人；1907年有1231人。受伤的人数在比例上多少有些不同，因为恐怖分子正在成为较好的枪手。恐怖的浪潮在1907年达到顶峰。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观察家写道：“有些日子，除了好几起重大恐怖行为以外，同时还发生几十起暗杀和企图暗杀低级官员的次要事件……所有城市都建立了炸弹工厂，有些不慎的制造者被自己造的炸弹炸死了……”等等。克拉辛的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4页。——译者注

炼金术^①广泛地流行起来。

整个说来，从1905年到1907年这三年期间以恐怖行为和罢工特别著称。但是，恐怖行为和罢工的统计记录有显著的差别：罢工人数逐年迅速下降，而恐怖行为的次数则以同样的速度上升。很清楚，随着群众运动的衰退，个人恐怖行动增加了。然而恐怖行为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加强。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革命带来的动力必然会消耗掉。的确，1907年还发生了1231起暗杀案，1908年就减少到400起，1909年减少到100起左右。此外，受伤未死者的百分比的增加也说明，现在的枪击事件是未经训练的外行干的，主要是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干的。

在高加索，拦路抢劫和流血械斗的浪漫传统还很盛行，有许多胆大包天的游击活动老手。在1905年到1907年，即第一次革命时期，仅在外高加索就发生各种恐怖行为1000多起。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战斗队在乌拉尔地区、波兰社会党旗帜下的战斗队在波兰都大肆活动。1906年8月2日，几十个警察和士兵在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街头被暗杀。根据他们的领导人的解释，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鼓舞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这些领导人的领袖是约瑟夫·皮尔苏德斯基，波兰未来的“解放者”和压迫者。列宁在评论华沙事件时写道：“我们建议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再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的游击活动……”^②。斯皮里多维奇将军的评语是：“尽管〔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反对的行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这些呼吁不是毫无结果的。”

在恐怖分子和警察的流血冲突中，钱是一个重要问题。钱是

① 指制造炸弹。——译者注

② 《谈最近的事件》。《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363页。——译者注

一切战争赖以支持的东西，包括内战在内。在1905年立宪宣言发表以前，革命运动主要从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得到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自由主义反对派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过是比较大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当资产阶级把希望转到未来的杜马上面去的时候，他们开始把革命者看做是妨碍他们和专制政府取得协议的障碍。阵线的变化使革命在财政方面受到有力的打击。关厂和失业使来自工人的钱也停止了。在此期间，革命组织已经建立庞大的政治机构，有自己的印刷所、出版社、专业鼓动人员，最后还有不断需要武器供应的战斗小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武力夺取金钱以外，就无法继续以资金供给革命。第一步几乎照例是下面发起的。最初的没收活动进行得比较和平，没收者和被没收的机构的雇员之间常常存在默契。有一个故事说：纳杰日达保险公司的办事员给犹豫不决的没收者打气说：“甭发愁，同志们！”但是这个牧歌似的时期没有继续多久。继资产阶级之后，知识分子，包括这些银行办事员，也离开了革命。警察措施更加严峻起来。双方死伤人数都增加了。“战斗组织”失去了支持和同情，迅速烟消云散，或者同样迅速地四分五裂了。

前面已经提到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选出的前杜马议员萨莫伊洛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典型地说明了即使是最有纪律的队伍也已经堕落变质的情况。原来是“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这支队伍在1906年下半年开始“做坏事”。这支队伍从一家工厂里偷到了钱（在这个过程中打死了出纳员），只把一部分钱交给党。这时，党委断然拒绝接受，并且对战士提出了谴责，但是为时已晚，战斗队迅速蜕化变质，不久以后就堕落到“像最普通的土匪一样进行抢劫”的程度。经常腰缠巨资的战士们开始大吃大喝，常常在大吃大喝时落入警察手中。这样一来，整个战斗队逐渐遭到可耻的结局。“但是”，萨莫伊洛夫写道：“我们必须承认，

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忠实于革命事业的真正忠诚的同志，有些人的心是冰清玉洁的……”

战斗组织原来的目的是领导起义的群众，训练他们使用武器，使他们懂得如何给予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列宁是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家——如果不是惟一的理论家的话。十二月起义被粉碎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是：对这些战斗组织如何处理。列宁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带去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草案一方面对游击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认为这种活动是十二月起义的必然继续，而且是即将到来的对沙皇制度大举进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主张“在党的控制下”进行所谓没收资金的活动。但是在自己内部分歧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撤销了他们这个决议。孟什维克的决议在 20 票弃权的情况下以 64 票对 4 票的多数得到通过。这个决议完全禁止“没收”私人 and 私有机构的财产，同时规定只有在某一地区已经建立革命政府机构的情况下才容许夺取国家财产；这就是说，只有在和群众起义直接有关的情况下才容许这样做。弃权或投反对票的 24 名代表是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半数的毫不妥协的列宁主义者。

列宁在印发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内容广泛的报告中完全避免提到关于武装活动的决议，理由是讨论时他不在场，“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①列宁的不在场不大可能出于偶然：他不过是不愿意束缚自己的手脚而已。同样地，在一年以后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为主席不能不出席关于没收问题的讨论。但是，尽管孟什维克代表席上提出了狂暴的抗议，他没有投票。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禁止没收，并且下令解散党

^①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13 卷，中文版第 53 页。——译者注

的“战斗组织”。

当然，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一切阶级和一切政党都不是从圣经戒律的观点、而是从对它所代表的历史利益是否有利的角度来看待暗杀问题的。当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们为弗朗哥的武力祝福时，没有任何保守派政治家建议把他们关起来按煽动谋杀治罪。当涉及的暴力是革命暴力时，御用的道学家就会出来反对暴力。相反地，一切真正为反对阶级压迫而斗争的人必须承认革命。一切承认革命的人也就承认内战。归根到底，“游击斗争是……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①〔列宁〕从阶级斗争的总原则的观点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难于驳斥的。分歧来自对具体历史环境的估计。在内战中，如果两次大搏斗之间有两三个月的间歇时期，这段间歇时期必然充满对敌人的游击斗争。但是，如果“间歇时期”长达数年之久，游击战就不再是新的战斗的准备，而仅仅是失败后的痉挛。当然，要决定一个分界点是不容易的。

抵制问题和游击活动问题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抵制代议机构只有在群众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这些代议机构或可以不予理睬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群众正退却的时候，抵制的策略就失去了革命的意义。列宁比别人更了解这一点，而且阐述得更清楚。早在1906年，他就否定了杜马的抵制。1907年6月3日政变以后^②，列宁之所以带头对抵制派进行坚决斗争，正是因为高潮已经转入低潮。不言而喻，在甚至有必要利用沙皇的“议会制度”作为战场为动员群众进行准备的时候，游击活动已经变

① 《游击战争》。《列宁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7页。 译者注

② 指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译者注

成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在内战顶点，游击活动加强了并促进了群众运动；在反动时期，游击活动企图取代群众运动的地位，但是事实上仅仅使党处于狼狈的境地，加速了党的瓦解。列宁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战友之一奥里明斯基从苏维埃时代的观点对这个时期作了批判性的描绘。他写道：“不少优秀青年被绞死；另外一些人堕落了；还有一些人对革命失望了。同时，一般人开始把革命者和普通土匪混为一谈。后来，当革命的工人运动开始重振旗鼓的时候，在付出的‘代表’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让我们记住：这里提到了巴库。

在第一次革命的几年期间，柯巴的革命活动整个加起来似乎如此微不足道，使人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就只有这么多吗？在把他抛在一边的事件的漩涡中，他不可能没有寻找过能够表现自己的才干的行动手段。柯巴曾经参加恐怖行为和没收活动是无可怀疑的。然而，这种参与属于什么性质却难以肯定。

斯皮里多维奇写道：“战斗活动……的主要鼓舞者和总的监督者……是列宁本人，他得到和他很接近的心腹人士的协助。”这些人是谁呢？战争爆发后成为揭露布尔什维克的专家的前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报刊上写道，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小的委员会，其存在不仅瞒过了沙皇警察的眼睛，而且瞒过了党员的眼睛。由列宁、克拉辛和一个第三者组成的这个小委员会……特别注意党的财政问题。”阿列克辛斯基所谓注意财政问题是指领导没收活动。那位没有指明的“第三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博物学家、医学家、经济学家兼哲学家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没有理由对斯大林参加战斗活动的事保持沉默。他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是，阿列克辛斯基在那些年

代里不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非常亲密，而且和斯大林也保持着接触。这个揭人隐私的人照例总是说的比他知道的更多。

《列宁全集》注释中关于克拉辛是这样说的：〔他〕“领导了中央委员会的战斗业务局。”克鲁普斯卡娅则写道：“党员们现在都知道了克拉辛在1905年革命时期在武装战斗人员、监督炸药的生产等等方面进行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毫不声张地、秘密地进行的；然而在这个事业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工作，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很珍视他。”第一次革命时期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依廷斯基写道：“我有一个明确的印象：尼基季奇〔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受到列宁真正尊敬和完全信任的惟一的人。”诚然，克拉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彼得堡。但是，如果柯巴在高加索领导着类似的活动，克拉辛、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在党的战斗活动中的作用丝毫没有谈，虽然她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总是尽量设法多提斯大林的名字。

1938年7月3日，莫斯科《真理报》十分出人意料地宣布说，1905年“高加索革命运动的空前强大的开展”是和“直接由斯大林同志在那里首创的我们党最富战斗性的组织的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关于所谓斯大林和“最富战斗性的组织”有关的这条惟一的官方消息指的是1905年初的事情，还在没收问题出现以前；它没有谈到柯巴的实际工作；最后，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看，这条消息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1905年下半年以前，梯弗里斯没有布尔什维克组织。

让我们看看伊雷马什维利对这件事有什么要说的。他谈到恐怖行为、“代价”和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是愤怒的。他说：“柯巴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所犯的有利于反动派的罪行的发起者。”在他的妻子死后，柯巴失却了“最后一点点人的感情”。他变成了

“对王公、牧师和资产阶级进行罪恶的有系统的谋杀的……热烈辩护者和组织者”。我们已经理由深信伊雷马什维利离开个人经历而转向政治、离开童年和青年时期而转向比较成熟时期的程度愈深，则他的证词也愈不可靠。这些青年时期的朋友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第一次革命开始时就结束了。10月17日，即发表立宪宣言的那一天，伊雷马什维利在梯弗里斯街上看见——只是看见，然而没有听见——柯巴爬在街灯铁柱上（那一天谁都喜欢往街灯上爬）对一堆人大声发表演说，他碰见这件事完全出于偶然。作为一个孟什维克，伊雷马什维利只能辗转听到有关柯巴的恐怖活动的消息。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证词显然不可靠。伊雷马什维利列举了两个例子：著名的1907年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后面我们还有机会来讨论这件事）和有名望的格鲁吉亚作家恰夫恰瓦泽亲王被杀害的事件。伊雷马什维利把没收事件的年代错误地搞到1905年去了。关于这个事件，他说：“柯巴那次又瞒过了警察的耳目；警察甚至连怀疑是他发起那次残酷尝试的证据都不够。但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那次正式开除了柯巴……”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提供丝毫证据来说明斯大林和暗杀恰夫恰瓦泽亲王的事件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毫无意义地说：“柯巴间接也赞成谋杀。他是一个心里沸腾着仇恨的鼓动者，是一切罪行的煽动者。”伊雷马什维利这一部分回忆只有一点是令人感兴趣的：这些回忆说明了柯巴在他的政敌当中的名声。

在一家德国报纸（曼海姆《人民之声报》，1932年9月2日）上，有一篇消息灵通作者（很可能是一个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的文章强调指出，朋友和敌人都同样过分夸大了柯巴的恐怖活动。“斯大林在组织这一类进攻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这是真的……但是，在这种事情里面，他通常执行组织者、鼓舞者和监督者的任务，而不是直接的参加者。”因此，某些传记作者把斯大林

描写成“明火执仗进行最无法无天的冒险活动”的人是十分错误的。所谓柯巴曾经参加1906年1月17日暗杀梯弗里斯军事独裁者格里亚兹诺夫将军事件的故事似乎属于这种捏造之列。“那件事是按照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决议，通过为此目的而特别指定的党的恐怖分子来执行的。斯大林和其他所有布尔什维克一样，在格鲁吉亚没有影响，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都没有参加那件事”。这个无名作者的证词是值得考虑的。然而从积极方面来说，这些话实际上毫无意义：它承认斯大林在没收和暗杀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但是没有提出任何材料来证明这种说法。

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科特·秦查泽是一个严肃可靠的证人。他说，斯大林对孟什维克企图暗杀格里亚兹诺夫将军的工作的落后性表示不满，邀请科特帮他组织一个自己的战斗小组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不久以后，孟什维克就设法自行执行了这个任务。同一个科特还回忆说：在1906年，他独自想到要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小组去抢劫国家财库。“我们的杰出的同志，特别是柯巴——斯大林，都批准我的建议。”这段证词令人加倍感到兴趣，因为，首先它说明，秦查泽认为柯巴是一个“杰出的同志”——也就是说，是当地一个领导人；其次，它使我们可以自行得出结论，认为柯巴在这些事情里面仅限于批准别人的建议。^①

1906年11月，党的战斗小组不顾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反对，在列宁的积极合作下，设法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后来在党内起过重要作用或值得注意

^① 1931年，科特·秦查泽死于流放地。他是被“杰出的同志柯巴——斯大林”判处流放的。——译者注

的作用的革命者，如像克拉辛、雅罗斯拉夫斯基、捷姆里雅奇卡、拉拉扬茨、特里利塞尔等等。斯大林不在其中，虽然当时他在梯弗里斯是自由的。可以这样设想：由于秘密工作的考虑，他宁愿不冒险在会议上露面。但是当时领导党的战斗活动并且由于自己的名声而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遇到危险的克拉辛却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领导作用。

1918年3月18日，——即苏维埃政权成立几个月以后——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在莫斯科他的报纸上写道：“当时由于和没收活动有某种关系而被他的党组织开除的同一位公民斯大林，对高加索布尔什维克迷恋各种属于没收性质的大胆事业的情况应当非常熟悉。”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在革命法庭控告马尔托夫。他对法官和挤满法庭的听众说：“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被我的党组织提交审判或开除。这是恶毒的毁谤。”但是斯大林对没收活动完全没有提。“一个人必须持有文件才有权提出马尔托夫这种指责。但是，毫无事实根据地仅凭谣言给人抹黑是卑鄙无耻的。”斯大林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要这样愤怒呢？整个布尔什维克和没收活动都是有牵连的。这不是秘密。列宁曾经在报刊上公开为没收活动辩护。另一方面，一个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在事情发生十年以后，不大可能认为被一个孟什维克组织开除是一件可耻的事。因此，如果马尔托夫的“指责”符合事实，斯大林没有任何必要予以否认。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足智多谋的对手到法庭上来就有给他机会审判自己的危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尔托夫的指责是假的呢？总的说来，由于沉耽于自己的新闻记者的气质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马尔托夫曾经不止一次地越过了按照他无疑很高贵的性格本来不应当越过的界限。但是，在这个例子里，争论的问题是那次审判。马尔托夫仍然一口咬定有这件事。他要求传讯某些证人：“首先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公众人物

伊西多尔·拉米施维里，他是肯定斯大林曾经参加没收巴库轮船‘尼古拉第一’号的革命法庭的主席、诺·饶尔丹尼亚、布尔什维克的邵武勉和1907年至1908年期间外高加索地区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其次还有以现任财政委员古科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证人。古科夫斯基曾经主持暗杀工人日阿里诺夫未遂案的审判。日阿里诺夫曾经向党组织揭露巴库委员会及其领袖斯大林和一件没收活动的关系。”斯大林在答复中既不谈没收轮船事件，也不谈企图暗杀日阿里诺夫的事。同时，他坚持说：“我从来没有受过审；如果马尔托夫这样说，他就是一个恶毒的毁谤者。”

按照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开除“没收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很周到地自行退党了。但是可能提出是否让他们回到党内来的问题。只有对那些仍然留在党的队伍里的煽动者才能直接采取开除的方式。但是看来，对柯巴并没有提出直接的控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马尔托夫肯定柯巴曾经被开除可能是对的：“原则上”是开除了的。然而斯大林也是对的：作为个人，他从来没有受到审讯。法庭要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斯大林反对传讯证人，理由是在那种严重的日子里和高加索通信是困难的、不可靠的。革命法庭没有深入追究这个案件的本质问题。它宣布毁谤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但是判决马尔托夫应受“社会谴责”，因为他侮辱了苏维埃政府（按照孟什维克出版物对这次审判的报道所用的讽刺性说法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府”）。提到曾经企图暗杀对没收活动提出过抗议的工人日阿里诺夫的事，不能不令人踌躇不安。虽然我们对这个插曲一无所知，但是它为未来发生的事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1925年，孟什维克唐恩写道：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等高加索没收者为布尔什维克派提供了资金。这仅仅是重复马尔托夫已经说过的话，无疑是以同样的材料来源作为根据的。谁也没有为

我们提供任何具体材料。然而并不缺乏揭开笼罩着柯巴生命中这个浪漫时期的帷幕的企图。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谈话时，曾经以他特有的讨人欢喜的灵活性要斯大林谈谈他年轻时代冒险活动的“任何事情”，例如抢劫银行之类的事。斯大林在回答时给这位提出问题的谈话对手一本小册子形式的传记，大概里面已经包括“一切”。但是这本传记对抢劫的事只字未提。

斯大林本人对自己的战斗经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从来没有提到过，连一个字也不谈。很难说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在自传方面从来不是以谦逊著称的。他认为不便谈的，就命令别人谈。从他的地位扶摇直上的时候开始，他可能是出于对政府“威信”的考虑。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这种考虑和他根本不相干。在斯大林还没有成为历史回忆录的授意者和控制者的时期，过去的战士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书面材料。他作为战斗活动组织者的名声找不到任何其他文件——无论是警察记录还是叛徒和变节者的口供——的支持。诚然，斯大林严格控制着警察记录。但是，如果宪兵档案里包括任何说明朱加施维里是没收者的具体材料，他所受到的惩罚一定会比当时真正受到的惩罚严厉得多。

在所有的假设当中，只有一种假设带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苏瓦里纳写道：“斯大林自己不提也不准别人提到和他的名字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恐怖行为，否则必然会清楚地说明：别的人参加了这些行动，而他仅遥遥加以监督。”同时，他在必要时则利用含蓄和强调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他事实上无权声称属于自己的那些成就算到自己账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是符合柯巴的性格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他的说法进行核对。因此他对进一步吐露具体情况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没收活动的实际参加者和接近他的人不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柯巴，仅仅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战斗是其他的人进行的；斯大林遥遥监督。

关于伦敦代表大会，伊凡诺维奇在巴库的他的秘密报纸上写道：

“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只通过了有关游击活动的决议，并且是完全偶然通过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一次没有应战。确切些说，布尔什维克不想把战斗进行到底，纯粹出于一种愿望：‘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①。

这个解释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是荒谬的：“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这种慈悲为怀的关切态度在列宁的政治习惯中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没有应战”，只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仅遭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反对，而且遭到他们最亲密的盟友波兰代表的反对。此外，布尔什维克本身在没收问题上也存在非常尖锐的分歧。但是，如果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信口开河而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就错了。事实上，他发现有必要在战士眼中贬低代表大会的限制性决议。当然，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的解释毫无意义的情况。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作风：凡是他要掩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采取最露骨的诡计。而他的非常露骨的说法常常起到这种作用，使他不必要寻找更深刻的动机。当一个严肃认真的党员读到列宁为了“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而没有应战的说法以后只能愤慨地耸一耸肩，然而头脑简单的战士就会欣然同意，对于反对没收活动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认真看待。为了进行下一次战斗活动，这就够了。

〔1907年〕6月12日早晨10点45分，在梯弗里斯的埃里温广场上，护送运输钞票的车辆的车队的哥萨克骑兵队遭到了特别大胆的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54页。——译者注

武装进攻。这次行动的进程计算得和钟表一样精确。按照预定计划轮流投出了好几枚力量特别强大的炸弹。枪声密集。一袋钞票（34.1万卢布）随革命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连一个战士也没有抓到。三名护送队员当场毙命；约有50人受伤，大多数是轻伤。这件冒险行为的主要组织者在军官制服的掩饰下，在广场上逛来逛去，观察到护送队和战士的一切行动，同时用巧妙的话使公众不进入即将发生袭击的地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在紧急关头，当整个工作似乎已经失败的时候，这位冒牌军官以惊人的泰然自若的方式拿到了那一袋钞票，把它暂时隐藏在属于观象台台长的一张躺椅里。这个观象台就是柯巴年轻时候曾经一度在那里担任会计的观象台。这位领袖就是亚美尼亚战士、化名为卡莫的彼得罗西扬。

他19世纪末叶来梯弗里斯以后，落到包括柯巴在内的宣传家的手中。他几乎完全不懂俄语。有一次，他又问柯巴：“我把这拿卡莫〔Kamo，原应当是Komu（卡木）意思是：给谁〕？”柯巴开始嘲笑他：“嗨，你说——卡莫，卡莫！……”从这个不礼貌的嘲笑中产生了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革命化名。这是卡莫的寡妇麦德维捷娃告诉我们的。关于这两个人的关系，她再没有说任何话。但是她的确谈到卡莫对列宁的令人感到的爱慕。他第一次去见列宁是1906年在芬兰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这位具有无限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的无畏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略微有些天真，是一个温柔的同志。他对伊里奇、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热烈地爱慕着……他和我的母亲交朋友，和她谈到他的姑母和姊妹。卡莫常常从芬兰到彼得堡去，随身总是带着武器。每一次，母亲总是特别小心地把他的左轮枪系在他背后。”这件事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是一个沙皇官吏的寡妇，直到年纪很老的时候才抛弃宗教。

在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卡莫再次访问了芬兰的工作人员。麦德维捷娃写道：“卡莫化装成一个军官到芬兰去拜访了列宁，然后带着武器和炸药回到梯弗里斯。”这次旅行不是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就是大会以后不久的事。炸弹来自克拉辛的实验室。列昂尼德是学化学的。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梦想有一种核桃大小的炸弹。1905年使他有机会扩大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从来没有造出那种理想大小的炸弹，但是他管理下的那些小工厂的确生产出破坏力非常强大的炸弹。战士们现在并不是第一次在梯弗里斯的广场上试验这些炸弹。

没收事件发生以后，卡莫在柏林出现了。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挑拨者日托米尔斯基的告发，他在柏林被捕。在逮捕过程中，普鲁士的警察抢走了他的手提箱，大概在里面发现了炸弹和手枪。根据孟什维克的消息（这次调查是由未来的外交家契切林进行的），卡莫的炸药是准备用来进攻柏林的门德尔森银行的。消息灵通的布尔什维克皮亚特尼茨基说：“这是假的。炸药是准备用于高加索的。”让我们把炸药的目的地当做悬案放下吧。卡莫在一个德国监狱里关了一年半以上，按照克拉辛的意见不断装疯作傻，大吵大闹。作为一个无法医治的疯子，他被交给俄国，在梯弗里斯的梅吉赫堡监狱中又关了一年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最后，卡莫被宣布为一个毫无希望的疯子。他被转到一座神经病院里去，从那里逃掉了。“在那以后，他非法地藏匿在一艘船的船舱里，到巴黎去和列宁会谈。”这是1911年的事。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的分裂使卡莫感到极大的痛苦。克鲁普斯卡娅重复地说：“他对三个人都热烈爱慕。”接着出现了一个抒情的场面：卡莫要人把杏仁给他拿去，坐在兼做饭厅的厨房里，像在高加索故乡一样吃着杏仁，讲着那些可怕的年头的故事。他谈到自己在监狱里如何装疯作傻，又如何驯服了一只燕子。“伊里

奇倾听着他的话，为这位天真稚气、热心快肠、随时准备完成最伟大的业绩、而在逃出监狱以后不知道究竟应当做什么的莽撞而大胆的人深感难过。”

卡莫在俄国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1913年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而颁布的宣言使他意外地得到减刑，改判终身苦役，而不是上绞首台。四年以后，二月革命使他意外地得到解放。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但却使卡莫很不习惯。他像一条被抛到岸上的大鱼。内战时期，我曾经试图使他对敌后游击战感到兴趣，但是战场上的工作显然不合他的口胃。此外，他曾历经的可怕的时代不是没有代价的。卡莫感到窒息。他使自己和其他人冒过几十次生命危险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另一个传奇人物科特·秦查泽被斯大林放逐以后死于肺病。卡莫如果不是1922年夏天在梯弗里斯街上意外地被汽车压死，无疑也会落到类似的下场。汽车里面坐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新贵。当时卡莫骑着一辆蹩脚的脚踏车在黑暗中走着：他并没有飞黄腾达。他死的方式本身是有象征意义的。

关于卡莫，苏瓦里纳以毫无根据的目中无人的态度写到和先进国家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的“违反时代潮流的神秘主义”。事实上，对“西方文明”国家绝非已经毫无用处的，具有革命性质的“神秘主义”只有少量痕迹在卡莫身上得到有限的表现。欧洲工人运动由于革命精神不够，已经使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中得到胜利。在这些国家里，“违反时代潮流的神秘主义”——这个字眼用在此处才是恰当的！——得到了最丑恶的表现。反对法西斯主义专制暴虐的斗争无疑会使西方革命战士发挥出卡莫身上所拥有的、使无耻的市侩目瞪口呆的一切特点。杰克·伦敦在他的《铁蹄》一书中预言，美国将出现一整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卡莫式的人物。历史过程远比肤浅的理性主义者愿意相信的复杂得多。

在党员圈子里，柯巴曾经亲自参加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事早已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苏联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在第二流和第三流官僚的沙龙里听到过多种多样的故事。他说，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没有直接参加没收活动，但是他本人大概“后来曾经吹过牛，说行动计划直到最小的细节都是他拟订的，并且说第一枚炸弹是他从苏姆巴托夫亲王的屋顶上扔下去的”。现在很难弄清楚，究竟是斯大林真正吹嘘过参加没收活动的事，抑或是别谢多夫斯基仅仅在夸耀自己消息灵通。无论如何，在苏维埃时代，斯大林既没有证实过也没有否认过这些谣传。十分明显，他毫不反对青年人心目中把没收活动这种悲剧性的浪漫主义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在1932年，我对斯大林在埃里温广场武装袭击事件中的领导作用仍然没有怀疑，并且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附带提到这一点。但是，对当时的情况进一步加以研究，使我不能不修改我对传统说法的意见。

在《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年表里1907年6月12日这个日期下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梯弗里斯没收事件（34.1万卢布），是由卡莫—彼得罗西扬组织的。”就只有这一句话。在一本献给克拉辛的文集里，关于高加索著名的秘密印刷所和党的军事活动谈得很多，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有一位对那个时期的活动很熟悉的老战士写道：“后者〔卡莫〕组织的在克维里利和杜舍特办事处以及埃里温广场进行的一切没收活动的计划都是他和尼基季奇〔克拉辛〕共同制定和斟酌的。”一个字也没有提斯大林。还有一个前战士说：“像梯弗里斯和其他地方进行的这种没收活动是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斯大林又是只字未提。比比奈施维里的书叙述了准备和执行没收活动的一切细节，而对斯大林连一次也没有提。从这些阙笔来看，

无疑可以得出结论：柯巴和战斗队的成员没有直接的接触，也没有给他们指示，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并不是这个行动的组织者，更不用说是直接的参加者。

伦敦代表大会于4月27日闭幕^①。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于6月12日〔新历25日〕，即一个半月以后。从斯大林回国到发生没收事件那一天，他来不及监督这样一个复杂的冒险行动的准备工作的。比较可能的是：那些战士是从以前几次大胆冒险行动中选拔出来编在一起的。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以前，他们可能在等待时机。他们当中某些人可能有些怀疑，不知道列宁对没收活动有什么看法。战士们在等待信号。斯大林可能给他们带来了这个信号。但是，他参加的程度是否超过这一点呢？

关于卡莫和柯巴的关系，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卡莫喜欢依恋别人，然而没有人说他依恋柯巴。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沉默使人认为不存在依恋的情况，倒是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原因可能是柯巴企图对卡莫发号施令，或者是擅自居功。比比奈施维里在他写的关于卡莫的书里说道：在格鲁吉亚受苏维埃管辖以后，那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陌生人”，以伪造的借口拿走了卡莫的信件和其他宝贵材料。谁需要这些材料呢？有什么目的呢？这些文件和卷带这些文件潜逃的人都无影无踪了。如果认为是斯大林通过一个代理人从卡莫那里抢走了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使他感到不安的某些证据，这种设想是否过分仓猝呢？当然，那并不排除他们在1907年6月曾经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在拟订梯弗里斯“事件”的最后细节时，柯巴可能是卡莫的顾问，

^① 伦敦代表大会举行于1907年5月13日至6月1日（旧历4月30日至5月19日）。因此，从大会闭幕到梯弗里斯没收事件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个半月。——原编者注

而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在那以后恶化的。此外，这位顾问可能在国
外极力渲染自己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自命为一次没收事件的
领袖的确比自命为十月革命的领袖容易。然而即使就十月革命来
说，斯大林也会毫不踌躇地自命为领袖的。

巴比塞说：1907年，柯巴到柏林去住了一段时间，“和列宁谈
话”。什么性质的谈话作者并不知道。巴比塞的书的内容大部分是
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在和路德维希谈话时也提到他在1907年曾
经到过柏林，所以这里提到去柏林的旅行更令我们注意。如果列
宁为这次会晤专程到德国首都去，那么无论如何不是为了进行理
论性的“谈话”。这次会晤可能是代表大会前夕的事，更可能是紧
接着代表大会以后的事，几乎无疑是为了讨论即将发生的没收行
动、转运钞票方式等等问题。为什么要在柏林而不是在伦敦谈判
呢？很可能列宁认为在伦敦和伊凡诺维奇会面是轻率的，因为在
伦敦，他处在其他代表和大会吸引来的大批沙皇特务及其他特务
众目睽睽之下。也可能有一个与代表大会无关的第三者预定要参
加这些会谈。

柯巴从柏林回到梯弗里斯，但是不久以后就搬到巴库去了。据
巴比塞说，从巴库那里，“他再次出国和列宁见面。”（巴比塞曾经
到过高加索，并且在那里按照贝利亚的安排写下了一些故事。）显
然有一个心腹的高加索人曾经谈到斯大林两次在国外会见列宁的
事，目的是强调他们的亲密关系。这两次见面的时间是非常耐人
寻味的：一次在没收事件以前，另一次紧接着在没收事件以后。这
就足以肯定会见的目的。第二次会晤非常可能与这个问题有关：是
继续干还是就此结束？

伊雷马什维利写道：“柯巴——斯大林和列宁的友谊从此开始
了。”很清楚，“友谊”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这两个人之间的距
离使他们不可能产生个人的友谊。但是看来，他们大约正是在那

这个时候开始互相认识的。如果列宁事前曾和柯巴安排梯弗里斯没收行动计划这个假设是有根据的，那么十分自然，他对他所认为的这次奇袭的组织者会充满敬佩。当他看到电报、知道战利品的夺得没有牺牲任何革命的生命的时候，列宁可能会暗自叫道：“出色的格鲁吉亚人！”他也可能对克鲁普斯卡娅这样说过。我们从他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这些字眼。对表现坚决的人或仅仅是成功地完成了指定行动的人的热诚是列宁直到去世时还保持着一个突出特点。他尤其珍视实干的人。列宁根据柯巴在高加索没收活动中已被夸大的记录来判断柯巴，显然开始把他当做一个目光敏锐、能够毫不退缩地领导别人的人。他肯定这个“出色的格鲁吉亚人”是有用的。

梯弗里斯的战利品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全部钱都是500卢布一张的钞票。票面价值这样大的钞票是无法流通的。在埃里温广场不幸的冲突得到有害的宣传以后，到任何俄国银行去兑换这些钞票都是愚蠢的。兑换活动转移到国外去了。但是挑拨者日托米尔斯基参加了兑换活动的组织工作。他很快就把这件事通知了警察。未来的外交委员李维诺夫在巴黎试图兑换钞票时被捕。后来成为季诺维也夫妻子的奥尔加·拉维奇在斯德哥尔摩落在警察手中。未来的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显然出于偶然而在日内瓦被捕。他写道：“我是当时原则上反对没收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兑换活动带来的灾难大大增加了这一类布尔什维克的数目。克鲁普斯卡娅说：“一般瑞士人吓得要死。他们整天谈论着俄国没收者。在伊里奇和我搭伙的公寓里，他们恐怖地谈论着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最近的“清洗”中，奥尔加·拉维奇和谢马什柯都失踪了。

绝对不能把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看成是内战中两次搏斗之间的一次游击性战斗。列宁不能不看到革命已经被推至朦胧的将来。就

列宁来说，这次的问题不过是利用敌人的钱来充实党的经费的一次简单的尝试，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动摇不定的时期作准备。列宁没有能够抗拒利用有利机会来一次愉快的“例外”的诱惑。从这个意义上看，必须坦率地说，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想法中包含相当大的冒险主义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和列宁的政治思想一向是格格不入的。至于斯大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广泛的历史考虑在他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过是一张令人讨厌的废纸，只要玩弄点简单的手腕就可以使它成为无效。只要得到成功，冒险是可以的。苏瓦里纳争辩说，把责任从派别的领袖身上推卸到一个次要角色身上是不公平的。这里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当时布尔什维克派的大多数人在没收问题上都反对列宁。和战斗小组保持直接联系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有极为令人信服的亲身的观察，而再度侨居国外的列宁是不了解这些情况的。没有来自下层的纠正，最有天才的领袖也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斯大林并不属于那些懂得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容许进行游击活动的人。而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对于他来说，党首先是一个机构，机构需要经费才能存在。经费可以借助于和生活以及群众斗争无关的另一个机构来取得。斯大林在这方面是很在行的。

这件悲剧性的冒险行动结束了党的生活的整整一个方面。它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关于梯弗里斯没收问题的斗争后来长期损害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关系。从那时起，列宁就转移了阵地，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反对没收的策略。有一段时间里，这种策略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左”翼的遗产。1910年1月，由于孟什维克的坚持，党的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正式审查了梯弗里斯“事件”。决议尖锐地谴责没收活动，认为这是对党的纪律的不能容许的违反，同时承认参加活动的人并非有意使工人运动受到损害，而“只是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的指导”。没有开除任

何人，也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因此，柯巴就和其他的人一起作为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指导的人而得到宽恕。

在此期间，革命组织迅速瓦解。早在1907年10月，孟什维克“文人”波特列索夫就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说：“我们正在经历完全瓦解和士气彻底涣散的过程……不仅没有组织，连组织的基本因素也不存在了。而这种不存在甚至被当做原则来歌颂……”把瓦解当做原则歌颂，不久就成了包括波特列索夫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孟什维克领袖的任务。他们宣布秘密的党已经一去不复返地取消了，并且说恢复秘密党的目的是一种反动的空想。马尔托夫坚持认为，正是由于“兑换梯弗里斯钞票这一类丑事”才迫使“最忠实的政党和工人阶级最积极的分子”避免和秘密政治机构发生任何关系。现在以取消派知名的孟什维克从挑拨活动的可怕发展中看到了“必须”放弃有害的地下工作的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他们稳坐在工会、教育俱乐部和保险组织里，以文化宣传者而不是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工作。为了保持自己在合法组织中的职业，工人出身的官员们开始使用保护色。他们避免罢工斗争，以免危害本来就很难得到容忍的工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断然拒绝革命手段。

在最悲惨的年代里，取消派最活跃。奥里明斯基写道：“他们受到的警察迫害较少。他们拥有许多作家，相当多的演说者，并且整个说来，还拥有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飞扬跋扈，并且以此为荣。”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不断缩小。他们保存秘密机构的企图由于敌对的环境而到处碰壁。布尔什维主义似乎肯定完蛋了。马尔托夫写道：“目前的一切发展使组织任何持久的党派的努力成为可悲的反动的空想。”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预测中，马尔托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整个俄国孟什维克也和他一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证明，取消派的希望和他们的口号才真是反动的空想。在

六三政权的统治下根本没有公开的工党存在的余地，甚至自由派的政党也得不到承认。列宁写道：“取消派摆脱了秘密的党，但是他们也没有执行成立合法党的义务。”布尔什维主义正是因为因为在革命衰退时期仍然忠实于革命的任务，才为自己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里空前蓬勃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在此期间，在和取消派相反的另一极端，布尔什维克派的左翼里面形成了一个极端分子的集团。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已经改变的形势，继续主张采取直接行动的策略。选举结束以后，在抵制杜马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导致了召回派的形成。他们要求从杜马里面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召回派和取消派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孟什维克随时随地，即使是在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都认为，必须参加任何“议会”，即使是纯粹由沙皇任意规定的议会也行。另一方面，召回派则认为，对由于革命失败才得以建立的议会的抵制可以掀起新的群众压力。既然放电现象和雷鸣是相伴而行的，这些“不妥协分子”就企图通过人为的雷鸣引起放电现象。

炸药工厂时期对克拉辛仍然有强烈的影响。这位精明的、头脑清醒的人一度参加过召回派，结果在后来许多年里抛弃了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秘密的三巨头当中，列宁的另一个最亲密的合作者波格丹诺夫也转到了左翼。随着秘密的三巨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派原有的最高级领导机构也垮台了。但是列宁毫不动摇。在1907年夏天，这一派的大多数人都主张抵制。到1908年春天，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已经只占少数；列宁的优势已经无可怀疑。柯巴很快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公开反对列宁的倒霉的经验使他更谨慎起来。他不声不响地、不惹人注意地抛弃了他的抵制派的朋友。从那时起，在每一个转变时刻，他的经常的做法是：偷偷摸摸地、闷声不响地改变立场。

党不断分裂成很小的集团，在真空状态下进行残酷的战斗。这种情况使各种派别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和解、协议和团结的渴望。正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面又突出起来：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党的主张。这一点必须讨论一下，即使是很简单地讨论一下也好，以便理解后来发生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在1904年——也就是从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性质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起——我就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孟什维克〕脱离了关系。在后来13年期间，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在党内斗争中的立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只要革命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当中都还占统治地位，只要两派都不准备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理由需要分裂；在新的革命中，在劳动群众的压力下，两派无论如何是不能不采取同样的革命立场的，就像他们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家认为，我过去的调和主义是智慧的声音。但是调和主义的深刻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明。不同派别的简单调和只有按照某种“中间”路线才可能办到。但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条人为地画出的对角线符合客观发展需要呢？科学的政治学的任务是根据对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不是根据政治派别这种次要的、暂时的力量的〔不断变化的〕平行四边形来拟订纲领和策略。诚然，反动力量的地位使整个党的政治活动局限在极端狭隘的范围里。在当时看来，意见上的分歧可能似乎是无关痛痒的，是被侨居国外的领袖们人为地夸大了。然而正是在反动时期里，革命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重大的远景就不能训练自己的干部。为明天进行准备是今天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调和政策希望事件发展过程本身将会提供必要的策略。它是在这种希望的基础上繁盛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实际上不仅意味着反对派别斗争，而且意味着反

对党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如果“事件发展过程”能够直接为群众提供正确的政策，那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何特殊统一、纲领的拟订、领袖的选择以及纪律性的培养又有何用处呢？

后来，在1911年，列宁指出，调和主义和党在反革命年代的历史任务的根本性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惟独他一个人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①正因为调和主义在那些年代里盛极一时，所以列宁认为它对革命政党的发展是最大的威胁。他很清楚，调和派自称有“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既有机会主义的前提，也有革命的前提。但是在讨伐这种危险倾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根本不去区分调和主义的主观前提。相反地，他对那些基本立场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调和派分子进行了加倍猛烈的攻击。为了避免和布尔什维克派本身的调和主义集团发生公开冲突，列宁宁愿把他论战的锋芒指向“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因为我——如前所说——企图为调和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从这次激烈论战中摘引出来的话后来为斯大林帮了忙，虽然这肯定不是原来的意图。

列宁在反动年代的著述——在具体细节上是细致入微，在思想的概括性上则是大胆无畏——对于革命训练来说永远是伟大的一课。列宁在1909年7月写道：“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

^① 《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新派别》。《列宁全集》第20卷，中文版第335页。——译者注

缓慢地……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①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1911年写道：“两三年以前公开运动〔即取消派〕的领袖们仅仅在原则上承认的东西——有必要‘用德语’来建立党——……现在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开始具体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虽然从表面上看，列宁和马尔托夫都已经开始“讲德语”，事实上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对于马尔托夫来说，“讲德语”意味着使自己适应俄国的半专制主义，希望逐渐使它“欧洲化”。对于列宁来说，同样的字眼意味着，在秘密党的帮助下利用微小的合法的可能性来准备新的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堕落到机会主义的事实表明，孟什维克在政治上更真实地反映了“德语”的精神。但是，列宁对德国以及俄国客观发展道路的理解要正确得多：和平改良时代正为大变动时代所代替。

至于柯巴，他既不懂法语也不懂德语。然而他的整个倾向使他接近列宁的立场。他不像孟什维克派那些演说家和新闻记者那样寻找公开的战场，因为公开的战场会暴露他的弱点，而不是显示他的优点。他首先需要有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但是在反革命统治条件下，这个机构只能是秘密的。虽然柯巴缺乏历史预见性，但是他具有非凡的毅力。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不属于数以万计的脱党分子之列，而是不顾一切始终忠实于党的区区几百个人里面的一个。

伦敦代表大会以后不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年轻的季诺维也夫以及已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的年轻的加米涅夫都搬到国外去了。柯巴仍然留在俄国。他后来把这当成自己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选择

^① 《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中文第2版第47—48页。——译者注

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有关个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柯巴是一个能够到国外担负更高级的工作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毫无疑问，他会接到迁往国外的命令，而他是既不能也不愿加以拒绝的。但是谁也没有召他到国外去。从党的上层领导开始知道他的时候起，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实践家”，也就是一个主要在地方组织活动中起作用的普通革命者，而柯巴本人曾经在塔墨尔福斯、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几次代表大会上检验过自己的能力，不大会愿意参加侨民的行列。在侨民当中，他就会屈居三等地位。后来，在列宁去世以后，必要性被说成是德性。“侨民”这个字眼在新官僚的嘴上和在沙皇时代的保守派的嘴上，意思非常接近。

列宁在恢复流亡生活以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觉自己好像正在走进坟墓。1909年秋天，他从巴黎写道：“我们这儿现在和一切事物都可怕地隔绝起来……这些年头真是困难得要命……”俄国资产阶级报刊上开始出现诬蔑侨居国外者的文章，据说，侨居国外是为有教养者所不齿的已经失败的革命的缩影。1912年，列宁在回答彼得堡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这些毁谤时说：“是的，侨民是有很多苦衷的。……他们比其他人更艰苦，更贫困。在他们中间，自杀的比重特别大……”^①但是，“在灾难深重和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们中间，而且只是在他们中间，提出了整个俄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问题。”^②1917年革命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侨民小组进行的艰苦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战斗过程中酝酿出来的。柯巴根本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从1907年秋天至1908年3月，柯巴在巴库继续进行革命活

^{①②} 《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列宁全集》第22卷，中文第2版第98页。——译者注

动。现在不可能肯定他是那一天到巴库去的。他可能正是在卡莫装最后一个炸弹时离开梯弗里斯的；柯巴的勇气的主要特点是谨慎。巴库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在 20 世纪开始时已经拥有 10 万以上的人口，而且继续迅速增加，把阿塞拜疆的鞑靼人大批吸引到石油工业中来。沙皇当局唆使鞑靼人反对比较先进的亚美尼亚人，借以对付 1905 年的革命运动。这种做法不是毫无效果的。但是，革命甚至把落后的阿塞拜疆人也抓住了。他们大批地参加了 1907 年的罢工，虽然和其他各地比较，他们参加得较晚。

柯巴在这座“黑色的城”里住了大约 8 个月，其中应当减去他到柏林去的时间。不算过分捏造的贝利亚写道：“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成长壮大起来，并且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柯巴被派往对方力量特别强大的地区。“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粉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如此这般。我们从阿利路也夫那里也了解不到更多情况。据他说，经过警察残酷破坏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是“在斯大林同志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下〔聚集起来的〕……他的组织能力、真诚的革命热情、无穷无尽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和布尔什维克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等等。不幸的是，斯大林的岳父的回忆录写于 1937 年。“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这个公式毫无疑问地揭露了贝利亚的商标。同一时期在巴库很活跃的、用政敌的眼光观察柯巴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在他身上看到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但是完全否认他在工人当中拥有任何个人影响。他写道：“他的性格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好的。柯巴也考虑到这一点。他从来不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讲话……柯巴到这个或那个工人地区去永远是一件秘密的事，只能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这个事实中加以猜测。”这似乎比较接近真实情况。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和维列沙克见面。

根据布尔什维克们在极权时代以前写的回忆录，巴库组织中占首位的不是柯巴，而是邵武勉^①和查帕里泽^②。这两个卓越的革命家是在英国占领外高加索时期于1918年9月20日被英国人杀害的。《邵武勉传》的作者卡里尼安写道：“在巴库的老同志当中，阿·叶努基泽、柯巴（斯大林）、季莫费（斯潘达梁）、阿廖沙（查帕里泽）等同志当时很活跃。布尔什维克组织……在石油工人工会中拥有广泛的活动基础。一切工会工作的真正组织者和书记是阿廖沙（查帕里泽）。”叶努基泽是在柯巴之前提到的；主要角色交给了查帕里泽。他还说：“他们两人（邵武勉和查帕里泽）是巴库无产阶级最受人爱戴的领袖。”在192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卡里尼安还没有想到把柯巴放在“最受人爱戴的领袖”之列。

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斯托帕尼谈到他在1907年如何热中于工会工作——“当时巴库最迫切的任务”。工会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在工会里，“谁也代表不了阿廖沙·查帕里泽所起的主要作用，柯巴（朱加施维里）同志起着较小的作用。柯巴的大部分力量主要放在他负责的党的工作上……”斯托帕尼没有具体说明，除了领导工会这个“最迫切的任务”以外，“党的工作”还包括什么。但是他无意中的确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的说明。巴库的布尔什维克都同意有必要从组织上“巩固”党在工会里的影响，但是“关于巩固的程度和方式，我们自己也有分歧：我们有自己的‘左翼’（柯巴—斯大林）和‘右翼’（阿廖沙·查帕里泽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产生分歧的不是根本问题，而是策略或建立联系的方法问题”。斯托帕尼故意含糊其

① 斯捷潘·格奥尔基也维奇·邵武勉（1878—1918年）。——原编者注

② 普罗科菲·阿普拉西奥诺维奇·查帕里泽（1880—1918年）。——原编者注

辞——斯大林当时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使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想像到实际的人物的部署。姗姗来迟的罢工运动的浪潮，使工会已经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工会领袖自然是那些懂得如何和群众谈话和如何领导群众的人：查帕里泽和邵武勉。再次被推入次要地位的柯巴盘踞在地下的委员会里。对于柯巴来说，党争取影响工会的斗争意味着群众的领袖——查帕里泽和邵武勉——应当服从他的指挥。从斯托帕尼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在这场为“巩固”他的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柯巴引起了所有占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群众活动对阴谋家的计划是不利的。

柯巴和邵武勉之间的竞争特别激烈。情况变得如此恶劣：根据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说法，在邵武勉被捕以后，工人们怀疑是柯巴把他的对手交给警察的，要求由党的法庭来审判他。只是由于柯巴自己也被捕了，他们的运动才结束。控告者不大可能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他们的怀疑可能是许多情况的巧合引起的。但是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柯巴的党内同志认为，他在野心遭受挫折时可能变成告密者。关于其他任何人，从来没有人讲过这种话！

在柯巴参加巴库委员会期间这个委员会如何取得经费的问题上，有一些关于武装“没收”、通过处死或烧毁油井的威胁强迫工业家捐款、制造和使用伪钞等等的旁证。但是这些旁证绝不是无可怀疑的。这些行为的确发生过。然而究竟是早在那样遥远的年代就已经把这些行为归诸柯巴的创议，抑或是很久以后才第一次把这些行为的大部分和柯巴的名字联系起来，现在很难肯定。无论如何，柯巴不可能直接参加过这种冒险活动；否则必然会透露出来的。他很可能是从旁指导军事活动的，正如他曾经企图从旁指导工会一样。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柯巴在巴库的这一段生活很少为人所知。最无关阔旨的插曲，只要它们可能提高“领袖的”威望，也都被记录下来，然而对他的革命活动却只是最

笼统地提到，压制消息的程度很难说是偶然的。

1909年，年纪还很轻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被关进巴库的所谓拜洛夫监狱，在那里面蹲了三年半。3月25日被捕的柯巴在这座监狱里蹲了一年半，从监狱转到流放地，在流放地住了九个月，然后秘密回到巴库，于1910年3月再次被捕，并再次被关入拜洛夫监狱。他在这座监狱里和维列沙克一起关了将近六个月。1912年这两个难友又在西伯利亚的纳赖姆碰头了。最后，在二月革命以后，作为梯弗里斯守卫部队的代表，维列沙克在彼得格勒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碰见了他的老相识。

在斯大林的政治吉星高照以后，维列沙克在侨民报刊上详细叙述了他们在监狱中的共同生活。他的故事或许不是完全可靠的，他的判断也不是尽都令人信服的。例如，维列沙克断言，柯巴本人曾经承认“由于革命的理由”而出卖过正教中学的某些同志；这无疑是以道听途说作为根据的。关于这个故事的不可能性已经指出过了。这位属于民粹派的作者在讨论柯巴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是极为幼稚的。但是维列沙克有一个宝贵的有利条件：他能够在文明共处的习惯和条件——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已经退化的环境中观察柯巴。巴库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当时却关了1500多人。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里、楼梯上。在这样过分拥挤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任何隔离。除了惩罚性牢房的门以外，所有的门都大敞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在牢房之间、房屋之间以及院落里自由地走来走去。“要想坐下来或躺下来而不压住别人的脚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相互之间，许多人对自已，都有了十分意想不到的看法。甚至连冷冰冰的、沉默寡言的人也露出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能够设法隐藏的性格特点。

维列沙克写道：“柯巴是一个极端片面的人。他没有一般原则，

也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他在本性上一直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一个粗野的人。在他身上，这一切都和一种特殊的、故意装出的调皮结合在一起，使观察力最敏锐的人第一眼也看不出这种调皮后面隐藏着的其他特点。”作者所说的“一般原则”，似乎是指道德原则：作为一个民粹党人，他是“伦理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维列沙克对柯巴的精力感到惊讶。这座监狱里有一种残忍的把戏，目的是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对手发狂：这种把戏叫做“逐入梦境”。维列沙克说：“从来不可能使柯巴失去镇静……无论怎么做也不能激怒他……”

和当局玩弄的把戏比较起来，这种把戏还算是十分天真的。监狱里有刚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自己命运的结束。死囚和其他人吃住都在一起。晚上，他们在囚徒众目睽睽下被带到监狱院落里绞死，所以在牢房里“听得见被绞死者的哭喊和呻吟”。所有犯人都感到神经紧张。维列沙克说：“柯巴睡得很熟，要不就是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他深信世界语是未来的国际语言）。”如果认为柯巴对处决漠不关心那未免太傻了。但是他的神经很坚强。他对别人的事不像对自己的事那样敏感。这样的神经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财产。

尽管存在着混乱、绞决以及党和个人的冲突，巴库监狱仍然是一座重要的革命学校。柯巴是一个突出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他不曾参加个人之间的讨论，宁愿上公共讲坛，这个迹象肯定说明柯巴在教育 and 经验上比大多数难友高明。“柯巴的外表和他在辩论中表现的粗野使他的表现总是令人不愉快的。他的演说缺乏机智，形式上枯燥刻板。”维列沙克追叙了一次“土地问题讨论”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柯巴的同志奥尔忠尼启泽“打了共同报告人、社会革命党的伊利亚·卡策瓦泽的耳光，因此受到其他社会革命党人的毒打。”这件事不是捏造的：性情非常暴躁的奥尔忠尼启泽甚

至在成为苏维埃的著名的大官以后还保持着以力服人的嗜好。列宁有一次甚至因此建议把他开除出党。

维列沙克对柯巴的“机械的记忆力”惊异不置。据说，柯巴“前额并不发达”的小脑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装进去了。“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本行，在这方面，人是不可战胜的。……他懂得如何利用引自马克思的适当的公式来证明任何论点。这个人给对政治蒙昧无知的年轻的党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维列沙克本人属于“蒙昧无知者”之列。对于这个在土生土长的俄国纯文学的社会学的教育下长大的青年民粹党人，柯巴的马克思主义的包袱看来一定是极端使他赞赏的。事实上，这个包袱是够小的了。柯巴既对理论不感兴趣，又不能锲而不舍地学习，又缺乏思想锻炼。说他具有“机械的记忆力”是不怎么正确的。这种记忆力是狭隘的，从经验中产生的、实用的；但是，尽管经过正教中学的训练，这种记忆力绝不是机械的。这是一种属于农民的记忆力，缺乏概括和综合的能力，然而坚定顽强，特别是在仇恨方面。说柯巴脑袋里装满了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现成的引语是完全不真实的。柯巴从来不是一个书蠹，也不是一个学者。他通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拣到一些关于阶级斗争和思想从属于物质因素的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尽管他使这些论点过分简单化了，他仍然能够利用它们战胜民粹党人，正如一个手持最蹩脚的手枪的人能够战胜一个手持木制武器的人一样。然而整个说来，柯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满不在乎的。

我们记得，当柯巴关在巴士姆和库泰依斯监狱里的时候，他曾经企图钻研德语的奥秘。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极为强大。然而柯巴在学习马克思的语言时比学习他的理论更不成功。在巴库监狱中，他开始研究作为“未来的语言”的世界语。这一点最有启发性地揭露了柯巴的智力修养的性质。在

学问方面，他总是寻找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尽管他在监狱和流放地住了八年，他从来不曾学会任何一种外语，他的生不逢辰的世界语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政治犯总是努力避免和刑事犯混在一起。柯巴则正好相反，“总是被人看到和恶棍、敲诈犯以及持枪抢劫犯搞在一堆”。他感觉自己和他们处在平等的地位。“他对从事真正‘事业’的人一向有深刻的印象。而他认为政治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应当懂得如何‘干’，并且懂得如何‘干得更好’”。这个意见非常恰当。正是这个意见比其他任何事物更有力地驳斥了关于柯巴具有“机械的记忆力”和装满现成引语的说法。和智力方面趣味较高的人在一起是使柯巴苦恼的。在列宁时期的政治局里，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阴郁焦躁地坐着。相反地，在和智力鲁钝、丝毫不受任何思想倾向约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比较喜欢交际、比较平心静气，也比较近人情。在内战时期，当某些部队、通常是骑兵部队不听驾驭、沉湎于暴力和酗酒的时候，列宁惯于说：“我们最好是把斯大林派到那儿去吧？他懂得怎样和这类人讲话。”

柯巴在监狱里不是抗议和示威活动的创议者，但是他总是支持创议者的。“这使他在一般囚犯眼中成为一个好的同志”。这个意见也是恰当的。柯巴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无论在什么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创议者。但是他十分善于利用别人的主动性，把创议者推着往前走，而自己则保持选择的自由。这并不是说柯巴缺乏勇气；他不过是希望把勇气用得合算一些。监狱的管理制度是散漫和残暴的混合体。犯人们在监狱墙壁之内享受着相当大的自由。但是，一旦超越了一个难以捉摸的界限，管理当局就会使用武力。维列沙克谈到1909年（他显然是指1908年）复活节的第一天，萨利亚团的一连士兵对所有政治犯毫无例外地进行了殴打，迫使他们通过等在两旁殴打他们的行列。“柯巴手上捧着一本书，

昂着头，从枪托的打击下走过去。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柯巴不顾刺刀的威胁，用一个脏水桶撞开了牢房的门。”这位沉默寡言的人——的确，在罕有的场合里——也会暴跳如雷。

莫斯科的“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是这样转述维列沙克的话的：“斯大林走过士兵的行列，遭受来自两面的夹击，一面读着马克思……”在这里把马克思的名字拖进来和把一朵玫瑰花放在圣母玛利亚的手中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苏联全部历史学都是由这种玫瑰花组成的。柯巴在枪托殴打下手里还持着“马克思”的书已经成为苏联学术研究、散文和诗歌的主题。然而，这种态度并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在监狱里挨打和监狱里的英雄主义当时都是家常便饭。皮亚特尼茨基谈到1902年他在维尔诺被捕以后，警察曾经建议把他（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工人）送到以打人著名的地区警官那儿去，以便迫使他招供。但是那位年纪较大的警察回答说：“在那儿他也不会说任何东西的。他属于火星派的组织。”甚至在那样早的时候，列宁派的革命者就以坚定不屈知名。为了弄明卡莫是否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失去了感觉，医生曾经把针刺进他的指甲，只是因为卡莫毫不动摇地忍受了几年这样的考验，他才终于被宣布为无法治疗的疯子。和这比较起来，挨几下枪托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低估柯巴的勇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必须对这种勇气加以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由于监狱的条件，维列沙克可以毫不困难地观察到柯巴的某种使他能够长期不为人所知的特点：“这就是他善于不声不响地煽动别人，而自己则躲在一边。”然后举了两个例子。有一次，在“政治”犯屋子的走廊里，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遭到殴打。满屋都响起了“挑拨者”这个不祥的字眼。只有警卫的士兵才能使这场惩戒停止下来。他的鲜血淋漓的身体被放在担架上抬到市立医院去了。他是一个挑拨者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没有被打死？

“在拜洛夫监狱里，已经证明的挑拨者通常是被打死的”，维列沙克附带地说明。“谁都毫不知情，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是隔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个谣言出自柯巴。”那个被打的人究竟是不是挑拨者始终没有弄清楚。是否可能他只是反对没收活动或指责柯巴是出卖邵武勉的工人之一？

另一个例子。有一个被称为“希腊人”的犯人在通往“政治”犯屋子的楼梯上刺死了一个刚关进这座监狱不久的青年工人。这个希腊人认为，那个被他杀死的人是一个密探，虽然他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场血腥事件自然轰动了整个监狱，长期成为一个疑案。最后，这个希腊人开始吐露真相，说他显然受到了毫无道理的“欺骗”：错误的消息来自柯巴。

高加索人很容易发火，很容易动刀子。头脑冷静、长于算计的柯巴懂得这些人的语言和习惯。他发现使这些人相互火并易如反掌。两个例子无疑都是为了报复。教唆的人不需要让受难者知道他们的不幸是谁造成的。柯巴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感情，甚至复仇后的快乐也不愿和别人共享。他宁愿单独地暗自享受这种乐趣。这两个插曲虽然很卑鄙，然而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后来发生的事件使它们看起来有一种内在的真实性。……在拜洛夫监狱里，为未来事件进行的准备在继续着。柯巴获得了经验，柯巴成长壮大了，柯巴成熟了。这个脸上长着麻点的前正教中学学生的灰黯的身形抛下了比以前更邪恶的影子。

维列沙克还提到——这一次显然是道听途说来的——柯巴在巴库活动时期的各种冒险行为：组织伪钞制造者、抢劫国家财库等等。“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中间的任何一项而出庭受审，虽然那些伪钞制造者和没收者和他一起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了解他所起的作用，其中必然会有人出卖他的。“柯巴善于不动声色地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同时使自己不受人注意。这使他

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可以不必公开作出解释和公开承担责任的狡猾的阴谋家。”

这样一来，我们对柯巴在监狱里的生活就比对他在监狱外的活动了解得更多了。但是无论是在监狱以内还是在监狱以外，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在和民粹派讨论以及和拦路抢劫犯闲聊之间，他并没有忘掉自己的革命组织。贝利亚告诉我们：柯巴在监狱里和巴库委员会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这是非常可能的：在政治犯和刑事犯以及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并不隔离的地方，和外界割断联系是不可能的。有一期秘密报纸就完全是在监狱里准备的。革命的脉搏虽然已经比以前微弱得多，但是仍然在跳动。监狱可能不曾促进柯巴对理论的兴趣，但是监狱也没有摧毁他的战斗精神。

9月20日，柯巴被送往沃洛果达省北部的索里维切果茨克。这是特别优待的流放：时间只有两年；不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是俄国的欧洲部分；不是一个村庄，而是拥有两千居民的小镇，有很好的潜逃机会。由此可知，宪兵们甚至连比较有分量的不利于柯巴的证据也没有搞到。由于那些边远地区的生活费用很低，流放者依靠政府每月发给他们的几个卢布维持生活并不困难；为了满足额外的需要，他们还得到朋友们和革命的红十字会的接济。柯巴是如何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度过九个月的，他干过什么，他研究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发表过任何文件：他的文章、日记、信件都没有发表。在当地警察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案”的卷宗里，在“态度”这项标题下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粗暴、鲁莽、不尊敬上级。”“不尊敬”是一切革命者共有的特点；“粗暴”是他独有的特点。

1909年春天，已经在彼得堡的阿利路也夫接到当时已被流放

的柯巴的来信，要他把地址告诉他。“同年夏末，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到彼得堡。我在彼得堡利齐尧区的一条街上偶然碰见了。”原来斯大林在阿利路也夫家里和工作地点都没有找到他，不得不在街上逛了好久，无处藏身。“当我在街上偶然碰见他的时候，他已极为疲倦。”阿利路也夫把柯巴安排在一个警卫团的同情革命的看门人的家里住着。“斯大林在这里安静地住了一个短时期，见到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几个成员，后来往南去，到了巴库。”

又到巴库去啦！他不大可能是出于对乡土的怀恋而被吸引到巴库的。比较准确的设想是：柯巴在彼得堡并不出名，杜马的议员们对他没有表示任何兴趣，谁也没有请他留下，也没有为他提供秘密居住必不可少的帮助。“回到巴库，他又努力工作起来，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1909年10月，他来到梯弗里斯，组织了并且领导了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反对孟什维克一取消派的斗争。”读者无疑会认出贝利亚的风格。

柯巴在秘密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是未来的斯大林写的。由于没有其他任何更值得注意的东西，现在对1909年12月柯巴为党在国外的报纸写的通讯赋予了非凡的意义。他写的《高加索来信》拿巴库这个活跃的工业中心和充满文官、商人和手艺人的停滞的梯弗里斯作了对比，很正确地用社会结构说明了孟什维克在梯弗里斯占统治地位的原因。接着就对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多年来的领袖饶尔丹尼亚展开了论战。饶尔丹尼亚再次宣称有必要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争辩说，工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不调和政策，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愈微弱，资产阶级……就愈能胜利……”柯巴对此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论点：“革命愈是依靠领导贫农反对地主和自由资产者的无产阶级所进

行的阶级斗争，这个革命的胜利就愈是彻底。”^①所有这一切本质上都十分正确，但是毫无新意；从1905年春天开始，这种论战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了。如果这种通信对列宁有任何价值的话，不是因为它像学生作文一样重复了他本人的思想，而是因为它是在大多数类似的声音已经消沉的时期来自俄国的活生生的声音。可是在1937年，这篇《高加索来信》被说成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策略的典型例证”。有一个属于这类的歌颂者写道：“我们的著作和我们一切教导都不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非凡的深度、丰富的含义及历史意义。”最慷慨的做法是不去理它。

同一位历史学家（一个名叫拉比切夫的人）告诉我们：“1910年3月和4月，终于有可能成立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了。斯大林是这个局的工作人员。但是在俄国局开始工作以前，它的成员就被逮捕起来。”如果这段话是真的。那么柯巴至少从形式上说是1910年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这是他的传记中多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不是真的。比拉比切夫早15年，老布尔什维克格尔曼诺夫（弗鲁姆金）就讲了如下这段话：“在本文笔者和诺根举行会议时，决定建议中央委员会批准下列五人名单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俄国部分的成员：诺根、杜勃洛文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斯大林和米柳亭。”由此可知，这里考虑的并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议，而仅仅是两个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格尔曼诺夫继续说：“我们两人都认识斯大林，知道他是最优秀的、最积极的巴库工作者之一。诺根到巴库去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各种理由，斯大林不能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格尔曼诺夫没有说明造成困难的确切原因。两年后，诺根自己写到他的巴库之行。他说：

^① 《高加索来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83页。——译者注

“……斯大林（柯巴）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当时他在高加索很著名，不得不隐藏在巴拉汉内油田区。”从诺根的报道来看，他甚至没有见到柯巴。

对斯大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的理由保持沉默的情况使人可以作某些有趣的推测。1910年是运动最彻底地瓦解的一年，也是调和主义倾向泛滥得最广泛的一年。中央委员会一月份在巴黎举行全会，调和派在会上取得了很不巩固的胜利。会议决定恢复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并且让取消派参加。诺根和格尔曼诺夫是布尔什维克的调和派。恢复“俄国”委员会——也就是在俄国国内秘密活动的委员会——是诺根的任务。由于缺乏著名人物，曾经几度试图把地方性的人物吸收进来，其中有诺根和格尔曼诺夫认识的“最优秀的巴库工作者之一”，即柯巴。但是这个想法毫无结果。我们前边已经提到的那篇德国文章的消息灵通的作者说：尽管“布尔什维克官方传记家企图把〔他〕参加没收活动和开除出党说成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然而，布尔什维克本身在任命柯巴担任比较重要的任何领导职务时也是踌躇不决的。”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诺根的使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柯巴最近参加过“战斗活动”。巴黎全会曾经指责没收者是受“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的指导的人。正在为取得合法地位而斗争的孟什维克绝不可能同意和没收活动的直言不讳的领导者合法。看来，诺根是在和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谈判的过程中才了解这一点。没有成立有柯巴参加的委员会。应当指出，作为斯大林的保护人的两个调和主义者中间，格尔曼诺夫现在属于完全失踪者之列；至于诺根，仅仅由于他在1924年已经早死才避免遭到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格尔曼诺夫和他的其他最亲密的朋友同样的命运。

无论柯巴在巴库扮演的是第一流、第二流还是第三流角色，他在巴库的活动无疑比在梯弗里斯成功。但是所谓巴库组织是布尔

什维主义惟一的不可战胜的堡垒的想法是一个神话。1911年底，列宁本人无意间为这个神话奠定了基础。当时，他把巴库组织和基辅组织并列为“1910和1911年在俄国具有模范和进步作用”的组织——这里指的是党完全瓦解和开始重振旗鼓的年代。《列宁全集》第15卷有一条脚注：“巴库组织在困难的反动年代一直存在，毫无间断，并且在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现在人们把这两个意见和柯巴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调查证明，这两个意见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巴库在复兴以后曾经和国内其他工业中心一样经历过同样的下降阶段——的确，它的下降阶段出现得较晚，但是下降的程度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剧烈。

斯托帕尼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10年开始，巴库的党和工会的生活都完全停顿了。”零碎分散的、残余的工会组织还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但是，甚至这些组织的存在也是由于孟什维克起了主要作用。“由于逮捕、缺乏积极的工作者以及总的混乱状态导致了不断的失败，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就几乎完全偃旗息鼓了。”1911年的局势更为恶劣。1912年3月，当全国的浪潮又开始明显地上升的时候，奥尔忠尼启泽访问了巴库。他给国外写信说：“昨天我终于设法召集到几个工人……没有组织，也就是说，没有地方中心；因此我们不能不满足于私下会谈……”这两段证词已经够了。此外，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奥里明斯基的证词：“在付出的‘代价’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列宁对巴库组织的估计错误是一个流亡者的普通错误。作为流亡者，他不得不根据片面的或不可靠的消息——其中可能有柯巴自己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情报——从遥远的地方作出判断。

这样勾出的总的画面是足够清楚的。柯巴并没有积极参加作为当时主要斗争场合的工会运动（卡里尼安和斯托帕尼）。他不曾

在工人集会上讲话（维克沙克），而是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诺根）。“由于各种理由”，他没有能够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格尔曼诺夫）。在巴库，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地方多（奥里明斯基），而且个人恐怖行为也较多（维列沙克）。柯巴直接领导了巴库的“战斗活动”（维列沙克、马尔托夫和其他人），这种活动无疑需要离开群众，转入“极为秘密”的状态。有一个时期，秘密组织的存在是依靠掠夺钱财而人为地维持的。因此，反动的影响更加强大，重整旗鼓的工作开始得更晚。这个结论不仅在传记中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明群众运动的某些一般规律。

1910年3月24日，宪兵上校马尔丁诺夫说：他抓到了巴库委员会委员、“一个占领导地位的最活跃的党的工作者”、化名为“柯巴”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妨认为这个文件没有经过贝利亚的窜改）。关于这次逮捕，另一个宪兵按照自己的责任提出报告说：“鉴于〔朱加施维里〕坚持参加”革命活动并“两次逃走”，他——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谨建议予以最严厉的惩办”。但是不必以为这里指的是处决：按照行政命令实行的“最严厉的惩办”意味着送到属于西伯利亚的辽远的地方去流放五年。

在此期间，柯巴住在他已经很熟悉的巴库监狱里。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国内政治局势和监狱管理制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1910年已经破晓。反动势力正在取得全线胜利。不仅群众运动，甚至连没收活动、恐怖，以及个人的绝望行为都达到新的低潮。监狱里更严格、更安静了，甚至连集体讨论都无从谈起。柯巴有足够的闲暇来研究世界语，如果他对这种未来的语言还没有感到失望的话。8月27日，高加索总督下令五年内禁止朱加施维里在外高加索居住。但是，显然未能提出任何严重罪名的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的建议没有得到彼得堡的理睬。柯巴再次被送往沃洛果达

省去继续度完他尚未满期的两年流放期。十分明显，彼得堡当局还没有把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看成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第五章 新的高潮

斯托雷平在全国作威作福约五年之久(1906—1911年)。他用尽了反动派的一切手段。六三政制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土地问题方面，表现出是毫不足取的。斯托雷平被迫从在政治上进行联合退而采用警察镇压手段。而且，在斯托雷平自己的秘密警察队伍中，出现了暗杀他的刺客，这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揭露他的政制的彻底破产似的。

到1910年，工业的恢复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些革命政党面临这样的问题：局势的这种转机将对国内政治情况产生什么影响？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保持他们的公式主义立场，认为，危机使群众具有革命思想，而工业复兴则使他们平静下来。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派都倾向于贬低或者断然否认实际已经开始的工业的恢复。惟一的例外是维也纳的《真理报》，它尽管有调和派的幻想，却保卫了这一正确的思想：恢复和危机的政治后果远不是自动性的，每次都是重新决定的，它取决于以前的斗争进程，取决于整个国内形势。因此，在工业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非常普遍的罢工斗争）之后，形势的突然衰退可能引起直接的革命高潮，如果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话。另一方面，在进行了以失败告终的长期革命斗争以后，使无产阶级分裂和遭到削弱的一次工业危机可能完全摧毁无产阶级的斗志。或者，在长期反动统治之后出现的工业高潮，能够恢复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的形式），在这以后，新的危机可能把群众的力量转到政治轨道

上来。

日俄战争和革命造成的震动使俄国未能分享 1903 到 1907 年世界范围的工业复兴。与此同时，无间断的革命战斗、失败和镇压，已使群众精疲力竭。1907 年爆发的世界工业危机使俄国的长时期萧条又延长三年，它远没有鼓舞工人进行新的战斗，而是使他们溃散，使他们的力量遭到空前的削弱。在关厂、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下，疲惫的群众肯定感到沮丧了。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的“成就”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需要一次新的工业高潮所具有的复兴作用来恢复自己的力量，补充自己的队伍，再次感到自己是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并投入新的战斗。

1910 年底，由于前第一届杜马主席、自由派穆罗姆策夫和托尔斯泰的逝世，发生了街头示威——这是很久没有看到的景象。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表面上，情况看来可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惯于犯的错误就是这样）：政治复兴是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榜样，开始吸引了上层工人。事实上，复兴的浪潮不是从上到下进行的，而是从下到上进行的。由于工业高潮，工人阶级逐渐从它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起来。但是，使群众改变的那些化学变化在变得明显以前，已经通过中间社会集团传播到学生那里去了。由于青年大学生是比较容易发动的，这种高潮就首先以学潮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有充分经验的观察家看来，事前就很清楚，知识分子的示威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本身内部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过程的一个征象而已。

事实上，罢工运动的曲线很快就开始上升了。不错，1911 年的罢工人数只达 10 万人（在前一年，它甚至没有达到此数的一半），但是，复兴过程缓慢只表明必须加以克服的麻痹状态是多么严重。无论如何，到同年年底，工人地区的情况比年初就大不相同了。1909 年和 1910 年的丰收刺激了工业复兴，在这之后，1911

年出现了灾难性的歉收，这一次歉收并没有使复兴停下来，而使2000万农民受饥挨饿。在农村开始的骚动再次把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12年1月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完全有权提到“政治高潮的开始”。但是突然的转机直到1912年春发生连纳屠杀工人的著名事件以后才出现。在这个辽远的森林地带（离彼得堡5000多英里，离最近的铁路线1400多英里），每年为英国和俄国股东提供千百万卢布利润的金矿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要求增加工资和废除罚金。从伊尔库茨克调来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150人被打死，250人受伤；由于没有受到医治，数以十计的伤者死亡了。

在杜马辩论连纳事件时，内政大臣马卡罗夫（他是一个蠢官，跟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右派代表的掌声中宣布：“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句无耻之极的话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先是从彼得堡的工厂，然后从全国各地，人们用电话和电报传来关于发表抗议宣言和举行抗议示威的消息。连纳事件的影响只有七年前在“流血星期日”以后席卷劳动群众的愤怒浪潮可以与之比拟。一家自由派报纸写道，“自从1905年以来，首都的大街或许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那时，斯大林在彼得堡，处于两次流放之间的自由时期。他在《明星报》（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提到它）上写道：“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痛苦都集中在一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①

① 《奔流起来了！……》。《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32页。——译者注

参加罢工的大约有 30 万工人。在五一罢工中有 40 万人游行。据官方材料，1912 年总共有 72.5 万人罢工。工人总数比工业复兴年代增加了不下 20%，同时由于生产的极大集中，他们的经济作用具有甚至更大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复兴影响了所有其他阶层的人民，饥饿的农村预兆不祥地骚动起来。陆军和海军中也发生了表示不满的事件。列宁在 1912 年 8 月写信给高尔基说：“俄国正出现的是革命的高潮，——不是别的什么高潮，而正是革命的高潮。”^①

这个新运动并不是过去的运动的重复，而是它的继续。1905 年，在发动强大的一月罢工的同时，人们向沙皇递交了天真的请愿书。1912 年，工人们立即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05 年的思想、传统和组织经验——它们为在反动时代取得的辛酸教训所丰富——滋养了新的革命时期。从一开始，领导作用就是属于工人的。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领导权属于布尔什维克。这在实质上预先决定了未来的革命的性质，虽然布尔什维克自己还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加强无产阶级，并且为它取得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作用，工业复兴加强了持久革命前景的基础。旧政制的马厩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扫帚来打扫干净。民主革命只有把自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也是征服自己，才能够胜利。

“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继续是这样。但是它有它的惟一弱点：调和主义，对孟什维主义的革命复活抱有希望。新的高潮——“不是什么别的高潮，而正是革命的高潮”——对调和主义进行了无可弥补的打击。布尔什维主义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并

^① 《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 46 卷，中文第 2 版第 126—127 页。——译者注

且教导它领导追随它的贫苦农民。孟什维主义依靠劳工贵族，倾向于自由资产阶级。群众一旦再次进入公开冲突的战场，就不可能谈论这两派之间的“调和”。调和派被迫采取了新的立场：他们中间的革命者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他们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

[柯巴的第三次流放从1901年9月23日持续到1911年7月6日，这时他在完成了两年流放期的剩余时间以后获释，其中有两个月是在从巴库前往索里维切果茨克的途中度过的，并且曾在各个转送监狱中停留。因此，]这次柯巴[作为一个流放者]在流放地度过了八个多月。关于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的生活，关于与他保持联系的流放者，关于他所读的书和使他感兴趣的问题，人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从他在那个时期写的两封信看来，他从国外收到了刊物，并且能够了解党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了解侨居国外的人的生活；在国外，派系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严重阶段。普列汉诺夫和他的一些无足轻重的追随者，再次与他的最密切的朋友们决裂，为使党处于非法状态这种主张辩护，反对取消派。这是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一生中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显现，他当时正在迅速走向没落。这样就产生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和寿命不长的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存在着取消派（马尔托夫等人）、前进报派（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调和派（托洛茨基）之间的和解。第二个联盟是完全没有任何原则作为基础的，它的组成在一定程度上使参加者自己也感到惊奇。调和派仍想“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无情地拒绝关于与取消派达成任何协议的主张，调和派自然转而采取与孟什维克和前进报派结成联盟或半联盟的立场。正像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所说的，使这个插曲式的联盟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是“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厌恶，因为这个中央为保卫它的思想而

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两个联盟的问题在当时人数不多的党的队伍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1910年12月31日，斯大林向巴黎写信说：“谢明同志：昨天我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你的信，我首先向列宁、加米涅夫及其他同志致热烈的敬礼。”^①由于有加米涅夫的名字，表示这个敬礼的话不再刊印了。接着就是他对党内形势的估计。“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惟一正确的……联盟的计划显然是列宁的主意，——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明察秋毫。但这并不是说任何联盟都是好的。托洛茨基联盟（他会说，这是“综合”）就是腐朽的没有原则性的东西……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它有深刻的原则性，并在于它的基础是对复兴党的方法问题有一致的看法。可是，正因为这是联盟而不是合并，所以布尔什维克必须有自己的派别组织。”^②所有这一切是完全符合列宁的看法的，实质上只是阐释列宁的文章，在性质上是表示自己忠于原则。他进一步宣布，“主要的”不是国外工作而是在俄国国内的实际工作。在好像是顺便这样宣布以后，斯大林马上又解释说，实际工作就是“运用原则”。在重复了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原则”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柯巴就更接近于他要说的话了。他写道，“……据我看，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组织中心小组（俄国国内的），这个小组应该先把……秘密的、半公开的和公开的工作统一起来……这样的小组却像空气和面包一样地需要。”^③这个计划本身并无任何新奇之处。自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列宁曾经不止一次企图恢复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的核心，但是在这以前，

① 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0页。——译者注

②③ 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页。——译者注

党的分散使这些企图全都失败了。柯巴建议召开党的工作者的会议。“这个会议很可能给上述的中心小组提供适当的人选。”^①在暴露了他把党的重心从国外转移到俄国来的目的以后，柯巴又赶紧来消除列宁可能有的任何疑虑：“行动必须坚决而无情，不要怕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前进报派方面的责难。……”^②他故意谦虚地谈到他计划中的中心小组：“这个小组可以随便叫什么名字，叫‘中央委员会俄国分部’或中央委员会直属辅助小组都没有关系。”^③这种假装的毫不在乎的态度大概是为了掩盖柯巴的个人野心。“现在来谈我自己。我还有六个月期满。期满之后，我就可以完全听候使唤。如果实在迫切需要工作者，我立刻可以溜之大吉。”^④这封信的目的是清楚的：柯巴提出自己为候选人。他想最终成为中央委员。

柯巴的无可非难的野心出人意外地为他另一封信（写给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说明了。“高加索沙夏在写信给你”（这封信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记得 1904 年在梯弗里斯和巴库的时候吧。首先我向奥里珈，向你，向格尔曼诺夫致以热烈的敬礼。现在与我一起过流亡生活的伊·姆·戈卢别夫把你们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了。格尔曼诺夫知道我叫 K…b…a（他会明白）。”很奇怪，迟至 1911 年，柯巴不得不用间接的、纯系偶然的名称来提醒老党员想起他自己的情况；他仍然是不知名的，或者有被人们轻易忘记的危险。他继续说：“我在今年 7 月就要（流放）期满。伊里奇等人要我不等期满就到两个中心之一去。但是我希望完成我的期限（一个合法的人机会更多一些）……但是如果非常需要人（我正等待他们的答复），那么当然我将溜之大吉……我们在这里无事可

①②③④ 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 2 卷，中文版第 199—201 页。——译者注

做，真闷得慌，我简直要闷死了。”

从起码的谨慎这一观点来看，信中的这一部分看来是惊人的。一个流放者的信件总有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险，然而他竟没有明显的实际理由就写信给他不很熟识的党员，提供关于他与列宁秘密通信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有人要他从流放地逃走，如果需要，他“当然将溜之大吉”。我们以后会看到，这封信果真落到宪兵之手，他们不费什么劲儿就确定了寄这封信的人的身份以及他所提到的所有人的身份。说明这种不谨慎作法的一个解释必然是：急于想夸耀！在1904年可能未受人充分注意的“高加索沙夏”情不自禁地要告诉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列宁本人已把他包括在党的中央工作者之列。但是，作这种夸耀的动机只起辅助作用。这封神秘信件的关键在最后一部分：

“当然，我们听到了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浪’的情况：一方面是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夫联盟。据我所知，工作者对第一个联盟的态度是赞同的。但是一般说，工作者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让他们任意在墙上爬吧；但是，至于我们，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令人可惊的话！斯大林认为，列宁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的斗争是“杯水风浪”。“工作者”——其中也有斯大林——“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参谋部）。“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看来，运动的利益与制订运动纲领的理论斗争并无联系。

一年半以后，在业已开始的转变的影响下，侨居国外的人员之间的斗争空前尖锐了，感情用事的半布尔什维克高尔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哀叹国外的“争吵”——杯水风浪。列宁以斥责口气答复他说：“资产者、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喜欢大叫大嚷地说社

会民主党人‘闹内部纠纷’，这批人对于解决这些‘迫切的难题’不认真，他们跟着别人跑，玩弄外交手腕，并满足于折中主义……”^①他在以后的一封信中坚持，“那些了解‘内部纠纷’的思想根源……的人就有责任去帮助群众寻找根源，而不应该去证明群众把争论看做是‘领袖人物的私事’是对的。”^②高尔基则坚持说：“目前在俄国工人中间有很多很好的……青年，但是他们对国外的人却怀着如此愤懑的情绪……”^③列宁回答说：“这是确实的，不过这不是‘领导者’的过错引起的……应当把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骂骂领导者，这很容易，也很普遍，然而并没有什么益处……”^④看来，好像列宁在对高尔基的有节制的反驳愤怒地驳斥了斯大林。

仔细比较斯大林的这两封信（信的作者从未打算要人们比较），对于看透他的性格和手法是极为宝贵的。他对“原则”的真正态度在第二封信里极为忠实地表示出来：“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这实质上就是许多不太聪明的调和分子的态度。斯大林对“侨居国外的人员”使用了非常轻蔑的语句，这不仅因为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因为他指望得到有经验的人，特别是格尔曼诺夫的同情。他从最近自莫斯科流放出去的戈卢别夫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全部心情。在俄国进行的活动情况很不好，地下组织衰退到极点，有经验的人非常容易责怪侨居国外的人在小事上大惊小怪。

为了了解斯大林采取两面手法的实际目的，需要记住，格尔曼诺夫本人与在党的上层人物中很有影响的其他调和派有密切关系，他在几个月以前曾提议由柯巴担任中央委员。柯巴认为，向

① 《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26页。——译者注

②③④ 同上书，第131—132页。——译者注

这个集团表示他对它的支持是有用的。但是他清楚知道列宁的影响的力量，因此他首先宣布他忠于“原则”。在他寄往巴黎的信中，他奉承列宁的不调和态度，因为斯大林是怕列宁的；在给莫斯科人的信中，他使他们反对列宁，因为列宁没有正当理由而“在墙上爬”。第一封信是逐字逐句重申列宁反对调和派的文章中的话。第二封信则重复了调和派反对列宁的一些论点。而这一切他是在24天之内做的。

不错，写给“谢明同志”的信有这样一句慎重的话：在国外的中心“不就是一切，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组织俄国国内的工作。”^①另一方面，在写给莫斯科人的信中有一个看来是无意中提出的暗示：工作者对列宁——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据我所知，是赞同的。”但是，在一封信里的辅助性纠正，在另一封信里成了发展相反的思想路线的起点。含糊的旁白（这种旁白差不多是思想上的保留）的任务是缓和这两封信之间的矛盾。但是事实上，它只是暴露了作者的问心有愧。

任何阴谋手法，不管多么原始，都足以达到其目的，柯巴故意不直接写信给列宁，而写给“谢明”。这就使他有可能以极为亲切的口气提到列宁，而使他没有义务去探讨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柯巴的真正动机对列宁来说并不是谜。但是，列宁采取的态度是政治家的态度。过去表现过坚强的意志和坚定性的一个职业革命者现在急于要使自己到党的机构里来。列宁注意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格尔曼诺夫也记得，调和派将在柯巴这个人的身上找到一个盟友。因此他的目的达到了，至少是暂时达到了。柯巴有许多条件可以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杰出委员。他的野心是有充分根据

① 《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00页。——译者注

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位青年的革命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欺骗、弄虚作假和故意采取无耻的手法。

在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的生活中，连累性的信件是要销毁的，与国外的人们的个人接触是很少的，因此，柯巴并不担心有人会把这两封加以比较。为未来保全了这些无价的文件的功劳完全在于沙皇邮局的检查员。在1925年12月23日（当时这个极权主义政权还远没有达到它目前的机械程度），梯弗里斯报纸《东方曙光报》很不经心，发表了柯巴给莫斯科人的这封信的副本，这个副本是从警察局档案中找出的。不难设想，这个倒霉的编辑部为此而得到的惩罚是什么！这封信以后从未再登，没有一个官方传记作者曾提到这封信。

尽管迫切需要组织者，柯巴并没有“溜之大吉”——那就是说，他并没有逃走，他这次完成了他的流放期限。报纸传来了关于学生举行集会和街上示威的消息。不下1万人拥挤在涅瓦大街^①。工人们开始与学生们联合起来。“这不是变化的开始吗？”列宁在接到柯巴从流放地的来信以前几周写的文章中这样问。在1911年最初几个月，高潮已是不容置疑的了，然而，已经逃走过三次的柯巴这次却安静地等待流放期满。新春虽然到来，看来他却还是很冷的。他是不是由于记得1905年的经验而害怕新的高潮呢？

所有传记作者都毫无例外地提到柯巴新的逃走。事实上，没有必要逃走；他的流放期在1911年7月结束了，莫斯科暗探局在顺便提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时候称他这次“完成了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市的行政流放期”。同时在国外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安排党的一次代表会议，看来，

^① 彼得堡（列宁格勒）的主要街道。——原编者注

柯巴和另外四个人一起被指派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流放以后，他前往巴库和梯弗里斯，以便鼓动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诱使他们参加代表会议。在高加索没有正式的组织，因此必须差不多是从头建立党组织。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通过了柯巴就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所写的呼吁书：

不幸，除了政治冒险分子、奸细和其他渣滓以外，在我们加强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事业中的先进工作者不得不对付我们队伍中的一个新障碍，即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

这指的是取消派。这个呼吁书是以一个比喻（作这种比喻是我们的作者的特点）结束的：

“笼罩全国的黑暗反动的阴暗嗜杀的云雾开始消散，并开始为人民的愤怒的暴风雨的云雾所代替。闪电划破了我们的生活的黑暗背景，黎明在远处显露了曙光，暴风雨就要到来了……”

这个呼吁书的目的是宣布梯弗里斯小组的出现，从而使当地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可以参加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

柯巴合法地离开了沃洛果达省。他是否从高加索合法地前往彼得堡，这是有疑问的。从前的流放者通常在一定时期内被禁止在重要城市居住。但是不管有没有得到许可，这位乡下人终于出发前往首都所在地。党刚刚从它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过来，最优秀的力量关在狱中、被流放或者侨居国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彼得堡需要柯巴。但是他第一次在首都出现的时间是很短的。在他流放结束和下次被捕之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中，有三四个星期一定为他前往高加索的行程所用去。柯巴究竟怎样适应他的新环境或者他怎样在新环境中开始他的工作，我们是一无所知的。

这个时期的惟一值得记忆的东西，是柯巴发往国外的关于维波尔格区 46 名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秘密会议的非常简短的消息。一

位著名的取消派发表的讲话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在党的意义上，不需要任何组织”，因为，为了进行公开的活动，成立“倡导小组”就够了，这种小组可以负责安排公开的演讲和关于国家保险、城市政治等等问题的合法集会。据柯巴的消息说，取消派关于适应假君主立宪政体的这个方案遭到全体工作者的彻底反对，其中也包括孟什维克。在会议结束时，除了那个主要的讲话人之外，全体投票赞成建立非法的革命政党。

不是列宁就是季诺维也夫为来自彼得堡的这封信加上了下列的编者按：

“柯同志的信值得所有珍视党的人予以最大的注意……人们很难想像出对我们的和事佬与调和派的看法与希望有比此更好的驳斥了。柯同志所描述的事件是偶然的吗？不，它是典型的……”

可是，“党接到这种肯定的情报”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们感激柯同志提供这种情报”。苏联百科全书在提到这次报纸事件时写道：

“斯大林的信件和文章证明了战斗努力和政治路线的不可动摇的一致，这种一致把列宁和成为他的战友的那位天才连结在一起。”

为了取得这种赞扬，有必要接连出版几种版本的百科全书，在这个过程中，为数不少的编辑被消灭了。

据阿利路也夫叙述，在9月初的一天，他在回家途中注意到他的家门口有密探。他上楼到他的房间，发现斯大林和另一个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当阿利路也夫告诉他楼下有“盯梢的人”的时候，斯大林不很客气地回答说：“你怎么搞的？有些同志变成吓破胆的市僧和乡下佬。”但是事实证明，真有密探：9月9日，柯巴被捕，到9月22日，他已经在他的流放地了，这次是在

省会沃洛果达——就是说，环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很可能，这次流放只是为了他非法在彼得堡居住而给予的一种惩罚。

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继续派密使到俄国来，准备这次代表会议。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之间的联系已慢慢建立起来，但经常中断。挑衅盛行，被捕的人数极多，但是，据奥里明斯基说，先进工作者对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主张的同情立即表明，“工作者只是容忍了取消主义，而内心根本是不喜欢它的”。尽管条件极为困难，密使设法与许多地方的非法小组建立了联系。这位奥里明斯基写道：“它就像一阵新鲜空气。”

在1912年1月5日于布拉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有来自20个地下组织——大部分都是很弱的组织——的15名代表。代表们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情况：数目不多的地方组织差不多完全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有很大比例的好细，他们一等组织站稳脚跟就背叛了组织。高加索的情况特别可悲。“在齐阿土雷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奥尔忠尼启泽在报告格鲁吉亚这个惟一的工业地点的情况时这样说。“在巴土姆没有任何组织。”在梯弗里斯——“情况也是一样。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发过一张传单，没有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尽管地方小组有明显的弱点，代表会议反映了新的乐观精神：群众正在行动起来，党感到情况对它有利了。

在布拉格作出的决议决定了党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进程。首先，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建立社会民主党核心，周围要有尽可能多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据代表会议说，使2000万农民饥饿的歉收再一次证明，“……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

保证”^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驱逐出党，并号召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和色彩”，为了重建秘密的党而对取消派进行斗争。^②在这样与孟什维克完全决裂以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了拥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独立存在的纪元。

在斯大林指导下编辑的、1938年出版的最新“党史”说：

“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舍金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所。”^③

但是，在官方的党的文件汇编（1926）中，我们看到：

“会议选出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泽、维克多（奥尔金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和戈洛舍金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党史”并没有把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把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包括在中央委员会中；但是它把斯大林包括在内，而旧名单是没有斯大林的。对这个谜的解释，可以帮助说明那个时期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以及莫斯科编史工作者目前使用的方法。事实上，斯大林并没有在会议上当选，而是在会议以后不久通过所谓补选成为中央委员的。上述官方材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柯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同志和弗拉基米尔（别洛斯多茨基，前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补选入中央委员会。”

同样，根据莫斯科暗探局的材料，朱加施维里是在会议以后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1卷，中文第2版第131页。——译者注

② 参看上书，第134页。——译者注

③ 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7页。——译者注

根据中央委员所享有的补选权成为中央委员的。苏联的一切参考书都毫无例外地提供了同样的情况，直到1929年斯大林的指示（这个指示完全改变了编史工作）发表时为止。在1937年纪念代表会议召开25周年而出版的文件中，我们看到：

“斯大林不能参加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工作，因为当时他流放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当时列宁和党已经知道斯大林是一位重要领导人……因此，根据列宁的提议，会议代表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把他选入中央委员会。”

关于斯大林究竟是在会议上当选的还是在以后由中央委员会补选为中央委员的问题，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斯大林想要成为中央委员，列宁认为有必要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人选极为有限，以致二流人物也成为中央委员了。可是，柯巴并未当选。为什么？列宁远不是他的党内的独裁者。此外，一个革命政党不会容忍对自己的任何独裁！列宁在与代表们进行初步商谈以后，显然认为不提出柯巴作为候选人是比较明智的，“在1912年列宁把斯大林带进中央委员会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道，“人们对此表示愤慨。没有人公开反对此事。但是他们在谈话中表示了愤慨。”这位前外交家提供的情况一向是不值得相信的，然而它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反映了官僚的回忆和闲谈。列宁无疑遇到严重的反对。只有一件事是他能够做的：等会议结束，然后向人数不多的领导核心呼吁，这个核心不是依靠列宁的推荐，就是同意他对候选人的估计。这样，斯大林就第一次从后门进入中央委员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内组织的历史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指导党在俄国的活动。除了斯大林以外，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还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梁、奥尔忠尼启

泽和加里宁。”

贝利亚是这样说的。当我在写本章的时候，贝利亚被任命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负责人，他在学术上的这种努力是得到报答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寻找任何文件来证明最新的“党史”一再重复的这种说法，那是徒劳的。首先，没有任何人曾被置于党的机构之“首”，这样一个选举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据旧的官方参考书，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奥尔忠尼启泽、斯潘达梁、斯大林和戈洛舍金组成的一个局”。在《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名单也是这样的。在莫斯科暗探局的文件中，前面三个人——“季莫费、谢尔戈和柯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这里用的是他们的化名。有趣的是，在所有的旧名单中，斯大林一贯不是名列最后，就是倒数第二。自然，如果曾把他置于俄国局之“首”，情况当然就不会是这样的了。戈洛舍金在后来的一次清洗中被开除出党的机构，他的名字也同样被排除于1912年成立的俄国局之外，他的位子为幸运的加里宁所替代。历史已成为陶瓷工人手中的陶土了。

2月24日，奥尔忠尼启泽对列宁说，他在沃洛果达访问了伊万诺维奇〔斯大林〕：“与他达成了肯定的谅解。他对于事情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指的是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柯巴得悉，他终于被补选入最近成立的“中央”。2月28日，他以中央委员的新身份从流放地逃走。在巴库稍住以后，他前往彼得堡。两个月以前，他已32岁了。

在柯巴从地方舞台升到全国舞台的同时，工人运动高涨，工人报纸有比较普遍的发展。在地下力量的压力下，沙皇当局失去了他们以前的自信，检查员的力量削弱了，进行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更广泛了。布尔什维主义公开出现了，最初是以一个周报出现

的，后来以一个日报出现。对工人发生影响的可能性立即增多。党继续处于地下，但是党报的编辑部第一次成为革命的合法的工作人员。彼得堡《真理报》这个名字影响了整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中，人们开始称布尔什维克为“真理报派”。在这家报纸存在的两年半时间内，政府把它封闭了八次，但是每次它都以类似的名称重新出现。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真理报》常常不得不只限于说一些谨慎的话和作一些暗示。但是它的地下鼓动员和传单说出了自己不能公开说的话。此外，先进的工人同时也学会了从字里行间体会意思。同西欧或美国的水平比起来，发行量4万份可能看来是太少了。但是在沙皇俄国过分敏锐的政治监视之下，这家布尔什维克报纸通过它的直接订户和读者，在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当中得到了响应。这样，年轻的革命一代就在经历过反动年代的老革命家的领导下团结在《真理报》的周围。斯大林后来写道：“1912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胜利的基础。”^①这是暗示他自己也参加了那个活动。

列宁由于还未接到斯大林逃走的消息，在3月28日抱怨说：“伊万诺维奇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②人员是很缺乏的。甚至在首都也没有合适的人。列宁在这封信中写道，在彼得堡“迫切”需要一个公开露面的人，“因为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斗争激烈而艰巨。我们既得不到情报，也缺少领导，更不能对报纸进行监督。”^③列宁当时在对《明星报》编辑部进行“激烈而艰巨”的斗争，因为这个编辑部反对与取消派进行斗争。后来，列宁再次坚持说：“赶快对《生活事业》[取消派的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3页。——译者注

②③ 《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苏·斯·斯潘达良、叶·德·斯塔索娃》。《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85页。——译者注

杂志] 进行斗争——这样胜利就有了保证。不然，我们的情况是会很糟糕的。不要怕论战……”。他当时所有的信件的基调就是这样。

我们也很可以继列宁之后重复问一遍：“他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斯大林的实际作用——像通常一样，是幕后作用——是不容易断定的，需要彻底研究一下事实和文件。他作为中央委员——即作为党的正式领导人之一——在彼得堡的职责自然也扩大到非法的报纸。然而，在向“历史学家”发出指示以前，这个情况已完全被人遗忘了。集体的记忆有自己的规律，它并不总是与党的规定吻合的。《明星报》是在1910年12月创办的，当时工业恢复的初步迹象已很明显。官方文件说，“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安排它的出版和从国外进行编辑工作方面是最密切合作的。”《列宁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列举该报在俄国的主要合作者的名字时提出了11人，其中忘了提斯大林。然而毫无疑问，他是这家报纸的工作人员之一，而且由于他的地位，是一位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在过去所有的回忆录和参考书中，也都忘记提他的名字——这种忘记在今天或许可以称为记忆力破坏所致。甚至1927年《真理报》在为纪念自己创刊15周年而出的特刊中也没有一篇文章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连社论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人们在研究旧的报刊时，有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惟一的例外，是在奥里明斯基的宝贵回忆录中发现的，奥里明斯基是与《明星报》和《真理报》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人之一，他是这样叙述斯大林的作用的：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逃走以后曾经常在彼得堡出现……他们二人在彼得堡的出现(直到他们重新被捕为止)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每次都对报纸、对党团等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这句简短的话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一个脚注里，这大概最确切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斯大林经常在彼得堡作短时的露面，对组织、对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对报纸施加压力，然后又不见了。他出现的时间太短，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组织的影响，他的主张和文章又太平凡，因此没有在任何人的记忆中留下持久的印象。当人们并非在胁迫之下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所记的并不是官僚的官方职务，而是有活力的人们的有活力的行动，生动的事实，明确的方案，具有独创性的建议。斯大林在这些方面都是不出色的。无怪乎人们所记得的是生动的原作，而不是复制品。不错，斯大林并不仅仅阐释列宁的话，但是由于他要支持调和派，他就继续在同时采取两条路线。从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所写的两封信中，我们对这两条路线已很熟悉了，那就是：同列宁在一起反对调和派；同调和派在一起反对列宁。第一个政策是公开的，第二个政策是隐蔽的。斯大林反对国外中央的斗争也没有使撰写回忆录的人得到启发，虽然这是由于一个不同的原因：所有这些写回忆录的人都积极地或者消极地参加了调和派反列宁的“阴谋”，因此希望避开党史的这一章。只是在1929年以后，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正式地位才成为对战前这一历史时期作出新解释时所依据的基础。

斯大林是不可能对报纸留下他个人的烙印的，原因很简单，他生性就不是一个报人。从1912年4月到1913年2月，据他的一位亲密同事估计，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了“不下20篇文章”，平均一个月约两篇。而且这是在局势处于高潮、生活在令人激动的每一天都提出新问题的时候！不错，在这一年中，斯大林在流放地度过了将近六个月。但是，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或者从沃洛果达向《真理报》写文章要比从克拉柯夫容易得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每隔一天就从克拉柯夫寄出文章和信件。懒散、过分谨

慎、完全缺乏写作本领、最后还有东方人的极端懒惰性，使斯大林的笔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他的文章在语气上比第一次革命的那几年更为自信了，这些文章继续具有不可磨灭的平凡的印记。

他在4月15日的《明星报》上写道：“随着工人的经济发动而来的是他们的政治发动。随着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而来的是因连纳惨案而引起的抗议、群众集会和政治罢工……无疑地，解放运动的潜在力量已经动起来了……向你们致敬，第一群燕子！”^①

象征“潜在力量”的“燕子”这个隐喻说明了我们作者的风格的特点。但是，他想说的是什么，毕竟是清楚的。斯大林在从所谓“连纳事件”得出“结论”时，分析了——像往常那样，公式主义地分析，而不顾活生生的现实——政府和政党的行动，指责资产阶级对枪杀工人“猫哭老鼠”，最后警告说：“现在，当第一次高潮正在退落的时候，曾经躲在猫哭老鼠这一烟幕后面的黑暗势力又开始出现了。”^②尽管他作的隐喻“猫哭老鼠这一烟幕”令人吃惊——文章在其他方面是中立的，因此这个隐喻似乎是特别奇怪的——，这篇文章大体上说出了应当说的话和其他许多人本来会说的话。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解说——不仅是他的风格，而且还有分析本身——的“粗糙”，人们对斯大林的著作不能卒读，像敏感的耳朵听不谐调的音乐一样无法忍受。他在一张非法的传单中写道：

“在5月1日这一天，当大自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森林和群山披上翠绿，田野和草地开遍鲜花，太阳开始更温暖地照耀，空气中感觉到新生的喜悦，大自然陶醉于舞蹈和狂欢中的时

① 《新的时期》。《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15—216页。——译者注

② 《结论》。《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42页。——译者注

候，——他们决定在今天大声地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工人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天，是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解放……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无产阶级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他们确信自己的胜利，他们镇定而坚强，他们骄傲地沿着通向乐土的道路，沿着通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①

这就是用梯弗里斯说教的语言讲话的彼得堡革命者。

罢工浪潮高涨着，党与工人的接触增多了。周报已不再能满足运动的需要。《明星报》开始筹款办日报。前杜马代表波列塔也夫写道，“1912年冬末，从流放地逃出的斯大林来到彼得堡。办一家工人报纸的工作进行得更起劲了。”斯大林本人在1922年为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中说：

“1912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里，两位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两位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和我这个中央委员……在一起商妥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且编排了该报的创刊号。”^②

这样，斯大林自己就肯定《真理报》编辑方针是他负责制订的。这个方针的实质可以总括如下：“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不错，4月22日，就在《真理报》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本人被捕。但是，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内，《真理报》是忠实于他与别人联合制订的这个方针的。“取消派”这三个字从这家报纸的词汇中勾消了。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必须同取消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

① 《五一万岁！》。《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09—210页。——译者注

② 《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106页。——译者注

此，当《真理报》起初硬要从伊里奇的文章中删掉同取消派的争论部分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他给《真理报》写去了一些气愤的信。”^①其中一部分——显然是一小部分——总算发表了。她还抱怨说，“有时候——虽然这种情形不多——伊里奇的论文杳无音信；有时候，压下他的稿子，不马上登载出来。遇到这种时候，伊里奇就焦急，给《真理报》写去气愤的信，但无济于事。”^②

同《真理报》编辑部的斗争是同《明星报》编辑部的斗争的直接继续。列宁在1912年7月11日写道，“向工人们隐瞒分歧……是不应当的、有害无益的、可笑的”^③。几天以后，他要求编辑部的秘书莫洛托夫（现在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说明这家报纸为什么要“顽固地、不断地删掉我的以及其他同事的文章中提到取消派的那些话呢？”^④同时，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即将到来。列宁警告说：“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无疑将一直与对取消派的斗争同时进行。这将证明是先进工人的最重要的问题。可是他们的报纸却保持沉默，避免‘取消派’这三个字！……规避这些问题就是自杀。”

列宁在克拉柯夫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党的调和派上层人物沉默地、然而顽固地进行的阴谋。但是他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工人运动的迅速恢复必然要尖锐地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不仅使取消派失去立足之地，而且也使调和派失去立足之地。列宁的力量不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230页。——译者注

③ 参看《致〈涅瓦明星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13页。——译者注

④ 《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23页。——译者注

在于他有能力建立一个机构——他也知道怎样来做这个工作——而在于他有能力在一切危急关头利用群众的活力来克服任何政党都有的缺点和保守性。这次也是这样。在工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在克拉柯夫的鞭策下，《真理报》勉强地、在不断进行抗拒的情况下开始慢慢放弃它的中立立场。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度过了两个多月。7月2日，他出发前往新的流放地，流放期为四年。这次要穿过乌拉尔，这是在托姆斯克省的北部——在纳赖姆地区，该地区因森林、湖泊和沼泽而著名。我们已经认识的维列沙克在科尔帕谢沃村再次会晤了柯巴，后者在前往他的目的地途中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天。这里有斯维尔德洛夫、伊·斯米尔诺夫和拉谢维奇，全是老布尔什维克。当时很难预言：拉谢维奇会死在斯大林流放他的地方；斯米尔诺夫会被他枪毙；而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由于过早逝世才免遭同样的下场。维列沙克写道，“斯大林到达纳赖姆地区后使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活跃起来，有不少人逃走了。”在另外几个人逃走，斯大林自己也逃走了：“他差不多是公开地搭乘开春后的第一艘汽船走开了……”事实上，斯大林是在夏末逃走的。这是他第四次逃走。

他在9月12日回到彼得堡时，发现那里的局势已大大改变了。暴风雨般的罢工正在进行着。工人们再次高喊革命口号而涌上大街。孟什维克的政策显然是信誉扫地了，《真理报》的影响迅速增长。此外，杜马选举临近了。克拉柯夫已经定下了竞选运动的调子。进行争论的阵地已经选好。布尔什维克是在与取消派分开和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竞选斗争的。工人们在民主革命的三个主要口号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个口号是：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从自由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把农民争取到工人一边来——这是列宁的竞选纲领的主要思想。列宁把对细节的无微不至的注意与大胆

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实际上是彻底研究了斯托雷平选举法的一切可以利用之处和需要加以防范之处的惟一马克思主义者。在从政治上鼓舞了竞选运动以后，他在技术上逐日指导了这个运动。为了帮助彼得堡，他从国外寄来了文章和指示，派来作了充分准备的密使。

萨发罗夫（现在是失踪者之一），1912年春天在从瑞士前往彼得堡的途中在克拉柯夫停留，他在那里得悉，与列宁接近的一个主要的党的活动家印涅萨也将前往彼得堡去帮助进行竞选。“至少接连两三天，伊里奇向我们作了充分的指示。”彼得堡工人选民团代表的选举规定在9月16日进行。印涅萨和萨发罗夫在14日被捕。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但是警察局还不知道逃出流放地的斯大林已于12日来到这里。工人选民团的代表选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①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多谢斯大林。”她只是把这两句话并列起来。这是一种消极自卫措施。我们在前杜马代表巴达也夫的回忆录的新版本中看到：“在若干工厂中临时举行的集会上，最近从纳赖姆逃出的斯大林讲了话。”（第一版没有这句话）据迟至1937年才写回忆录的阿利路也夫说：“斯大林直接掌握了第四届杜马的整个的繁重竞选工作……斯大林非法地住在彼得堡，没有一个肯定的永久住所。他不愿在一次拖长了的工人集会结束以后在深夜去打搅他的任何亲密同志，而且也由于考虑到他是在进行秘密活动，他常常在某个酒馆里喝一杯清茶度过一夜的其余时间。”他在这里有时也“坐在充满了烟味的酒馆里打个盹。”

在竞选的初期需要与选民直接接触的时候，斯大林不可能对选举问题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差的演说家，而且还因为只有四天的时间供他支配。他弥补了这一点，他在多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译者注

层选举制的后期起了重要作用，只要有必要，他就鼓动选民团代表，依靠非法的机构，通过从幕后指挥的办法来指导他们。在这个活动中，斯大林无疑证明自己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合适。

竞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是《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巴达也夫在他的初版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托书是由中央委员会写成的，但是在新版的回忆录中，他说委托书是斯大林个人写的。委托书非常可能是集体努力的产物，在这个集体努力中，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拥有最后决定权。

委托书说：“我们认为俄国正处在必将到来的群众运动的前夜，这一运动也许比1905年更加深入……这一运动的先锋，也像1905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国解放事业休戚相关的多灾多难的农民。”^①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说：“一定要把这份……委托书用大号字登载在显著的地位。”^②省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委托书。在这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斯大林也作为一个政论家更积极地活动起来；我在一周中在《真理报》上看到他的四篇文章。

彼得堡的选举结果，像各个工业地区一样，是十分良好的。在最重要省份中的六个省份里（共包括工人阶级的4/5左右），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当选了。七个取消派主要是由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选票而当选的。斯大林在写给在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的信中说：“和1907年的选举不同，1912年的选举恰巧是在工人革命浪

① 《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45—246页。——译者注

② 《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6页。——译者注

潮兴起的时候举行的。”^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没有什么抵制倾向的工人积极地为选举权而斗争。政府委员会企图宣布彼得堡的某些最大工厂中的选举结果无效。工人们以一致的抗议罢工相对抗，这个抗议罢工达到了目的。这封信的作者继续说，“应当指出，罢工运动是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发起的。”^②这里指的是斯大林自己。他为竞选运动作的政治结论是：“革命的民主社会党生气勃勃而强大有力，这是第一个结论。取消派在政治上破产，这是第二个结论。”^③这是正确的。

这七名孟什维克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想要把这六名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工人）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11月底，列宁亲自写信给瓦西里也夫〔斯大林〕：“既然我们拥有工人选民团方面的全部六名代表，就决不能默默地服从某些西伯利亚人^④。六人团既然受到多数的压制，它就应当提出强硬的抗议……”^⑤斯大林对这封信的答复，像对其他信的答复一样，仍然是郑重保管着的。但是列宁的呼吁并未得到同情：这六个人认为与那些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的团结高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独立。在《真理报》发表的一项特别决议中，统一的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团结是一个迫切的需要”，表示自己赞成将《真理报》与取消派的《光线报》合并，并且作为朝这个方向走的一步，建议它的

① 《彼得堡的选举》。《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69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270页。——译者注

③ 同上书，第281页。——译者注

④ 指在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他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原编者注

⑤ 《致约·维·斯大林的信》。《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84页。——译者注

全部成员都成为两家报纸的撰稿人。12月18日，孟什维克的《光线报》在它的撰稿人名单上胜利地公布了四个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字（两个拒绝刊登自己的名字）；孟什维克派成员的名字同时在《真理报》的报头上出现。调和主义再次获胜，这在实质上意味着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精神和文字的失败。

不久，《光线报》的撰稿人名单上又出现了一个名字——高尔基的名字。这使人感到是一个阴谋。“你怎么与《光线报》搞在一起了呢???”列宁写信给高尔基，打上三个问号。“难道你可能是在步代表们的后尘？可是他们完全是上当了！”在调和派取得这个暂时的胜利的时期，斯大林在彼得堡执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和对《真理报》的控制权。没有任何人透露过关于他对严重打击了列宁的政策的一些决定表示抗议的任何情况——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调和派阴谋的幕后鼓动者是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代表后来为他的犯罪行为辩解说：“像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我们的决定……是与我们当时有机会与之讨论我们的活动的那些党内人士的态度一致的……”这个转弯抹角的说法暗指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局，首先是暗指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谨慎地声辩说，罪责不应从领导人身上转移到被领导者的身上。

几年以前，人们在苏联报纸上注意到，对于列宁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及与《真理报》编辑部进行的内部斗争的历史没有作充分的说明。最近几年，有人采取了一切行动使得作这样的说明比过去更加困难。列宁在那个重要时期的信件还没有全部发表。在历史学家手中的，只有在实行极权主义控制以前由于某种原因从档案中拿出的那些文件。但是，即使从这些零星的不全的材料中，也可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列宁的倔强只是他的现实的远见的另一面。他坚持沿着在最后摊牌时一定会成为内战的战线的那条线划清界线。经验主义的斯大林生性就是不能采取长远看法的。

在竞选期间，他对取消派大力进行了斗争，为了能选上他自己的代表，这是一个获得重要的支持的问题。但是，一旦他的组织任务完成，他就认为没有必要引起新的“内部纠纷”，特别是因为处在革命浪潮影响之下的孟什维克看来也倾向于讲不同的语言了。的确，没有理由“在墙上爬了”！对列宁来说，他的整个政策使群众受到了革命教育。只要在选举以后，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仍然是联合的，竞选斗争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他认为，有必要在每一步、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给工人各种机会，使他们相信，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所有其他政党都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克拉柯夫和彼得堡之间的最重要的矛盾之点。

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动摇是与《真理报》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巴达也夫在1930年写道：“在这个时期，具有非法身份的斯大林主持了《真理报》。”消息灵通的萨维里也夫的写法不同：“在1912年秋和1912—1913年冬，仍然具有非法身份的斯大林，实际上主持了《真理报》。在这个时期，他只短时离开，前往国外，前往莫斯科和其他地方。”这些目击者的叙述是符合全部实际情况的，是不能加以怀疑的。然而，说斯大林实际主持了这家报纸却是不确实的。实际主持这家报纸的是列宁。他每天都寄出文章，对别人的文章进行批评、建议、指示和更正。斯大林是一个懒于思考的人，他不可能跟上源源不断提出的这些建议和主张，这些建议和主张有9/10在他看来是多余的、是夸张的。编辑部基本上是保持一种守势。它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设法顿挫克拉柯夫的政策的光芒。列宁不仅知道怎样保护这些锋芒，而且还知道怎样使这些锋芒重新锋利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成为调和派反对列宁的压力的行动的秘密鼓动者。

《列宁全集》编辑委员会（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萨维里也夫）说，“由于在竞选结束时对取消派采取的软弱立场以及由于向前进

报派提出了为《真理报》撰稿的要求而产生了新的矛盾。1913年1月在约·斯大林离开彼得堡以后，关系更坏了……”。“更坏了”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说法证明，甚至在斯大林离开以前，列宁与编辑部的关系并不是友好的。但是斯大林用各种办法避免使自己成为“标的”。

编辑部成员从党的意义上说是一些没有什么影响的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偶然而来的人物。列宁要是撤换他们，本来是不难的。但是他们在党的上层人物的态度中和在这个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上得到支持。斯大林与编辑部和党团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与斯大林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会意味着改组党的参谋部。因此，列宁的政策尽管是坚定不移的，却是很谨慎的。11月26日，他“感到非常痛心”^①地斥责了编辑部，因为它没有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开幕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其实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是完全不困难的，《真理报》编辑部也知道代表大会是在星期日开幕。”^②斯大林无疑真正感到惊奇。国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然而，主要的摩擦原因并不是这种偶然的、虽然是一再发生的错误，而是在对党的发展进程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只有具有大胆的革命看法的人才感到列宁的政策是有意义的；从报纸的发行或从建立组织的观点来看，这看来只能是极为过分的。斯大林在内心深处继续把列宁这个“侨居国外的人”看作是一个宗派主义者。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当时发生的一个微妙的插曲。在这几年中，列宁手头是很拮据的。当《真理报》能够自立的时候，编辑部规定给它的鼓动者和主要撰稿人一笔酬金，这笔酬金虽然数目

①② 《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9页。——译者注

不大，却是他的主要财政支柱。正当冲突变得十分尖锐的时候，这笔钱就不汇了。虽然列宁对这种事情是极为敏感的，他却不得不相当坚持地提醒他们注意他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应寄的钱寄来。耽误会使我们陷入窘境。请不要耽误。”^①不能认为扣钱不寄是一种财政惩罚（虽然后来斯大林当权时，曾毫不犹豫地一再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即使这不过是疏忽问题，它却充分说明了彼得堡和克拉柯夫之间的关系。的确，这种关系远不是友好的。

在斯大林前往克拉柯夫出席在党的总部举行的会议以后，列宁对《真理报》的愤慨立即在他的信件中公开化了。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抗拒的印象，即列宁只是在等待斯大林启行，以便与彼得堡的那一窝调和派决裂，同时保持与斯大林达成和平谅解的可能性。在消除了这个最有势力的敌人以后，列宁马上对彼得堡编辑部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在1月12日写给彼得堡的一个亲信人物的信中，提到《真理报》在关于纺织工人报纸方面所犯的“不能原谅的错误”，坚持要纠正“你们的愚蠢”等等。这封信完全出自克鲁普斯卡娅的手笔。后来，列宁亲笔写道：“我们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我们不想答复。必须赶走他们……我们对于没有关于改组编辑部的计划的消息极为不安……改组，更好的是，完全赶走全部旧人，这是极为必要的。它办得糟极了。他们赞扬崩得和《时报》（机会主义的犹太刊物），这完全是卑鄙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光线报》，他们对于文章〔即列宁本人写的文章〕的态度是恶劣的。我简直失去耐心了……”这封信的语气表明，列宁的愤怒——他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克制自己——达到了极限。对这家报纸的严厉批评是关于斯大林负责直接监督它

^① 《致〈真理报〉编辑部》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80页。——译者注

的整个时期的。写“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的那个人的姓名还没有透露，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不大会是斯大林写的，他太谨慎了，不会这样做；此外，当时他非常可能已经离开彼得堡。更可能的是，这封信是莫洛托夫写的，他是编辑部的正式秘书，他像斯大林一样性情粗暴，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灵活。

从列宁信中另外一些话里可以清楚看出，他现在是多么坚决地要处理长期存在的矛盾：“对款项的管理采取了什么行动？谁拿去了订报费？它在谁手里？一共有多少？”列宁显然并不排斥决裂的可能性，他很关心把财政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并未决裂。感到狼狈的调和派根本未敢想到这一点。消极抵抗是他们的惟一武器。现在，甚至这个武器也要从他们的手中打掉了。

克鲁普斯卡娅答复什克洛夫斯基从伯尔尼寄来的悲观信件，并说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并不像看来那样糟糕。她在信的开头承认，“当然，《真理报》办得很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表示意见是一致的，像是不容置辩的。“每一个人都是编辑人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作家……工人对《光线报》的抗议没有发表，以避免论战。”但是，克鲁普斯卡娅答应要在最近的将来进行“重大改革”。这封信是在1月19日写的。第二天，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写信到彼得堡说：“……必须建立自己的《日报》编辑部，撤掉目前的编辑部。现在情况糟透了……没有自下而上实现统一的运动，是愚蠢的和卑鄙的……难道这些编辑是人吗？不是人，而是可怜的废物，事情就坏在他们手里。”^①这就是列宁在想要表明他要斗争到底时所采用的文风。

同时，他在作了周密的布置以后对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调

^① 《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37页。——译者注

和主义开火。早在1月3日，他写信到彼得堡说：“务必无条件地发表我们寄给你们的巴库工人信件……”。这封信要求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与《光线报》决裂。巴库工人指出，在五年中，取消派“一直千方百计地重申党已死亡。”工人们问道：“现在他们为什么要求与死尸团结呢？”这个问题十分中肯。列宁则坚持问道，“这四位〔代表〕什么时候退出《光线报》呢？难道我们必须再等下去吗？……甚至从遥远的巴库，有20名工人也在抗议了。”这样假定是不会错的：在通过写信未能使这些代表与《光线报》决裂以后，列宁在斯大林仍在彼得堡的时候慎重地开始动员下层工人。毫无疑问，巴库工人是由于列宁的倡议而抗议的——列宁选择巴库也并非偶然！此外，他们不是把抗议信寄往巴库领袖柯巴所负责的《真理报》编辑部，而是寄往在克拉柯夫的列宁。冲突的复杂性已极为明显。列宁前进了。斯大林则玩弄手法。在调和派抗拒（这种抗拒不是没有得到取消派无意中的帮助，取消派愈来愈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情况下，列宁不久就诱导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抗议下辞去他们担任的《光线报》撰稿人的职务。但是他们继续受到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取消派多数的纪律的约束。

列宁为最坏的情况甚至为分裂作好了准备，他像以往一样，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使麻烦尽可能少，使牺牲者的人数尽可能少。恰恰就是为这一点，他才首先要求斯大林到国外去，这样，他就能够使斯大林了解，在即将进行的“改革”期间，他最好离开《真理报》。同时，另一位中央委员被派往彼得堡——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这个重要的事实得到官方的证实。《列宁全集》第16卷的注释说，“为了改组编辑部，中央委员会派斯维尔德洛夫前往彼得堡。”列宁写信给他说：“今天得知《日报》已开始进行改革。多多致意，深表祝贺，并祝成功……你们无法想像，同一个暗中作对的编辑部合

作，使我们吃了多少苦头。”^①这是积聚的怨恨与宽慰感相交织的一些话，列宁这样就解决了在整个困难时期与编辑部的争端，而在这个时期中，就像人们告诉我们的，“斯大林实际上主持了这家报纸”。

季诺维也夫在1934年（当时他已有杀身之祸）写道：“写这些句子的人清楚记得，斯大林到达克拉柯夫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列宁倍加高兴——因为在斯大林离开彼得堡期间，他能够在那里进行他的微妙的开刀手术，并且因为他大概能够不对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任何改组而做到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在简略而谨慎地叙述斯大林在克拉柯夫居留情况的时候写道（好像是无意中加上的）：“伊里奇当时正因《真理报》而生气，斯大林也因《真理报》生气。他们商谈如何把事情搞好。”^②意味非常深长的这些话，尽管有意说得晦涩，显然是说得更明白的文本中仅存下来的东西，那个文本已由于检查员的要求而搁置起来。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来看，不可能怀疑列宁和斯大林“生气”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每人都在设法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但是，这场斗争太不势均力敌了，斯大林不得不退却。

他奉召参加的会议从12月28日开到1913年1月1日，参加的有11人——中央委员、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著名的地方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由于革命的高涨而产生的一般政治问题外，还讨论了党内生活的尖锐问题——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党报、对取消派和对“团结”的口号的态度。主要的报告是列宁作的。必

① 《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44页。——译者注

②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1页。——译者注

须认为，杜马代表和他们的领袖斯大林不得不听取不少辛酸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以友好口气说出来的。看来，斯大林在会议上保持了平静，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谦逊的巴达也夫在他的初版回忆录（1929）中甚至没有把斯大林列在与会者名单之内。此外，在紧急情况下保持沉默是斯大林的得意作法。会议的记录和其他文件“尚未发现”。非常可能，已经采取特别措施务使这些文件不被发现。克鲁普斯卡娅在那个时期寄往俄国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在这次会议上，地方领导人所作的报告是十分有趣的。人人都说群众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在选举期间已很明显，到处都有自发成立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是与党没有关系的，然而它们在精神上是党的组织。”至于列宁，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指出，会议“是非常成功的”，“将起它的作用”。他首先所想到的，是解决党的政策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警察局通知它驻国外机构的负责人说，尽管他上次提出了报告，波列塔也夫代表并未参加会议，下列的人参加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克鲁普斯卡娅；马林诺夫斯基代表、彼得罗夫斯基代表和巴达也夫代表；洛波夫，工人麦德维捷夫，俄国炮兵中尉特罗雅诺夫斯基^①，特罗雅诺夫斯基的妻子^②和柯巴。有趣的是名字排列的次序：在警察局的名单上，柯巴的名字列在最后。在《列宁全集》（1929）的注释中，他的名字列在第五，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之后，虽然当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早已失宠了。在最近时期的名单中，斯大林总是居第二位，紧跟在列宁之后。这些变动相当

① 亚历山大·阿·特罗雅诺夫斯基，苏联驻日大使，以后是驻美大使。——原编者注

② 不是华盛顿外交界认识的特罗雅诺夫斯基夫人，而是叶琳娜·罗兹米罗维奇，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原编者注

清楚地说明他是怎样发迹的。

警察局想要用这封信表明，彼得堡对于在克拉柯夫进行的活动比它在国外的奸细有更清楚的了解。无疑，马林诺夫斯基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作为奸细的真正身份只有警察总部中的最高级人物知道。不错，与他接触过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早在反动年代就怀疑他了，但是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证实他们的怀疑，他们的怀疑减少了。1912年1月，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马林诺夫斯基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代表会议，列宁急切地把握了这个有才干、有魄力的工人，并帮助提出他作为杜马选举的候选人。警察方面也支持它的奸细，逮捕了所有可能与他竞选的人。莫斯科工人的这位代表一度在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建立了他的威信。马林诺夫斯基在从列宁那里收到拟好的议会演说稿以后，就把稿子送交警察局长审阅。警察局长起初企图作一些修改；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制度把每个代表的独立权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因此，虽然这位社会民主党代表是暗探局的最好的告密者，暗探局的这个奸细也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演说家。

1913年夏，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再次对马林诺夫斯基产生怀疑；但是由于缺乏证据，这个问题又搁置起来。后来政府本身害怕此事可能暴露，害怕暴露之后产生政治丑闻。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上司的命令，在1914年5月向杜马主席提出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辞去代表职务。关于他扮演的角色的谣言再次传播开来，而且传得很盛，这次还在报上登载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前往国外会见列宁，要求调查。他显然与他在警察局的上司共同规定了他的行动方针。两周以后，彼得堡的党报发表了一封电报，电报间接地宣布，中央委员会调查了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以后，深信他个人是正直的。又过了几天，一项决议发表了。决议大意说，马林诺夫斯基由于故意辞去代表职务，“已使自己处于有组织的马克

思主义者的队伍之外”。用合法的报纸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开除出党。

列宁的反对者对列宁进行了长期的和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庇护”马林诺夫斯基。警察密探参加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是参加中央委员会，当然是党的一个重大灾难。事实上，斯大林最后一次流放就是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出卖。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派系的敌对而复杂化的猜疑毒化了地下组织的气氛。没有人提出对马林诺夫斯基不利的直接证据。毕竟不可能根据含糊的猜疑而宣布一个党员政治上的——或许甚至是肉体上的——死刑。而且由于马林诺夫斯基居于负责地位，而党的声望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他的声望，列宁认为，他有责任以他一向是出色的力量来为马林诺夫斯基辩护。在君主政体被推翻以后，马林诺夫斯基为警察局服务这一事实完全得到证实。十月革命以后，这个奸细在从德国俘虏营回到莫斯科时，根据法庭的命令被枪决了。

尽管缺乏人员，列宁并不急于派斯大林回俄国。必须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拉柯夫会议以后也不急于回到他从前工作的地方，这次会议明确无误地（不管是多么间接地）谴责了他的政策。像往常一样，列宁尽了他一切力量使这位被打败的人作一次体面的退却。报复是同列宁的性情格格不入的。为了使斯大林在这个重要时期留在国外，列宁使他对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发生了兴趣——这完全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一种安排！

高加索有几十个半开化的、原始的然而迅速觉醒的民族。斯大林是高加索人，列宁无须向他证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独立的传统继续在格鲁吉亚发扬光大。柯巴本人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具有革命冲动的。他的假名就源起于他自己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

的斗争。不错，据伊雷马什维利说，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他对研究格鲁吉亚问题变得冷淡了，“民族解放……对他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不想对他取得权力的意志施加任何限制。俄国和全世界今后必须是他追求的目标。”伊雷马什维利显然预见到晚得多的时候的事实和态度。不容置疑的一点是，柯巴在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就放弃了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这样浪漫主义继续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毫无生气的社会主义协调地和平共处。但是，在抛弃了格鲁吉亚独立的主张以后，像许多大俄罗斯人一样，柯巴不能够继续对民族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因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俄罗斯人等等之间的关系经常使高加索的革命活动复杂化。

在他看来，柯巴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但是，他在感情上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了吗？大俄罗斯人列宁是不能容忍可能伤害被压迫民族的感情的任何玩笑或奇谈的。斯大林具有的吉第里洛村农民气味太重了。当然，在革命前的年代，他是不敢玩弄民族偏见的，后来在他已经当权的时候才敢这样做。但是这种性格甚至在当时已经在小问题上表现出来。在提到孟什维克中的犹太人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时候，柯巴写道：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开玩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妨在党内来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①

甚至现在也不可能不感到惊奇：在为了写给高加索（那里的气氛充满了民族仇恨情绪）工人看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竟引述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53页。——译者注

了这样一个极为可疑的玩笑。此外，这不是偶然不够机智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洋洋得意地拿代表大会关于没收土地的决议“开玩笑”，目的是要消除高加索战士的怀疑。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巴库的孟什维克当时是由犹太人领导的，作者想用他关于反犹太的暴行的“玩笑”来使他的反对派在落后工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这比通过说服教育争取他们要容易，斯大林在一切事情上总是寻求会遇到最小阻力的办法。可以补充一句，阿列克辛斯基的“玩笑”也不是偶然的，这个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对分子和反犹太分子。

自然，柯巴在他的政治活动中维护了党的正式立场。可是在他出国以前，他的政治文章从未超过日常宣传的水平。现在，只是在列宁的倡议下，他才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来对待民族问题。他对高加索的复杂民族关系的直接了解无疑使他比较容易在这个复杂的领域进行探讨，在这个领域中，制订抽象的理论是特别危险的。

在战前欧洲的两个国家，即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中，民族问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这两国中，工人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在理论方面，以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认为，民族是与领土、经济和阶级无关的，把它变为受所谓“民族性格”限制的抽象概念。在民族政策方面，以及在一切其他方面，它并不想超越对现状的纠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害怕瓜分这个帝国的想法，力图使它的民族纲领适应于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所谓“民族文化经济”的纲领规定，同一民族的公民，不管他们是怎样分布在奥匈帝国的领土，不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分区是什么，应当在纯个人特点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解决他们的文化任务（剧院、教堂和学校等等）。这个纲领是不自然的、空想的，因为它企图在一个为社会矛盾所

分裂的社会中把文化与领土和经济分离开来；它同时也是反动的，因为它使同一国家的工人被强迫分裂为各种民族，破坏了他们的阶级力量。

列宁的立场与此截然相反。他认为，民族与领土、经济和阶级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并不认为，历史形成的国家（它的疆界横切了各民族的有机躯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要求承认国家的每一个民族单位有权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由于各个民族自愿地或者由于必要而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共处，他们的文化利益必须在最广泛的区域自治（因而是地域自治）——包括在法律上保障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的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列宁认为，某一国家的全体工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的不容争辩的义务是团结在同一个阶级组织里。

民族问题在波兰特别尖锐，这个问题由于波兰的历史命运而恶化了。以约瑟夫·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所谓波兰社会党热烈主张波兰独立；波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的黠武民族主义的暧昧的附属物。另一方面，波兰社会民主党（它的领导人是罗莎·卢森堡）提出了关于波兰地区实行自治作为民主俄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要求，与波兰独立的口号相对抗。卢森堡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的：在帝国主义时代，波兰与俄国分离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而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分离则是不必要的。她认为，“自决权”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持续了好几年。列宁坚持说，帝国主义在各国、各地区和各个生活方面的统治并不是相似的或者同等的；过去的遗产是各种历史时代累积起来的和互相交错而产生的东西；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凌驾一切，它并不代替一切；尽管帝国主义进行统治，许多民族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解决；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波兰也可能独立，这取决于国内和国际局势。

列宁的看法是，自决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在民族关系方面的应用。在资本主义下，真正的、完全的和全面的民主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弱小民族的民族独立同样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甚至在帝国主义下，工人阶级并不拒绝为民主权利——包括每一民族独立存在的权利——而斗争。而且，在我们的星球的某些部分，正是帝国主义自己使民族自决的口号具有了特殊意义。虽然西欧和中欧在19世纪总算设法解决了它们的民族问题，但是在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民族民主运动到20世纪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否认民族自决权实际上就等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的殖民地，并且一般地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

在反动时期，俄国民族问题大大恶化了。斯大林写道：“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用来报复‘爱好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逆流，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①这是由于宗教祭礼谋杀案而对基辅的犹太人贝里斯进行审判的时候。回想起来，从文明的最新成就特别是在德国和苏联的成就看来，那次审判在今天看来差不多是人道主义的实验。但是在1913年，它震惊了全世界。民族主义的毒素也开始影响工人阶级的许多部分。感到惊恐的高尔基写信给列宁，认为必须反击这种沙文主义的狂暴行动。列宁回答说：“关于民族主义，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我们要在这方面加把劲。”^②这里指的是斯大林。高尔基是长期与党

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89—290页。——译者注

② 《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243页。——译者注

有联系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但是，他显然完全不知道斯大林，因此列宁不得不使用“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这样一个不称名道姓的、虽然是恭维性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是列宁按民族来称呼一个著名俄国革命者的仅有的一次。当然，他心中所想的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而是高加索人。这个原始因素无疑吸引了列宁；无怪乎他这样厚道地对待卡莫。

斯大林在国外居留的两个月中，写了一篇很短的、然而是很锋利的论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为合法杂志写的，所以它的用词很谨慎。尽管这样，它的革命倾向是极为明显的。作者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定义与符合奥地利学派精神的抽象心理的定义对抗。他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把民族的心理特点与它的地理和经济发展条件混合起来的这个复合定义，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效果的，因为这样，每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从改变它的生存的物质条件（从地域开始）方面来寻求。布尔什维主义从不沉迷于国家边疆的崇拜。在政治上，问题是根据民族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在地域上、政治上和行政上改造沙皇帝国这个民族监狱。

无产阶级政党并不责成各个民族留在某一国家的疆界之内或者与它分离，这是各个民族自己的问题。但是它认为，它必须帮助每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真正民族愿望。至于与一个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这是具体历史情况和力量对比的问题。斯大林写道：“谁

^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4页。——译者注

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①

保障自愿留在民主俄国疆界之内的民族的利益的办法将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区域自治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而是为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②各个地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地域自理是与民族只在“文化”问题上的超地域的即纯精神的自理相对立的。

但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最直接和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布尔什维主义主张各民族的工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紧密地和不可分割地团结在党和工会中。“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③

奥国“文化自治”纲领的目的之一，是“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的发展。”^④布尔什维主义惊异地问道：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把人类的各个民族部分分离开来决不是我们的事情。不错，布尔什维主义坚持，每个民族应有分离权——有这个权利，但是没有这个义务——作为防止压迫的一种最后的和最有效的保障。但

①②③④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页。——译者注

是，人为地保存民族特点是与布尔维主义格格不入的。必须利用消除任何民族压迫或侮辱——甚至是变相的，甚至是精致和实际上是“无可估量的”民族压迫或侮辱——的行动来实现各民族的工人的革命统一，而不是实现他们的分离。只要是存在着民族特权和侮辱，各民族就必须有彼此的分离的可能，从而他们可以使工人便于为了各民族的亲密无间而自由地统一起来，其遥远的前景是，最后各民族溶而为一。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它在十月革命中充分表现了它的力量。

奥国纲领只是透露了它的弱点：它既未拯救哈布斯堡帝国，也未拯救奥国社会民主党。奥国纲领培植无产阶级民族集团的特点，同时未能真正满足被压迫民族，它只是掩饰了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正像斯大林正确指出的，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①但是，应当十分公正地指出，作者在批评他的反对者对“民族特点”的关心时，对他们的思想作了显然是过分简化的解释。他说，“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自己打自己的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②事实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心中所想的当然不是保存这种显然是反动的残余。至于“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正是斯大林后来把它“发展”到人类历史上或许没有任何人发展到的那种程度。但是，这属于另外一套思想。

这篇论文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对他的宿敌诺·饶尔丹尼亚进行论战的，饶尔丹尼亚在反动年代开始倾向于奥国纲领。斯大林接连举例说明，民族文化自治“一般说来……如果从高加索的条

^{①②}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24页。——译者注

件来看，那更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①他对犹太崩得的政策批评也是同样坚决的，崩得不是按照地域原则而是按照民族原则组织的，它企图强使全党接受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主义，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来实行改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②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说是他的惟一的——理论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40页）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没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之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谜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

列宁在他一生中两次与他的亲密合作者、高级理论家决裂。第一次是在1903—1904年，当时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老权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决裂了，并与杰出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决裂了；第二次是在反动年代，当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和罗日柯夫这些非常有资格的作家全都离开他。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是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列宁处在困境。无怪乎他急切地抓住在制订党纲的某一问题方面可能有用的任何青年同志。

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42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357—358页。——译者注

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月，研究民族问题，熟悉了在那里的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雅诺夫斯基夫妇。”^①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这位克鲁普斯卡娅又说：“我回忆起伊里奇对待缺乏经验的作者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帮助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至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在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别人。例如，他想委托谁写一篇论文，但没有把握那人是否写得出，于是先同那人详细地谈论这一题目，发挥自己的想法，引起那人的兴趣，充分试探以后，然后建议说：‘您写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好不好？’作者甚至觉察不出同伊里奇的预先谈话给了他多大帮助，觉察不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进了伊里奇的话，甚至采用了他的表达方式。”^②当然，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她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的导师的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办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

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夫与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1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34页。——译者注

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语，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可能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布哈林与列宁不同，倾向于学者风格；对布哈林来说，文章的结构是由它的政治利益或论战利益决定的。布哈林的影响并没有超过这一点，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接近罗沙·卢森堡的程度要比接近列宁的程度大得多。特罗雅诺夫斯基参加的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与斯大林接触的。过了几年，在情况改变以后，这种接触使这位不重要的和不稳定的特罗雅诺夫斯基得到了一个最负责的外交职务。

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到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他的笔迹。作者机械地写进去的某些句子，或者显然是校改者所写的某些句子，如果不参考列宁的相应著作，那看来就是出人意外的或者是无法理解的。斯大林未作任何解释就写道：“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①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对俄国革命进程的相对影响这个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完全是列宁的，而且他在反动年代曾作过无数次阐释。在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一度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俄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俄罗斯人并未

^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14--315页。——译者注

遭受过民族压迫，相反，压迫了其他民族；但是，遭受农奴制的沉重压迫的却正是大俄罗斯广大农民群众。这个思想的真正创造者不会不提出证据、也不加评论（好像顺便作为一个通论而提出似的）就发表这样一个复杂的和经过认真考虑的思想。

长期与列宁一起生活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学到了列宁的思想，进而学到了他的用语，甚至学到他的笔迹。对斯大林却不能这样说。当然，他也是靠列宁的思想生活的，可是在离开列宁很远的地方生活，他只是在需要这些思想来达到他自己的独立目的时，才利用这些思想。他太倔强、太顽固、太愚笨、太呆板，因而学不到他的老师的写作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对他的文章的修改，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像破烂不堪的旧布上的鲜艳补丁”。揭露奥地利学派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人无疑是列宁。其他一切简单的、然而是有关系的公式也是列宁提出的。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关于鲍威尔对民族所下的“相对的性格共同体”这一定义，我们在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话：“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①这句话是列宁写的。在这以前和以后，斯大林都没有表示过像这样的意见。而且，在提到鲍威尔对自己的民族定义所作的折衷的修正时，文章评论说：“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②人们不会看不出这是列宁的手笔。关于称工人的民族组织形式是“同志情感的学校”这个说法也是这样。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尽管有许多尖刻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像具有兔子颜色的变色龙、潜在的燕子和泪水做成的烟幕这样的话；列宁把所有这些华丽词藻统统

①②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8、300页。——译者注

删去了。自然，原来的手稿和所作的修改能够加以隐藏，但是无论如何隐藏不了列宁的手笔，也隐藏不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在他被监禁和流放的那些年代中，没有写出那怕是与他在维也纳和克拉柯夫的几周中所写的这篇著作无可比拟的任何东西。

2月8日，在斯大林仍在国外的時候，列宁向《真理报》编辑部祝贺，“近日来在整个报纸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进步”^①。这些进步是原则问题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对取消派的斗争上。据萨莫伊洛夫说，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担任了实际的主编的责任；他当时仍具有非法身份，一直待在一个“不可侵犯”的代表寓所里，整日忙着处理报纸的稿子。“此外，他在一切个人事物方面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这是正确的。关于斯大林，萨莫伊洛夫却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而他与斯大林的接触是很密切的，而且对斯大林是十分尊敬的。2月10日，警察进入了“不可侵犯”的寓所，逮捕了斯维尔德洛夫，不久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无疑是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告密。2月底，已从国外归来的斯大林也与这些代表住在一起。萨莫伊洛夫叙述说：“他在我们〔杜马〕党团和《真理报》的生活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不仅参加了我们在寓所里安排的一切会议，而且还经常冒很大危险前去参加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会议。在那里，他在反对孟什维克的争论中和在其他各种问题上维护了我们的立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斯大林发现彼得堡的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先进的工作者坚定地支持斯维尔德洛夫根据列宁的授意而进行的改革。《真理报》有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调和派遭受了挫折。斯大林甚至没有考虑

^① 《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45页。——译者注

真正为他在两个月以前被迫放弃的立场进行辩护。这样做是不符合他的精神的，现在他只关心保全他的面子。2月26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号召工人们“发表意见反对党团内部的分裂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实质上，这篇文章是准备使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同时把分裂的责任加在对方身上的运动的一部分。斯大林已不再受他过去的行动的约束，他企图用旧辞藻来表示他的新目的。因此，他提出“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这样一个关于分裂党团的企图的引起误解的说法。无论如何，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克拉柯夫学习以后，作者设法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改变他的路线和开始采取新政策。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机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久就被捕了。

3月，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合法的《真理报》主办下，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和晚会。萨莫伊洛夫说，斯大林“想要到那里去”，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同志。他征求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去是否安全，有没有危险？这个不忠实的顾问回答说，他认为没有危险。但是，危险是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布置的。斯大林一到，大厅里就充满了密探。同志们在给他穿上一件女人穿的斗篷以后，企图通过舞台入口把他领走。但是，他被捕了。这次他注定要销声匿迹整整四年。

在发生这次逮捕事件以后两个月，列宁写信给《真理报》说：“衷心祝贺你们的成就……改进是巨大的、确实的，但愿是稳固的和彻底的……但愿不要乐极生悲！”^①为了作完整的叙述，我们不能不引述列宁在1913年10日寄往彼得堡的信，当时斯大林已在遥远的流放地，加米涅夫负责编辑部的工作。这封信说：“这里人

① 《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77页。——译者注

人都对报纸和它的主编感到满意。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一句批评的话……人人都满意，我自己特别满意，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一位预言家。你们记得吗？”信的末尾说：“亲爱的朋友，现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六人团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上。我请你们全力以赴，不让报纸或马克思主义舆论再动摇一次。”

所引述的这一切证据都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列宁认为，报纸在斯大林负责的时候办得很糟。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向调和主义摇摆。只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报纸才开始在政治上来说办得好了。报纸在加米涅夫负责办的时候改进了，令人满意了。同样，在他的领导下，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赢得了他们的政治独立。

马林诺夫斯基在分裂党团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甚至同时起两种作用。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在写到这一点的时候说：“马林诺夫斯基执行列宁和警察局的指示，在1913年10月实现了……‘七人团’和‘六人团’之间的最后的争吵。”当时孟什维克方面一再对列宁的政策与警察局的政策的“巧合”感到高兴。既然事变的进程作出了自己的判决，旧论点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警察局希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会削弱工人运动。相反，列宁估计，只有分裂才能使工人得到所需要的领导。警察局的权谋家显然估计错了。孟什维克注定要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全面胜利了。

斯大林在最后一次被捕以前的六个多月中在彼得堡和国外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帮助进行了杜马竞选运动，主持了《真理报》，参加了在国外举行的一次重要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这半年对他个人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次负责在首都的活动，他第一次与重大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他第一次与列宁有了密切接触。他认为，自己有的优越性——这是

他作为一个现实的“有经验的人”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不由于他与这位伟大流亡者的接触而动摇。他对自己的估计更加富有批判性和更加冷静，他的野心更加隐秘了。他这个乡下佬的受伤的自负心必然掺杂了妒忌心，这种自负只是由于谨慎才有所收敛。

第六章 战争和流放

列·托尔斯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蹲着，作出奇怪的手势。他断定这个人一定是疯子。走近的时候，他才相信这个人在做必要的工作：在磨刀石上磨刀。

列宁喜欢引用这个例子。在旁观者看来，无休止的讨论，派系争吵，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内部的争论和分裂，似乎像疯子的活动。但是，事变的考验证明，这些人在做必要的工作。斗争并不像局外人看来那样在深奥的学术问题上进行，而是在革命运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

列宁和他的信徒苦心、明确地阐明了主张，划清了政治界线，因此，只有他们才作好了应付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迅速使《真理报》派取得了对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在反动年代，老一辈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斗争。取消派常常轻蔑地说，“列宁手下只有一些小伙子”。但是列宁认为，这就是他的党的一个很大的优点。革命像战争一样，必然把它的一大部分担子放在青年的肩上。不能够吸引“小伙子”的社会党是毫无希望的。

与革命政党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沙皇警察在自己的秘密信件中毫不吝啬地夸奖布尔什维克。警察局长在1913年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最有魄力、最勇敢、能够不倦进行斗争和抵抗并能够经常进行组织工作的分子，一直是……以列宁为中心的那些组织和个人……党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一切活动的永久的组织灵魂是列

宁……列宁派总是比其他派别组织得更好，在目的性方面更明确，在工人当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方面更有办法……在过去两年中当工人运动开始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比其他人更接近工人，他是首先宣布纯革命性口号的人……布尔什维克小组、核心和组织现在遍布各个城市。永久的通信联系和接触已与几乎所有的工厂中心建立起来。中央委员会几乎是正规地进行活动，而且完全掌握在列宁手中……鉴于上述情况，这一点就不足为奇：目前，整个地下党正围绕着布尔什维克组织建立起来，的确，后者实际上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于这个说法，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国外人员的通信也具有了新的乐观口气。克鲁普斯卡娅在1913年初写信给什克洛夫斯基说：“一切接触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不知怎样，你更多地感到好像是在与志同道合的人打交道……布尔什维主义的事业比以前更巩固了。”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自豪、并且昨天还嘲笑列宁是堕落的宗派首脑的取消派，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并且孤立了。列宁从克拉柯夫不倦地注视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记录并整理了所有那些可能使他了解无产阶级的脉搏的事实。他在克拉柯夫对工人报纸得到的捐款作了细心的统计，从这种统计中可以看出，在彼得堡，86%的工人读者站在《真理报》一边，只有14%站在取消派一边；在莫斯科，力量对比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在落后的省份，取消派的情况略微好些，但是整个说来，4/5的先进工人是支持《真理报》的。与“派系和思潮”相对抗的正确政策在三年中就把绝大多数先进工人团结在布尔什维主义周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些派系和思潮团结一致的抽象号召能够有什么价值呢？第四届杜马选举期间，投票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普通选民，当时67%的工人选民团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当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中的两派发生冲

突期间，5000票是投给布尔什维克的，只有621票是投给孟什维克的。取消派在首都完全被打垮了。工会运动中的力量对比也是这样的：莫斯科有13个工会，其中没有一个属于取消派；彼得堡有20个工会，其中只有无产阶级成分最小和最不重要的4个工会部分或全部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1914年初选举工人代表参加彼得堡病人福利基金会时，《真理报》的候选人完全获胜。所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集团——取消派、召回派和各种调和派分子——证明完全不能够扎根于工人阶级。因此，列宁得出了结论：“只有在反对这些集团的过程中，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在俄国形成。”

1914年春，当时的第二国际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以便就地了解工人阶级内部派系的冲突。这位机会主义的怀疑论者以比利时议会政治的尺度衡量了俄国野蛮人的争论。在他回去后的报告中说，孟什维克想要合法地组织起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权利；布尔什维克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没收土地。王德威尔得称这种分歧是“相当幼稚的”。列宁对此只有苦笑而已。不久出现的事态发展使得有可能无可争辩地考验了个人和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幼稚”意见分歧逐渐在全世界工人运动中传布开来。

列宁在1913年初写信给高尔基说：“奥俄战争对于革命（整个东欧的革命）说来将是一件极有利的事。但是弗兰茨—约瑟夫和尼古拉未必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①可是，他们毕竟这样做了，虽然这是一年半以后的事。

^① 《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34页。——译者注。

同时，工业的危机已渡过了顶点。危机的最初的潜在震动开始为人们所感到，但是它未能制止罢工斗争，相反，它使这个斗争更加富有进攻性了。光是在战争爆发前六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就有差不多 150 万罢工者。最后一次大发动是在军事动员的前夕发生的。7 月 3 日，彼得堡警察开枪射击一群工人。最重要的一些工厂响应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都举行罢工以示抗议。罢工者多达 20 万人。各处都举行集会和示威。人们还企图修筑街垒。在已成为军营的首都发生这些事件的情况下，法国总统彭加勒前来与他的皇帝“朋友”举行最后的谈判；他有机会窥视一下俄国革命的这个实验室。但是几天以后，政府利用宣战来消灭工人组织和工人报纸。首先受害的是《真理报》。沙皇政府的得意想法是用一次战争来扼杀革命。

某些传记作家断言，斯大林是“失败主义”理论或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公式的制订者，这完全是捏造，并且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斯大林的智力和政治性格。他与政治革新和大胆创造理论的精神是最不符合的，他从未预见过任何事情；他从来没有走在任何人前面。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因此向来害怕预先作出结论，宁愿在剪裁之前先量十遍。在这个革命者的内心，总是隐藏着一个保守的官僚。第二国际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斯大林是决不会主动与它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的理论的制订完全是列宁的成就的一个重要部分。斯大林没有为它贡献一个字，就像他没有为革命理论贡献一个字一样。但是，为了了解斯大林在流放年代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以后最初几个重要星期内的行动，以及为了了解他后来与一切布尔什维主义原则的决裂，有必要扼要叙述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已经制订并且已逐渐使他的党相信的一套观点。

欧洲灾难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党人是否能够承担起

“保卫祖国”的责任。这并不是每个社会党人是否应履行他作为一个士兵所负的义务的问题。他是不能做别的事情的。逃跑决不是革命的政策。问题是，一个社会党是否应当在政治上支持战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停止反对政府的斗争，鼓动“保卫祖国”。列宁回答说：不行，它不应这样做，它无权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是战争，而是因为这是反动的战争，是由想要瓜分世界的奴隶主造成的一场血腥大屠杀。

欧洲大陆上民族国家的形成包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大体上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随着 1871 年的凡尔赛和约而终结。在这个时期中，为建立或者保卫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和文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进行的战争具有进步的历史性。革命者不仅能够而且有义务在政治上支持这些民族战争。从 1871 年到 1914 年，欧洲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取得成就以后就过时了，而把自己变为垄断的或者说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完成了所能够完成的一切以后而趋向没落的一种资本主义。”没落的原因在于，生产力同样受到私有制的框框和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为了寻求出路，帝国主义就力图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接替了民族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在性质上是完全反动的，它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死胡同、停滞和腐朽。

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星球上有落后民族，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些被压迫民族争取统一和独立的斗争具有双重进步性，因为一方面它为他们自己的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可以部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明的帝国主义民主共和国与殖民地国家落后的野蛮君主政体发生的战争中，社会党人将完全站在被压迫国家（尽管它有君主政体）方面来反对压迫的国家（尽管它有“民主”）。

帝国主义用“保卫和平抵御侵略”、“保卫祖国”和“保卫民主”等等主张来掩盖它的掠夺目的——夺取殖民地，夺取市场，夺取原料基地和夺取势力范围。这些主张是完全虚假的。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①对无产阶级来说，战争的客观历史重要性是惟一具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为了什么目的？——而不是外交手法，玩弄外交手法的人是知道怎样把敌人说成是侵略者的。

帝国主义者提到民主和文化利益的话也同样是虚伪的。既然两个阵营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祖国、民主和文化，而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进行殖民奴役，任何社会党人都无权喜欢这个帝国主义阵营而不喜欢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从国际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若说哪一个国家失败对社会主义来说将是损失最小的”，那是完全无用的。为了这个设想的“较小的损失”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就是背叛人类的未来。

“民族统一”的政策在战时比在平时更加意味着支持反动派，使帝国主义野蛮制度永远存在下去。但是，不给予这种支持——这是一个社会党人的起码义务——只是国际主义的消极的或者被动的方面。光这样做是不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和战场上进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多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要表明，必须把枪口转向各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而不是转向他们自己的兄弟，即其他国家雇佣的奴隶。”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4页。——译者注

但是，战时进行革命斗争可能使自己本国政府遭到失败！列宁没有为这个结论所吓倒。“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自己的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鼓动可能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①所谓“失败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无耻的反对者企图把这一点说成是意味着：列宁承认国际主义者可以为了战胜自己国家的反动派而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合作。事实上，这里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斗争，办法是各国无产阶级同时把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作为直接的主要敌人而对它进行斗争。列宁在1914年10月写信给施略普尼柯夫说：“使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从俄国的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考虑，丝毫不容置疑、绝对不容置疑的一点就是，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现在马上失败带来的损失最小……”^②

用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虔诚哀叹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不行的。“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③同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和约只是取得新战争以前的喘息时间。只有对战争和战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的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④

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斗争是列宁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8页。——译者注

② 《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宁全集》第47卷，中文第2版第117页。——译者注

③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7页。——译者注

分。他特别痛恨地拒绝了“裁军”的要求，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显然是幻想，只会转移工人对武装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做奴隶对待。”^①而且，“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②列宁拒绝了空洞的“和平”口号，而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来与它相对抗。

在战争期间，工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列宁称他们的倾向是“社会沙文主义”：言论上是社会主义，行动上却是沙文主义。但是，第二国际的背叛并不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而是改良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继续和发展。“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思想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③

战前资本主义繁荣的最后时期（1909—1913）使无产阶级上层特别强烈地迷恋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和各个落后国家取得的超额利润中，有一部分落到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手中。因此，他们的爱国是由帝国主义政策直接给他们的好处所决定的。战争把一切社会关系都暴露出来，在战争期间，“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由于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府和参谋总部联合而取得巨大权力”。机会主义者肯定走到阶级敌人的阵营去了。

社会主义中的中间的、也许是最广泛的思潮是所谓中派（考

①② 《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173—174页。——译者注

③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334页。——译者注

茨基等人)。它平时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现在差不多完全成为以和平主义词句为幌子的社会沙文主义的俘虏。至于群众，他们没有准备，并且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建立的党机构所欺骗。列宁在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对第二国际的工人官僚进行了估计后并不半途而废。“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①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必须一劳永逸地与社会沙文主义者断绝一切接触。“不坚决与机会主义决裂”、与“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思潮”即中派决裂，“在目前就不可能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对工人进行国际动员”。党的名称必须改变。“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个被糟蹋的和信誉扫地的名称而恢复‘共产党’这个旧的马克思主义名称，岂不更好？”现在是与第二国际决裂而建立第三国际的适当时候了。

这就是与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在战争爆发前仅两三个月认为是“幼稚的”意见分歧。同时，第二国际的这位主席成为他的国王的爱国大臣。

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二国际中最革命的部分——事实上是惟一革命的部分。可是，甚至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立即在战争迷宫中找到出路。一般说，混乱思想在党的上层最普遍，持续得最久，因为他们是与资产阶级舆论直接接触的。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立即急剧右转，与孟什维克一起发表了一个含糊的声明。不错，7月26日在杜马宣布的这个文件未谈“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执行其掠夺政策的幌子的假爱国主义”，但是它保证，无产阶级“将保卫人民的

^①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335页。——译者注

文化财富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不管侵犯来自什么地方，不管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保卫文化”的借口下，党团采取了爱国主义立场。

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9月初才到彼得堡。党对它的态度远不是全面赞同的。大多数反对意见是不赞同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据施略普尼柯夫说，这个口号引起“迷惑”。当时由加米涅夫领导的杜马党团又企图缓和列宁的提法的尖锐性。莫斯科和各省的情况也是这样。莫斯科暗探局说，“战争使‘列宁派’措手不及。他们长时期来……没有就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取得一致意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用暗语通过斯德哥尔摩写信给列宁说，“尽管对他很尊重，他卖房子的建议〔‘失败主义’口号〕没有引起响应。”在萨拉托夫，据当地的领袖安东诺夫说，“具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工人不同意失败主义立场。不仅如此……他们（例外极少）是肯定的护国主义者。”在先进工人当中，情况较好。在彼得堡的工厂中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如果俄国获胜，我们的情况不会更好，我们将受到比以前更厉害的压迫。”萨莫伊洛夫写道：“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同志们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感到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并且早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就肯定地走出了这条道路。”

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人设法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大规模的逮捕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报纸遭到的破坏使工作人员分散了。因此，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作用就变得更加重要。布尔什维克代表从最初的恐慌情绪中恢复过来以后，开展了重要的非法活动。但是他们早在11月4日就被捕了。对他们不利的主要证据是国外党的工作人员的文件。当局控告被捕的代表叛国。在预审中，加米涅夫和所有的代表（只有穆拉诺夫除外）都否定了列宁的提纲。在2月10日进行的审判中，被告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加米涅夫声明，摆在他面前的文件“肯定与他对目前战争的看法相反”。他发表这个声明不是由于关心自己的安全；这主要表示了整个党的上层对于失败主义的否定态度。使列宁极为气愤的是，被告的纯辩护性战术大大削弱了这次审判的鼓动效果。辩护工作本来是可以与政治攻势同时进行的，但是加米涅夫是一个聪明的和受过充分教育的政客，他生性是不会应付特殊情况的。辩护律师方面则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辩护律师之一彼列维尔节夫拒绝了叛国罪名，他在审判时预言，工人代表对他们的阶级的忠诚将永远留在后代的记忆中；而他们的弱点，即缺乏准备，依靠他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顾问，等等，“所有这一切将像一个空壳一样与诽谤性叛国罪名一起被抛弃”。

历史是从来不倦于开虐待狂玩笑的。由于这样一个玩笑，不是别人，正是彼列维尔节夫，以他的克伦斯基政府司法部长的身份，控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和进行间谍活动。他这样做是借助于连沙皇检察官也没有使用过的无耻制造假证件的手法的。只有斯大林的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方面胜过了这位民主司法部长。

尽管被告的行动是暧昧的，审判工人代表这一事实彻底打击了“国内和平”的神话，唤醒了已受过革命教育的工人阶层。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约有4万工人购买《真理报》，而读《真理报》的工人就更多得多了……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这个阶层生气勃勃……只有这个阶层站在人民群众中间，扎根于群众之中，宣传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国际主义。”^①群众很快就开始觉醒了，但是这种觉醒的影响是慢慢才传到外面的。由于要

①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什么？》，《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77页。——译者注

服军役，工人的手脚受到束缚。每一个违反纪律的行动都使他们有可能被立即调到前线，同时还附有警察局的一项等于是宣判死刑的特别符号。这种做法在彼得堡特别有效，那里的监视倍加严格。

同时，沙皇的军队继续失败下去。爱国心和恐惧所造成的麻痹状态逐渐消失了。1915年下半年，莫斯科纺织地区的高昂物价引起了零星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没有发展起来。群众感到不满，但是没有闹事。1916年5月，在各省的新兵中间发生了零星的骚动，南方开始发生粮食骚动，并且立即蔓延到喀琅施塔得——这是守卫通往首都的道路的堡垒。最后，12月底，轮到彼得堡了。政治罢工立即卷进工人达20万名之多，布尔什维克组织毫无疑问是参加了的。局面打开了。2月，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暴风雨般的罢工和骚动。这些罢工和骚动迅速发展成为起义，并随着首都驻军站到工人一边而达到顶点。自由派和孟什维克所指望的“德国发展路线”并未实现。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不久也脱离了所谓的德国道路……在遥远的流放地，斯大林注定要看到起义的胜利和沙皇的逊位。

在位于叶尼塞斯克省北部土鲁汉斯克地区的大约3万平方英里土地上，散居着约1万人，俄罗斯人和异族人。两户到十户（很少十户以上）的小村落相距数百英里之远。这里一年有八个月是冬天，农业是不存在的。居民渔猎为生，因为鱼和兽类很多。斯大林在1913年年中到达这个不适于居住的地区，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在那里了。不久，阿利路也夫接到一封信，斯大林在信中要求他催促巴达也夫代表把列宁从国外汇的钱寄来……“斯大林详细解释说，他急需这笔钱，以便在北极的严冬到来以前为自己准备必要的食品、煤油和其他东西。”

8月25日，警察局通知叶尼塞斯克宪兵说，流放犯斯维尔德洛夫和朱加施维里可能企图逃跑。12月18日，警察局打电报要求叶尼塞斯克省长采取措施防止这种逃跑。警察局在1月打电报给叶尼塞斯克宪兵说，斯维尔德洛夫和朱加施维里除了以前所收到的100卢布以外，将再收到50卢布以便准备逃跑。3月，暗探局的密探甚至听说，人们看到斯维尔德洛夫在莫斯科。叶尼塞斯克省长马上报告说，这两个流放犯都“在这里，已经采取措施防止他们逃跑”。斯大林写信给阿利路也夫说，列宁汇的钱是用来买煤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但是写这种信也无用。警察局从第一手——即从马林诺夫斯基本人那里——知道正在准备逃跑。

1914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写信给他妹妹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和我将再北移100俄里（将近70英里）——在北极圈以北80俄里（将近55英里）。监视更严格了。我们现在已接不到邮件，我们通常是每月一次从一位经常迟到的‘步行者’得到邮件的。实际上，我们一年只能收到八次到九次邮件……”指定他们居住新的地点是无人的库莱卡村。但这还不够。“由于朱加施维里收到了钱，当局已有四个月不发津贴给他了。他和我都需要钱。但是你不能把钱汇到我们的名下。”由于扣发津贴，警察局为沙皇的预算节省了钱，并且减少了逃跑的可能性。

斯维尔德洛夫在从库莱卡寄出的第一封信中清楚地叙述了他与斯大林在一起生活的情况。“我的新居的情况大大恶化了。首先，我已不再独自住一个房间，我们两个人住。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一位老相识，因为我们已在别的流放地见过了。他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太个人主义了，而我是主张至少要有点守秩序的样子。这就是我有时感到不安的原因。但是这不是很重要的。更糟的是，没有东西把我们跟房东的家隔离开来。我们的房间就在他们的房间的隔壁，没有另外的

门。他们有孩子。自然，这些小孩有很长时间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们有时很碍事。此外，村中的成年人也来。他们来了就坐下，不声不响坐半个钟头，然后突然站起来说：“好吧，我们要走了，再见！”他们刚走，别人又来了，这样重复下去。他们好像不管一切似的，在最好的学习时间即在晚上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白天要劳动。我们在晚上看书看到午夜以后的习惯不得不放弃，因为根本没有煤油。我们点蜡烛。由于蜡烛的亮光对我的眼睛来说太不够，我现在全在白天看书。事实上，我不看什么书了，我们实际上无书可看……”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主席和苏联的未来独裁者就是这样生活的。

这封信中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称斯大林是“不错的家伙，但是太个人主义了”这个谨慎的描述。这个证言的第一部分显然是为了缓和第二部分的语气而写的。在这个情况下，“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个人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得不与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但是并不考虑另外那个人的习惯或兴趣。斯维尔德洛夫所坚持而未成功的“有点守秩序的样子”是要求为了同房间的人的利益而一定程度的自制。斯维尔德洛夫生性就是会体谅人的。萨莫伊洛夫说，他在个人关系方面是“一位好同志”。斯大林身上却没有一点体谅人的影子。此外，他的行动可能还有很大程度的报复性。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斯维尔德洛夫被派去消除斯大林在反对列宁时所依靠的那些《真理报》编辑人员的，斯大林是决不宽恕这种事情的。他从不宽恕任何事情。在1924年说要发表的斯维尔德洛夫在土鲁汉斯克写的全部信件从未发表；显然，这些信包含着以后关系恶化的历史。

施韦泽——中央委员会第三名委员斯潘达梁的妻子，斯潘达梁在战争前夕前往库莱卡，当时斯维尔德洛夫已从那里迁走了——叙述说，在斯大林的房间里，“桌子上堆满了书和几大包报纸，

在房间一角的绳子上挂着他自己制造的各种渔猎工具。”显然，斯维尔德洛夫关于书籍不够的怨言已使人们采取了行动，朋友们往库莱卡寄书来了，自然，“他自己制造的”工具不可能是步枪和火器。这些工具是渔网和捕兔子及其他野物的捕机。后来斯大林既未成为射手，也未成为猎人（从这两字的体育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一般的表面情况来看，比较容易设想的是，他在晚上安放一个捕机，而不是开枪射击在飞行中的鸟。

社会革命党人卡加诺夫（他后来成为歌剧歌手）把他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与斯大林会晤的时间说成是 1911 年而不是 1913 年；在这样的情况中，年代方面的错误是司空见惯的。卡加诺夫除了谈到其他事情外还谈到，斯大林为流放地的一个名叫恰伊卡〔海鸥〕的抢劫农民的罪犯辩护。他争辩说，不能把恰伊卡定罪，应当把他争取到他们一边来，未来的斗争是需要这类人的。我们已从维列沙克那里听说过柯巴对罪犯是有偏爱的。有一次，在一场争论的过程中，据说斯大林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反犹太分子，他用格鲁吉亚的粗鲁话骂犹太人。斯大林还违反了政治流放者的传统——如果人们相信卡加诺夫的说法的话——与一个警察奥塞金·基比罗夫建立了友好关系。斯大林在答复同志们的责难时说，这种友好关系并不妨碍他在必要时把这个警察作为政治敌人而加以消灭。据这位卡加诺夫说，斯大林由于“他完全不讲原则、阴险和极端残酷……”而使流放者感到惊奇。“甚至在小事上，他的异乎寻常的野心也自行流露出来。”在这样的故事中，很难断定哪些是真话，哪些是捏造的。但是整个说来，卡加诺夫的叙述使人想起，这和维列沙克在巴库监狱的观察很为相似。

库莱卡的邮政联系和其他联系要依靠修道院村，从那里可以通向叶尼塞斯克并进而通向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前流放者加文（现在是失踪者之一）告诉我们，叶尼塞斯克市是与地下的和合法

的政治生活有接触的，它与其他流放地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通信，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则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有联系，并向流放者提供秘密文件。甚至在北极圈，人们也设法过党的生活，分为小组，进行争论，直到嗓子喊哑，有时甚至直到引起极大的仇恨情绪为止。但是，流放者只是在1914年年中第三号中央委员、热心的斯潘达梁到达土鲁汉斯克地区以后，才开始在原则上发生分歧意见。

至于斯大林，他采取超然态度。据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隐居起来。他专心于渔猎，差不多是完全孤独地生活着……他实际上没有与人们来往的需要，只是偶尔去修道院村看看他的朋友苏廉·斯潘达梁，几天以后又回到他的隐居洞。在他碰巧参加了流放者安排的集会时，他是不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发表他的无条理的意見的。”这些话在后来的一个版本中把语气写得缓和并加以润色（甚至“洞”这个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变成“实验室”了）。必须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斯大林中止了与大多数流放者的个人来往，并且避开他们。无怪乎他与斯维尔德洛夫的关系也同样断绝了。在单调的流放条件下，甚至比他更能适应环境的人也不能避免发生争吵。

斯维尔德洛夫在他碰巧得到发表的一封信中谨慎地写道：“精神气氛不是特别好的……只有在监禁和流放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的若干次冲突（个人冲突），尽管是些小冲突，却对我的神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冲突”，斯维尔德洛夫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另外两个布尔什维克，即戈洛舍金和麦德维捷夫，很快也离开库莱卡，他们现在同样在失踪者之列。斯大林容易发火，粗暴，野心勃勃，人们是不容易与他相处的。

传记作者说，这次，逃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说显然是夸张，虽然毫无疑问，逃跑一定会遭遇到严重的困难。斯大

林以前几次的逃跑并不是真正的逃跑，只是非法地离开流放地。一旦人们决定不要自己的“合法身份”，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沃洛果达甚至是从纳赖姆逃走并不费劲。土鲁汉斯克地区则大不相同：在那里，人们必须依靠鹿或狗，或者在夏天乘船，或者小心躲藏在船舱内（如果船长对政治流放者友好的话），以便走一段很难走的路。一句话，土鲁汉斯克的流放者想要逃跑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在那些年代里，有几个人确实设法从土鲁汉斯克流放地逃跑，这最好地证明了上述论点。不错，在警察局得悉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的逃跑计划以后，他们二人受到了特别的监视。但是北极的“卫兵”是有名懒惰和容易用酒来诱惑的，他们从不阻止别人逃跑。土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因此而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施韦泽写道：“斯大林常常到修道院村来，流放者常常在这里聚会。他为了这样做而使用了非法的以及各种合法的借口。”在广阔无垠的北部荒地上，监视不可能是很有效的。在第一年里，斯大林看来是在观望形势，并且不慌不忙地采取准备步骤，他是很谨慎的。但是在第二年的7月，战争爆发了。除了逃跑的实际困难和政治困难以外，又增加了在战时政治条件下过非法生活的危险。正是由于这个加剧了的危险，斯大林才没有逃走，许多其他人也因此而没有逃走。

施韦泽写道：“斯大林这次决定留在流放地。他在那里继续写民族问题，完成了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舒米亚茨基也提到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在流放的最初几个月，斯大林的确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关于这一点，我们有阿利路也夫的明确证言。他写道：“同年（1913年）初冬，我接到斯大林的第二封信……信封里附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斯大林要我把这篇文章寄给在国外的列宁。”如果文章能够附在信封里，它就不会是很长的。可是这篇文章的结果怎样呢？1913年，列宁全年都继续

在制订民族纲领。他不会不急切地利用斯大林的新著作。无人谈到这篇文章的命运，这只是证明，它被认为不充实，不能发表。斯大林不依靠列宁在克拉柯夫向他提出的思想路线而独立地写作，这显然已使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因而列宁认为无法修改这篇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这一惊人的事实：在以后的三年半的流放中，生了气的斯大林没有再努力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文章。

在流放地像在监狱里一样，重大事件似乎是特别难以相信的。据舒米亚茨基说，“爆发战争的消息使我们大家目瞪口呆，其中有些人的看法完全错误……”加文写道：“护国主义倾向在流放者当中是强烈的，人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足为奇，甚至在彼得堡（最近易名为彼得格勒），革命者也迷失了方向。施韦泽说，“但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他给流放者的第一封信就消除了一切怀疑，稳定了动摇分子。”这封信怎样了呢？这样的文件在流放者当中传阅时是随传随抄的。这些抄本不可能全都遗失。落到警察手中的抄本应当在警察局档案中发现。如果得不到斯大林的这封历史性“信件”，那只是因为根本没有写这封信。施韦泽的证言尽管是平凡的，却是人类的一个可悲文件。她是在1937年即事件发生以后25年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写她的回忆录的。她被迫归功于斯大林的那个政治贡献事实上属于——虽然在较小的程度上——她的丈夫、1916年死于流放地的那位不乖顺的斯潘达梁。当然，施韦泽十分清楚地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是弄虚作假的机器是自动进行工作的。

比较符合事实的是在施韦泽的文章以前约13年发表的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舒米亚茨基把在对爱国主义者进行斗争方面的领导作用归功于斯潘达梁。“他是首先采取毫不妥协的‘失败主义’立场的一些人之一，并在同志们难得举行的集会上讽刺地申斥社会爱国主义者……”甚至在晚得多的版本中，舒米亚茨基在

叙述普遍存在的思想混乱时仍保留了这样一句话：“故斯潘达梁对这个问题看得清楚而明确……”显然，其他人看得不那么清楚。不错，从未去过库莱卡的舒米亚茨基又马上补充说，“在自己的洞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立即采取了失败主义立场”，斯大林的信件“支持苏廉对他的反对者进行的斗争”。加上这句话是为了使斯大林在“失败主义者”当中居于第二位，但是舒米亚茨基本人却大大减少了这句话的可信性。他进一步写道：“只是在1914年底和1915年初，斯大林访问了修道院村并支持斯潘达梁以后，斯潘达梁才不再受到反对集团的攻击。”斯大林是不是在与斯潘达梁会晤以后而不是在战争开始时才采取国际主义立场的呢？舒米亚茨基为了掩盖斯大林的长期沉默而从新版中删掉了提到斯大林“只是在1914年底和1915年初”才去访问修道院村的一切话，但是事实上，他这样一来比以前更加强调说明了这种沉默。其实，这次访问是在1915年2月底进行的，当时由于七个月的战争的经验，不仅动摇分子而且甚至许多积极的“爱国主义者”也从麻痹状态中清醒过来。事实上，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的主要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提纲是感到迷惑和不安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照提纲的原样加以接受。因此，没有理由期望斯大林的迟钝和保守的脑子会独立地得出意味着工人运动中的大变动的结论。

在斯大林的整个流放期间，在已知的文件中，只有两次反映了他对战争的立场。这就是他给列宁的私人信件和他所签名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集体声明。2月27日从修道院村写的这封私人信件是斯大林的整个战争期间给列宁的第一封并且显然是惟一的信件。我们全文引述：

“我向您，亲爱的伊里奇，致意，热情、热情地致意。向季诺

维也夫致意，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①致意。您好吗？健康状况怎样？我像以前一样生活，啃我的面包，完成了我的流放期的一半。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您的情况怎样？您那里的情况一定活跃得多……我最近读了克鲁泡特金^②的文章——这个老笨蛋一定完全发疯了。我还读了普列汉诺夫在《言论报》^③上的一篇短文——无可改正的陈腐的胡扯。去它的！取消派和他们在自由经济协会中的副代理人怎样了呢？没有人打他们，他妈的！难道可以让他们跑掉而免受处罚吗？让我们痛快一下，让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将来将出版一家报纸，狠狠地给他们几记耳光，而且要经常这样做，永不厌倦。如果您想写信的话，请寄往：土鲁汉边区，叶尼塞斯克省，修道院村，苏廉·斯潘达梁转。您的柯巴。季莫费（斯潘达梁）请您向盖得^④、桑巴^⑤和王德威尔得^⑥转达他们对他们担任光荣的——哈哈——部长职务的辛酸祝贺。”

这封信显然是受了与斯潘达梁的谈话的影响，它基本上没有提供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估计斯大林的政治立场。年老的克鲁泡特金，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在战争开始时就成为过激的沙文主义者。甚至连孟什维克者完全弃绝的普列汉诺夫的情况并不更好。王德

① 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原编者注

②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科学家、历史学家、批评家、社会哲学家，他当时流亡在伦敦。——原编者注

③ 《言论报》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日报。——原编者注

④ 儒勒·巴西尔·盖得(1845—1922)，法国社会党前左派领袖，是不管部长(1914年8月—1915年10月)。——原编者注

⑤ 马赛尔·桑巴(1862—1922)，法国改良主义社会党政治家，公共工程部长(1914—1916)。——原编者注

⑥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比利时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务部长，担任过各种内阁职务。——原编者注

威尔得、盖得和桑巴由于担任了资产阶级部长，是太明显的目标了。斯大林的信没有关于当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新问题的丝毫暗示。对和平主义的态度，“失败主义”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成立新的国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当时进行的许多辩论的中心问题。列宁的主张是很不受欢迎的。斯大林如果事实上同意列宁的主张，那么在信中向列宁表示这种同意，岂不极为自然？如果施韦泽的话可以相信，那么，斯大林就是在这里，在修道院村，第一次看到了列宁的提纲。她以贝利亚的风格写道：“斯大林在读列宁的提纲时是怀有多么大的愉快、信心和胜利感呵！这个提纲证实了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为什么他不在他的信中提出关于这个提纲的一点暗示呢？如果他独立地研究了新国际的问题，他不会不向他的老师就他自己得出的结论至少是谈几句话的，也不会不就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向他的老师请教。但是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迹象。斯大林只从列宁吸收适合他自己的观点的那些思想。在他看来，其余的就是未来的靡靡之音了，如果不是在国外的“杯中风浪”的话。他后来就是抱着这些观点来迎接（1917年3月）二月革命的。

从修道院村写的这封信内容空洞，并有一种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浮夸口气（“他妈的”，“哈哈”，等等），但是它透露的东西比它的作者想要透露的多得多。“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能够过紧张写作生活的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如果您想写信的话，请寄往……”真正重视交流理论思想的人是不会这样写的。这封信有三个特点：阴险、愚蠢和庸俗。在他的四年流放中，他没有与列宁系统地通过信，尽管列宁非常重视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联系，并有保持通信的嗜好。

1915年秋，列宁问流亡者卡尔宾斯基：“我要请你帮忙，请查明……‘柯巴’的姓（约瑟夫·朱……?? 我们忘记了）。非常重

要！”卡尔宾斯基回答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问这干什么，是要汇款还是寄信？需要查问他的姓，就肯定表明他们并不经常通信。

斯大林签名的另一文件，是一批流放者写给致力于工人保险事业的合法报纸编辑部的一封信：

“《保险问题》^①要极力设法在思想上替我们工人阶级保险，防范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班先生所进行的极端败坏人心的、根本违反国际原则的反无产阶级宣传。”^②

这无疑是对社会爱国主义的一篇宣言，但它仍然完全是不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甚至在左翼孟什维克中间所共有的思想范围以内。这封信从风格来看，一定是加米涅夫写的，它的日期是1916年3月12日——即在革命压力已经大大得势而爱国主义压力已经大大减少的时候。

加米涅夫和被定罪的杜马代表在1915年夏到达他们在土鲁汉斯克的流放地。代表们在审判时的行动继续是党员当中大肆争论的问题。约有18名布尔什维克，包括4名中央委员——斯潘达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块来到修道院村。彼得罗夫斯基作了关于审判的报告，加米涅夫作了补充。萨莫伊洛夫叙述说，参加讨论的人“指出了我们在审判时所犯的错误。斯潘达梁讲得特别尖锐，其他人发表了比较宽容的意见”。萨莫伊洛夫根本没有提斯大林参加了讨论。但是斯潘达梁的未亡人被迫把实际上是她丈夫做的事情归功于斯大林。萨莫伊洛夫接着说，“在

① 《保险问题》是1913年10月作为《真理报》保险部的一个分支创办的，虽然表面上它致力于工人保险事业，它也讨论一般的政治问题，在战争期间沙皇当局封闭《真理报》以后，它发表了关于危险的战争问题的文章。——原编者注

② 参看《斯大林传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5页。——译者注

讨论后通过决议，决议整个说来赞同了……党团在审判时所采取的行动”。这种宽容是与列宁的不调和态度大相径庭的，列宁公开斥责加米涅夫的行动，认为“与一个革命的民主社会党人不相称”。什克洛夫斯基应列宁的要求以婉转的措词从伯尔尼写信给修道院村的萨莫伊洛夫说：“我非常高兴你不想同我的家属争吵，但是他（加米涅夫）给我们造成了多少不愉快的事（而且不仅是他）……任何人都不会犯错误或者做某种蠢事，但是他必须至少通过公开道歉来纠正他的错误，如果他和他的朋友们对我的荣誉和我的亲人的荣誉有任何重视的话。”萨莫伊洛夫解释说，必须把“我的家属”和“我的亲人”这些话理解为“党中央委员会”。这封信是最后通牒性的，但是加米涅夫和代表们都没有发表列宁要求他们发表的声明。没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支持这个要求，虽然什克洛夫斯基的信是在会议刚要举行前在修道院村收到的。

斯大林对代表们的行动的宽容基本上是一种谨慎的同情表示。面对着充满着可怕后果的审判，列宁的尖锐公式一定看来是倍加不适当了。为了自己认为是错误的某种东西而牺牲，有什么意义呢？过去，斯大林从未表现过愿意利用被告席作为一个革命讲坛。在对巴库示威者的审判悬而未决的时候，他采取了相当可疑的手法来使自己与其他被告分离开来。他是把加米涅夫在审判时的策略作为战略而不是作为进行政治鼓动的机会来加以判断的。无论如何，在整个流放期间以及在革命期间，他一直是加米涅夫的亲密朋友。在修道院村所拍的一张集体照片上，他们是站在一起的。12年以后，斯大林不是作为原则问题而只是作为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才提出加米涅夫在审判时的行动作为对他的一个可怕的指控。但是什克洛夫斯基的信向斯大林暗示，问题比他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他不再能继续采取等待态度了。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这一点，他才写了上述的信给列宁，这封

信之所以写得那么随便，是为了掩饰他不愿在政治上表示自己的意见。

1915年，列宁要在莫斯科出版一本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以便至少从字里行间表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这本文集被检查员扣起来，但是文章保存下来，并在革命以后出版。我们发现，除列宁以外，作者当中有作家斯切潘诺夫，奥里明斯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比较新的布尔什维克米柳亭，调和派分子诺根——全是流亡者。我们也发现斯维尔德洛夫写的题为《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的文章。但是斯大林没有为这个文集写任何文章，而他的流放生活条件和斯维尔德洛夫是一样的。可以说明这一情况的是，斯大林担心他的意见可能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左，或者由于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未被发表而烦恼。暴躁和任性像谨慎一样，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在流放期间应征服兵役，这显然是在1916年，因为当时正在动员年纪较大的人（斯大林当时快37岁了），但由于他左臂不能弯曲而未把他征入军队。他耐心地在北极圈那边等待机会，捕鱼，放捕机捉兔子，看书，可能也写文章。“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他是一个隐居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暴躁，远不是流放者当中的中心人物。斯大林的信徒舒米亚茨基写道：“在土鲁汉斯克流放者的记忆中，比许多其他人的形象更为清楚的是苏廉·斯潘达梁……这位不妥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组织者的不朽形象。”斯潘达梁是在战争前夕到达土鲁汉斯克的，比斯大林晚一年。“他常常讽刺地说：‘这里多么平静！每一个人在一切问题上都同别人意见一致——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难道你们不知道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正在听取流放者的意见吗？……’”苏廉是第一个采取反爱国主义立场的人，并且使每一个人都倾听他的意见。但是在

对同志们的个人影响方面，斯维尔德洛夫居第一位。斯维尔德洛夫“活跃并会交际”，他是生来不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外向性格者，他总是团结其他人，收集重要消息，在流放者的各个集居地传布、组织流放者合作社，此外还在气象台进行有系统的观察。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流放者以这两个人为中心组成集团。虽然这两个集团一起对行政当局进行斗争，可是舒米亚茨基所说的“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从未停止。今天不容易断定那个斗争的原则基础是什么。斯大林是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他谨慎地和紧密支持斯潘达梁。

舒米亚茨基在他的初版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地区的行政当局认识到苏廉·斯潘达梁是最活跃的革命者，把他看成是革命者的领袖。”在后来的版本中，这句话扩大而包括两个人：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警察基比罗夫（斯大林大概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对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进行了密切的监视，认为他们是“所有流放者的头目”。舒米亚茨基暂时丢开了官方的说法，他在这方面完全忘记提斯大林，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土鲁汉斯克流放者的一般水平大大超过普通水平。在这里同时拘留了构成布尔什维克俄国中央的主要核心的那些人：加米涅夫、斯大林、斯潘达梁、斯维尔德洛夫、戈洛舍金和另外几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流放中没有正式的党组织，不可能匿名进行领导和在幕后操纵。每一个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阴险、僵硬和顽固不足以争取这些富有经验的人，人们必须有文化修养，是独立的思想家并且是有技巧的辩论家。斯潘达梁显然由于敢于大胆思考而出色，加米涅夫由于学识广博和有较自由的想法而出色，斯维尔德洛夫由于有较大的感受性、创造性和灵活性而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满足于发表简单的意见，舒米亚茨基只是在他的回忆录的较后版本中才想到称这些意见是“尖锐

的”。

斯大林在流放地是否学习，学习些什么？他早就过了人们满足于漫无目的地随便看书的年纪了。只有研究具体的问题，记笔记，设法把他自己的主张系统地写下来，他才能进步。然而除了所提到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以外，没有人谈过斯大林在这四年中的写作生活。斯维尔德洛夫根本不是理论家或作家，然而他在这几年中写了五篇文章，从外文进行翻译，定期向西伯利亚报纸投稿。他以乐观的口气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这样，我的情况还不坏。”毫不爱好理论的奥尔忠尼启泽逝世以后，他的妻子在写到已故丈夫的监狱年代时说：“他无休止地学习和看书。在监狱当局向谢尔戈发的很厚的油布面笔记本中，保存着他从在当时所看的书中记下来的长篇摘录。”每一个革命者都从流放地和监狱带出这种油布面笔记本。不错，有许多东西在逃跑和搜查期间丢失了。但是斯大林在最后一次流放中，本来可以带出他喜欢带出的任何东西，并且会完整无损。至于在以后的年代，不是他受到搜查，相反，他使别人受到搜查。然而，要想寻找他在这一整个孤独和悠闲时期的文化生活的任何痕迹，却是徒劳。在这四年中——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世界大战的年代，国际社会民主党崩溃的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年代，为新的国际奠定基础的年代——斯大林不可能一直没有拿过笔。然而在他当时所写的东西中，看来没有一句话可以用来提高他在后期的声望。战争年代，为十月革命铺平道路的年代，在斯大林的思想史上是一块空白。

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流亡者”列宁的笔下得到了完善的表现。一国——而且是落后的俄国——的舞台太有限，人们无法对世界的前景作正确的估计。正像流亡者马克思需要伦敦（它当时是资本主义的中心），以便把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与英国经济学综合起

来一样，列宁在战争期间必须留在欧洲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焦点，以便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得出决定性的革命结论。在布哈林以后和在季米特洛夫以前的共产国际正式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 1922 年写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托洛茨基出版的巴黎《呼声报》（后为《我们的言论报》）对于未来写第三国际历史的人将是基本的材料，这些材料形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思想。”应当欣然承认，曼努伊尔斯基过分估计了托洛茨基的作用。但他甚至没有口实来提出斯大林的名字。可是几年以后，他得尽最大力量来纠正这一疏忽。

由于多雪荒地的单调生活而安定下来的流放者远没有料到在 1917 年 2 月（公历 3 月）所发生的事件。他们全都感到意外，尽管他们一直相信革命是必须要发生的。萨莫伊洛夫写道：“最初，我们好像突然忘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政治分歧和相互的敌对似乎突然消失了……”这句有趣的话为当时的一切出版物、讲话和实际步骤所证实。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之间的壁垒倒塌了。全国沉浸在人们以轻松然而近是近视的态度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调和主义之中。人们在英雄词句——二月革命的主要成分，特别在它的最初几周里——的洪流中挣扎前进。一批一批的流放者从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出发，汇成一道人流，在令人陶醉的喜气洋洋的气氛里向西行进。

在西伯利亚的一次集会上，据人们后来说，加米涅夫与自由派、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参加主席团，他参与签署了一封电报，向皇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祝贺，因为他采取了据认为是慷慨的然而事实上是怯懦的行动，即放弃王位，等待立宪会议作出决定。有这样的可能：很重感情的加米涅夫认为，最好不要不礼貌地拒绝签字而使主席团中的同事感到不安。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注意，而斯大林（甚至没有人想到要把他包括

在主席团内)直到他和加米涅夫的无情斗争开始后才反对加米涅夫的这个不体面行动。

途中,第一个有大量工人的大地方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代表苏维埃。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一起是这个总的组织的成员,这些布尔什维克等待从这里路过的领导人给予指示。被统一浪潮完全征服了的这些领导人甚至没有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有什么用处呢?布尔什维克像孟什维克一样,是主张支持由自由派的李沃夫大公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分歧在战争问题上也是不存在的:必须保卫革命的俄国!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就是抱着这种心情向彼得格勒前进的。萨莫伊洛夫追述说:“沿铁路的道路上的情况是很奇特和热闹的,有许多欢迎示威、集会等等。”在大多数车站上,流放者都受到兴高采烈的居民的欢迎,军乐队奏马赛曲^①;奏国际歌的时代尚未开始。在较大的火车站上举行了节日宴会。这些被赦免的人不得不“无休止地讲话,讲话”。许多人嗓子哑了,累得不舒服,留在他们的车厢里;“但是甚至在车厢里,我们也得不到安静。”

斯大林嗓子没有哑,因为他没有发表讲话。另有许多更有本领的演说家,其中有嗓音洪亮的矮小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仍然居于次要地位;阴沉,对于高潮到来时汹涌澎湃的洪流感到惊恐,并且像以往一样,是心怀恶意的。他再次被一些才干小得多的人排挤到一边去了。他已有将近20年的革命活动的历史,这种活动为不可避免的逮捕所打断,而在逃跑后又继续进行这种活动。

① 马赛曲是所有反对沙皇专制的人按照法国大革命的爱国与共和传统所普遍唱的战歌;而国际歌(欧仁·鲍狄埃在1871年写)完全限于社会党人和新的社会制度的战士,这个制度是以全世界的劳动者——不分种族和国籍——从剥削和压迫中自我解放为根据的。——原编者注

自从柯巴放弃了梯弗里斯的“停滞的沼泽”而前往工业城市巴库以来，差不多10年过去了。他在这个石油工业都城工作了将近八个月，在巴库监狱度过了将近六个月，在沃洛果达流放地度过了将近九个月。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地下活动后又受到二个月的惩罚。逃跑以后，他再次进行了将近九个月的地下工作，在监狱度过了约六个月，在流放地住了九个月——这是比较不错的比例。在流放结束后，他进行了不到二个月的秘密工作，在监狱度过将近三个月，在沃洛果达省住了将近二个月，进行一个月的活动后又受到两个半月的惩罚；又进行了二个月的地下活动，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将近四个月。又一次逃跑，进行了半年多的活动后，又是坐牢和流放，这次一直流放到二月革命，即持续了四年。总的说来，他在参加革命运动的19年中，二年九个月在监狱度过，五年九个月在流放地度过。这个比例不算坏，大多数职业革命家坐牢的时间要长得多。

在这19年当中，斯大林并没有作为主要人物，甚至也未作为二流人物出现。他是无名的。梯弗里斯暗探局局长在1911年提到所截获柯巴从索里维切果茨克发出的信时，写了一份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详细报告，报告中既没有值得注意的事实，也没有惊人的特点，或许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它提到化名“柯巴”的“沙夏”是作为孟什维克而开始他的生涯的。同时，在提到这封信中顺便谈到的古尔根（齐哈卡雅）时，宪兵写道：“后者老早就是一位重要革命……”根据这个材料，古尔根是“同著名的革命者波格丹·克努尼杨茨一起”被捕的。后者不仅也是格鲁吉亚人，而且和柯巴同年。至于朱加施维里自己的“名望”，甚至一点暗示都没有。

两年以后，警察局长在详细叙述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参谋部的结构时顺便谈到：斯维尔德洛夫和“某一个约瑟夫·朱加施维

里”通过补选而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某一个”三字表示，1913年，朱加施维里的名字对警察局长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有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一个情况来源。直到不久以前为止，斯大林在1917年3月以前的革命经历是十分平淡的。数以十计的（如果不是数以百计的话）职业革命家做了像他所做的那样的工作，有些人做得更好些，有些人做得差些。莫斯科勤勉的研究人员算出，从1906年到1909年的三年中，柯巴写了67篇呼吁书和在报上登的文章，即一个月不到两篇。这些文章只不过是為了他的高加索读者而把别人的思想改头换面提出来，一篇也没有从格鲁吉亚文翻译出来，也没有在党或党团的主要机关报上转载过。当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国外出版的刊物中，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不管是报纸、杂志还是文集，都没有斯大林的文章，在撰稿人名单上也没有提到他。人们仍然不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作家，而只是一个不出色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912年，当他的文章开始或多或少经常地在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出现时，柯巴给自己找了斯大林这个笔名，这是从钢这个字找来的，就像罗森菲尔德在他之前从石头这个字找来加米涅夫这个笔名一样。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当中，选择硬的笔名是很流行的。斯大林署名的文章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些文章除说理粗糙外，没有特点。在少数主要布尔什维克这个小圈子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谁，也没有什么人想要知道。1913年1月，列宁在为著名的鲁巴金书目参考书所写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经过仔细考虑的注释中写道：“主要的布尔什维克作家有：格·季诺维也夫，弗·伊林^①，尤·加米涅夫^②，普·奥尔洛

① 列宁。——原编者注

② 列·鲍·加米涅夫。——原编者注

夫斯基等人。”列宁不可能想到把斯大林列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作家”之一，虽然当时斯大林就在国外写他的“民族”论文。

皮亚特尼茨基同党的整个历史，同党的国外工作人员以及同党的俄国的地下机构，同作家和非法的运输者，是一直有联系的，他在关于1896--1917年这一时期的谨慎的、整个说来是诚实的回忆录中，谈论了所有或多或少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甚至在该书最后的索引中也没有斯大林的名字。这个事实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皮亚特尼茨基远不是反对斯大林的；相反，直到今天，他一直是斯大林的二等随从人员。在莫斯科暗探局的一大本材料（它包括布尔什维主义从1903到1917年的历史）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三处：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他被任命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他参加克拉柯夫会议；没有关于他的工作的任何话，没有任何估计，没有提到一个突出的个人特点。

斯大林不是作为一个人物而是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个成员第一次出现在警察视线之内和党的视线之内。在宪兵的报告中，像在革命者的回忆录中一样，在谈到他本人的主张和行动时，从来没有称他是领导人、创始者和作家，而总是作为党组织的一部分——作为地方委员、中央委员、一家报纸的撰稿人和一张名单上的许多人之一提到的；而且在提到他时，从来不是把他列在首位。跟和他同年的许多人相比，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晚得多，并且不是正式选入而是补选进去，这不是偶然的。

有人从彼尔姆向在瑞士的列宁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致兄弟的敬礼。今天动身去彼得格勒。加米涅夫、穆拉诺夫、斯大林。”当然，拍这封电报是加米涅夫的主意。斯大林最后签名。这三个人感到自己为团结的纽带连结起来。人救把党的最优秀力量解放出来，斯大林想到革命的首都是感到害怕的。他需要加米涅夫的相

对的声望和穆拉诺夫的代表头衔。这样，他们三人一起到达了为革命所震撼的彼得格勒。为斯大林写传记的德国人之一契·温德克写道：“他的名字在当时只有少数党内人士知道。他没有像列宁在一个月以后那样……受到持红旗和奏音乐的感到鼓舞的人群的欢迎。他也没有像两个月以后从美国赶回来的托洛茨基那样受到驱车出迎并把他举起来的一个代表团的欢迎。他无声无响地到达，坐下来工作……在俄国国境以外，没有人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

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

1917 年是国家生命中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一代的职业革命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作为一块试金石，这一年对主张、党派和人物进行考验。

在目前称为彼得格勒的彼得堡，斯大林发现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种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特别是在首都，布尔什维主义在劳工运动中占了优势。1917 年 3 月，在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曾参加 1911—1914 年运动的数量可观的群众实际上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已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不仅仅是数十万计的人站起来了。由于军事动员，这些工人中有将近 40% 是新工人。站在前线的是老工人，他们在那里起着革命酵素的作用。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为刚从乡间出来的没有什么特点的新来者、为农村小伙子和农妇所替代。这些新人必须经历像前一时期的先锋所经历过的那种政治经验，不管是多么短暂。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普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能够为起义取得胜利，但是不能为党取得政治权力。

各省的情况甚至更不好。乐观的幻想和一视同仁的博爱的浪潮，加上新近觉醒的群众在政治上的天真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自然条件。工人以及效法他们的士兵把那些至少在言论上不仅反对君主政体，而且还反对资

产阶级的人们选入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使得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从而拥有无数的鼓动者听凭他们使唤，他们全都宣称必须团结、博爱和具有同样美好的其他市民道德。军队中的代表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人，即农民利益的传统维护者，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提高该党在新由农民中来的无产阶级中的威信。因此，各种妥协分子的党派和优势看来是确定无疑了——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如此。

最糟糕的是，事变的进程使布尔什维克措手不及。它的久经考验的和可以信赖的领袖没有一个在彼得格勒。那里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名叫施略普尼柯夫和查鲁茨基的两个工人和一个名叫莫洛托夫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号召，“工厂工人以及起义军立即把他们精选的代表选入临时革命政府”。但是这项“宣言”的草拟者自己实际上并不重视他们的这项号召。他们根本不打算发动一个独立的争取政权的斗争。相反，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在今后许多年内起一个左翼反对派这样一个比较平淡的作用。

从一开始，群众就唾弃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它同贵族和官僚是一丘之貉。例如，根本谈不上工人或士兵投立宪民主党的票。政府权完全掌握在得到军人支持的社会妥协派手里。但是妥协派缺乏自信心，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后者遭到群众的憎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个政权是靠采取报复行动而存在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把临时政府视为他们的敌人。在一些工厂的集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要求把政府权力移交给苏维埃的决议。布尔什维克丁盖尔施泰特（后来被清洗）作证说：“没有一次工人集会会拒绝通过我们提出的这种决议案……”但是，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向妥协派压力屈服，停止了 this 运动。先进工人竭尽全力摆脱上面的指导，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关于革

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深奥论点。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有几派意见发生冲突。但是并没有从各种论点得出必要的推论。党处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中。著名的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后来追述：“谁也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什么，这是一种极其不妙的情況。”

斯大林〔在旧历3月12日，新历25日，星期日〕从西伯利亚归来，列宁〔在旧历4月3日，新历16日，星期一〕从瑞士归来，其间的22天极为重要，因为它们说明了斯大林的政治面貌。他突然处于广阔的活动场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都不在彼得格勒，加米涅夫在那里。加米涅夫由于他最近在法庭中的行为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并且一般说来以他的机会主义倾向闻名。还有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他在党内几乎默默无闻，主要是一个组织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容易发怒的斯潘达梁不在了：他死于西伯利亚。像在1912年一样，现在斯大林又一次暂时成了至少是彼得格勒的两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领导人的话。迷失方向的党期望得到明确的指示。用保持沉寂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不再可能了。斯大林必须回答最紧急的问题——关于苏维埃、政府、战争和土地的问题。他的答复公布了，这些答复是很说明问题的。

斯大林一到彼得格勒就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总部，彼得格勒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三个成员，在几个作家的协助下，正在决定《真理报》的色彩。虽然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他们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着手工作的。斯大林让别人在工人和士兵集会上讲话，讲哑了嗓子，他自己却深居在总部里。四年多以前，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来自库莱卡的这个流放者对于控制党的机器有其妙诀：他仍然

认为他的旧的委任是有效的。在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的协助下，他首先从领导中排除了“左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真理报》编辑部。他干得相当粗暴，由于他不怕抵抗，急于显示他是头子，情况尤其是如此。

施略普尼柯夫后来写道，“回来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所持的态度是挑剔的和否定的。”这些同志并不是对工作毫无特色和优柔寡断不满，相反，是对人们为同妥协派划清界线而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满。像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更接近苏维埃中的多数派。《真理报》在编辑部易手后，早在3月15日（28日）就宣布，“只要临时政府跟反对派或反革命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坚决支持临时政府。这项宣布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反革命的惟一重要代理人就是临时政府本身。斯大林对战争的立场表现了同样精神：只要德国军队仍然服从德皇，俄国士兵就应该“坚守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好像帝国主义问题只是一个皇帝问题！文章是加米涅夫写的，但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出异议。如果他在那些日子里跟加米涅夫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要比他的伙伴更加闪烁其词。《真理报》解释说：“一切失败主义，或者不如说是惟利是图的报纸在沙皇检查制度的保护下称为失败主义的东西，在第一个革命团队在彼得格勒大街上出现时，就消失了。”这是公然否定了列宁的话（列宁在沙皇检查制度所不及之处宣传失败主义），同时重申了加米涅夫在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受审时所作的声明。但是这一次，这篇文章是斯大林认可的。至于“第一个革命团队”，它的出现只是意味着从拜占廷式的野蛮走到帝国主义文明的一个步骤。

施略普尼柯夫追述说：“改变了的《真理报》出版的那一天是护国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日子。整个塔夫利达宫，从杜马委员会的商人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肝脏——执行委员会，只谈一条新闻，即

温和的和有理智的布尔什维克对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在执行委员会本身，我们遇到了恶意的微笑……当那一期《真理报》送到工厂时，它在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中间造成了混乱和愤怒，而我们的反对者则恶意地感到满意……边远地区的愤怒是极大的，当无产阶级发现《真理报》由最近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三个前主编指导时，他们要求把后者开除出党。”

1925年，在当时统治党的“三人小组”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压力下，施略普尼柯夫修正了他的叙述，语调软了一些。但是这个叙述的确十分清楚地记录了斯大林在革命舞台上最初的步骤，记录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这些步骤的反应。《真理报》不久不得不在它的报上刊载的维堡分子的尖锐抗议，迫使编辑部以后在表示它的意见时更加谨慎，但是并不改变它的政策。

苏维埃政治充满了妥协和暧昧。群众最需要的首先是找到愿说老实话的某个人；那当然是革命政治的要旨。人人都规避这一点；害怕打乱两个政权并存的微妙结构。

围绕战争问题讲的谎言最多。3月14日（27日），执行委员会向苏维埃提出了它的《告全世界人民》宣言草案。这个文件号召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人拒绝“充当国王、地主和银行家手里的征服和暴力工具”。但是苏维埃领导人自己丝毫无意同英国和比利时的国王、日本的天皇或者是同银行家和地主（他们本国的以及所有协约国的）断绝关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报纸满意地指出，“这个宣言正在发展成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共同持有的思想。”这番话是十分正确的——完全符合法国社会党部长们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所抱的精神。差不多是同时，列宁通过斯德哥尔摩写信到彼得格勒说，革命受到把旧帝国主义政策用新的革命词句掩饰起来这样一个危险的威胁。“我宁愿跟我们党内的任何人决裂而不愿向社会爱国主义屈服……”。但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拥护列宁的主

张。

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致通过这项宣言一事不仅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米留可夫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胜利，而且还意味着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左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有的人向假的爱国纪律屈服了。斯大林《真理报》写道：“应该欢迎……苏维埃昨天发出的……宣言。这个宣言如能深入广大群众，无疑会使数百数千的工人重新记起已经被遗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实际上，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呼吁，它们所干的只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持为民主而战这样一个幻想。

斯大林关于宣言的文章不仅清楚地揭示了他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而且还揭示了他的一般思想方法。他固有的机会主义在时间和环境的逼迫下会暂时隐藏在抽象的革命原则下，当事情到决定关头时，他的机会主义就抛弃了这些原则。他在文章的开始几乎是逐字重复列宁的论点：即使在推翻沙皇制度后，俄国参加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当他要作出他的实际结论时，他不仅以含糊的限制条件欢迎社会护国主义宣言，而且还效法加米涅夫断然拒绝动员群众反对战争这一革命作法。他写道，“首先，把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②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③借助对资产阶级施加友好“压力”（对资产阶级来说，征服是战争的整个目的），斯大林希望根据“民族自决权”来实现和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列宁一直给予最严重打击的，恰恰就是这种市侩乌托邦主义。不论多少“压力”都不能使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必须推翻他们。但

①②③ 《论战争》。《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8—9页。 译者注

是斯大林完全由于害怕而不敢作出这个结论——正像妥协派那样。

斯大林的《论取消民族限制》的文章也是同样重要的。〔载于1917年4月7日（3月25日）《真理报》。〕他的基本思想是从早在梯弗里斯学习小组时代的宣传小册子得到的，即民族压迫是一种中古时代的遗物。被视为是强国统治弱国的帝国主义，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一种概念。他写道：“没落的土地贵族是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是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在英国，土地贵族（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民族压迫比较缓和，不那么残忍。当然，这里不包括战争时期的情况，在战争进程中，政权一转入大地主手中，民族压迫就大大加剧了（例如对爱尔兰人、印度人的迫害）。”^①他的文章所充满的荒谬说法——所谓种族和民族平等在民主国家里是可靠的；在英国，在战时，政权转移到地主手里；封建贵族被推翻意味着民族压迫的废除——浸透了庸俗的民主主义精神和迟钝感。没有这样一句话：帝国主义进行了封建主义完全无法进行的（只是由于它的地方组织薄弱无力）那种规模的民族压迫。在理论方面，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他就没有前进过；不仅如此，他看来已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在1913年初在列宁的指导下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

文章得出结论说：“既然俄国革命获得了胜利，它就创造了这些实际条件，即〔为民族自由〕推翻了封建农奴主的政权……”^②对我们的作者来说，革命已经完全成为陈迹。有望的是“草拟法律”并“依法批准这些法律”，这是完全符合米留可夫和策烈铁里的精神的。他仍未谈到的不仅有资本主义剥削（斯大林甚至没有

^{①②} 《论取消民族限制》。《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8页。——译者注

想到要推翻这种剥削)，甚至还有地主阶级对上地的所有权，而他本人曾认为这种所有权是民族压迫的基础。政府是由像罗将柯和李沃夫大公这种俄罗斯地主统治的。这就是——即使是现在也是很难相信的！——斯大林在列宁宣布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前仅仅十天所持的历史和政治见解。

由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3月28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同时开幕的还有俄罗斯最重要的苏维埃代表会议。虽然自从革命以来已整整一个月，党仍然处于极端混乱的情况下，过去两周的领导工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政治趋势的分化还不明确。在流放时需要斯潘达梁到来，现在党必须等待列宁到来。像沃依廷斯基和埃利亚娃等这种激烈的沙文主义者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并同那些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的人们一起参加党的代表会议。护国主义者比经常退却和道歉的半护国主义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发表他们的意见。由于大多数代表属于Swamh〔看法不稳定的中间路线派〕，他们的发言人当然就是斯大林了。萨拉托夫的代表瓦西里也夫说，“我们大家对临时政府的看法都一样。”克列斯廷斯基高兴地赞同说，“关于实际步骤，斯大林和沃依廷斯基之间没有分歧。”就在第二天，沃依廷斯基加入了孟什维克，七个月以后，他领导一支哥萨克部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看来，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行为并未被遗忘。在代表们中间可能还谈到他给皇太子的神秘电报。或许是斯大林提醒别人注意他的朋友的这种错误。无论如何，被委派提出有关对临时政府的政策的主要政治报告的不是加米涅夫，而是名气要小得多的斯大林。这项报告的记录是保留着的；对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来说，这是一项无价的文件。这项文件的主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直接得到武装工人和士兵支持的苏维埃同只是蒙苏维埃领导人之恩而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在报告的一部分里说：

“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没有一个拥有充分的主权……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惟一革命领导者——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真正巩固革命人民的成就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保卫者的任务。”这一段摘录值得成为一整套纲领！

报告人把社会中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分工。苏维埃，即工人和士兵，进行了革命；政府，即资本家和自由地主阶级，“巩固”了革命。在1905年到1907年期间，斯大林一再著文重申列宁的话：“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更不用说领导革命了。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对它进行顽强的斗争。”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政治指导思想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由于二月革命的进程而失效。自由资产阶级领袖米留可夫在起义前几天在他的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正在火山上行走……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一个巩固的政府。”当起义开始时，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抵抗，自由派除了站在起义的胜利所准备的基础上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正是米留可夫在昨天还说一个拉斯普庭君主政体比火山爆发好，而现在却控制着临时政府。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临时政府应该“巩固”革命成果，而实际上它是在千方百计地扼杀革命。对于起义群众来说，革命的意义在于废除旧形式的所有权，即临时政府所保卫的那种形式。斯大林把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尽管妥协派尽了一切努力，这个斗争日益紧张而要变为内战）说成只是两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分工。甚至左翼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也不会把问题说成是这样。这是策烈铁里——而策烈铁里是妥协派的圣人——的理论最庸俗的表现：“温和的”和比较“坚决的”两派力量在一个叫做“民主”的舞台上

演戏。两者合演一出戏，有的人在“征服”，有的人在“巩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1924—1927年）、在西班牙（1934—1939年）以及一般在他所有倒霉的“人民阵线”中执行的现成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公式。

报告人继续说，“现在就加速事变的进程，加速资产阶级阶层的分离，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制止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分离以争取时间……为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作好准备。”代表们半信半疑地倾听这种论点。“不要吓唬资产阶级”曾经是普列汉诺夫的口号，在高加索则是饶尔丹尼亚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在跟这种思潮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达到了成熟程度。“制止”资产阶级的“分离”就一定会制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两者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1913年，斯大林本人在被捕前不久就曾写道：“‘不要吓唬资产阶级’的论调……只会引人发笑，因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吓唬’而且要从阵地上打倒这个由其辩护士——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①很难理解，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把自己一派的14年历史忘得一干二净，而在最紧要关头采取最可恶的孟什维克公式。答案可以在斯大林的思想方法中找到：他不善于接受一般概念，他的记忆力记不住这种概念。他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不时利用它们，然后毫不在意地加以抛弃。他在1913年的文章中指的是杜马选举。“从阵地上打倒”资产阶级仅仅意味着撤消自由派的委托书。目前所指的是用革命办法推翻资产阶级。斯大林把这项任务推到了遥远的未来。现在，他很像孟什维克，认为“不要吓唬他们”是必要的。

斯大林在宣读了他帮助草拟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之后，相当

^① 《彼得堡的选举》。《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78页。译者注

出人意外地宣称，他并不完全同意这项决议案，他宁愿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提出的决议案。这种花招的秘密意义是不清楚的。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途中可能参与草拟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可能他在感到代表们的态度之后，认为最好是稍为离开加米涅夫一点。但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的质量甚至比彼得堡的决议案的质量还要低：“……十分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威信的唯一源泉是临时政府必须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从西伯利亚带来的这个骗人政策证明是十分简单的：资产阶级“必须完全服从”人民并“采取”工人和农民的“方针”。几周以后，“只要……”就支持资产阶级这一公式成了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笑柄。但是有几个代表已提出抗议，反对支持李沃夫大公的政府；这个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传统完全背道而驰。第二天，社会民主党人斯切克洛夫（他本人是“只要”公式的支持者，同时是接近统治集团的“联络委员会”的委员）在苏维埃会议上漫不经心地对临时政府的真正阴谋——反对社会改革，为君主政体和兼并而努力——作了如此阴暗的描绘，以致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感到震惊而不采纳支持临时政府的公式。温和派代表诺根表示了其他许多人的看法：“现在很清楚，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支持，而是对抗行动。”左翼代表斯克雷普尼克表示了同样的想法：“自从斯大林昨天作报告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临时政府阴谋反对人民和革命……但是决议案却说要支持它。”沮丧的斯大林（他对局势的估计甚至经不起24小时的考验）提出动议，要求“指示委员会修改关于支持的那句话”。但是会议更进一步：“以只有四票反对的多数票，从决议案删去了关于支持的那句话。”

人们可能认为，从此以后，报告人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

工的整个计划将被遗忘。实际上，从决议案中被删去的只是词句而不是思想。害怕“吓唬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实际上，这项决议是一项呼吁，敦促临时政府在忙于为君主政体复辟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之际，“为彻底消灭旧政权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会议除了对自由派施加友好的压力之外，不敢再做别的事情。它没有提到为取得政权——即使只是为了民主目标——而进行独立的斗争。加米涅夫在同时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权力问题上他“乐于”作为布尔什维克投标支持右翼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所提出的正式决议案。他这样宣布好像是一心想要最为清楚地揭示已通过的决议背后的真正精神似的。从这些事实看来，由于1913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而永久化的1903年分裂一定只是一种误解。

因此，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考虑右翼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议，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以最同情的态度对此表示了反应：“我们应该这样做。有必要阐明我们关于统一的条件的建议。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的路线统一是可能的。”所说的路线就是在瑞士举行的两次社会党会议上的“路线”，在这两次会议上，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占了优势。两周前由于左倾遭到惩罚的莫洛托夫胆怯地提出异议：“策烈铁里希望把不同的因素统一起来……根据这个路线统一是错误的……”。查鲁茨基的抗议较为坚决：“只有市侩才会仅仅由于希望统一而统一，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这样……在表面遵循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路线的基础上统一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提出一项明确的纲领。”但是，被称为市侩的斯大林坚持立场：“我们不应该跑在前头并促进分歧。党的生活是不可能没有分歧的。我们会忘记党内这些小分歧。”人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斯大林宣布同苏维埃内占优势的集团的鼓动者策烈铁里的分歧是在党内可以“忘记”的小分歧。这次讨论是在4月1日（旧历4月14日）进行的。三天

后，列宁宣布对策烈铁里进行誓死斗争。两个月以后，策烈铁里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逮捕了他们。

1917年3月会议对于了解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思想状况，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蛰居四年之后回来的斯大林的思想状况，特别重要。他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分子和痴呆的乡下佬，后来有了点名气，时势迫使他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在那几周里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在战争年代的立场。如果他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略微接受一点列宁的思想，像人们20年后写的回忆录所声称的那样，他本来是不会像他在1917年3月那样无可挽回地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的。由于列宁不在以及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才有可能在革命爆发时显示他真正的为人，暴露他的最根深蒂固的特性——不信任群众，完全缺乏想像力，目光短浅，爱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以后的年代，每当斯大林有机会在重要的局势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时候，这种特性就继续暴露出来。斯大林在三月会议上十分彻底地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政客，因此三月会议今天已从党史中删去，有关这次会议的记录被封存起来。1923年，有人为“三人小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秘密准备了三个副本。只是1926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反对斯大林时，我才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得这项了不起的文件，这样，我才能够在国外以俄文和英文加以发表。

但是，这项记录在本质上毕竟同他的《真理报》文章毫无不同，而仅仅是补充了这些文章。我们没有看到过斯大林在那个时期有一篇文章、建议和抗议或多或少能清楚地把布尔什维克观点同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政策对立起来。当时的见证人左翼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已经提到的宣言《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作者——在他的极为宝贵的《革命札记》中写道：“除了加米涅夫之外，

当时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斯大林……在他的没有什么特点的任期内……〔他〕给人们——不仅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偶尔隐现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灰点。实际上，关于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苏汉诺夫后来为这段显然是相当片面的叙述付出了生命代价。

4月3日〔16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在穿过交战国德国之后，越过芬兰边境，到达了彼得格勒……以加米涅夫为首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前往芬兰欢迎列宁。斯大林没有去，这个小的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和列宁之间是根本没有个人亲密关系的。海军军官（后来是苏联的一个外交官）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屋坐下时，就问加米涅夫：‘你们一直在《真理报》写些什么？我们看过几期，对你们很生气……。’”加米涅夫在国外同列宁工作的时期里，已经十分习惯于这种冷水了。但是他仍然爱戴列宁，甚至崇拜他，崇拜他的一切：他的热情、他的深奥之外、他的朴素、他的俏皮话（俏皮话还没有说出，加米涅夫就笑了）、他的笔迹（加米涅夫不自觉地模仿列宁的笔迹）。许多年后，有人追述，列宁曾在路上问起了斯大林。这个很自然的问题（无疑，列宁问起了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后来在苏联一部影片中成为情节的开端。

报道革命情况的一个观察力敏锐的和耿直的人，对列宁在成群的布尔什维克面前第一次公开露面作了如下的叙述：“我永不会忘记这篇演说，这篇演说像雷一样，不仅使我这个偶尔走进人群的异端分子，而且甚至还使所有的信徒受到震动和吃惊。肯定地说，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发表这种演说。”

这不是发表雷鸣般雄辩演说的问题（列宁是不发表这种演说的），而是他的整个思潮的问题。“我们不要议会制共和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我们不要除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之外的

任何政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即当时的“人民阵线”只是对人民的背叛。他强烈地嘲笑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粹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拉在一起的“革命民主”这个时髦名词。统治苏维埃的妥协派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苏汉诺夫说，“在当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听众头晕！”

党对于列宁，正如对二月革命一样，毫无准备。在革命的五周中积聚起来的一切准则、口号和说法被打得粉碎。拉斯科尔尼科夫写道：“他坚决攻击党的领导集团和个别同志在他到来之前采取的策略。”拉斯科尔尼科夫指的首先是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最负责的党的工作者都在场。甚至对他们来说，伊里奇的演说都是全新的东西。”没有进行讨论。大家都惊愕不已以致无法进行讨论。谁也不愿使自己遭到这位厉害的领袖的攻击。他们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地说，伊里奇在国外住得太久了，他同俄国失去接触，他不了解情况，更糟糕的是，他走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去了。昨天还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的斯大林默不作声。他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比他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为分地辩护时或者比他在一年后一度成为抵制主义分子时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得多。肯定地说，最好是隐退。谁也不想知道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因此，谁也记不起斯大林在后来几周做了些什么，因而无法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任何叙述。

同时，列宁远不是无所事事的。他用他的尖锐眼光观察情况，向他的朋友提问题，征询工人的意见。就在第二天，他向党提出了一项关于他的看法的简短纲要。这些看法后来成了作为《四月提纲》而著名的最重要革命文件。列宁不仅不怕“吓唬”自由派，甚至还不怕“吓唬”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他并没有向布尔什维克党的自命不凡的领袖闪烁其词。他清楚地说明了阶级斗争的逻

辑。他抛开了胆怯的、无用的“只要”公式，他向党提出了夺取政府的任务。但是首先必须断定谁是敌人。缩在角落里的黑帮保皇派是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参谋部是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由它鼓动的临时政府组成的。但是后者是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恩而存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由于群众的易受欺骗而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采取革命暴力。首先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必须在工人、士兵和农民面前揭露民粹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不是同他们团结友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要向群众说明……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①这个纲领中的一切都是质朴的、可靠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中肯的。在这个提纲上只有一个人的签名：“列宁”。党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都不愿在这项爆炸性文件上签名。

就在4月4日，列宁出席了斯大林曾解释过他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实行和平分工理论的那次党代表会议。对比是太尖锐了。为了缓和这种对比，列宁一反他的习惯作法，没有分析已经通过的决议，而只是抛开它们。他把会议提到了高得多的水平。他迫使会议看到新的前景——姑息的领袖们甚至没有猜到的前景。这位新报告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夺取政权？”他进而申述了当时流行的解释：革命大概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只是在初步阶段；战争造成了没有预见到的困难，等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问题是，无产阶级没

^① 参看《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4—115页。——译者注

有充分觉悟起来，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应当承认这一点。物质力量是在无产阶级手中，但是资产阶级是十分警惕的和作好准备的。”列宁把问题从假客观主义领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人企图躲在这里而不执行革命任务）转到了觉醒和行动的领域。无产阶级之所以未能在二月夺取政权，并不是由于社会学规定不能夺取政权，而是由于他们未能夺取政权一事使妥协派能够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欺骗无产阶级——问题就是这样！他继续说（而迄今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表现了对政府的信任。这只能用陶醉于革命来解释。这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不能同意。我宁愿继续居于少数。”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不难认识到所指的是他们自己。全体与会者都知道这篇讲话指的是谁。代表们毫不怀疑，当列宁扬言决裂时，他不是开玩笑。这与“只要”公式和以前的一般陈腐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战争问题的轴心也同样坚决地转移了。尼古拉·罗曼诺夫被推翻了。临时政府部分地答应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一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吗？法国早就是一个共和国，而且不止一次是共和国。但是它参加战争的作法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性质是由统治阶级的性质来决定的。“当群众宣布他们不要任何征服时，我相信他们。当古契柯夫和李沃夫说他们不要任何征服时，他们是在说谎。”这个简单的准则是极其科学的，同时是战壕中的每个士兵所能理解的。然后列宁直接进行了攻击，直接提到《真理报》的名字。“要求资本家的政府放弃兼并是荒唐的，是极大的笑话。……”这番话是直接攻击斯大林的。“要缔结……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①然而妥协派支持资本家，

^①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4页。——译者注

《真理报》则支持妥协派。“苏维埃的号召没有一个字表现了一点阶级觉悟。它完全是玩弄词藻。”这里指的是斯大林当做国际主义声音来加以欢迎的那项宣言。在保持着旧联盟、旧条约和旧日的情况下，和平主义词句只能起欺骗群众的作用。“俄国的独特之点是，从无法控制的暴力异常迅速地过渡到极其阴险的欺骗。”三天前，斯大林宣布他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统一。列宁说：“我听说在俄国有一种统一倾向。同护国派统一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我认为，最好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保持孤立，以一当十！”甚至要用孟什维克所用的那个名称即社会民主党，都不再容许了。“我提议更改党的名称，提议我们称自己为共产党。”与会者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刚同列宁一道回来的季诺维也夫）支持这个建议，因为看来，它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的过去作亵渎神圣的决裂。

继续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编辑的《真理报》声称，列宁的提纲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并不同意他的意见，《真理报》本身将继续奉行自己的旧政策。这项声明是加米涅夫写的，斯大林默默地支持他。他必须长时期保持沉默。列宁的思想在他看来是流亡者的幻想，但是他等着瞧党机构如何反应。布尔什维克安加爾斯基（他经历了其他人所经历的那种演变）后来写道：“必须公开承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保持着1905年老布尔什维克的看法。抛弃这些看法是不容易的。”事实上，问题不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而是全体老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例外。在全国党干部举行的三月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为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全都必须在思想上自我改造。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16个委员中，只有两人支持提纲，甚至他们也不是立刻支持的。齐霍夫追述说：“许多同志指出，列宁失去了同俄国的接触，未把目前情况考虑进去，等等。”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列别捷夫谈到布尔什维克起初如何谴责列宁进行鼓动：“这种鼓动

看来是空想的，这是因为他长期没有同俄国生活发生接触。”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之一无疑就是一向轻视“流亡者”的斯大林。几年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追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后在我们党的策略中规定了断然措施。必须承认，在他回来之前，党内肯定是非常混乱的……人们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任务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人们认为，在某种条件下支持临时政府就够了。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能够把它团结成一个单位，领导它。”1922年，拉斯科尔尼科夫原本不会想到他会看到斯大林成为“有权威的领袖”。乌拉尔工人马尔科夫（在革命发生时，他在车床旁边工作）写道：“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之前，我们的领袖一直在暗中摸索……随着他的著名提纲的出现，我们党的立场开始澄清了。”在列宁去逝后不久，布哈林说：“回想他的提纲所受到的待遇吧，当时我们自己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四月提纲实际上是背弃了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件。”“我们自己党内”这个“部分”包括党的全体领导人，没有一个例外。莫洛托夫在1924年写道，“随着列宁在1917年回到俄国，我们党开始感到它站在稳固的基础上……在他回来之前，党只是怯懦而毫无把握地摸索它的道路。……党缺乏革命时刻所需要的明确性和坚定性。……”柳德米拉·斯塔夫比其他人更早一点对所发生的变化作了比较确切而清楚的阐述：“在列宁回来之前，所有的同志全都在黑暗中徘徊……”她是在1917年4月4日〔17日〕在党的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这样说的。“看到人民的独立的创造性，我们不能不加以考虑……我们的同志们满足于仅仅通过议会方法为制宪议会作准备，甚至没有考虑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性。由于接受了列宁的口号，我们就要做生活本身敦促我们做的事情了。”

党4月间在思想上的重新武装使斯大林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他从西伯利亚回来时，拥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一个

中央委员的头衔，得到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的支持。他在思想上也开始进行自己的那种“重新武装”，他拒绝了当地的领袖们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过激，并通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若干文章、在会议上作的一次报告和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草拟的决议案而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活动进行当中（这种活动按其性质来说是领导人的工作），列宁出现了。他参加了会议，像一个督学走进教室一样。他听了一会儿教师的讲课以后就撇开教师，用一块湿海绵把这位教师在黑板上乱写的无用东西全部擦掉。代表们的情绪由吃惊和抗拒变成钦佩。但是斯大林并不表示钦佩。他非常不快，感到毫无办法，并且深为嫉妒。他在全党面前丢了脸，丢脸的程度比他对《真理报》进行了不幸的领导之后在克拉柯夫的秘密会议上远为严重。对此进行斗争是毫无用处的。他现在也看到了他在一天以前甚至没有猜到的新前景。他所能做的只是咬牙切齿和保持沉默。列宁在1917年4月实现的革命永远铭刻在他的意识中。这使他痛心。他掌握了三月会议的记录，企图把它藏起来，不让党看到，不使记录载入史册。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解决问题。1917年的《真理报》合订本仍在图书馆里保存着。此外，那几期《真理报》都再版了——斯大林的文章本身说明了问题。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的历史刊物和各报出的创刊纪念号都充满了许多回忆四月危机的文章。因此，必须逐步使这一切不再流传，加以伪造，并以新材料来代替。我在1922年偶然使用了党的“重新武装”一语，这个字眼后来成为斯大林及其周围的历史学家进行日益猛烈攻击的对象。

不错，迟至1924年，斯大林仍然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在对自己表示应有的宽容以后承认自己在革命开始时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他写道：“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①为了在当时已开始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保护自己的后方，有必要公开承认这一点。这种承认在两年以后证明对他的限制太大了。1926年，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否认他在1917年3月所采取的政策的机会主义性质：“这是不确实的，同志们，这是流言！”——仅仅承认他有“某种动摇……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暂时的动摇呢？”雅罗斯拉夫斯基曾以历史学家的资格提到：斯大林在革命开始时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四年后，他受到了各方面强烈的迫害。不再容许甚至是提到“暂时的动摇”了。威信这个偶像是一个贪心的怪物！最后，在斯大林自己编的“党史”中，他把列宁的立场说成是他自己的立场，把他自己的见解说成是他的敌人的见解。这部了不起的历史宣称：“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组织中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等人持着有条件赞助临时政府和拥护护国派政策的半孟什维主义立场。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所回来——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协同党内大多数同志，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立场。”^②等等。这样，通过逐步把事实变成谎言，黑的就变成白的了。加米涅夫称之为“散播谎言”的这种方法贯穿着斯大林的整个传记。在莫斯科进行的审讯中，这种方法的表现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垮了台。

①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9页。——译者注

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1—242页。——译者注

我在1909年分析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的基本思想时写道：“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时候才会有巨大的危险性。”1917年3月，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党的老干部使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些反革命特点得到了极端的表现，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区别看来已经消失。迫切需要把党在思想上大大重新武装起来。只有列宁伟大得足以担任这个任务，他在4月间完成了这一任务。显然，斯大林不愿公开出来反对列宁。但是他也没有出来支持列宁。他毫不费力地摆脱了加米涅夫，正如十年前他抛弃抵制派那样，也正如他在克拉柯夫会议上不声不响地让调和派听任命运摆布那样。他不惯于为没有立即成功的希望的任何思想辩护。彼得格勒组织的会议从4月14日一直举行到22日。虽然列宁的影响已占优势，辩论有时仍然很激烈。参加的人中有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等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甚至没有到场。显然，他想要暂时被人遗忘。

全俄代表会议4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这次会议要澄清三月会议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大约150个代表，共代表着7.9万个党员，其中1.5万个在首都。对于昨天刚从地下出来的一个反护国主义的党来说，这种情况不是很坏的。列宁的胜利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五个党员被选入主席团，而对三月机会主义政策负责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没有当选。加米涅夫有足够的勇气要求在会上作少数派报告。“由于认识到古典封建主义残余和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还没有消灭……现在还不能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是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捷尔任斯基和安加尔斯基等人的基本思想。李可夫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原应来自西方。”反对派演说家支持加米涅夫，坚持说民主革命还未结束。这是真实

的。可是，临时政府的任务不是完成革命，而是改变革命的进程。因此，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执政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辩论很激烈，然而和平的，因为在一切根本方面，问题已在事先决定了，列宁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使反对者易于后退。

在辩论进行期间，斯大林作了简短的发言，反对他昨天的盟友。加米涅夫在他的少数派报告中曾争辩说，既然我们并不要求立即推翻临时政府，我们就必须要求监督它，否则群众就不会了解我们。列宁反驳说，无产阶级对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监督”，特别是在革命条件下，不是空想，就是等于同它合作。斯大林认定，现在是表示他同加米涅夫有分歧意见的一个大好时机。为了装得好像是在为自己的立场的改变作一种解释，他利用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4月19日发表的一项照会。米留可夫的极端帝国主义的直言不讳的态度，差不多使士兵走上了大街，引起了一次政府危机。列宁对革命的看法是以阶级的相互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孤立的外交照会为基础的，这种照会同政府的其他行动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斯大林对一般概念不感兴趣。他所需要的只是某种明显的借口，以便他可能改变，而使他的虚荣心丝毫不受损害。他在“逐步”后退。最初，他说，“拟定纲领的是代表苏维埃，而现在拟定纲领的却是临时政府了。”^①在米留可夫照会之后，“政府在进攻苏维埃，苏维埃在退却。在这种情形下谈苏维埃监督政府的问题，等于讲空话。”^②这番话听来是牵强的和错误的。但是诡计成功了：斯大林这样就设法使自己及时同反对派分离，当投票时，反对派只得到7票。

①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8—49页。——译者注

斯大林在他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中千方百计地弥合他的三月报告（这项报告认为，民族压迫的根源完全是土地贵族）和新的立场（党目前正在研究这种立场）之间的差距。他不可避免地反驳自己说：“支持民族压迫的不仅有土地贵族。除他们以外还有别的力量——帝国主义集团，这些集团把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奴役各民族的方法搬到本国内部……。”^①此外，追随大资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上层分子，他们也分享掠夺的果实”^②。这就是列宁在战争年代如此坚持不懈地反复讲述的理论。他的报告继续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支持民族压迫的社会力量的合唱队。”^③为了结束这种压迫，必须“把这个合唱队从政治舞台上清扫出去”^④。由于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二月革命肯定没有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奠定基础。例如，临时政府尽力反对为扩大芬兰的自治而作的一切努力。“我们应当站在哪一方面呢？显然应当站在芬兰人民方面……”^⑤乌克兰人皮达可夫和波兰的捷尔任斯基表示反对民族自决纲领，认为这是空想的和反动的。捷尔任斯基天真地说：“我们不应该提出民族问题，因为这样会耽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因此，我建议从决议案中取消波兰独立问题。”斯大林回答说，“社会民主党既然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就应当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⑥这是斯大林在他一生中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照帝俄时期的旧历，那一天是1917年4月29日。

代表会议具有一次代表大会的特权，因此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米

①—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页。——译者注

留亭、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斯大林、费多罗夫；候补委员是泰奥多罗维奇、布勃诺夫、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和普拉夫定。由于某种原因，在133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只有109人参加了秘密投票。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离开这个城市了。列宁得到104票（斯大林也许是拒绝支持列宁的5个代表之一？）季诺维也夫得到101票，斯大林97票，加米涅夫95票。斯大林第一次按照党的正常方式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他当时快38岁了。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一次由党代表大会选入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时只有二十三四岁。

在代表会议上，有人曾企图把斯维尔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谈及此事，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大错误。他又说，“很幸运，我们得到了来自下面的纠正。”列宁本来很难有什么理由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候选资格的。列宁只是通过通信了解他是一个不倦的职业革命家。反对意见可能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忘记斯维尔德洛夫如何在他之后在彼得格勒把情况纠正过来，改组了《真理报》；他们在库莱卡的共同生活仅仅增进了他的敌意。斯大林决不宽恕任何事情。他显然企图在会议上进行报复，以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我们只能猜测他用了什么办法设法赢得列宁的支持。但是他的图谋没有得逞。如果说在1912年列宁想使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时遭到了代表们的反对，那么现在，当他想排斥斯维尔德洛夫于中央委员会之外时，遭到了同样的反对。在四月代表会议上选出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斯维尔德洛夫寿终正寝，其他所有的人——斯大林本人除外——以及四个候补委员，不是被正式枪决，就是被非正式地消灭。

没有列宁，谁也不知道怎样利用这种空前的局面。大家都受了旧公式的束缚。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现在死抱住民主专政的

口号就意味着“实际上倒向小资产阶级”。很可能，斯大林胜过他人之处在于他对倒戈以及对于愿意同妥协派和解、同孟什维克合并，毫无内疚。他丝毫没有由于对旧公式的尊敬而受到妨害。意识形态崇拜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因此，他毫无内疚地抛弃了长期抱有的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的理论。像往常一样，斯大林在他天然具有的机会主义的压力下凭经验行事，这种机会主义总是驱使他寻求阻力最小的路线。但是他在他的立场上并不是孤立的；在列宁回来之前的三星期中，他一直在表示的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内心隐藏的信念。

不应该忘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的出身和生活条件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思想和他们跟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变成职业革命家的工人们非常急切地参加到这派人中间去，他们参加进去以后就失掉自己的特点。党机器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权威（这两点都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不止一次成为党动摇的原因，最后成了党堕落的原因。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这个理论表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但是党机构中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比较有限的经验，只吸收这个理论的零星部分。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往往只是死记现成的公式，而闭目不视情况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乏同劳动群众的独立的日常接触，也缺乏对历史进程的全面了解。因此他们易于受到其他阶级的影响。战时，党的上层大半受到来自资产阶级人士的妥协主义倾向的影响，而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在抵抗席卷全国的护国主义歇斯底里方面表现了大得多的稳定性。

革命为民主进程开辟了广泛的行动领域，在这方面，革命使各党的“职业革命家”感到满意的程度远远超过使战壕中的士兵、村庄中的农民和军火工厂中的工人感到满意的程度。昨天还在地

下活动的一批无名之辈突然变成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他们不是成立了议会，而是成立了苏维埃，他们在苏维埃中可以自由地争辩和统治。对他们来说，引起革命的那种阶级矛盾看来正在民主日光的照耀下消失了。因此，几乎在俄国的各个地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了。即使在他们仍然分开的地方，例如在彼得格勒，两个组织对合并的要求肯定是迫切的。同时，在战壕中，在村庄中，在工厂里，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公开和强烈，这预示着内战，而不是合并。像时常发生的那样，在行动起来的阶级和党机器的利益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裂痕。甚至受到特殊革命训练的布尔什维克党干部，在君主制度被推翻后的那一天，就明确倾向于忽视群众，宣布自己的特殊利益同这个机器的利益是一致的。当这种干部成为权力强大的国家官僚时，能期望他们做些什么呢？斯大林是不会对这个问题作任何思考的。他是这部机器的精华，是其中最有力的骨干。

但是，列宁通过什么奇迹在短短几周内把党的道路变成了一条新的途径呢？应该同时在两方面——列宁的个人特点和客观情况——寻求答案。列宁所以强而有力，不仅因为他了解阶级斗争的法则，而且还因为他善于倾听在行动中的群众的意见。他所代表的与其说是党机器，不如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肯定相信，在担负支持地下党的重责的那些工人中，现在有数以千计的人会支持他。当时，群众比党更富革命性，党比它的机器更富革命性。早在3月间，工人和士兵的真正态度在许多情况下已变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同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发出的指示完全不同。列宁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巨大的，因为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证实他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党机器的权威，像它的保守主义一样，当时只是在形成之中。列宁并不是作为个人发挥影响的，而是因为他体现了阶级对党的影响以及党对它的机器的影响。在

这种情况下，谁试图抵抗，谁就很快失去立足之地。动摇分子同在前线的人趋于一致。抱审慎态度的人参加了大多数。因此，列宁以比较小的损失及时规定了党的方向，并且使党对新的革命作好准备。

布尔什维克领袖在没有列宁指导的情况下行事时，总是犯错误，通常是右倾。然后，列宁像救星一样出现，指明正确的道路。这是不是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列宁就是一切，其他所有的人都无足轻重呢？在民主人士中相当普遍的这个结论是极偏的，因此是错误的。对于科学也可以这样说。许多年来，机械学没有牛顿，生物学没有达尔文，似乎就都无足轻重了。这一点也对也不对。为了搜集事实，加以分类，提出问题，为牛顿或达尔文的广泛解决办法准备基础，需要数以千计的普通科学家进行工作。这种解决办法则又影响了数以千计普通的新的研究人员的工作。天才并不是从他们自己本身创造出科学来；他们只是加速了集体思考的过程。布尔什维克党有一个天才领袖，这不是偶然的。只是具有列宁的性格和气魄的革命家才能成为最大无畏的党的领袖，这个党能够使它的思想和行动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天才本身是最少有的。一个天才领袖在确定自己的方向方面比别人快，估计局势比别人透彻，看得比别人远。在一个天才领袖和他的最亲密伙伴之间产生巨大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的远见所具有的力量抑制了他的伙伴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列宁是“一切”，党没有列宁就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没有党，列宁就像牛顿和达尔文没有集体科学工作一样，将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问题不是大概受了集中和纪律等等东西影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殊罪恶，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的天才问题。有的作家企图贬低布尔什维克党，说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幸而有一个天才领袖罢了。这些作家仅仅表明他们自己在

思想上庸俗。

布尔什维克领导如果没有列宁，原会找到正确的行动方针，然而而是缓慢地找到，并将以磨擦和内部斗争为代价。阶级矛盾原会继续否定和拒绝布尔什维克保守派的毫无意义的口号。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其他二流人物的抉择是，不是坚持表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倾向，就是干脆跑到街垒的另一边。我们决不可忘记，施略普尼柯夫、查鲁茨基和莫洛托夫从革命一开始就试图采取比较左的路线。

但是这并不是说正确的道路总会找到。时间因素在政治中特别是在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阶级斗争不会无限期地等待政治领袖找到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天才领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通过可以作为教训的实例缩短了学习时期，使党能够在适当的时刻影响事变的发展。如果列宁未能在4月初回来，党无疑终于会摸索到他的“提纲”所提出的方针。但是，难道别人不能使党及时对十月的结局作好准备吗？这个问题不能直截了当地答复。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需要迟钝的党机器坚决地面对行动起来的群众和思想——斯大林是不能以必要的创造性主动行事的，他会成为一个制动器，而不是一个推进器。只是在有可能借助这个机器来利用群众之后，他才开始有力量。

很难追溯斯大林在以后两个月中的活动。他突然退居三等地位。列宁本人现在直接日夜负责《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不仅像战前那样从遥远的地方进行控制。《真理报》为整个党定下调子。季诺维也夫是鼓动工作的主宰。斯大林仍然没有在任何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对新政策不热情的加米涅夫，是党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中的代表。斯大林实际上已从这个舞台上消失，甚至在斯莫尔尼也很难看到他。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了最杰

出的组织活动的最高领导，给党的工作者分配任务，同地方人员打交道，调整矛盾。斯大林除了在《真理报》承担的例行责任和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外，还偶尔分配到行政的、技术的或外交的任务。这种任务远不是很多的。生性懒惰的斯大林，只有在直接涉及他个人利益时才能够因为受到压力而进行工作。否则，他宁愿吸他的烟斗和等待。他一度真正感到不快。他到处都为更加重要或更有才能的人所代替。一想到3月和4月的事情，他的虚荣心就马上受到刺激。他一反自己的本性，慢慢地改变了他的思想的趋势。但是，在决定性关头，这证明是一种半心半意的转变。

在风暴般的“四月的日子”里，当士兵们走上大街，抗议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照会时，妥协派像往常一样，忙于向政府提出劝告和向群众作出安抚性的保证。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和其他驻军发出了由齐赫泽签名的一封教书式电报，承认米留可夫的好战照会不值得予以赞同，但是又说，“谈判已在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之间开始，还没有结束”（这种谈判按其性质来说是决不能有结局的）。〔它继续说〕，“鉴于一切零星的和无组织的公开出动的危害性，执行委员会要求你们抑制自己”，等等。

我们从正式的记录中惊讶地注意到，电报的全文是由两个妥协派分子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委员会草拟的，而这个布尔什维克就是斯大林。这是一个小插曲（在那段时期，我们没有找到有关他的重要插曲），但是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插曲。这封安抚性的电报是说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中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监督”的一个小的典型例子。布尔什维克同这项无用政策发生丝毫接触都遭到列宁的特别猛烈的谴责。如果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公开出动不合时宜，这个委员会原应以党的名义，用自己的话对他们这样说，而不是由自己对齐赫泽和李沃夫大公之间的“谈判”负起责任。妥协派之所以把斯大林安插在这个委员会里，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

克在喀琅施塔得享有任何威信。这就更加是拒绝这项任务的理由了。但是斯大林没有拒绝。在发出这封安抚性电报之后三天，他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恰恰选择了关于米留可夫照会的争执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监督”是毫无意义的。逻辑的矛盾从来没有使这个经验主义者感到不安。

在6月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党组织代表会议上，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基本的政治报告之后，斯大林作了关于《民族团队中的民族运动》的报告。在受到被压迫民族觉醒的影响的现役陆军中，部队自发地按民族重新编制。因此就产生了乌克兰军团、伊斯兰军团和波兰军团等等。临时政府公开反对这种“军队的瓦解”，而布尔什维克则出来保卫被压迫民族。斯大林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它是不会增加什么新东西的。

6月3日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拖了将近三周。来自各省的几十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他们消失在大批妥协派分子中间）远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且仍然抱有3月的情绪。要领导他们是不容易的。我们早已知道的一个民粹党人（他在巴库的监狱中曾经一度观察过柯巴）有趣地提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维列沙克在1928年写道：“我用种种方法设法了解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作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克雷连柯坐在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桌子旁，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主要发言者，而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则默默地指导着布尔什维克党团。他们是战术力量。当时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人的全部重要性。”维列沙克没有说错。斯大林在幕后使布尔什维克党团对投票作好准备方面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并不总是用原则进行争论。但是他的确具有说服普通的特别是地方上的领导人的妙诀。但是即使在这个工作上，占主要地位的也是斯维尔德洛夫，他是在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常任主席。

同时，政府正在使军队对进攻作好“精神”准备，这种进攻使得在国内和前线的群众精神沮丧。布尔什维克党团坚决反对这种军事冒险，并且预言会有灾难。代表大会的多数都支持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决定用街头示威来对付，但是在考虑这一点时，产生了分歧意见。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支柱沃洛达斯基不能肯定工人们会走上大街。军队党组织的代表们坚持说士兵们不带武器就不会出来。斯大林认为“事实是，在士兵中间有激动情绪，而在工人中间没有这种明确的情绪”。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反抗政府。最后决定在6月10日星期日举行示威。妥协派很惊慌，他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禁止示威。布尔什维克屈从了。但是代表大会对于它禁止群众示威的命令所造成的恶劣印象感到害怕，因此它规定在6月18日举行一次大示威。结果是出人意料的：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团队都举着布尔什维克标语牌走出来。代表大会的威信遭到了一次无法挽回的打击。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两星期后，他们尝试利用这一点。因此就产生了“七月事变”，这是两次革命之间的最重要的分界线。

5月4日，斯大林《真理报》写道：“革命正在扩大和深入……走在运动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说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么现在它开始落后了。”^①恰恰在两个月以后，“七月事变”证明，各省大大落后于彼得格勒。斯大林在作估计时所想到的是组织，不是群众。列宁早在四月会议时就说过：“首都苏维埃在政治上比地方苏维埃更加依赖资产阶级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竭尽全力设法把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各省的苏维埃（组成这种苏维埃

^① 《革命的落伍者》。《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58页。——译者注

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许多情况下违反地方政府的意志而接管了地方政府,甚至设法调节经济生活。但是首都苏维埃机构“落后”的原因是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走得太远,以致他们的要求的激进性吓坏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讨论七月示威时,斯大林说,工人们并不希望闹事。七月事变本身驳斥了这个论点,无产阶级无视妥协派的禁令,甚至无视布尔什维克党的警告,涌上了大街,同驻军们并肩前进。斯大林的两个错误特别表现了他的特点:他并未呼吸到工人集会的空气,他跟群众没有联系,不信任群众。他所掌握的情报是通过党机器得来的。但是群众同党比较起来更富革命性,党则比它的委员会委员更富革命性。像在其他场合那样,斯大林表现了党机器的保守倾向,而不是群众的有生力量。

7月初,彼得格勒早已完全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新闻记者克劳德·阿奈在使法国新任大使了解首都的新局势时,指向涅瓦大街那边的一些最大的工厂集中地维波尔格区,“在那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成了主宰。”几团驻军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就是朝布尔什维克方向动摇。“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夺取彼得格勒,谁会制止他们呢?”对局势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当时还不可能夺取政权,因为,尽管斯大林在5月写了上面引述的那样的话,各省仍是大大落后于首都的。

7月2日,两个情绪激动的机枪团代表进入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会场(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声称他们的团已决定立即全副武装走上大街。会议正式表示反对这个行动。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会议的这个决定。13年后,斯大林的一个合作者、悔过的机会主义者培斯特柯夫斯基追述了这次会议:“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会议室容纳不下所有与会者,部分群众从走廊通过开着的门倾听辩论情况。我

也在这部分群众中间，因此我不能清楚地听到这个报告……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出现。由于他说话声音不大，我从走廊里没有听出他说的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注意到的：斯大林的每句话都很尖锐有力，他的讲话的特点是他的提法清楚……”

与会者分散后就前往自己的团队和工厂，以便阻止群众举行公开示威。斯大林在事后报告说：“在5点钟左右，我曾经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名义正式声明我们决定不举行发动。”^①但是，到大约6点钟的时候，示威爆发了。“党有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应当参与这个发动，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而不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②。稍后，斯大林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叙述了七月事变的情况：“党不要举行示威，党希望等到在前线的进攻政策名誉扫地时为止。但是国内混乱、克伦斯基的命令和派遣军队赴前线一事所引起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发生了。”中央委员会决定使示威具有和平性质。“士兵们提出了可否携带武器出动的问题，中央决定不带武器。但是士兵们说不带武器出动不行……他们携带武器只是为了自卫。”^③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暧昧的证词。这位桂冠诗人在1929年以兴高采烈的语调谈到斯大林如何在《真理报》总部接到喀琅施塔得来的电话，如何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是带武器还是不带武器出动。斯大林回答说：“步枪？……你们同志们知道得最清楚！……至于我们文人，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武器铅笔，我们到处都带着……至于你们和你们的

①②③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页。

译者注

武器……你们知道得最清楚！……”这个故事大概是夸大的。但是可以感到里面有一点真实之处。总的说来，斯大林倾向于低估工人和士兵的战斗准备。他总是不信任群众。但是不论什么地方发生战斗，不论是在梯弗里斯的广场上，在巴库的监狱里，还是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他总是力图使战斗的性质尽可能尖锐。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总是可以用关于铅笔的比喻来审慎地加以推翻的。但是人们决不可夸大这个插曲的意义。这个问题大概是喀琅施塔得党委员会提出的。至于水兵，他们无论如何原会带着他们的武器出动的。

七月事变没有发展成为一次起义，它突破了仅仅是一种示威的范围。有人从窗户和屋顶上进行了挑衅性的射击。发生了没有计划的或者没有明确目的的武装冲突，但是有许多人伤亡。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偶然把彼得巴甫洛要塞攻下一半，塔夫利达宫被包围了。布尔什维克证明自己完全是首都的主人了，却故意把起义作为冒险而否定。斯大林在彼得格勒会议上说：“我们原能在7月3日和4日夺取政权。但是前线、各省和苏维埃会起来反对我们。没有各省的支持，我们的政府就没有手足了。”由于缺乏直接的目标，这个运动开始消失了。工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士兵们回到了自己的营房。彼得巴甫洛要塞的问题依然存在，喀琅施塔得驻军仍然占领着这个城堡。斯大林说：“中央委员会派我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我在那里终于说服了水兵卫戍部队不要应战……我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一同去找〔指挥官〕库兹明。库兹明……作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劝他不要使用武力。我很清楚，社会革命党的军人们是想造成流血事件，以便给工人、士兵和水兵一个‘教训’。我们阻

碍了他们完成他们的背信弃义的计划。”^①斯大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执行这一微妙任务，只是因为他在妥协派的眼中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他们的仇恨是针对其他人的。此外，他跟别人不一样，能够在这种谈判中采用避免过分行为并倾向于妥协的一个稳重而温和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调。他肯定没有提到他向水兵提出的关于“铅笔”的忠告。

不顾明显的事实，妥协派宣布七月示威是一次武装暴动，并指控布尔什维克进行阴谋活动。当运动结束时，反动军队从前线开回来。在报纸上出现消息（消息是根据司法部长彼列维尔节夫的“文件”写的）说，列宁和他的合作者不折不扣地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接着，诽谤、迫害和骚动的日子开始了。《真理报》报馆被捣毁。当局发布命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造成“暴动”的其他人。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阴险地要求犯罪者自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列宁是应该到当局那里去针对诽谤进行公开斗争，还是应该躲藏起来？这个问题是否会发展为一次法庭审判？有人动摇，在局势发生这种突变时，动摇是不可避免的。

在那些日子里谁“拯救”列宁和谁想“毁灭”列宁的问题在苏联的文献中占了重要地位。杰米扬·别德内依在若干时候以前谈到他如何乘汽车赶到列宁那里去，同他争辩，劝他不要效法基督“把自己交在自己的敌人的手里”。前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完全否定了他的朋友的说法，他在报上谈到杰米扬·别德内依如何在芬兰的别墅度过危急时刻。言外之意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5页。——译者注

是，说服列宁的光荣“属于其他同志”。这一含意显然表明，邦契为了使某个更有势力的人感到满意，不得不使他的亲密的朋友感到恼怒。

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说：“7日，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列宁的妹妹〕到阿利路也夫的住宅去看伊里奇。当时，正是伊里奇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援引必须出席法庭的理由。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激烈地反对他到法庭上去。伊里奇对我说：‘我和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已经决定上法庭去，你把这个决定去告诉加米涅夫吧。’加米涅夫当时躲藏在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我急忙要去，伊里奇叫住我说：‘我们来告别吧，也许我们再不能相见了。’我们拥抱起来了。然后，我去找加米涅夫，并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决定转告给他。傍晚，斯大林等同志来了，说服了伊里奇不上法庭去，这样便保全了他的生命。”^①

奥尔忠尼启泽更为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困难的时刻：“对我们党领导人的紧张搜捕开始了……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列宁决不可躲藏起来，他必须上法庭……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认为。我在塔夫利达宫会见了斯大林。我们一起去看列宁……”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一事实：在“对我们党领导人的紧张搜捕”在继续进行时，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在敌人的总部塔夫利达宫平静地会面，没有受到处罚。在阿利路也夫的寓所重新进行了老的争论：自首还是藏起来？列宁认为不会有公开审讯。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断然反对自首的是斯大林。“士官生〔相当于西点军校的学生〕不会把你带到监牢去。他们会在途中把你杀掉……”这时，斯塔索娃出现了，告诉他们一个新的谣言——根据警察局的文件，列宁是一个奸细。“这些话对列宁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强烈印象。他的脸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5—326页。——译者注

色紧张起来。他以极大的决心宣称，他必须到监狱去。”奥尔忠尼启泽和诺根被派到塔夫利达宫去，试图说服执政的党派保证“伊里奇不会受到……士官生的私刑”。但是吓坏了的孟什维克却为他们自己寻求保证。斯大林则在彼得格勒会议上报告说：“我个人向李伯尔和阿尼西莫夫〔孟什维克、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提出了发表宣言的问题。他们答复说，他们不能提出任何种类的保证。”在敌人阵营中进行了这种试探之后，决定列宁应该离开彼得格勒，稳妥地躲藏在地下。“斯大林着手组织列宁的动身事宜。”

指挥军队的军官波洛夫策夫将军后来的叙述证明，反对列宁自首的人们多么正确。“前往贴里奥基〔芬兰〕希望抓到列宁的军官问我，我是愿意要这位先生的完整身体还是碎片……我笑笑回答说，被逮捕的人往往设法逃走。”对于假审判的组织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一个逮捕和杀害列宁的问题，像两年后在德国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所做的那样。斯大林比别人更加相信流血报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想法。此外，他远不会担心“舆论”可能说些什么。包括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内的其他人动摇了。诺根和卢那察尔斯基本来赞成列宁自首，后来在当天也反对自首。斯大林比别人更加坚决地坚持立场，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最近的苏维埃编史者对这个引人注目的插曲作了什么描绘。1938年官方的一个刊物写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后来成为法西斯匪徒的托洛茨基要求列宁向法庭自首。赞成列宁自首的，还有以后被揭发出是人民之敌的法西斯走狗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斯大林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斗争”，等等。事实上，我个人并未参加这些会议，因为在当时我自己也不得不躲藏起来。7月10日，我写信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政府，宣布我完全拥护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7月22日，我被逮

捕了。列宁在给彼得格勒会议的信中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在困难的七月日子里，（托洛茨基）证明自己是跟得上局势的。”斯大林没有被捕，甚至没有在这个案件中受到正式控诉，原因非常简单，对当局或舆论来说，他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我和其他人遭到严酷迫害的时候，报上根本没有提到斯大林，虽然他是《真理报》的一个编辑，并在他的文章上签名。谁也没有给予这些文章以丝毫注意，没有人对文章的作者感兴趣。

列宁最初躲藏在阿利路也夫的寓所，后来迁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在那里他同一个名叫叶梅里雅诺夫的工人住在一起。他绝对信任这个工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尊敬地提到了他，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阿利路也夫说：“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动身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去的时候——那是在7月11日傍晚，斯大林同志和我护送伊里奇到谢斯特罗列茨克车站。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躲在拉兹里夫的草棚里和后来躲在芬兰时，他不时通过我送条子给斯大林。有人把条子送到我的寓所；由于需要立即回答，斯大林在8月间就搬到我处，和我一同住在列宁在七月事变的日子躲藏过的那个房间。”他显然在这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阿利路也夫的女儿娜杰日达，她当时只是个少女。另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工人，一个归化俄罗斯的芬兰人拉希亚，在报刊上谈到列宁如何有一次指示他，“在第二天傍晚把斯大林带来。我到《真理报》编辑部办公室找到了斯大林。他们谈得很久”。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斯大林在那段时期里是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员，列宁无疑完全信任他，认为他是一个审慎的进行秘密活动的人。此外，一切情况自然而然地驱使斯大林担任这个角色：季诺维也夫躲藏起来了，加米涅夫和我在狱中，斯维尔德洛夫负责一切组织工作。斯大林比其他人都来得自由些，不像其他人那么受到警察的注意。

在七月运动以后的反动时期里，斯大林的作用变得重要得多了。培斯特柯夫斯基在他的表示歉意的回忆录中谈到了斯大林在1917年夏季的工作情况。他写道：“彼得格勒的劳动群众当时都不大知道斯大林。他也不去寻求群众对他的欢呼。由于没有演说才能，他避免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但是在党的每一次会议上，每一次严肃的组织会议上，斯大林都要发表政治讲话。由于这一点，党的活动分子都很了解他。当有关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议会的候选人问题提出时，在党的活动分子的倡议下，斯大林的候选资格被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之一。”斯大林的名字在彼得格勒的候选人名单上占第六位。……迟至1930年，为了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并不享有声望，仍有必要指出他缺乏“演说才能”。现在，这样一个说法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斯大林被宣称是彼得格勒工人的崇拜偶像，是一个第一流演说家。但是，的确，虽然斯大林不在群众面前露面，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7月和8月在总部、在秘密会议上和一般会议上进行了极其负责的工作，同彼得堡委员会进行接触等等。

关于这个时期里的党的领导，卢那察尔斯基在1923年写道：“……直到七月事变为止，斯维尔德洛夫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一起，可以说是在布尔什维克总部负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七月事变的日子，他升到最前面。”这一点是真实的。在党遭到严重破坏的日子里，那个带着眼镜、身材矮小、面色黝黑的人的举动，好像什么不幸之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继续把任务派给人们，谁需要鼓励就鼓励谁，提供意见，必要时则发布命令。他是这个革命年的真正的“总书记”，虽然他并没有这个头衔。但是，他是党的书记，党的绝对的政治领袖。列宁仍然留在地下。列宁从芬兰送来了有关一切基本政策问题的文章、信件和决议草案。虽然由于他在远处，因而经常犯战术上的错误，但是这使他能够更

加肯定地规定党的战略。日常领导工作落在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这两个依然自由的最有影响的中央委员身上。同时群众运动大大削弱了。一半党员转入地下。党机器的重要性相应地增长。在党机器内部，斯大林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增长了。这个规律在他的整个政治传记里不变地发生作用，并且可以说是构成了它的主要动力。

7月间直接遭到失败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在最后摊牌时，由于各省比较落后，他们的鲁莽行动被粉碎了。因此在首都群众中间的失败主义情绪要比其他任何地方浓厚。但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周。在7月中旬，公开的鼓动恢复了，当时在这个城市各个地方的小型集会上，三个英勇的革命家出现了：后来在克里木被白卫军杀害的斯卢茨基；在彼得格勒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沃洛达斯基以及在1936年被斯大林杀害的叶甫多基莫夫。在各处失去了偶然的同路人之后，党在月底再度开始发展起来。

7月21日和2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当局和报纸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次会议。在冒险的进攻遭到惨败之后，前线的代表们开始愈来愈经常地来到首都，他们抗议在军队中压制自由和继续战争。他们未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妥协派没有什么可告诉他们的。来自前线的士兵在走廊和接待室里彼此结识，以激烈的军人用语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身居高位之人交换意见。布尔什维克有使自己慢慢渗入各处的秘诀，他们建议这些感到迷惑和愤怒的代表们同首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商谈。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参加的有前线29个团队的代表、彼得格勒90个工厂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周围几支驻军的代表。前线的士兵谈到了毫无意义的进攻，谈到了屠杀，谈到了妥协派委员和再次变得趾高气扬的反动军官之间的勾结。虽然大多数前线士兵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革命党人，但是措词尖锐的布

尔什维克决议被一致通过了。代表们从彼得格勒回到战壕成了鼓吹工农革命的无比的鼓动者。看来在组织这次出色的会议方面，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

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企图使群众不举行示威，但未成功。会议在长时间中断后，举行到7月20日晚上。会议活动的进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的作用和他在党内的地位。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是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的，他谦虚地——没有一点假谦虚的样子——把理论和重要的政策问题留给其他人处理。会议主要是估计在7月的大破坏之后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重要委员沃洛达斯基在一开始时就宣布：“目前，只有季诺维也夫能够成为报告人……如果能听列宁讲话，那是很好的。……”没有人提到斯大林。由于群众运动而中断的会议在7月16日才复会。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正躲藏着，作基本政治报告的工作落到斯大林身上。他作为季诺维也夫的代替者出现了。他说：“很明显，目前反革命所以战胜了布尔什维克，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孤立了并出卖了布尔什维克。”^①报告人的主旨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但是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胜利。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只要经济崩溃没有得到克服，只要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危机就会不可避免，群众就会不止一次地走上街头，决战就会发生。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②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再切合实际了。妥协主义的苏维埃帮助了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来镇压布尔什维克，来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这样苏维埃自己就丧失了实际权力。就在昨天，它本来能用一道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12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第113页。——译者注

命令就消除临时政府，而在苏维埃内部，布尔什维克原能在简单的被缺选举中获得权力。但是现在，这不再可能了。在妥协派的协助下，反革命武装了自己。苏维埃本身只是成了反革命的掩护。为这种苏维埃要求政权，那是愚蠢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样的机关，而在于这个机关执行哪个阶级的政策。”^①现在谈不上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了。除了准备一次武装起义之外。别无可为。一俟最低微的村民和前线的士兵一起转向工人，马上可能进行武装起义。但是在出现了这个雄伟的战略前景之后，为就要到来的时期制定了一项极其审慎的战术指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巩固现有的组织并防止群众举行为时过早的发动……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的策略路线。”^②

虽然这个报告在形式上是十分初步的，但它对过去几天发生的局势作了彻底的估计。辩论没有给报告人所说的话增加什么东西。1927年，会议记录编辑委员会说：“这个报告的基本主张是与列宁共同商定的，并且是根据列宁还未来得及发表的文章《三次危机》制定的。”此外，代表们知道（非常可能是通过克鲁普斯卡娅知道的），列宁为报告人写了特别提纲。记录说：“参加会议的人要求公布列宁的提纲。斯大林说，他手头没有这个提纲……”代表们的要求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对方针作了如此根本的改变，以致他们希望听到他们的领袖的真正见解。但是斯大林的答复是不容易理解的。如果只是把提纲留在家里，他原能在下次会议上提出来，但是提纲从未提出。因此造成的印象是，提纲被藏起来了，不让会议看到。甚至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七月提纲》同列宁在地

①②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18、106页。——译者注

下所写的其他各项文件不同，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布。由于唯一的一份掌握在斯大林手里，我们必须假定，他已把它丢失了。但是他自己没有谈及丢失的事情。记录编辑委员会假定：列宁的提纲是他根据他的文章《三次危机》和《论口号》的精神写的。这两篇文章是在这次会议之前写的，并且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在喀琅施塔得发表的，因为那里仍然有出版自由。事实上，把内容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报告只是阐释了这两篇文章，他没有加上一句独创性的话。显然，斯大林没有看到这两篇文章，并且没有想到有这些文章；但是他利用了提纲，提纲的思想内容同文章是一样的。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报告人“忘记”把列宁的提纲带到会议上，为什么这项文件从未予以保留。斯大林的性格使得作这种假设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在代表会议委员会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在那里，沃洛达斯基拒绝承认反革命在7月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得到了多数。现在由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不再由斯大林在会议上辩护，而是由沃洛达斯基辩护了。斯大林没有要求提出少数报告，没有参加辩论。代表中间的思想很混乱。沃洛达斯基的决议案最后得到28个代表的支持，3个代表反对，28个代表没有投票。维波尔格区的一批代表为他们不参加投票提出的借口是：“列宁的提纲没有公布，报告人没有为这项决议案辩护。”这番话显然暗示把提纲藏起来是不适当的。斯大林一言未发。斯大林把提纲藏起来的做法引起不满，而且他未能为提纲得到多数票，因此他遭到了双重失败。

至于沃洛达斯基，他继续在实质上为布尔什维克的1905年革命纲要辩护：首先是民主专政；然后是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决裂；如果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为社会主义专政而进行斗争。斯大林在莫洛托夫和其他几个人的支持下为列宁的新概念辩护：

只有依靠最贫困的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开辟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同沃洛达尔斯基比较起来，斯大林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沃洛达尔斯基拒绝承认资产阶级反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点，同列宁和斯大林比较起来，也是正确的。辩论还要在几天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斯大林写的一项呼吁：《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这项呼吁有一部分说：“……被收买的仆从和卑怯的诽谤者敢于公开‘控告’我们党的领袖‘叛国’……我们领袖们的名字从来还没有像现在，当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们辱骂他们的时候，这样为工人阶级所珍贵和亲近！”^①除了列宁以外，迫害和辱骂的主要受害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我自己。当“资产阶级流氓”辱骂他们的时候，这些名字对斯大林特别亲切。

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在性质上是7月26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预演。那时，彼得格勒各个区苏维埃差不多全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在工会总部，像在工厂和车间委员会一样，布尔什维克势力占统治地位。代表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会集中在斯维尔德洛夫手里。政治准备工作由列宁从地下进行指导。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以及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报纸开始再次出版），从各个角度来说明政治形势。他为党代表大会草拟了一切基本决议案，并在同各个报告人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审慎地估量一切论点。

这次代表大会称为“统一的”代表大会，因为彼得格勒区联派组织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加入党。属于这个组织的有越飞、乌

^①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32—133页。——译者注

里茨基、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尤列涅夫、卡拉汉和我，以及以种种方式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其他革命家。《列宁全集》的一个脚注说：“在战争年代，区联派很接近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这个组织大约有 4000 名工作人员。

报纸上登载了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代表大会是在两个不同的工人阶级地区半公开地举行的。在政府人士当中有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说法。但是在摊牌时，克伦斯基决定，不冲进维波尔格区是比较明智的。对一般公众来说，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人们是不著名的。出席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后来著名的有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尤列涅夫、曼努伊尔斯基……主席团由斯维尔德洛夫、奥里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甚至在这里，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最著名人们缺席，斯大林的名字仍然列在末位。代表大会决定致电慰问“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和柯伦泰和所有其他被逮捕和遭迫害的同志”。这些人被选入了名誉主席团。1938 年出版的刊物只说列宁被选入名誉主席团。

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自从四月代表会议以来，党从 8 万人发展到 24 万人，即在人数方面增加了两倍。在七月事变的打击下，这种发展是健全的。全部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发行总额的微不足道是令人惊讶的——这样一个大国只发行 32 万份！但是革命的主张像电流一样，布尔什维克思想渗入到成百万人的意识中。

斯大林重复了他的两个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活动的报告和关于国家情况的报告。斯大林在提到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首都赢得了大约 20% 的选票）时报

告说：“中央委员会……竭尽全力同反革命的主力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有意无意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战。”^①自从三月会议以来，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三月会议时，斯大林曾经认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革命民主”的一部分，并且曾经依靠立宪民主党人来“巩固”革命成果。

同惯例相反，从政治报告中摘出了战争问题、社会护国主义、第二国际的瓦解和世界社会主义内部成立集团的问题，交布哈林去论述，因为斯大林对国际问题是一窍不通的。布哈林说，通过对临时政府和其他协约国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和平的运动已经完全失败，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能早日达到以民主方式消灭战争的目标。斯大林继布哈林之后作了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代表大会就两个报告联合进行了辩论，虽然不久就很清楚，两个报告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斯大林报告说：“有些同志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所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空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破坏，如果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没有动摇，那么他们这样说是对的。一切国家都把干预经济领域的问题当做在战争条件下的必要的问题提出来了……”^②此外，“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苏维埃这样广泛的组织……所有这一切排斥了劳动群众拒绝干预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在俄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现实基础就在这里。”^③

他的主要论点的明显矛盾是惊人的。如果说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成为空想，那么生产力通过战争受到破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48页。——译者注

② 参看上书，第162页。——译者注

③ 同上书，第170—171页。——译者注

坏并不会使社会主义时代更加接近，相反，会使这个时代空前遥远。事实上，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不是基于生产力通过战争受到的破坏，而是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在战前以及在不受战争影响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而且的确看到了。不错，战争加速了群众中的革命过程使它快到不可估量的地步，但是它丝毫没有改变革命的社会内容。应该补充说，斯大林的论点是从列宁的一些孤立的、没有得到发挥的言论抄袭来的，发表这些言论的目的是要使老干部认识重新武装的必要性。

在辩论当中，布哈林设法部分地为这个旧的布尔什维克方案辩护；在第一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民主的名义同农民并肩进军；在第二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欧洲无产阶级并肩进军。斯大林反驳说：“照布哈林看来前途如何呢？在他看来，在第一阶段我们要实行的是农民革命。但是要知道农民革命不能不和工人革命会师，不能不和工人革命汇合在一起。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同时为其本身的要求而斗争。因此我认为布哈林的方案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①这是绝对正确的。除了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使农民革命赢得胜利。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无法取得政权。斯大林使用了到1917年4月为止一直被斥为“空想”的论点（这种论点在1905年初第一次得到说明）来反驳布哈林。但是在几年之内，斯大林忘记了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这种论点；相反，他同布哈林一起重新提出“民主专政”方案，这个方案将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占重要地位，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0—171页。——译者注

中起致命的作用。

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改变基调，从和平地把政权转移给苏维埃改为准备武装起义。为了武装起义，首先必须了解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它的总方向是清楚的——从人民到资产阶级。要断定变化的程度则困难得多。只有阶级之间的另一次公开冲突才能衡量力量的新的对比。8月底，这个考验来临，因为科尔尼洛夫将军反叛了。这次叛乱立即表明，资产阶级无论在人民或军队中间仍然得不到支持。因此，七月事变表明的变化是表面的和插曲性的。然而它是十分真实的，因此，建议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苏维埃是不能设想的。列宁在制订新方针时，首先关心的是使党尽可能坚决地正视改变了的力量对比。在一定意义上，他采取了故意夸大其词的办法：低估敌人的力量比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更加危险。但是过高估计原会使代表大会踌躇不前，像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发生的情况一样，特别是因为斯大林对列宁的主张作了过分简化的陈述。

斯大林说：“关于政治形势。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从前苏维埃是实际的力量，可是现在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丝毫权力的团结群众的机关。”^①某些代表坚决认为，反动派在7月的胜利是暂时的，反革命并未获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还未被废除而造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他们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像他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用一句陈腐的话来答复：“在革命期间并不产生反动。”事实上，每一次革命的轨道都是由上升和下降的特殊曲线组成的。敌人进行的或者由于群众本身非常落后而造成的反震动（这种反震动使得这个政权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页。——译者注

更加适应反革命阶级的需要)造成了反动,而没有撤换那些掌权的人。但是反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另一回事:政权不转入另一个阶级之手,那是不可设想的。在7月并没有出现这种决定性的政权转移。迄今,苏联历史学家和评论员继续从书上抄袭斯大林的公式,而不自问一下:如果政权在7月转入资产阶级之手,为什么资产阶级不得不在8月发动叛乱?直到七月事变为止,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下,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影子,实际权力在苏维埃手中。在七月事变后,一部分实际权力从苏维埃转入资产阶级之手,但是只是一部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未消失。后来决定十月革命的性质正是这件事情。

斯大林进一步说:“如果反革命竟然再苟延一两个月,那只是因为联合的原则没有废除。可是,既然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爆发就必然会到来,终究会有有一天,工人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①让我们注意: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这就是党在以后几年的公式。在一切重要方面,斯大林的报告对局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作了正确的预测——列宁的估计和预测。但是,像通常一样,他的报告缺乏对思想的阐释。这位报告人作出论断,他从不加以证明或争辩。他的估计是凭经验作的,或者是现成的;他的估计并没有经过分析性的思考,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些估计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有机联系本身产生了必要的论证、演绎和说明。斯大林,作为一个论战者,喜欢不时以格言的方式重申人们已经表示过的主张,这种格言认为需要证明的事情已经得到证明。这些论点往往夹杂一些

^① 参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66页。——译者注

粗鲁之词，特别是在最后，因为那时不必害怕反对者的反驳了。

1938年，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出版物写道：“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人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一起被提到的只是3个死人。但是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说，有21个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由于党的半合法性，通过秘密投票当选的人的名字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得票最多的4个例外。列宁——在可能有的134票中得到133票，季诺维也夫——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除他们以外，当选的还有下列诸人：诺根、柯伦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勃诺夫、阿尔乔姆、乌里茨基、米柳亭、别尔津、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穆拉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和邵武勉^①。这些名字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的。8个候补委员的名字肯定地得到确认：洛莫夫、越飞、斯塔索娃、雅柯夫列娃、查帕里泽、基谢廖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

代表大会在8月3日结束。次日，加米涅夫从狱中获释。从那时起，他不仅经常在苏维埃机关中讲话，而且还对党的一般政策和斯大林个人施加了明确的影响。虽然他们二人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适应了新的方针，但他們要摆脱自己的心理习惯是不容易的。只要可能，加米涅夫就要磨平列宁的政策锐角。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一点；他只是避免惹祸。在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会议问题上爆发了公开冲突，举行这次会议的倡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想作垂死挣扎的俄国护国派和妥协派认为，这次会议是“为和平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被控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列宁表示坚决反对参加显然是由德国政府发起的这次会

^① 这个名单中没有布哈林的名字。——原编者注

议。在8月6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公开表示赞成参加这次会议。斯大林甚至没有想到在《无产者报》（这是当时《真理报》的名字）为党的立场辩护。相反，斯大林没有发表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尖锐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在拖了10天以后，并且只是在文章的作者坚持要求和向其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以后才发表。可是，甚至在那个时候，斯大林也并没有公开支持加米涅夫。

加米涅夫获释以后，民主的司法部长就马上在报纸上造谣说，他同沙皇秘密警察有某种联系。加米涅夫要求进行调查。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同郭茨〔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袖〕讨论加米涅夫案件中的一项任务”。他过去被派过同样的任务：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讨论”喀琅施塔得分子的案件，同孟什维克阿尼西莫夫“讨论”对列宁的保证。斯大林一直留在幕后，他比其他人更加适合担任各种微妙的任务。此外，中央委员会始终相信，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进行的讨论中不会让任何人蒙蔽他。

斯大林8月13日在论述对加米涅夫的诽谤的时候说：“反革命卑鄙的嘶嘶声又变得响亮起来了。令人厌恶的反动毒蛇从角落里出来，伸出了毒舌。它要螫人，然后偷偷缩进它的黑暗蛇窟……”等等，这是他的典型的梯弗里斯“变色龙”的风格。但是，这篇文章不仅在风格方面是有趣的。作者接着说：“恶劣的引诱，颠狂的谎言和诽谤，无耻的欺骗，低劣的伪造和捏造，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起初，他们企图诽谤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是德国的间谍。这一点失败之后，他们想要把这些战士说成是沙皇的间谍。这样，他们试图污蔑那些把自己的有觉悟的一生献给反沙皇政制的革命斗争事业的人是……沙皇的奴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反革命的头目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加米涅夫无能为害，把他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一位公认的领袖加以

消灭。”很可惜，在1936年审判加米涅夫时，这篇文章没有在检察官维辛斯基的材料中出现。

8月30日，斯大林毫无保留地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写的没有署名的文章《不要做的事情》。这篇文章显然是反对准备起义的。“有必要正视现实：在彼得格勒，现在有许多情况有利于1871年巴黎公社所代表的起义的出现。”未提季诺维也夫的名字，列宁在9月3日写道：“提到公社的话是非常表面的，甚至是愚蠢的……公社不可能立即向人民提供布尔什维克在执政时能够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即给农民以土地，立即实现和平的建议。”对季诺维也夫的打击也打击了报纸的主编。但是，斯大林保持沉默。他准备匿名支持右派对列宁进行的任何论战。但是他很谨慎，不使自己牵涉进去。一有危险的迹象，他就躲开了。

对于斯大林在这个时期的报纸工作，实际上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是中央机关报的主编，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是一位作家，而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演说家，根本不适合进行任何公开活动。他没有写过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讨论，没有提出一个口号来普遍传播。他关于时事的评论不是个人的，并且完全是在党当时的观点的范围以内。他是被委派担任报纸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不是一个革命的政论家。

群众运动恢复了，暂时脱离工作的中央委员重新进行活动，这自然使斯大林退出他在7月代表大会期间所据有的显著地位。自那以后，他的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群众既不知道，敌人也不注意。1924年，党史委员会出版了共分几大卷的革命编年史。第四卷共422页，所说的是8月和9月的事情。它记录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争吵、决议、演讲和在任何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文章。在这一卷中，三次提到在当时实际上是无名的斯维尔德洛夫，提到加米涅夫46次，提到我（8月和9月初我是在狱中度过的）31次，

提到在地下的列宁 16 次，和列宁同样命运的季诺维也夫提到 6 次，斯大林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甚至在约有 500 个专名的索引中也没有斯大林的名字。换句话说，在这两个月中，报纸没有注意到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或他所发表的一篇讲话。参加当时的事变的或多或少是著名的人，没有一个曾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

幸而有可能通过中央委员会在 7 个月（1917 年 8 月到 1918 年 2 月）中的记录，或多或少是详尽地追溯斯大林在党的生活中或者不如说是在党总部工作人员生活中的作用，这些记录得到保存，但的确是**不完全的**。在政治领导人米柳亭、斯米尔加、格列博夫缺席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比斯大林更适合于公开露面的人物被派参加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党的决定中很少出现斯大林的名字。乌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被委派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这三个人也被委派草拟关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决议。斯大林被派同一家印刷厂谈判关于重新出版中央机关报的事宜。他还参加另一个起草一项决议的委员会，等等。在 7 月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关于根据“严格分配职务”的原则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动议被通过了。但是草拟这项动议要比付诸实行容易些。事变的进程在若干时候内继续使职责发生混乱，使决定被推翻。9 月 2 日，中央委员会指派了一家周刊和一家月刊的编辑委员会，斯大林参加了这两个委员会。9 月 6 日（在我出狱以后），在一家理论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中由加米涅夫和我代替了斯大林和梁赞诺夫。但是这项决定也只是留在记录中。事实上，两家杂志各只出版一期，实际的编辑会同被指派的委员会完全不同。

10 月 5 日，中央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为即将举行的大会准备一项党纲草案。这个委员会由列宁、布哈林、我、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柯伦泰组成。斯大林未被列入，这不是因为有什么

么人反对他的候选资格，而只是因为当问题是草拟一项绝顶重要的党的理论文件时，谁都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但是党纲委员会从来没有开过会，甚至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在日程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党起义获胜并执掌了政权，而没有一项拟好的纲领。甚至在纯粹是党的事务上，事件并不总是按照党统治集团的先见和计划使用人的。中央委员会指定一些编辑部、委员会、三人小组、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而在它们还来不及开会以前，就被新事件打乱了，人人都忘记了昨天的决定。此外，由于进行秘密活动，记录被稳妥地收藏起来；谁也没有提到它们。

相当奇怪的是，斯大林是比较经常地缺席的。在中央委员会于8月、9月和10月第一周举行的24次会议上，他有六次缺席，其他六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没有得到。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种不按时出席会议的作风尤其不可宽恕，因为他没有参加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在公开集会上讲过话。他本人显然并不重视他自己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而现在却说他是参加这些会议的。在若干情况下，他缺席无疑是由于他的感情受到伤害和由于恼怒。他每当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就不高兴而躲起来，梦想进行报复。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所载出席会议的委员的次序：9月13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9月15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9月20日：托洛茨基、乌里茨基、布勃诺夫和布哈林等人（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缺席）；9月21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缺席）。名字的次序当然不是有规定的，有时候不按次序。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我们考虑到在前一时期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缺席时，斯大林的名字经常列在首位。当然，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关于斯大林，再也找不到更大的事情了。此外，

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公正地反映了党的日常生活和斯大林在其中的地位。

运动的范围越大，斯大林在其中的地位就越小，他就越难在普通的中央委员中间突出。在10月这个决定性年头的决定性月份中，斯大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不那么受人注意了。这个残缺的中央委员会（他的唯一的真正基地）本身在这些月份中缺乏固有的自信心。它的决定往往由于外部的因素而归于无效。整个说来，党机器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在革命动乱中有着巩固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口号的影响越广泛和深入，委员会委员越难掌握这个运动。苏维埃越是受党的影响，这个机器发现自己的地位越小。这就是革命的矛盾之一。

1917年的情况在后来局势较为平静的时候相当明朗化了，在提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许多历史学家，甚至是十分诚实的历史学家，都把事情说得好像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政策是由中央委员会直接指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约在9月初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会议记录无疑表明，除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我参加的几次全体会议以外，中央委员会并未起政治作用。它没有在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采取过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里的许多决定仍然决而未行，因为同苏维埃的决定发生冲突。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决议在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时间考虑之前，就付诸实行。只是在取得政权、结束内战和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制之后，中央委员会才逐渐开始把对苏维埃活动的领导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到那时才轮到斯大林。

8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个强烈的宣传运动来反对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开的政府会议。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人粗暴地操纵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8月12日在莫斯科工人举行

抗议总罢工的紧张局势下开幕的。未被准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力量。资产阶级吓坏了，并且非常愤怒。科尔尼洛夫总司令在 21 日把里加放弃给德国人，在 25 日开始向彼得格勒进军，一心要建立个人专政。对科尔尼洛夫作了错误估计的克伦斯基宣布这位总司令是“祖国的叛徒”。甚至在那个紧要时刻，即 8 月 27 日，斯大林都没有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去。索柯里尼柯夫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到了委员会。他宣布布尔什维克准备同苏维埃多数的机构就军事措施达成协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抱着谢意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士兵和工人目前追随布尔什维克，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没有经过流血被迅速镇压下去了，苏维埃在 7 月间部分丧失的权力完全恢复了。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在报纸上向妥协派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让苏维埃接管政权，保证宣传的完全自由，布尔什维克将完全在苏维埃合法性的基础上采取他们的立场。妥协派好战地拒绝同布尔什维克达成折衷办法。他们继续向右派寻找自己的盟友。

妥协派的粗暴拒绝只是加强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像在 1905 年一样，第一个革命浪头使孟什维克占有的优势不久就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烟消云散。但是同第一次革命中的倾向不同，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成长是同群众运动的高涨而不是同它的衰退一致的。这个重要过程在农村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一个左翼从社会革命党（该党在农民中占优势）分裂出来，试图同布尔什维克齐步前进。大城市的驻军几乎完全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一个左翼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作证说，“的确，布尔什维克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们每日经常地在车床旁跟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与布尔什维克同生活，共呼吸。他们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手中。”他们是在党的手中，而不是在党机器的手中。

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一项政治决议。力图不屈服的妥协派决定进行一次新的较量。9天后，问题在苏维埃中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旧主席团和联合政府政策得到了414票，519票反对，67票弃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食其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之果。苏维埃用我作为其新任主席提出的决议欢迎它组织的新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将作为内战政府载入革命史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这是对拒绝我们的“折衷办法”的妥协派公开宣战。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的所谓民主会议于9月14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它表面上是为了抵消政府会议，而实际上是为了批准这个腐败透顶的旧联合政府。妥协派变得疯狂起来了。几天前，克鲁普斯卡娅秘密赴芬兰去看列宁。在一节满载士兵的车厢里，人们谈论的不是关于联合政府，而是关于起义的事情。“当我把这些士兵的言论告诉给伊里奇的时候，伊里奇立即深思起来，以后他无论说什么话脸上的深思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显然，他谈的是一个问題，而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題，即武装起义问題，在想如何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①

在民主会议开幕的那天——（一切假民主议会中最愚蠢的一个）——列宁给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两封著名的信件：《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及《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这次他要求立即行动：发动团队和工厂的人们，逮捕政府成员和民主会议成员，夺取政权。显然这项计划不能在当天付诸实行；但是它的确引导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和活动进入新的途径。加米涅夫坚持断然拒绝列宁的建议——说它是灾难性的！加米涅夫害怕这些信件在党和中央委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1页。——译者注

员会中传阅，他主张把副本全部毁掉，只留一份存入档案，他得到六票。斯大林建议“把这两封信发给最重要的党组织，并建议它们进行讨论”。最近的评论说，斯大林的建议的目的在于“组织地方党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力促它执行列宁的指示。”如果情况是这样，斯大林原会直接出来为列宁的建议辩护，原会以他自己的决议来对抗加米涅夫的决议！但是他的想法远非如此。各省的大多数委员会委员比中央委员会更右倾。把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列宁信件发给他们看，等于是表示不赞成这些信件。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争取时间，如果发生冲突，就有可能申辩说，地方委员会违抗。中央委员会由于优柔寡断而陷于瘫痪。会议决定把列宁信件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列宁极其不耐烦地等待答复。但是斯大林甚至没有在五天后举行的下次会议上露面，信件问题甚至未被列入议程。气氛越热，斯大林的花招越冷。

民主会议决定在资产阶级同意下组织类似代议制机构的某种机构，克伦斯基答应给予这个机构以咨询权。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共和国国会或预备国会应持什么态度，立即成为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一个极重要的策略问题：他们在走向起义的道路上到底是应当参加这个国会，还是不理它？作为中央委员会在民主会议党团会议上的报告人，我提出了抵制的主张。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上几乎分成了两半（九人主张抵制，八人反对抵制），它把这个问题提交党团作出决定。为了说明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两项报告：托洛茨基的报告和李可夫的报告”。斯大林在1925年坚持说，“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张抵制预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加米涅夫和诺根）。”^①这番话几乎是对

①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97页。译者注

的。当党团决定结束辩论时，它决定再让每一方派一位代表为它说话：斯大林代表抵制派，加米涅夫（而不是诺根）代表参加派。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得了 77 票；斯大林和我得了 50 票。地方人员使抵制策略遭到失败，他们同孟什维克的分离在国内许多地区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表面上看来分歧似乎是不重要的。事实上，基本问题是，党到底是准备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起反对派的作用呢，还是为自己规定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任务。斯大林后来由于这次事件在官方历史中占重要地位而追述了他担任的报告人角色。这位厚道的主编自动地补充说，我支持“中间路线立场”。在后来的版本中，我的名字被完全删去了。新的党史宣称：“斯大林……坚决反对参加预备国会。”^①但是除了会议记录的证词之外，还有列宁的证词。他在 9 月 23 日写道，“应当……到群众中去……应当给他们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议会。”^②然后加了一个脚注：“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但是，克里姆林宫当然已正式规定从新版《列宁全集》中消除所有的这种过失。

10 月 7 日，布尔什维克党团示威性地退出了预备国会。“我们向人民呼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等于号召起义。就在那天，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同反革命斗争情报局。这个有意说得含糊的名称掩盖了一项具体任务：侦察和为起义进行准备。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和我被委派组织这个局。由于记录很简要，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69 页。——译者注

② 《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 32 卷，中文第 2 版第 256 页。——译者注

又没有其他文件，作者不得不在这一点上靠自己的记忆力。斯大林拒绝参加这个局，建议由没有什么权威的布勃诺夫代替他。他对这个主张本身持保留态度，如果不是持怀疑态度的话。他是赞成起义的，但是他不相信工人和士兵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他是孤立的，他不仅同群众没有联系，而且甚至同他们的苏维埃代表也没有联系，他满足于党机器的歪曲的印象。对群众来说，7月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实际上，盲目施加的压力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对布尔什维克信心已经带有怀疑色彩了：他们能够做他们答应做的事情吗？布尔什维克鼓动者不时抱怨说，群众对他们有些冷淡。事实上，群众对于等待、犹豫不决和说空话已感到厌倦了。但是在党机器中，这种厌倦经常被称为“缺乏战斗情绪”。因此，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产生了怀疑。此外，在就要起义以前，甚至最勇敢的人也一定会在心窝中感到有点冷。这一点并不总是得到承认，但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自己的心情很暧昧，他决不会忘记4月，当时，他作为明智的“有经验的人”大受羞辱。另一方面，斯大林信任这个机器的程度远超过信任群众的程度。在一切最重要的场合，他的保身之法是同列宁一起投票。但是他并未主动支持所通过的决议，不直接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保护着后退的桥梁。像一个拖后腿的人影响别人，最后由于他越出常轨而错过了参加十月革命的机会。

的确，同反革命斗争情报局毫无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群众的过错。9日，斯莫尔尼同政府发生了新的尖锐的冲突，政府下令把革命军队从首都调到前线。驻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保护者苏维埃的周围。起义的准备工作立即获得了具体基础。昨天发起组织这个情报局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转向在苏维埃本身内成立一个军事参谋部。第一步是在同一天即10月9日采取的。“为了对付总参谋部领导革命军队撤出彼得格勒的企图”，

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因此，根据事情的逻辑发展，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任何讨论，起义就几乎是突然在苏维埃舞台上发动了，并开始利用它的苏维埃总参谋部，这个参谋部要比10月7日成立的情报局有效得多。

中央委员会的下次会议是在10月10日举行的，列宁戴着假发参加。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列宁的动议，这项动议主张把武装起义作为最迫切的实际任务。困难在于时间问题，即使对最有信心的起义的支持者来说，也是如此。早在民主会议的日子里，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规定10月20日为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现在可以完全保证布尔什维克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至少在彼得格勒，起义必须在20日之前发动；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并将有被解散的危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15日左右在彼得格勒发动起义，这一点没有在书面上记录下来。因此，剩下的准备日子只有五天了。人人都认为这是不够的。但是党是它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强加于妥协派的那个日期的俘虏。我宣布执行委员会已决定组织自己的军事参谋部，这项宣布并未造成很大的印象，因为这主要是一个计划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论战，他们两人坚决反对武装起义。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似乎不是根本没有讲话就是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无论如何，在记录中，丝毫没有关于他可能说过的什么话的痕迹。这项动议以十票对二票获得通过。但是所有参加的人对于这个日期仍然抱有疑虑。

在这次会议快要结束时（这次会议持续到午夜以后），根据捷尔任斯基的相当偶然的倡议，决定“为在政治上指导起义而组织一个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组成的局”。但是这个重要决定毫无结果：列

宁和季诺维也夫仍然躲藏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调和地反对10月10日的决定。“起义政治指导局”甚至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只有它的名字保留在用铅笔写的杂乱的记录里（在用墨水写的附言中）。这个有名无实的局以“七人”这个简称载入了官方的历史中。

组织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迅速地进行着。当然，吵闹的苏维埃民主机器使得不可能进行任何决定性的刺激。但是在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列宁担心会有拖延，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由于他的要求，10月16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最重要的彼得格勒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持他们的反对立场。在形式上，他们的态度比前更加强硬。六天过去了，起义还没有开始。季诺维也夫要求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时再作出决定，以便同各省的代表“磋商”。他在内心里希望他们给予支持。在辩论时，情绪很激动。斯大林第一次参加了这种讨论。他说，“起义的日子应该选择得适当。只能这样来理解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止境地退却，使革命遭到失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保证自己有可能选择起义的日期和条件而不让反革命组织起来呢？”^①他是在为党的选择攻击时刻的抽象权利辩护——而问题却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如果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代表大会证明不能立即夺取政权，那只会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而损害这个口号。季诺维也夫坚持说，“我们必须坦率地对我们自己说，我们不会在今后五天内试图发动起义。”加米涅夫也力陈这一点。斯大林并未直接对付这

^①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页。——译者注

个问题；他以这样的惊人词句作为结束语：“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不赞同调走军队。”^①他只是重申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最近提出的公式，而这个公式同他自己的抽象的演说毫无关系。但是，“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几天还是几周的问题吗？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作具体说明。他自己的头脑对局势是不清楚的。

10月10日的决议以20票对2票的大多数获得通过，3票弃权。但是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关于在彼得格勒的起义必须在10月20日之前发动的决定是否仍然有效，很难找到答案。从政治上说，在代表大会之前发动起义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付诸实行，剩下的时间太少了。10月16日会议从来也没有设法调和这个矛盾。但是这时，妥协派来救援了。第二天，他们由于自己的原因决定把他们根本不想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推迟到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出人意料的延期提出公开抗议，但是暗中表示感谢。额外的五天完全解决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困难。

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以及在起义之前最后几周出版的《真理报》十分详细地追溯了斯大林在起义的背景下的政治行径。正如战前他一方面在表面上支持列宁，同时寻求调和派的支持来反对“在墙上爬”的侨居国外的人那样，现在他一方面同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的多数站在一起，而同时支持右翼反对派。像以往一样，他是谨慎行事的。但是，事变的迅速发展和矛盾的尖锐性迫使他不时采取比他所想要采取的更进一步行动。

^①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页。——译者注

10月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反对起义的信。在党的领导人当中的情况立即变得极其严重。列宁在地下大为震怒。为了能够传播自己关于起义的观点，加米涅夫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个问题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斯维尔德洛夫公布了列宁的信件，这封信斥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由于在同一上午《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的声明，危机突然复杂化，声明说：“列宁同志的文章的尖锐语调并没有改变我们基本上继续同意他的意见的事实。”这个中央机关报认为，指责列宁的抗议的“尖锐性”而不指责这两个中央委员反对党关于起义的决定的公开立场是适当的，而且表示它在“基本原则”上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像在当时还有比起义问题更为根本的什么问题一样！中央委员们惊奇地揉揉自己的眼睛。

斯大林在编辑部的惟一的同事是索柯里尼柯夫——未来的苏联外交家，后来是“清洗”的受害者。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与撰写反驳列宁的那篇社论的工作毫无关系，并且认为它是错误的。这样，斯大林就在起义前四天，还在单独——在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反对他自己的编辑同事的情况下——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担心使危机延长才克制了它的愤怒。

斯大林继续在起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玩弄手法，他正式表示反对接受加米涅夫的辞呈，他争辩说，“我们的整个形势是矛盾的。”加米涅夫的辞呈以五票对斯大林和另外两人的反对票被接受了。一项决议以六票对斯大林的一票被通过了，这项决议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会议记录说：“斯大林说，他要离开编辑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放弃他在革命情况下能够担任的惟一职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他的辞

呈，从而防止了另一次分裂的发生。

从围绕着斯大林所创造的传奇来看，他的这个行动可能是无法解释的，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符合他的内在性格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和猜疑性的谨慎在历史性的决定时刻迫使他隐退，等待时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保证自己可以来来去去。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辩护肯定不是由于感情上的考虑。4月，斯大林改变了他的正式立场，但是没有改变他的思想。虽然他投票支持列宁，他在感情上与加米涅夫要接近得多。此外，对于他自己的作用的不满自然使他要和其他感到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即使在政治上他和他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起义以前的整个最后一周中，斯大林在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我为一方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方之间玩弄手法。在10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恢复了最近被打乱的平衡，建议指定列宁为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提纲，并建议指定我准备政治报告。这两个动议都一致通过。如果当时在我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任何分歧——这是在几年以后所捏造的一个谣言——的话，中央委员会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委托我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作这个最重要的报告吗？在这样使自己站在左边以后，斯大林再次隐退，等待时机。

传记作家对于斯大林参加十月革命一事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不管他们多么愿意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提到他的名字的话——在文件中，或者许多回忆录中都是这样。为了设法弥补这个大的空白，官方的历史编纂学家把起义同所谓准备这次起义的某个神秘的党“总部”联系起来，这样来暗示他参加了起义。但是，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叙述关于这个“总部”的活动，关于它的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关于它指导起义所使用的方法等等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总部”。但是，这个奇谈是值

得注意的。

在中央委员会 10 月 16 日同彼得格勒党的一些主要的组织者举行的会议上，决定组织由五名中央委员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列宁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仓促写成的一项决议案说，“这个总部将成为革命苏维埃委员会的一部分。”这样，按照这个决定的直接的意义，成立“这个总部”的目的不是为了独立地领导起义，而是补充苏维埃参谋部。但是，正像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临时想出的其他许多主意一样，这个主意从未实现。就在中央委员会在我缺席情况下在一张纸上组织一个新的“总部”的时候，由我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肯定地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完全负责了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斯维尔德洛夫——他的名字列在“总部”成员名单上的第一位（并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最近的苏维埃刊物所错误记载的那样）——在 10 月 16 日的决议前后在与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密切联系下进行了工作。迟至 10 月 24 日，“总部”的另外三名成员——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每人都是单独参加的，好像 10 月 16 日的决议根本没有通过一样。至于斯大林，根据他在那个时期的整个行动方针，顽固地不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或者军事革命委员会，没有参加它的任何一次会议。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根据正式发表的记录轻而易举地加以证实。

在 10 月 21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四天以前成立的“总部”是应该报告它的工作的，或者至少要说它已开始工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只有五天了，而起义是应当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举行。斯大林太忙，不会有功夫来做这件事。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他退出《真理报》编辑部的辞呈。但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总部”成员——斯维尔德洛夫、

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一个都没有提出关于这一点的暗示。10月16日会议的记录显然被谨慎地搁置起来，以便掩盖关于列宁“非法”参加会议的一切痕迹，而且随后的富有戏剧性的四天中，这个“总部”更加容易被忘记，因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紧张活动已完全排斥了对任何这样的补充机构的需要。

在10月21日举行的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参加的下次会议上，又没有关于这个“总部”的报告，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它。中央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好像从来没有通过关于一个“总部”的任何决议一样。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再派十名出色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有斯大林）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改进它的工作。但是这只是另一项仍然是在纸面上的决议。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迅速进行中，但是沿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途径进行。首都驻军的实际主人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寻求借口来公开与政府决裂。这个地区的驻军的司令官在10月22日提供了这个借口，因为他拒绝让委员会的委员控制他的参谋部。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局（斯维尔德洛夫和我参加了）决定承认与驻军的决裂是一个既成事实并采取攻势。斯大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任何人都从未想到请他参加。凡是在需要破釜沉舟的时候，没有人提到这个所谓的“总部”的存在。

直接发动起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月24日上午在斯莫尔尼（现在变成堡垒）举行的。会议一开始，加米涅夫^①的一项动议就被通过了：“任何中央委员非经特别许可都不得离开斯莫尔尼。”议程上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就在起义开始的那个时刻，也没有提到所谓的“总部”。会议记录说：“托洛茨基建议把中央

^① 加米涅夫在同时已恢复中央委员的职务。——著者注

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使用，以便同邮电工作人员和铁路人员保持接触；第三个委员则监视临时政府。”捷尔任斯基奉派同邮电工作人员进行接触，布勃诺夫奉派同铁路人员保持接触。斯维尔德洛夫则奉派监视临时政府。此外，“托洛茨基建议在彼得巴甫洛要塞派驻一批后备人员，委派一名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实现这个目的。决定：‘派斯维尔德洛夫去同这个要塞保持经常接触’。”这样就第一次把“总部”的三个成员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使用。如果这个“总部”存在并且忙于为起义进行准备，那么这种事情自然就是不必要的了。记录说，“总部”的第四个成员乌里茨基提出了一些实际建议。但是第五个成员斯大林在什么地方呢？

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甚至没有参加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中央委员规定自己不得离开斯莫尔尼。但是，首先，斯大林甚至没有到那里去。1929年发表的会议记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解释他缺席的原因。谁也没有把这一点当做问题提出，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关于发动起义的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没有斯大林参加、甚至在丝毫没有他间接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当这出戏中的一些角色分派给各个演员时，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谁也没有建议派他担任什么角色。他只是退出了这场游戏。也许他从某个秘密隐藏地来领导他的“总部”？但是这个“总部”的其他所有成员继续留在斯莫尔尼。

在公开起义已经开始的时刻里，同别人隔绝的列宁很为焦急，他向地区领袖发出呼吁：“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

的，而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①从这封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直到10月24日晚上，列宁对于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动进攻一事还一无所知。同列宁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斯大林来保持的，因为他是警察丝毫不加注意的人物之一。必然要得出这样的推论：由于斯大林那天早晨没有去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后来一整天都不在斯莫尔尼，他直到深夜才发现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在紧张地进行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懦夫。指责斯大林是懦夫是没有根据的。他只是在政治上不表示态度。这个谨慎的阴谋家宁愿在紧要时刻作骑墙派。他在采取立场之前，先等待看看起义的结果如何。如果失败的话，他就能对列宁、我和我们的信徒说：“全是你们的过错！”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人们在那些日子的易于发怒的脾性，才能按照功过来估量这个人的冷静的勇气，或者如果你喜欢说的话，估量一下他的阴险之处。

不是的，斯大林并没有领导这次起义——既没有亲自领导，也没有通过某个“总部”领导。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甚至在后来出版的一些记录、回忆录、无数文件、参考性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谁也没有提到这个所谓“总部”，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是这个“总部”的领袖，或者是以其他某种资格参加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党没有记着他，只是在1924年，党史委员会在搜集各种材料时，才发现10月16日会议记录中有关于成立一个实践“总部”的决议全文。当时正在跟左翼反对派和我本人激烈进行的斗争要求对党史和革命历史有一种新的说法。我记得，到处有朋友和有联系的谢雷布里亚科夫有一次对我说，斯大林的秘书处对发现这个“总部”感到非常高兴。

^① 《致中央委员的信》。《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430页。——译者注

我惊奇地问道：“这一点可能有什么意义呢？”

精明的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他们将以此为依据编造一些东西。”

但是甚至在当时，关于这个“总部”的问题，仍只限于一再重新刊印会议记录并含糊地提到它。1917年事变对每个人来说记忆犹新。革命的参加者还没有被消灭。被列为“总部”成员的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仍然活着。由于纯粹的宗派狂热，捷尔任斯基当然完全能够同意把并非斯大林的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但是他不能把这种成就归功于自己，那是他力所不及的。捷尔任斯基后来去世了。布勃诺夫失宠和被消灭的原因之一，无疑就是因为他拒绝作假见证。其他人都记不得有关这个“总部”的任何事情。空洞的记录仍然是作为记录而存在——没有骨肉，没有耳目。

这一点并未能阻止它成为关于十月革命的新说法的核心。1925年，斯大林已经在争辩说：“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①这个论点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按照决议的确切意义，这个“总部”已经成了我担任主席的那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斯大林完全暴露出他打算在这部记录上“编造”一部新的起义史。他所没有解释的，就是“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的来源。而这一点可能是值得考虑的。

在初版的《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在我的名字下有下面一段话：“在彼得堡苏维埃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以后，〔托洛茨基〕当选这个苏维埃的主席并且作为主席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

^①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5页。——译者注

义。”这样，“传奇”就在《列宁全集》的作者在世的时候在这部著作里找到了一个地位。在1925年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对此提出异议。斯大林自己一度赞扬过这种“流行说法”。他在1918年的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关于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驻军很快地转到苏维埃方面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坚定地进行了自己的工作，党主要和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和波德沃伊斯基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今天，这番话听来好像是赞辞。事实上，作者内心的目的是提醒党，在起义的日子里，除了托洛茨基以外，还存在着中央委员会，而斯大林是它的一个委员。但是，斯大林不得不使他的文章具有至少是一种客观的样子，他在1918年不能不说他所说的这句话。无论如何，他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周年把“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归功于托洛茨基。那么，这个“总部”的神秘的作用是什么呢？斯大林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它；这是在发现10月16日的记录六年以前的事。

1920年，斯大林不再提到托洛茨基了，他提出列宁而不是提出中央委员会作为这个错误的起义计划的草拟者。他在1922年重复了这一点，但是以“一部分同志”来代替列宁，并且审慎地暗示他（斯大林）与拯救起义使它免受错误计划之害这件事有关。又是两年过去了，看来好像是托洛茨基恶意地捏造了关于列宁的错误计划的谣言；事实上，托洛茨基本人提出了这个错误的计划，幸而它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拒绝。最后，在1938年出版的“党史”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激烈反对十月革命的人，而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斯大林进行的。与此同时，所有的艺术都被动员起来：诗歌、绘画、戏剧和电影突然要使这个神话似的“总部”具有生命，虽然最勤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用放大镜来找到关于它的任何痕迹。今天，在世界银幕上，更不用说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斯大林成了

十月革命的领袖。

关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事实也一再以同样方式修改了，虽然也许不完全是如此明目张胆地修改，这取决于改变中的政治结合。1917年，斯大林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企图利用他们来反对列宁和我，为他的未来的“三人小组”作准备。1924年，当“三人小组”已经控制了政治机器的时候，斯大林在报纸上争辩说，在十月之前，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分歧是暂时的、次要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①在“三人小组”垮台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行为在若干年中成了谴责他们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主要理由，最后，这个理由被列入了使他们两人被枪毙的那项致命的起诉书中。

对于这种冷静地、耐心地，同时是残酷地、坚持不懈地为达到一贯是个人目标而奋斗的做法，人们不能不感到非常惊讶而叹息。正如这个年轻的柯巴一度在巴土姆千方百计地打击他的上级、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那样，正如他在狱中和流放期间唆使傻子反对他的对手那样，他现在在彼得格勒不倦地勾心斗角，以便推开、诋毁、诽谤和贬损在某个方面压过他或者妨碍他的野心的任何人。

当然，十月革命作为新政权的源泉已在新的统治集团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中央和各个支部是谁进行领导的呢？斯大林需要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来迫使全国接受一幅历史图景，在这幅图景里，他代替了起义的真正的组织者而把革命叛徒的角色派给了这些组织者。如果认为他在开始时就有一项个人扩张的拟好了的行动计划，那是不正确的。特殊的历史

^①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283—284页。——译者注

环境使他的野心具有了甚至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的规模。在一个方面，他是始终一贯的：不顾其他一切考虑，他利用每个具体情况，在牺牲他的同志们们的情况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耐心地、毫不激动然而是不慈悲地这样做！正是在不间断地进行阴谋、审慎地提供真假情况和有计划地进行伪造方面，最好地反映出斯大林是一个人物，是新的特权阶层的领袖，这个阶层一般说来必须为自己捏造新的传记。

由于在3月间有了一个坏的开端，而这个开端并未在4月间得到改善，斯大林在这个革命年头的全年一直躲在幕后。他同群众从来没有直接联系，对革命的命运从未感到负有责任。在某些时候，他是参谋长，从来不是总司令。他宁愿保持平静，等待别人采取主动，注意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他自己则落后于局势发展。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有某种稳定的关系和许多时间供他支配。革命使他无法得到这两者。

斯大林从未在由直接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下被迫分析过革命的问题，他对十月革命的固有的逻辑从来没有亲切的了解。因此，他对革命的回忆才是如此经验主义的、分散和不协调，他后来对起义战略的判断才是如此矛盾，他在后来的若干革命（德国、中国、西班牙）中的错误才是如此巨大。真的，革命并不是这位前“职业革命家”的要素。

但是，1917年是这位未来的独裁者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阶段。他自己后来说，在梯弗里斯，他是一个小学生；在巴库，他成了一个学徒；在彼得格勒，他成了一个工匠。他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降到了左翼孟什维克水平）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冬眠了四年之后，这个革命年在他的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里，他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之下，处在很有资格的同志们们的圈子内。他第一次有机会学到迄今一直是在他的经验范

围之外的许多东西。他抱着恶意（然而是锐敏和机警地）倾听和观察。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得到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他们是昨天在地下、监狱和流放地的同志们）支持的临时政府使他能够更加仔细地窥视这个神秘的实验室，人人知道，在那里，把锅子擦亮的不是上帝。在沙皇时代把地下革命家同政府分开的无法估量的距离缩小到零。政府变成为某个很亲切的东西，成为一个很熟悉的概念。柯巴摆脱了他的许多乡气，如果不是在习惯方面，至少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他敏锐地、愤懑地感到他作为一个人所缺少的东西；同时，他考验了准备斗争到底的一批紧密团结的、有才能和有经验的革命家的力量。他成为群众拥之执政的党的总参谋部的一个公认的成员。他不再是一个柯巴。他肯定地成了斯大林。

第八章 人民委员

〔布尔什维克如此彻底地为争取国家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以致他们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取得了 11 月 7 日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易如反掌”——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一个团队起来保卫民主俄国，由于从前的警察部队已经分散，彼得格勒的克伦斯基政府实际上只有军校学生和非常没有经验的妇女营来抵抗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所指挥的武装工人、士兵和水兵。争夺占地球面积 1/6 的帝国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是在各省和两个都会在双方异常少的部队之间决定的。〕

〔文明的民主的西方已进入战争的第四年，它拒绝相信这个既成事实。在布尔什维克当权将近一周之后，克伦斯基真诚地对感到惊讶的世界肯定地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不复存在，甚至在彼得格勒也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胜利比在莫斯科和各省较为容易和较为稳固。驻在彼得格勒的哥萨克是“中立的”——像大本营和一切公开的反动分子一样，不向临时政府提供援助，保留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的权利，与此同时，克拉斯诺夫将军带着数目不详的军队向首都进军。银行、各个部和差不多一切公共行政机关的官员和职员都罢工了。孟什维克领导的铁路、电话、电报和邮政工人工会扬言要罢工以使一切交通运输事业停顿，除非胜利者同意成立各个社会党组成的、然而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个威胁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领导中产生了一个主要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危

起义以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右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坚持，立即与孟什维克和民粹派举行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被起义所推翻的政党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给它们一个多数，尤其是要从政府中除掉列宁和我，因为这两人是对十月“冒险负责的人。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倾向于接受这个要求。中央委员会11月1日（14日）举行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记录是这样说的：“有人建议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这个建议是要使我们党失去领导，我们不接受。”中央委员会谴责右派甚至愿意实际上把权力交出去，认为这是“苏维埃多数害怕利用自己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并不拒绝与其他党派分享他们的权力，但是只能在苏维埃有适当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分享。列宁宣布，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谈判只有作为掩饰军事行动的一种幌子才是有意义的。〔对列宁来说，谈判不是认真的，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引诱物。〕

我提出的关于终止同妥协派的谈判的动议获得通过。斯大林没有参加辩论。但是他投票支持多数。右派代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要求少数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这个最后通牒是由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签字的：列宁、我、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关于这个文件的原由，一位中央委员布勃诺夫说：“在写了这个文件以后，他（列宁）把每一个中央委员个别地请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看看声明的全文，建议他们签字。”这个说法是令人发生兴趣的，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正确地估计签名的次序的意义。列宁首先把最后通牒给我看了，在得到我的签名以后，又召进了其他人，首先是斯大林。情况总是这样的，或者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文件不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他们的签名大概会在斯大林的签名之前。

培斯特柯夫斯基叙述说，在十月的日子里，“有必要从中央委员会当中选出起义的领导。被选出的是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让我们顺便指出，在把领导权委派给这三个人时，斯大林的合作者肯定地埋葬了列宁和我都不是其成员的那个实践“总部”。这次，在培斯特柯夫斯基的语词中有一点真实性。不是在起义的日子里，而是在起义在各个重要城市获胜以后然而在建立任何稳定的政制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的参谋部，以便能够在当地执行一切必要的决定。正如记录所说，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为了解决迫切的问题选出四人组成的一个常务局：“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这四个人受权决定一切非常事务，但是有义务召请当时在斯莫尔尼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作出决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由于他们有尖锐的不同意见，已经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说明了为什么它是由上述四个人组成的。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忙于党的书记处的工作，忙于在集会上讲话和解决冲突，很少在斯莫尔尼。这四个人实际上变成三个人了。

〔1918年2月19—20日晚上，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的人民委员会〕选出了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普罗相和卡列林〔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它受权在人民委员会各次会议之间的时期内执行当前的一切工作。〔政府的这个执行委员会也是由这三个布尔什维克和两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但是没有理由想像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中央委员会经常开会和决定一切重要的和特别是有争论的问题。为了作出有关各省起义的进程、关于克伦斯基进入彼得格勒的企图和对首都的粮食供应等不能推迟的实际决定，三人小组是必要的。这个三人小组至少在名义上只存在到政府转移到莫斯科为止。

伊雷马什维利抨击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后的政策，他写

道：“三人小组充满了不能平息的复杂情绪，开始以不人道的残酷消灭一切活的和死的东西”，等等。伊雷马什维利把列宁、我和斯大林包括在三人小组中。可以有把握地说，伊雷马什维利只是在很久以后即在斯大林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以后才有这个三人小组的想法。但是，在伊雷马什维利的这些话中有一点真实性——或者至少近似真实性。在谈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时，列宁的“我要与斯大林商量后给你一个答复”这句话一再被人引述。问题是，这样一个三人小组在某些时候的确存在，虽然并不总是有斯大林参加。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同样提到了这个三人小组，虽然是以有点不同的语气和从不同的角度提到的：

“甚至列宁在那个时期都感到如此需要斯大林，在布列斯特的托洛茨基发来电报，需要立即作出决定而斯大林又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就通知托洛茨基说：

‘我希望首先同斯大林商量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只是在三天以后，列宁就打电报说：‘斯大林刚刚到达。我将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立即向你提出我们的联合答复。’”

那个时期的最重要决定经常是由列宁在同我取得一致意见后作出的。但是在这一次，没有取得这样的一致意见，需要第三者。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加米涅夫并不总是在莫斯科。此外，他像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样，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进行鼓动工作。斯大林的时间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多，他可以不进行鼓动工作，不领导苏维埃及进行其他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离开察里津以前，他通常执行“第三者”的任务。列宁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因此自然不单单以他自己的名义作出答复。一般地说，最近的书刊中常常提到的关于列宁指示、命令等等的说法，完全是根据斯大林主义体制加以类推而提出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指示只是由政治局发出的，

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在工作人员不全在的时候，只由三人小组发出，这三个人构成了五名政治局委员中的法定人数。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列宁就同样谨慎地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商量，在档案中可以找到提到这种磋商的每一个数目的记录。

但是，当时有许多关于“二人小组”的谈论。在内战期间，苏维埃“桂冠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写了一些关于“我们的二人小组”的诗。当时没有人谈到三人小组。无论如何，当时用这个名称的任何人都会选择斯大林作为第三个人，而是选择斯维尔德洛夫，他是非常得人心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所有比较重要的法令都是由他签字的。我记得，有几次向他谈到我们的某些指示在各省没有充分的威信。有一次，斯维尔德洛夫说：“在地方上，他们只接受三个人的签字：伊里奇的，你的，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我的。”〔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有真正了不起的组织才能和有很大的辛勤工作能力的人——远远超过斯大林〕列宁在1920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没有人能像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那样善于一个人同时兼顾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我们就不得不尝试用集体工作来代替他一人的工作。”^①

当我在5月初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我根本记不得斯大林的名字。我大概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在一些文章上的签字，这些文章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最初会晤的人是加米涅夫、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我同他们进行了关于合并的谈判。不论是在苏维埃的会议上，还是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花费我很大一部分时间的无数次会议上，我都

^①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8卷，中文版第2版第266页——译者注

没有碰到斯大林。在我到达后，由于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作，我立即与所有的领导人物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但是，甚至在二流中央委员，例如布勃诺夫、米柳亭、诺根等人当中，我也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合并以后，斯大林仍然是一个无名人物。〕党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在预备国会的主席团中，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在应当派党的主要代表参加一再延期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是要以民主议会的方式决定俄国未来的政府——的时候，斯大林就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来定这些代表。记录表明，斯大林的话是：〕“同志们，我提出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同志作为参加立宪会议的候选人。”这些人就是以全党名义提出的五个人。让我们追述〔根据官方编的历史〕，只是在两星期以前，据说我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要求列宁出席法庭。

在以列宁为首的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完整的名单中，斯大林的名字居第八位。25名被指定的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初步的正式候选人。这个名单是由三名中央委员乌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草拟的。列宁尖锐地抗议这个名单：名单上可疑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可靠的工作者太少了。

* “完全不能容许的还有：从没有受到充分考验、最近才参加我们党的人（像尤·拉林）当中来的候选人的数目是不成比例的。由于把这样的候选人（他们实际上应该在党内工作好多年月）列在名单上，中央委员会就为野心家、为在立宪会议中谋求地位的人敞开了大门。必须对这个名单进行特别的审查和纠正……不言而喻，在区联派（他们在无产阶级工作中和指导我们党的方面是完全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当中，没有人会反对例如列·达·托洛茨基的候选资格。因为第一，托洛茨基在到达以后，立即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当中为合并而斗争；第

三，在困难的七月事变的日子，他证明完全称职，是革命无产阶级党的忠诚战士。很清楚，对于昨天才参加党的许多党员却不能这样说，而他们的名字却在名单上出现了……”

在这 25 名〔布尔什维克代表〕中，有 13 名后来受到斯大林的处罚，或者在死后受到谴责。

在获得政权以后，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较巩固了，但仍然是一个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宁在“提拔”斯大林，重视他的坚定、大胆、顽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他的阴险，因为这些特点是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列宁并没有期望他有任何独立的主张、政治主动性或者创造性的想像力。斯大林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静。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的胜利使他有了信心。他开始使自己习惯于掌握权力。阿利路也夫写道，“在十月以后，斯大林迁到斯莫尔尼，在那里住在楼下的两个小房间里。”〔他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是第一任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斯莫尔尼列宁的办公室举行的。在那里，一道没有油漆的板墙把女电话员和打字员所在的小房间隔开了。斯大林和我首先到达。我们从板墙后面听到了德宾科的很粗的声音。他在同芬兰通电话，谈话有一种温柔性。这位 29 岁的有黑胡须的水兵是一个愉快的和自信的大汉，他最近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很亲密，她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女人，会六种外文，年纪快要 46 岁了。在党的某些人士中，毫无疑问对这一点有许多闲话。在这以前，我没有同斯大林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斯大林带着一种出人意外的高兴神情走到我跟前来，用肩膀指向隔壁，嘻嘻地笑着说：“是他跟柯伦泰在一起，跟柯伦泰在一起！”他的姿态和他的笑声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是极其庸俗的，特别是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地方。我记不得我是干脆没有说什么话，把我的眼睛转开呢，还是冷淡地

答复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斯大林感到他犯了错误。他的面色改变了，他的黄色眼睛出现了我在维也纳^①所看到的那种敌对精神。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试图同我就私人问题进行谈话。

1918年1月底，斯大林作为党的代表参加了几个外国左翼社会党代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召开左派国际主义者会议，它得出结论说，“国际社会党会议……应当在以下条件下召开：第一，各党和各组织一致同意采取为争取立即实现和平而对‘它们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第二，它们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的时候，立宪会议被解散了。这是列宁倡议的，他还带头制定相应的办法。与此同时，发表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这些历史性文件的全文中有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出的修正。《列宁全集》的一个脚注说，“他们的修正大部分都没有原则性。”

在革命以后最初几年，斯大林所担任的职务以及他所执行的各种任务（主要是组织性的和外交性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就是当时大多数负责人员的情况。人人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忙于内战；例行任务通常是由最密切的助手承担的。斯大林被列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一个成员，但是事实上，他同《真理报》差不多是毫无关系。他执行了民族委员部的比较有系统的工作，这种工作由于他经常到前线去而中断。苏维埃国家刚在形成，不容易以新的方式决定各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这种工作的一般指导（且不提倡议）完全是列宁负责的，列宁从最早时期以来就极

① 托洛茨基是1913年初在维也纳初次会晤斯大林的，那时斯大林正在写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当时，托洛茨基不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原编者注

为重视民族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土地问题。从他的秘密处的日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常接见各种民族代表团，发出关于这个或那个民族团体的信件、询问和指示。所有比较主要的措施都必须通过政治局；次要的措施用电话同列宁商量。民族委员部只是在事务上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

关于这个委员部的工作的情况可以在1922年和1930年发表的培斯特柯夫斯基的回忆录中找到。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20个月中，培斯特柯夫斯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助手。他是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后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他参加过十月起义，在胜利以后担任过各种职务，其中包括在1924—1926年担任苏联驻墨西哥公使的职务。他长期参加了一个反对派，但是设法及时悔过了。最近的悔过烙印出现在这个回忆录的第二版中，但是它并没有使这个回忆录失去新鲜性或吸引力。

他们的合作是培斯特柯夫斯基主动提出的，他敲各个门，请人们利用他的平凡才能，但是并没有人利用。

*“‘斯大林同志，’我说，‘你是不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是的。’

‘可是你有一个委员部吗？’

‘没有。’

‘好吧，我为你搞一个委员部。’

‘可以，可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呢？’

‘目前只需要一个委托书。’

这时，不愿意多费话的斯大林前往人民委员会的执行办公室，几分钟以后，拿回了一份委托书。”

在斯莫尔尼已经有人占据的一个房间里，培斯特柯夫斯基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靠墙放下，在墙上贴了一张纸，纸上写道：“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此外又放上两张椅子。

* “‘斯大林同志’，我说，‘在我们名下一分钱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新政府还没有接管国家银行。

‘你需要很多钱吗？’斯大林问。

‘在开始时 1000 卢布就行了。’

‘一小时以后再来吧。’

当我在一小时以后到来时，斯大林命我向托洛茨基借 3000 卢布。‘他有钱。他在前外交部中找到了钱。’我到托洛茨基那里给他一张 3000 卢布的正式收据。据我所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还没有把这笔钱归还托洛茨基同志。”

1917 年 11 月 9 日（23 日），从清晨两点到四点半〔斯大林在列宁旁边〕，当时以直达电报同总司令杜鹤宁将军进行谈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布关于立即开始同交战各国进行和谈的命令。在杜鹤宁拒绝以后，列宁下令把他撤职，并任命尼·瓦·克雷连柯为总司令。〔关于像这样的事件〕培斯特柯夫斯基写道：“斯大林成为列宁在战斗的革命行动中的领导机构中的副手。他负责监督顿河、乌克兰和俄国其他地方的军事作战”。“副手”这两个字在这里是不适合的；比较正确的是说“技术助手”。由于对内战的进程的观察主要是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这个任务也由斯大林执行，因为他可以从他的工作中抽出比其他任何中央委员都多的时间。

斯大林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谈话主要是半技术性的和半政治性的。他是在执行指示。非常有趣的是，这是他在 1917 年 11 月 17 日（30 日）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最初几次谈话之一，这次谈话是同乌克兰拉达的代表波尔什进行的。乌克兰拉达与克伦斯基政府相似，它得到小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毫无疑问，它也得到上层资产阶级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盟友的支持。同时，乌克兰苏维埃处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是直接反对拉达的。苏维埃和拉

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后。波尔什以拉达的名义询问彼得格勒政府，它对于一般的民族问题和对于乌克兰的命运特别是它的内部政制的态度是什么。斯大林作了笼统的回答。斯大林说：“在乌克兰的政权，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应当属于全体工农兵代表，其中也包括拉达的组织。在这个方面，中央拉达和人民委员会有达成协议的广泛余地。”这恰恰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以后所要求的联合，加米涅夫所进行的谈判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破裂的。

在基辅的直达电报室同乌克兰的部长波尔什在一起的，是布尔什维克谢尔盖·巴金斯基。巴金斯基也同样要求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他们是彼此控制的。巴金斯基代表苏维埃，他说，中央拉达认为不可能在当地把权力移交给苏维埃。斯大林答复巴金斯基说，如果中央拉达拒绝召开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那么“就在没有拉达参加的情况下召开这种代表大会”。他还说：“在地方上必须接受苏维埃政府。这是我们不能够拒绝的唯一的革命命令，我们不了解乌克兰中央拉达怎么能反对一个不言自明之理。”

一刻钟以前斯大林宣布有可能把苏维埃同拉达的民主组织结合起来；他现在则宣布主张成立一个没有任何联合的苏维埃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之理。如何来解释这个矛盾呢？我们手头没有文件。但是，谈话有幕后的主持人，这是十分清楚的。在谈判期间，斯大林把电报纸条从斯莫尔尼的楼下送往在楼上的列宁。列宁在看到了斯大林关于把苏维埃同拉达的组织结合起来的建议以后，他不得不送给他一个严厉的条子。或许他甚至跑到楼下到电报室去以便把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没有争辩，在他的谈话的第二部分就发出了同他在第一部分中发出的指示完全相反的指示。

作为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被包括在俄国共产党参加芬兰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但是把他包括在内完全是有名无实的。斯大林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培斯特柯夫斯基写道：“当1917年12月底芬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产生了芬兰工人阶级应当追随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作为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列宁、我和斯维尔德洛夫都不能离开彼得格勒；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个时期不适合于担任在芬兰提出起义的任务。斯大林看来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显然第一次会晤了唐纳。22年以后，斯大林在苏芬战争的前夕同唐纳进行了谈判。

培斯特柯夫斯基提到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密切的合作。“列宁甚至一天没有斯大林都不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斯莫尔尼的办公室是处在列宁的‘胳膊之下’。在一天当中，他要把斯大林叫出无数次，或者到我们办公室来把斯大林带走。斯大林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他们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次在我进入列宁的办公室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图景。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俄国地图，地图前面放了两张椅子。伊里奇和斯大林站在椅子上，他们的手指在地图北部移动，我想是在芬兰部分。

“在晚上，当斯莫尔尼的动乱平息一点的时候，斯大林就到直达电报室，在那里呆几个小时。他进行了时间最长的谈判，不是同我们的军事领袖（安东诺夫、帕夫卢诺夫斯基、穆拉维约夫等人），就是同我们的敌人，同乌克兰拉达陆军部长波尔什进行。有的时候，当他有某种紧迫的事务而被叫出时，他就派我到电报室去。”这里提供的事实或多或少是正确的，但是解释是片面的。在那个时期，列宁非常需要斯大林，这是没有疑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直在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我的时间不是花在会议

上面，就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主要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负责党的整个组织工作。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肯定的任务。民族委员部，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占他的什么时间。因此他起了参谋长的作用，或者起了在列宁之下处理负责任务的一个人员的作用。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谈话主要是技术性的，虽然是非常负责的，列宁只能把这些任务委托给一个有经验的、对于斯莫尔尼的一切任务和事务非常了解的人。

〔甚至在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以后，列宁继续遵守不发布个人命令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规定。差不多三年以后，〕1920年9月24日，奥尔忠尼启泽从巴库通过直达电报要求列宁允许派遣一艘驱逐舰到恩捷里（波斯）的时候，列宁在电报上写道：“我要问问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实际上，在电报、信件和报告中有数不清的这样的话。列宁从不自行作出决定，总是问政治局。通常只有两三名政治局委员（有时只有两个）在莫斯科。从这些数以百计的关于询问政治局委员的批语中，只有写有“问斯大林”这种字样的批语被摘引出来，使人们认为，这些批语意味着列宁不问斯大林是不采取任何步骤的。

〔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斯大林的编史学家实际上是休假了。〔他们有真正的文件可以引述来支持他们编造的神话，来自当时由托洛茨基负责的外交委员部档案中的文件。例如在1935年，一个名叫索凌的人写道：〕

* “托洛茨基在从布列斯特给列宁的信中提出了下列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不要签订兼并和约，也不要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复员军队。1月15日（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用直达电报同托洛茨基（他要求立即答复）进行的一次谈话中称托洛茨基的计划是‘可以争辩的’，要等到斯大林到达后再给予最后的答复，斯大林当时不在彼得格勒，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

要同斯大林商量。我们引述这次谈话的全部记录：

1月15日（2日）——托洛茨基和列宁通过直达电报进行了下列的谈话：托洛茨基问列宁是否收到了通过一个拉脱维亚士兵送给他的一封信。托洛茨基一定要立即答复这封信。答复应当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字样表示出来。

‘这是列宁在打电报。我刚刚收到你的专函。斯大林不在这里，还没有能给他看这封信，你的计划在我看来是可以争辩的。不能等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里举行特别会议后再作出最后决定吗？一俟斯大林回来，我就给他看这封信。

列 宁’

‘我们将设法尽可能长久地推迟作出决定，等待你的通知。请设法快一点。拉达代表团正在执行一个明目张胆的背叛政策。在我看来，在中央委员会内考虑这个计划是不方便的，因为这可能在计划执行以前引起反应。

托洛茨基’

对托洛茨基的答复：‘我希望，首先同斯大林商量然后再答复你的问题。今天哈尔科夫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它向我保证说，基辅拉达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动身去看你。

列 宁’

当1月18日（5日）的谈判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候，列·达·托洛茨基通过直达电报要求给予指示，并接连收到以下两个通知：

1. ‘致托洛茨基：斯大林刚刚到达。我将同他考虑，我们将向你提出我们的联合答复。

2. ‘通知托洛茨基，要求他使谈判休会而到彼得格勒来。

列宁、斯大林’”

〔在1939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历史完全把事实颠倒了。它说：〕

* “1918年2月10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进行的和平谈判中断了。虽然列宁和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但是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却叛变式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训令。他声明说，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但同时他却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实行遣散军队。

这是骇人听闻的行为。德帝国主义者当时所能要求于苏维埃国家利益叛徒的，无过于此了。”^①

〔从同书第207页翻到第208页，我们找到了下面的叙述：〕

* “列宁称这个决议为‘奇谈与怪论’。

当时党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党主义者’这种反党行为的真实原因。然而不久前审判反苏维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1938年初）已经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共产党主义者’集团，曾经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组织过反苏维埃政府的秘密阴谋。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阴谋同伙会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并加以杀害，然后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新政府。”^②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记录。有63个布尔什维克出席了1918年1月21日（8日）的会议，其中绝对过半数（32人）投票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的立场——既不主战也不主和——得到了16票。列宁的立场——主张同德意志帝国媾和——得到了15票。党中央委员会三天后再次考虑了这个问题。1918年1月24日（11日）的会议记录如下：〕

①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5、287页。——译者注

* “托洛茨基同志动议就下列方案进行表决：‘我们结束战争，我们不缔结和约，我们遣散军队。’方案付诸表决。9票赞成，7票反对。

列宁的建议也付诸表决：‘我们用一切方法拖延和约的签订’（12票赞成，1票反对）。列·达·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是否打算发出要求进行革命战争的号召？’（2票赞成，11票反对，1票弃权）；‘我们停止战争，不缔结和约，遣散军队’（9票赞成，7票反对）。”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签订一项单独和约，他的论点是：“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①“不能依靠？”列宁立即驳斥了斯大林的支持；的确，西方的革命还未开始；“但是，如果我们由于这一点而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

第二天，1月25日（12日），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考虑了和平问题。会议以多数票决定提出“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这个方案供苏维埃代表大会考虑。

斯大林对这个方案持什么态度？在这次会议（这个方案在会上以9票对7票被接受）以后一星期，斯大林说了这样的话：

“1918年2月1日（1月19日）会议；斯大林同志：……‘使我们摆脱这个困难局面的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

如果人们考虑到，在整个这一危急时期，党组织和苏维埃的绝大多数都主张进行革命战争，因而列宁的立场只能通过一次党

^①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问题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6页。——译者注

和国家的革命（这当然是完全谈不上的）来贯彻，那么斯大林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当斯大林说我的立场是当时使党摆脱这种局面的惟一办法时，他远不是错误的，只是承认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2月10日〕参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会的苏维埃代表团公布了苏维埃政府拒绝签订兼并和约以及中止同四国同盟的战争的正式声明。〔两天后公布了〕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的命令：停止对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遣散俄国军队。

〔列宁在一年后提到这些事件时写道：〕

* “我们党怎么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方面、没有一个组织都不反对遣散军队的呢？我们是怎么回事——难道完全发疯了吗？完全不是这样。军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甚至在十月以前就说，军队不能作战，让它在前线再留几周都不行了。十月以后，凡是愿意正视事实，愿意看看不愉快的严酷现实，而不是隐藏起来或蒙上自己的眼睛、满足于发表自豪的言论的人，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根本没有军队。不可能依靠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快遣散军队。

这是俄罗斯国家机构的病态部分，它不再能承受战争的负担了。我们愈快遣散军队，就会愈快把它溶解在尚未处于病态的那些部分之中，国家就会愈快地准备应付它的新的困难任务。这就是我们在毫无异议而一致通过那个决议时的想法——从表面的事变看来是荒谬的那个决议：遣散军队。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一直在说，保持军队是不实际的幻想。我们愈快遣散军队，整个社会机构就会愈快开始复原。这就是为什么‘德军不能进攻’这种革命词句，以及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革命词句即‘我们不能宣布战争状态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是极大的错误，是对事变作的过分的估计。但是假定德军进攻怎么办呢？‘不会，他们

是不能够进攻的。’”

实际上，德军的进攻持续了14天，从2月18日到3月3日。2月18日，中央委员会整日讨论了如何对付已经开始的德军的进攻的问题。

在布列斯特谈判于2月10日破裂以及苏俄代表团公布了关于中止战争和拒绝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声明之后，“主战派”——主张进行极端兼并的一派——终于胜利。2月13日在汉堡由德皇威廉主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的如下声明被接受了：“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和约这一点自然而然导致了休战的终结。”2月16日，德国军事司令部正式通知苏维埃政府，从2月18日中午12点开始中止同苏维埃共和国的休战，这就违反了所规定的协议：必须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七天发出关于休战中止的通知。

如何对付德军的进攻的问题最初是在2月17日晚上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德方立即提出的关于为签订和约而举行新的谈判的建议以6票对5票遭到否决。另一方面，没有人投票“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而尼·伊·布哈林、格·伊·洛莫夫和阿·阿·越飞“拒绝就这样提出问题进行表决。”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进攻充分发动之前，在它劳工运动的影响变得明显之前，暂不恢复和谈”。下面的决定被一致通过了（有3人没有投票）：“在德军的进攻成为事实而在德国和奥国还没有开始革命的发动时，我们就缔结和约。”

2月18日，在德军进攻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整日举行了会议，只有短暂的中断（一项记录表明，时间是“在晚上”，另外两项记录没有说明更确切的时间）。在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发言赞成签订和约，我和尼·伊·布哈林发言反对，在这之后，“立即提出重开和谈的建议”，这一动议以7票对6票被否决了。在第二次或者说在晚上的会议上，列宁、斯大林、斯维尔

德洛夫和克列斯廷斯基发言赞成重开和谈；乌里茨基和布哈林发言反对；我发言建议我们不重开谈判，但是要求德国人提出他们所制定的要求。在这之后，就下面的问题进行了表决：“我们是否应当立即向德国政府提出一项立即缔结和约的建议？”这项建议以7票（列宁、斯米尔加、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夫、我、季诺维也夫）对5票（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哈林、越飞、克列斯廷斯基），1票弃权（斯塔索娃）获得通过。然后，决定立即起草关于这个已被接受的决定的确切声明，并草拟提交德国政府的信件的全文。列宁提出的关于电报所包含的内容的建议付诸表决。除2人弃权外，全都投票赞成指出和提到和约条件的苛刻性；赞成准备按旧条件签字，但表明并不拒绝接受更苛刻条件的，7人赞成，4人反对，2人弃权。草拟电报全文的任务交给了列宁和我。列宁立即草拟了电文，我作了小的修正。电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由人民委员会签署，2月19日发往柏林。

在2月21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投票反对利用协约国的帮助来对付德军的进攻。就军事和技术援助问题同盟国进行的谈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开始的。谈判由列宁和我继续进行，代表法方的是拉维涅将军、尼塞尔将军和雅克·沙杜尔上尉，代表美方的是雷蒙·罗宾斯上校。2月21日，关于德军的继续进攻，法国大使努朗打电报给我说：“你们在抵抗德军方面可以指望法国的军事和财政合作。”当然，德国军国主义和法国军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只是一个必须使敌视我们的某些力量失去作用从而拯救苏维埃政府的问题。〔但是法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克列孟梭宣布了对布尔什维克的神圣战争。于是，我们被迫缔结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对概述德国和约条件的苏维埃电报的复电是在〔2月23日〕上午10时半在彼得格勒收到的。同2月10日提出的和约条件相比较，这些条件要苛刻得多。红军必须立即撤出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由德国警察加以占领；苏俄必须同资产阶级乌克兰政府和芬兰政府缔结和约，等等。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问题〔在同一天〕也予以讨论，最初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后来是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最后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全体会议上。

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发言赞成接受这些条件和签订和约。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洛莫夫发言反对。我说，“如果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定能承担起组织防御的任务。我们能够办到这一点……但是这需要最大程度的一致。由于缺乏这种一致，我不愿承担投票赞成战争的责任。”中央委员会以7票对4票（4票弃权）决定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为革命战争作准备，并（一致——3票弃权）决定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选民进行民意测验，以便断定群众对缔结和约的态度。

在2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不必签字，但是我们必须开始和谈。”列宁回答说：“斯大林说我们不必签字，错了。必须在这些条件上签字。如果你不在这些条件上签字，那么你就将在三周内苏维埃政府的死刑宣判书上签字。”〔记录又说：〕“乌里茨基同志发言反对斯大林的意见，他说，这些条件必须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但是进行谈判已不再可能了。”

了解当时情况的每个人——〔甚至像乌里茨基这样一个一贯极力主张同德意志帝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人〕都可清楚看见，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斯大林此番话的立场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早在2月28日，德国〔军队就攻占了〕得文斯克。它的进

攻速度是特别快的。遏阻政策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但是〕斯大林却〔在5天后〕在2月23日建议不签订和约，而……进行谈判。

斯大林在2月23日的会议上第二次发言，这次是为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辩护。他还乘此机会纠正了他自己对国际革命问题的看法，〔因为〕列宁〔批评了他。斯大林说，〕“我们也是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你们估计几周会发生革命，而我们估计几个月才会发生。”这番话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绪以及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1918年1月24日（11日）〕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一件事情上意见一致，即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据斯大林说，是在今后几个月内），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这样，“托洛茨基主义”当时就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实质上，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斯大林没有采取过什么独立的立场。他犹豫不决，等待时间，哑口无言——并进行策划。“老头子一直在盼望和平”，他对我说，朝列宁的方向点点头，“但是他不会得到什么和平”。然后，大概他又走到列宁跟前，说了关于我的同样话。斯大林从不真正地公开表示意见。的确，没有人对他的看法或他的矛盾特别感兴趣。我确信，我的主要任务（那就是使我们对和平问题的态度有可能为世界无产阶级所理解）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次要的考虑。他感兴趣的是“一国的和平”，正如后来他感兴趣的只是一国的“社会主义”一样。在进行决定性的投票时，他同列宁在一起。只是在几年以后，为了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他才不嫌麻烦地为自己拟定了关于布列斯特事件的某种类似“观点”的东西。〔可以把他的态度同列宁的态度比较一下。列宁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之后，立即于3月8日举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

* “其次，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当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既然历史把这变成了泡影，那么，也就值不得再去提了。”^①

在整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期间，列宁所采取的政策同斯大林的政策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斯大林更加接近季诺维也夫。必须说明，只有季诺维也夫有勇气要求立即签订和约，他预言拖延谈判会更加真正地增加和约条件的苛刻性，以此来吓唬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从“爱国的”观点来看，立即签订这些条件会比较有利，但是列宁认为，拖延和谈是进行革命鼓动，国际革命任务在爱国考虑之上——在和约的领土条件和其他一切条件之上。对列宁来说，这是一个在国际革命斗争中争取喘息时期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国际革命是一个我们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错，后来他的确修正了这些话，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对其他人，但是实质上，在当时正如在很久以后一样，国际革命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利用这个公式。

正是在这个危机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政治的因素，对斯大林来说是那么多的未知数。他对这种因素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感兴趣。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在进步的人们中间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辩论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举行谈判并准备缔结和约。有不

^①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27页。——译者注

少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和霍亨索伦政府是在演一出喜剧，而在这出喜剧中暗示对方，结尾语是事先安排了的。革命斗争要求我们向工人们表明，我们不能采取别的行动，敌人正在轻易地击败我们，我们不得不签订和约。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德军的进攻是我们的最好证据，证明这项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德国的一项最后通牒是不够的；一项最后通牒可能同样是预演的一出戏的一部分。德军的真正调动，城市的被攻占，军用财产的被劫夺，则完全不同了。我们失掉大量财富，但是我们却赢得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见的意义就在于此。

按照宪法，一个人民委员部是由主席^①和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则由6个委员，有时甚至12个委员组成。指导一个部门是不容易的。据培斯特柯夫斯基说：“民族问题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反对斯大林，经常使他们的人民委员处于少数。”这位悔过的作者赶忙补充说：“斯大林决定改造我们，并坚持不懈地这样做。在这方面，他表现了才能和智慧。”不幸，培斯特柯夫斯基并未详述问题的这个方面。但是我们的确从中得知了关于斯大林结束他同委员会的矛盾的独出心裁的方式。培斯特柯夫斯基说，“他有时失去耐心，但是他在会议上从不显露出来。在这种场合，当我们在会议上进行的无休止讨论使他的耐心丧失殆尽时，他会突然消失，他是特别的技巧这样做的；‘一眨眼的功夫’，他会从房间中消失，躲藏在斯莫尔尼的一个僻静处，后来是躲藏在克里姆林宫的僻静处。没有办法找到他。最初，我们常常等他。但是最后我们就休会，我独自留在我们的共同办公室里，耐心地等他回来，但是毫无用处。通常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斯大

① 人民委员。——原编者注

林。每当我回答说斯大林不见了，他总是对我说，‘立即去找他’。这是不容易的。为了寻找斯大林，我就要在斯莫尔尼和克里姆林宫的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我会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他。有一次我在水兵沃龙佐夫同志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有一次在厨房里找到了他，在那里，他躺在一张长椅上吸烟斗，思考他的论点。”

由于党的最优秀力量进行军事工作或经济工作去了，民族委员部的委员会是由次要人物组成的。但是他们勤勉地搜集论点来对付斯大林的论点，向他提出他回答不上的问题。他有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完全不足以进行强迫；他必须使别人信服或说服别人。斯大林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他生性自高自大，而他的才智又不够，两者之间的矛盾给他造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局面。他在自己的部门中并不享有威信。当他的耐心丧失殆尽时，他只是躲藏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人们可以怀疑他是不是在这位司令官的厨房里思考他的论点。更加可能的是，他是在护理他自己内心的创伤，并在盘算，如果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不敢反对他，该多么好。但是，在当时，他甚至想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只是发号施令，而其他人都默默地服从。

培斯特柯夫斯基关于在莫斯科（政府在第二年3月从彼得格勒迁到那里）寻找人民委员部部址的叙述同样是很有趣的。各部门之间展开了争夺商人的私有房屋的激烈斗争。民族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时什么也没有。“我对斯大林施加了压力。”斯大林对谁施加了压力，我不知道。“不久以后，民族人民委员部拥有了几所私人房屋。中央办事处和白俄罗斯委员会设在波瓦尔斯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委员会设在尼基茨克，波兰委员会设在阿尔巴特，犹太委员会设在柏列契斯金卡，鞑靼委员会设在莫斯科河码头的某个地方。此外，斯大林和我的办公室设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

这种情况十分不满。‘现在要监视你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找一幢大房子，大家都集合在那里。’这个想法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几天后他对我说：‘我们分配到西伯利亚大旅馆，可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故意占去了。但是我们不退却。叫阿利路也娃用打字机把下面这句话打在几张纸上：‘本处为民族人民委员部占有’。带几枚图钉。”

阿利路也娃是斯大林未来的妻子，她是民族人民委员部的打字员。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带着这些有魔力的纸和图钉，乘汽车前往兹拉托乌斯特街。“天色已晚。这家旅馆的大门关闭了。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本房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占有。’斯大林把它撕下来，把我们的纸贴上去。斯大林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走进去。’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后门。由于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电灯熄了。我们划了火柴照路。在第二层楼上，我们东歪西倒地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随便在一些门上贴上我们的通知。回去时，我们没有火柴了。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走到底层，差一点折断我们的脖子。我们终于设法摸索走到汽车那里。”

需要一定的想像力才能设想一个政府成员在黑暗中闯入一幢为另一个政府部门所占有的房屋，撕下一些通知，把另一些通知贴上去。可以肯定地说，其他任何人民委员或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不会想到做这样事情的。这里我们认识到巴库监狱时代的柯巴。斯大林一定知道，关于一所房屋这种可争辩的问题将在最后由人民委员会或在政治局中予以决定。在一开始就向其中的一个机关提出申请，原会简单些。显然斯大林有理由假定，在这场竞争中，不会作出有利于他的决定，他企图使人民委员会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尝试失败了；这幢房屋拨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更

加重要的部^①。斯大林心中又一次怀有对列宁的怨恨。

按照培斯特柯夫斯基的叙述，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推理的：每一种民族压迫只是阶级压迫的一个表现。十月革命摧毁了阶级压迫的基础。因此，没有必要在俄国组织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区。地域应该完全从经济方面划分。“……反对列宁主义政策的情绪，虽然乍一看来似乎是奇怪的，在非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拉脱亚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中间特别强烈。在边界地区受到压迫的布尔什维克是在同地方民族主义党派进行的斗争中长大的，他们倾向于不仅拒绝沙文主义的毒素，甚至还拒绝进步的社会要求。民族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委员会由三个俄罗斯化的非俄罗斯人组成。他们以他们的抽象的国际主义来对付被压迫民族的实际发展需要。实际上，这项政策支持了旧的俄罗斯化传统，它本身在内战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危险。”

成立民族人民委员部是为了把以前受压迫的俄罗斯各民族组织起来，办法是成立各个民族委员会——例如亚美尼亚、白俄罗斯、犹太、拉脱维亚和伊斯兰教民族（后来改名为鞑靼—巴什基里亚）、波兰等委员会——和高加索山区居民、德意志、吉尔吉斯、乌克兰、楚瓦什、爱沙尼亚、卡尔梅克、南部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为捷克战俘服务）、沃加克和科米等部门。委员部试图在苏维埃基础上组织各民族的教育工作。它出版了一份俄文周报《民族生活报》，并用各种民族语文出版了一些刊物。但是它主要致力

① 到1930年，斯大林的权力不再是可以反对的了。但是对他的正式的个人迷信那时刚刚开始建立。这样才能解释这一情况：在这些回忆录中，尽管语调一般是赞扬的，仍然可以听到一种亲切的调子，甚至允许有一点善良的讽刺。几年后，当清洗和处决建立了必要的疏远感时，关于斯大林如何藏在一个司令官的厨房里或如何在黑夜中占领住房的故事已经听来是不体面的，而使这项文件受到禁止。该作者可能由于违反了礼仪而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著者注

于组织各民族共和国地区，从各民族本身中寻找必要的领导干部，一般地指导新组织的地域单位和照顾住在自己被分离的地域以外的少数民族。一些落后的民族第一次由于革命而要求过独立的民族生活。在他们看来，民族委员部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力。它为他们敞开了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过一种独立的生活的大门。在这方面，斯大林是列宁的一个无法替换的助手。斯大林非常熟悉高加索土著人民的生活——只有一个土著人才能够这样熟悉。在他的血液中就具有这种土著成分。他爱原始人民的社会，找到了同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不担心他们会在任何方面胜过他，因此他以民主、友好的方式对待他们。列宁很珍视斯大林的这些为其他人所没有的特点，用一切办法试图在各种民族代表团面前提高斯大林的威信。“同斯大林谈谈吧。他清楚了解这个问题。”他了解情况。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吧。他几十次、几百次地重复这种推荐。有时，斯大林同各民族代表或者在他自己的委员会中发生严重冲突，在所有这种场合中，问题就被提到政治局；在那里，作出的一切决定总是有利于斯大林的。这一点使得他的威信在落后民族的统治集团面前、在高加索、在伏尔加河、在亚洲进一步提高了。新的少数民族官僚机构后来成为斯大林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堡垒。

1919年11月27日，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组织和东方人民的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以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在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四人当选名誉委员：列宁、我、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大会的主席苏丹—加里也夫（后来结局不好的人物之一）建议大会欢迎斯大林，把他视为“燃烧着仇恨国际帝国主义的火焰的战士之一”。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丹—加里也夫关于总的政治革命的报告最后有着这样的致敬口号：“俄罗斯共产党万岁！党的领导人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万岁！”这一点特别说明了当时领导人的等级。甚至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

这次东方人民代表大会都不认为有必要把斯大林包括在党的领导人之列。

从革命的时候起直到民族人民委员部在 1923 年撤销时为止，斯大林一直是民族人民委员。民族人民委员部是由于成立了苏联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民族委员会撤销的。可以认为肯定证实的是，至少直到 1919 年 5 月为止，斯大林并不非常忙于民族委员部的事务。最初，《民族生活报》的社论并不是斯大林写的，后来，当这家刊物开始以大本出版时，斯大林开始一期接一期地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他的社论。但是斯大林写的文章并不是很多，而是逐年减少的。从 1920 年到 1921 年，我们发现他只写了两三篇文章。1922 年，一篇也没有。那时，斯大林完全去搞政治机器去了。

1922 年，这家刊物的编辑部说：“在《民族生活报》出版之初，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起了积极作用。在那段时期里，他不仅写了社论，而且还常常写参考性评论，为党的生活栏写札记等等。”读到这些文章，我们又想起了梯弗里斯出版物的老编辑和 1913 年彼得堡《真理报》的编辑。

例如，在好几期中，他专门注意东方。这是列宁的指导思想。在他的若干文章和演说中，他可能遵循这个思想。无疑，斯大林对东方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性质的。他本人就是一个东方人。他对西方生活和西方语言都不熟悉，如果说他在西方代表面前总是感到不知所措，那么在东方落后民族的代表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命运的这位人民委员就感到自己更有信心得多，并且是站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基本思想是列宁的思想。但是对列宁来说，东方和西方的前景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的。在 1918 年，占重要地位的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东方问题；战争就要结束了，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动乱，在德国、奥匈帝国和其他地方都有革命。例如，在 1918 年 11 月 24 日（即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发生时）

的一期中刊载了斯大林的题为《不要忘记东方》的文章。我们大家全都认为这些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当时斯大林写道：没有东方的革命运动，“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①——换言之，斯大林认为，没有东方的革命觉醒，不仅在俄国，甚至在欧洲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是重复列宁的指导思想。但是在重复这种思想时，不仅有分工，还有兴趣的划分。关于西方革命，斯大林完全无话可说。他不了解德国，不了解它的生活或语言，其他人则以丰富得多的知识写有关德国的文章。斯大林集中力量于东方。

在1918年12月1日，斯大林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乌克兰在解放中》的文章。这是老一套的座谈会式的词藻。重复代替了其他办法：“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给新的不速之客——英法奴役者以应得的打击。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揭穿他们的反动作用”^②，等等令人作呕的话。在1918年12月22日同一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写道：“在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协助下，（乌克兰）苏维埃国家机器正在恢复中。乌克兰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以皮达可夫同志为首的……组成乌克兰政府的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是：皮达可夫、伏罗希洛夫、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克维林、查东斯基和柯秋宾斯基。”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伏罗希夫还活着，成为元帅。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一次事故中死亡；所有其他的人不是被公开处决，就是毫无踪迹地不见了。这就是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命运。

① 参看《不要忘记东方》。《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28页。——译者注

② 《乌克兰在解放中》。《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56--157页。——译者注

2月23日，他发表了题为《两个阵营》的社论，他在社论中说：“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涨，围攻着帝国主义的堡垒。革命浪潮的吼声在被压迫的东方各国发出了回响。帝国主义脚下的基地燃烧起来了……”。^①尽管说了好些“浪潮”，这些说法都是陈词滥调，彼此互不协调。在所有这些话中，在平淡的含糊的官僚词藻之下，明显地有一种不真诚的语调。1919年3月9日，《民族生活报》发表了斯大林所写的题为《两年以来》的文章，文章表示了他的结论：“无产阶级的两年斗争经验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的预言。”^②在那些日子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还没有缩小到一个单独的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其他所有文章都属于这一类型。所有的文章全都极端缺乏独创性的思想或吸引人的形式。这些文章在表面上是说教性质的，枯燥、冗长和虚假。

楚瓦什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20年4月举行，也就是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两年多之后举行的。名誉主席团仍是由列宁、我、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四人组成。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刊物在描述代表大会开幕情况时指出，墙上挂着世界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那时还没有斯大林的画像，什么地方都不挂他的画像，谁都从来没有想到甚至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挂他的一幅画像。而这次会议完全在斯大林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斯大林在巴库，在那里，他

① 《两个阵营》。《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06—208页。——译者注

② 《两年以来》。《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16—217页。——译者注

在庄严的苏维埃会议上讲话，作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的报告。在11月13日的达格斯坦人民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了达格斯坦的自治。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刊物说，“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多次为雷鸣般的掌声和《国际歌》所打断，最后全场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11月17日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的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亲自宣布“成立一个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①，并作了关于上述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1920年12月18日和21日之间，举行了第一届全俄自治共和国、边区、州代表会议。斯大林因病不能出席，卡敏斯基代表斯大林向会议祝贺。会议一致通过了向斯大林慰问的动议。但是那次东方人民大会的记录说：“……选出大会名誉主席：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选出名誉主席团成员……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又是居于末位！

在维也纳，斯大林在列宁指导下，写过一本有价值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书，在西伯利亚他想独立地继续这个工作，但是列宁甚至认为不可能发表他的文章。在1917年的三月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认为民族压迫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的看法，而完全看不到帝国主义是我们时代民族压迫的主要因素。在1923年，他把具有悠久传统和压迫过弱小民族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同弱小民族的防卫性民族主义放在同等地位。这些明显的错误，斯大林式的错误，放在一起看是可以理解的。上面已经指出，这是因为他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概念。他根据一时的需要利用一些互不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就像在鞋铺里按大小挑选鞋子一样从中进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每遇到事件转折点他总是那么容易自

^① 《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52页。——译者注

相矛盾起来。因此，即使在他专长的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也不能达到完整的概念。

他在1920年10月10日的《真理报》上写道：“承认脱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建议脱离。边疆地区的脱离将会损害中央俄罗斯的革命力量，中央俄罗斯鼓舞了西方和东方的解放运动。脱离出去的边疆地区必将遭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奴役。只要看一看脱离俄罗斯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芬兰等就够了，它们只保持着独立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变为协约国的无条件的附庸。回顾一下被德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乌克兰和受协约国蹂躏的阿塞拜疆的最近历史，就可以充分理解在当前国际条件下提出让一个边疆地区脱离的要求的反革命性质。”^①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写道：革命浪潮“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被彻底击溃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

^① 参看《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13页。——译者注

和农民。”^①

这就开始了外国干涉的浪潮和对边疆地区的占领，这些边疆地区的居民多数是非俄罗斯民族，他们必然憎恨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化的政策。在斯大林1920年11月8日在巴库作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结束语：“毫无疑问，我们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困难是吓不倒我们的……”套用路德的某些话，俄罗斯可以说：“我站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交界处，为了摧毁旧世界，在这个交界处，我把西方无产者的努力和东方农民的努力联合起来。愿历史之神帮助我！”^②

〔根据〕培斯特柯夫斯基〔说〕：

* “1918年春天，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为了就这个决定制订更具体的办法，5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乌拉尔边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的代表，鞑靼族和巴什基尔族的代表，以及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官员。

参加这个会议的乌拉尔边区的代表是西罗莫洛托夫和金图尔同志。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巴什基尔族共产党员沙米古洛夫同志。这三人都坚决反对成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认为其性质是对泛伊斯兰民族主义的一种让步。受到这种意外的支持后，民族人民委员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我们这些‘左派’精神抖擞，决心坚持地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这样一来，主张成立共和国的人就处于少数。坚决支持斯大林的只有鞑靼族共产党领

① 参看《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21—123页。——译者注

② 参看《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45—346页。——译者注

领导人奴尔—瓦希托夫和乌法鞑靼人的代表、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伊布拉吉莫夫。巴什基尔族共产党人沙米古洛夫表示反对成立这个共和国，认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不必要的让步。另一巴什基尔人马纳托夫的行动更坏些。他在会议上投票赞成成立共和国，不愿意‘同他的上级争吵’，但是在走廊中他却要求我们坚决反对建立这个共和国，因为据他说，巴什基尔人不愿意同鞑靼人在一个共和国中。

随后在会议期间斯大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并宣布，由于这个问题事先中央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们应该投票赞成组织一个共和国。但是我们没有让步，并且对会议召开之前就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表示抗议。我们离开了那个小组会，拒绝再参加委员会的讨论。当时我们揶揄斯大林说：‘只有一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一起’。为了这件事我们后来收到中央委员会的书面责备。”

1917年11月宣布成立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之后，群众中增长了对苏维埃政府的同情。这些巴什基尔群众的领导权落入以扎克—瓦利多夫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代表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部分。这个集团逐渐堕落为反苏活动的前哨据点，并同杜托夫和高尔察克建立了联系。可是，在巴什基尔自治权被高尔察克取消之后，扎克—瓦利多夫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同苏维埃政府开始谈判。1919年2月，在消灭高尔察克之后，巴什基尔政府投向苏维埃政府一边，并且在同月底，在西姆比尔斯克东部战线参谋总部，巴什基尔政府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这个协议保证给予巴什基尔人民自治，条件是它的政治应建立在苏维埃宪法的基础上，巴什基尔部队同红军公开共同行动反对白卫分子等。

1919年3月初，斯大林在莫斯科开始同巴什基尔代表团谈判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谈判的结果是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巴什基尔政府在1919年3月20日缔结关于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的

协定。在3月初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并且由于乌法附近的军事失利，我未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平静地留在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并且同巴什基尔代表团一直谈判到3月20日。可是，巴什基尔的现代历史家几乎都不记得斯大林和这件事有关。〔下列两段摘录是典型的，第一段摘自安塔古洛夫的著作，第二段摘自隆莫伊洛夫的著作：〕

(一)

* “俄罗斯同志和巴什基尔同志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彻底无政府状态发生了。在一个地方，以巴什基尔政府的名义逮捕了俄罗斯人；在另一地方，以地方政府的名义逮捕了巴什基尔人。托洛茨基的乌法之行和这个运动（1920年3月）恰巧发生在同时。巴什基尔官员再度开始同苏维埃政府的托洛茨基同志进行谈判，并且取得某种程度的协议。”

(二)

* “同时，由于收到从巴什基尔来的消息，中央对巴什基尔问题很注意。3月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授予特别权力来到乌法，召集我们到那里举行关于巴什基尔问题的会议。从斯特里塔马克来代表巴什基尔人参加会议的有瓦利多夫、图赫瓦图林、拉哈马图文和卡斯普兰斯基；边区委员会代表和中央官员有杜德尼克、萨莫伊洛夫、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乌法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埃尔秦。”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乌克兰的布尔什维主义力量是薄弱的。其原因要从那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中去找。各城市由于居

民是大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只有少数是乌克兰人，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殖民地性质。在乌克兰产业工人中，相当大部分是大俄罗斯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对农村以及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发生兴趣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受到半讥讽的对待，这当然使他们愤慨并把他们推向沙文主义。城市中非乌克兰族的社会主义分子同农村群众的生活并无一种血缘关系的感受。在乌克兰城市中，他们是代表大俄罗斯的文化的，但他们之中大多数，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对大俄罗斯文化也并不十分熟悉。因此，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了乌克兰布尔什维主义的异族性质，恰好在应该使布尔什维主义深深扎根的时期缺乏布尔什维主义，并且产生深刻的独立性、错综复杂的冲突和争吵以及经常的内部派别斗争。

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其任务是经常注意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比其他人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有更密切的关系。这种较密切的关系早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并延续了好几年。在乌克兰，斯大林代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在某些党代表大会上，他又代表乌克兰的组织。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他以其实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参加，由于这个乌克兰组织的生活大部分浪费在经常的争吵、冲突和搞派别之中，斯大林在这种气氛中就如鱼得水。

他在乌克兰的时期充满了失败，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一直完全没有透露。〔斯大林主义者所写的官方历史，被迫纪录下在斯大林担任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的整个时期在乌克兰贯彻党的路线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但谨慎地避免提到他的名字同这种流行病般的失败有关。这些历史不说：归根结底，“1919年初在乌克兰犯的关于农民和民族问题的错误——这个错误使那里

的苏维埃政府垮台”，是由于斯大林完全不适当地执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政策。列宁谴责这次错误说：“管理得良好的农田只有很小部分应该改变为苏维埃农场，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我们需要一种同我们在1917年末和1918年好多月中所需要的那样的政策……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划出大的苏维埃农场以供普遍的土地分配。”〕

〔斯大林在1920年3月16日出席第四届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并带有中央委员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明确决议。他在会上又遇到了包括各色人等的反对，带头的是萨普罗诺夫的“民主集中派”的追随者，这个派别已在前一年12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的辩论中被击败了。这一次，这些反对者的所有论点事先都已知道，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提出了托洛茨基预先为他写好的反驳论点。托洛茨基写这些反驳论点是政治局委托的。可是，斯大林却在乌克兰会议上遭到了失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干涉，在乌克兰中央委员还不能实行它的坚持执行“民族自决”原则的政策之前，就解散第四届会议所选出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并且从乌克兰召回一批有严重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的官员。1919年12月全俄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要点如下：〕

“鉴于乌克兰文化……许多世纪以来受到沙皇制度和俄罗斯剥削阶级的压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党员尽力协助消除对自由发展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一切障碍。由于许多世纪的压迫，在乌克兰落后部分群众中产生了民族主义倾向，鉴于这个事实，所有党员的任务是：对待这些群众要十分耐心谨慎，用同志式的态度向他们解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们……应该使劳动群众学习乌克兰语言，并在所有苏维埃机构中使用乌克兰语言的权利得到实际执行……使……乌克兰

兰语言成为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武器。应当立即采取步骤保证在所有苏维埃机构中有足够的懂乌克兰语言的工作人员，并且所有工作人员将来都能说乌克兰话。”

这应当是十分容易为之辩护的决议。虽然一般说来，斯大林不是一个成功的辩论家，但考虑到当时的力量对比情况，他的失败还是使人惊异。很可能是，斯大林预先感到会议的气氛不利于阐述他的论点，就决定采取以败取胜的办法，通过居间人表明，他阐述这种论点并非出自自己的信念，而只是执行纪律。他想用这种办法一举两得——既取得乌克兰代表的同情，又可以把失败责任转嫁于我，因为我是那个决议的作者。这种阴谋正符合这种人的精神状态！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不但领导小小的格鲁吉亚的贫困农民，而且也渴望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取得“全俄罗斯革命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十月革命的头几个月中，格鲁吉亚知识界的主要分子不把格鲁吉亚认为是一个民族故乡，而认为是一个“吉隆德省”，是上帝选择的向全国提供领袖的南方省份。但是这只有在还有希望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进行。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可能性明朗化之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就立即切断与俄罗斯妥协派的联系，而同格鲁吉亚本地的反动分子联合。到了苏维埃取得胜利，格鲁吉亚的主张单一的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人就一变而为分裂主义的热烈支持者。……

〔下列当时的文件对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提供了新的说明：〕

(一)

* “高加索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

奥尔忠尼启泽：

你的有所抱怨的信收到。你误解我的调查为不信任你，进行调查是我的责任。我希望在我们会面之前，你将放弃这种不适当的委曲语气。

第九十六号。

1920年4月3日

列宁”

(二)

* “罗斯托夫转巴库

高加索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奥尔忠尼启泽：

(通过负责人员递交，递交情况应报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斯克利扬斯基。)

中央委员会命令你把格鲁吉亚领土上的所有部队撤到它的边境，并禁止侵入格鲁吉亚，在同梯弗里斯谈判后，显然与格鲁吉亚获致和平并非不可能。

立即报告关于叛乱者的一切最精确的事实。

这是政治局的命令。

第〇〇四/一〇九号。

1920年5月5日

列宁、斯大林”

(三)

〔此信用的是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信纸，用打字机打的，日期为1921年2月17日，发自莫斯科，编号为第八六四号，上标“秘密、亲收”，收信人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信旁有两处批注——一为斯克利扬斯基写的：把此信呈交列宁；另一为列宁写的：把此信退还斯克利扬斯基。信的主要内容为：〕

* “……由于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主动行动，我们面对着侵入格鲁吉亚的既成事实：红军已越过格鲁吉亚边境并与格鲁吉亚军队发生冲突……

总 司 令 谢·加米涅夫
参谋部军事人民委员〔斯·〕达尼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彼·〕列别捷夫”

(四)

叶卡特林堡
秘 密

* “莫斯科

斯克利扬斯基：

请就对格鲁吉亚进行军事行动问题写一简短备忘录，此次行动何时开始，何人下令等。我需要此备忘录提供中央全会之用。

第十六号。

1921年2月21日

托洛茨基”

(五)

* (列宁所写：为一秘密文件的副本)

(由斯科利扬斯基同志打字，签名)

绝密

“中央委员会倾向于让第二集团军积极支持格鲁吉亚的起义和占领梯弗里斯，同时保持国际关系状态，条件是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认真考虑一切事实后，对胜利完全有把握。我们通知你们，由于运输问题，我们现在饿着肚子坐在这里，因此将不能给你们一节火车或一辆汽车。我们不得不从高加索取得谷物和油。我们要求立即通过直通电报答复，电报要由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斯米尔加、西金、特里弗诺夫、弗鲁姆金签署，在我们未复上述诸人的电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

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无日期)

克列斯廷斯基、斯科利扬斯基”

(六)

“斯科利扬斯基同志，请立即在你亲自监督下把此件摄影，极端谨慎地译成密码，发给斯米尔加，并要他亲自站在直通电报机前，亲自译出密码。(把此事告诉总司令，但不把此件给他看。)

斯大林自己会派奥尔忠尼启泽去。

因此，要加倍和千万倍小心。你要负全责。

1921年2月14日

(列宁同志亲笔)

列 宁”

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已无法支持下去。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清楚的。然而，在实行苏维埃化的行动和方法上意见并不一致。我主张在格鲁吉亚内部进行一定准备时期的工作，以促进起义，然后再去援助。我认为，在同波兰达成和平并击败弗兰格尔之后，已没有来自格鲁吉亚的直接威胁，可以延期采取最后行动。奥尔忠尼启泽在斯大林支持下，坚持要红军立即开进格鲁吉亚，估计那里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列宁倾向于站在中央委员会中这两个格鲁吉亚籍委员一边。这个问题政治局是在1921年2月14日决定的，当时我在乌拉尔。

军事干涉进行得很成功，如果不算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的疯狂运动在内，并没有引起任何国际间纠纷。然而，为了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而使用的那种方法在那以后数年中发生极大的影响。有些地区，劳动群众在革命前本来就在多数情况下支持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把后来所遭受的困难和苦难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的一部分。但在那些由红军实行苏维化的较落后地区就不是这样。在那里，劳动群众认为，增加的困难是外面强加的政权的结果。在格鲁吉亚，过早的苏维埃化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孟什维克分子的地位，并且导致1924年的广泛群众叛乱。斯大林自己承认，当时格鲁吉亚不得不“重耕一遍”。

第九章 内 战

当人们读目前的历史著作时，在每个事件中都可发现有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托洛茨基没有执行列宁的训令；在南部战线，托洛茨基违抗列宁的指示；在东部战线，托洛茨基的行动违反列宁的命令，诸如此类等等。首先，应该指出，列宁不能个人给我下指示，党内的关系不是那样。我们都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解决所有不同的意见。每当列宁和我有不同意见时（这种情况并不止一次），问题就自动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定。因此，严格说来，从来不发生我违反列宁指示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形式的一面。追究到实质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问，对于这样的列宁是否有充分理由应该执行他的指示：他所任命的军事部领导人是一个只会犯错误和犯罪的人；所任命的国民经济领导人——李可夫是一个“自己供认”的资本主义复辟者和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所任命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叛国者季诺维也夫；所任命的党报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是未来的法西斯匪徒布哈林。

在斯大林时期的所有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鲁彻尔、布琼尼、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德宾科、费德拉、〔科克、普特纳、费尔德曼、阿尔克斯尼斯、埃德曼、普里马科夫和其他许多人〕等在我担任军事部领导人的时候，都一度被提升到军事负责职位，多半是在我视察前线和直接监督他们的军事工作的时候由我亲自提升的。因为无论我自己的领导

工作多么差，在挑选最优秀的军事领袖这一点上显然是够好的，因为斯大林在十几年中找不到可以代替他们的人。的确，几乎所有的内战时期的红军领袖，以及所有后来缔造我们的军队的人，最后都变成“叛国者”和“间谍”。但这并没有改变情况。保卫过革命和国家的是他们。如果在1933年，会发现红军是由斯大林而不是别人缔造的话，那么挑选了那么一批指挥员的责任就会由他来担负。御用的历史家要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并没有一些困难，但用了很直截了当的办法。他们把任命叛国者担任领导职位的责任全归于我，而把正是这些叛国者所取得的胜利的荣誉都无保留地归于斯大林。今天，由于斯大林自己编纂的一本历史，这种举世无双的历史分工，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了。

内战时期的军事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适当地使用他们，对指挥人员建立必要的监督，消除有嫌疑者，施加压力，进行惩罚。行政机器中的所有这些活动完全适合斯大林的才能。然而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有必要把人这个原料变成一支军队，打动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灵，激励他们的正确情操，鼓舞他们对新领导人的信心。关于这方面，斯大林完全无能。例如，就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团前面出面；在这方面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他从来不亲自向军队发表书面文告，显然是对自己的学院式文章缺乏信心。他在他所工作过的战线地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影响一直是间接的、官僚主义的、警察式的。

我记得在内战时，曾经问过当时同斯大林在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谢雷布里亚科夫，为了节约部队力量，他是否可以无需斯大林的协助。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不，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施加压力。那不是我的专长。”这种“施加压力”的能力就是列宁对斯大林那么器重的东西。国家机器

“施加压力”的力量越大，革命精神被撇离这个机器越远，斯大林就越加自信。

如果前线吸引斯大林的话，它也使他讨厌。军事机器保证有可能发号施令。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个机器的首脑。最初他只统率20个军中的一个军；后来他领导五六个战线中的一个战线。他建立了严厉的纪律，紧紧抓住所有的杠杆，不容许不服从。同时，作为一个集团军的统帅，他有系统地怂恿别人违反战线领导人的命令。在领导南部或西南部战线时，他违反了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军队中，除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关于从属关系的规定：那些具有某种指挥官或高级行政职位的大公们，常常不把上级军官放在眼里，从而在陆海军的管理中造成混乱。我记得曾对列宁说，斯大林不适当地利用其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权力带入我们军队之中。〔十年以后〕，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的文章中〔毫无隐讳地承认〕：“斯大林准备违反任何规章，任何从属关系。”宪兵是从不法之徒中招募来的。

上下级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事。集团军一级几乎总是对战线一级不满，战线一级总是对参谋部有意见，特别是在情况不十分顺利的时候。斯大林的特点，是他有系统地利用这种摩擦，使它们发展成为激烈的抗争。斯大林把他的合作者拉进危险的冲突，从而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使他们更依赖他。有两次，中央委员会直接下令把他从战线召回，但是每当形势有新的转折时，他又被派出去。尽管屡有机会，他在军队中并未建立起威信。可是，那些在他指挥下的军事合作者，一旦被拉入反对中央的斗争之中，以后就一直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察里津集团成了斯大林派的核心。

斯大林在内战中起过什么作用，也许下述事实最足以说明：在内战结束时他的个人威望毫无提高。当时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说

出或写出这样的话：斯大林“拯救”了南部战线，他在东部战线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关于他拯救了察里津使它免于陷落。在有关内战的许多文件、回忆录和文集中，斯大林的名字不是根本未提就是同很多其他名字并提。而且，波兰战争给他的名誉沾上不可抹除的污点——至少在党内较熟悉情况的人士之中。他躲避参加反对弗兰格尔的战役，究竟是因病还是有其他考虑，现在很难断定。无论如何，内战时，他在群众中是不出名和陌生的，就像他在十月革命中一样。

现在的历史家写说：“在1918—1920年那个困难时期，斯大林同志从一个战线调到另一个战线，调到革命的最危险地点。”在1922年，教育人民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包括15篇文章的《五年文集》，其中一篇关于“缔造红军”，一篇关于“在乌克兰的两年”，都是谈到内战的。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一个字提到斯大林。次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内战》的包括两卷的文集。它的内容是关于红军历史的文件和其他材料。当时还没有人有兴趣使这种文集带有倾向性。在这整个文集中，没有一字提到斯大林。同年，即1923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共有400页的书，名为《苏维埃文化》，其中关于军队的部分，在《红军的缔造者》的标题下，印了许多张相片。这中间没有斯大林。在题为《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七年中的革命武装部队》的部分，斯大林的名字甚至都没有提到。然而，这部分的插图中不但有我的相片、布琼尼和布鲁彻尔的相片，甚至也有伏罗希洛夫的相片。其中提到的内战时期领导人，不但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德宾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乌波列维奇、普特纳、沙兰戈维奇，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人，几乎他们后来全部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被枪杀，其中〔只提〕两人——弗鲁姆金和谢·加米涅夫是在自然情况下死的〔无疑，这只是因为他们能在大清洗之前死去〕。关于弗鲁姆金死亡的

情况，仍然罩着疑云。这本书中提到的人中，有内战中任波罗的海和里海舰队司令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在1938年斯大林对外交使团进行清洗时，拒绝从他在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任所奉召回苏联。在写了一封控诉斯大林的公开信之后，他突然在神秘情况下死去，显然是被毒死的。〕

【伏罗希洛夫不动声色地争论说，“在1918—1920年期间，斯大林或许是中央委员会中仅有的被从一条战线派往另一条战线的一人”。无疑地，“或许”这个字是伏罗希洛夫有意用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的，因为当他写那句话的时候，他是完全知道下述事实的：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和代表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都不比斯大林小，有些人还比他大得无法估量——其中有依·恩·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拉谢维奇、穆拉洛夫、罗森霍尔茨、奥尔忠尼启泽、伏龙芝、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别尔津、古谢夫。他知道，所有这些人或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或作为战线领导机构的成员，集团军领导机构的成员，或者领导几个集团军和战线，有的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员（如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谢维奇），在各个战线上呆了整整三年，而斯大林在内战三年中在各战线的全部时间还不到一年。】

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似乎是根据档案中的某种证据，顺便提到斯大林一度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没有具体提到他是在哪一个时期参加这个最高军事机构的。在1928年一切权力都集中到斯大林手里的时候，由三个作者编写的一篇专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十年》中说：

“1919年12月2日，古谢夫同志参加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后在内战整个期间，斯大林、波德沃伊斯基、奥库洛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谢雷布里亚科夫都在不同时期被任命参加了革命军事委员会。”

【由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在1924年编纂的一本共产党历史中，在肆意重复了关于斯大林“在内战时期主要时间在前线”的谎言之后，还说斯大林“从1920至1923年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列宁的《杂文》第二十卷（第九页）中，提到斯大林“从1920年起……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在1931年《真理报》红军节那一期中，出现了三个“未发表过”的文件——都是1920年的电报，其中一封电报是斯大林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打给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日期是6月3日；第二封电报是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打给上述身份的斯大林的关于前线情况的例行报告，日期是6月25日；第三封电报是南部战线怀念伏龙芝打给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报告对弗兰格尔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就是内战本身的结束，电报日期是11月15日。根据这些文件，也就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证据，似乎斯大林确实曾是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最少是从1920年6月3日至6月25日，三星期多一点。还没有过在那一年，那两个日期以前和以后的证据被引用来证明他是那个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没有呢？的确，军事部出版的收集有我的命令、文告、演说的五卷文集，不但被没收和毁坏，而且禁止提到它，更不要说引用它了。党的正式历史杂志《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10月出版的一期就完全是内战的文件的这五卷写道：“在这些……卷册中，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家将可以找到大量十分宝贵的文件材料。”

但是在军事部的档案中，还存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速记记录。这个机构的记录极为精确并且保存得十分安全。为什么不援引这些材料来确证斯大林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实际时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这些会议的记录中，没有提到他出席，只有一两次他作为地方性问题的请求者时是例外。记录中从来没有提到他是委员会的实际委员，更不要说根本不存在的“主席团”了。

然而，斯大林是在1920年春天被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为那个机构的委员的。】

对于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的解释，就我所能记忆的，相当能说明斯大林的性格。在内战整个期间，我在每一次同斯大林的冲突中，总是设法使他处于一种必须明确的阐述对军事问题的意见的地位。我设法把他的愠怒情绪和暗中反对变为公开的反对，也就是让他公开参加一个军事领导机构。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完全支持我的军事政策。我在取得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同意后，终于使斯大林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我已不记得是以什么借口。斯大林只好接受这个任命。但他找到了简单的对付办法：以工作过于繁忙为借口，他一次也没有参加〔那个最高军事机构的〕会议。

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在苏维埃政权的头12年中，既没有人提到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领导”，甚至也没有人提到他“积极”参加内战。可是这很容易解释，简单的事实是：当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军人知道事情真相和事件的过程。

【即使在1930年《真理报》在红军节出版的一期上，也还没有宣称斯大林是整个红军的主要组织者，而只说是红军骑兵部队的主要组织者。在那一天之前的八年，即1922年2月23日，《真理报》曾经在一篇关于内战的文章中发表过稍为不同的关于建成红军骑兵部队的说法：

* “马蒙托夫占领了柯兹洛夫和坦波夫一个时期，造成很大破坏。托洛茨基同志为了组织骑马的群众而提出的口号“无产者，骑上马！”受到热烈欢迎。到了10月19日，布琼尼的军队就在沃龙涅什指挥下对马蒙托夫进行打击。”

〔一直到〕1926年，不但是在我被免除军事部的职位之后，而且是在我已经遭受残酷迫害之后，军事学院出版了一本历史研究

著作《革命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其作者都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书中还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的‘无产者，骑上马！’的口号是完成组织红军的那一方面工作的激奋人心的口号。”

这里提到的“那一方面工作”就是指红军骑兵部队的缔造。在1926年，还没有人提到斯大林是骑兵部队的组织者。

〔伏罗希洛夫坚持〕斯大林在组织骑兵部队方面的伟大作用。伏罗希洛夫写道：“这是把骑兵师联合为大到一个军的单一部队的第一次试验。斯大林预见到骑马的群众在内战中的威力。他透彻地了解他们在一次毁灭性军事行动中的极大重要性。但是以往没有人有过使用骑兵军团作战的独有的经验。科学著作中也没有写到它。因此，这种措施引起了惊奇或者直接反对，特别反对它的是托洛茨基。”〔伏罗希洛夫这样争辩，只是暴露了他对军事问题的无知，这种无知的程度只有他的回避事实的本领能超过。〕要点在于，是把两个师团和一个神枪手旅合并为一个特别骑兵军，还是把这三支部队交给一个战线的指挥官支配这样的问题，根本同是否认识到骑兵部队重要性无关。最重要的标准是关于指挥官的问题：布琼尼是否有能力统率这样多的骑兵？他是否有能力从担任战术任务提高到担任战略任务？如果没有一个熟谙和理解骑兵的优异的战线一级的指挥官，没有可靠的通信手段，那么成立一个特别骑兵军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过分集中骑兵总是可能减低骑兵部队的基本有利条件，即其机动性。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具有插曲性质，如果历史能重演，我还会再重申我的怀疑。〔可是，由于特殊情况是那样，〕我们的确成立了骑兵军。

〔实际上，〕创建红军骑兵部队的运动是我在1919年许多月工作中的主要部分。有如我在其他地方讲过的，红军是由当时在动员农民的工人建成的。工人比农民优越的条件不但在于工人的总

的文化水平，而且特别在于他们善于使用新技术的武器。这就使工人在军队中具有双重的有利条件。至于骑兵，情况就很不一样。骑兵的故乡是俄罗斯的草原。最优秀的骑手是哥萨克人。其次是草原上拥有和熟悉马匹的富农的子弟们。骑兵部队是旧军队中最反动的部分，它比军队中其他任何部分都更久地支持沙皇政权。因此，建立一支骑兵部队就有双倍的困难。必须使工人习惯于马匹。必须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者实际骑上马背，即使只是担任政治委员或者基层的列兵。他们的任务是在骑兵部队的中队和团队中建立坚强和可靠的革命小组。这就是我的“无产者，骑上马！”口号的含意。全国各地，所有工业城市，都贴有这个口号。我跑遍全国各地，给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布置关于建立〔骑兵〕中队和〔骑兵〕团队的任务。我的一个秘书波兹南斯基亲自专门负责建立红军骑兵部队的工作——我应该补充说，他的这个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单单是骑上了马的无产者的这个工作就实际上使不健全的游击队转变为训练良好的骑兵部队，（并且使成立一支可靠的骑兵部队成为可能）。

苏维埃政权有三年在进行内战。全国的工作都由军事部决定。所有其他政府活动都从属于它。重要性仅次于它的是供应人民委员部。工业主要是为战争服务。所有其他部门和机构经常缩小精简，有些甚至完全撤销。所有积极和英勇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各人民委员部的成员，以及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布尔什维克〕，多半时间都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或有时作为集团军军长，在前线度过。战争本身对于一个前几个月还在地下的革命政党，是一个训练政府纪律的严格学校。战争通过它的无情要求，从党内和国家机器中把渣滓淘汰出来。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留在莫斯科：列宁是政治中心人物；斯维尔德洛夫不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

且还是党的总书记〔甚至在那个职位还未正式设立之前〕；布哈林是《真理报》主席。季诺维也夫留在彼得格勒担任这个城市的政治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适合于做军事工作。莫斯科的领导人加米涅夫数次被派到前线去，虽然他的天性也不是一个军人。拉谢维奇、斯米尔加、伊·尼·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谢雷布里亚科夫等〔主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差不多都经常在前线。

即使只是简单地列举一下这些和其他许多战士在地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业绩，也会使我们谈得太远。他们之中任何人在任何方面也不比斯大林差，好几个人在革命者所认为最宝贵的价值方面还比他强——政治上的鲜明性，英勇精神，作为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的才能。只要回顾一下这一些就够了：当组织红军时，其他一些人被认为比斯大林更适合担任那个工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1918年3月4日设立，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波德沃伊斯基、斯科利扬斯基和达尼舍夫斯基任委员；邦契—布鲁也维奇任秘书长；一些沙皇军队的军官为军事专家。到1918年9月2日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时，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瓦采齐斯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委员为伊凡·斯米尔诺夫、罗森霍尔茨、拉斯科尔尼科夫、斯科利扬斯基、穆拉洛夫和尤列涅夫。到1919年7月8日，当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精简人员时，它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斯科利扬斯基任副主席，李可夫、斯米尔加、古谢夫为委员，谢·米涅夫为总司令。像其他人一样，斯大林在军队中也有其地位，红军让他适当地发挥才能。违反事实的是，后来硬说斯大林在组织红军和领导内战中起过卓越的作用。】

军队是在炮火下建立的。建军方法是临时应付的居多，立即就在战斗中受到考验。为了解决每一个新的战斗问题，必须从无到有地组织新的团新的师。军队是由工人建立的，在纷乱情况下

以飞跃的速度壮大起来。工人动员农民和吸引旧军官参加他们的事业，并且把他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不是容易的任务。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工业和运输完全瘫痪，没有后备物资，没有农业经济，工业解体的整个过程一直在恶化中。在那种情况之下，自然谈不到实行强迫兵役和强迫动员的问题。至少暂时需要采取自愿办法。

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对于在战壕中打仗已感到厌烦，对于他们，革命就意味着从战争中解放出来。要动员他们再参加另一次战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动员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人更容易些，但是他们需要训练，而敌人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这样做。同我们党有某种联系的、绝对可靠的我们自己的军官数目是不足道的。他们在军队中担任重大的政治任务，但是他们的军事眼光是近视的。当他们的知识不够用时，常常不明智地利用其革命和政治的权威，因而妨碍了建军的工作。党本身，由于是在九个月前刚刚从沙皇统治的地下状态走出来，几个月后又遭受临时政府的迫害，它在十月光辉胜利之后，难于适应还要面临内战的思想。总之，在创建红军的道路上堆积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有时似乎让争论消耗了一切精力。我们能不能创立一支军队？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问题。

在从反对旧国家的革命斗争过渡到创立新国家，从破坏沙皇军队过渡到创立红军的过程中，伴随着党的危机，或者说应该说是系列危机。每走一步，都有旧的思想方法和旧方式同新的任务发生冲突。党必须进行重新武装。由于军队是国家的所有组织中最必要的组织，以及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注意力的中心是保卫革命，很自然地党内的所有讨论、冲突和分成派别都围绕在建军问题上。几乎在我们一开始努力使分散的武装队伍变为一支由中央指挥的军队的时候，就出现了反对派。党内和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终于

都支持军事领导机构，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本身为它辩护。然而，也并不是没有人攻击和摇摆不定的情况。在内战激烈进行期间，党内也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即使在前线，在不公开的党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也常常不顾情面地攻击军事领导机构的政策。当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去迫害那些批评的人。在前线，处分是十分严格的——也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但是只处分未完成军事任务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的力量比较软弱无力，因为我得到列宁的支持。一般说来，每当列宁和我的意见一致时（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一致的），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总是支持我们，几乎都是一致支持。十月革命的经验已经在党的生活中成为有效验的一课。

可是，应该说，列宁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动摇过，并且好几次有严重的错误。我比他有利的条件在于，我不间断地到各个战线旅行，同非常多的人接触，从当地的农民、战争俘虏、逃兵，一直到前线最高级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这种各种各样的大量印象是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列宁从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所有的线又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根据多半来自党的高级机构的情报，对军事问题作出决定，而军事问题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新问题。没有人比列宁更能了解来自下面的个别呼声。但是这种声音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他才听得到。

1919年8月间，当我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的前线时，列宁就一个优秀党员提出的关于把总参谋部的全部军官都换为党员的建议征求我的意见。我尖锐地给他否定的答复。我在1918年8月23日从斯维亚日斯克用直通电报回答说：“的确，军官中有很多是叛徒。但是，当军队在铁路上移动的时候也有证据说明有人破坏，但并没有人建议用共产党员来换掉铁路上的工程师。我认为，拉林的建议一文不值。我们现在正在创造条件，以便对军官进行无情

的甄别：一方面集中营；另一方面是在东部战线的战斗。像拉林那样的灾难性的措施只不过是惊慌情绪的产物……前线的胜利将使我们改进我们目前的甄选办法，并将给我们提供可靠的总参谋部人员。……那些最反对我们使用军官的人，不是惊慌失措的人，就是很不懂军事机器的工作的人，或者就是比破坏分子更坏的党的军事工作者。他们不知道如何达到目的，他们的行径像暴君一样，他们自己什么也不做，而他们一失败，就把责任推到总参谋部人员身上。”

列宁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在那时，既有胜利，也有失败。胜利，就加强对我的军事政策的信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增加背叛的人，在党内引起新的批评和反对的浪潮。1919年3月间，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关于某些红军指挥官叛变的消息的夜间会议上，列宁递给我一个条子：“我们是否应该撤掉所有专家并且任命拉谢维奇为总命令？”我了解，在那以前几天，反对军事部的政策的人，特别是斯大林，曾经向列宁施加特别大的压力，使他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在他的条子背后写下我的回答：“儿戏！”显然，我的生气的反驳给他深刻的印象。列宁欣赏明确的意见。第二天，我口袋里带着总参谋部的报告，走进克里姆林宫中的列宁办公室，问他：

“你知道我们军队有多少沙皇军队的军官？”

“不，我不知道。”他答道，感到兴趣。

“大约多少？”

“我不知道。”他坚决拒绝猜测。

“不在3万以下！”这个数目实在使他诧异。我继续说：“如果算上他们之中的叛徒和逃兵的百分比，你就会发现这个数目并不怎么大。在这期间，我们已经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正在不断成长壮大。”

几天以后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就他自己对军事政

策问题的疑问算了一下账：“当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告诉我……军官的数目多达几万人的时候，我就有了如何最好地利用我们的敌人，如何强迫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建设共产主义，如何利用资本家用以反对我们的砖头来建设共产主义的明确想法。……我们没有其他的砖头。”

书呆子气和死板公式同我们无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拼凑办法和试验以取得胜利。有的集体军的军长是旧军队的军士，参谋长是个将军。另一个集团军的军长是个旧将军，副军长是个游击队员。有一个师由一个旧军队的列兵统率，附近的一个师又由总参谋部的一个上校统率。这样的“兼收并蓄主义”是环境迫使我们采取的。但是，占很大百分比的受过教育的军官对整个指挥水平起了十分良好的影响。我们的指挥官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第一流的军官。在1918年，红军的指挥官和行政干部中，76%是前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只有12.8%是新生的红色指挥官，他们当然职位都较低。到内战结束时，指挥员中就包括有：未受过军事教育但有直接战斗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在内战期间从士兵中成长的；旧军队的军士和列兵；在短期的苏维埃军事学校受过训练的青年指挥员；最后是沙皇军队的骨干军官和战时军官。指挥员中有43%以上未受过军事教育，13%是旧军士，10%受过苏维埃军事学校的训练，34%是沙皇军队的军官。

一方面，在加入红军的旧军官中，有一些是认识到新时代的意义的进步分子（占极少数）；也有很多是懒惰无能力的人，他们参加红军只是因为无路可走；另一方面，活跃的反革命分子们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背叛我们。旧军队的军士是通过特别动员的办法招募来的，其中有若干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最出名的就是前骑兵上士谢明·布琼尼。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也并不很可靠，因为在革命前，军士多半是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这些人之

中也有不少是逃兵，在反革命暴乱和白军中是活跃分子。每个指挥员都配备有一个政治委员，他一般是工人布尔什维克，有参加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指望培养一批可靠的军官。

当我在1919年12月领导军事部的时候，我说过：“政治委员的制度是为了起脚手架的作用……我们可以逐步拆除这个脚手架。”那时，没有人预料在20年后政治委员的制度会再度复活，但是这一次是为了相反的目的。革命时代的政治委员是作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监督那些多半来自资产阶级的指挥员；后来的政治委员则是作为官僚阶层的代表，监督那些多半来自士兵的军官。

〔1918年4月22日，公布了一项关于村、州、省、边区军事人民委员会集中化命令。〕在7月，我向第五届苏维埃大会（这次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建立红军的计划）提出报告说，许多较低级的人民委员部还没有组织起来，原因是缺乏能胜任的军事人员。我们的目标是把各军事—行政机构加以集中化，以便进行动员和成立正规军部队。每一个军区都由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由三名委员组成：党和政府的代表各一名，以及一个军事专家。由于同时把相当大数量的军事专家派到前线去，派到州、省、边区和城市的军事人民委员会中去，我们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只好自己摸索。我们组织了一个军事证书委员会。但是它并没有必要的材料从是否忠于新政权的观点，对旧军队的将军和军官们进行适当的评价。我们不能忘记，做这个工作是在1918年春天，也就是取得政权后几个月。行政机器是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中建立起来的，得到的援助是些偶然的助手的临时援助，多半是偶然的建议。的确，在那种情况下别无其他办法，开展对军事专家的鉴定，对他们的最后选择等事宜是逐步进行的。

军官中，有很多人，也许还是大多数，并没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十分反动的分子已经在一开始时就跑掉了，最猖狂的分子跑到外

线去,当时外线正在建立白色战线。剩下的人犹豫不决,等待机会,不能抛下自己的家属,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由于惯性参加了红军的军事行政机构或者指挥系统。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进一步态度是由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决定的。英明的、精力充沛的、机灵的政治委员——这占少数……会立刻把军官争取过来,这些军官由于习惯势力看不起政治委员,但对于政治委员的坚决、大胆、政治见解明确感到惊异。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的这种结合常常保持很久,而且以高度稳定性见称。如果政治委员无知而粗暴,虐待军事专家,不慎地在红军士兵面前使他们受怀疑,那么友谊根本谈不到,这些犹疑不决的军官最后还在内心里倾向新政权的敌人。

察里津由于其行政系统的无政府状态,游击习气,不尊重中央,缺乏管理秩序,对军事专家的挑衅性粗暴态度,其气氛当然不宜于争取军事专家的好感和使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忠实仆人。自然,如果认为察里津可以无需军事专家,那就错了。每一个临时应付的指挥官都必需有一个懂得例行军事事务的军官。但是察里津所使用的那种专家是从军官的渣滓中招募来的——酒鬼或者是毫无人类尊严的人,毫无自豪感,愿意在新主人面前爬行,谄媚新主人,在任何问题上不表示反对的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这就是我在察里津所看到的那种专家。伏罗希洛夫的参谋长就正是这种类型的专家。这个不重要的军官的名字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提到过,我对他的命运毫无所知。他是一个顺从听话的沙皇军队的前上尉,爱酒如命。第十集团军军长完全同意他的参谋长的做法,从来不感到难为情。

为了培养最接近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官,特别去动员前沙皇军队的军士。他们之中多数人是在战争后期提升为军士的,因此他们的军事知识并不十分重要。然而,旧的军士,特别是炮兵和骑兵军士,对军事问题有十分好的理解,真正远比指挥他们的军官

更有经验。这一批人中包括布琼尼、布鲁彻尔、德宾科^①和其他一些人。在沙皇时代，这些人是从文化水平较高、较有教养、较习惯于指挥的人中招募来的。因此，这些军士几乎全是富农、小士绅、城市资产阶级、小官员、教师、会计等人的子弟，就不会使人惊异了。这一类军士高兴地接受了指挥职务，但是并不愿服从和容忍军官的更高的权威。

他们也同样不愿承认共产党的权威，不愿完全服从它的纪律并同情它的目标，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他们疯狂地反对定价收购谷物，更不要说向农民征用谷物了。这一类人中包括骑兵指挥官杜缅科^②，察里津地区的军指挥官，布琼尼的顶头上司（布琼尼当时是一个师长）。杜缅科的天分比布琼尼高。但是他最终发动叛乱，杀害了他军中所有的共产党员，企图去参加邓尼金的部队。他被抓住处决了。布琼尼和接近他的指挥官们同样也经历过一段动摇时期。驻在察里津的属于布琼尼的一个旅的旅长反叛了，骑兵部队的许多人参加了绿林军^③。前沙皇军队军官诺索维奇的叛变，

① 德宾科是海军下级军官。——原编者注

② 斯大林主义历史家叶·耿基娜在她的著作《1981年的察里津之战》一书（政治书籍出版社1940年版）中第109页就杜缅科写道：“杜缅科本人原来是一个富农，拥有一座风磨、两匹马等等。但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的牛马被没收，白军还征用了一些东西。这就把杜缅科暂时推入红色阵营。他开始组织一支骑兵团，但是不在他的故乡顿河边区切尔斯州，而在别人不知道他是富农的萨尔州。”——原编者注

③ 内战虽然主要是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战争，其他较小的集团也卷入其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绿林军。它是农民游击队，从绿色森林中（其名字的由来）向红军或白军出击，更多的是攻击白军。绿林军自命是农民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红军和白军都反对。绿林军运动在黑海盆地、库班边区和克里木最活跃。在1919—1920年冬季，作为红军的同盟军，绿林军在粉碎邓尼金将军的军队的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绿林军运动大概是在1921年结束的，当时实行限制贸易自由，农民的反叛普遍都被苏维埃政府消灭了。——原编者注

由于他占据的是纯粹的行政职位，比杜缅科的叛变的危害性当然要小一些。但是军队中的反对派（斯大林派的温床）在前线是倚靠杜缅科型的分子的，因此这次兵变现在根本都不提了^①。

不熟悉事件实际发展情况的读者和现在看不到档案材料的读者，很难想像事件被歪曲到什么程度。全世界现在都听到过保卫察里津，斯大林到彼尔姆前线巡视，以及所谓“工会讨论会”等。这些插曲今天都成了历史事件山脉中的高峰。然而，这些所谓高峰都是人为地制造的。从档案的大量材料中，某些特殊的插曲被挑出来，并在其周围渲染了历史的戏剧效果。后来，御用历史家的作品在旧的夸张的基础上又加了新的夸张；在这些夸张上面，又不时加上了纯粹的虚构。总的结果就成为舞台艺术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根本没有一桩是符合文件的。外国的报刊，甚至有学识的历史家，也把这些谎言当做第一手材料。在有些国家，可以找到这样的历史专家，他们知道关于察里津或“工会讨论会”的第三流细节，可是实际上对那些重要和有意义得多的事件却一无所知。在这种问题上进行伪造具有灾难的性质。〔然而，〕真是令人奇怪，关于斯大林在前线的活动以及内战时期他的总的活动的文件和真实材料又发表得多么少。

在内战年代表的记述材料中，关于察里津的故事是同斯大林名字毫无联系的许多事件之一。他在幕后起的作用，最多也只能说是十分短的时期，只有很少数的人知道，绝对无必要多谈到他。奥尔忠尼启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他甚至曾用自杀来证明对斯大林的忠实，但他的纪念第十集团军的一篇文章中也没有提到斯大

^① 这个问题甚至在前述的共有 217 页的关于察里津插曲的历史书中关于杜缅科的部分都谨慎地避而不提。——原编者注

林。布尔什维克党人米宁，当时是察里津市长，后来成为第十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在1925年写过一部名为《围城》的英雄主义的戏剧，其中在察里津事件上提到斯大林那么少，以至米宁最后成了“人民的敌人”。要使历史离开事实很远，斯大林才能上升到察里津史诗中一个英雄的地位。

好多年以来，总把事情说成似乎是：在1918年春天，察里津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而斯大林被派到那里去扭转军事局势。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完全是一个给养问题。1918年5月28日，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同当时负责供应工作的瞿鲁巴讨论了那时候普遍采用的向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和工业中心提供给养的紧急办法。会议结束时，列宁在给瞿鲁巴的信中写道：“今天立即用电话与托洛茨基联系，以使他明天能使一切工作开始。”在同一封信中，列宁通知瞿鲁巴说，人民委员会决定让供应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立即动身去库班，为了工业地区的利益去协调南方的给养供应工作。瞿鲁巴在答复中说：“斯大林同意去北高加索。派他去吧。他熟悉当地情况，施略普尼柯夫有他在一起会有用处的。”列宁表示同意：“派他们两人今天去。”在那以后几天中，关于斯大林和施略普尼柯夫又作出了若干决定。最后，有如列宁的《杂文》中所记录的：“斯大林作为俄罗斯南部给养工作的总负责人，被派往北高加索和察里津。”并没有提到任何军事任务。

斯大林所遇到的情况同许多其他苏维埃官员所遇到的一样。同大批官员一样，他们是被派往各省去动员征收剩余谷物的。一到那边，他们就碰到白卫分子的反叛。于是他们的给养收集队就变为军事部队。教育、农业等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就这样被卷入边远地区的内战风暴，并且从一种意义来说，他们都被迫改行成为军人。列·加米涅夫是中央委员会中除季诺维也夫以外

最不军人化的委员，他在1919年4月被派往乌克兰催促向莫斯科输送供应品的工作。他发现洛干斯克已被包围，整个顿河盆地面临着危险。而且在最近刚取得胜利的乌克兰，情况越来越不利。就像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情况一样，加米涅夫在乌克兰被卷入军事行动。列宁打电报给加米涅夫说：“绝对有必要由你亲自……不但检查和催办各种事情，而且你自己应当率领援兵到洛干斯克和整个顿河盆地，因为否则灾难必将极大和极难挽救。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肃清顿河盆地，我们必将毁灭……”这就是列宁当时的习惯作风。这些话可以证明，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加米涅夫在南部的军事领导。有许多次，这个非常不军人化的加米涅夫^①在若干战线都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

在一切口头和印刷宣传手段被集权主义集中的情况下，是可能像对一个人一样对一个城市制造假名誉的。现在，内战中许多英雄主义事迹已被遗忘。斯大林没有起过作用的城市很少被人记起，而察里津这个名字却被赋予神秘的意义。必须记住这一点：由

① 这是指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的姻兄弟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曾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在列宁领导下任副主席（从1922年起），被列宁亲自指定为列宁著作的代表人和《列宁选集》的编纂者，列宁研究院的创立者和首任院长，继列宁之后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等等。1919年，他在前线担任国防委员会的特命代表。这个加米涅夫在1936年作为自己供认的叛国者而被斯大林下令枪杀。不应把他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混淆起来，后者是沙皇时代一个军事家族的后裔，1917年革命时，他是一个上校，指挥第三十波尔塔瓦团；在托洛茨基担任军事部人民委员期间，他是被吸收入红军的沙皇军队军官之一。托洛茨基在1918年9月任命他为东部战线的指挥官，1919年7月任命他为苏维埃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以接替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齐斯。谢·谢·加米涅夫一直任总司令至1924年4月这个职位取消时为止。他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由于自然的原因逝世。——原编者注

于我们所处的中央位置以及敌人的兵力部署成一大圆圈，我们就有可能沿着内线作用，把我们的战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即根据其相对重要性来相继肃清各战场。在那灵活性极强的运动战中，国内不同地区都在某些重要时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来又失去这种重要性。可是，察里津的斗争绝没有达到有如下述一些斗争一样的重要性：喀山的斗争，从那里可打开进入莫斯科的道路；奥里奥尔的斗争，从那里经过土拉有捷径直达莫斯科；彼得格勒的斗争，失去它对它本身就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而且就可以从北面打开莫斯科的门户。还有，尽管近来的历史家断言察里津“是军事学院的孕育地，这个学院培养了其他许多战场的指挥干部，这些指挥官今天都成为军队的基层部队的领导人”，但是事实是，最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军事领袖并不是从察里津来的。我并不是单单指一些中心人物，如斯克利扬斯基，他真正是红军中的加诺^①；如伏龙芝，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事领袖，后来任指挥红军之职；如图哈切夫斯基，他后来成为军队的改编者；如叶戈罗夫，后来担任参谋长；如雅基尔、乌波列维奇或科克等，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其他军队和其他战线上受到考验和训练的。他们对察里津，对它的无知而自满的态度，它的经常勒索，都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的嘴里，“察里津分子”这个词就有贬责的意思。

1918年5月23日，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泽）打电报给列宁说：

“这里情况恶劣。我们需要坚决的措施……地方的同志太散漫。进行帮助的愿望都被认为是干涉当地事务。六火车的谷物已

^① 指法国著名将领、军事战略家拉扎尔·尼哥拉·马格里特·加诺（1753—1823）。——译者注

准备好送往莫斯科，放在车站，但还没有送走……我再重复一句，我们需要的是最坚决的措施……”

斯大林在1918年6月到达察里津，带有一队赤卫队，两列装甲火车，而且还被授予全权，以便取得谷物输送给饥饿着的政治和工业中心。他到达后不久，几个哥萨克团就包围了察里津。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村庄已经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在库班草原上到处窜扰的〔白卫分子的〕“志愿军”已经壮大起来。北高加索（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惟一粮仓）的苏维埃军队在它们打击下损失很大。

斯大林原不应该留驻在察里津。他应该〔去组织输送粮食给莫斯科并且〕前往北高加索。但是他在到达察里津后一星期内，即在6月13日，就打电报给列宁说，察里津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因为有一队哥萨克人向离察里津约40俄里的一个地点发动突袭。”从斯大林6月13日的电报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原要他去诺沃罗西斯克，掌握与炸沉黑海舰队有关的关键性发展情况。至少在那以后两星期，仍然是规定他要去诺沃罗西斯克。1918年6月28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说：

* “同志们！现在我来……回答关于黑海舰队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将亲自来这里告诉你们，当时他是怎样为我们宁可凿沉舰队、也不让德国军队搭乘舰队船只去进攻诺沃罗西斯克而进行鼓动的……黑海舰队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人民委员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很快就要来莫斯科，他们

将会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①

〔可是，他不去北高加索，或者由于军事情况变化而改变计划，也不去诺沃罗西斯克，〕斯大林继续留在察里津，一直到这个城市在7月被白卫分子包围为止。

斯大林原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数以百万蒲式尔计的小麦运往莫斯科和其他中心而获得很大荣誉。然而，尽管他使用了残暴手段，他所能运出的也就是三只驳船的东西，有如他6月26日电报中所提到的。如果他曾经运出更多东西，那么一定会把其他有关电报发表，并且早就有人加以评论了。相反，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无意中承认了他在输送谷物方面的失败，最后一次承认是他在8月4日说：不能再期望从察里津得到给养。斯大林在不能兑现其向中央供应粮食的吹牛诺言之后，就从“粮食战线”转到“军事战线”。他成为察里津和北高加索战线的独裁者。他作为党和政府授权的代表，取得了十分广泛的权力，实际上是无限制的权力。他有权在当地实行动员，征用财产，把工厂军事化，进行逮捕和审判，任免人员。斯大林采用高压手段来行使他的权力。一切努力都集中在防御任务上面。所有当地党和工人的组织都抓在他手里，并且还补充了新的力量。违法乱纪的游击队被控制利用了。全城的生活突然之间处于残酷无情的独裁的铁钳子之中。“大街上和十字路口都有红军巡逻队，”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写道，“在伏尔加河中间，停泊着一艘大驳船，它的黑色大肚皮耸立在水上，一个戴着褪色军帽的有气无力的官员斜视着那只船，并且不安地向岸上一些矮小的老妇人低声说：‘那……就是契卡！’但是那并不是契卡本身。那只不过是它的流动监狱。契卡是在市中心

^①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第433页。——译者注

工作，设在军队总部旁边。它开足马力……在工作。它没有哪一天不是在最可靠和最受人尊敬的地点破获了各种阴谋。”

〔在7月7日，斯大林到达察里津后约一个月，写信给列宁说（信上注有“匆匆赶往前线——只谈正事”字样）：〕

* “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①

* 〔7月11日，斯大林又打电报给列宁说：〕

“问题由于这个事实而复杂化了：北高加索军区的参谋人员证明是完全不能适应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条件。这不但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心理上不能对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因为这些参谋人员只懂如何画蓝图，如何提出改造的计划，他们对于战斗行动完全不关心……一般说来他们觉得自己是外人……我认为在卡列金的战线被切断同给养点的联系、北方被切断同谷物地区的联系的时候，我没有权利对此漠不关心。我只要发现，将继续纠正这些和其他许多缺点；我正在采取若干措施，并将继续这样做，尽管我不得不把所有敌对的军官和指挥官免职，尽管有程序形式上的困难，必要时我将打破它。我要表明，我向所有最高机构担负一切责任。”

〔8月4日，斯大林从察里津写信“给列宁、托洛茨基和瞿鲁巴”：〕

* “南方情况严重。军事委员会承受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

^① 《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06页。——译者注

子。混乱的造成，部分是由于前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懈怠，部分是由于军事领导人拉进军区各部门来的人阴谋破坏。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撤销了旧的、可以说是罪恶的命令，在这以后才……举行了进攻……”^①

那时，从全国各地收到了类似的函电，因为到处都混乱。令人惊奇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的字眼。军区是在4月建立的，还没有开始工作，因此说成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还嫌过早。

由于军事情况，任何大规模提供给养的任务证明是无法解决的。斯大林在8月4日写道：“同南方，同南方产粮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而联系中部和北高加索的察里津地域本身也同中央隔绝，或几乎隔绝了。”^②斯大林解释军事情况极端恶化的原因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农民力量的变化，“他们在10月曾为苏维埃政权斗争，而现在却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从心底里仇恨粮食垄断、固定价格、征集和反投机斗争）”^③；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军队的不良情况……他最后说：“总之，应当说，在同北高加索的交通恢复以前，对察里津区（在粮食方面）不能……指望。”^④

斯大林担任前线所有军事部队的供应给养负责人的职务，是受到莫斯科的认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曾经明确的派遣斯大林去那里，“在驱逐所有叛逆分子之后，建立秩序，把所有部队统一为正规部队，建立适当的指挥部”。这个电报上还说明是列宁同意发出的。因此，可从电文判断，给予斯大林的这些权利，连我也是参加作出决定的。我们当时的共同的任务是使各省服从中央，建立纪律，使所有各种志愿军和游击队的部队都归属

①②③④ 《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1、113页。……译者注

军队和战线领导。不幸，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活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当时我还不知道斯大林已要下定决心（被我的一封电报“忽视了”），因为他从不敢把这件事报告中央。我的印象是，斯大林没有以足够坚决的态度为反对地方自治、地方游击队以及地方人民的一般的不服从现象作斗争。我指责他对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的错误政策过分宽待，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就是那种政策的实际唆使者。这从事后不久他自己的电报以及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所承认的话中看得很清楚。

斯大林在察里津停留了几个月。他秘密进行反对我的工作，甚至当时这已经是他的主要活动了。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他的最密切的合作者伏罗希洛夫的公开反对。不过，斯大林的做法是准备好可以随时后退，不被牵连。列宁比我更了解斯大林，他显然已怀疑，察里津分子的顽固态度可以用斯大林的幕后活动来解释。我决定就在察里津本身解决问题。在同那里的指挥部发生一次新的冲突之后，我决定调回斯大林。这件事由斯维尔德洛夫进行调解而完成了，他亲自坐着专派的火车去把斯大林带回来。列宁希望把冲突缩小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他当然是正确的。

那时候，红军已经能在东部战线打一些大胜仗，差不多完全肃清了伏尔加河流域，但是南方的情况仍然很坏，那里一切还是一片混乱，原因是命令没有执行。10月5日，我在科兹洛夫发布一项命令，规定南部战线的所有集团军和兵团统一由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为旧将军〔西金和三个布尔什维克——施略普尼柯夫、美哈诺申和拉齐米尔〕。命令说：“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应予以无条件立即执行。”这个命令威胁要对不服从命令者严惩不贷。然后我打电报给列宁说：

“我绝对坚持把斯大林调回。察里津战线尽管部队绰绰有余，情况还是不好。伏罗希洛夫有能力指挥一个团，但没有能力指挥

5 万人的一个集团军。不过，如果他向南部军队指挥官西金提出报告，我将让他在察里津继续指挥第十集团军。迄今为止，察里津方面还没有向科兹洛夫方面送去战斗报告。我曾要求每日要报告侦察和作战情况两次。假如到明天这一点还没有做到，我就要把伏罗希洛夫和米宁押起来交给军事法庭，并在军令中公布这个事实。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法令，斯大林和米宁在察里津期间，就只不过是第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发动攻势，我们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很快就有秋季的泥泞，那里的道路步兵和骑兵都通不过。如没有察里津配合，就不可能采取任何严重的行动。不能在外交谈判上浪费时间了。察里津必须服从，不然就得面对后果。我们拥有巨大优势的军队，但是上层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如果能得到的坚决明确的支持，我能在 24 小时内了结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我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走。”

〔第二天，我又向列宁发去如下的直通电报：〕

* “我收到了下述电报：‘斯大林的第一一八号军事命令必须撤销。我已向南部战线司令西金发布充分的指示。斯大林的活动破坏我的一切计划……总司令瓦采齐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达尼舍夫斯基’。”

〔斯大林在 10 月下半月从察里津被调回。以下就是〕他在《真理报》（1918 年 10 月 30 日）上所写的〔关于南部战线〕一文：

* “敌人攻击最猛的地点是察里津。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敌人拿下察里津，切断同南方的交通，就能保证达到他们的一切目的：可以使顿河反革命分子同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军队的哥萨克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建立起一条从顿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革命统一战线，可以使南方和里海一带都归国内外反革命分子所有；

可以使北高加索的苏维埃军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①

〔这是斯大林在“供认”由于他的阴谋活动和不服从命令致使局势恶化而有罪吗？并不是，斯维尔德洛夫在从察里津回莫斯科途中，〕谨慎地探问我的意图，并建议我同斯大林谈一次话。后来发现斯大林就在他所乘的火车里。

“您真的想把他们全部都免职吗？”斯大林用格外服从的口气问我。“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

“这些很好的孩子会毁掉革命的，革命不能等待他们长大懂事，”我回答他，“我所要的就是把察里津拉回到苏维埃俄罗斯。”

从那以后，每当我触动了他个人偏爱、友谊和虚荣心的痛处时，斯大林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所有那些被触碰了痛处的人都拉拢在一起。他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件事，因为这能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从那时起，察里津的首脑人物们就成为他的主要工具。列宁一病倒，斯大林就通过他的亲信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察里津反对分子都是些奇特的家伙。最讨厌军事专家的是伏罗希洛夫——近来历史家称之为“洛干斯克的锁匠”——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无耻的家伙，智力不十分高，但精明而不择手段。他根本不懂什么军事理论，但善于威吓，不惜利用天分比他高的下属的主意而无耻地说是自己的主意。他对军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认识在1921年充分表现出来。〕他无批判地附和某个无名的极左派分子，争论说，进攻性和攻势战术是“红军的阶级性”的产物，同时还引用1921年法国军事条例中的语句来作为有必要采取攻势的“证据”。

他的“忠实助手”是夏殿科〔第十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原来

^① 《关于俄国南部》。《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34页。——译者注

裁缝，后来的历史家们用这样的话使他不朽]：“他皱着鹰一般的眉头，战斗的眼睛斜视着，在前线到处奔跑，心里燃烧着要作为克利姆^①的忠实助手的热情。”

同样热心但与上述两人都不一样的，是谢尔盖·米宁。〔他是诗人和煽动家的奇怪混合体，全心全意为了事业，对所有沙皇军队的军官怀着盲目的畏惧。〕自从他作为青年学生参加1905年革命起，在察里津工人中很受欢迎，察里津以他为它的最主要、最热情的演说家而自豪。他是这一批人中最诚实的一个，但或许也是最难理喻的。由于他坚持不妥协的态度，他在使察里津军事局势恶化方面热心地出了大力。〔他是斯大林的察里津阴谋计划中的无辜的工具，但也就成为更有效的工具，一到没有用处时就被抛在一边。〕

另外还有工程师鲁希莫维奇，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军事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这个共和国是革命初期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共和国之一。鲁希莫维奇给予伏罗希洛夫组织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第一个命令。在负责供应工作岗位上，这个只有省的概念的〕鲁希莫维奇除想到第十集团军的需要之外，就想不到其他的需要。其他任何军队都没有它吞下那么多步枪和子弹，但在第一次被拒绝时就大叫大嚷莫斯科的专家们是卖国贼。〔他像军事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瓦列里·〕梅日拉乌克〔一样〕，后来上升到斯大林特权集团中的二等地位，又〔由于不明的原因而〕消失了。另外，还有兹洛巴、哈尔阡科、戈罗多维克、萨维茨基、帕尔霍缅柯和其他人，他们对红军和苏维埃国家的贡献都不比千千万万其他人更大，但只是由于他们早期在察里津同斯大林的关系而不至于完全默默无闻。

① 克利姆为伏罗希洛夫的名“克利门特”的昵称。——译者注

〔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后来写道：〕“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以傲慢和令人愤怒的态度发言。他对材料的巨大浪费大肆恶骂。……托洛茨基对解释不感兴趣……”我在11月1日从察里津打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

“第十集团军情况如下：这里部队很多，但没有有效的领导人。南部战线的参谋人员和瓦采齐斯倾向于赞成更换指挥官。我认为如给予伏罗希洛夫一批有经验的作战参谋人员才有可能保留他。他拒绝这种办法，我对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没有怀疑……惟一的严重障碍是米宁，他继续执行极端有害的政策。我全力坚持把他调职。勋章何时可以准备好？”

在视察察里津军队的所有单位之后，我在1918年11月5日的一项特别命令中，表扬了许多单位及其指挥官，同时也指出，这个军队中有些单位自称一个师，实际并没有那样的内容；“某些单位的政治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军事后备力量的配备并不经常从军事上的审慎态度出发”；“在某些情况下，指挥官不愿执行一项行动命令，而把它提交一个会议考虑……”以及类似情况。我的命令说：“作为公民，士兵们在空闲时间可以自由开会谈任何问题。作为士兵，他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执行军事命令。”

在访问了包括察里津在内的南部战线之后，我在1918年11月9日向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说：“并不是所有的苏维埃工作者都已经了解，我们的行政权已经集中，来自上级的所有命令是最后的决定……我们对这些还没有了解这种情况的苏维埃工作者将采取无情的态度；我们要把他们撤职，清除出我们的队伍，用镇压的手段把他们拉出来。”这些话当时表面上是针对伏罗希洛夫的，但更大程度上目标是斯大林。斯大林当时也在代表大会上，他保持沉默。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也保持沉默。他不能公开为其行为辩护。这就使他更加怒气填膺。就是在这时期——从察里津调回

来，怒气冲冲，满心想报复——他写了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击我的威信，反对我也就是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在那篇文章中，尽管斯大林充满着压在心头的怒气，他还是不得不写道：

“起义的所有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要塞能迅速地落入苏维埃一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能大胆推行，党主要并且首先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它已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一军营）根据军事人民委员部关于组织国防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召集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成员为列宁、我、克拉辛、交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取得列宁的同意后，我建议也把斯大林包括在内。列宁想使斯大林在被从察里津军队调回的问题上得到一些补偿，我则想给斯大林一个机会公开发表其批评和建议，而不致使军事部陷于毫无准备的情况。第一次会议是在12月1日白天举行的，一般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从列宁的笔记看来，在那次会议上，斯大林发言六次，克拉辛九次，斯科利扬斯基九次，列宁八次。每个发言的人只准发言两分钟。国防委员会工作的领导权，不但在重大问题上，而且在细节问题上，都完全集中在列宁的手里。分配给斯大林的任务是写一个关于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的提纲和一个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提纲。没有证据说明，两个提纲中的任务一个已经写出来。还有，为了推进工作，作出决定说，“由国防委员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各项命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适当部门的代表签署后，就具有国防委员会命令的效力”。但对斯大林而言，这整个决定就只不过是又一个头衔，而没有实际工作。

〔尽管作了这些让步，斯大林还是继续秘密地支持察里津的反对派，破坏军事部在那个地区贯彻命令和纪律的努力。在察里津，他的主要工具是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斯大林自己尽可能对列宁施加一切压力。因此我就有必要在12月14日从库尔斯克发出下述电报：〕

*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把奥库洛夫调职的问题不能根据这个问题本身来决定。对奥库洛夫的任务是为了同伏罗希洛夫抗衡，为了保证军事命令得以执行。在伏罗希洛夫破坏了一切关于妥协的努力之后，不可能再让他留任。察里津必须有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官，伏罗希洛夫必须去乌克兰。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随后伏罗希洛夫被调往乌克兰。第十集团军的战斗力迅速地不断加强。施略普尼柯夫不仅担任新指挥官，而且还接任军事委员会中斯大林的职位，事实证明他的效率高得多，察里津的军事局势很快就好转了。〕

在伏罗希洛夫被调职后几天，也就是在他自己被从察里津调职、被迫放弃极具吸引力的干涉军事事务这一事情发生后几个月，斯大林又得到机会去前线工作——这一次是几个星期。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托洛茨基背上插上一刀。这个事件是从列宁和托洛茨基互致以下电报开始的：〕

(一)

* “密电致托洛茨基同志，发往库尔斯克或这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

莫斯科，1918年12月13日。

从彼尔姆附近传来十分惊人的消息。它处于危险之中。我怕我们已经把乌拉尔忘却了。是不是已经用足够的力量把援军派到彼尔姆和乌拉尔去了？拉谢维奇对季诺维也夫说，只有打过仗的部队才应该派去。

列 宁”

(二)

* “致托洛茨基，发往柯兹洛夫或这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

莫斯科，1918年12月31日。

有几份从彼尔姆附近送来的党内报告提到了军队的极其严重的情况和酗酒的情形。现将这些报告寄给你。报告要求你到那一带去。我本想派斯大林去。我怕斯米尔加会对拉谢维奇过于软弱，而据说拉谢维奇本人就喝酒，无法恢复秩序。把你的意见用电报告告诉我。

第六六八四七号。

列 宁”

(三)

* “用直通电报以密码发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复第六六八四七号电。

沃龙涅什，1919年1月1日19时〔午后7时〕。

从第三集团军的作战报告看来，我的结论是集团军的领导机构已经完全不知所措，我曾经建议撤换指挥人员。这个决定被推

迟了。现在我认为撤换是不能再予推迟的了。

你对派到那里去的那位同志的过分软弱所表示的疑虑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同意把斯大林派去，并赋予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双重权力，以恢复秩序，清洗政治委员队伍，并严厉惩处犯了错误的人。新的司令员将在取得谢尔普霍夫的同意之后予以任命。我建议任命拉谢维奇为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那里我们还没有一个负责的党员干部，而这条战线可能很快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第九号。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这件事于是被提交中央委员会，它决定：〕

“委派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组成党的调查委员会，对彼尔姆的失陷以及乌拉尔战线最近的失利的原因进行调查，并就与上述事件有关的情况作出详细的说明。”

〔这时第三集团军已经把彼尔姆放弃给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节节进击的部队，退守维亚得卡，形势岌岌可危。正当第三集团军据守维亚得卡抗击敌军进攻的时候，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到了那里。1919年1月5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抵达那里的当天，就打了一个电报给列宁：〕^①

* “调查已经开始。调查进行情况将随时报告。现在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第三集团军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急需。这就是第三集团军（原有3万多人）只剩下1.1万名左右筋疲力尽的残兵，勉

① 下面这三段摘录是在托洛茨基为本书所作之附注中发现的，它们摘自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著作，托洛茨基在别处也引用过他的著作。它们谈到这件事的始末，但其准确性如何须另当别论。托洛茨基很可能对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归于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某些字句颇表怀疑。——原编者注

强抵挡着敌人的攻击。总司令派来的部队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敌视我们的，须严加审查。为挽救第三集团军残部和防止敌人迅速推进到维亚得卡（根据战线指挥人员和第三集团军指挥人员的一切情报，这种危险是完全实际的），绝对必须火速从俄罗斯至少调来三个完全可靠的团交由集团军司令员指挥。我们坚请向有关军事机关催办此事。再说一篇：不采取这种措施，维亚得卡将蹈彼尔姆的覆辙。”^①

〔1月15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向国防委员报告说：〕

* “1.2万名配有刺刀和腰刀的可靠的战士已经开抵前线；次日又到了两个中队的骑兵。10号又派来了第三旅第六十二团（前此已经予以彻底审查过）。这些部队使我们有可能制止敌军的前进，提高第三集团军的士气并使我军向彼尔姆方向进击，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进行得很顺利。第三集团后方的苏维埃和党的机构正在进行彻底的清洗。在维亚得卡和各县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中已经开始建立并且还在继续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全部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正在按着新的路线加以改变。军事管制已经予以整顿和改组。州的肃反委员会已经清洗过并且配备了新的干部……”

〔经过调查之后，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导致灾难的原因是：〕

* “在敌军开始前进的时候，我军已经疲困不堪；当时我军缺乏预备队；参谋部同第三集团军缺乏联系；司令员指挥不当；由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前线的不可容忍地罪恶的处理方法，使及时支援第三集团军的可能性化为乌有；由于旧式的招募

^① 参看《自东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66页。——译者注

兵员的方法，从后方派去的增援部队不可靠；由于地方苏维埃和党组织太不中用，后方极其不稳定。”

〔在这个报告中，几乎每一句话对托洛茨基都是一个打击。如果列宁、国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认真地看待这些对托洛茨基的指控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把他解除职务。然而，列宁很了解斯大林，他知道这件由斯大林及其同僚从维亚得卡打来的报告与其说是汇报情况不如说是互相攻讦——为了报复把他从察里津调回来，报复托洛茨基拒绝给他另一次在南方战线上一试身手的机会，而在那里他可以同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察里津保卫者汇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在乌克兰利用他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军长的职衔，继续与军事专家为敌，扰乱参谋部的工作并且干涉总司令部发出的指示。在斯大林等人的支持下，他很快就使得自己在南方战线上变得如此不可容忍，以至不得不在1919年1月10日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 “莫斯科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我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曾经造成察里津前线我军完全崩溃的察里津政策在乌克兰是不能容许的……奥库洛夫即将启程赴莫斯科。我建议你 and 列宁同志对他关于伏罗希洛夫的工作所作的报告给以最大的重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的路线意味着破坏我们的一切工作。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正当斯大林在捷尔任斯基帮助下在维亚得卡纵容不法行为的时候，〕列宁却坚持我应该同斯大林求得妥协：

* “斯大林非常希望到南方战线去工作……斯大林希望他在这个岗位上能够使我们确信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把所有这些

斯大林的意见通知你的时候，我请求你，列夫·达威多维奇，给予它们最深思熟虑的关注。并且回答我：首先，你是否同意让斯大林亲自向你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是愿意向你汇报的；其次，你是否认为有可能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排解以往的冲突并且设法一道共事，这一点是斯大林十分盼望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努力谋求同斯大林合作共事。”

列宁的信显然是在斯大林的坚持的影响下写的。斯大林为了取得同意、和解和继续在军事方面工作，甚至不惜表示暂时的、不诚恳的投降。前线吸引着他，因为在那里他第一次能够运用所有管理机器中最完善的一种，即军事机器，来进行工作。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又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一个军事委员会、任何一个集团军、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主要角色。别人犹豫的时候，他作出决定。他能够发出命令，而每一项命令实际上都自然而然地得到执行——不像在民族人民委员部的联席会议上那样他不得不躲在司令官的厨房里。

我在1月11日通过直通电报答复了列宁：

“妥协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该作一种糟糕的妥协。事情的真像是，所有察里津的保卫者现在都已经聚集在哈尔科夫。从奥库洛夫的充满着实事求是的材料的报告以及政治委员们的报告中，你可以体会到察里津保卫者究竟是些什么人。我认为斯大林对这种察里津倾向的赞助的态度是最危险的恶症，比任何军事专家的变节背叛都要恶劣。鲁希莫维奇只不过是伏罗希洛夫的又一个别名而已。不出一个月，我们会再一次被察里津式的混乱压得喘不出气来，不过这一次不是遭到哥萨克而是遭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打击而已。鲁希莫维奇还不是惟一的。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把无知提高成为一种原则。伏罗希洛夫加上乌克兰的游击队加上老百姓的低下的文化水平加上恶意宣传——这种现象是我们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让他们把阿尔乔姆派去吧，但是不要派伏罗希洛夫或鲁希莫维奇……我再一次敦促仔细阅读奥库洛夫关于察里津我军的情况以及关于伏罗希洛夫如何在斯大林的配合下瓦解了这支军队的报告。”

与斯大林初期在南方战线上的工作有关材料没有公布过，原因是这个时期并不很长而且对他说来结局是相当悲惨的。可惜我不能依靠任何材料来补充我对于这件事的记忆，因为在我个人保存的档案中这件事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官方的档案当然保存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在叶戈罗夫指挥的南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中有斯大林和别尔津，这个人后来完全致力于军事工作并且在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上起过显著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有一次在夜间——很遗憾，我说不出确切的日期——别尔津打直通电话问我，他是不是“非签署一项由战线司令员叶戈罗夫发出的作战命令不可”。根据条例看来，政治委员或者军事委员会的政治方面的成员在作战命令上签字只不过意味着这项命令没有任何隐藏的反革命的含意而已。至于命令的军事内容，那完全由司令员负责。在这一个具体的事件中，战线司令员只不过是把总司令的一项作战命令转一下手，把这份发给他指挥下的某集团军的命令转达给那个集团军并加以阐释而已。斯大林声称，叶戈罗夫的命令不能成立并且说他拒绝在上面签字。鉴于一个中央委员都拒绝签署这项命令，别尔津也就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然而，只经指挥人员签署的作战命令实际上是无效的。

斯大林提出了什么样的理由来反对这个命令呢？据我记忆所及，这是一项次要的命令，其性质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什么理由也没有。他就是不愿意签字。他完全可以打直通电话向我解释他的理由，或者如果他愿意的话，打直通电话给列宁。根据同样的条例，战线司令员如果同斯大林的意见不一致的话，可以向总

司令或者向我表明他自己的考虑。这样，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就会立即在政治局加以讨论，就会请总司令来提出补充说明，但是正如同在察里津一样，斯大林宁肯采取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我不愿意签字”。他宣布说，目的是向他的同僚和属下显示他的重要性。我回答别尔津说：“经过政治委员签署的总命令对你是具有约束力的。马上在上面签字，不然就把你提交军事法庭。”别尔津立即在战线司令员的命令上签了字。

问题被提交政治局。列宁不无尴尬地说道：“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又当场出丑！”作出了把斯大林从南方战线召回来的决定。这是斯大林第二次严重失职。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有什么怨恨的情绪。相反地，他甚至说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说，他早已想提起大家注意总司令部与战线司令部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他说，虽然总司令的命令并没有包含什么有害的东西，但是事先并没有征求南方战线的意见，而这是不对的。据他说，他真正抗议的就是这一点。他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我的印象是，他的野心超过了他的能力。他已经陷于自己一时兴起说的大话而不能自拔。总之，十分明显的是他正在尽一切可能掩饰自己的劣迹并且使别人相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为了保全他的面子，有人建议，或许是根据列宁的指使提出的，把他调到西南战线上去。但是斯大林答复道：〕

* “1919年2月4日。

党中央委员会

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

……我自己深信不疑的是：即使我去也不可能改变那里的局面……

斯大林”

〔在这件事以后的三四个月内，他收起了想到军事机构去工作

的热望，同时又重新为《民族生活报》撰写文章了。

〔察里津保卫者虽然表面上被清除掉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事实上斯大林及其盟友只不过改换了他们进攻的战场和方法而已。这个新的战场就是党，而他们的方法也相应地作了调整。〕正如同在1912至1913年间对付调和派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前对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一样。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表面上与军事上的反对派毫无关系，却努力地把它扶植起来并且利用它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杠杆〕。

军事反对派由两个集团组成。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被监禁与流放弄得衰弱不堪，无法在建设军队和国家的工作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岗位。他们用非常冷淡的眼光看待各种各样的暴发户——而这类人有不少高踞着负责的地位。但是在这部分反对派中也有许多先进工作者，重新充满着精力的战斗分子，他们眼见旧日的工程师、教师、教授，再度掌握着领导地位，归根到底，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并且不敢确信已经掌握权力的新的阶级能够主宰并控制广大的旧知识分子阶层。在革命从工业中心向外围扩展的初期，由工人、水手和过去的士兵组成了武装的战斗队，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战斗队经常要打一些小仗。由于他们得到群众的同情，他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受到一定锻炼，他们的领导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权柄。在这些战斗队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关系。他们的战术具有游击战的性质，而对他们说来这也就足够了。但是被推翻了的阶级，在他们的外国保护人的援助下，开始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军队。这些装备精良、官员充足的军队开始发动攻势。习惯于轻易获胜的游击队马上就表现出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足够的侦察部门；他们之间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能力进行复杂的运动。因此——在不同时期，在国内的不同地区内——游击主义遇到了灾难。要把这些互不相干

的战斗队包括进一个集中的建制里去是一件困难的任务。指挥员的军事作战能力不高，而且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旧军官，另一方面为了掩盖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他们对旧军官是敌视的。然而，一直到1918年7月举行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坚持认为，我们能够依靠游击队来保卫自己而无须乎拥有一支集中的军队。“这等于对我们说”，我答复他们道：“我们可以依靠马车而不需要用铁路来进行运输。”

我军的战线逐渐趋向于联成一个圆圈，其周长足有8000多公里。敌人自己选择了这个方向，他们在外围建立了根据地，从国外取得援助，并且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中心地带。我军形势的有利条件在于我们占领着中心地带，并且沿着内线行动。一旦敌军选择了进攻的方向，我军就能选择反攻的方向。我们能够随时运动我们的部队并且把他们集结起来在最重要的方向进行突击，但是只有在指挥调动完全集中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发挥这个有利条件。为了做到暂时牺牲某些较远的次要防线以保全较近的重要防线，我们必须使大家服从命令而不是讨价还价。这一切是简单已极，不需要再解释的了。其所以还有人不懂得这一点，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离心的倾向，而这这是由于革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互相隔绝的村社的地方主义，以及还没有来得及成熟的自然的独立精神所造成的。一个证明是，最初不仅各州，就是各区里都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其中还设有自己的国防人民委员。正规组织起来所显示的成就使得这些分散的队伍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自己作了改组，并且把他们自己以团和师的形式巩固起来。然而在精神和方法上他们仍然原封未动。一个师长自己没有自信，对团级干部们也就很随便。伏罗希洛夫身为军长，却很放纵他的师长们。但是尤其可恨的是他们对中央的态度，因为中央并不满足于表面上把这些游击部队改编为团和师的形式，而坚持向他们提出军事组

织上的更为根本的要求。1919年1月，我在同游击队中斯大林的一个党羽进行的一场论点中，这样写道：

“在我军的一支部队当中，不久以前还有人把相当粗鄙而愚蠢地讥笑‘军事专家’的行为当做革命性的最高标志；那就是说讥笑所有上过军事学校的人；然而就是在这支部队中简直就没有进行过政治工作。这支部队对待党员政委的敌视态度比之对待专家的敌视态度可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究竟是谁在散布这种敌视的态度呢？那就是那些糟糕透顶的新的指挥官们——他们是些军事上的无知之徒、半瓶醋的游击队员、半心半意的党员干部，他们不希望有人在他们左右，不管他们是党员干部还是严肃的军事干部……他们死抓住自己的岗位不放，一听到学习军事就恨之入骨……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以至于陷入不可救药的绝境，结果干脆起来反抗苏维埃政府。”

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彼得格勒第二团主动放弃了他们据守的一条极其重要的防线，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抢了一条汽船从喀山附近顺伏尔加河而下逃往下新城。我下命令截住了这条船并且把这些逃兵交由军法审处。团长和政委都被处以枪决。由于军事上的失职而枪毙共产党员，潘帖列也夫政委的事件还是第一次。关于这个事件党内有过许多流言蜚语。1918年12月，《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不经审讯就把一些最优秀的同志枪决了”的事，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我的名却显然指的是我。文章的作者叫做阿·卡缅斯基，此人本身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显然不过是个马前卒而已。令人不解的倒是，这么一篇含有如此可怕而严重的指控的文章竟然能在中央的机关报上刊登出来。报纸的主编是布哈林，他是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在军队中任用“将军们”。但是，特别是在当时，他是完全无力参与密谋的。经过调查我发现文章的作者，或者毋宁说是文章的签字人，阿·卡

缅斯基，是第十军的一个军官，当时正处于斯大林的直接影响之下，这才揭开了谜底。毫无疑问，斯大林在暗中左右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这项指控所用的词句本身：那种厚颜无耻的所谓枪毙“最优秀”的同志，尤其是“不经审讯”的说法，由于他极其拙劣的捏造以及它本身的荒谬绝伦而令人吃惊。但是恰恰是这种夸大其词的指控暴露了斯大林——这个后来的莫斯科审判的组织者的真面目。中央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卡缅斯基和编辑部都受到了申斥，然而斯大林那只操纵的手却仍然没有暴露出来。

〔后来，斯大林在南方战线的时候，还继续通过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走卒对这个已经名誉扫地的故事加以利用。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期间，托洛茨基正在前线，当他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不得不再度吁请中央委员会“就枪决潘帖列也夫的案件进行调查”。“因为”，按照中央委员会1919年4月18日会议记录的说法，“在代表大会上又提起了这个事件”。由于斯大林出席了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个请求经一致同意提交了组织局，而这里斯大林也在座（他身兼两个机构的委员）。组织局再一次一致同意〕委派了一个由克列斯廷斯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斯米尔加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全面调查这个问题。他们三人既是组织局又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结论，当然是，潘帖列也夫是经过了审讯，并且并不是作为共产党和〔政委〕而是作为可恶的逃兵被枪毙的——〔按照统率潘帖列也夫那个团的军长斯拉文的说法〕，他之所以被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团放弃了阵地，而是因为他同他的团一道放弃了阵地”。十年以后，这个事件又在斯大林反对我的运动中，在同一个《不经审讯枪决最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题下发生的作用。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就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我军在乌发附近受到白军猛烈的

打击。我决定不顾大会的召开立即出发到东方战线去。在提出所有部队代表立即返回前线的建议之后，我就准备动身到乌发去。部分部队代表表示不满；他们到首都来就是为了得到几天休假，因而不愿意离开首都。有些人就造谣说我打算躲避有关军事方针的辩论。这个谎言使我感到惊讶。我在1919年3月16日向中央委员会建议撤销要求部队代表立即重返前线的指示，把维护军事方针的事交给索柯里尼柯夫并即赴东线。尽管存在着十分强大的反对派，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军事方针这件事并没有能挡住我走；以我看来前线的战局比在代表大会上搞竞选活动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因为我丝毫不怀疑，我所认为惟一正确的方针凭它本身的价值就可以站得住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我事先提出的提纲并且指定索柯里尼柯夫作主要报告人。反对派的报告由老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炮兵军官弗·姆·斯米尔诺夫来作。斯米尔诺夫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他们坚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并且曾经主张用游击战来抵抗德国正规军。这种主张甚至一直到1919年还是他们的施政纲领的基础，虽然老实说，他们同时也已经有所收敛。不任用军事专家，不用正规的有条理的领导来代替临时拼凑的作法，是不可能建立一支集中而正规的军队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头脑冷静一些下来以后，力图使他们旧日的观点与国家机器的发展以及正规军队的需要相适应。但是他们是在逐步退却，尽可能地将他们的老一套加以利用，并且用新的提法来掩饰他们实质上的游击倾向。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关主席团的组成的事件，事情虽然不大却很能说明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尽管这只是最初阶段的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是令人伤脑筋的军事问题。列宁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是反对派幕后的首领。列宁已经同彼得格勒代表团

就主席团的组成达成了协议。反对派提出了好几个补充的名额，其中不仅有反对派的人还有其他人。例如他们提出了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然而，布哈林、斯塔索娃、奥鲍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都拒绝接受提名，他们把已经就主席团的组成问题达成的协议当做是他们个人应该遵守的协定。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拒绝接受提名。这样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对派的立场。看来为了使他的党羽挤满代表大会并且在代表当中进行竞选运动，斯大林曾经下了一番苦功。列宁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避免使人难堪，他尽了一切努力使斯大林免受一场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能入选的考验。列宁通过一名代表提出了这个先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必要在主席团成员之外再提一些补充的候选人？”列宁没有费什么事就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否定的答复。斯大林遭到了失败，然而列宁尽了一切所能及的努力来使得这场失败不具有针对个人的、伤人感情的性质。按照今天官方的说法，斯大林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支持了列宁在军事问题上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在目前已经没有必要保守〔这类〕军事机密的时候，还不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世呢？

在1920年3月召开的乌克兰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以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报告人的姿态出现，形式上为我作辩护；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己的心腹大力来推翻他提出的报告。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要耍这种手腕是困难的，因为会议的程序全都在列宁、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负责的军事干部的掌握之下。但是在骨子里，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也在起着同乌克兰代表会议上一样的作用。他身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却要不是模棱两可地为官方的军事方针作辩护就是一言不发。但是他通过他的最亲密的伙伴——伏罗希洛夫、鲁希维奇以及其他察里津保卫者这些反对派的急先锋——继续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破坏，其目的事实上倒不

在于推翻军事方针而在于推翻它的主要报告人。他唆使这些代表对毫无保留地为军事人民委员部作辩护的索柯里尼柯夫进行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反对派的核心是察里津集团，而其中最出风头的是伏罗希洛夫。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一个时期中他们就已经同斯大林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他给他们指示并且叫他们不要操之过急，同时又把阴谋的矛头集中指向军事人民委员部。这就是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活动的梗概。

“一年以前”，索柯里尼柯夫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报告说，“在军队完全陷于瓦解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军事组织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于是苏维埃政府乃采取了组织志愿兵的制度，这支志愿军当时起到了它的作用。现在，在回顾这个时期，如同回顾我们曾经经过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既考虑到它的积极的方面，也考虑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这个积极的方面主要在于，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参加进来了……但是，除了它的光明面之外，这个游击时期也还有着黑暗面，这个方面终于盖过了那些好的方面。最优秀的分子离开了，牺牲了，或者被俘……剩下的是由最糟糕的分子构成的乌合之众……除了这些坏分子之外，又补充了一些由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灾难性的崩溃而无处存身，因而不得不参加志愿军的人……在这些人之外，甚至于还补充了从旧军队复员下来的地痞流氓。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组织的游击时期中出现了种种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清算掉这种游击制度。到头来它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它使得互不相干的小股部队各自在不同的领袖之下集结起来。归根结底，这些小股部队不仅仅进行保卫苏维埃政府和保卫革命胜利的斗争，而且进行明火执仗的盗匪行为。它们成了坚决支持冒险主义的游击队……”，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时期中”，索柯里尼柯夫继续说道，“国家……军队……的建设工作……在向前发展着……”。

“许多热烈的讨论”，索柯里尼柯夫在报告的另一部分中说道，“环绕着有关军事专家的问题展开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基本解决了。甚至于反对使用军事专家的人本身也承认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在把游击队改组成正规部队的工作中使用了军事专家……由于这样我们使战线稳定了下来，因此我们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相反地，在没有使用军事专家的地方，我们耗费了自己的力量，甚至于到了全部瓦解的地步……在军事专家的问题上，我们所面对的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特殊问题。大家想必还记得，在关于请工程师到工厂里来工作，关于聘请过去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那些极左派的共产主义者是如何用他们的‘超共产主义式’的批评来讥笑我们的……他们说，把工程师找回到工厂来工作就意味着使资产阶级的指挥机构复辟。现在我们又碰到了类似的批评，而这一次是有关建军的问题。有人对我们说，把旧军官找回到军队里来，我们就会恢复过去的军官阶层和旧的军队。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同这些指挥人员一道工作的还有政治委员，他们是苏维埃政府的代表；这些军事专家已经参加了一支完全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这支军队，尽管有着数以万计的旧军事专家，已经在实践中表明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

到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军事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远没有过去那样突出了。反对派已经不像一年以前那样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了。一年以前他们还公然说集中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他们主张用游击队代替集中的军队，并且反对利用飞机坦克等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这一次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术原则：他们声称军团、师甚至旅都是些装备过重的单位。他们建议把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全部缩编为一种特殊的包括各兵种的单位，每个单位的大小约相当于一个团。这实质上是略加掩饰的游

击主义思想。极左派的游击主义者对于自己的辩护要更为公开一些。对于旧军官团的使用，特别是用在指挥岗位上，被说成是与忠于革命的军事原则不相容的行动。

工人政府的武装部队的实际组织工作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的。我们曾经想办法，特别是在初期，尽量利用旧军队遗留下来的经验、方法、知识和装备。我们凭借手头所有的人力和技术装备来建立一支革命军队，随时随地努力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委制度是保证无产阶级控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我们把新老指挥人员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大多数代表对这一点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再没有哪一个敢于在原则上反对这个军事方针的基础了。反对派于是转而批评一时的错误和过火的行为，用各种各样的悲惨的传闻来款待代表大会。

反对派的报告人斯米尔诺夫，针对着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有些人大概主张建立游击军队，而其他人则赞成正规军队”的话进行了直接的答辩。他指出，在有关使用军事专家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并没有就我们的军事方针的主导趋向发生分歧。”主要的分歧发生在有没有必要扩大政治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权，以便保证他们更多地参与军队的调动和有关作战问题的决定，从而削弱指挥人员的作用。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批评只接受了一半。大会决定继续全力招募旧的军事专家，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准备一个新的指挥部，并使之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绝对可靠的工具。这个决议和所有其他决议都一致通过，只有一票弃权。这个事实说明，反对派这时已经抛弃了大多数主要的成见。由于无力把自己的路线提出来与党的多数派的路线相对抗，他们只好同意总的结论。尽管如此，前一个时期的游击主义的某些影响，在整个1919年内，仍然显著存在，特别是在南方一带——如乌克兰、

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等地，在这些地区消灭游击倾向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位显赫的军事干部在 1920 年写道：“尽管有人在我们的军事方针、在红军招募军事专家等等问题上掀起了这些烦扰、喧嚷和吵闹，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托洛茨基同志仍然是正确的。他用铁一般的手腕继续推行着既定的军事方针，对一切威胁毫不在乎……红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就是这个军事方针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直到今天，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还在坚持不懈地数说着关于我所任命的“将军们”阴谋叛国的陈词滥调。只要大家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 20 年以后几乎把他自己任命的全部指挥人员都加上叛国的罪名而予以消灭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是特别愚蠢的了。还可以再指出一点，官方的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和反对派的副报告人弗·姆·斯米尔诺夫，这两个内战的积极参加者，后来都成了斯大林主义清洗的牺牲品。

在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特别的军事会议，会上的记录都保存下来了，却从来没有发表。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参加者，特别是心怀不满的反对分子，有机会充分、自由而坦率地发表意见。列宁在会上作了发言，有力地为军事方针辩护。斯大林说了些什么呢？他有没有发言为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辩护？对这个问题很难作直截了当的回答。毫无疑问他在幕后进行了活动，唆使各反对分子反对军事人民委员。从当时的情况以及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的回忆看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军事会议的文件直到现在没有发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罪恶昭彰的证据——斯大林不是根本没有发言，就是当时他的发言现在会使他感到太难堪了。〔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也是〕为起草最后决议而特设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干了些什么勾当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惟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

仆从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提拔为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人。

季诺维也夫，无疑在斯大林同意之下，曾经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为“被侮辱的”伏罗希洛夫作辩护。我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对他这种说法作了答复。我说：“我在对待他〔伏罗希洛夫〕的问题上，惟一应该负的罪责是我耗费了过多的时间，竟有两三个月之久，通过协商、劝说和私下的说合来办事，而为了事业的利益，我早就应该作出坚决的组织上的决定。因为，到头来，在有关第十集团军的问题上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最短期间内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这当然有赖于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把计划协调起来〕，因为全国已经分成八个军区，下面统辖着 46 个州和 344 个区的军事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竭尽全力就军事人民委员部在军事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散播毒素。〕所有手头的文件都充分证明，根据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采取的立场看来，斯大林是反对派的首脑。如果说我过去还只是有点疑惑，而现在则是坚信不疑，斯大林同乌克兰人搞的阴谋，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操纵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同他在军事反对派中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没有能够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报复的机会。

第十章 内 战（续）

1919年春天，在尤登尼奇将军统率下的西北义勇军出乎意料地发动了攻势，进逼彼得格勒。不久，英国舰队驶入了芬兰湾。布拉克—巴拉霍维奇上校身先士卒，率领他的部队进击普斯可夫。同时爱沙尼亚军队也在前线活跃起来。5月14日，罗将柯将军的兵团突破了由于抽调了部分兵员支援更为吃紧的战线而被大大削弱了的第七集团军的阵地，占领了杨堡和普斯可夫，并且迅速地同时向加特契纳、彼得格勒和卢加进逼。驻扎在彼得格勒近郊的第七集团军军长同尤登尼奇将军私相勾结，阴谋在十月革命的首都外围的喀琅施塔得、奥拉尼恩包姆、红丘炮台、灰马炮台和红村等地驻防的卫戍部队中组织叛乱。根据他们同尤登尼奇的合谋，叛乱者准备会同他的部队攻占首都。他们期望心怀不满的水兵会支持他们，特别是舰队会给他们积极的援助。但是两艘苏维埃无畏战舰上的水兵并不支持叛乱，而英国舰队〔当时还仅限于在戒备中等待时机。〕结果，这项阴谋全部流产。到1919年6月12日，只剩下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还在〕叛乱者手中，而连续四年都没有采取收复这两个地方的行动。最后，经过从喀琅施塔得方面发起的攻势，一支红海军部队终于在6月16日占领了红丘炮台。〔灰马炮台也同样轻易地就占领了。〕

〔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彼得格勒市和这个区的党和政府的首脑，他在步步进逼的敌人面前恐慌万状，于是政治局派了斯大林去支援他。〕

斯大林带着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他的特权，在1919年5月下半月抵达彼得格勒。〔他的冷酷无情和坚决果敢马上就表现出来了。在到达彼得格勒两个星期之后，他打了一个电报给列宁：〕

* “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两个炮台的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查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我只能对这种所谓科学悲叹。红丘炮台所以能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般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粗暴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强迫执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①

列宁对于这种挑衅式的夸夸其谈的语调感到烦恼。从彼得格勒本来是有可能随时同克里姆林宫和大本营保持联系，撤换不称职或不可靠的司令员，加强参谋部，也就是说，进行每一个党的负责军事干部不断地在一个战线又一个战线上应做的一切工作，而又不违反高尚的志趣、良好的作风和维持正确的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不至于损害部队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权力。但是斯大林不会这样做。他只有在侮辱别人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到自己对他们的优越处。他如果不对所有的部下发泄他的狂暴的轻蔑，就不会从工作中得到满足。如果他找不到其他的手段，他就把粗鄙当做一种手段，并且夸耀自己有着侮辱别人所尊重的措施和人物的特殊才能。他用这样的字句结束了他的电报：

“赶快运送供6个师用的200万发子弹来，供我调遣。”

^①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32页。——译者注

这个如此典型的斯大林式的附言牵涉着一整套制度。军队当然有自己的供应部长。子弹总是缺乏的，它们是根据总司令的直接指令，按照贮存的数量以及战线和部队的重要性分配的。但是斯大林僭越了各级主管部门，违反了一切命令的准则。他把供应部长抛在一边而直接通过列宁索取子弹，又不把它们置于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置于他个人的调遣之下，好由他把子弹当做礼物送给某个师，以便使该师师长认识到他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十年之后，伏罗希洛夫利用了斯大林在1919年春末对彼得格勒所作的这次短暂的访问，又一次酝酿篡改历史。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足的神话，叫做“斯大林是彼得格勒的救星”。这是个狡黠的神话，他用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故意把事情发生的季节掉换了。事实是〕尤登尼奇在1919年曾经两度打算占领〔彼得格勒〕——一次在5月间，另一次在10月间。

尤登尼奇的第一次袭击只不过是动用了很小兵力的出击，并没有引起党的注意就过去了。党当时正专注于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的战事而无暇他顾。彼得格勒的局势只经过了很短时期即趋于稳定，党和国家的全部注意力再度转向东方和南方。与此同时，尤登尼奇利用爱沙尼亚作屏障，并且得到英国的十分积极的援助，在此后的四个月间组成了一支配有大批军官，并且有充足装备的新的军队。第二次的袭击是一场硬仗，起初十分有利于尤登尼奇。列宁认为我们无力兼顾所有的战线，建议放弃彼得格勒。我反对这个建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斯大林，决定支持我的意见。我前往彼得格勒之后，列宁在1919年10月17日写信对我说：

“昨晚在国防委员会过夜并发给你……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如你所知，你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但是，把彼得格勒工人调到南方去的命令当然并未撤销（据说你在同克拉辛和李可夫的谈话中曾发挥这个意见）。……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草拟的呼吁书。我很

匆忙。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名字署在你的下面。祝好。

列 宁”

彼得格勒的争夺具有极端的戏剧性。首都全城都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以内，已经作好街道的广场上进行战斗的准备。当苏维埃报刊报道彼得格勒的保卫战而不加更多的解释的时候，人们都了解这是指的尤登尼奇在秋季举行的第二次攻势，而不是春季的战役。然而1919年秋天，斯大林正在南方战线，与真正挽救彼得格勒的战事毫无关系。有关这次对尤登尼奇所作的基本战役的官方文件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公布了。但是如今尤登尼奇的两次攻势已经被合而为一，而著名的彼得格勒保卫战则被描述为斯大林的作品。

〔还在彼得格勒的时候，斯大林就利用了一个机会诽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且含沙射影地旁及于委员会主席，下面这封发自彼得格勒的电报就是明证：〕

* “1919年6月4日

列宁同志：

谨将从瑞士人那里缴获的一份文件寄给你。从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为白党服务的不仅有第七集团军参谋长（记住去年秋季十一师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附近倒戈，投向克拉斯诺夫一边，以及在皮尔姆前线某些团叛变的事），而且还有以柯斯加也夫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整个参谋部。（预备队是由柯斯加也夫分配调遣的。）

现在要由中央委员会来作出必要的结论了。它有勇气这样做吗？

分析证据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新的“可能”正在出现。我应该写得更为详尽一些，但是我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让彼得斯告诉你吧。

我所深信不疑的是：

(1) 纳杰日金不配作司令员。他没有指挥能力。他只会把西方战线断送掉。

(2) 像奥库洛夫这种干部是有害的，他们唆使专家来反对我们的已经颇为沮丧的政治委员，从而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

斯大林”

〔列宁接到这封电报时正在开会。他没有理会电报中的显然是狂暴的指控，而写了下面这张字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利扬斯基：〕

* “斯大林要求撤换奥库洛夫，因为据说他正在一心一意地搞阴谋而且使工作陷于瓦解。”

这讽刺性的“据说”二字的涵义是不言而喻的。斯克利扬斯基在那张字条上写了这样的回答：

“奥库洛夫是那里惟一正派的干部。”

〔根据当场记下来的话，列宁对这个回答的反应是：〕

* “既然如此，起草一份电报（关于奥库洛夫控告第七集团军的事由的详细说明），我要用密码发给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以便使冲突不至于扩大而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

〔这件事于是被提交党的最高执行机构，它的决定立刻就用直通电报传达给正在哈尔科夫的托洛茨基：〕

* “鉴于在彼得堡的中央委员和奥库洛夫之间的冲突正在扩大，并认为有绝对必要在彼得堡的军事工作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团结，而且有必要在那条战线上立即取得胜利，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临时决定召回奥库洛夫，由托洛茨基同志调遣。

1919年6月4日。第二九九五号。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 列宁、加米涅夫、谢雷布
里亚科夫、斯塔索娃”

这对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必要的让步。除了接受它之外别无他法。〔至于柯斯加也夫，这位非常〕能干的将军也并不引起我的信任。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外人一样。但是瓦采济斯支持他，而柯斯加也夫同这位脾气暴躁而又任性的总司令倒颇为相得益彰。要替换柯斯加也夫是不容易的。〔再说，〕也找不到反对他的事实。很显然，“从瑞士人那里缴获文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被人提起过。无论如何，把柯斯加也夫同任何一个团的叛变联系起来的企图显然是粗暴而勉强的，因为这些团都是在党的直接注视之下组成的。至于纳杰日金，他曾经指挥过〔在最危急的关头〕〔实际上拯救了〕彼得格勒的第七军。至于奥库洛夫的罪过，那完全是由于他努力地最忠实地执行一切命令和条例，并且坚持拒绝参与任何反对中央的阴谋而造成的。〔至于〕斯大林的挑衅般地大胆而执拗的语调，那是由于他感到他终于在东方战线的军事委员会中纠集了真正支持他的力量，而在那里对于总司令的不满正在转变为对我的不满。

在东方战线上有关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歧发生在总司令瓦采济斯和东线司令员谢·谢·加米涅夫之间。他们俩人都在沙皇军队的总参谋部中担任过上校职务。他们之间无疑是互不服气的。而政治委员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军总参谋部里的共产党员支持瓦采济斯，而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古谢夫——则全心全意站在加米涅夫一边。很难说这两个上校哪一个更有才具。两个人无疑都秉有第一流的战略天才，两个人都在世界大战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两个人肯定说都很乐观，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成为军事将领的。瓦采济斯更为倔强而别扭，而且无疑是易于受敌视革命的分子的影响的。加米涅夫则比较容易相处一些，而且更加易于受同他一道工作的共产党员

的影响。然而，虽然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而且是一个十分能够冒险的富有幻想的人，他却缺乏深度和坚定性。列宁后来对他感到失望，并且不止一次地用非常尖锐的语调批评他的报告。〔有一次，列宁作了这样的评语〕：“他的答复是愚蠢的，而且有些地方文理欠通。”

东方战线可以说是红军的第一个产物。它在所有必需的配备上，包括党员在内，都比其他战线要更为充实一些。〔在1918年秋季〕，高尔察克应该算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已经推进到喀山，并且威胁着下新城，从那里他可以长驱直入进迫莫斯科。很自然，革命的国家这时候把一切方面的精华都调到东方战线上来。

9月7日，第五集团军的部队开始攻击通向喀山的道路。〔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伤亡很重。捷克军队因支持不住而后撤。9月10日第五集团军攻克了喀山。〔这是〕〔苏维埃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是拯救年轻的共和国免于全面崩溃的一个转机。我在喀山亲眼看到了这场胜利。那是严重而令人恐惧的时刻。在辛比尔斯克失陷之后，我们实际上是不战就放弃了喀山。下一步是下新城。如果白军占领了下新城，他们就扫清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这就是喀山之役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在这次战役过程中诞生的第五集团军为自己争得了荣誉。我们把喀山从白卫军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手中夺取过来的那一天是革命过程中的转折点。喀山的收复揭开了肃清东部的反革命的序幕。全国的劳动者都把喀山的收复当做重大胜利而加以庆祝。对于军队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是更为重大的。

〔但是在〕1919年3月，拥有3000把刺刀和6万把腰刀的高尔察克迅速地向伏尔加河开进。形势再度变得岌岌可危。在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列宁的意见是我应该亲自监督东方战线上的战事。现在有必要重提这一段细节并且用文件上的根据

加以印证，以驳斥目前的伪造说法。

(一)

* “1919年4月10日

斯克利扬斯基并转下新城交托洛茨基：

鉴于东方战线的局势极其困难，我想最好你能留在那里，特别是因为13号那天不会出什么严重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决定昨天给你发这样一封电报，但是我怕斯塔索娃已经走了，这封电报没有发出。我们正在紧急地考虑一系列支援东方战线的非常措施，关于这件事斯克利扬斯基会告诉你的。把你的意见通知我们。

列宁”

(二)

* “用直通电报从下新城发往莫斯科交列宁：

完全同意我必须留在东方战线，我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左派共产党人在第三军进行鼓动煽惑人心的事情，在那里有人鼓动反对军事指挥官，并且反对据说是要建立军事礼节之类制度的命令。需要派来一些坚强的中央派的党员。极其重要的是要干部们支持辛比尔斯克，那里的省委非常弱，特别是在县份上。

1919年4月10日。第一〇四七号。

托洛茨基”

(三)

机密

* “摘自1919年4月18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

出席：列宁、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四位同志考虑到：

2. 托洛茨基同志的下列声明，即在东方战线上指挥由四个集团军组成的南方兵团的伏龙芝同志缺乏担负如此重大任务的经验，并且有必要加强这条战线。

决定：

建议总司令瓦采济斯前往东方战线，以便现任战线司令员加米涅夫同志能够以全力投入领导南方兵团所属各集团军的工作。”

(四)

* “摘自1919年5月12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文件。

出席：列宁、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等三位同志

考虑到：

9. 托洛茨基同志拍给列宁同志的电报提到，需要对由于〔乌拉尔〕哥萨克的叛乱而成为战略重镇的萨拉托夫给予特别的注意。

9. a. 立刻把安东诺夫、费奥多尔·伊万诺夫、里茨贝格和普拉克辛等同志从萨拉托夫调回来。

b. 立刻派伊·尼·斯米尔诺夫到萨拉托夫去担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要塞委员会委员……”

在两度退却之后，反击高尔察克的进军正十分顺利地进行着。瓦采济斯认为，目前主要的危险在于南方并且建议在冬季把东线的部队保留在乌拉尔，直到危险完全消除为止，这样就可以抽调一部分师团去支援南方战线。我的一般论点早在1月1日的电报中就阐明了。我倾向于对高尔察克进行毫不间断的攻势。但是这个具体问题是由力量对比和总的战略形势所决定的。如果高尔察克在乌拉尔以外还保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如果我们的不断战斗前进已经使红军部队受到严重的损耗，那么再在乌拉尔山区以外去进行更多的战斗就会造成危险，因为这样就需要补充新的共产党员和指挥员，而所有这一切目前都必须留给南方战线。

我还必须说明，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个时候已经相当巩固的东方战线脱离了联系，而且全神贯注于南方战线。从远处很难判断东方战线上节节进击的各个集团军还保存了多大的实力，也就是说，还有多大力量能够不仅不依靠中央的援助继续向前进攻，而且还能拨出一部分力量来支援需要精锐师团的南方战线。我给了瓦采济斯以一定的指挥调动的权力，我想如果东方战线司令部有反对的意见，或者万一出现了东方战线继续前进就会给南方战线带来不利情况的话，政府还会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决定，纠正总司令的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瓦采济斯和加米涅夫之间的矛盾。瓦采济斯对东方战线企图独行其是以及它所作的一些闪烁其词的答复感到不满，要求把加米涅夫撤职而代之以以前第六集团军军长萨莫伊洛夫。〔但是，这个措施采取以后，同情加米涅夫的政治委员们立即提出了抗议。列宁问托洛茨基，这件事以及斯大林从彼得格勒发生的对柯斯加也夫的指责怎样处理才好，托洛茨基在基辅用直达电报答复道：〕

* “我同意把加米涅夫调回东方战线接替萨莫伊洛夫，但是

我不知道目前加米涅夫到哪里去了。我也不反对撤换柯斯加也夫，我也曾经多次提过这个建议，但是困难的是需要找一个不至于比他更糟的人来接替他。我认为，拉谢维奇并不比阿拉洛夫更坚强。不同的只不过是其所表现的软弱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而已。古谢夫更适合于战地司令部的职务。不论怎么样，在把加米涅夫派回去，特别是在撤换柯斯加也夫的问题上，都需要事先同总司令商量一下，以免使整个机构陷于瓦解。我建议，最先要做的是最紧急的事，那就是把加米涅夫调回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找到他并且叫他马上到莫斯科来。同时物色代替柯斯加也夫和阿拉洛夫的人选，而这是比较不那么紧急的。请告知你作的决定。

托洛茨基

然而我必须指出，库兹明、奥列霍夫、纳乌莫夫、瓦托欣等对萨莫伊洛夫的看法同拉谢维奇、古谢夫、斯米尔加等对加米涅夫的看法一样，也同阿拉洛夫对柯斯加也夫的看法一样。这种前线上的义气是我们共有的不幸。

1919年5月21日。

托洛茨基又及”

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内，红军对南方的反革命给了粉碎性的打击，这些反革命主要是由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的、有着骑兵掩护的顿河哥萨克军组成的。但是在克拉斯诺夫的后面，邓尼金的志愿军正在库班和北高加索一带建立起来。5月中旬，我们由于不断前进已经大大削弱了的部队同邓尼金的新编队伍遭遇并且开始败退下来。我们丧失了所有早先攻占的土地，外加新近解放的乌克兰全境。与此同时，在由前上校加米涅夫担任指挥、由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方战线上，形势已经大为好转，战事也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致我根本不再到那里去了。我连加米涅夫的模样都几乎忘记了。为胜利所陶醉的斯米尔

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把他们的司令员抬了起来，同他一道为兄弟般的友谊干杯，并且为他打了最热情的报告给莫斯科。总司令瓦采济斯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建议东方战线部队留在乌拉尔过冬，以便抽调几个师去支援形势日趋严重的南方战线，然而加米涅夫在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的支持下，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加米涅夫争辩说， he 可以从他的部队中抽调几个师归南方战线使用，但无须乎停止乌拉尔的攻势。自此以后，特别是由于瓦采济斯在自己的错误完全暴露之后继续固执己见，加米涅夫的声望乃在牺牲瓦采济斯的情况下提高了。〕斯大林立即抓住了东方战线同总司令之间的矛盾。他一向用敌视的态度对待曾经公开谴责他干预战略问题的瓦采济斯，并且伺机向他进行报复。现在这个时机出现了。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显然在斯大林的配合之下，建议任命加米涅夫为总司令。东方战线的胜利影响了列宁，我的反对意见也被否决了。

加米涅夫被任命为总司令，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也在1919年7月3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改组了。新的军事委员会由托洛茨基、斯科利扬斯基、古谢夫、斯米尔加、李可夫和总司令加米涅夫组成。

新任总司令的第一项任务是草拟一个整顿南方战线部队的计划。加米涅夫素以富有乐观主义精神和敏捷的战略思想而著称。他不很了解南方战线上的工人、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等社会成份，于是他从东方战线司令员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南方战线的事务。最简单的做法是把从东方战线调来的师团集中在伏尔加河沿线，并且打击邓金尼的总部所在地库班。这本来是他同意及时抽调几个师而又不中断他本身继续前进的那个计划的基础。

在战略问题上，我总是先倾听总司令的意见。然而，我对于南方战线的了解，使我相信这个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邓尼金已

经想办法把他的总部从库班迁到乌克兰去了。向哥萨克们发起攻势意味着迫使他们倒向邓尼金一边。在我看来，主要的打击显然应该放在邓尼金和哥萨克之间的分割线上，那里沿线地带的老百姓全都反对邓尼金和哥萨克而拥护我们。但是我反对加米涅夫计划的意见被理解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东方战线之间的分歧的继续。斯米尔加和古谢夫，在斯大林的合作下，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之所以反对这个计划，是因为我在一般的原则问题上不信任新的总司令。看来，列宁也有这种疑虑。但是这些疑虑是根本不对的。我并没有过高估计瓦采济斯。我以友善的态度欢迎加米涅夫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减轻他的负担。但是这个计划的错误是如此明显而毋庸置疑，因此在政治局全体委员，包括斯大林，投票反对我而批准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提出了辞呈。就我的辞呈（1919年7月5日，党的最高执行机构作了如下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考察了托洛茨基同志所宣布的意见，并且考虑到了它的各个方面，一致结论，他们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也不能同意他的请求。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将尽一切力量来使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选择的工作，也就是目前最困难、最危险、也最重要的南方战线上的工作，既尽可能地对他方便，又尽可能地对共和国有利。托洛茨基同志作为军事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有充分的权力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协同他自己任命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该线司令员（叶戈里耶夫）采取行动。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的机会，使他能够通过一切途径按照他的设想，力争改进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而且，如果他有这样的愿望的话，将力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坚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托洛茨

基同志的辞职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那样只会给共和国的利益带来最大的损害，因此建议托洛茨基同志不再提出这个问题，而在今后最大限度地执行他的职责，在他集中精力于南方战线的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的职责减轻一些。

鉴上所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也拒绝接受托洛茨基同志辞去政治局委员以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

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
谢雷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

我收回了辞呈并且立刻出发到南方战线去了。

三天之后，当我在前线上的柯兹洛夫的时候，接到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发来的密码电报，上面说，根据一名被控叛国罪并已供认不讳的军官的供词，可以推知，瓦采济斯与闻了一项军事阴谋：

“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发往柯兹洛夫市交托洛茨基：
绝 密
全部密码
1919年7月8日

多莫季诺夫已经供认不讳并且已经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叛徒。他已经就一项阴谋提供了实证。曾经长期同总司令共事而且同他住在一套房间里的伊萨也夫积极参与了这项阴谋。构成一整套证据的许多其他明证肯定总司令与闻了这件阴谋。总司令必须予以逮捕……”

〔这封〕电报是由〔肃反委员会的首脑〕捷尔任斯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列宁和我的副手斯科利扬斯基签署的。从电报中提到的名字看来，显然指的是新近被撤职的总司令。瓦采济斯就这样在他被撤职之后几乎立即就在叛国嫌疑的罪

名下被逮捕了。这件事使得有关战略问题的争论具有险恶的含意。政治局内部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总司令的人事调动问题也大大复杂化了。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个事件的确切境况和含意。从瓦采济斯不久就被释放并且甚至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教授看来，可以说他对于任何军事阴谋是一点也没有干系的。他由于对自己被解除总司令职务感到不满而对接近他的军官说了些冒失话倒是并非没有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逮捕他的事情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瓦采济斯看不起他，斯大林早就怀恨在心。再则，从他对肃反委员会首脑所持有的友好的影响以及从东方战线各将领和新任总司令对他的支持看来，他感到自己可以肆无忌惮保险不会出问题。他由于能够间接打击军事人民委员而感到更加满意。人们意识到在这个事件背后有着明显的阴谋，在捷尔任斯基背后有着斯大林的无形的影响。

〔7月27日，〕“由于出现了非常的情况”索柯里尼柯夫仓促地叫我到柯兹洛夫去。在那里，我发现南方战线司令员叶戈里耶夫认为加米涅夫〔关于南方〕的作战计划不正确，他虽然在执行这项计划却并不期望能获成功。作战部长佩列米托夫的态度和索柯里尼柯夫本人的意见也是如此。最初，除索柯里尼柯夫外，我没有同任何人谈到过这件事，在叶戈里耶夫提到这个计划的不合理处的时候也没有要他加以阐述，〔而立刻打电报给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 “虽然我并没有对争论中的各种论点加以分析，然而我认为，一个人对于他所执行的计划毫无信心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惟一的办法，是立即〔在行动开始之前〕撤换南方战线司令员，而以一个承认总司令的作战指挥权并同意其作战计划的人来代替他。谢利瓦乔夫大概会同意加米涅夫的计划。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应该立即任命他为南方战线的副司令员，以便在一个星

期之后任命他为南方战线司令员。等待着你的指示。

1919年7月27日。第二七七/S号。

列·达·托洛茨基”

〔复电不是由列宁而是以政治局的名义打来的。只有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叶列娜·斯塔索娃在上面签字——其用意似乎是要使这封电报具有非个人的性质：〕

* “发往奔萨交托洛茨基同志： 机密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已经考虑了你发来的第二七七/S号电报，并且完全同意你关于在坚决执行一项既定计划中任何的动摇都会造成危害的意见。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的作战指挥权并且要求你向所有负责干部进行必要的解释。政治局在现有委员之外，另行任命斯米尔加、谢雷布里亚科夫、拉谢维奇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央委员会指示。

1919年7月28日。

斯塔索娃”

〔南方战线的战略问题是关键性的。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被瓦采济斯事件所加剧，已经达到这样困难的地步，以至于要通过隐蔽的方式和十分冠冕堂皇的途径来进行。托洛茨基立即把他收到上述指示的消息打电报通知他在莫斯科的副手并转达中央委员会。电文说：〕

* “斯克利扬斯基同志并转中央委员会： 机密

我不理解你们来电的含意。鉴于叶戈里耶夫的怀疑，我建议给他派一名助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代替他的职务。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我在柯兹洛夫的时候，免去了作战部长佩列米托夫的职务，因为他不同意总司令的计划，并且促地从军事监察部把贝伦达调来代替他。在我走之前，我曾经得到索柯里尼柯夫的同意，当着他的面直截了当地向叶戈里耶夫提

出他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总司令的计划的计划的问题。他用极其肯定的语气作了答复，而且据我的判断，他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保留。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总司令同他作了初步商谈之后，十分有必要把谢利瓦乔夫派去担任他的副手。关于这项建议，除了要贯彻遵守纪律的准则（又没有说清楚对谁贯彻）之外，没有给我任何其他答复。

我认为，在已经有了六名委员（叶戈里耶夫、叶戈罗夫、索柯里尼柯夫、奥库洛夫、弗拉基米洛夫、谢雷布里亚科夫）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是荒谬的，特别是由于拉谢维奇已经被任命为彼得格勒的卫戍司令，而斯米尔加则是绍林军团的成员。我建议撤销这项决定。

没有子弹并极端缺乏步枪是前线上的严重问题。第九军已经征集好2万名战士，但是他们都没有枪，而只半数人可望得到补给。发的子弹少得可怕，如果出现了任何一点点麻烦的情况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我对南方战线的四个军的形势的观察以及我同南方战线司令员谈话的结果，我向你们提出警告，整个战役有可能由于缺乏弹药而失败。第二八四号。

1919年7月29日。

托洛茨基”

〔根据新任总司令关于在南方战线上发动攻势的计划所作的准备工作继续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在8月里的第一个周末——那就是攻势实际开始前的一个星期——政治局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问题。〔十分〕明显，邓尼金，为了同罗马尼亚和波兰取得联系，并且把他的根据地从叶卡特林诺达尔转移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去，极其可能把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乌克兰而不是指向东方。不管总司令为了排除这个目前最严重的危险采取了什么措施，都必须立刻决定如何进行这场迫在眉睫的乌克兰争夺战。首

先，必须使第十二集团军同由于没有电信联络而同南方战线失掉联系的第十四集团军会合起来。这时候，不仅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已经合而为一，而且两个集团军都日益被迫对同一个敌人邓尼金作战。因此我建议使第十四集团军脱离南方战线的管辖，把这两个集团军的指挥部统一起来置于第十四集团军军长叶戈罗夫和他的参谋部的指挥之下，这个新成立的军团就叫做西南战线，总部设于康诺托普，并且把它置于总司令和总参谋部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这个拟议中的西南战线具有最起码的〕战斗力，〔必须〕尽非常大的努力，依靠从比较稳定的前线上调来的共产党部队、从莫斯科的区级干部，甚至于绝对可靠的捷克部队的援助，制止土匪活动、破坏铁路路轨之类的行为。全国所有可以动用的党员军事干部，不管他们原来担任什么职务，都立即用专车送往乌克兰。所有原来派到其他各军去的政治干部，必须被派到乌克兰去，同时还运去了靴子、弹药和枪支。第十二集团军已经弹药告罄了。由于缺乏弹药，他们不得不用手榴弹同叛乱的移民作战。两个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都不强。根据乌克兰国防委员会同两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协议，任命伏罗希洛夫去镇压两军后方的叛乱。所有在乌克兰参加镇压叛乱的人员和机构都归他指挥。

〔因地而异但又基本上性质相同的类似的困难出现在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面前。列宁变得执拗起来。进攻刚刚开始他就写信给斯克利扬斯基说：〕

* “我身体不适，只得卧床休息。

因此回信请派通讯员送来。

沃龙涅什方向的进攻拖延下来（从8月1日至10日!!!）是非常可怕的。邓尼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是怎么回事呢？索柯里尼柯夫说，我们在那里（沃龙涅什附近）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能如此坐失良机呢？

告诉总司令，这样不行。必须严加注意。

是否要给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这样一封电报（抄送斯米尔加）：

密码

决不容许拖延进攻，因为拖延会把整个乌克兰送给邓尼金，会使我们毁灭。你们要对拖延进攻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负责。速告你们的理由以及何时开始坚决进攻的日期。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①

〔南方战线的攻势，根据谢·谢·加米涅夫的计划，在8月中旬开始了。六个星期以后，即9月底〕，我写信对否决我的计划的政治局说，“沿着阻力最强的一线的进攻已经证明完全对邓尼金有利，正如同所预料的一样……目前我们在南方战线上的局势比总参谋部开始执行它的按照推理得出来的计划的时候更为不利。要闭眼不看这一点是幼稚的。”这时候，许多原来支持这个计划的人，包括已经从东方战线调到南方战线的拉谢维奇，已经看清楚了这个计划的致命的错误。3个星期以前，9月6日那天，我曾经用密码打电报给总司令和中央委员会说：“南方战线斗争的中心困难已经向库尔斯克—沃龙涅什一线转移，那里没有后备兵员。”我也提醒〔他们〕注意下列的问题：

“肃清马蒙托夫的努力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果。由于没有收到机关枪，甚至连少数的汽车也没有收到，摩托化机关枪部队未能建立起来。马蒙托夫显然是在着手通过库尔斯克前线同他自己的部队会师。我们的弱小而分散的步兵部队简

^① 《致埃·马·斯克良斯基》。《列宁全集》第49卷，中文第2版第59页。——译者注

直不能对他起什么作用。拉谢维奇的指挥机构因为缺乏交通工具而陷于瘫痪。马蒙托夫的会师可以认为是势在必行。战线可能在库尔斯克—沃龙涅什一线被突破的危险正在变得愈益明显。拉谢维奇的下一个任务是追击敌人以堵塞这个漏洞。将要用游击式的袭击来骚扰马蒙托夫……破坏铁路将影响从察里津向库尔斯克的调动。而形势迫切要求向西方调动预备队。以急行军方式调遣布琼尼的骑兵军团或许是有可能的。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由于前线机构的全部停滞不动，形势正在日益恶化。我们认为下列的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1) 立即任命谢利瓦乔夫为南方战线司令员。

(2) 谢利瓦乔夫的职务应该由南方战线副司令员叶戈罗夫担负起来。

(3) 派后备部队，包括第二十一师，向库尔斯克方向尾追马蒙托夫。

(4) 把第九军从诺沃罗西斯克方面调到斯塔罗别尔斯克来。

(5) 把布琼尼的军团尽可能向右方中心地带调动。

(6) 火速赶运预备队和给养给第八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

〔此外〕，我建议对某些部队进行重新部署，这实际上等于清算掉已经失败的计划。〔这还是攻势开始不到三星期的事。〕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拉谢维奇同我一道在电报上签了字。但是新任总司令〔在坚持错误上同他的前任一样〕倔强，而政治局却坚决支持他。在9月6日当天，我在奥勒尔经过直通电报收到这个答复：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了托洛茨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拉谢维奇的电报，对总司令的答复予以肯定，并且对目前这种重新审议1919年9月6日决定的战略计划表示诧异。第九六/sh号。

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托

列 宁”

在两个月之内，军事行动的进程就推翻了原定的计划。更糟糕的是，在这两个月的不断的、毫无效果的战斗当中，许多道路已经被彻底破坏，而预备队的集中也远比六、七月间要困难得多了。因此就更加需要把兵力来一个彻底的重新部署。我建议把布琼尼的骑兵军用急行军的速度调到东北方面去，同时把另外几个单位也向那个方向调动。〔但是政治局，当然包括斯大林在内，在这整个期间内继续拒绝接受这些和其他的建议，同时坚持赞同〕总司令发出的指示；〔他反复说道，〕“沿南方战线进军的基本计划仍然坚持不变；换句话说，主要的攻击应该由绍林的特别军团发动，其任务是摧毁顿河和库班河一带的敌人。”〔然而〕在此期间进攻已经完全停顿下来。库班河一带的形势，尽管调去了最精锐的部队，仍然变得极其严重起来，而邓尼金正在向北方进军。

“为了估价作战计划，”我在9月底写道，“考虑一下它的结果是不算多余的。南方战线得到的兵员比任何其他战线都要多；在攻势开始的时候，南方战线只有不到18万把刺刀和腰刀，以及同等数量的步枪和机关枪。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之后，我们的南方战线的东半部可悲地踌躇不前，而在西半部我们陷于困难的撤退之中，损失了部队，组织机构也遭到破坏……必须在作战计划中去寻找失败的全部原因……具有中常战斗力的部队被调到完全由哥萨克人居住的地方去，而这些哥萨克人并没有前进，只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家园而已。这种具有民族色彩的顿河战争的气氛对我们的部队起着瓦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邓尼金的坦克、高明的战术等等使他获得巨大的优势。”

〔不久之后〕问题就不再是这个计划的本身而在于它的灾难性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后果了。看来总司令是在仿效拿破仑的格言，希望通过坚持自己的错误，从中获取一切可能的好处，从而取得最后胜利。失掉了信心的政治局坚持自己作出的决定。9月21日，

我军放弃了库尔斯克。10月13日，邓尼金攻占了奥勒尔，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土拉的道路，在土拉集中着最重要的兵工厂，从那里再向前进就是莫斯科了。我向政治局提出了两个抉择：或者改变我们的战略计划；或者撤出土拉，破坏掉那里的兵工厂，并抵御直接指向莫斯科的威胁。这时，总司令本人已经抛弃了原来计划的若干部分，他的固执和政治局对他的支持都已经被打破了。10月中旬，为准备反攻而进行的重新部署已经完竣。一部分兵力已经集结在奥勒尔西北准备对库尔斯克—奥勒尔铁路采取行动。另外一部分兵力，以布琼尼的骑兵军为首，位于沃龙涅什以东。这可以说就是我原来坚持采取的计划。〔从这些事实看来，研究一下日后斯大林派的历史学家关于这个时期的记述是有教益的：〕

* “在9月和10月初，邓尼金在南方战线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在10月13日夺取了奥勒尔。为了挽救南方战线上由于长期失利而造成的极端困难而危急的局势，党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同志到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斯大林同志作出了新的对邓尼金作战的战略计划，得到了列宁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这个计划的实现导致了邓尼金的彻底失败和崩溃。”

〔在关于谁提出了正确的计划然而遭到了拒绝以及谁应该对错误的、代价大的计划负责这些问题上，斯大林本人的说法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923年，斯大林谈到了南方战线的史实，其目的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表明某些政治原则，而实际上是在政治上为自己开脱：〕

* “拿军事战略来对比，例如……同邓尼金作斗争……，政治战略的主要特点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绘出来。大家都记得，1919年底邓尼金逼近土拉时的情景。当时在军事家中间，在究竟应当从何处给邓尼金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争论。有一些军事家建议选择察里津—诺沃罗西斯克一线……另一

些军事家……建议沿沃龙涅什—罗斯托夫一线……。前一计划……是不利的，因为他主张我军沿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推进，这就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给邓尼金军队开辟一条经过土拉和谢尔普霍夫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后一个……计划是惟一正确的，因为……它主张我军主力部队沿着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推进，这样不必付出特别的牺牲；另一方面，它可以扰乱向莫斯科推进的邓尼金军队的主力部队的行动。大多数军事家都赞同后一个计划，因而也就决定了对邓尼金战争的命运……”^①

看起来，斯大林是随手选择了这一段往事来说明政治策略方面的某些概念的。实际上，举这个例子并不是偶然的。1923年来到了。斯大林心中忐忑不安，料想列宁会给他一次狠狠的打击，因此他有意识地中伤列宁的威望。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大家都很清楚，支持这个错误的、代价高昂的计划的不仅仅有某些“军事专家”（如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而且有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然而他宁可提到“军事专家”之间的不一致而不去触及政治局内部的斗争。他知道党的领导干部们记得十分清楚，他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也就是在总司令本人已经在具体实践中摈弃了他自己原定的计划之后，才开始支持我从7月初起就一直主张的计划的。但是在1924年11月19日，列宁逝世十个月之后，斯大林〔又更进一步。他〕开始企图制造一个有意虚构的关于南方战线战事的版本并把矛头指向了我：

“事情发生在1919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邓尼金拿下了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勒尔。托洛茨基同志从南

^①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134—135页。——译者注

方战线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紧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线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顿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得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①

的确，我在10月10日离开了南方战线前往彼得格勒。我们在南方战线上的反攻本应在10月10日开始。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为了反攻而进行的部队集结已经接近完成，而当时彼得格勒正处于被尤登尼奇占领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更加需要我到那里去。在回忆三年内战时期并查考有关我来往于各战线之间的记录和报道的时候，我发现我一次也没有同一支打胜仗的部队在一起，参与它的进攻并同其他人一道分享它的胜利。我的旅行从来没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性质。我总是到敌人已经突破了战线并且处于困难之中的地段去。我的任务是把溃退的团队变成进攻的部队。我同部队一起退却，但是从来没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一旦那些被击溃了的师团重新恢复秩序、指挥部下达了前进的命令之后，我就要同这支部队告别到另一个不利的地段上去，要不然就回到莫斯科去住几天，以解决中央的积压起来的问题。这样，在三年中我简直没有一次能看到打了胜仗的士兵的笑脸，也没有同他们一道进入过攻克的城市。〔斯大林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在10月中旬以后，我军在南方战线展开的攻势取得胜利的整个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到那里去过的原因。然而，斯大林的捏造却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完全加以歪曲了。

^① 参看《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91页。——译者注

〔但是，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人说过托洛茨基就是导致7月至9月之间进攻邓尼金失败的这个计划的作者。在这期间〕，一切还仅仅限于含糊其词地说什么某些军事工作人员（也不知是向谁）提出过请托洛茨基同志“不要干预”的要求。事实上，中央委员会10月15日发出的13点指示是我用书面提出的，并且经过大家一致通过，包括斯大林在内。列宁、我自己、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的任务是调遣新的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上去替换那些由于不断打败仗而感到疲惫不堪的原有的工作人员。斯大林并不属于这个委员会。究竟新派去的工作人员中有哪些曾经要求我“不要干预”，特别是向谁提出过这类要求，斯大林并没有说出来。〔1929年，伏罗希洛夫宣称：〕

* “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三项主要条件：1. 不许托洛茨基干涉南方战线的事务也不许他越入它的辖区之内；2. 必须把一整批斯大林认为没有能力重整部队的干部从南方战线调走；3. 必须火速把斯大林选定的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的新干部派遣到南方战线去。这些条件完全被接受了。”

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由谁接受的？〔这些问题答案是既非斯大林也非他的仆从所关心的。然而即使〕在他把修正这个错误计划的功劳归于斯大林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在1929年也没有敢肯定说这个错误的计划是我作的。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看来，他承认我是反对这个计划的。然而这一个忽略也被最新的历史著作弥补了。〔根据齐奈达·奥尔忠尼启泽的著作，我们看到的是：〕

* “斯大林……断然拒绝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总参谋部制定的粉碎邓尼金的旧计划……斯大林在一张致列宁的便条中写道，‘这个疯子建议穿过没有道路的、敌视我军的区域，使我军受到全

军覆没的威胁’，……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计划来代替这个已经被生活本身所扬弃的计划，根据新的计划，红军要通过无产阶级的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向罗斯托夫前进……伟大的斯大林的战略为革命赢得了胜利。”

〔一口咬定说在南方战线上取得了最后胜利的计划是斯大林作出的这件事里有着讽刺性幽默的味道。然而这个骂倒一切的狡赖就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它所根据的证明文件就是斯大林给列宁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斯大林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起初在口头上后来又通过书面形式提出的反驳7—9月计划的论点，而这些论点曾经是他和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一道所批驳过的。由于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对这件事的原委都十分熟悉，因此斯大林在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要把旧计划的责任栽在我的头上。相反地，他怪罪于总司令及其属下的“斗鸡式战略家”，也就是那个在7月间总司令部改组时斯大林所依恃的古谢夫。〔在那封信里，斯大林争辩道：〕

*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总司令（大本营）坚持旧计划的呢？显然，只是一种固执己见，也可以说，就是派别成见，最愚蠢和对共和国最危险的派别成见，这种派别成见是斗鸡式的“战略家”古谢夫在总司令部里培植起来的……”^①

正当总司令本人推翻了自己的原定计划，改变了把突击部队集中在邓尼金的哥萨克后方的做法而用这支部队展开直接的正面攻击的时候，斯大林又拍了一封电报〔加强那封信的分量〕。政治局除了事后批准用新计划代替旧计划外别无其他抉择。究竟是采取了这样一个决定，还是政治局只不过接受了既成事实而同时内

^① 《自南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43页。——译者注

心感到高兴而已，是无法从公开文件中看出来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下面这个文件倒是不言自明的：〕

* “摘自

机密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1919 年 9 月 14 日会议文件。

出席：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等同志
考虑到：

5. 斯大林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两同志关于增援南方战线和调动某些人员的声明以及斯大林同志为了支持这项声明，作为最后通牒而发来的电报。

兹决定：

5. (a) 委托列宁同志给斯米尔加同志发一封密码电报，征询他对政治局希望作出的某个调动的意见。

(b) 委托托洛茨基同志以政府的名义向总司令加米涅夫传达必须攻占库尔斯克并且向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进击的政治经济性质的指示以及如何根据这个指示把从东方战线和哈萨克斯坦战线抽调来的增援部队分配到南方战线和东南战线上去的步骤（这项指示的正式文本附后）。同时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上述指示的内容亲自同总司令进行商谈。

(c) 通知斯大林同志，用辞职作最后通牒来支持个人工作上的建议这种作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919 年 12 月 4 日，伊万·斯米尔诺夫自东方战线报告说，〕“高尔察克已经丧失了他的军队……不会再发生战斗了……我希望在抵达森林车站以前就把他的流动参谋部全部俘掳……从我们追击的速度看来，到 12 月 20 日巴尔纳乌尔和诺沃尼可拉也夫斯克将在我军手中。”〔在西北战线上，尤登尼奇已经被全部击溃。在南方邓尼金也在逃窜之中。由于邓尼金想借助于暧昧的“土地改

革”争取农民支持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在战场上又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因而失去了军事专家和地主的支持，白卫军也对他失去了信心。1920年3月26日，他正式辞去了总司令职务，由曾经把被击溃的白卫军在克里木重新纠集起来的弗兰格尔男爵接替。

〔在高加索战线上，白卫军还在给红军的骑兵和步兵以沉重的打击。在1920年2月1日和2日的战斗中，马蒙托夫击退了红军的进攻并且在诺沃切尔卡斯克附近转入攻势。包括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在内的高加索战线上的红军部队不仅由于战斗伤亡而且由于斑疹伤寒的流行而削弱了。增援部队和补给因为铁路上的混乱状况而未能如期到达。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把援军和给养运到高加索战线去。列宁和托洛茨基乃求助于此时正在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的斯大林：〕

“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挽救战局，需要你立即取道绍林目前所在迭巴利策沃驰赴高加索战线的右翼。同时你应该采取非常手段从西南战线抽调大量增援部队和干部。为了稳定局势已经把你编入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继续担任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

第九/sh号。

1920年2月3日。

列宁、托洛茨基”

〔斯大林复电的文本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看来他大概是以目前岗位上的任务繁重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这件事使我们又发了下面这封电报：〕

* “如果你能够在今后数星期内集中全部注意和精力，把支援高加索战线的工作置于西南战线的利害考虑之上的话，中央委员会并不坚持你非去不可。已经派阿尔热诺夫前往沃龙涅什督促必要的调动工作。请予以必要的合作并把调动工作的进展确切地

通知我们。

第五一二号。

1920年2月4日。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两个星期之后，列宁打电报给斯大林说：〕

* “政治局考虑到肃清邓尼金是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不要求你亲自到高加索战线去，但是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增援部队赶运到那里去。

第三四号。

1920年2月19日。

列宁”

〔第二天列宁又就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

“高加索战线情况日益严重。照昨天的形势看，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很可能失守，敌人还企图乘胜北进，威胁顿河区域。请采取非常措施，加速调运第四十二师和拉脱维亚师，并加强其战斗力。我想你会对整个局势作出估计，施展出你全部力量，取得重大成就的。

第三六/sh号。

列宁”

〔斯大林的答复如下：〕

*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绝密

列宁

密码

抄送党中央委员会

我不清楚为什么把高加索战线的责任首先加在我的身上。按事物的常理看来，加强高加索战线的责任完全在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的委员们，据我所知，健康状况都极为良好）而不

在于斯大林，因为他无论怎么说工作已经是过于繁重的了。

第九七〇号。

1920年2月20日。

斯大林”

〔就此，列宁发出了下面这封鞭策斯大林的电报：〕

“从西南战线向高加索战线赶派援军的职责已经交给你了。总之，大家应该尽一切可能予以援助而不应该拿部门的职权范围来支吾搪塞。

第三七/sh号。

1920年2月20日。

列宁”

“莫斯科

库尔斯克，1920年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月19日。

托洛茨基同志：

谨向你发出紧急呼吁，请把我从无所事事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我毫无充分理由地呆在西南战线司令部已经将近三个星期，而两个月来一点工作也没有做。我既找不出拖延的原因也无法获得新的任命。如果在我指挥各集团军的近两年期间，我还作出了一点点贡献的话，我恳求你给我以发挥我的才能的机会，如果在前线上没有这种机会，那么请让我在运输方面或者在军事人民委员会找到一点事做。

第二号。

集团军军长 图哈切夫斯基”

〔显然，斯大林并没有在西南战线上为图哈切夫斯基找到发挥他的才干的机会。而在这条战线上，斯大林以其作为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的委员所享有的政治威望，实际上是那里的主宰。图哈切夫斯基那时还只有20多岁。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

他在沙皇的军队中充当尉官。十月革命把他全心全意地争取了过来。他不仅在红军中服务而且成为共产党员。他转眼之间就在前线上出了名，在一年之内就升为红军将领。就连被他的出色的战略天才击败了的敌人也都羡慕地承认他这种天才。托洛茨基在他这封电报上批道：“转告列宁和斯大林两同志。”在这件事以后究竟马上采取了什么步骤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件事是有案可查的：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西方战线司令员并负责向华沙展开攻势行动。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刻起，波兰共和国就对它抱着敌视的态度。波兰人不顾 1919 年国际联盟把维尔诺划归立陶宛的决定攫取了这个地区，之后，又侵入白俄罗斯领土，并在秋季占领了明斯克和沃尔希尼亚和波多利亚的大片土地。面对着邓尼金将军的胜利，他们又转入沉寂。他们唯恐保证要恢复沙俄帝国的领土完整的白军取得胜利之后，将不仅对于波兰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野心，而且对于波兰本土不利。但是在红军开始给予邓尼金以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候，他们立刻又活跃起来。在新近成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队的支持之下，波兰军队在 1920 年 1 月占领了得文斯克，迫使红军放弃了拉特加利亚，在 3 月间占领了莫泽尔，并且在波兰的“解放者”约瑟夫·皮尔苏茨基亲自统率下，在 4 月间会同已经垮台了的佩特留拉政府的部队，向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虽然红军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作战的，然而苏维埃政府的目标却不仅是要打退进攻，而且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引入波兰，并由此为共产主义打开进入欧洲的大门。〕

4 月 30 日，我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说：“正由于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将具有极端紧张而严重的性质。”因此必须“认识到对波兰的战争不仅仅是西方战线的任务，而且是整个工农俄罗斯的中心任务。”5 月 2 日，我通过报纸发出了一个普遍的警告，要

大家不要对波兰革命寄予过于乐观的希望：“这场战争将以波兰的工人革命而告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要设想这场战争将引起一场革命，却是没有根据的……认为胜利……简直是垂手可得的想法是极端轻狂的。”5月5日，我在全苏机关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说道：“认为历史将开始为我们揭开波兰的工人革命并且因此使我们无须进行一场武装斗争的设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结语中说道：“同志们，我希望你们从这次会议上把这种思想带回去作为你们的主要结论，那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斗争将是一场艰巨而紧张的斗争。”在这个时期中，所有我发出的军事上的命令和公开声明都充满了这个思想。5月9日，我在斯摩棱斯克签署的一项命令宣称：“目前西方战线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战线。”“补给机关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场持久而顽强的斗争而不是一次轻易而短暂的战役。”我反对向华沙挺进，因为，鉴于我军的兵力和物资薄弱，这次进军只有在波兰内部立即发生起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而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保证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实质我已经在我的自传里用最概略的词句加以阐述。

这次战役的主要策动者是列宁。支持他反对我的有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甚至还有小心翼翼的加米涅夫^①。李可夫是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我这一边的中央委员之一，但是他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拉狄克也反对这场在波兰的冒险。所有当时的机密文件现在都在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手中，在这些文件中哪怕只要有一句话能够支持后来关于这场冒险的说法，它早就会被公布了。正是这种说法得不到证实，特别是各种叙述矛盾百出的情况，说明在这里我

^① 这里指的当然是党的领袖列·鲍·加米涅夫，而不是军事领袖谢·谢·加米涅夫。——原编者注

们也不得不与同样的热月^①党人式的神话打交道。

在华沙附近遭遇到的灾难之所以达到那样异乎寻常的程度，原因之一在于指向利沃夫（林堡）的由南方战线各军组成的西方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不当。斯大林是这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首脑。他要在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预定进入华沙的时候，不惜以一切代价同时进入利沃夫。我军向维斯杜拉河的迅速前进已经迫使波兰军队的指挥部把全部力量，以及在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协助下调动的大批预备队集中在华沙和卢布林一带。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西南战线的前沿同主要的西方战线的前沿成直角分道扬镳：斯大林独自作战。当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受到的威胁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总司令命令西南战线把前进的方向急剧地转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一线，以打击华沙附近的波兰部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战线司令部，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却继续向西方前进：难道占领利沃夫本身不是比帮助“别人”攻占华沙更重要吗？在三四天内我军总参谋部还没有能使这项命令付诸执行。只是在再三催促，外加威胁之后，西南战线司令部才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这时，几天的拖延已经产生了致命的影响。8月16日，波兰人展开反攻，并且迫使我军后撤。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不公开的会议上就波兰战事进行秘密辩论的时候，斯大林竟公然拿出了一项惊人地恶毒而不真实的声明，说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斯米尔加“欺骗了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作出了在一定时候拿下华沙的“许诺”，却没有实现他的“许诺”。西南战线也就是说斯大林自己的行动，据

① “热月”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制定的共和国日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的7月19日或20日至8月18日或19日。法国共和二年热月9日（即公历1794年7月27日）发生了推翻罗伯斯庇尔政权的政变。参与这次政变的人史称热月党人。——译者注

说是早已由斯米尔加的“许诺”所决定了的，因此这场灾难性的失败的责任应该由斯米尔加来负。代表大会在沉默的敌意中倾听了这个眼里闪着黄光、满脸阴沉的演说家的演说。斯大林的演说除了打击他自己以外没有起丝毫作用。没有一个人投票支持他。我当场对这种惊人的含沙射影提出了抗议：斯米尔加的“许诺”不过是说他希望攻下华沙；但是这种希望并不能排除意外的因素，而这是一切战争中都会有的，而且这种许诺绝不能给任何人以按照事先的设想而不根据战事的实际发展来行动的权利。这些异议使列宁大为烦恼，他加入了讨论并且表示大家不需要责难某个具体的人。为什么斯大林不把这次辩论的速记记录予以公布呢？

1929年，叶戈罗夫〔他是波兰战役期间西南战线的司令员，第一次公开企图为他的行动辩护，他写了一篇专论题目叫做〕“利沃夫—华沙”，〔在这篇文章里他不得不承认：〕

* “……我们所有的历史家正是在这一方面批评了西南战线的战事。根据现有文件来了解这一战役的人没有一个不认为，西方战线的失利是同西南战线的行动直接有关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西南战线司令部的指责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西南战线采取了完全独立的作战计划，既没有从整个波兰战线的全局，也没有从邻近的西方战线的战况来考虑；在决定性的时刻，没有给西方战线以必要的配合……总起来说，这就是所有的，包括最近发表的，多多少少是论述1920年前线上的相互影响问题的著作中所一再重复的说法……例如，在麦·莫夫钦写的一篇严肃而有趣的著作《据马恩河及维斯杜拉河战役的经验所作的嗣后诸战役》（国家出版社1928年出版）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话直接提到：‘西南战线没有执行总司令关于指派第一骑兵军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方向前进的不容置疑的命令。’（74页）我们的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就是根据这些和类似的文件学习波兰战史的，而且他们在离开学校

之后还把这类印象带到我军部队中去。简言之，关于西南战线在1920年扮演着灾难性角色的神话……现在显然已经不引起丝毫怀疑，并且已经公认为未来的战术家和战略家所应该研究的史实了。”

作为西南战线总司令，并因而要对斯大林的一意孤行的战略负严重责任的叶戈罗夫，要用比较有利于自己的对1920年的军事行动的解释，来减轻他的错误的严重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叶戈罗夫在事情发生九年之后，在“关于西南战线扮演着灾难性角色的神话”，用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得到明确的肯定，而且甚至于成为战争史的一部分的时候，才企图为自己辩护，这一事实却立刻引起了怀疑。事实上，所以迟延的原因，是军队和国家由于波兰战役的失利而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他们对任何歪曲事实的做法，特别是出自对这次失败负责的人们的歪曲，将会感到很大的愤恨。他不得不等待时日并保持缄默。

至于我这方面，本着为整个政府的威信着想以及不愿意把争论引入已经就够纷扰不堪的军队内部去的精神，我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一个字来提醒他们关于这次战役之前进行的激烈争辩。叶戈罗夫只有等到极权主义政权建成之后才能出来进行反驳。小心翼翼的叶戈罗夫自己是作不了主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直接受斯大林的指示写的，虽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这本书里却始终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让我们记住，系统地审查历史的最初阶段就是1929年开始的。

但是，虽然叶戈罗夫企图减轻斯大林和他本人的罪过，他还没有企图把罪责加在另一方的头上。伏罗希洛夫在1929年发表的由他签署的彻头彻尾辩解性的文章《斯大林与红军》里也没有这样做。伏罗希洛夫含糊其词地说道，“由于我军在华沙附近的失利，中止了已经准备好的向利沃夫的前进，这时距离华沙仅10公里的

骑兵军也中止前进了。”然而，事情不能仅止于自我表白。在这种问题上，斯大林是从不半途而废的。把责任转嫁给曾经反对向利沃夫进军的人们的时机终于来到。〔1935年，党员教授〕沙·拉比诺维奇〔在他的〕《国内战争史》中〔写道〕：

* “第一骑兵军已经卷入了攻占利沃夫的战斗，除了拿下利沃夫之外，它没有办法能够直接支援西方战线。它不可能为西方战线提供更多的援助，因为那样做就要从利沃夫附近抽调大批部队。托洛茨基不顾这个事实坚决下令把第一骑兵军从利沃夫撤下来集中在卢布林附近，以便给正在向西方战线各部队侧翼前进的波兰军队的后方进行打击。由于托洛茨基这个极其错误的决定，第一骑兵军不得不放弃了占领利沃夫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能够给西方战线的部队以任何帮助。”

〔当然，〕这种可能性之所以丧失只是由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遵从叶戈罗夫和斯大林的指示而违反总司令的命令，拖延了好几天才转向卢布林进军。〔但是一年以后，军事杂志〕《红骑兵》在《第一骑兵军的战斗历史》〔这篇文章里说得严重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声称，骑兵军……“不仅没有能阻止波兰军队从布格河撤退，而且甚至没有能击破波兰军队向进军华沙的红军部队侧翼发动的反攻。”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只关心新近占领的加里西亚这个次要的目标，根本不愿意帮助图哈切夫斯基执行向华沙进军这件主要的任务。现在伏罗希洛夫却争辩道，只有占领利沃夫才能使他“给予波兰白卫军及其突击部队的后方以沉重的打击。”

简直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拿下距离主战场 300 公里之遥的利沃夫，就能够对这时候已经把红军驱逐到华沙以东 100 公里去的波兰突击部队的“后方”给以打击了呢？为了要打击波兰军队的“后方”，那就必须首先追击他们，因而首先必须放弃利沃夫。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要去夺取它呢？利沃夫本身并不是毫无军事价值的，然而只有发动加里西亚人起而反抗波兰的统治才能使夺取利沃夫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这样做需要时间。军事方面的任务和革命方面的任务在进度上完全不相吻合。从敌人即将在华沙附近展开决定性反攻的危险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起，继续向利沃夫前进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罪恶了。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两条战线之间的嫉妒心理起了作用。据伏罗希洛夫〔本人承认〕，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违反了各项准则和命令。

“在我看来我军的形势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皮尔苏茨基这样写道。“在黑暗的地平线上我所见到的一线光明是布琼尼无法向我军后方发动进攻……这个弱点已经由第十二军暴露出来了。”根据斯大林委员的命令，这个军没有支援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却同它失去了联系。〔好几年之后，为了替斯大林的行动辩护，《红星报》愤怒地叫喊道：〕“为了掩盖他的可恶的、失败主义的指挥调动，叛徒托洛茨基故意地有意识地造成第一骑兵军向北方的调动，大概是去支援西方战线的吧。”不幸的是，我可以再加一句，我造成这次调动还是太晚了一些。如果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个无知之徒不到加里西亚去“独自作战”，如果红军的骑兵能及时赶到卢布林，红军就不会蒙受到那种惨败了。由于这场惨败，我国被迫接受里加和约，它把我国同德国分割开来并因而对两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坚决向华沙的进军引起了希望之后，接踵而来的失败像地震一样地震撼了全党，打破了它的平衡，并且在所谓的工会讨论中得到部队的反映。

〔党的历史学家纳·波波夫在1930年2月23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文章里，承认向华沙的进军是政治局的错误，同时又说：〕“托洛茨基……是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反对这次进军的，他觉得从外部把革命输入波兰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同样的原因，托

洛茨基反对红军在1921年2月援助格鲁吉亚起义者的做法。不论在1920年7月的波兰问题上还是在1921年2月间有关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考茨基式的论调都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有力的批驳。”〔五年以后，拉比诺维奇在他的《国内战争史》中把托洛茨基〕“在波兰战争期间的错误”〔说成是〕“这样一种根本的政治”〔立场，即〕“对于我们来说，战争的目的是促进并加速波兰的革命，用红军的刺刀把革命输入欧洲……否则，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论点，声称‘波兰战线是苏维埃共和国生死攸关的战线’。”过去的指控这样一来又颠倒过来了。迟至1930年，我还被公认为反对向华沙进军的人，我的罪名是不愿意用刺刀来传播社会主义。但是在1935年，却又宣告说我是主张向华沙进军的，支配着我的是我要用刺刀把革命输入波兰的决心。

就这样，斯大林逐步地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着这个问题。他把华沙战役的责任加在我头上，而事实上我是反对这次战役的。红军的惨败由于波兰国内并没有出现革命而早已注定，并且由于他自己的专断独行的战略而更加恶化，然而这场惨败的责任他却加在我的头上，虽然我事先曾经警告过他们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呼吁他们不要热中于诸如占领利沃夫之类的昙花一现的胜利。

把罪责一点点转嫁给反对他的人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根本手段，这种手段在莫斯科审判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还可以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对于波兰战争没有作过任何值得注意的建议性的贡献。当时的函电表明，我有机会逐日与之通信以决定有关波兰战争的日常政策的人是：列宁、契切林、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加米涅夫、拉狄克。这六个人当中只有列宁死得是

时候。契切林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屈辱中死去；拉狄克在监禁中了却残生；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和加米涅夫都被处以死刑。

波兰战役的结束使我们以集中兵力对付弗兰格尔，他在春季期间跑出了克里米亚半岛，摆出了要拿下顿涅茨盆地的架势，使共和国的煤炭供应处于危殆之中。在尼科波尔和斯塔霍夫卡展开的几次雷霆万钧的攻势把弗兰格尔的部队逐出了他们的阵地，红军继续前进，在战役的高潮当中摧毁了锡瓦什地峡的工事。克里米亚又重归于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可以料想得到，“这场迫于眉睫的战斗中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制定的。”叶戈罗夫在1935年11月14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纪念击败弗兰格尔15周年的文章里说道：〕

* “托洛茨基所持的最为有害的观点是，弗兰格尔战线只不过是一条具有三等重要性的防线而已。斯大林同志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最危险的观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斯大林。”

只要提一下这件事就够了，谢·古谢夫，如同现在的美赫利斯一样，当时是斯大林在红军中的真正的代理人，他在1925年〔发表的〕题为《弗兰格尔的溃败》这篇文章中，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在整个内战期间，斯大林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始终是一个第三流的人物。他主持过民族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以及某些民族的代表大会。他同芬兰、乌克兰以及巴什基里亚人进行过谈判，也就是说执行着政府授予的必要的但毕竟是次要的任务。他没有参与有关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维埃的以及第三国际的主要方针政策的事务。在1921年12月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雅罗斯拉夫斯基以组织委员会名义提出了下

列这张主席团名单：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泽、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利莫夫、科马罗夫、鲁祖塔克、伊·尼·斯米尔诺夫和鲁希维奇。这张名单在它的成员和排列次序两方面都是有趣的。名单的作者，亦即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名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把季诺维也夫放在第二位以提醒大家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前四名以外的其他成员也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区一级的领导人。这张名单上没有斯大林的地位，而日期却标明是1921年年底。这时内战已经完全结束。它并没有使斯大林成为领袖。

第十一章 从默默无闻到 三巨头统治

〔内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政治上还是默默无闻的。党内的应声虫们当然知道他，但是并不把他当做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看待。尽管他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的成员，然而对于一般党员群众来说，他却是中央委员会中最不出名的委员之一。国内一般很少听到关于他的话。非苏维埃世界甚至没有感到有这个人存在。然而，在不到两年期间，他对于党的政治机器的控制变得如此强大有力，列宁认为，他的势力是如此有害，以至列宁在1923年3月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又过了两年，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中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掌握的机器贬黜到了一种岌岌可危的政治处境之中。斯大林不仅代替病中的列宁成为党的领导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成了三巨头中最强有力的人，后来还成了列宁的惟一的继承者。不仅如此，随着岁月的增进，他还取得了列宁从未享有过的那样大的权力——那的确是比悠久的俄国专制历史上任何沙皇所享有过的专制权威还大的权力。〕

〔这种情形是怎么造成的呢？斯大林从政治上默默无闻一跃而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原因何在，它的过程又如何？〕

【每一个历史阶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大变动的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产物，都根源于前一个阶段并具有同它类似之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些作家争辩说，布尔什维克专政

只不过是沙皇制度的新版，他们像鸵鸟一样无视于君主制度和贵族阶级已经废除，资本主义已经铲除并实行了计划经济，国教已经废除并以无神论教育群众以及地主阶级已经废除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事实。同样地，在斯大林战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后，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人——例如那些以前曾经批评过布尔什维主义而现在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的维伯、韦尔斯和拉斯基之流——闭眼不看主要的难以歪曲的事实，那就是，尽管在非常时期曾经不得不采取镇压的手段，十月革命毕竟带来了有利于劳苦大众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巨大变革；相反地，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却引起了不断把苏维埃社会秩序变得有利于少数享有特权的热月党式的反动官僚的社会变革。同样不顾基本事实的是，某些资本主义的叛徒，其中不少曾经是斯大林的仆从，他们把头深深藏在苦恼的幻灭的沙堆里，而看不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反革命尽管在表面上同法西斯党魁的反革命有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在某些决定性的、根本的实质问题上却是有区别的；他们看不到，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反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黑索里尼和希特勒领导的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有所不同，看不到这种区别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不管受到热月党式的官僚们如何歪曲）与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同工人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区别并行不悖的。

再者，斯大林的经历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独裁者的经历比起来也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一点是这种根本区别的一个证明——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一个缩影。这两个人都是某种运动的倡导者，都是超群的煽动家，都是民众的喉舌。他们在政治上的崛起，虽然看起来似乎荒诞不经，却都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凭着自己的动力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同他们自己领导运动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斯大林崛起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相同。他的历史上似乎缺少着前一个

阶段。他的崛起的过程是在一种无法穿透的政治帷幕背后发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的充满权力的身躯突然间从克里姆林宫里走了出来，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斯大林的存在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独裁者了。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怀着更为热切的关注从个人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讨着斯大林的性格。他们在他的个性的特征上搜寻着研究他的政治前途的锁钥。

要理解斯大林以及他后来获得成功的原因，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个性上的主要动因：权力欲、野心、嫉妒——那种活跃的、永不熄灭的对于比他更有才能、更有权势、地位更高的人的嫉妒。墨索里尼曾经用他骨子里的那种特殊的吹嘘的口吻对一个朋友说道：“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能够同我相比的人。”斯大林甚至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那样做太粗鲁、太荒谬，也太可笑了。单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当中，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一切方面都超过斯大林，除了他的野心勃勃以外。列宁把权力当做行动的工具而给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单纯追逐权力的欲望却同他格格不入。斯大林就不是这样了。从心里上看来，他一向认为，权力同它所服务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要像运动员为了胜过别人而运用他的筋骨那样来行使他的意志——这就是他的个性的主要动力。因此他的意志不断聚集着力量，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活跃，表现的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对一切都毫无顾忌。斯大林越是认识到自己缺少着许多为了攫取权力而必备的特性，就越加强烈地要弥补他性格上的每一个缺陷，就越要巧妙地地在一定的情况下把短处变成长处。

目前，这种正式地把斯大林同列宁相比的做法是十分下流的。如果在性格的广度上来进行比较的话，斯大林甚至不能同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提并论。不管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是多么贫乏，这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还是反动势力的成功的领袖，他们从自己

所领导的运动开始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主动性，并且唤起群众行动起来，在一团乱糟糟的政治斗争中开辟出新的道路。斯大林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缔造的。斯大林在党的政治机器里发展起来并且始终没有同它脱离。他除了通过这个机器以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处理群众和历史事件的办法。在他掌握大权的初期，自己都对自己的成就感到突如其来。他举棋不定，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总是想退缩或者躲到别人背后去。为了利用他来对付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给他以支持和鼓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这样做，不过程度上稍差一些而已。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斯大林会高高地站在他们头上。在第一届三人小组中，季诺维也夫小心谨慎地用一种高傲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加米涅夫则带着一丝嘲讽的意味对待他。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目前，在俄国历史上大肆捏造事实的还不止斯大林派一家。的确，这种捏造事实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建立在无知和多情善感上的神话获得养料的；关于喀琅施塔得、马赫诺以及其他革命历史事件的丑恶的歪曲就是例子。只要提到这一点就够了，苏维埃政府在喀琅施塔得采取的无可奈何的行动是不得已的悲剧；当然，革命政府之所以把这座屏障着彼得格勒的炮台“拱手奉送”给叛乱的水兵，并不仅仅是由于少数暧昧不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唆使一小撮反动农民和士兵起来暴动而已。在处理马赫诺事件以及可能是心怀好意但肯定是做了坏事的有革命倾向的分子的问题上也作了类似的考虑。

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英勇的革命时期中并没有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革命家一脚踢开，恰恰相反，他们热心地抓住一切机会与其合作，为了求得这种合作他们做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例如，列宁和我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把某些地区分配给无政府主义者，当然，

要取得当地居民的同意，让他们在那里试验他们那种没有国家的社会秩序。那种设想之所以只讨论了一下就打消了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无政府主义运动本身没有能够在俄国革命这个试验场上通过实际事件的考验。在最有才干、头脑最清醒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终于认识到，只有参加我们党的行列才能最好地为他们的事业服务。

尽管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是独力取得政权的，然而，我们明白表示出我们愿意通过谈判同其他苏维埃党派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异想天开、荒谬绝伦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无异于要把我们的党斩首示众。我们只好同当时似乎有一些可能合作的惟一的另外一个苏维埃政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但是，在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辞去了政府职务，7月间他们通过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既成事实以及阴谋进行政变在苏维埃政权背上砍了一刀。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的先生们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让十月革命、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被前联合政府中的奸诈的伙伴毁灭，被德意志帝国军队的铁蹄践踏吗？事实是不容歪曲的。历史证明，在接踵而至的事件的冲击之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土崩瓦解，它的许多最勇敢的党员，包括暗杀冯·米尔巴赫伯爵的布鲁姆金，变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人看到，在布鲁姆金所干的愚蠢而后果严重的挑衅行为背后存在着革命的动机，于是把他吸收作正式党员并委以重任，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报复心强呢还是“自由主义”呢？（这样的人还远远不止布鲁姆金一个。他的情况只不过是更为人熟知而已。）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背叛，虽然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盟友和同路人，却没有给我们以损害，相反地使我们加强了最后决战中的力量。它终止了左翼共产党人的变节。党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军队里和苏维埃机构中的共产党支部的影

响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坚定了。

在英勇的革命时期的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错误是在对待非布尔什维克政党上失之过于宽容和忍让。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像嗥叫的狼、奔走的豺和狂吠的疯狗一样掀起了大合唱。只有最黑暗的沙皇反动派的无耻的机关报《新时代》，摇着尾巴企图用“服从”的语调来进行绝顶巧妙的活动。列宁把它们全部看穿，并且看到了容忍这一帮家伙的危险。“难道我们还能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肆无忌惮地搞下去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天哪！我们有着多么利害的独裁统治哟！”这些吃人野兽的报纸一把抓住了“剥夺剥夺者”这句话，在社论、诗篇和特稿中大作文章。“他们对‘剥夺剥夺者’那句话还有什么话没有说过啊！”列宁有一次用好笑的绝望的口气喊道，“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呢？”我问道，“还是纯粹的捏造？”——“完全不是！”列宁反驳道。“我的确用过这些字眼。说过就忘记了。而他们却把这些字眼编了那么一大套！”他幽默地挥了一下手。

尽管孟什维克党人通过他们对铁路工会和其他方面的控制有意破坏事关重大的防务活动，然而我们并没有妨碍不同意见的发表——直到沃洛达斯基和乌里茨基被暗杀以及在1918年8月30日发生了谋害列宁的事件时为止。在这些悲剧性的日子里，革命的心肠突然变硬了。它开始丢掉它的“仁慈”和容忍。党的利剑得到了最后的磨炼，增强了决心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更无情了。在前线，军队的政治部门同突击部队和革命军事法庭相配合在尚未成熟的军队内部起着骨干作用。在后方同样的过程也适时地得到反映。在前线，这时我们攻克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在全国范围内我们获得了新生。当斯维尔德洛夫和我到高尔克村去探望正在养伤的列宁时，他一面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详细问

到军队的组织情况、士气、共产党员在军队中起的作用、纪律的加强等等，一面高兴地插话说，“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妙了！军队的加强很快就会通过提高纪律性、提高责任感在全国各地得到反映……”的确，到了秋天，巨大变化的效果已经随处可见了。我们在春季的那几个月里感到的束手无策的状态已经肯定地不复存在了。变化已经发生了。问题不再是取得挽救革命的间歇亦即喘息时间，而是即将来临的新的巨大的危险，它已经在无产阶级当中打开了从未探测过的潜在革命热忱的源泉。

在1918年6月剥夺了右派的和中间派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制度下的合法地位以后，在证实了他们不仅通过个别的错误行为而且通过破坏、牵制、阴谋和其他明目张胆的战争行动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内战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就不得不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7月间企图举行阴险的政变之后把他们列入取缔的名单之内。但是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6月14日颁布的开除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并建议其他苏维埃机构也采取类似行动的法令，在五个月之后，即在这些党派回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公认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之后，又予以重新考虑。1918年10月，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项决议中承认，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它批驳“任何一种同敌视民主制度的阶级进行的政治合作”，并拒绝“参加任何建立在民主制度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全民族’联合的基础之上，或者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府组合，尽管它有着民主的幌子作掩饰。”鉴于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些声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11月30日的会议上，颁布了一项法令，撤销它6月14日的决议中“有关孟什维克党”的部分。几个月之后，在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开始出现“向左转”的现象。1919年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苏俄领土上的社会革命党派各组织代表会议“坚决批驳

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就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9年2月25日又颁布法令，“对所有愿意受上述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决议约束的社会革命党的派别”撤销了1918年6月14日的法令。

但是到了春季，一些省份爆发的富农叛乱以及高尔察克的胜利前进又使得这些党派（除少数几个代表外）回到了他们的旧的立场上去。由于这一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5月发出了一项指示，“要逮捕所有不准备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向高尔察克进行斗争的显要的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就证明了，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早先所作的忠于苏维埃“民主”的表白只不过是他们的诡计罢了。他们经常进行煽动，要取消肃反委员会，甚至要取消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的判决，这正好符合白卫军的利益而且在红军后方散布败坏士气的情绪。】

〔由于苏维埃政府的逮捕和同情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党员的纷纷脱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到了1919年底只剩下了空架子。它们的领导人不是经常遭到追捕和监禁就是逃亡出走。曾经大肆吹嘘的苏维埃民主（这种苏维埃制度最初以代表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的、由国内反沙皇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人民大会的形式出现，它们最初还只是参与，后来则单独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到了内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让位给一党专政的统治了。

〔与此同时，那种必然导向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继续发展着。这种现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由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所造成的，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苏维埃内部实行的高压控制，这些党派的积极活动也确实反苏维埃的，然而被军事共产主义和内战造成的破坏所加剧的国内经济的严重困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不能统治就

毁灭掉它”的态度，也是促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在苏维埃民主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这两方面的向着极权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不总是清晰可辨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之后，曾经为这次政变进行准备并且采取配合行动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都把首要的地位让给了苏维埃。而起义就是用苏维埃的名义并且表面上在它的赞助下举行的。在苏维埃内部，人民委员会的实权很快就超过了赋予它权力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人民委员会内部，居多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掌握了大权。到了1918年3月初，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在联合政府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这件事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同时左派共产党人也为了同样的原因，在党内组织反对派来抵制中央委员会。这个时候，“民主集中制”的理想受到了进一步打击，因为事实上政府和党内的权力都集中在列宁和那些唯唯诺诺地执行他的意志的亲信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手中。

〔不幸的先例是在1917年11月间发生的，那时已经当了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卓越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继列·鲍·加米涅夫之后担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样一来，在斯维尔德洛夫的身上就出现了十月革命后的欧洲的第一个党和国家的联合机器。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政治机构，不知不觉地——当然也

只是潜在地——成了当代的一党专政国家的前驱。^①

〔列宁的威信是如此高于一切，以至于他不得不采取一种过于小心谨慎地恪守会议制形式的做法来防止自己成为独裁者。尽管他有着毫不妥协的气质，卫护自己观点的顽强不屈的韧性以及要尽可能迅速而有效地工作的热情，他在同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反

① 参看 1904 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的决议，其中说道：“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全力以赴地与资本主义搏斗，在每一个国家里，与资产阶级政党对峙的只应该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只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过去的经验，特别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的经验，使布尔什维克党人确信这种思想的正确性。在 1927 年 12 月 2 日到 19 日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代表被击溃的反对派发言时说道：“我们必须在两条道路中进行抉择。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第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条道路对革命是极其有害的。这是政治堕落背叛阶级的道路。对于我们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是为我们的全部的思想体系所禁止的，是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全部教导所不容许的……因此只剩下第二条路。这条路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服从党。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深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能在我们党的内部实现，而不能在它以外或者反对它的情况下实现……但是如果除此以外还要我们放弃我们的观点（而这正是这次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就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了。这种要求一个人摒弃自己的意见的做法从来没有在我们党内提出过。如果我们宣布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两个星期以前我们还在维护的意见，那就是虚伪的做法，而且我们也得不到你们的信任……你们不会相信它……那样只会使取得一致的基础本身受到损害……”等等。在我用着重号标出来的那些字句里包含着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党的纪律的不同看法的关键所在。这次斯大林派的代表大会采取了开除反对派并且要求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完全解除武装，并坚决谴责反对派的观点为反列宁主义和孟什维克的”这种做法回答了加米涅夫。就在第二天，以同一个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 23 个从列宁主义改信斯大林主义的人登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台，并且发表了如下的悔过和精神自杀式的声明：“……尽管代表大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那样严酷……我们……把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顺从于党的意志和思想……在判断什么是有利什么是有害于革命的胜利进展这一点上，党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接着，他们接受了代表大会提出的最后通牒，并且请求重新接纳他们入党。这就是他们的末日的开始。——原编者注

对派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十分有耐心的。他力求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同反对他的人相处。如果不是托洛茨基派退出了论争的话，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进行辩论的时候可能已经败于布哈林手下。他也没有为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共产党人在1918年的危急的月份里通过报刊和讲坛向他和党的多数派展开猛烈的攻击而对他们怀恨在心。就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他们的流产了的政变的那一天，列宁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答复了他们的领袖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论点。但是列宁并不是议会迷。他在1915年就写道：“把‘立宪会议’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目前的问题在于谁来召集这个会议。”因此，在1918年他就把立宪会议不客气地干掉了。〕

在起义后的几天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列宁就提出了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必须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他坚持说，“我们必须推迟选举。我们必须使年满18岁的人有选举权从而扩大享受这种权利的范围。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候选人名单修改一下。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不合适：没有受过考验的知识分子太多，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工人和农民。必须剥夺科尔尼洛夫派和士官生〔立宪民主党人〕的合法地位。”有些人争辩道：“目前推迟立宪会议是不策略的；这样做会被理解为把立宪会议清除掉，特别是由于我们自己就曾经因为临时政府推迟了立宪会议而指责过它。”对于这些人，列宁回答道：“这是胡说！重要的是事实，不是词句。同临时政府比起来，立宪会议曾经是或者仍可能是进步的，但是同苏维埃政府比起来，它肯定是个退步。为什么推迟了它就不策略呢？如果立宪会议将来被士官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掌握，难道那样就策略了么？”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还有些人争辩道，“然而，目前我们是弱小的，地方上简直就不知道有苏维埃政府。如

果大家听说我们推迟了立宪会议，我们的地位就更要削弱了。”斯维尔德洛夫特别积极于反对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他比我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更密切地同地方上有着联系。列宁的主张得不到支持。他常不赞成地摇着头一再说道：“这是个错误，明显的错误，它将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害！我希望这个错误不至于把革命断送掉……”然而当反对推迟的决定通过以后，列宁就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为召开立宪会议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上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即使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算上，我们也将处于少数。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竞选政纲上跟着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跑，到处受到愚弄。“当然，我们将不得不解散立宪会议，”列宁说道。“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会怎么样呢？”然而纳坦松^①老头子在这一点上使我们安下心来。他跑来同我们“协商”，但是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看我们将不得不强行解散立宪会议。”列宁喊道，“好极了！对的就是对的！但是你

① 马尔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松，又名波布罗夫（1849--1919）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家和民粹派领袖。他是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革命作用的柴可夫斯基集团的组织者之一。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州后，在1876年组织了十分机密的民粹派北方协会，并且在那年夏天发起并领导了帮助克鲁泡特金越狱的集团。作为土地与自由党的组织者之一，他成了民意党的领袖，在这个党分裂之后，他成了它的恐怖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在1881年由于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而被捕，并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流放十年。1891年他同维克多·切尔诺夫一起组织了民意党。1891年被捕后关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和东西伯利亚。他是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之一，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从1905年起成为左派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始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并且是齐美尔瓦尔德大会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17年社会革命党分裂之后，他成了左派的领袖。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失败之后，他领导着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政变，并以革命共产主义者而闻名。他是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死于1919年。——原编者注

那一伙人能做到这一步吗？”纳坦松回答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动摇的，但是我想他们终究会同意的。”这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度着极端激进的蜜月：他们的确同意了。列宁热情地致力于处理立宪会议的问题。他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彻底，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并且对不幸被任命为立宪会议人民委员的乌里茨基进行无情的反复询问。顺便提一下，列宁亲自下令从无产阶级成份比较多的拉脱维亚部队中调了一个团到彼得格勒来。“万一出了什么事，农民是可能动摇的。”列宁评论道，“而目前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果断。”

在列宁的压力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安排下，从俄国各地聚集拢来的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分配到所有的工厂、工业和部队中去。他们在组织1月5日的“补充革命”的机构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至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认为进行一场战斗是同他们的高调不相符合的：“既然人民选举了我们，让人民来捍卫我们吧。”实质上，各省来的这些有产者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才好，而且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胆小如鼠的。但是，为了弥补他们的不足，他们却对第一次会议的仪式进行了极其精心的准备。他们带了蜡烛，以防布尔什维克们把电灯关掉，还准备了大量的夹肉面包，以防断炊。充分装备着夹肉面包和蜡烛的民主就这样来同专政作战了。人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来捍卫这些人，他们自认为是人民选举的代表，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去而不复返的革命时期的影子而已。

在清算立宪会议期间，我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但是我一到彼得格勒来开会的时候，列宁就对我提起了解散立宪会议的事：“当然，我们没有推迟召开立宪会议是非常冒险的事——我们太不小心了。但是最后合计起来，事情这样发展也还是比较好的。苏维埃政府把立宪会议解散这件事意味着用革命专政的名义

直截了当而彻底地清算掉形式上的民主。因此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样，理论上的总结同动用拉脱维亚步兵团互相配合起来。毫无疑问，列宁这时已经形成了他后来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阐述民主制度的惊人论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如所周知，对于形式上的民主的批判有着很长的历史了。我们和我们的前人都认为，1848年革命的过渡性是由于政治民主破产了的缘故，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民主。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迫使政治民主取代了纯粹民主所不再能占有的地位。政治史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靠批评纯粹民主养肥了的社会民主实际上起着纯粹民主的作用，并且彻底沾染上它的罪恶。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已经不止出现过一次：反对派被请来用审慎的方式解决已经威信扫地的势力所无法应付的问题。民主最初以一种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临时状态出现，后来变成了最高的准则，最后的控制手段，不可侵犯的神圣中之神圣，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最彻底的虚伪。甚至于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在10月间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资产阶级企图在1月间通过立宪会议这个鬼影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式来实行复辟。无产阶级革命在明白无误、直截了当地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所取得的胜利进展，给了形式上的民主以仁慈的一击，使它再也不可能死灰复燃了。这就说明，列宁所说的“最后合计起来，事情这样发展也还是比较好的”这句话是对的。通过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这个机构，二月共和国只不过得到一个再死一次的机会而已。〔在加米涅夫根据自己的倡议，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短时期中，〕废除了克伦斯基制定的对士兵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这使得列宁震怒不已。“真荒唐！”他咆哮道，“没有死刑你打算怎么干革命？你真以为把自己解除了武装就能对付得了这些敌人吗？还有什么别的镇压手段？关监狱吗？在

内战时期，双方都希望打赢对方的时候，谁还理会它？”加米涅夫想争辩说，废除掉的只不过是克伦斯基专门用来对付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宁一点也不让步。他很清楚，在废除死刑的法令背后是一种对待我们面临着的空前的困难的一种轻浮态度。“这是错误，”他反复说道，“不可原谅的弱点，和平主义的幻想。”等等。他建议立刻撤销这项法令。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恐怕会产生不利的印象。某一个人建议，最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死刑。最后，我们只好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出乎意料地问我，“万一白卫军把我们两个都打死了怎么办？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应付得了吗？”〔列宁最初是依靠斯维尔德洛夫而不是依靠斯大林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斯维尔德洛夫是第一个企图把党的和苏维埃的政治机器分开来的人。斯维尔德洛夫当选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的主席（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第一部苏联宪法中，斯维尔德洛夫不仅把列宁主义的原理包括进去，而且把行政管理上的初步的实际经验也包括进去，例如苏维埃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农村里的苏维埃村贫农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区域的疆界和职权，以及许多其他非理论所能具体概括的特殊问题。据斯大林作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说，“斯维尔德洛夫是顺利地解决建设新俄国……的复杂的组织任务……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苏维埃政权，即工农政权……”解决了“把以前秘密的党转移到新的轨道上，……找出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党的领导，保证苏维埃的正常发展……”的任务的“最初几个人中的一个，甚至是第一个。”^①斯维尔德洛夫的

^① 《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41页。——译者注

确是无法替代的：他充满信心、勇敢、坚定、机智，他是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十分赞赏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列宁打电话给斯维尔德洛夫建议采取某项紧急措施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接到“已经照办”的回答。这意味着那项措施已经被采纳了。我们常就这件事开玩笑说，“对于斯维尔德洛夫，毫无疑问，总是——已经照办！”

〔到了1919年春天，中央集权的过程已经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以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权都被党中央委员会夺去，这种转移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权力从斯维尔德洛夫的政府办公室撤到他的党委办公室去，而在地方上苏维埃委员会已经完全听命于同级的党委会了。各地党委会又处于由列宁主宰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之下。但是这个过程这时还没有具体化，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在斯大林的任内全部完成了。〕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牺牲党的民主而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由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某些正式建议而进一步加速了。季诺维也夫表面上是根据自己的主意行事，而实际上是列宁的工具。他一方面建议，为了提高效率，中央委员会把它的部分职权下放给它所委派的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另一方面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部，叫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不欢迎这些建议。奥辛斯基极其反对成立政治局：

〔“请允许我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紧急问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才开两次会，而且，如季诺维也夫同志小心地提到的，是为了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换句话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只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这一切的实质是，由五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而全会则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讨论。这样一来，其他

的 14 个委员都降为次要的委员了。”

〔奥辛斯基当然是对的。终于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政治局后来不仅决定紧急的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会而已。1919 年，政治局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组成。翌年，政治局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扩大为七个人——1919 年的五个人加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不仅如此，在 1921 年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分给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又经明文规定加以进一步限制：那次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不再是每月开两次而是两月开一次；再则，全俄党代表会议不是每季开一次而是半年开一次。这就使得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

〔在同一个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同样由五个人组成的组织局。它的职责是，在政治局批准下，任命和撤换党员干部的人事工作。但是，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根据加米涅夫的动议，它的职权有所扩大：组织局有权“毋须经过政治局批准决定有关组织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不高于省一级的干部的人事调动问题……”斯大林是政治局最初的委员中唯一兼任组织局委员的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二人也在 1920 年成为两个局兼任的委员，然而他们在品德上的高超使他们不屑于参预人工培植的机关政治。这样一来，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 1920 年开始，斯大林实际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担任州委书记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干涉。从潜在力量上看来，他成了政治局，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统治机构中的最强有力的委员。

〔在工农检察院成立的时候，斯大林又被任命为它的首脑。在 1919 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提议建立这个新的机构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把它描述为“一种社会主义监察部门，它将控制我们苏维埃机器的所有单位，把触角伸到苏维埃建设事业的所有部门中

去。”列宁并不隐讳自己支持斯大林掌握这个部中之部的态度。他在答复反对派的反对意见时说道：

〔“……现在谈谈工农检察院。这是个庞大的机构……必须任命一个有威望的人来领导这个机构，不然我们就会陷于困境，被琐屑的阴谋诡计所淹没。我想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不会反对选择斯大林同志的”。

〔这个新委员部的职责是要根除所有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然而，在斯大林掌握下它很快就成了政治阴谋的温床，并且成了他用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器的主要工具之一。在1922年4月18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就这个机构写道：

〔“人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那就是在工农检察院任职的主要是些在其他方面没有获得成就的人。因此，在这个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举国笑柄的工农检察院里……互相间的倾轧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这个机构（不仅是它的不大的统治集团，而是这整个组织）会恢复健康并得到加强，因为今后能干的工作人员将继续被派去担负实际工作而不会派去检查这些实际工作。因此，通过工农检察院的作用来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器的计划显然是异想天开的”。

〔对于这项批评，列宁在5月6日回答道：

〔“在工农检察院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根本不对的。目前，甚至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沾染了恶劣的‘本位主义’，职员水平很低，各部门内部倾轧……没有工农检察院是不行的。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对工农检察院下点功夫，使它成

为一个能检查和改进全部国家工作的机关。”^①

〔但是不久以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改变了，这个由他特地设计出来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委员部本身的官僚主义化和政治上的腐化使他比托洛茨基还要感到担心。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三个附属机构书记处，这件事的后果比当时任何人所预见的都要可怕得多。斯大林后来就是在这个机构里牢牢扎下了根的。时机一到，书记处就要取代政治局成为权力的中心。当时中央委员会只有一个书记，即斯维尔德洛夫，而没有书记处。从1917年11月斯维尔德洛夫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起，直到1918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分子同列宁主义者分裂时止的这段时间里，斯维尔德洛夫在政府职务上比他在党的书记这个职务上花费的精力要多，因而关于党员工作调动的职责是由他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同人民委员会各委员单独或集体地平均分担的。至于技术上的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央委员以外的人员执行的。办公室的记录大多是保存在他个人的笔记本上和他的脑子里。这个人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虽然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党的危机之后，斯维尔德洛夫把主要注意力从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上转到党的书记的职务上来，他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处理党的事务，因此他简直成了这个政治机器的不可缺少的中枢。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死去，使党的机器陷入危险的情况之中。书记处在1918年3月成立的时候，克列斯廷斯基被任命为领导人。他也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但是没有让他凭记忆力办事，于是他着手进行书记处各部门的分工并且建立了记录制度。然而新的书记处无

^① 《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181页。——译者注

力担负把反对派从重要的党和苏维埃的岗位上驱逐出去并代之以既愿意又有能力执行党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干部这种双重任务。1920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乃对书记处本身进行了改组。代表大会决定：

“1. 加强书记处，把它扩大为由三名中央委员常任书记的机构；2. 把目前的组织和行政问题转归书记处管辖，而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活动方面的一般管理事务留给组织局管辖……”

〔这次改组的目的是提高书记处的权力和威信，使它能够更好地对付反对派并制止他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集会上散布异端邪说。

〔但是被选入这个高级机构的三个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克列斯廷斯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性格过于厚道宽宏，不能担当党的警察工作。在他们的任期内，反对派的活动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猖獗起来了。连这三位书记处书记本身也都受到同情那些民主信徒的嫌疑。在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被开除出书记处而且被开除出组织局、政治局甚至于中央委员会。接替他们的职务的，是注定要成为新布尔什维克领导后起之秀的二流角色：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只要考虑一下当时组织局的情况就不难看出，在这次新的“选举”背后是谁的影响起的作用最大了。在组织局的五名委员中，三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已经失掉列宁的信任的书记处书记，另外一个是由于在十月革命前后坚决反对过列宁而直到不久以前还受到辱骂的李可夫，而最后一个则是操纵政治和策划阴谋的老手斯大林。

〔后来形成斯大林主义这个体系的新兴人物还不止这三个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早在1919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斯基是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

会上当选的。这三个人加上米哈伊洛夫和奥尔忠尼启泽是在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古谢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和丘巴尔也是被斯大林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些地方领袖或中央的次要干部。当斯大林本人表面上还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比较次要的角色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使越来越多的急功好利的布尔什维克政客们相信，他能够使忠于他的人政治上得到好处。他的领导至少具有这种特色。]

斯大林认为，在最初同他合作的人当中，最忠实于他的是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这两个人都不为列宁所喜欢。奥尔忠尼启泽肯定说是富有力量、勇气和坚强的性格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个缺少文化、脾气暴躁、完全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他还是个革命家的时候，他的勇敢和坚决的自我牺牲精神占着主导地位。但是当他做了大官以后，他的粗鲁和生硬就盖过了其他品质。列宁过去曾经对他很有好感，这时愈来愈疏远他了。奥尔忠尼启泽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不和终于爆发了，列宁建议，由于奥尔忠尼启泽滥用职权，应该停止他的党籍一年到二年。

同样地，列宁对于捷尔任斯基的友善的关怀也冷淡下去了。捷尔任斯基由于他深刻的固有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突发的力量而与众不同。他不受权力的腐蚀。但是，他的能力往往与交付给他的任务不相称。中央委员会改选时，他总是重新当选。但是，只要列宁还活着他就没有希望进入政治局。1921年，也许是1922年，捷尔任斯基这个极端骄傲的人，用带着一点屈从的口吻向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人物看待。我当然尽我所能来消除这种印象。“他不把我当做组织者和政治家看待”，捷尔任斯基坚持说道。

“是什么东西让你这样想吧？”

“他顽固地拒绝接受我以铁道人民委员的身份向他打的报

告。”

列宁对捷尔任斯基在那个岗位上的工作成绩显然并不满意。事实上，就组织者这个词汇的广义而言，捷尔任斯基算不上是个组织者。他往往是把他的同事们集合起来根据他自己的性格而不是根据他的工作方法对他们加以组织。这显然不是整顿铁道人民委员部的办法。到了1922年，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十分不满，而且心情非常不愉快。斯大林马上招收了这两个人。

〔另外一种在造成斯大林的权势中起过显著作用的党的组织机构就是1920年9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最初提出要成立的所谓监察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监察委员会是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建立的，而不是像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那样是它的一部分。它有权考虑所有提出的申诉，并且“同中央委员会协商一致”作出判决，“在必要时”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向代表大会提出上诉以解决某些棘手的问题。类似的、但不受1920年9月的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那个委员会约束的监察委员会也在各州党代表大会上成立起来。尽管最初不是那样，后来这些监察委员会终于变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属分支机构。

〔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目的如下：

〔“建立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威望，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根绝官僚主义、个人野心和党员滥用党和苏维埃职权等使人堕落的罪恶，根绝破坏党内同志关系的行为，根绝散布有害于党和个别党员的荣誉并破坏党的团结和威望的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流言蜚语和诸如此类的传闻的做法。”

〔这些目的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足以使任何不为领导集团所喜的党员受到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颁布了反对

派别活动的条令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两样显然都是用来取消反对派的武器。第三件事即关于进行清党的决议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在1922年春天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最初建立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被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受权集中掌握各地监察委员会的活动，这些地方监察委员会于是干脆把惩处地方党委和州党委中难以驾驭的党员的职责接收了过来。此外，每个加盟共和国也都建立了直接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负责的监察委员会。另外一项关于设立检查部和党内侦探人员以加强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也被通过了。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七个委员中，只有老布尔什维克索尔茨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同索尔茨一道当选的三名新委员——什基里亚托夫、柯罗斯捷辽夫和穆拉诺夫——像他一样都是斯大林的政治上的盟友，而斯大林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总书记。这样一来，在1922年春天，斯大林就在最高中央监察委员会首脑会议的七个委员中取得四个委员的支持。

〔在此期间，党内产生了一种微妙然而深刻的变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为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已经摊出来了。它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展开的。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为首的所谓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纲领被领导集团谴责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偏向”。根据官方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纲领要求工会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不仅要把国家的职能而且要把党的职能也接管过来。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争论道，虽然在消费方面必须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但是在生产方面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必须坚持采用“突击方法”。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使工会机构从属于经济管理的行政系统”，而据反对他的人的说法，这却意味着把工会转变为国家机构。列宁认为，工会应该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并且比任何时期都更应该成为一种广大的

“共产主义学校”。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支持列宁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还发表了一些其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柯伦泰为首要发言人的各个集团之间的三角争论。讨论还不限于在党代表大会以内进行。在公开场合和所有苏维埃机构里都展开了讨论。

〔到了1922年3月27日和4月2日之间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这种自由讨论的气氛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在两次大会之间的一年中，由于各种小派别已经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明令禁止，反对派乃转入了“地下”，他们的秘密组织是如此完善，以至于由领导集团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些决议案都被否决了，而且由于投反对票的人太多，甚至不可能用欺骗的手段对投票结果进行“修正”。

〔反对派不只是在暗地里显示他们的胆量，而且在反对派分子梁赞诺夫在一次讲话中公开斥责领导集团，以及当代表们公开抗拒列宁提出的把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施略普尼柯夫、麦德维捷夫和柯伦泰开除出党的主张，并且顽固地拒绝这样做的时候，都有人发出强烈的赞同的表示。这种公开的反对是一种远为更广泛的暗中反对的迹象。领导集团认为，暗中的反对派是两者中更为恶劣的一种，因为在他们的阴谋诡计中孕育着令人痛苦的突然打击。很显然，由书记处的三名平行的书记均摊责任的做法，使得每一个书记都不愿意担负全部责任，因而无力担负由书记处指派“忠诚”的同志担任首要职务并选择“忠诚”的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职责。列宁及其亲信于是决定通过两个办法来加强书记处——设立总书记，使另外两名书记作为他的副手而不是平行的同事，并且选择最善于进行铁腕工作的人即约瑟夫·斯大林来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他的两个最忠实的走卒，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被选为他的副手。

〔斯大林在1922年4月2日当选为总书记。两个月之后列宁就患了重病。到这个时候，由于在他本人的尽力纵容下各种机缘的凑合，斯大林在权势上已经掌握了战略性的地位。如果列宁很快就康复了的话，斯大林有可能重归于默默无闻——当然只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必然。但是列宁的病势每况愈下。〕

按照官方的说法，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是亲密而友善的。实际上，这两个政治人物不仅由于他们在年龄上相差十岁，而且由于他们在性格上的迥然不同而彼此相距甚远。他们二人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友谊。毫无疑问，列宁是在1907到1913年间反动势力猖獗的艰难岁月中赏识了斯大林的实际的组织才干的。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斯大林的粗暴一再使他感到厌恶，越来越妨碍他们之间的顺利合作。斯大林之所以继续秘密地反对列宁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点。满怀嫉妒和野心的斯大林，处处都感觉到列宁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上比他高超得多，不能不日益变得抗命不羁。〔尽管程度上随时有所不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所有实际工作中尚称满意地〕维持着，直到列宁因患重病〔而不能积极参与国事〕时为止，这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斗争，最后以破裂而达于顶点。

〔早在1920年春天〕庆祝列宁的50寿辰的仪式上，斯大林就发表了一通演说，数说列宁的错误。很难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篇演说叫人听起来那样不入耳，以至第二天，4月2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在报道这次庆祝会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谈到了他们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期间的几件事”，再没有别的了。然而同时斯大林又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在一篇题为《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的一般性的纪念文章中表明，他向列宁学习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学习些什么。这篇文章就其理论和文学价值而言是不值一看的。只要提一

下这篇文章是用这个论断开头的就够了：

“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①

他的论断当然适用于英国，不过他却没有引英国作例子，但是它不适用于法国，而对于德国就完全不适用了，在那个国家里，党是白手起家把工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斯大林对于欧洲的工人运动史还同1920年那样一无所知，因此，要想从他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理论上的指导是毫无意义的。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意思还不仅在于它的标题，而且在于斯大林关于列宁的全部想法。斯大林赞扬列宁首先是个组织者，其次才是政治领袖。斯大林首先提到“列宁（同志）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列宁的组织计划受到了赞扬，因为他“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

再者：

“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②

只是在这一段话以后斯大林才又写道：“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③接着又转到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它的纲领和策略上去。说一句不算夸张的话，没有别的马克

①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0页。——译者注

②③ 同上书，第132页。——译者注

思主义者，或者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会对列宁作出这样的估价。的确，组织问题并不是政策的基础，相反地却是理论、纲领和实践形成以后所得出来的推论。然而，斯大林把组织问题这个杠杆当做基础看待却并不是偶然的，所有涉及纲领和政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实质上永远是组织这个基础的装饰品。

在那同一篇文章里，斯大林最后一次多少有点正确地形成了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即无产阶级在我们的时代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情况下应该起的作用。斯大林以嘲笑孟什维克的口吻写道，在那些没有把过去的革命的历史学通的人看来，似乎“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

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派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①

奇怪的是，不过三年以后，斯大林就把这种孟什维克的观念不折不扣地运用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去，后来又以远为嘲讽的态度运用到1931到1939年间发生的西班牙革命上去。如果当时斯大林真正消化了并且彻底理解了列宁主义对革命的概念的话，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但是，斯大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宁主义有关党的中央集权机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这个概念，就再也看不见它的理论考虑上的根源，它的纲领上的基础也变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于他自己的过去，他自己的社会出身、培养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在1917年，只是由于列宁不容许他那样做，他才

^①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4页。——译者注

没有实现同孟什维克的合流；在中国革命期间，他打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实现的却完全是孟什维克的理想，用布尔什维克的手段，亦即他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实施着孟什维克的纲领。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绝顶的效率推行着同样的政策。

由此看来，如果说斯大林这篇论列宁的文章（它从那时以来已经无数次用许多文字大量再版）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这个题材的颇为头脑简单的论述的话，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作者的政治性质的线索。它甚至于包含着一些在某种意义上自传性质的字句：

“我们的同志（不仅是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①

1920年，斯大林还像在1913年那样认为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此外，他在为列宁的这种倾向作辩护的时候并没有消除掉列宁被指控为喜欢夸张、喜欢走极端的罪名。

〔列宁卫护每一个有长处的干部，就像卫护他自己的眼珠一样。他对于他们都是很慈爱的。我们看到他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坐在因患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而将要死去的斯维尔德洛夫的床边，同他交谈了“10到15分钟”。我们看到他责备瞿鲁巴说，“亲爱的亚·德·！你这种对待国家财富的态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给你的命令是：疗养三个星期！你必须服从医院领导送你到疗养院去的决定。那么帮帮我的忙吧，不注意你的衰弱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你必须恢复健康！”同样，当斯大林在1920年12月进莫斯科的索尔达钦柯夫医院动手术以后，据斯大林的主治医生罗萨诺夫的说

^①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2页。——译者注

法，列宁〕

* “每天早晚两次打电话找我，而且不只是询问一下他的健康状况，而是坚持要我向他作极其详尽的报告。斯大林同志的手术很难做。在割阑尾的时候必须在周围切开很宽的口子，我们感到很难保证结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为此焦灼不安。‘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我说，‘马上打电话给我……不管是夜里，白天还是什么时候。’手术动过四、五天以后，看来已经不再会有危险了，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从心眼里欢呼出来，‘真太感谢你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每天打电话来麻烦你的。’

“有一次我到斯大林同志的寓所去，在那里碰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客气地同我打招呼，把我拉到一边，又向我提出了无数有关斯大林同志的病况和治疗的问题。我说需要送他去休养以便他能够在严重的手术后很好地恢复健康。他插口道：‘我也是对他这么说！但是他不愿意听我的话！不过，我会想办法料理这件事的。但是最好不要到疗养院去。我听说它们现在已经办得很不错，不过我还看不出它们好在哪里。’我建议说：‘为什么不让他到他家乡的山区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答道：‘你的想法很对！在那儿他可以躲得更远一些，谁也不能麻烦他了。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办妥。’”

〔但是，斯大林一直拖到翌年7月才到他的家乡格鲁吉亚去。在他重返格鲁吉亚期间，斯大林在那里遇到强烈的反对，他的病又发作起来。1921年7月25日，列宁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泽，他是斯大林的副手并且是在格鲁吉亚实行“缓靖”政策和计划的主要执行者：

“收到了您的第二〇六四号电报。请告知为斯大林看病的医生的姓名和地址。斯大林的休养被打断了几次？请用密码电报回复。您是否参加8月7日的全会？第八三五号。

列 宁”^①

〔1921年12月28日，列宁给他的秘书写了下面这张便条：

“明天请提醒我，我要会见斯大林，并请事先替我接通奥布赫（医生）的电话，以便询问斯大林的情况。

写于1921年12月28日”^②

〔不到三个月，列宁就病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了，但是他还是挣扎着参加了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又过了两个月，列宁说话已经感到困难，右臂和右腿的活动也不方便了。原因是1922年5月26日发生的一次急性的动脉硬化症，这个消息直到6月4号才公布出去。经过一个夏天的时好时坏，列宁在10月间恢复了工作，11月间甚至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演说。但是12月16日他的病又发作了，他的右半身全部瘫痪了，由于病势过于沉重，他没有能参加在12月底举行的俄罗斯共和国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新建立的苏维埃联邦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再也不能积极参与苏联的国家大事了。就像站在尼波山上的摩西一样，他从远处看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天堂，在病势发作的间歇当中，他还抓住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口述了他最后的训诫——他的遗嘱，这是在1923年1月4日完成的；以及他的《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日记摘录》等论文。在这几个月里，列宁完成了他最后的创作活动。在3月5日到6日之间的夜晚，他的创作活动达到了顶点，列宁口授了他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3月9日他的病第三次也是

① 《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的电报》。《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0页。——译者注

② 《致莉·亚·福季耶娃》。《列宁全集》第52卷，中文第2版第167页。——译者注

最严重地发作了，再加上失眠和神经过度兴奋使他陷于可怕的痛苦之中。他说话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他陷入半身不遂的困境。但是，他要活下去、要活动的意志是顽强不屈的。

〔到了第二年夏末，他的健康稍有好转，长期失眠的恶症也消除了，他开始像小孩一样重新学走路，到了秋天他又重新学说话。10月间他已经能够拄着手杖走路，他曾经亲自驾车到莫斯科去，看了看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室，在回高尔克村的路上，他又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农业展览馆。他每天都挑选一些书籍和文章要别人读给他听。他逐渐恢复了说话的能力。看来，他完全康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在1924年1月20日他醒来的时候感到身体不舒服，说有点头痛，不想吃饭，全身都不自在。第二天，他还是不舒服，在侍从的劝说下吃了一顿早饭和午饭。午饭后他躺下睡觉。下午6点钟，他的病又严重发作了，呼吸越来越困难，脸色苍白，体温急剧上升，昏迷不醒，50分钟后列宁与世长辞了。脑溢血使他的呼吸器官失去作用，夺去了他的生命。整整15年零7个月之后，他在世人所谓的列宁—托洛茨基政府中的伙伴，也因为脑溢血而死去，然而这一次却是一个不那么巧妙的凶手的斧子所造成的。列宁死的时候差三个月不到54岁；托洛茨基死的时候比他大七岁。斯大林，这个连最袒护他的美国记者在耐心地为他辩护了17年之后也都把他描绘成“一种猛兽，它先用爪子扒一下自己的猎获物来试试它的力量，随后把猎获物打伤，退后一步来看看效果如何，最后才把猎获物结果掉”的人，却比他们两个都死得晚。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早在列宁患病的期间就已经安排下了。

〔当列宁的病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包括苏俄在内的全世界的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印象是，他的病并不严重，很快就可以恢复工作。他是一个身体和意志都十分坚强的人，还只不过50来岁。政治局的委员们最初也都真诚地抱着这种看法。后来，他们了解到情况

恰恰相反，但是他们也没有纠正大家的看法，甚至于没有把真相告诉苏联的工农群众和党内一般同志。既然列宁只是暂时患病，政治局当然就继续行使职权。尽管一般公众认为托洛茨基是最有希望继承列宁的人，尽管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抱同样的看法，然而，党领导机构里的政治庸人们却并不认为这个几年前还是个反对派的托洛茨基有资格继承他们的伊里奇，他们也不认为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中有谁能够继承列宁。这些委员相形之下都不过是些庸从而已。不管列宁是暂时患病还是长期离职，唯一能继承他的是一个由党的高级干部，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据说，这样的指导委员会在列宁患病后不久就成立了。

〔但是，实际上成立的是一种变态的机构。继承权落到一个三人小组手中，这个小组以季诺维也夫为首，以加米涅夫为副，而斯大林是最年轻的成员。就这样，季诺维也夫由于在政治局中得到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好歹成了列宁的继承者。他之所以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并不是由于大家认为他的能力最强最有资格，相反地因为他们认为他最缺乏领导能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最脆弱。在政治局的7个委员中，列宁病了；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列宁的当然继承者的看法得不到支持，这种在党的领导机构以外广泛流传的看法使他成为政治局里和党内庸人眼中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人；季诺维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支持，他们认为，在他的领导下可以最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并采取行动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出头露面，只好勉强表示支持；而托姆斯基则被迫表示支持。在政治局内部以及在季诺维也夫同样得到多数委员支持的中央委员会内部，除了他本人以外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他只不过是个代行领导职务的傀儡，只有在他所采取的措施符合其他人的愿望的情况下，他才能保住这个名誉地位，直

到真正的领袖作好准备来取而代之的时候为止。

〔列宁希望谁来继承他呢？一直到1922年12月16日他的病第二次发作使他躺下来之前，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满心期望可以恢复健康，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在几天以后写的遗嘱中，显然是试图就各个继任人选提出坦率的意见，而不是作出硬性的决定。正由于他的压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权，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提出他赞成和反对的方面，推荐人选，特别是提到由于斯大林的“粗鲁”和“不忠”应该免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但是除了提出关于他的继任人怎样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严重争执会给党和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带来灾难的警告之外，再也没有说什么别的。然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发现不得不采取决然而义无反顾的步骤，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斯大林断绝了同志关系——这意味着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联系。这个“革出教门”的行动发生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列宁在他的病第三次严重复发之下卧床不起，没有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个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也是第一个充满着由总书记亲手挑选的代表的大会，它标志着列宁主义政权末日的开始，标志着斯大林主义这个新的政治方向的降临。

〔列宁同斯大林的破裂，在列宁作了多次的耐心的努力以求避免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最亲近的盟友在1922年11月底支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职，以期利用后者对我的敌视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时候，列宁对这个人选表示了异议，〔他在同他的密友们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中〕这样说道，“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列宁很担心他的病会复发，他急于要利用他的病再度发作并可能引起致命的危险以前的时间，通过一致的协议，特别是同斯

大林本人的协议，来建立一种和谐的集体领导。（因此他作了热忱的努力使他自己的工作同书记处的工作互相配合起来。他极其注意维护斯大林的威望。直到1922年10月21日，列宁还在一封措词尖锐的电报中批驳了格鲁吉亚反对派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提出的十分激忿的抗议。同样地，他继续给他支持，要不然就把在其他问题上对他的批评缩小为温和的责备。只是在列宁终于坚信斯大林是不可救药的时候，事情才爆发了出来。格鲁吉亚问题只不过是导致最后破裂的若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

斯大林对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武库所贡献的惟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那是1913年的事。文章的内容大体上是他本人在高加索所作的考察的总结，从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得出来的结论，以及，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从列宁那里抄来的泛泛的历史性的论述。从文笔上看来，斯大林把这些都当做他自己的东西，就是说，把它们同他自己的结论联系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消化这些论点，而且肯定并没有吸收这些论点。这一点在苏维埃的年代里充分暴露了出来，已经用白纸黑字的形式解决了的问题又以头等重要的行政工作的形式再度出现，而且使所有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受到它们的支配。直到这个时候才看出来，所谓斯大林与列宁在一切事物上的一致性，特别是斯大林在1913年所写的那篇论文中所保证的他们之间在民族问题的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在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宣读了他的必不可少的民族问题的报告。正如同他惯常的经验主义的做法那样，他不是根据活生生的材料，不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经验，而是根据互相毫无关联的抽象来作出他的结论。他在1921年还重复着与1917年同样的论点，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它们的民族问题，而苏维埃国土却有着解决这种问题的一切可能。报告引

起了不满，甚至于迷惑。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对这个问题最感到兴趣的代表，主要是少数民族代表，表示对报告感到不满。甚至于当时已经是斯大林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而后来是他的最忠诚的扈从之一的米高扬都抱怨说，党需要这样的指示，即“在边疆地区究竟应该作些什么样的制度上的改革，应该建立什么样类型的苏维埃制度……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并没有指出。”

对于斯大林，原则从来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民族问题上也许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更是如此。在他看来，眼前的行政工作总是比一切历史法则要重大得多。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有在党委允许之下才会注意到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之所以保卫地下运动，只是由于他的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在二月革命以后，那种机器同不合法斗争一道被打碎了的时候，斯大林又看不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且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派联合起来。最后，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以后，一切任务，一切问题，一切前途都被置于国家这个工具中的工具的需要之下了。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不再从他在1913年竭力颂扬的历史法则的观点出发，而是从行政机构的方便的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这样一来，他必然发现自己同最落后的，最受压迫的民族的要求大为相左，并且为大俄罗斯的官僚帝国主义获致了不应有的权益。

格鲁吉亚人民在成份上几乎完全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强烈地反对把他们的国家苏维埃化。但是由此引起的巨大困难却由于采用了军事武断的方式和方法来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而大大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对于格鲁吉亚的群众，需要采取加倍审慎的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不和，列宁坚持对格鲁吉亚以及一般说来对外高加索采取一种格外灵活、谨慎而耐心的政策，而斯大林则认为，既然国家机器已

经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地位是稳固的。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理人是奥尔忠尼启泽，这个头脑发热而性情急躁的格鲁吉亚的征服者认为，每一件反抗的表示都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斯大林似乎忘记了不久以前〕我们已经承认了格鲁吉亚的独立并且同它签订了条约。〔那是1920年5月7日的事。但是在1921年2月11日，〕红军部队已经奉斯大林的命令侵入了格鲁吉亚并且使我们面临着既成事实。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写道：

“斯大林反对这项条约。他不愿意让他的故乡处在俄罗斯国家之外并且生活在他所厌恶的孟什维克党人的自由统治之下。他的野心驱使他攫取格鲁吉亚的统治权，然而，那里的和平而聪明的人民以冷冰冰的倔强抵御着他的摧毁性的宣传……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要向那些孟什维克领袖报复，因为他们曾经坚决拒绝支持他的乌托邦计划并且把他从他们的队伍当中开除出去。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意志，根据他自己的狂妄自大的主观决定，把他的故乡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斯大林化了……斯大林在莫斯科组织了对格鲁吉亚的远征军并且亲自统率出征。1921年7月中旬，他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梯弗里斯。”

1921年斯大林到格鲁吉亚去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同过去故乡的人们对他的习惯的看法不同了，过去他被大家叫做沙夏，后来又叫做柯巴。现在他却是政府、无所不能的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了。然而，在格鲁吉亚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做领袖看待，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大家并不把他当做斯大林而是把他当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说，并不是根据他个人的品格而是根据他的职权来接待他。曾经同他一道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格鲁吉亚事务上至少同他一样有发言权，他们随便地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在他们不得不屈从他的意见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勉强，同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威胁说，

要把全部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还没有能成为领袖，甚至于在他自己的〔老巢里也是如此。这使他感到切肤之痛。他绝不能原谅这种对他的权威的冒犯〕，因为他是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是民族人民委员。他认为，自己在有关格鲁吉亚的事务上理所当然地要比党中央委员会所有其他委员都更有资格发言。在莫斯科，他作为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格鲁吉亚人而以权威自命，而在格鲁吉亚，他则以一个不受本地民族感情和成见影响的莫斯科代表的姿态出现。从他的做法看来他似乎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而是莫斯科派来的布尔什维克，是民族人民委员，而且对他来说，格鲁吉亚人似乎只不过是许多民族中的一个而已。他装出一副对格鲁吉亚的民族情况一无所知的模样——显然是为了弥补他本人青年时代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却做得有些过火。〔他的行为有点像一个大俄罗斯式的俄国归化人，任意践踏本民族人民的权利。〕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外国人俄罗斯化的做法。这个说法既适用于斯大林也适用于捷尔任斯基〔他是从波兰人变成俄国归化人的。根据显然夸大了事实的伊雷马什维利的说法：〕

* “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入侵部队中起初包括了若干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这个国家除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政治上的友谊之外，同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仍然是格鲁吉亚人，对于他们来说，祖国的独立重于一切……然而，斯大林却在他派去的俄国赤卫军和肃反委员会的协助下向他们宣战了。”

伊雷马什维利对我们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遭遇到普遍的敌视。在梯弗里斯社会党人在某剧院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成了敌对性示威的对象。可以想见，身为老孟什维克的伊雷马什维利本身控制了这次会议，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他。我们听说，其他发

言的人也同样谴责了斯大林。可惜，这些发言的速记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而大家也没有义务过分相信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话：

“一连几个钟头，斯大林被迫一语不发地听着反对他的人发言并且承认这些指控。斯大林竟然不得不容忍这样公开而勇敢的愤慨的发言，真是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事。”

〔接着发生的事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来说明。〕斯大林再一次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为了在格鲁吉亚给自己建立坚实的政治支持，他背着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借着奥尔忠尼启泽的帮助，同时也并非没有得到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在那里煽动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反对最优秀的党员的“革命”，同时背信弃义地用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把自己掩盖起来。由于他同格鲁吉亚的同志们开会的情况达不到列宁那里，斯大林就抓住这一点企图用假的情报把他包围起来。列宁觉察到有问题，就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处搜集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情况；经过研究，他决定把问题公开提出来。很难说，最使列宁感到震惊的是什么：是斯大林个人不忠诚呢，还是他长期以来无力把握住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两者都有。

〔在探索事实真相的同时，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一封纲领性的信件来阐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以便使同志们不至于就他在当前有争论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产生误解。12月30日，他口授了下述的便笺：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第二天，他口授了那封纲领性的信件：〕

* “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

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列宁是做得对的。如果他认识到局势的全部严重性还要把它轻描淡写，那就太可恶了，因为正如托洛茨基八年以后所描绘的那样，在他背后所发生的事，实际上是〕斯大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宁派击溃了。这是党内反动派的首次胜利。它掀开了革命的第二章〔——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

〔列宁终于不得不在 1923 年 3 月 6 日写信给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分子〕：

* “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并抄送：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致以敬意！

列 宁”

在此前一天，他口授了下面这封短信给我：

*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绝密。亲收

我请你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事件作辩护。这件事目前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表现公正无私。说实在的，恰恰相反！如果您同意为它进行辩护的话，那么我就会安心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不同意，请把所有的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谨致以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 宁”

〔他还通过他的两位私人秘书要托洛茨基也在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格鲁吉亚辩护。列宁的请求是用电话打来

的，而那些案卷——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和笔记——则是由格莉亚塞和福季耶娃两位小姐带给托洛茨基的，她们还随身带来了记录列宁口授信件的沃洛季契娃小姐写的一个便条，上面通知他说，接替列宁担任政治局和苏维埃内阁主席的加米涅夫“即将在星期三到格鲁吉亚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问你，你本人是否有什么信要带给他”。列宁的几位秘书在1923年3月7日，星期三那天，拜访了托洛茨基。]

“看了我们同你往来的信件之后，”格莉亚塞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那样就使得局面不一样了。他指示我把他原来打算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炸弹抛出去的原始材料交给你。”在这之前加米涅夫已经通知我说，列宁已经写了一封信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因此我建议说，既然加米涅夫要在当天动身到格鲁吉亚去参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把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给他看一下，让他好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福季耶娃回答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指示我把这封信交给加米涅夫同志，不过我可以问他一下。”几分钟之后，她带着下面的口信回来了：“千万别这么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把这封信给斯大林看的，斯大林可能作出糟糕的妥协，以便日后再来打击我们。”

“换句话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伊里奇认为甚至于在正确的做法下也不可能同斯大林达成妥协了，是不是？”我问道。

“是的，”她肯定地答道，“伊里奇不信任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枚炸弹。”

列宁的意图现在是十分清楚了。他要用斯大林的政策作例子，在党的面前揭露（而且是如此无情地揭露）把专政加以官僚主义式改造的危险。但是在这以后，紧接着，可能就在半个小时以内，

福季耶娃又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封信回来了。她说，他已经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写好了〔上面引过的〕那封便笺给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并且指示要把抄件交给加米涅夫和我。

“你对这个变化作何解释？”我问福季耶娃。

“显然”，她答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病情在恶化，他要赶快把能办的事情都办掉。”

〔两天以后列宁的病第三次复发了。

〔在代表大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4月16日的会议上，斯大林看来竭力要就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格鲁吉亚问题所写的笔记和信件，通过对托洛茨基的隐蔽的攻击来保护他自己。下列的托洛茨基写的两项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

* “中央委员会各委员：

机密第二〇〇 T

关于：斯大林同志4月16日的声明

（1）列宁同志的文章是秘密地并且是由列宁同志本人通过福季耶娃同志交给我的，而且，尽管我曾经表示想要把文章的内容告诉各政治局委员，列宁同志通过福季耶娃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2）由于在我收到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列宁同志的病况就恶化了，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通信自然也就终止了。

（3）不久之后，格莉亚塞同志向我要那篇文章，我就把它交回了。

（4）我把它抄了一份供我自己使用（为了修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为了写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5）列宁同志就他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文章和其他文件所作

这样就使得某些同志认为有理由在某些代表中间传播与那个声明相应的说法。

由于我不能容许在这件事情上有丝毫含糊之处——其原因当然是你所不难理解的——我认为有必要赶快制止这种情况。如果你在对这封信的答复中不能告诉我说，你将在今天之内向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提出声明，以扫除在这件事情上存在任何暧昧不明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将得出结论，认为你已经改变了你昨天的意图，我并将请求争议委员会对这件事进行彻查。

你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并且体会到，我之所以直到如今还没有采取这个步骤，并不是因为它会对我的利益有丝毫损害。

1923年4月18日。第二〇一号。”

4月23日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就民族问题发言的时候，在结束语中说道：

“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①

这些话无疑是历史上曾经记录在案的绝顶的阴险狡猾的典范。斯大林深深知道列宁是多么愤怒地反对他的民族政策，深深知道，只是由于患了重病，他的“导师”才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把他这位“门徒”轰到九霄云外去。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四、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215页。——译者注

第十二章 上台的道路

〔1923年初，对于那些了解政治局势的最高级领导人来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斯大林已把对他个人忠诚不渝的代表几乎塞满了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党内最高的权力机关。这种趋势使列宁十分震惊，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房间内，谈到我们苏维埃机关^①内官僚主义的可怕发展，谈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并要我积极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回答说：

“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我深信，在目前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忽略目前这种情况：在中央和各省，正在根据对某些党内有权势的人物和中央委员会本身内部的统治集团的忠诚，非常特别地挑选官员和专家，党员和非党员，担任甚至是区域和地方的职位。只要你向一个小官员进攻，你就会碰到一个重要的党领导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个工作。”

列宁想了一会后说——我是在逐字逐句引用他的话：

“换句话说，我是在建议发动一个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运动，而你是在建议把这个斗争扩大到包括党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在内？”

我没有料到这一点，我笑了，因为我当时心中没有想得这么

^① 政治机构的共产党用语。——原编者注

完整。我回答说：“我想，是这样”。

“那么，很好，”列宁应声说，“我建议组成一个集团。”

“同一个正人君子组织一个集团，这是件愉快的事。”我说。

当时协议：列宁提出一个关于成立这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以反对“一般的”官僚主义，特别是组织局内的官僚主义。他答应“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分别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列宁的健康变得更坏了。后来，他的秘书把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便条和信件带给我。他好几个月由于动脉硬化症而无法工作，对我们反对组织局内的官僚主义集团，不能做任何事情。显然，列宁的计划是针对斯大林的，尽管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是同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明白表示的思路是一致的。

〔如果斯大林在这个时候控制着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那么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内和中央委员会内仍控制着多数，因此，他是三头同盟中的头号人物。他同斯大林进行着无声的、隐蔽的然而却是激烈的斗争，争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内的多数。季诺维也夫完全控制着列宁格勒组织，而他的伙伴加米涅夫控制着莫斯科组织。这两个最重要的党中心只需得到另外几个大的党中心的支持，就能够获得代表大会的多数。这个多数对于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和批准有利于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是必需的。但是季诺维也夫没有能够获得多数。事实证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以外的绝大部分党组织都处于总书记的牢固控制下。〕

〔尽管这样，季诺维也夫有勇无谋，竟然坚持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列宁的地位。他在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从而取得了列宁继任者的地位。在筹备这次代表大会的期间，由于列宁患病不能出席，〕最棘手的问题是，谁应当作这个主旨报告，而自从建党以来，作主旨报告一直是列宁的不可旁贷的权利。这个问题在政治局提出的时候，斯大林第一个说：“政治报告当然

应当由托洛茨基同志来作。”

我不想作这个报告，因为在我看来，这等于在列宁患重病的时候宣布自己要取得列宁继任者地位的候补资格。我作了大致如下的回答：“这是一个临时时期。让我们希望列宁不久就会好起来。同时，这个报告应当由总书记来作，以符合他的职务。这可以消除无聊猜测的一切根据。此外，你和我在经济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而我是少数。”

“但是，假定没有分歧呢？”斯大林问，让我了解他准备作出很大的让步，那就是，达成一个卑鄙的妥协。

加里宁在我们谈话时插言进来。“什么分歧？”他问，“你的建议在政治局中总是得到通过的。”

我继续坚持由斯大林来作这个报告。

“无论如何”，他以一种做作的谦逊态度回答，“党不会了解的。这个报告必须由最孚众望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来作。”

〔这个问题最后由中央委员会内季诺维也夫多数作出了决定。这使得所有的党员都清楚地看到，季诺维也夫是作为党首脑的列宁的继任者。依靠他所控制的代表和三头同盟中他的小伙伴所控制的多数，他有一切理由期望，他以头号布尔什维克的身分登上讲坛作政治报告的时候，会受到热烈的欢呼。但是总书记欺骗了他在三头同盟中的这个伙伴：季诺维也夫没有得到通常的掌声。他的主旨报告是在差不多沉闷的静默中作的。代表们的裁决是明显的：季诺维也夫的新地位是篡夺来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1923年4月17日到25日开了一个星期。这次大会使斯大林在三头同盟中的地位从小伙伴上升到大伙伴。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的多数垮了。斯大林把这两个机构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系统方面。在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秘密头子；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都是他的人。但是，省、县和地方监察委员会都不在他的控制下，因为其中很多都是在他当总书记以前选出的。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原应由敌对的监察委员会处理的，或牵涉到斯大林政治机器的利益的案件，只要有可能，都以这种或那种借口移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不但这样，只要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这种或那种借口干脆撤销一些敌对的监察委员会。这种做法，加上在监察委员会的省会议和区域会议上的有组织的共谋，获得了很大的成果。

〔为了“审讯”和“清除”反对派，特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党纪检查委员会，完全是斯大林分子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的委员，由7人增加到50人，并有候补委员10人——有了更多的高位来酬劳忠诚的分子。而且，它的新规定的职能和它的实际活动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对象的特别的国家政治保安部。

〔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企图同最高级领导人做一笔交易来捞回他的政治财产。他动摇于这两个计划之间：1. 剥夺书记处的自行扩大的任命权，从而把书记处降低到它从前作为政治局的一个附属机构的地位；2. 使它“政治化”，这就是说，在书记处内成立一个由三个政治局委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它的最高机构，这三个人将是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这三人中的一人。他觉得，某种这样的组合，对抵消斯大林过大的势力是不可缺少的。

〔1923年9月，他在基斯洛沃茨克——高加索的一个温泉胜地——附近一个山洞内就这个问题开始举行他的会议。伏罗希洛

夫当时在罗斯托夫，接到了季诺维也夫邀请他出席会议的电报。斯大林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也接到了。出席会议的其他一些人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在一封致斯大林的、由自己亲自交给他最好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送交收件人的信中，写下了一个关于他在会上发表的意見的摘要。他透露：

“斯大林同志……回了一个语气粗鲁然而却是友好的电报……不久之后，他来了……他们作了几次谈话。最后决定我们不动书记处，但是，为了使组织工作同政治活动协调起来，我们派三个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这个并不非常实际的建议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而我们同意了……这三个政治局委员是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我。我出席组织局会议的次数，我想，有一两次。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连一次也没有来过。毫无结果……。”

〔实际上，满怀希望的季诺维也夫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出席一两次组织局会议，就是了解任何不属于斯大林机器的人要在那里“破门而入”是毫无希望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至少有不参加会议的远见和想像力。

〔同时，德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但是三巨头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同盟者仍在忙于破坏声望过高的托洛茨基的威望，忙于互相厮杀，只能偶或对这个最重要的世界革命问题敷衍了事地过问一下。德国同志们得到的长期指示是：充分使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后来，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从6月12日到24日，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谈论革命。

〔激昂的德国群众——他们在城市中有1500万，在乡村中有700万——支持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但是由于列宁瘫痪了，不能

说话；由于托洛茨基受到党纪的限制，由于他在政治局内处境孤立从而在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发出任何命令，什么动静也没有。在1923年这个关系重大的8月中，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首脑）和布哈林（公认的“仅次于列宁的头号共产主义理论家”）写了下面这些话：

“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不是应当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问题。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如（1）实现和平的保证；（2）土地归于农民这一口号；（3）工人阶级中极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目前，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当然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他们的邻国，而这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什么呢？……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分子并不是在睡觉；但是，让他们先进行攻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可以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并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表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软弱的。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去鼓动他们。”

〔这个三头同盟首席成员和苏联共产党秘密头子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首脑的一个命令，后者就相应地拟出了他对德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指示。像一切这种意见一样，它是“保密的”、“机密的”，当时并不是普遍都知道的。托洛茨基不知道斯大

林的秘密“意见”，但是很了解德国形势的严重性，要求立即为德国起义规定一个距离当时八个到十个星期的灵活的临时日期，并且立即开始作相应的准备。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是受斯大林摆布的。

〔布兰德勒在9月初来到莫斯科请求指示和帮助，但是他甚至不能见到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被人从这个机关推到那个机关，后来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面前来陈述他所了解的德国形势和他的看法。他们给布兰德勒的指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6月里作出的决定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参加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来组织一个工人政府。布兰德勒表示不愿意，他们就对他说，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更好地为起义作准备。斯大林对进一步提出来的一些论点的答复是专断地下令立即参加，而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的首脑，向萨克森共产党发出一个电令，要它马上参加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但如此，还指示布兰德勒自己也参加政府。这样，如果他不服从的话，他只好放弃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屈服了。

〔在9月底开始进行的仓促的准备是非常不充分的，而且组织得也非常不好。德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共产党中心组织了战斗队——所谓红色百人队，并命令他们处于准备状态，等待作为将于10月20、21日在开姆尼兹举行的一个会议的结果而发出的信号。起义预定在萨克森发动。如果起义按照计划发展，共产党就加以领导；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党将拒绝承担一切责任，躲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保护色背后，它企图依靠社会民主党的帮助，来抵挡不可避免的反应。

〔这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做法。1917年10月，他就在俄国这样做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进行辩论时，他秘密支持公开反对列宁坚持起义的主张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时锐利地

留心观察哪一方在实际上得胜。在俄国，他对起义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并没有把准备起义的任务交给他。但是，在1923年的德国局势中，他是最高首脑。

〔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在10月21日举行的开姆尼兹会议上拒绝布兰德勒关于发动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建议时，布兰德勒发出了他按照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指示所能发出的惟一信号：他取消了革命。但是在规定一次德国革命的日期后，又加以取消，然后又规定，这不是第一次。但是，对于一个迫不及待地要发动行动的革命党来说，不能期望它无限期地像水龙头那样听话。在开姆尼兹发出取消的命令后两天，起义在汉堡开始了。一切都毫无目的。战士们没人领导也没有目标。起义失败了。本来可以成为一次革命的行动变成了一次毫无意义的、罪恶的冒险。这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逐步发展的事件中的第一个事件，它是1933年对希特勒第一次投降的首次大预演。

〔德国起义的失败在苏联共产党内立即有了反响。那些真诚的布尔什维克感到不安。他们坚持要对党领导人的作为进行不只是敷衍了事的检查。他们要在公开辩论中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第一个要求是恢复在党内组织集团的权利。这个权利是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紧急时期中取消的。自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对三头同盟的统治的不满就一直在增长，这种不满也不只是针对三巨头的，它是针对整个中央委员会的。46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有皮达科夫、萨普罗诺夫、谢雷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辛斯基、德罗布尼斯、阿尔斯基、弗·姆·斯米尔诺夫，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说：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它对党内的主动性起破坏作用。它用一个政治机器替代党……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它工作得很好，但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它必然失灵，而且在即将

来临的严重发展面前，它有彻底破产的可能。造成目前形势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客观地发展的派别独裁制度已不再有用。”

〔这46人对9月全会关于在党内“扩大民主”的空洞表示并不满意。不但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内，而且在党组织内组织了抗议集会，对群众进行了反对官僚主义制度的鼓动。

〔日益高涨的抗议运动有发展成为一个左派统一反对派的危险。为了促使这一运动发生变化，季诺维也夫代表三头同盟在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六周年的时候于《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党内有“工人民主”，从而使讨论合法化了。同时，最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谈判，最后导致政治局起草、并由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12月5日通过一项决议。在这项决议中，诸如官僚主义、特权之类的这些弊端遭到了谴责，并且庄严地保证恢复批评和调查的权利以及使一切职位通过公正的选举产生的权利。托洛茨基自从11月初起就一直患病，因此无法参加大讨论，他同所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一起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字。

〔最高级方面的斗争在这样严守秘密的情况中一直进行了将近两年，以致整个党对此毫无所知，除了极少数受到信任的核心人物以外，所有的人一般都认为托洛茨基是现行制度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他决定发表一个说明他自己态度的声明，作为他在12月5日中央委员会决议上签字的一个补充。他在这个声明中，坦率地说明他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布尔什维克运动在政治上蜕化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他号召青年鄙弃消极服从、向上爬的思想和奴性，并且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12月5日中央委员会决议所概述的新方针应当首先使每一个人清楚地理解到：“今后谁也不应对党采用恐怖手段”。

〔这封信在最高级领导人中间引起了愤怒的风暴。最最激烈的

是季诺维也夫。如布哈林在四年后的一次派别斗争所透露的，季诺维也夫坚持逮捕托洛茨基，因为他那封关于“新方针”的信件意味着“背叛”。而且，尽管这次讨论是经过正式许可的，但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却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总书记和三巨头首席成员的政治机器也是这样。为了给将于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奠定基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于1924年1月16日到18日举行。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斯大林的报告以下列的话谴责亲民主的讨论和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提出了打破党机关的口号，并企图把重心从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转移到反对党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上去。客观地说，这种毫无根据的批评和破坏党机关声誉的露骨企图，除了使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影响外，不能导致任何其他的结果。……”

〔而这当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最后，政治局命令正在患病的托洛茨基到高加索去进行治疗。这是放逐，是使他暂时离开政治中心的一种有礼貌的做法（由于他的声望，他们不得不对他客气一些）。患病的托洛茨基还没有到达高加索，就接到斯大林的一个电报，说列宁——他的健康近来一直在改善中——突然逝世了。〕

在政治上，斯大林和我长久处于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阵营中。但是，某些人总是谈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总是首先推断，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不仅是关于这个莫斯科独裁者的，而且关于苏联的一切东西，都出于这种情绪。在我目前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克里姆林宫那些文字代理人总是毫不费劲地提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从而使自己无需对我写的关于苏联的任何东西作出切题的答复。已故的弗洛伊德最不赞成这种廉价的心理分析。怨

恨毕竟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但是斯大林和我已被烈火似的事件所隔离，以至任何个人的东西都已在火焰中烧掉，变成灰烬，什么东西也不剩了。怨恨含有嫉妒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无论在思想和感情上，斯大林空前的高升意味着最深的堕落。斯大林是我的敌人。但是希特勒也是我的敌人，墨索里尼也是，许多别的人也是。今天，我对斯大林没有什么“怨恨”，就像对希特勒、佛朗哥和日本天皇一样。主要的是，我想了解他们，以便使自己有很好的能力同他们斗争。一般地说，在有历史重要意义的事情中，个人怨恨是一种渺小的、可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但是使人堕落而且是使人盲目，但是，从世界舞台上以及苏联国内最近一些事件来看，就连我的许多反对者也深信，我并不是那样盲目：我的那些看来极不可能实现的预言已证明是真实的。

由于我将要叙述一个特别令人气愤的主题，先讲这几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就更其必要了。我力图根据对他的密切观察和他传记的苦心研究，对斯大林的性格作一个一般的描述。我并不否认，这样描述出来的形象是阴沉的，甚至是奸险的。但是我敢问任何人：能不能换上另一个稍具人性的人来干出过去几年中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大规模“清洗”、史无前例的指控、荒谬绝伦的审讯、消灭整个革命的一代，以及最后，最近在国际舞台上的阴谋。现在我要从一个地方革命者怎样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独裁者的经过情况中提出一些相当奇怪的事实，并附述某些想法和怀疑。这些想法和怀疑，我不是一下就有的。它们是慢慢地成熟的，过去每当我有这种想法或怀疑时，我总是把他们丢开，认为他们是过分的不信任造成的。但是，莫斯科审讯——这些审讯透露了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搞的一套阴谋、作伪、捏造、暗中下毒和谋杀的可怕手段——暴露了以前几年的可怕情况。我开始不断地问自己：在列宁患病的时候，斯大林实际上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个门

徒有没有做什么事来加速他主人的死亡？

我比任何别的人更了解这种怀疑是使人吃惊的，但是从情况、事实和斯大林的性格来看，不能不有这种怀疑。在1922年，聪颖的列宁警告说：“这个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这些菜证明不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这不仅是比喻的说法，而且实际上真是这样。两年前^①我第一次写下了在当时（1923年至1924年）只有七八个人知道的事实，而且那时只写下了一部分。在这几个人当中，除了我自己外，现在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活着。但是这两个人——就算莫洛托夫是核心人物中间的一个，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没有坦白我现在要讲的情况的动机。我应当补充一句：凡是我提到的一切事实，一切引证和引语，都可以由苏联官方出版物或我的档案保存的文件加以证实。我曾有机会向调查莫斯科审讯的约翰·杜威博士委员会提供过口头和书面的说明，而我提出的几百个文件，没有一个被指责为假的。

过去几年中绘制的数量很多的（我们不谈质量）肖像画，老是画着由斯大林伴随的列宁。他们并排坐着，在一起商量，互相凝视着，很友好的样子。在绘画、雕塑、银幕上一再突出这个主题，是为了想使人们忘掉，在列宁在世的最后一个时期中，充满了他同斯大林的激烈冲突，一直发展到两人彻底决裂。同样，列宁反对斯大林，其中也毫无个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他非常重视斯大林的某些特点，他的坚定的性格、坚韧，甚至他的残忍无情和阴谋才能，这些特点在斗争中、因此在党总部内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越来越利用他的职位所提供的机会来收罗忠于他个人的人和对他的反对者进行报复。斯大林在1919

^① 大概是在1937年，因为这一部分是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中，或10月左右以杂志文章的形式写成的。——原编者注

年成为监察人民委员部^①的首脑以后，逐渐把这个机关变成一个徇私和阴谋的工具。他把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变成给人恩惠和降祸施福的不竭的泉源。他同样滥用自己作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在他一切行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个人的动机。列宁逐渐深信，斯大林由于掌握政治机器而发展的某些特点，对党是直接有害的。因此，他决心把斯大林调离这个机器，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今天的苏联，列宁这个时期的信件是最忌讳的文件。幸运的是，这些信件中有一些副本和影印副本存在我的档案中，其中有一些我已经发表了。

1921年年底，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第二年的春天，他第一次中风。他有两个月不能动，不能说，也不能写。从7月起，他开始慢慢地复元。10月，他从乡间回到克里姆林宫，再次拿起工作。党机关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专断作风和阴谋的蔓延，真正地震撼了他。12月，他就民族政策路线，特别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实施的民族政策路线（在格鲁吉亚，总书记的威信遭到公开的蔑视），对斯大林的迫害行为开火。他出来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反对斯大林，并且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报告。据列宁的秘书们说，列宁自己把这个报告称为“对斯大林的一枚炸弹”。1月23日，使总书记大为惶恐的是，他提出了组织工人监察委员会^②来制约官僚主义的权力的计划。列宁在3月2日写道，“让我们坦白地说，监察人民委员部今天毫无威信可言……我们没有比监察人民委员部更坏的机关了……”等等。领导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是斯大林。他很懂得这些话的含义。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的健康又恶化了，他无法出席会议，

① 工农检查院的另一个名称。——原编者注

② 不要同当时已经在活动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相混。——原编者注

用例条和电话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斯大林立即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对列宁隐瞒集中于党书记处的许多情报。对最接近列宁的那些人实行了封锁。克鲁普斯卡娅尽了她最大的力量不让病人受到书记处敌意的冲击。但是列宁知道怎样把一些零星的、几乎无法觉察到的迹象拼凑起来，得出形势的全貌。“别让他忧虑！”医生坚持。但是说比做起来容易。卧床不起，同外界隔离的列宁十分震惊和愤怒。使他忧虑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医生关于列宁健康的报告越加不利，总书记的行为就越加大胆。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闷闷不乐，紧紧地咬着他的烟斗，他的猜忌的眼中露出阴险的光芒，回答别人时总是咆哮。他的命运是在危险中。他下定决心克服一切障碍。这就是他同列宁最后决裂的时候。

前苏联外交家季米特里耶夫斯基——他同斯大林非常友好——讲起过这个在总书记的随从们中间传播的戏剧性的插曲：

“由于克鲁普斯卡娅经常打扰他，他就非常讨厌她。有一次，克鲁普斯卡娅又打电话到乡下来找他要一些情况，斯大林……用最狂暴的话斥责她。克鲁普斯卡娅满面流泪，立即向列宁诉说。列宁的神经已经由于看到种种阴谋而紧张得快要破裂，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克鲁普斯卡娅赶忙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但是，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的，’克鲁普斯卡娅胜利地对加米涅夫说。‘如果他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斯大林，他是决不会下决心断绝私人关系的。’”

克鲁普斯卡娅的确说过这些话，但决非是“胜利地”说这些话；相反的，这个非常真诚和敏感的妇人对这件事非常不安和担心。说她向列宁“诉说”是不确的，相反的，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起了缓冲的作用。但是，在回答列宁不断的询问时，她向他讲的东西，不可能比书记处告诉她的东西更多，而斯大林隐瞒了最重要的事情。3月6日向一个可靠的速记员口授的这封绝交

信，或者毋宁说是寥寥数行的便条，冷冷地宣布断绝“同斯大林的一切私人 and 同志关系”。这个便条是列宁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文件，同时也是他同斯大林的关系的最后总结。接着，列宁最重的一次中风发作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一年后，当列宁已经涂上防腐剂躺在他的陵墓中的时候，造成这次决裂的责任尽管从季米特里耶夫斯基所讲的情况看来很明显，竟然公开推到克鲁普斯卡娅的身上。斯大林指责她“阴谋”反对他。臭名昭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他常常替斯大林办一些暧昧的差使）1926年7月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他们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向病中的列宁诉说他们受到斯大林伤害。多么可耻——用私人问题使关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的政策复杂化！”这里，所谓“他们”指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她由于列宁触怒斯大林而受到报复性的惩罚。至于克鲁普斯卡娅，她告诉我说，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极不信任。“沃洛佳说：‘他’（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她的头朝斯大林的房间摆了一摆）‘没有最起码的正直，没有最微小的、人的正直……。’”

所谓列宁的“遗嘱”——即他关于怎样组织党领导机构的最后的意见——是在他第二次卧病期分两次写成的：第一次是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是在1923年1月4日。遗嘱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十天后，这种克制的措词对列宁说来好像不够了，他加上了一段附言：“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应当“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

^① 参看《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页。——译者注

较少任性等等。”^①列宁试图用尽可能没有刺激性的话来表示他对斯大林的敬重：但是，他的确提出了解除斯大林这个可以赋予他权力的职位的问题。

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这个遗嘱对斯大林不可能是一个意外。尽管这样，他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他在自己的秘书、后任红军政治首脑的梅赫利亚和著名的苏联政治家西尔佐夫（他以后就不见了）的面前第一次读这个遗嘱时（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他提交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他对列宁破口大骂，发泄他在这些日子中对他的“主人”的真实感情。巴让诺夫，斯大林的另一个以前的秘书，叙述了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宣布这个遗嘱时会上的情况。“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十分窘迫，瘫痪在那里。斯大林坐在主席团讲坛的踏步上，觉得羞耻和悲惨。我对他作了密切的观察：尽管他自制和表现出镇静，但是很明显，他的命运正处在危险中……”拉狄克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上坐在我的旁边，他靠过身子来说：“他们现在不敢反对你了。”他注意到信中两个地方：一处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会内最能干的人”，另一处是鉴于斯大林的粗暴、不忠和滥用权力的倾向而要求撤换斯大林。我对拉狄克说：“正相反，他们现在不得不一直搞到底，而且，要尽快地搞。”实际上，遗嘱不但没有能够结束内部斗争（这是列宁所希望的），反而加剧了这个斗争，使它达到狂热的高度。斯大林再也不可能怀疑，列宁恢复活动意味着总书记在政治上的死亡。倒过来说，只有列宁死掉，才能给斯大林扫清道路。

^① 参看《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页。——译者注

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作者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又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他的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通过一个我们共同的大夫盖蒂埃医生，我能够逐日了解列宁的病况。盖蒂埃医生也是我们全家的一个朋友。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能不能说已经完了？”我的妻子和我常常问他。

“根本不能这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够再次康复。他的体质很强壮。”

“他的精神机能呢？”

“基本上，它们将完整无损。也许，并不是每一个音调都会保持它以前的纯正，但是这个巨匠仍将是巨匠。”

我们继续抱着希望。但是，我现在意外地听到这种情况：似乎是生存意志的化身本身的列宁为自己要求毒药。他的内心状态该是怎么样的！

我回想，斯大林的脸色在我看来是多么异常、暧昧，同当时的环境是多么不调和。他向我们转达的要求是凄惨的，但是他的脸上挂着一种阴沉的微笑，像挂在假面具上一样。他面部表情和他说话不一致，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是不熟悉。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使人无法忍受的。使得这种情景更加可怖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要求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仿佛在观望别人要说些什么。他是不是想抓住我们对这一要求的反应的含意，而不使自己不表示态度？或者，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隐蔽的想法？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挚爱列宁的加米涅夫脸色苍白，默不作声；季诺维也夫手足无措，像他

在困难时刻一直表现的那样。他们是不是甚至在这次会议之前就
知道列宁的这个要求？还是斯大林突然向三头同盟内的同盟者和
我讲这件事？

“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我喊道。“盖蒂
埃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

“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
“但是 he 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
……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无论如何，这是谈不到的，”我坚持——这一回，我想，有
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他可能一时冲动，走不可挽回的一步。”

“老头子是在受苦，”斯大林重复说，茫然望着我们，像以前
那样；也不说怎么办。他心里一定在想一个同这些谈话有关的、然
而与之并不协调的念头。

当然，以后的事情可能影响我的回忆的某些细节，尽管一般
地说，我知道，我的记忆是可靠的。但是，这个插曲是永远不可
磨灭地留在心上的事件之一。而且，我一回到家里，就把这件事
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的妻子。自从那时以后，每当我回想这一幕
的时候，我不得不一再对自己说：斯大林的行为，他的整个态度
是无法理解的，是阴险的。这个人要什么？他为什么不去掉他假
面具上的阴险的微笑？……没有进行表决，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式
的会议，但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都有一个没有讲明的理解：我
们甚至不能考虑把毒药交给列宁。

这里自然会发生这个问题：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
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
着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
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
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

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惨的要求的惟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兴趣来这样做。这个病人，凭着他万无一失的直觉，猜到克里姆林宫内外发生的事，以及斯大林对他的真正想法。列宁甚至无需审阅他最亲密的同志的名单就能断定，除了斯大林，没有人会帮他这个“忙”。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中于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些日子里，列宁不仅想到死，而且还想到党的命运。列宁的革命的神经无疑是他神经中最不容易向死亡投降的神经。

当柯巴还是一个给关在监狱里的十分年轻的人的时候，他就常常暗中唆使暴躁的高加索人同他的反对者作对，其结果通常是把他们打一顿，有一次甚至杀了人。随着岁月的逝去，他的技术臻于完善之境。党的垄断性政治机器，同国家的极权机器结合起来，给他造成了甚至连他的前辈凯撒·布尔吉亚之流也无法设想的可能性。国家政治保安部侦讯人员进行超宗教裁判所审讯的办公室通过一个扩音机同斯大林的办公室连结起来。不露脸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咬着烟斗，贪婪地听着他自己大体规定的对话，满意地搓着手，不出声地笑着。在臭名远扬的莫斯科审讯前十多年，有一个夏天晚上，他在一个避暑地住所的阳台上，一边喝着酒，一面向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自认，他生活中最大的愉快是锐利地盯着敌人，精心策划一切，无情地进行报复，然后睡觉。后来，他对整个一代布尔什维克实行了报复。这里没有理由再来谈莫斯科诬陷案。这些案件在当时所得到的评价既是权威性的又是

详尽无遗的^①。但是为了了解真正的斯大林和他在列宁患病和逝世的日子里的行为，有必要说明1938年3月最后一次大审讯的某些插曲的真相。

亨利·雅戈达在被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工作了16年，起初当一个助理首长，后来当部长，作为总书记同反对派斗争中的一个最受信任的助手，他同总书记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触。逼供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的那套办法是雅戈达亲自制定的，如果不是他首创出来的话。1933年，斯大林奖给雅戈达一枚列宁勋章，1935年，把他提升为国防总人民委员，即政治警察元帅，这离才能卓越的图哈切夫斯基被提升为红军元帅只有两天。雅戈达是一个无名小卒，大家都这样看他，大家都看不起他，现在他提升了，那些老革命一定互相表示愤怒。即便在顺从的政治局内，也有反对这样做的企图。但是，某些秘密把斯大林和雅戈达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根神秘的纽带神秘地断了。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决定同时清除掉他的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同犯。1937年4月，雅戈达被捕了。像通常一样，斯大林于是得到一些附带的好处：由于得到了赦免的保证，雅戈达在审讯中把谣传斯大林所犯的罪行承担了下来。当然，这个保证没有遵守：雅戈达被处决了，以便更好地证明，斯大林在法律和道德问题上是不调和的。

但是，在这次审讯中，透露了极其说明问题的情况。根据雅

① 《列夫·托洛茨基案件：关于莫斯科审讯对他的控诉的意见听取会的报告》，调查预备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威等编，纽约和伦敦哈泼兄弟公司1937年出版，第617页。

《无罪：调查莫斯科审讯对列夫·托洛茨基的控诉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主席杜威等编，纽约和伦敦哈泼兄弟公司1938年出版，第422页。

戈达的秘书、亲信布拉诺夫的证词，雅戈达有一只特别的毒药箱，每当需要时，他总是从这只箱子内取出宝贵的药瓶来，交给他的代理人，并授以适当的指示。这个国家政治保安部首脑，从前是一个药剂师，对毒药异常感兴趣。他手下有几个毒物学家，他们为他们办了一个实验所，供给它不受限制和监督的财力物力。当然，雅戈达设立这样一个实验所不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远不是这样。在这件事上，同其他的事情一样，他是在执行他的公务。作为一个下毒的人，他仅是一个统治工具。甚至像尼罗宫廷中的老洛库斯塔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在技术方面要远远胜过他的愚昧的前辈。

被告席上，坐在雅戈达旁边的是四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控谋杀高尔基和两名苏联内阁部长。“我供认，……我开了不适于所患病症的药方……”因此，“我应当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过早的死亡负责。”在审讯的日子里，像供认毒害这个年迈有病的作家之类的捏造和指责所构成的基本背景，在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和对情况进行的更加周密的分析，使我不得不改变这个判断。在审讯中，并不是一切都是扯谎。的确有被毒害的人，也有下毒的人，并不是所有下毒的人都在被告席内。下毒的主犯那时正在用电话指挥审讯。

高尔基既不是一个阴谋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软心肠的老人，是那些被损害的人的保卫者，是一个重感情的抗议者。在十月革命初期，他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饥荒时期，不满和镇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朝臣们抗议了。就连斯大林的妻子阿利路也娃也抗议了。在这种气氛中，高尔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同欧洲的作家通信；外国人访问他，被损害的人向他诉苦，他决定舆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默然忍受当时正在准备的消灭他深交多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

做法。高尔基公开抗议这些诬裁案，就会立即在全世界眼前摧毁斯大林正义的魔力。

要让他保持沉默是决办不到的。逮捕他，流放他，则更加办不到，更别说枪毙他了。通过雅戈达“不流血地”加速消灭病中的高尔基，这种想法在这个克里姆林头子看来，一定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斯大林天生这样一副脑筋，只要想到马上就作出决定。雅戈达接受这个任务后，就叫他“自己的”医生去执行。他根本不冒什么风险。据列文医生自己说，“拒绝，就会毁掉我自己和我的一家。”而且，“你是怎样也逃不过雅戈达的手掌的。雅戈达是一个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他的人。即使你躲到地下，他也会抓住你。”

但是这些权威的、受人尊敬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为什么不向他们很熟悉的、作为他们的病人的政府及要人们控诉呢？仅仅在列文医生的病人名单上，就有 24 个高级官员，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成员在内。答案是，列文医生，像克里姆林宫内和周围的人一样，十分清楚雅戈达是谁的代理人。列文医生屈服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反对斯大林。

关于高尔基的不满，他想到国外去，斯大林不肯发给他出国护照，这些事在莫斯科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是在私下里谈论的。在这个伟大的作家死后，立即产生了这种怀疑：斯大林多少帮助了自然的毁灭力量。审讯雅戈达的一个附带的任务是扫清斯大林的这种嫌疑。因此，雅戈达、医生们、和别的被告一再说，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一个享有信任的朋友”，“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完全赞成“领袖”的政策，“非常热情地”谈到斯大林的作用。如果这一切只要有一半是真的，雅戈达就不会大胆干掉高尔基，他更不敢把这个阴谋交托给一个克里姆林宫医生去执行了，因为后者只要打一个电话给斯大林，就可以毁了他。

这是从一项审讯中提出的一个“细节”。审讯有许多，“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这一切上面都有斯大林的磨擦不掉的烙印。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苦心考虑各式各样的计谋，使任何拂逆他的人受到极度的屈辱，使他诬告他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最可怕地出卖自己。对于不顾一切反抗的人，总是有一小瓶药水等着他。消失的只是雅戈达；他的毒药箱还在那里。

在1938年审讯中，斯大林仿佛是附带地指责布哈林在1918年准备暗杀列宁。天真而热情的布哈林尊敬列宁，热爱列宁，就像小孩爱他母亲一样，他在论战中放肆地反对他时，他也是跪着这样做的。布哈林，用列宁的话来说“软得像蜡”，没有，也不可能有个人的野心。过去如果有人预言，布哈林有朝一日会被控暗杀列宁，那么，我们全体，特别是列宁，就会大笑，建议把这样的预言家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种显然是荒唐的指责呢？这很可能是他对布哈林不谨慎地表示过的对斯大林本人怀疑的一个报复。一般地说，一切指责都是符合这个方式的。斯大林虚构的案件的基本因素并不纯粹是幻想的产物；它们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做辣菜的大司务本人的行动或阴谋中得来的。同一种守势性攻势的“斯大林想法”——这种想法在高尔基死亡的例子中显露得十分清楚——在列宁死亡一事上，显示了它全部的力量。在第一件事上，雅戈达丢了命；在第二件事上，布哈林。

我大致像这样地设想事情的过程。列宁在1923年2月底要毒药。在3月初，他再次瘫痪。当时的医疗预断是谨慎地不利的。斯大林感到自己更加有把握了，他开始像列宁已经死了一样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他的强有力的体质，在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

慢慢地好转，可以比较随意地转动；听别人读或自己阅读；他的说话能力开始恢复。医生的诊断越来越有希望。列宁的恢复，当然不能阻止官僚反动势力替代革命。克鲁普斯卡娅有正确的理由在1926年说：“如果沃洛佳还活着，他现在是在监牢里。”

对斯大林本人来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命运的问题：他要么立即就在这一天设法成为党机器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头脑；要么就要给贬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斯大林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全部权力。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权力。他离目标已经很近了，但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危险离他更近。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一定下了决心：必须立即行动。他到处有自己的同谋，他们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他旁边有药剂师雅戈达。斯大林是把毒药送给列宁，同时暗示医生认为他已没有希望康复呢，还是采取更直接的手段，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的命运悬在一根线上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动一动，事情就定局了。

在1924年1月中旬之后不久，我动身到高加索的苏呼米去，打算医治一种顽强的神秘传染病，这种病的性质对我的医生仍然是不解之谜。我在途中接到了列宁的死讯。按照一个传播得很广的说法，我失去权力是因为举行列宁葬礼时我没有在场。这种解释是很难认真看待的。但是举行追悼仪式时我不在场，这使得我的许多朋友感到严重不安。在我的大儿子（他当时将近18岁）的来信中，有一种青年的绝望的声调：我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赶去。这也是我自己的意向。关于列宁逝世的密电，是我和我的妻子在梯弗里斯火车站接到的。我立即通过直接线路向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个密电：“我认为有必要回返莫斯科。葬礼什么时候举行？”约一小时后，莫斯科来了复电：“葬礼将在星期六举行。你来不及赶

回来。政治局认为，由于你的健康状态，你必须继续前往苏呼米。斯大林。”我并不认为，我应当只是为了自己而要求推迟葬礼。只是后来我盖着毯子躲在疗养院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才知道，葬礼已改期到星期日举行。同以前的安排和最后变动葬礼日期有关的情况十分复杂，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斯大林的做法不但欺骗了我，而且看来也欺骗了三头同盟中他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光是从作为宣传鼓动的直接效果的观点出发来对待一切问题；同季诺维也夫不一样，斯大林在他的危险行动中受更具体的考虑的指导。他可能担心，我要把列宁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谈话联系起来，要问医生有没有用过毒药，并要求进行特别的尸体检验。因此，从一切方面来说，在把遗体涂上防腐剂，内脏火化，而不再可能由于这种怀疑而进行验尸之前，使我留在外边，那是比较安全的。

当我向莫斯科的医生询问列宁直接的死因时（他们没有料到列宁会死），他们答不上来。我没有用这方面的问题烦扰克鲁普斯卡娅。我在苏呼米的时候，她曾经给我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没有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私人关系，直到两年后他们同斯大林决裂时才恢复。他们显然避免讨论一切关于列宁去世的情况，回答问题时只说一两个字，而且避开我的眼光。他们是知道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感到怀疑？无论如何，他们在以前三年中同斯大林关系十分密切，以致他们不得不担心怀疑的阴影也会投到他们身上。

对着列宁的遗体，斯大林看着一张纸片，宣读对他主义遗业的忠诚誓词，誓词是用他在梯弗里斯神学校学到的那套宣道文体写的。在当时，这篇誓词没有受到什么注意。今天，所有的教科书内都有这篇东西，代替了十诫^①。

^① 斯大林的誓词是编者插入的。——原编者注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①

关于莫斯科审讯和国际舞台上的最新事态发展，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尼罗和凯撒·布尔吉亚的名字。既然提到这些老鬼魂，那么在我看来，谈到一个超尼罗和一个超布尔吉亚是适当的，同我们时代的成就相比，那个时代的罪恶似乎是十分平凡，几乎是天真的。但是，在纯粹的个人类比中，也可能看出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意义。衰落的罗马帝国的风俗是在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从异教向基督教过渡的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代标志着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从天主教向新教和自由主义的过渡。在这两种

^① 参看《悼列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69·173页。——译者注

情况中，旧道德在新道德形成以前，已经衰竭了。

现在我们又处于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时期，处在最大的社会危机的时代，像往常一样，社会危机伴随着道德的危机。旧的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新的刚刚开始出现。当屋顶塌下来、门窗掉下来的时候，房屋就没有遮蔽，不能住人。今天疾风正在吹过我们整个星球。所有的传统的道德原则日益败坏，不单是斯大林的道德原则如此。

但是，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辩解。尼罗也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但是他死后，他的雕像打碎了，他的名字也就磨掉得毫无踪迹。历史的报复要比最有权力的总书记的报复更加可怕。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使人告慰的。

补遗一 热月式的反动

在革命和内战的大紧张后，开始出现了政治上的反动。〔这同非苏维埃国家这类社会现象根本不同。〕这种反动是针对〔帝国主义〕战争和针对那些领导这场〔甚至在“胜利”国家也肯定〕不得人心的〔完全无益和滥事屠杀的〕战争的人的。在英国，它的矛头主要针对劳合·乔治，并在政治上使他陷于孤立，直到他生命的終了。法国的克雷蒙梭〔和美国的威尔逊〕受到了同样的遭遇。

群众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和一场内战后，感情有很大的不同，那是自然的事。在俄国，工人和农民完完全全懂得，实际牵涉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场战争，在非常直接的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对胜利的满意是巨大的，那些帮助取得胜利的人的声望也是同样巨大的。〔同时，有必要摆脱战争，最后重新从事平时的工作，重新建立正常和平的秩序来满足人的需要。英雄主义本身已成为平凡的事，人们对战争中的恐怖已经受够了。

〔虽然这种反动的矛头并不是针对内战的领导人的，但是这种要求和平的难以抑制的冲动，使许多人的眼睛转过来望着那些做像配给食品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的人，住房，工资高的好工作。斯大林和其他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现在居于显要地位，领导这个从战争到和平，从自我牺牲到自我改善的、悄然无声然而却是强有力的过渡运动。这种心情对于青年和一般群众——那些在内战时期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人——的影响不

如对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的中年人和对在平时活动中获得了好处的有职业者的影响那么强大。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影响不是强大而广泛的。〕

许多行政人员，有很大一部分行政人员，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和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命令，因此，三年的内战在苏维埃政府本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些理论家企图证明，苏联目前的极权主义的政权并不是由于这种历史条件造成的，而是由布尔什维主义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他们忘掉了，内战并不是由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造成的，而是由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要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而造成的。没有疑问，斯大林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由内战的环境和情况以及后来帮助他建立个人独裁的整个集团——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一整批〔上升到指挥官和行政人员〕的工人和农民所塑造造成的。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五年内，97%以上的党员是在革命胜利后入党的。又过五年，〕100万党员中，绝大多数对于党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的状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更不必说革命前的地下时期了。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到那时，足足有3/4的党员只是在1923年之后加入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那就是地下时期的革命者——的人数，已不到1%。到1923年，党的素质已被大批年轻没有经验的党员大大地冲淡了，他们〔迅速地受到塑造〕让他们在党机器专职人员的指挥下，扮演〔唯命是听的人〕的角色。党的革命核心的这种冲淡，对于党机器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即战胜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1923年，情况开始稳定。内战，像同波兰的战争一样，已肯定地过去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已经克服，新经济政策刺激了国民经济，使它得到了蓬勃的恢复。经常把共产党员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从一个活动范围调到另一个活动范围，不久已

成为例外的情况，而不再是一种常规。共产党员开始得到长期的职位，〔这是他们自己的地盘导致更高的职位的地盘，他们〕开始以有计划的方式来管理那些交给他们管理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地区。〔他们迅速地变成官员，变成官僚，因为〕党员和官员的职位安排有了一种更有系统和更有计划的性质。任命职务不再被认为是临时性的和几乎是偶然性的了。任命的问题同个人的生活问题，〔被任命者的〕家庭的生活条件，他的前途，有愈来愈大的关系。

就在那时，斯大林开始愈来愈显赫地成为组织者，指派任务的人，分配职位的人，培养者和官僚主义的头子。他挑选人员的标准是，他们对他的各个对手，特别是对他认为是主要对手——他上升道路上的主要障碍，采取敌视或冷漠态度。斯大林把他自己的行政经验，主要是在幕后进行一套阴谋活动的经验归纳起来，使之系统化，并把它传授给那些同他有最密切的联系的人。他教他们怎样按照他自己的党机器组织自己的地方政治机器；怎样收罗合作者，怎样利用他们的弱点，怎样使同志们互相对立，怎样管理党机器。

随着官僚主义的生活愈来愈稳定，它产生了对舒适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斯大林控制着这个追求生活舒适的自发的运动，指导它，使它为自己的意图服务。他用最有吸引力的、最好的职位奖给最忠诚的人。他规定从这些职位得到好处的限度。他亲手挑选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向许多监察委员灌输必须无情迫害异己分子的思想。同时，他却指示他们不要查究那些忠于总书记的官员们所过的异常奢侈的生活。因为斯大林〔用一个标准〕，即对他自己，对争夺权力的斗争，对他要制服别人的无情欲望是否〔有用〕来衡量一切形势，一切政治情况，一切人员的组合。

除此以外，他是什么都不懂的。他驱使他的两个最强大的竞

争者斗争。他把自己利用个人敌对和集团敌对的才能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一种无法模仿的艺术，因为他在这方面发展了一种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本能。在任何新的形势下，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自己可以得到好处。每当整体的利益同他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他总是毫无例外地牺牲整个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不论用什么借口，不问结果如何，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给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制造困难。他以同样坚持的态度来设法奖赏一切个人效忠的行为。起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宣布，平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偏见。他出来为不平等辩护，为官僚主义的显贵们的特权辩护。

斯大林这样蓄意堕落，他对前景是从来不感兴趣的。他也不考虑这种由他带头在搞的做法的社会意义。他那时像现在一样，是作为像他那样的一个经验主义者行事的。他选拔那些忠于他的人，奖赏他们；他帮助他们取得特权地位；他要求他们放弃个人的政治目标。他教他们怎样为自己建立一套必要的机构来左右群众，使群众俯首听命。他从来不考虑，他的政策直接违反列宁在生前最后一年愈来愈关心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自己偶或提到官僚主义。但是总是出诸最抽象和没有力量的口吻。他考虑的是心不在焉，文牍主义，办公室乱七八糟之类的现象，但是对于由盗贼信义、由他们的共同利益〔作为整个政治集团的享有特权的剥削者〕以及由愈来愈远离人民的趋势连结在一起的整个特权阶层的组成，则熟视无睹。斯大林毫不感到他不但在组织一个新的政治机器，而且在组织一个新的阶层。

他对待问题只是从选择干部，改善他的机器，取得他个人对它的控制权，他个人的权力的观点出发。没有疑问，在他看来，既然他同一般的问题都有关系，他的机器会使政府得到更大的力量和稳定，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超过这个范围，他是没有勇气进行概括的。处于特权地位的，用

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群众面前伪装起来的一个新的职业官员统治阶层的形成——这个新的享有巨大特权和巨大权力的统治阶层的组成，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且在很大的、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改变新社会的社会组成——这是他不肯考虑的一个问题；只要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是挥舞手臂就是挥舞手枪把他打发掉。这样，斯大林这个经验主义者，虽然没有正式同革命传统决裂，虽然没有宣布弃绝布尔什维主义，却成了这二者的〔最有效力的叛徒和破坏者〕。

1923年秋天进行全党讨论的时候，莫斯科组织大体上分成两半。在开始的时候，反对派占一定的优势。但是，两者的社会〔势力〕并不是相等的。在反对派方面，有青年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基层党员；但是，在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方面，首先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和有纪律的政客，他们同总书记的政治机器有最密切的关系。我当时患病，因而没有参加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是一个具有一些影响的因素；但是，不应当夸大这件事的重要性。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厌倦了。那些支持反对派的人并没有希望进行重大严肃改革的抱负。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异常凶狠地进行斗争：〔它是在本能地为自己将来的兴旺而战〕。的确，这个阵营至少有一个时候陷于完全的混乱，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季诺维也夫后来向我们透露的。有一次，他从彼得格勒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发现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十分惊慌。斯大林显然在策划一个阴谋，想同反对派讲和，而牺牲他的同盟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种事正是像他所干的。当时，由于我生病，政治局在我的家里开会。他向我提出明显的建议，对于我的健康表示了完全出乎意外的关切。季诺维也夫，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向彼得格勒要求支持，从而结束了莫斯科这种暧昧的局势。他开始组织一个鼓动员和突击队的非法的参谋部，用

汽车把他们从一个企业送到另一个企业，散布歪曲说法和诽谤言论。当然，斯大林在不同他的同盟者决裂的情况下，谨慎地给自己保护好向反对派退却的道路。季诺维也夫大胆一些，因为他更加有冒险性和更加不负责任。斯大林却谨慎。他还没有了解党内要人们中间，特别是苏维埃机关内所发生的变化〔他自己助长的变化〕的全部规模。他并不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他在摸索和探明每一个反抗力量，把每一个支持力量都估计进去。他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担义务，而他自己保持超然的态度。

就在这次秋季讨论中，明确地制定了党机器同反对派斗争的策略，并且在行动中加以试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来自下面的压力来搞垮党机器。党机器必须保持不动。党本身可以常常改组，调整或重新组织；有些党员可以被开除，被损害；有些可以被吓倒。最后，可以玩弄事实和数字。党机器的人员坐着汽车，从一个工厂被送到另一个工厂。为了同党机器这种篡夺权力的做法作斗争而成立的各个监察委员会，只不过变成了这部机器的车轮的齿轮。在党的会议上，特别可靠的监察委员会官员们记下每一个有反对派倾向的嫌疑的发言者，事后就忙于调查他过去的历史。收集一些多少是具体的材料——过去的某种错误，或只是社会出身不好——来作为破坏党纪的罪名的根据，或把人家弄得恼火以至违反党纪，这总是，或者几乎总是不太困难的。这样，就能够开除、调动反对派对手，吓得他们不敢开口，或同他们达成妥协。

这一部分工作由斯大林自己直接掌握。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内部，他有着以〔索尔茨、〕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为首的自己的特别机构。他们的任务是编制不顺从的人的黑名单，然后在沙皇警察档案中调查他们的家世。斯大林有一个特别的档案库，里面装满了不利于所有重要的苏维埃领导的各种各样的文件，

对他们的指责和中伤的谣言。1929年，在同政治局的右派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开决裂的时候，斯大林威胁要揭露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才得以使这两人继续对他效忠。

1925年，苏联有一家幽默杂志登载了一张讽刺画，画着政府首脑处在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情况中。画得非常逼真。而且，在用很有暗示性的文体写的文字中，用加里宁的缩写“M. K.”指他。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几个同我接近的人，其中有谢雷布里亚科夫，他在监狱里和流亡期间同斯大林相交很熟。

“这是斯大林对加里宁的最后警告，”他解释。

“但是为什么？”

“当然不是因为他关心他的道德问题，”谢雷布里亚科夫笑道。“显然，加里宁在什么事情上顽固不化。”

加里宁对不久以前的情况知道得太清楚了，他起初不肯承认斯大林是领袖。长时期以来，他害怕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匹马”，他常常对他的亲密朋友说，“有朝一日会把我们的车子拉到沟里去。”但是逐渐地，他尽管心里不愿意和抗拒，先转而反对我，然后反对季诺维也夫，最后，在更加不愿意的心情下，反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由于他的温和的见解，他同这三人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叶努基泽随着加里宁的足迹，通过了同样的演变过程，只是比较的隐蔽，而且无疑，内心要更加痛苦得多。由于这个人的性格（他的主要特点是善于适应），叶努基泽不能不参加到热月派的阵营中。但是，他不是一个野心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无赖。对他来说，很难同老的传统决裂，更难转过来反对他一向尊敬的那些人。在决定性的时刻，叶努基泽不但没有显出咄咄逼人的劲头，相反地，总是发牢骚，鸣不平抗拒。斯大林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向叶努基泽提出过

警告。我是差不多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虽然在那个时候，揭发的制度已经不但毒化了政治生活，甚至毒化了私人关系。但是，在有些人中间，还存在着相互信任。叶努基泽同谢雷布里亚科夫非常友好（虽然后者作为左翼反对派的一个领袖，是非常杰出的），而且常常向他倾吐他的心里话。“他（斯大林）还要什么？”叶努基泽发牢骚说。“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他还觉得不够，他要我承认，他是一个天才。”

斯大林是在我 1917 年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为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庇护下的。他写道：“有些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发抖，这是十分可能的。例如，我知道，当时被捕的有些布尔什维克甚至准备从我们的队伍中开小差。但是根据这一点对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作出这个结论，那是无情地歪曲历史。”

这段引语中令人感到兴趣的部分与其说是坚决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还不如说是牵强地提到“当时被捕的某些同志”。这是针对卢那察尔斯基而言的。在革命后搜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卢那察尔斯基在警察当局侦讯下所作的口供。这对于他的政治勇气确实不是一种光荣。这件事本身对斯大林算不了什么，更不勇敢的布尔什维克都做了他的亲密部下。真正使他在意的是，在 1923 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他的著作《革命领袖剪影》，在这本书里，他没有把斯大林的剪影包括进去。这一省略并不是故意的。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反对斯大林。他只是同当时任何别的人一样，都没有想到要把斯大林置于革命领袖之列。但是，到 1925 年，形势变了。这是斯大林暗示卢那察尔斯基相应地改变其政策否则就要遭到揭露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没有提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他得到一定时间来调整他的“阵线”。卢那察尔斯基一定

懂得指的谁，因此从根本上转变了他的态度。他在〔1917年〕7月犯的罪过立即不予追究了。

沙皇时代的年轻革命者并不都〔是小说书中的英雄〕。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在〔秘密警察进行的〕侦讯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如果他们以后的行为弥补了这种弱点，党并不决绝地开除他们，而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923年，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开始把一切这种证据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来讹诈已经远远弥补了这种早期的缺点的数以百计的老革命家。他威胁他们要揭露他们过去的历史，使这些人吓得像奴隶般地服从，并使他们逐步沦入萎靡不振的状态。〔他强迫他们去做他对反对派的阴谋中的最卑鄙的工作，从而使他们永远同他自己共命运。那些不愿对讹诈屈服的人，不是被党机器在政治上打得粉碎，就是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我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我的私人秘书格拉兹曼〔就是这样死的〕。他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对党〔非常〕忠诚，〔非常兴奋和敏感〕，是一个有着毫无瑕疵的荣誉的革命者。他〔是〕早在1924年自杀的。他这种走绝路的行动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得在他死后为他雪冤，并对它自己的执行机关提出〔非常谨慎和温和的〕谴责。

〔两年后，采取了企图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行动。①虽然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已经受到屈辱，但是他们的情况还没有明确化。事情发生在1926年。7月里，已同斯大林决裂，并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的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反对

① 这部分叙述是以列夫·托洛茨基的札记为基础的。正文是托洛茨基的寡孀娜塔莉亚·伊凡诺夫娜·谢道夫写的。这一部分从本页方括弧以外的文字到下面注出的地方为止。——原编者注

派的其他两个领袖是于三个月后，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下一全体会议上被开除出同一个机构的。同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夫人）在穆拉洛夫和内战时期对他忠心耿耿的其他同志的陪同下，前往高加索休假。叶努基泽把他们以前在基斯洛沃茨克住过的那所别墅〔交给他们使用〕。托洛茨基像过去一样地受到敬重。地方当局表现了真诚的尊敬，有时甚至是他们不能隐藏的热情。在偶然的以及非偶然的会晤时，他们真诚热烈地向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问候。基斯洛沃茨克所有的休养所，接二连三地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去讲话，每一个休养所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和欢送他。但是，中央的压力已经可以感受到。各省还没有正式接到关于改变“阵线”的命令。斯大林还不敢公然发出这种命令。但是他暗中向他的抚督们表明了他的愿望。因此，我们不时遇到最近从莫斯科来的这批或那批人的明显冷待的表示。我们听说，某些休养所辩论过是否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的问题。但是，那些反对邀请的人，人数和影响在那时都微不足道，所以在热情的多数的坚持下，还是一致决定邀请他。这样坦率地表示赞成列夫·达威多维奇，在莫斯科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

穆拉洛夫对发生的一切事情消息很灵通。他对于这些事情很敏感，而且懂得它的意义。我们感到不安，因此经常保持警惕。像通常一样，打猎是由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因为它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像过去一样，继续由他们警卫和保护。但是情况既然有了改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种警卫有了双重意义，而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如对列夫·达威多维奇私人警卫员那么信任，他们是同我们一起从莫斯科来的，内战前线上的紧密牢固的联系使他们同列夫·达威多维奇连结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打完猎，回来得比平常晚一些。回来得晚，并

不是我们的过失；的确，我们怀疑，这是预谋的。半夜，正当我们驶近基斯洛沃茨克的时候，我们所乘的那辆电车突然出轨了，转了一个圈子倾倒了，震了一下。我们都跌下来，起初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试图向我们解释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的官员极其狼狈。他们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这件事看来很像一件没有得逞的预谋“事件”——无疑是对列夫·达威多维奇在基斯洛沃茨克获得的成功的报复。对于“落后的”高加索和同它站在一起的所有省份，必须用致人死命的一击来使它们得到一个教训。^①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没有多久，对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和同情者施加的压力逐渐加强。对于在1927年5月26日83人宣言上签名的几百个人的处理是残暴无耻的，但是对几千个口头上支持他们的人的处理更是残暴无耻。他们给拖到党的法庭上去，只是因为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不符合斯大林派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从而粗暴地剥夺了他们作为党员的最基本的党员权利。当时党内正在准备舆论，以便干脆开除反对派。此外，还对反对派的成员和同情者采取某些不相干的措施，乌克兰共产党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威胁反对派说：“你们到工人职业介绍所会被人嘲笑”。莫斯科党委书记在莫斯科威胁说：“我们要使你们失业”。〔这些不是无聊的吹牛。当〕饥饿的威胁不能使反对派静默时，中央委员会就公开动用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人如果看不到，用这种方法同反对派斗争是一种反对党的斗争，那么他一定是瞎了眼。在使用这种武器的时候谈团结，那有什么意思？斯大林分子所谓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狼同它正在吞掉的绵羊的团结？……

〔继捷尔任斯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明仁斯基，在列宁

① 托洛茨基夫人写的部分到这里为止。——原编者注

生前，一直参与各种反对派运动。他同抵制派在一起，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之类的东西使他着迷。这是他年轻时候的事。但是，到他一生的末期，警察镇压机器又使他着了迷。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外，他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他以自己全部脑筋使他的机器毫不间断地开动。为此，首先必须坚决支持政府。有一次在内战时期，明仁斯基突然警告我提防斯大林对我的阴谋。这件事我在我的自传内叙述过。三巨头上台后，他对三巨头效忠。三巨头分裂后，他转而效忠斯大林。1927年秋，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干预党的内部分歧时，我们一大批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我，我想，还有别的人——去看明仁斯基。我们要求他把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上公布的、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害的〕那些证词拿给我们看。他并不否认，这些文件基本上是伪造的，但是直截了当地不肯让我们看这些文件。

“你还记得吗，明仁斯基，”我问他，“有一次在南方前线，你怎样在我的列车上对我说，斯大林在对我搞阴谋？”明仁斯基狼狈起来了。

这时候，雅戈达——他当时是监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斯大林的视察员——插嘴了。“但是，明仁斯基同志”他说，把他狐狸似的脑袋伸到前面来，“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前线。”

雅戈达年轻时是一个药剂师。在平时，他到老死可能是一个小城市药房的老板。

我打断了雅戈达的话。我对他说，我不是在对他说，而是在对明仁斯基讲话。并且再次提出我的问题。于是，明仁斯基回答说：

“是的，我在南方前线到过你的列车上，并且警告过你什么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提到过任何人的名字。”一种像梦游者那样的困惑的微笑在他的脸上露出来。

没有效果。在我们空手离开后，斯大林走进去向他说话。后来，加米涅夫单独去看他；那时离开他受反对派的三巨头的支配，到底还不很久。

“你是否真的认为，”加米涅夫最后问他，“斯大林一人能担当起〔十月革命〕的任务？”

明仁斯基避开了这个问题。“那么你们为什么让他发展成为这样巨大的力量？”他用问题来回答问题。“现在已经太晚了。”

1924年春天，中央委员会有次举行全体会议之后（我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对〔伊凡·尼·〕斯米尔诺夫说：“斯大林将成为苏联的独裁者”。斯米尔诺夫同斯大林很熟，他们多年一起做革命工作，一起过流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彼此最了解。

“斯大林吗？”他惊异地问我。“但是他是一个庸人，一个无声无臭的小人物。”

“庸人，是的；小人物，可不是”。我回答他说：“历史的辩证法已经勾住了他，会把他提起来。厌倦的激进派、官僚、耐普曼、富农、暴发户、卑鄙的人，从施了肥的革命的翻过来的土壤中爬出来的一切虫豸——他们全都需要他。他知道如何迎合他们的立场，他说的是他们的话，他知道怎样领导他们。他有一个老革命者的应得的名誉，这使他们对他们是十分宝贵的，因为他可以作一个遮住全国眼睛的眼罩。他有意志，有胆量。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他们，并使他们反对党。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他现在就在把党内卑鄙的人，狡猾的蒙混者组织到自己的周围来。当然，欧洲、亚洲和我国的巨大的事态发展可能起干扰作用，推翻一切这种猜测。但是如果一切像目前那样继续自动发展下去，那么，斯大林将同样的自动地成为独裁者。”

1926年，我同加米涅夫有过一次争论，他坚持说，斯大林不

过是“一个小城市政客”。当然，这种讥刺的提法有一点道理，但是只是一点。奸猾、无信、利用人性的最低等的本能的能力这些特性，在斯大林的身上发展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而且，考虑到他的顽强的性格，这些特性在斗争中是强大的武器。当然，并不是任何斗争。解放群众的斗争需要其他的特性。但是，挑选人员给他们特权地位，用宗派精神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削弱和控制群众，斯大林的特性的确是有价值的，而且理所当然地使他成为官僚反动派的领袖。〔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一个庸人。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系统，他甚至不能作逻辑的思考。他讲话中每一句话有某种当前的实际目的。但是，总的来说，他的讲话从来没有上升到逻辑的结构。

如果斯大林能够在起初预料到他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将会导致什么结果，那么尽管有希望战胜他的对手，他无疑也会不进行这个斗争的。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任何东西。他的对手预言，他将成为热月派的领袖，革命的党的掘墓人，这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空洞的臆测〔和玩弄词藻〕。他相信党机器是全能的，相信它能够完成一切任务。他丝毫也不了解他正在起的历史作用。由于没有创造性的想像力，没有概括和预见的能力，斯大林在单独掌舵的时候，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革命者。但是，这些特性，加上他从前是一个革命者的权威，使他能够掩盖热月式官僚主义的抬头。

他的野心具有一种被欧洲技术所加深的粗野的亚洲的特色。他必须使报纸天天对他大事吹捧，登载他的照片，只要有一点借口就提到他，用大号铅字排印他的名字。今天，就连电报局职员也知道，如果打给斯大林的电报，不称他为人民的父亲，或伟大的导师，或天才，他们就不能接发这个电报。小说，歌剧，电影，绘画，雕塑，甚至农业展览会等等，都必须绕着斯大林旋转，像绕着它的轴心旋转。斯大林时代的文学艺术将作为最荒唐的和卑

鄙的拜占廷作风的实例载入史册。〔1925年，斯大林由于卢那察尔斯基没有在一本著作中提到他为许多领袖人物之一，便对卢那察尔斯基怀恨在心。但是，十几年后，俄国的〕大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他是俄国最有权威的、最独立的作家之一〕对于斯大林这样写道：

您，各民族的灿烂的太阳，
我们时代的不落的太阳，
太阳也比不上您，因为太阳没有智慧……

〔斯大林泰然领受了。他高兴了。有一个较小的作家写了一首接近于他文学水平的诗《回来了的太阳之歌》，毫无疑问，他是更加高兴了。这首诗歌颂道：〕

我们的太阳来自斯大林，
我们的兴旺的生活来自斯大林……
我们同他，
同列宁的儿子，
同智者斯大林，
甚至创造了风雪遍野的冻土地带的好生活。

〔斯大林不懂得，这种文学作品听起来〕像猪叫〔，而不像诗〕。有一个谄媚的朝臣为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写了一篇关于“当今圣主”沙皇亚历山大第三的文章，它同最近的苏维埃百科全书中一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相比，是真实、适度和风雅的典范。

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集团限制了斯大林。由于长期受到列宁的教导，他们知道思想和纲领的价值。虽然他们时常大大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而且破坏它的思想完整性（这一切都是在军事借口下干出来的），他们从来没有超越一定的限度。但是，三巨头分裂后，斯大林摆脱了一切思想上的限制。政治局

委员不再由于自己缺乏学识或由于自己十足的无知而感到难堪。一切讨论和论争都失去了力量，特别是关于共产国际的问题。到那时，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承认任何外国支部有任何独立的意义。一切都归结到它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对派的问题。在先前几年，我在共产国际中的一个任务是观察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国际发生大变动（从1923年年底起继续到1924年年底）后，各支部的新领导人有越来越脱离老原则的倾向。我记得，我有一次把最近一期的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带给一次政治局会议，并摘译出一篇纲领性文章的几个部分。这些摘录充分显示了他们〔作者〕的无知和机会主义，以至政治局一时陷于混乱。但是，他们当然不能背弃他们的“孩子”。斯大林派了政治局中认为自己懂得一点法语——青年时代在学校里学到的一点法语——的仅有的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他向我要剪报，并且刚一看到就开始翻译，略去不认识的字眼和成语，歪曲其他的字句，添上他自己的荒唐的述评。立刻大家都齐声支持他。很难表达那种痛苦、愤怒的感情……。

苏联虽然纸张缺乏，但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真正地到处泛滥。今天，对这些著作进行理论上的评价似乎是不值得的。斯大林自己不可能再读他个人大约从1923年到1929年间所写的或所说的东西，因为它们同之后十年中他所写、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是显然抵触的。他后来所说的话，完全否定了以前的话，以至要转述这些政治废话，哪怕只是最简短的摘录，对我来说是一种十足的苦差使，而对耐心的读者，则像洗碗水一样的乏味。在斯大林派机器和反对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给发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指出其中一些突出的概念，对我们

的目的就足够了。各种政治力量集结在这些概念的周围。这些概念有三个。它们有时互相部分地补充，部分地互相替代。

第一个概念同工业化有关。三巨头起初反对我提出的工业化计划，为了进行论战，他们把它叫做超工业化计划。在三巨头分裂，斯大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组成集团后，这种态度更加强了。反对所谓的超工业化的官方论点的总的倾向是，迅速工业化只有牺牲农民才能办得到。因此我们必须以蜗牛的速度前进。工业化速度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等等。事实上，官僚主义不想干扰居民中开始致富的阶层，那就是新经济政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这是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第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它从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它仅仅在这个问题上整整翻了一个筋斗，然后轻松愉快地着手打破以前一切超工业化的纪录——大部分是在纸面上和演说中，呜呼！

在第二个阶段，在1924年，发动了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政治内容缩小到这一主题，即我们对国际革命不感兴趣，为了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官僚主义越来越担心，同国际革命政策发生关系的危险，正在危害它的地位。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其本身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但是表现了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从这个斗争中出现了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到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了解他们自己发动的斗争的含意。

官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中的第三个概念，同反对平均，反对平等的运动有关。这一斗争的理论方面具有离奇的性质。在马克思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信中，斯大林找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不平等，或者，像他所说的，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特权仍将保持着。马克思这句话并不是说要建立新的不平等，而只是说要逐步地而不是突然

地消灭工资方面的旧有的不平等，这句话被错误地解释成为宣布官僚及其附庸的权利和特权。这样，苏联的前途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途脱离了关系，同时官僚主义得到了他们在苏联内部取得特权和统治劳动人民的权力的理论根据。

因此，进行革命和取得革命胜利，仿佛是为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猛烈而疯狂地为反对平均而斗争，因为平等危害它的特权；反对不断革命，因为这危害它的存在。斯大林在这个斗争中找到成群的支持者，这是不足奇的。他们之中，有以前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成群地参加国家机关和甚至党机关，唱着颂扬斯大林的实用常识的赞美歌。

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在1922年进行得非常谨慎，在1923年则公开而激烈。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在1924年公开开始，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对不平等的指责的斗争在1925年年底前开始，而且在实质上成为官僚主义社会纲领的轴心。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是公然直接地为富农的利益进行的。所以需要以蜗牛速度来发展工业，是为了让富农得到对抗社会主义的没有痛苦的解药。这种哲学在当时是右翼的哲学，也是斯大林派中央的哲学。官僚主义和农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在这个时期鼓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平等的斗争把官僚主义不但同农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而且同工人贵族空前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平等成为这些同盟者的共同的社会基础、根源和存在的原因。因此，从1923年到1928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纽带把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了。

就在那个时候，俄国的热月派显示了它同法国原来的热月派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个时期，准许富农向贫农租借土地，并雇用贫农替他做工。斯大林准备把土地租给私人40年。在列宁死后

不久，他秘密地企图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在归“私人持有”“许多年”的幌子下，转移给他故乡格鲁吉亚的农民作为私人财产。在这个问题上，他再次显示了他的农民劣根性，在他身上的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是多么顽强。根据斯大林的秘密指示，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拟订了一个关于把土地转移给农民所有的计划。只是由于季诺维也夫的抗议（他听到了这个阴谋的风声）和这个计划在党员中引起的震惊，感到自己还没有充分把握的斯大林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自然，在这件事上的替罪羊是那个不幸的格鲁吉亚人民委员。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斯大林和他的机器越来越大胆。特别是他们摆脱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限制性影响后。的确，官僚主义为了迎合它的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已经大胆地走得这么远，以致到1927年，就像一切有见识的经济家一直看到的那样，大家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要求，由于他们的本性，是漫无止境的。富农要土地，要土地十足的所有权。富农要取得自由处理其全部收成的权利。富农竭力制造以自由商人和自由工业家为形式的他自己在城市中的相应代理人。富农不想忍受以固定价格缴售其收成的强制办法。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国家劳动的剩余产品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由谁来处理剩余产品——由新资产阶级呢还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这成了下一个问题。谁处理剩余产品，谁就取得了国家权力。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它帮助了官僚主义打垮了劳动群众及其发言人左翼反对派的抵抗）和热月式官僚主义本身（它帮助了小资产阶级骑在农民群众的头上）之间的斗争。这是争夺权力和争夺收入的直接的斗争。

显然，官僚主义击败无产阶级的先锋，摆脱国际革命的影响，和使不平等的哲学合法化，并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变成后

者的仆从，而最后被拖离国家钱袋。官僚主义给自己的六年政策的后果吓得要死。因此它剧烈转而反对富农和耐普曼。同时它发动了所谓的第三时期^①和反对右派的斗争。在傻子看来，第三时期的理论和政策似乎恢复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教义。但是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是消灭右翼反对派及其仆从。臭名昭彰的第三时期在国内外演出的那些愚蠢的滑稽剧为时不久，现在无需加以叙述。如果它们对群众的影响不是那么悲惨，那原是可发一笑的。在反对右翼分子的斗争中，斯大林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施舍，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秘密。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的概念。他的思想工作只不过是进行威胁和重复反对派的口号和论点，自然加以教条主义的歪曲。他不但捡起反对派的破衣服，而且为了不让人们认出来，他把破衣服撕成碎片，他不费力气去把它们缝成新衣服（这种细微末节从来没有使他烦恼过），只要有需要就用它们来遮盖自己的裸体。但是，不能说，这堆由一只左边的袖子，一只右边的口袋，一条裤腿——这些都是按照别人的身体剪裁的——组成破布，能够被认为是十分令人满意地遮住了领袖的裸体。他的党羽也不能帮助他，因为他们必须同各民族之父的一切行动完全合拍。

另一方面，1926—1927年的左翼反对派的著作是异常丰富的。反对派对国内外生活的每一个事实，政府的每一个行动，政

① 这是1929年的一次共产国际全会上所宣布的政策，而不是一种实际倾向。这个政策的根据是这样一种假定：随着苏联五年计划的实行，俄国正朝着空前的繁荣前进，而在世界的其他部分，整个社会结构都在迅速地瓦解，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因此，共产党人有责任在所有的国家里（当然，苏联不在此例）动员群众，为即将来临的起义作准备。这个政策造成了许多愚蠢的、荒谬的，甚至是非常悲惨的后果——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德国的反纳粹力量的分裂，这一点曾有助于为希特勒的统治开辟道路。——原编者注

政局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反应，向党的各个机构，主要是政治局，递交个人的或集体的文件。这些是中国革命的年代，英俄委员会的年代，内部问题大混乱的年代。官僚主义还只不过在摸索它的道路，从右翼摸索到左翼，然后又从左翼摸索到右翼。反对派所写的大部分东西，并不是打算供一般报纸发表的，只是供党的一些领导机关了解情况之用。但是即使专门给《真理报》或理论月刊《布尔什维克》写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上发表过。

政治局中的多数坚决要扼杀反对派——至少，要闷死它，排挤它，开除它，逮捕它。这就是斯大林反驳论点的方法。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这种方针。但是逐渐地，斯大林把他们拖入了斗争。他削弱了他们精神上的保留，消磨他们的成见，使后一步成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他的擅长，在这方面，他手段之巧妙是无可争辩的。持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委员终于甚至不再温和地抗议斯大林的更粗鲁的“活动家”的暴行。逐渐，他们被迫放弃不表示态度的沉默，而采取赞同一个又一个的暴行。

我被驱逐到土耳其时设法随身携带的那部分反对派著作现在存于哈佛图书馆，谁有兴趣通过原始材料来研究那个惊人斗争的记录，谁都可以阅读这些文件。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阅读这些文件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些文件写了几乎15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反对派在两个方面是正确的：它在当时作了正确的预言和大胆地说了出来；它表现了在执行其政治路线方面的坚韧性。反对派的论点从来没有给驳倒。不难设想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被他们所引起的愤怒。在反对派文件的每一行字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反对派代表们在智力和政治上胜过政治局的多数。斯大林无话可答，他甚至不想这样做。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在进行反驳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辩论，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

能的话，在肉体上消灭他。在论点和批评面前，智力上的无能引起了愤怒，而愤怒又驱使他匆忙采取措施来消灭反对派。1926—1927年，就是这样过去的。这证明只不过是十年后使全世界震惊的背信和堕落行为的一个预演。

这个大论战的一方是左翼反对派，它求知欲旺盛、不倦地进行探索和研究，认真地寻找正确解决正在改变中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问题的办法，但是不违反党的传统。在另一方面，官僚集团冷酷地设法迅速消灭批评它的人，一切对手，使他们不得安宁的、不让他们有机会享受他们赢得的胜利的扰乱者。在反对派的成员正忙于分析对中国的官方政策的基本错误或批评同英国职工大会组成的集团时，斯大林散布谣言说，反对派正在支持奥斯廷·张伯伦反对苏联；说反对派不想保卫苏联；说某某一个反对派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的汽车；说加米涅夫打了一个电报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说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反对列宁的疯狂的信。而日期，当时情况，诸如此类的一切细节，总是模糊不清的。

斯大林进行反驳，也不只是采用这几种办法。他和他的仆从甚至不惜在反犹太主义的混水中摸鱼。我特别记得《工人报》刊登的一张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为题的讽刺画。在党报中有许多这种具有反犹性质的讽刺画和打油诗。对这些诗画博得了奸险的窃笑。斯大林对这种越来越猖狂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是友好的中立。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斗争，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因为他们是反对派”，等等。对于任何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人来说，事情十分清楚，他的故意含混的声明只是针对反犹太主义的“过火行为”而发的，同时在所有的苏联报纸上传播这个含蓄的提示：“不要忘记，反对派的领袖是犹太人。”这种说法使反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

绝大多数党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记忆，投票击败反对派的。在党机器的压力下，他们逐渐被迫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投票，正如机器本身自上至下地被拖入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样。斯大林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担任主角，因为他们同反对派论战的能力比他强得多，但是也是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后路都拆掉。给予反对派的沉重打击，在当时看来是决定性的打击，引起了对被征服者的秘密的然而却是深切的同情，同时引起了对胜利者的公然的敌意，特别是对两个主要人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公然的敌意。斯大林也利用了这一点，他公开同作为这个不得人心的反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主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脱离关系，他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在一个派系斗争中的公正而温和的调停者。

1925年，季诺维也夫为了使拉柯夫斯基对他的派系胜利得到一个深刻印象，议论我说：“一个可怜的政客。他不能找到正确的策略。这是他被打败的原因。”一年以后，这个批评我的策略的不幸的人对左翼反对派敲门求纳。无论是他，或是加米涅夫，迟至1925年，都还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成为官僚反动派的工具，正如他们在1917年想错的一样。到1926年，他们认识到，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不可能有其他的策略，因为他们毕竟是老近卫军，而老近卫军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概念是不可能没有它的国际主义观点和革命干劲的。这是老布尔什维克承担的传统。这是列宁时期全党把它们看成为不可替代的资产的原因。列宁对于老一代革命者的特殊的关心是像由同志团结以及在同样程度上由这种政治考虑所决定的。季诺维也夫向拉柯夫斯基吹嘘他用来对付我的成功的“策略”时，他是在吹嘘他如何滥用和浪费这笔资产。从1923年到1926年，在季诺维也夫的倡议下，而且起初在他领导下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斗争，是在

挽救老近卫军的口号下进行的。反对派被指责破坏布尔什维主义老近卫军。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照顾老布尔什维战士的健康。朝着公开的热月方向的转变，再没有比在政治上损害这个老近卫军方面表现得更明显了。〔在这〕以后，继之以对它的肉体上的消灭。保障老布尔什维克健康的委员会最后由一小批〔国家政治保卫局〕执刑吏所替代，斯大林奖给了他们红旗勋章。

勒菲弗尔在〔他的〕《热月派》〔一书中论述〕说，热月派的任务是将热月9日演成一个小小的插曲——仅仅是为了保持雅各宾党人的基本核心和继续执行他们的传统政策而对敌对分子的一次清洗。在热月政变的第一阶段，并没有对全体雅各宾党人进行进攻，仅仅打击了恐怖分子。〔苏维埃热月派重演了这一幕。〕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是从捍卫老近卫军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路线开始的，继而是在保卫党的团结的名义下进行的，最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全体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在这两次热月政变中，对革命者进行消灭都是以革命和所谓革命的最高利益的名义进行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作为雅各宾党人而被消灭的，而是当作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分子等等而被消灭的。同样，布尔什维克是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被消灭的。在苏联出版物中可以被公开合法使用的俄文名词“托洛茨基的走狗”，同热月9日出版的《Méhée de la Touche》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罗伯斯庇尔的尾巴”（La queue de Robespierre）有显著相似之处。而且，和热月派的基本方法的相似之处是更为明显的。勒菲弗尔写道，就在热月9日的次日，巴莱尔以公安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再次向议会保证说，并没有发生什么紧要的事。

* “巴莱尔在热月10日以他们的名义宣布，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次‘小骚乱，它没有使政府发生变动……’”

〔三个星期后：〕

* “果月2日（8月19日）……就是那个对罗伯斯庇尔提起诉讼的同一个卢歌，叙述了反动措施推行的情况，再次主张逮捕所有有嫌疑的人，并宣称有必要‘继续施行恐怖统治’。”

〔对左派的这一打击自然使右派肆无忌惮起来，他们的头脑发热了：〕

* “实行新措施的热月派最害怕的是……一次起义。右派分子利用了热月派的这种恐惧心理，开始清洗俱乐部、逮捕和杀害雅各宾党人。从那时起，右派在热月派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将巴黎或各省的一切不满的表现、批评或愤怒，说成是恐怖分子的阴谋的证据。”

全体领袖们的威信——不单是列宁个人的威信——总起来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个人领导的原则是完全不能见容于党的。党挑选比较孚众望的人充当领导，信任他们，敬爱他们，而总是认为实际的领导权来自中央委员会全体。三人领导很成功地运用了这个传统；坚持中央委员会有驾乎任何个人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斯大林，这个出色的阴谋家、中派分子和折衷主义者，这个零打碎敲的能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逐步地利用了和无耻地滥用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

1925年底，斯大林尚且以第三人称谈论领袖们，并且唆使党来反对他们。他受到拒绝对任何领导人俯首帖耳的、官僚机构中的中间阶层的喝彩。然在事实上，斯大林自己已经是个独裁者了。他是个独裁者，但他还不觉得他是领袖，而且也没有人承认他是领袖。他不是一个靠他的人格的力量，而是通过同老领导人们决裂了的政治机器的力量而成为独裁者的。迟在1930年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时，斯大林说：“你们问，我们为什么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为我们不愿意党内有贵族，因为我们党内只有一种

法律，一切党员有平等的权利。”他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这一说法。

他把右翼用为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武器。因为只有右翼有明确的纲领、利益和原则，而左翼政策的胜利使这些东西受到了危害。但是，当他看到，左翼反对派的被驱逐，在党内引起严重的疑惧和不满，并起了对胜利的右翼的愤怒时，斯大林知道怎样利用这种不满来打击右翼。他不大关心右派和左派之间的这场斗争中阶级力量的冲突，而更为关心扮演一个号称可以使不可避免的牺牲者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党免于分裂的和事佬或息事宁人者的虚伪角色。作为一个超然的仲裁者，他可以将对某些孚众望的党员采取严酷手段的责任，时而加之于党的这一翼，时而又加之于党的另一翼。但阶级是不会受欺骗的。作为一个计谋，1924年至1928年有利富农的政策比犯罪更坏；这个政策是荒谬的。富农不是傻瓜。他们从税收、物价和利润来判断，而不听信高调和雄辩：他们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言词来判断。施弄计谋决不能取代阶级力量的行动和反对的行动。它的用处充其量也是有限的。没有别的东西比不正当的无原则耍弄计谋更能瓦解一个群众政党的革命意志。也没有任何东西比它对个别革命者的意志和品德更有害。军事上的谰诈决不能取代主要战略。

大约在十月革命十年后，斯米尔加同我谈话时指出，在最初五年间，基本的倾向是弥合分歧——旧的裂缝修补了，老的创伤平复了，反对者和好了，等等。而在后来的五年内，自1923年起，情况倒了过来；一切裂缝扩大了，一切分歧扩大并尖锐化了，所有的创伤化脓了。以固有的形式和传统及老党员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新的统治阶层采取越来越反对的立场。

在这一矛盾中存在着热月政变的实质。有些人把后来一切的发展归之于一些据说是布尔什维克党固有的基本特性，这些人的

用心是徒劳的和荒谬的。按照这些人的看法，仿佛一个政党是一个清一色的东西和一个无所不能的历史因素。其实，一个政党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历史工具，是许多历史工具和学校中的一种。布尔什维克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规定为自己的目标。这一政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通过夺取政权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就这一点来说，它已完成了 一项巨大的历史任务。惟有因喜欢进行玄妙讨论而迷惑不解的人，才要求一个政党制服和消灭同它敌对的远较有力的群众和阶级的因素。一个政党到了 一定阶段、在某一时刻就开始解体，这一事实表明了政党作为历史工具的局限性。在内外压力的紧张情势下，裂缝出现了、罅隙扩大了，器官开始萎缩。这一分解的过程在 1923 年开始来临，起初是缓慢的，但不久就加快了速度。老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英勇的老干部逐渐走上了老死的道路；它被高烧、痉挛和极其痛苦的疾病发作弄得摇摇欲坠而终于死亡。为了建立一个政权（应恰当地叫做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是这个党的消灭。

许多批评家、宣传家、记者、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形形色色的业余社会学家，时时就方法上的错误训诫左派反对派。他们说，从争夺权力的观点来讲，左派反对派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左派反对派不可能夺取权力，甚至也不希望这样做——它的最有思想的领袖们的确没有希望这样做过。只有在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左派反对派这样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去争夺政权。在这些情况下，策略是建立在出击、向群众发出直接号召和对政府发动正面进攻之上的。左派反对派的不少成员在这种斗争中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并对怎样进行这一斗争有第一手的知识。但在 20 年代的初期和其后，俄国不存在革命的高潮，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在

这种情况下，谈不上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请记住，在1908到1911年及其后的反动年月里，布尔什维克党拒绝对君主制发动直接的进攻。它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为恢复革命传统和保存某些干部而斗争，以便为最后的进攻作准备；对发展中的事变进行不倦的分析；以及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可能性来锻炼先进的工人阶层。左派反对派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别的做法。的确，苏维埃反动政权给反对派造成的处境要比沙皇反动政权给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处境困难得多。但基本上，任务是相同的——保持革命的传统，党内的先进分子保持接触，分析发展着的“热月政变”的局势，为世界范围内和苏联的将来的革命高潮进行准备。一个危险是：反对派可能低估它的力量，和在若干过早的试探性出击之后放弃执行这一任务。在这些试探性的出击中，先头部队不但要同官僚机构的抵抗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同群众的冷漠发生冲突。另一危险是：在确信没有可能同群众、甚至同群众中的先进部分保持公开联系后，反对派会放弃斗争而潜伏起来以待较好时期。这就有完全遭到失败的危险……

革命粉碎并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这就是它的实质所在。群众登上舞台。他们决策，他们行动，他们用自己的史无前例的办法制订法律；他们审判，他们发布命令。革命的实质在于，群众本身成为它自己的执行机关。但当群众离开了社会舞台，退居于他们各自的市邑，撤退到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住宅，变得困惑、幻灭，疲惫的时候，这一场所就变得荒漠冷落了。而当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占据这个舞台时，它的荒凉只是更甚了。自然，对自己和群众缺乏信心的领导人总是忧心忡忡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反动取得了胜利的时期，军事警察机器比在旧政权下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在由革命到“热月政变”的这个转变中，俄国“热月政

变”的具体性质是被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法国革命没有这种东西供其使用。体现于“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仅仅维持了一年。“国民公会”真正支持这一专政，“国民公会”比俄国的革命俱乐部和小组要强大得多。这里存在着革命动力同革命动力在议会中的反应之间的传统的矛盾。各阶级的最活跃的人们参加了革命力量的斗争。其余的人——中间人士、隐而不现的人、落后分子——似乎自己选择了被摈弃的道路。在选举时期，参加者的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也包括相当大部分的半消极的和半冷漠的人们。在革命时期，议会的代表们比起他们所代表的革命派别来，要温和和有节制得多。为了支配“国民公会”，山岳派让“国民公会”统治人民，而没有让“国民公会”以外的人民中的革命分子去统治。

虽然十月革命的性质是无可比拟地远为深刻的，但“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主要是从旧执政党的残余和它们的思想意识代表们中间集结来的。那些没有逃到国外去的地主、资本家、律师和他们的儿子被吸收到国家机器内，不少人甚至被吸收入了党。更多的进入国家和党机器里的人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旧党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市侩们，这些人在暴雨狂风的革命和内战的年月里，畏首畏尾躲在一旁，而最后相信苏维埃政府稳定了，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致力于争取安适的永久地位（如果不是在中央，起码是在各省）的崇高工作。这一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是“热月政变”的当然支持者。

这一乌合之众的政治思想从淡淡的粉红色直到雪白。当然，社会革命党人总在准备用一切方法维护农民的利益，反对卑劣的工业家的威胁。总的说来，孟什维克认为应该给农民资产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土地。他们也成了农民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混得政

府工作的、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存的代表们，自然抓住农民作为他们的救生带。当时，他们在维护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方面，不可能希望获得任何成功。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经过一个保卫农民阶级的阶段。这些集团没有一个能公开出头露面。他们都需要执政党和传统布尔什维主义作他们的保护色。对他们来说，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永远确立他们所曾遭受的剥夺的制度的斗争。他们自然而然乐于接受布尔什维克中那些反对不断革命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

经济复苏了。出现了少量的剩余。自然，剩余集中在城市里，任凭统治阶层支配。随之，戏院、餐馆和娱乐场所恢复了。在一种沉睡状态中度过了生气勃勃的内战年代的、数以十万计的各行各业的人们，现在醒过来了，伸伸懒腰，开始参与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人都站在不断革命的反对者的一边。他们都需要和平，发展，和加强农民阶级，也需要城市里娱乐场所的继续繁荣。他们力求这一趋势不要间断，而不需要革命。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曾经对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演变”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使列宁感到非常不安。事变的发展表明，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一种特殊的配置，这个“策略”变成了“演变”的根源。这个革命政党以后采取的战略退却是它的蜕化的开始。

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社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终被保持下来了。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让我们记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终结。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俄国的“热月政变”无疑已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统治在全世界还没有证明为过时的话，无论如何，反对

平等和建立极其深刻的社会分化的斗争，截至目前为止还没能消灭革命的基本社会主义成果——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虽然官僚机构损伤了这些成就，但它还不敢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18世纪的末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素。那时，它在欧洲和全世界还有用武之地。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私有制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惟一最大障碍。虽然，官僚机构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他们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质，他们的保守主义，他们的政治上的同情而言，是倾向于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经济根源大体上是在于所有制的新条件。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不但威胁着财产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威胁着官僚机构本身的社会基础。它很可能乐于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抛弃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但它决不准备摈弃它自己的权利和特权去做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事情。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官僚机构和富农之间的异常尖锐的冲突。

【就在这方面，苏联的“热月政变”根本不同于它的法国版本。为了根除封建社会和保卫新秩序的存在不受外部敌人的攻击，雅各宾党专政是必要的。在此之后，热月派政权的任务是为这一新社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一新社会是以财产私有制和不限制的贸易（或大体上不限制的贸易）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1921年新经济政策恢复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是向资产阶级的勒索让步。但实际上，贸易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动摇政权的基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政府仍然操在曾经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国雅各宾党人的手中。甚至在1925年，当这种贸易自由进一步放宽时，也没有改变政权的基础，虽然威胁更大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以农民的名义进行的。在农民背后的是垂涎欲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商人和贪婪的官僚。托洛茨基主义一被击败，出租土地就合法化了。在这一路线一贯的指导下，政权自左到右的总转

变是无庸置疑的，虽然偶尔也向左摆，但接着就向右摆得更厉害。既然官僚机器利用向左退却为以后向右跃进的每一步取得更大的动力，这条时左时右的道路就始终在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有利于享受特权的少数人，它的热月派的性质是明白无误的。】

卢梭曾教导说，政治民主是同过分的不平等不相容的。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雅各宾党人的脑际充满着这一教导。雅各宾党专政的立法，特别是关于工人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是以这种方针为根据的。苏维埃的立法也是这样，甚至在军队中也废除了不平等。在斯大林统治下，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样。而今天，苏联不但存在着社会的不平等，而且还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官僚机构厚颜无耻地以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原则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在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不平等的指责的运动中，在它为实行差别工资而进行的鼓动中，官僚机构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作掩护，并且站在辛勤劳动的“中”农和技术工人的背后，为它的特权寻找理由。它指责说，左翼反对派企图剥夺熟练劳动应得的较高的工资。这同资本家和地主对熟练技工、野心勃勃的小商人和永远遭殃的农民的假慈悲是同出一辙的煽动性的伪装。这是斯大林的卓越的阴谋，这主张自然马上在享有特权的官员们中间找到了支持。这些人第一次把他当作他们的精选的领袖；平等被极端无耻地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反对派被谴责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和反对列宁福音的罪魁。官僚主义分子仰身坐在无产阶级专用的汽车里，在通往无产阶级所拥有而只有少数人被允许进入的避暑胜地的路上，纵声大笑地说：“我们过去进行斗争，为的是什么？”这句含有讽刺意味的话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官僚机构曾对列宁表示尊敬，但他们总觉得他的清廉的手是可厌的。1926年到1927年间流传的一句俏皮话，表明了官僚机构对联合反对派领袖们的态度：“他们容忍加米涅夫，但不尊重他。他们尊重托洛

茨基，但不能容忍他。他们对季诺维也夫既不容忍也不尊重。”官僚机构要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间找一个拔尖的人作领袖。斯大林的坚定的性格和狭隘的观点引起了信任。叶努基泽对谢雷布里亚科夫说：“我们不怕斯大林”。“一等到他开始摆起架子，我们就搞掉他。”可是，到头来，倒是斯大林搞掉了他们。

法国的“热月政变”是左翼雅各宾党人发动的，但最后变成了反对一切雅各宾党人的反动。“恐怖分子”、“山岳派”和“雅各宾”变成了骂人的话。在各省，自由之树被砍倒了，三色帽徽被踩在脚下。这在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想像的。集权党的内部，有它在十月革命的正式旗帜下动员来的一切不可缺少的反对分子。这个党不容忍任何竞争，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也是如此。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斗争没有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斗争，这是因为党将这一斗争囫圇地吞下去了，为斗争规定了界限，并且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进行这场斗争。

在头脑简单的人的心目中，“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似乎推翻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热月政变时期的理论。然而事实上，这些理论和实践正好证实了关于热月政变的理论。热月政变的本质过去是、现在是，也不能不是社会性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形成，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新下层的产生。覬覦这一身份的有两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本身。它们在〔打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抵抗的〔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一任务完成后，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官僚机构由于它的孤立和脱离无产阶级而感到害怕了。它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粉碎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和继续发展壮大起来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它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

这里，它不再同法国的热月政变有相同之处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变得至高无上了。保卫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国有化，是官僚机构的生死攸关的法则，因为这些是它的统治地位的社会根基。这就是它要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原因。官僚机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一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新反对派代表们大批投降这一事实，是它已经取得这种支持的最好的证据。反对富农、反对右翼、反对机会主义——那一时期的官方口号——在工人们和许多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们听来，好像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当时，我们警告他们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还在于谁在做这些事。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机构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以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没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们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机构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重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为了了解俄国的“热月政变”，弄清楚党作为一个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法国革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同布尔什维克党相类似。“热月政变”时期，法国有不同的社会团体，〔使用各种〕政治名号，在特定的社会利益的名义下相互攻击。热月派攻击雅各宾党人，说他们是“恐怖分子”。“金色少年”是右翼，支持热月派，同时也形成对热月派的威胁。在俄国，所有这些事变的进程、冲突和联合却是在单一的党的掩盖下进行的。

表面上，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和 20 年后，同一个党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目标的名义下纪念着它的存在的各个阶段；这

目标就是：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和团结。然而事实上，党的任务和清洗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质。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老革命党从内部清洗了野心家；按照这种精神，各委员会是由革命工人组成的。相当大的一批企图钻到政府里的冒险家、野心家或彻头彻尾的无赖之徒都被赶出去了。但相反地，近年来清洗的矛头完完全全是指向老革命党的。清洗的组织者是党内最官僚化的和才干最低劣的人们，清洗的受害者是坚持革命传统的最忠诚的人，特别是党的最老的革命一代、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成员。清洗的社会意义已经根本改变了，然而，这种变化在被进行清洗的是同一个党这一事实掩盖着的。在法国，在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区反对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发动得太迟的运动。后者以热月派为代表，而受到“金色少年”一帮人的支持。

就连这一帮“金色少年”，今天也被吸收到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去了。这些人是野战军，是从资产阶级的子弟中征集来的，这些享有特权的青年人坚决准备保卫他们自己的或他父母的特权地位。下列事实足以说明问题：若干年内，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是柯萨列夫。众所周知，他是个滥用他的高位追求个人目的的一个道德堕落分子。他的全部机器是由同一类型的人组成的。这就是俄国“热月政变”的“金色少年”。他们被直接吸收入党，掩盖了它作为特权阶层反对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一支野战军这一社会作用。苏联金色少年们高声叫嚷：“打倒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万岁！”正好比法国“热月政变”中的“金色少年”们叫喊：“打倒雅各宾！国民议会万岁！”

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对国民议会所施加的压力而撑持住的。热月派，即叛变的雅各宾党人竭力从相反的方向施用同样的方法。他们开始在长裤党人当中把穿着讲究的资产阶级子

弟们组织起来。这些金色少年，或者像保守报刊溺爱地称呼的“青年人”，在国家政治中成为如此重要的因素，以至当雅各宾党的人从所有行政岗位上被赶出后，“青年人”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同样的情况仍然在苏联发生着。的确，在斯大林统治下，那就发展得更加深远了。

热月派资产阶级的特点是深切仇恨山岳派。因为它自己的领袖们是来自长裤党人的领导人。资产阶级和同它合伙的热月派最怕重新爆发群众运动。就在这个期间，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完全形成了。它疯狂地仇恨雅各宾党人和半雅各宾党人——认为这些人是他们最神圣的利益的出卖者、投敌分子、叛徒。苏维埃官僚机构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仇恨有同样的社会性质。他们是属于同一阶层、同一统治集团和同一享有特权的官僚机构的人们。他们抛弃了原来的地位，只是为了将他们的命运同长裤党人、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以前已经形成。它在制宪议会中在政治上脱壳而出，但它不得不经历国民议会时期和雅各宾党专政，以便清算它的敌人，而在热月反革命政变期间，它就恢复了它的历史传统。苏维埃统治集团完全由热月派官僚组成，他们不但是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罗致而来的，还是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征集来的。而后者是要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狂热者”算旧账的。

热月反革命政变有它的社会基础。那是一个有关面包、肉、住宅和盈余——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奢侈品——的问题。采取严格限定最高价格方式的雅各宾资产阶级的平等，限制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福利（财产）的增长。在这一问题上，热月派完全明白并且清楚地了解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在他们制订的权利宣言中没有包括“人们在权利方面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

的”这一主要条款。热月派在回答那些主张恢复雅各宾派的这一重要条款的人时说，它是含糊不清的和危险的；人们的权利当然是平等的，但是他们的能力和财产是不平等的。热月派是对斯巴达情操的直接违抗，反对争取平等。

在苏维埃热月派中可以找到相同的社会动机。首先，这是一个抛弃了革命初期的严格限制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官僚机构取得日益增多的特权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建立自由的、节约的政权的问题。在这方面所作的让步是临时性的，而且它持续的时期要比原来打算的短暂得多。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由政权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上层的手中。官僚机构的特权则有其不同的根源。官僚机构把国民收入中它能够或靠使用暴力、或靠运用权势、或借直接干预经济关系而攫取的那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有关国家剩余产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很快地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开辟了官僚机构取得政权的道路。

补遗二 “金托”^①当政

大卫在登上以色列国王王位之前曾放牧羊群和吹弄笛管。当我们考虑到，几乎所有半游牧的以色列人的子孙都牧羊，而且那时治理人民的艺术并不比牧羊复杂得多的时候，他的奇特的经历就变得容易理解了。然而，从那时以后，社会和统治艺术的复杂性已大大地增加。当〔一个现代的〕帝王〔不得不〕让位的时候，〔人们不再需要〕在牧人中间寻找他的继承人。这个微妙的问题是在王朝的自动世袭的基础上获得解决的。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风云人物。尤利乌斯·凯撒是权力的自然候选人，他的出身使他成为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寡头政权中的一员。拿破仑第一并不是这样的。然而，即便是他，也不像我们时代的主要独裁者一样〔是暴发的新贵〕。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出色的军人〕。至少，〔在这方面〕他〔像尤利乌斯·〕凯撒一样，忠实于同样的古代〔传统〕，那就是：一个武士既已表现出在战场上指挥武装人员的能力，那他就更有资格用这种能力来统治非武装的、无防卫能力的平民百姓。〔假拿破仑（一般人这样称呼小拿破仑或拿破仑三世）〕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古老的传统。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完全缺乏军事天才的人。但是，即便他也不完全是一个暴发的新贵。他是，或者被认为是他的〔伟大的〕伯父的

① “金托（Kinto），格鲁吉亚语，意即无赖。——译者注

侄儿。此外，是那只飞翔在他头上的驯服的鹰^①在关键时刻〔使他变成了伟人〕。〔作出下面的结论应该说是无情的：〕若不是这只象征性的鹰，路易·拿破仑亲王的脑袋〔的外边也会像他的脑袋里边一样地空空如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甚至连拿破仑三世的业绩也仿佛成了荒诞无稽的历史陈迹。民主制度稳固地建立起来——至少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是如此。它在拉丁美洲国家里的进展〔与其说是重大的〕，无宁说是富有教益的；它在亚洲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它唤醒了非洲的人民。立宪制度似乎是文明的人类所能接受的惟一方法和惟一的政府制度。因为文明在继续发展和扩大，民主制度的未来仿佛是所向无敌的。

俄国在那次战争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给这一历史概念以第一次打击。在死气沉沉的状态和混乱的民主制下度过了八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来临了。但是，这毕竟仅仅是革命的“插曲”，而革命本身仿佛只是俄国的落后的产物，是英国在17世纪中叶和法国在18世纪末期所经历的那些震荡在20世纪的重演。列宁仿佛是莫斯科的克伦威尔或罗伯斯庇尔。这一新的现象至少还能够加以类比，这一点是聊以告慰的。

〔然后出现〕了“常识神经病”——这是施马尔豪森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它给〔历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在历史上不容易找出与墨索里尼和11年后的希特勒相同的先例。可以听见将他们比作凯撒、西格弗里德和卡庞的喃喃低语。〔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在经历了长期代议制熏陶的文明的民主国家内，神秘的陌生人突然掌握了政权，他们在年轻时所做的工作

① 指法兰西的军旗，意即他得到军队的支持用武力发动政变。——译者注

几乎同大卫或约书亚一样微贱。他们没有军事上的英勇武功。他们不曾向全世宣布任何新的思想。他们背后并没有立着头戴三棱帽的伟大祖先的影像。罗马的“母狼”^①不是墨索里尼的祖母。卍字不是希特勒家族的徽章，而只是从埃及人和印度人偷来的标志。自由民主思想〔仍然〕对法西斯之谜束手无策。〔毕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上去都不像天才。然则，他们的令人头脑晕眩的成功又怎样解释？

〔这两个法西斯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时代里，这个阶级本身不能够提出独创的意见，也不能产生有创造性的领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际上向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进行剽窃和模仿。墨索里尼偷盗布尔什维克和加布里尔·邓南遮，并向大企业界寻求灵感。希特勒则模仿布尔什维克和墨索里尼。因此，依仗资本主义〔大亨们〕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是典型的二流人物——正好像不管你从上面或从下面来看，小资产阶级本身在阶级斗争中也总是在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

小资产阶级专政在18世纪末仍然是可能的。但就在那时，它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罗伯斯庇尔被右翼推下了深渊。〔克伦斯基的悲惨的挣扎并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无能；连那么能干和富有进取心的帕尔钦斯基，也被证明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克伦斯基仅仅是这种社会软弱性的更为合适的代表。若不是布尔什维克攫取了政权，在法西斯向罗马进军五年之前，世界上就有了一个俄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俄国不能摆脱20年代初期席卷战后欧洲的深刻的反动，是本书作者在别处讨论的主题。这里只消谈到这一点就够了；〕1922年10月30日墨索里尼领导下第一个法西斯内阁在意大利的组成；1923年9月13日〔使普里莫·德·里维

^① 相传罗马为狼所建。——译者注

拉上台)的西班牙政变;1923年10月15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对46名布尔什维克的宣言的谴责;——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时代的这些迹象将会引起认真的考虑。〕

然而,在〔他能加以利用的〕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内,墨索里尼已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随机应变的才能、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宽容的气度。他继承了意大利即席而作的悠久的传统。即席而作的天赋是这个民族的习性。他是机灵的和不同寻常地野心勃勃的,为了贪得无厌地谋求成功,他抛弃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事业。他对政党的愤怒变成了一种动力。他在前进的过程中创立并且破坏理论。他是无耻的个人主义和在自夸掩饰下的怯懦的化身。希特勒表现出疯狂和唯我独尊的特性。个人的创伤在他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脱离了本阶级而又不肯当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常的工人安分守己地认为自己的地位是正常的。但希特勒是个狂妄的、有病态心理的不安于位的人,他把对犹太人和社民党人的憎恨作为垫脚石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拚命地决心爬得更高。在行进的过程中,他为自己确立了充满无数矛盾和内心保留的一套“理论”——一种德国帝国野心和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怨气冲天的白日梦的混合物。在试图找出与斯大林相同的历史人物时,我们不仅必须把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和列宁排除出去,而且也必须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排除出去。当我们想起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或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我们〕就比较能对斯大林有所了解。

在我站起来宣读左派反对派宣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经常被口哨、喊叫、威胁和咒骂所打断。我遇到的情况,非常像十年前我在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开幕那天站起来宣读布尔什维克

宣言时的情况。我记得伏罗希洛夫叫喊：“他的做法就跟他在预备国会里的做法一样！”这个说法要比发出叫喊的这个人当时所意识到的更为确切得多。

到了1927年，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变成了真正令人作呕的奇观。问题是不经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在幕后召开的有斯大林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的。斯大林当时要同右翼集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进行政治交易。每届中央委员会确实至少要举行两次正式会议。攻击反对派的方针是事先准备好的，任务和讲话是预先指定的。喜剧上演时，每次都更像酒吧间的下流、暴乱的滑稽戏。诬蔑人的语调更加放肆无忌。更加粗暴无礼的委员们，仅仅是由于他们对待反对派的粗暴才能而新近被吸收入中央委员会的向上爬的人，不断地用翻来覆去的毫无意义毫无根据的指控和闻所未闻的粗话和辱骂，打断老革命家的讲话。所有这一切的导演是斯大林。他在主席团的后面走来走去，不时用眼盯着那些被指定发表演说的人。而当辱骂某一反对派成员的话达到完全无耻的程度时，他毫不掩饰表示他的赞同。会上说出的话是如此下流，出席会议的人是如此粗野，真正使这些蠢人道德败坏的那个人是如此地令人厌恶，以至很难设想，我们是在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梯弗里斯街头的习惯已经搬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来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回忆起斯大林的老合作者菲利普·马哈拉泽时，对他的评语：“他简直是一个‘金托’！”

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的另外一位高加索的老同志布杜·穆吉瓦尼，将他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一次谈话告诉了我。穆吉瓦尼企图说服斯大林，有必要同反对派达到某种协议；不然，党就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震荡。斯大林默默地听着，在室内走来走去，显然不赞同。他然后煞有介事地以轻盈的步伐走到房间的远远的一角，又回转身来默默地走向穆吉瓦尼。他肌肉紧张，提起

脚跟，举起一只手臂，突然停住脚步，用可怕的声音叫喊：“一定要粉碎他们。”穆吉瓦尼说，他简直是可怕……。

据别洛博罗多夫说：

“杀死沙皇是斯大林的主意。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将王室安置在叶卡特林堡，而斯大林怕的是，只要尼古拉二世还活着，他就会引起白卫军之流的注意。1918年7月12日，斯大林已经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好了。7月14日，他使戈洛舍金参与他的计划。7月15日，戈洛舍金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意图给负责看守王室的政治委员别洛博罗多夫一封密电。7月16日，别洛博罗多夫给莫斯科发一个电报说，叶卡特林堡在三天内将要陷落。戈洛舍金去见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将别洛博罗多夫的报告放进口袋内，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沙皇落到白卫军的手里。’这句话等于是死刑判决。”

我的计划：审判——无线电——文件。

毫无疑问，对人的、肉体上的残忍，即通常所谓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当斯大林被监禁在巴库监狱里的时候，和他同住一间囚室的一个人曾经梦想革命。当时名叫柯巴的斯大林出其不意地问他：“你渴望血吗？”他拿出藏在靴子里的一把刀子，高高地提起一只裤脚，在腿上扎了一个深而又长的切口。“这是血，给你。”在他当上苏维埃的要人以后，他在他乡下的家里，以割断羊的喉咙或将煤油倒在蚁冢上放火去烧来取乐。这些独立的旁观者说出的关于他的故事是很多的。世界上具有这些倾向的人是很少的。这些恶劣的自然本能发展到这种可怕的程度，必须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他将他的一切创伤、憎恨、怨愤、忌妒和爱慕从一个省的狭小范围带到全国广大范围内。他任何事情都没有遗忘。他的记忆力是最善于记恨的。他制订了他自己进行报复的五年计划，甚至

十年计划。

(审判)

赫夫苏尔族有格斗的习惯。倘若赫夫苏尔人想在某人身上报仇雪恨，他就把一只死猫丢在他敌人的坟墓上。

据齐奈达·奥尔忠尼启泽说，斯大林会说：“在死人的墓上躺着一只死猫。”

斯大林同希特勒的联盟满足了他的报仇之心。首先，他想羞辱英法政府以报复在张伯伦放弃追求希特勒之前克里姆林宫所受到的侮辱。他自己以下面的做法得到最大的乐趣：暗地里同纳粹谈判，而表面上却同英法的友好代表团公开谈判以欺骗伦敦和巴黎，然后出乎意外地把他同希特勒缔结的条约突然公布出来。他是个悲剧性的小人。

如果将全能的和不忠实的神话即对社会主义及革命的强烈憎恨除掉是可能的话——如果说，关于大裁判官的诗——关于复仇主义的悲剧的诗——能够用世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堕落的概念——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15世纪……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诗以基督默默地吻大裁判官的嘴唇而结束。基督教官僚主义的后裔之一的告别。列宁尽管是谨慎的，也要向他脸上吐唾沫。

雅罗斯拉夫斯基主义。

老人苏尔茨——市侩主义的狭隘性。

莫罗茨——党的良心，只是没有良心。

希克尔雅托夫——一个被压服的、顺从的和稍带醉意的工人。矮小的希克尔雅托夫会对列宁说：“走开，别打搅我们，不然我们要烧死你！”

亚历山大和弗拉基米尔——俄国知识阶层的精华。在亚历山大的身上，表现出知识阶层结束了它的可悲的过去；在弗拉基米尔的身上表现出知识阶层建造了通向未来的桥梁。

领袖不是天生的，正好像罪人不是天生的一样。德施塔尔夫人认为，缓慢的、然而不间断地趋于完美的过程，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看得到。

可以这样说，所有历史上的天才人物、一切创造者、一切首创者，在他一生的前 25 年或 30 年间，都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的精髓。随后而来的只是它的发展、深化和应用。在斯大林一生的早期，我们除了听他用粗俗的言语重复现成的老一套的话外，没有听到他说过别的东西。

斯大林只是在官僚机构在它自己的总书记的领导下完全消灭了列宁的全部工作人员后，才上升到天才的地位的。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论题上都没有发表过片言只字的人，在他年龄远远超过 40 以后，自动地升到他的官僚机构的顶峰，——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天才。这是完全用不着证明的。

据尼古拉也夫斯基说，布哈林把斯大林说成是“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天才”(apportioner of genius)。这是一个确切的说法，只是他并没有“天才”。这是我第一次从加米涅夫听来的。他指的是斯大林一点一滴地、在一个分期计划的基础上实现他的阴谋的才能。要使阴谋的实现成为可能，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政治机器。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工作包括逐渐地顺着迂回的道路钻进机器内部，然后控制这个国家的舆论。如果加速这个过程，一下子将这一变化全部摆在人们面前，就会引起惊惧、愤怒和抵抗。

在基督的 12 个门徒中，只有犹大是一个叛徒。可是，倘若他大权在握，他会将其他 11 个门徒以及所有的次要门徒（路可说，耶稣有 70 个次要门徒）都说成是叛徒。

1924 年 11 月 19 日，斯大林在工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全会上说：

“听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在 3 月到

10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踌躇不决，被内部的矛盾所腐蚀，百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同志，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样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言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他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①。

我当然没有说过关于党特别是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不能胜任或没有价值的话。我只说明了内部倾轧的性质。但真正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其2/3的委员由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特务组成，又怎能赢得胜利。我们还没听说过对这个神秘的谜的解释。自1918年开始，奸细们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占绝大多数。换句话说，在革命的关键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完完全全是由奸细们决定的。不用说，在1924年，斯大林不能预见到，在15年内，他的方法的逻辑会使他走向可悲的极其荒谬的地步。斯大林的典型特点是他抹煞关于往事的回忆——除了个人的宿怨和得寸进尺的报复欲以外的本领。

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已经设法使一个专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发展。能不能根据1936年到1938年而对1924年作出结论呢？1924年，他还只是在为夺取权力而斗争。斯大林在当时是否能进行这一阴谋呢？有关他的履历的全部材料使我们不能不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梯弗里斯正教中学起，他就留下了最恶毒的怀疑和指控的记录。在他看来，墨水和白报纸在政治斗争中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只有死人才不会再醒过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5年同斯大林决裂后，都将信件存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① 参看《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7页。——译者注

“倘使我们突然丧命了，那么，要知道，这是斯大林干的。”

他们劝我照样做。加米涅夫对我说，“你认为斯大林在忙着答复你的论点，没有的事。他在盘算着怎样把你除掉而又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你记得 1923 年前鞑靼人民委员会主席苏丹—加里也夫被逮捕的事吗？”加米涅夫继续说：“这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第一次逮捕一位重要党员。不幸，季诺维也夫和我同意逮捕。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尝到血的味道。我们一同他决裂，就写下遗嘱性质的东西。我们在其中警告说，倘若我们‘意外地’死去，斯大林应对其负责。这个文件存放在可靠的地方。我劝你同样做。你要料想到那个亚细亚人会做出任何事情来的。”

季诺维也夫又说，“倘使他不是怕报复——害怕青年人的恐怖行动，他早在 1924 年就能把你弄死。这就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决定第一步先消灭反对派干部和推迟杀死你，直到他有把握能杀死你而不受惩罚。他痛恨我们，特别是加米涅夫，主要是因为，关于他的事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来杀死我们。”这不是猜测之词；在三人统治的蜜月期间，他们相互间是交谈得相当坦率的。

斯大林的不间断的胜利开始于 1923 年，那时，他逐渐越来越深信历史的进程是可以藐视的，莫斯科审判是这一欺骗和暴力政策的顶峰。同时，斯大林开始忧虑地觉察到，他脚下的地在崩陷和垮下去。每一新的欺骗需要加倍的欺骗来支持它；每一暴行扩大了需要支持这一暴行的新的暴行的规模。一个明显的衰退时期开始了。在此时期，全世界与其说对他的力量、意志、深仇死怨感到惊讶，无宁说对他的智力和政治方法的低劣感到惊讶。

斯大林的狡诈本质上是非常粗糙的，是适合于原始人的头脑的。例如，倘若我们研究一下莫斯科审判的全部情况，我们就看

得出，它们的设计和执行的粗糙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1925年4月，我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我的继承人伏龙芝是个在西伯利亚做多年苦工的老革命家。他命中注定不能长久担任此职——只有〔7个〕月。1925年11月，他死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在他任职的几个月中，伏龙芝在保卫红军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督问题上，表现出来过多的独立性；这就是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2年后丧命的那种罪过。巴让诺夫曾说，伏龙芝是一个军事阴谋的中心人物；这是荒唐的胡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冲突中，伏龙芝反对斯大林。对于独裁者来说，这位新任军事人民委员的反对，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才智有限而驯服的伏罗希洛夫对他似乎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工具。党内流传的谣言说，伏龙芝的死是因为斯大林的需要。

根据可用的材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伏龙芝患了胃溃疡；他的私人医生认为，他的心脏受不了哥罗芳麻醉剂；伏龙芝于是坚决反对动手术。斯大林派了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医生——他的心腹特务——召集了一个挑选出来的医生小组，这个小组建议动手术；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决定；伏龙芝不得不服从，就是说，不得不接受死于麻醉的结局。伏龙芝死的情况在文学著作〔鲍里斯·皮尔尼亚克著《不陨落的月亮的故事》〕中以歪曲的形式反映了出来。斯大林立即没收了这本书，并使作者丧失了官方的宠信。〔皮尔尼亚克〕后来不得不公开地、而且非常谦卑地“悔过”。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紧跟着发表一些间接证明他无辜的文件。很难说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但是，这种怀疑的性质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到1925年底，斯大林的权力已经如此强大，以致他能够依靠一个驯服的、用哥罗芳和外科医生的刀子武装起来的医生小组。然而，那时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10。

巴让诺夫在提到我于1929年2月被放逐到土耳其一事时写

道：

“这仅仅是手段的一半。我不认得我的斯大林……自从凯撒·波尔吉亚的时代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当时，人们机敏地在法莱纳斯—阿杰尔^①酒杯里投放一种速效的药粉，或者是敌人咬了一口苹果就死去。最新的科学成就启发了今天的行动措施。科施杆菌的培养液掺在食物内，经常给人吃下去，可以逐渐使人患奔马性肺结核而遽然死去。……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因为这在他的习性和特点中占有很大地位。”

当巴让诺夫的书于1930年出版时，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文字上的练习。莫斯科审判之后，我比较认真地看待这本书了。谁曾使这个年轻人作出这种推测呢？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呢？巴让诺夫曾在斯大林的会客室里受过训练。在那里，早在1926年，即巴让诺夫离开斯大林的秘书处那一年，科施细菌和波尔吉亚施毒的方法显然就被讨论过了。两年后他逃出国，随后变成一个反动的亡命徒。

当叶若夫充任国家政治保安部的领导时，他改变了施用毒药的方法。天公地道地讲，雅戈达必须被承认是这种方法的创始人。可是，他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1938年2月的审判里，雅戈达的秘书布拉诺夫的被控罪名之一就是施毒，他因此而被枪决。布拉诺夫得到过斯大林的信任可以由下列一事得到证明：他是受令押送我和我的妻子流放到中亚细亚而后流放到土耳其的那个人。为了大力营救我以前的两个秘书塞尔穆克和波兹南斯基，我要求将他们同我一起送出国。布拉诺夫害怕在土耳其边境遇到难堪的张扬并希望将一切事情安排得平平静静的，就同莫斯科打了直通电报。半个钟头后，他将克里姆林宫答应把波兹南斯基和塞尔穆克

^① 意大利一种葡萄酒。——译者注

在我之后立即送出来的电报纸带给我看。我不相信。我对布拉诺夫说，“你总会使我受骗的”。

“那么你可以叫我无赖。”

“那对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告慰的，”回嘴说。

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作证说，雅戈达对他说，“有必要减少高尔基的活动，因为他妨碍了‘高级领导人’”。关于“高级领导人”的这个说法被重复了好几次。在法庭上这个提法被解释为指李可夫、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言。但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那时他们是最下贱的人和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牺牲品。“高级领导人”是克里姆林宫主子们的别名，主要是指斯大林。让我们回忆一下，高尔基正是在季诺维也夫受审的前夕死去的。

斯大林没有预见到第一次审判的后果。他希望把问题限制在消灭他最痛恨的几个敌人的范围内——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已计划了用十年工夫去消灭他们。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官僚机构害怕了，恐惧了。官僚机构第一次看到斯大林不是地位平等的人当中的领袖，而是一个亚细亚的暴君，一个专制君王，成吉思汗——布哈林曾这样称呼他。斯大林开始害怕他会丧失他的权威地位并且对苏维埃官僚机构老资格人士失去号召力。他无法使他们忘掉他的过去，不能使我们对他自封为驾乎他们之上的仲裁者佯作不知。惧怕和恐怖随着危及人的生命和利益的事例的增加而迅速地增长着。没有一个老革命者相信这种控告。后果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他不得不超出他的原定计划的范围。

就在准备1936年大规模清洗的期间，斯大林建议起草“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所有瓦尔特·杜兰特和路易斯·费舍斯之流对新世纪的民主备加赞扬。对斯大林宪法的这一切无耻的叫嚷，其目的是在于争取全世界民主舆论的赞同，然后在这个可庆可喜的背景之下，将斯大林的一切反对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而

加以粉碎。这是斯大林智力上近视的典型，他对私人报复比对抵挡法西斯对苏联和全世界工人的威胁更加关怀。在准备“最民主的宪法”的同时，官僚机构忙于举行一系列的宴会，宴会上大谈特谈“幸福的新生活”。在每一次宴会上，给斯大林拍了照——被男女工人围绕着，膝上坐着笑容可掬的儿童等。他的自咎的内心不得不服用这种镇痛剂。我说，“很明显，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策划中”。被引进克里姆林宫机构里的别的人也对斯大林的过度的仁慈和宽厚心存疑惧。

某种类型的莫斯科记者重复说，苏联在清洗之后比以前更加团结一致了。这些大人先生们甚至在清洗之前就对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的团结大加赞许。但很难理解，任何头脑健全的人能够相信，很多最重要的政府、党、外交和军队的代表人物能被证实为外国代理人，却又不是一个政权存在着深刻的内部不满的标志。清洗是一种严重病症的表现。消除症候很难说就是治好病症。我们有沙皇政府专制政权的先例。这个政府在战争时期以叛国罪逮捕了国防大臣苏霍米尔诺夫。协约国的外交官对萨宗诺夫说，“你们的政府是个强大的政府，竟敢在战争时期逮捕它自己的国防大臣。”事实上，那个强大的政府当时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苏联政府不但逮捕了和处死了它的现任国防部长图哈切夫斯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它消灭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全部高级指挥人员。斯大林宣传机器在通情的驻莫斯科外国记者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就苏联的实际情况欺骗了世界舆论。所谓固若磐石的斯大林政府是一个神话。

斯大林用他的罪恶审判证实了比他想要证实的更多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他没有能够证实他想要证实的东西。他仅仅暴露了他的秘密试验室。他强迫 150 人供认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但是，这些供认的总和构成了斯大林自己的供状。

斯大林在一两年内处死了伏罗希洛夫的所有副职人员和同僚，他的亲密的合作者，他的最可靠的人。这该怎样去理解呢？是不是伏罗希洛夫在他对斯大林的态度上开始有独立的表现呢？更加可能的是，伏罗希洛夫被他亲近的人所怂恿。军事机器是非常贪得无厌的，不轻易忍受文职人员加之于它的限制。斯大林预见到，他同那个强大的机器有可能发生冲突，于是决定在伏罗希洛夫变得不能控制之前，就使他安分守己。斯大林通过国家政治安全部、即通过叶若夫，背着伏罗希洛夫进行了消灭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的准备工作，而在最后一个时刻内使他面临一个必须抉择的局面。这样，伏罗希洛夫既落进了斯大林的预谋和不忠不义的圈套，只得默默地同斯大林合作，消灭了指挥人员的精华。此后，他命中注定只能充当一个丝毫不能反对斯大林的可怜而无力的的人物。不靠赢得一个人的钦佩，而靠迫使他参与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来使一个人依附于自己，——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个老手。这些人就是筑成以斯大林为顶峰的金字塔的砖石。

“朕即国家”这句话比起斯大林的集权政权的实际情况来说，几乎是一句自由主义的格言。路易十四只把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罗马教皇把他们自己同国家和教会等同起来——但也只是在教皇统治俗世的时代。集权国家远远超过凯撒一天主教。因为它还干预国家的全部经济。斯大林不像太阳国王^①，他可以正确地说：“朕即社会”。

^① 指路易十四。——译者注

附 录 三种俄国革命观

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的焦点和根本的分歧，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其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这种关于革命观的争论，与斯大林传记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斯大林本来并未参加。他写的几篇与此问题有关的宣传文章，是完全没有理论价值的。好多执笔为文将那些思想通俗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比斯大林写得好些，而且好得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观作任何批判性的阐述，自然是属于列宁传记内的事情。但是理论也有其自己的命运。在第一次革命及其以后的时期，直至1923年为止，当各种革命学说都制定出来并加以应用的时候，斯大林是没有什么独立立场的，可是1924年发生了一种突然的变化，从而开始了一个官僚反动和彻底地重新估价过去的时代。革命影片颠倒放映，旧时的学说被人拿出来作新的估价或加以新的解释。于是，乍看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地，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论上面，视之为“托洛茨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源泉了。自此以后好多年中，对于“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便成为斯大林及其伙伴们所有理论（恕我滥用这个字眼）著作的主要内容了。既然，在理论方面，“斯大林主义”的每一点都出于对不断革命论（1905年提出的）的批评，那么叙述这个理论，说明它与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的差异，显然也是本书分内的事情，至少是应

当作为本书附录来加以叙述的。

俄国的发展，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但历史的落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依样画葫芦地于 100 年或 200 年后再走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道路。宁可说这个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上最高的成就，纳入于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在思想方面说来，也是这样。正因为它的历史的落后性，俄国才能成为欧洲唯一的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就已经获得巨大发展的国家，——当然是这样的，因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二者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俄国得到最深刻的理论的检验。

唯心主义的民主派（大多数是民粹派）迷信地拒绝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称之为“民主的”革命，图谋拿这中性的政治商标来掩饰革命的社会内容，不仅为了欺骗别人，而且为了欺骗自己。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始祖普列汉诺夫，远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他反对民粹派的时候，就已证明俄国没有任何理由依靠自己爱走的发展道路了。同“凡世上的”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须经过资本主义炼狱。在这条道路上，俄国可以争得政治自由，这是无产阶级继续为社会主义斗争时所不可缺少的。普列汉诺夫不仅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视前者为目前的任务，视后者为未来的远景，而且规定了两种革命中各自的不同力量配合。无产阶级先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去争得政治自由；然后，经过几十年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与资产阶级直接冲突。

1904 年末，列宁写道：“俄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

贬低和庸俗化。……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①1905年，他又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民主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②他坚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③——这话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内为无产阶级往后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这范围内，列宁还是跟在普列汉诺夫后面亦步亦趋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路线的交叉点。

在此情形下，柯巴宣传的时候自然是不敢越出那些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遗产的通俗公式的范围以外去的。他在1905年1月间写道：“根据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制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应当争取的！只有这样的立宪会议才能使我们有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极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国。”^④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做战场，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持久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前途。1907年，即当国外的和彼得堡的报刊已经进行了无数次争论，而理论上的预断又经过

①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112页。——译者注

②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0、34页。——译者注

④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9页。——译者注

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严格的检验之后，斯大林写道：“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农奴制度，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结果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一点，似乎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是同意的。”^①这里，斯大林并非说革命当以什么开始的，却是说革命当以什么告终的！他预先把革命限制于“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而且说得相当坚决。我们想在他那时写的著作中找到一丝一毫关于与民主革命有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暗示，那是白费气力。他的这个立场一直保持到1917年2月革命初期，直到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为止。

在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及一般孟什维克领袖看来，把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性质，首先含有这样一种政治意义，即避免过早地拿社会主义这个红色幽灵去打扰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吓跑”，走入反动营垒去。孟什维克的主要策略家阿克雪里罗得在统一代表大会^②上说道：“俄国社会关系仅仅成熟到可以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应当提起无产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直接争取政权一类的话。……无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而斗争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注定我们的无产阶级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非与资产阶级合作不可。”如此说来，俄国革命的内容就被预先限制在那些符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改革范围之内了。

这就是两派根本分歧的出发点。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否认俄国资产阶级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有力、更彻

① 参看《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4页。——译者注

②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日至25日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译者注

底得多地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俄国革命的症结乃是土地问题。……根据对群众为土地斗争的条件的说明……我们对革命的成败问题必须下定决心。……”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将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将农民的土地纲领看做资产阶级进步纲领。他在统一代表大会上说道，“土地国有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手段。土地国有化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将加剧阶级斗争，加强土地的利用和农业投资，降低粮食价格。尽管公认土地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俄国资产阶级还是反对没收贵族地主所有土地的，正是为了这个原故，俄国资产阶级才力图在普鲁士式宪法基础之上与君主制度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所提的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他宣布，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任务，乃是要建立一种“民主专政”，把这作为惟一的手段，来彻底肃清俄国的封建残余，来创立一种自由农民阶级，来开辟美国式的而非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列宁写道：革命的胜利，“……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拚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

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①

列宁的思想的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是从土地革命为革命中心任务这一点出发的，而非从宪法改革为革命中心任务那一点出发的；它又指出那些能实现这个任务的社会力量唯一切实可行的结合方式。列宁的这个思想的弱点在于“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中含有内在的矛盾。列宁公开称这个“专政”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的时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为了维持与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啻是放弃它自己的专政了。所以那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本质上是农民的专政。有几次，列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例如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当普列汉诺夫反对夺取政权的“空想”的时候，列宁就回答他道：“这里说的是什么纲领呢？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是要谁夺取政权呢？革命的农民。列宁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这些农民混为一谈了呢？”^②没有！他说他自己：列宁分别得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和什么是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又反问道：“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③在这论战式的说明中，列宁很明白地暴露了他的立场的弱点。

农民散布在广大的国土上，而以城市为其接触点。农民自身甚至不能提出他们的利益，因为在不同的区域，农民所想的利益是不相同的。各省之间的经济的接触是通过市场和铁路建立起来的，但市场和铁路都是操在城市手里。农民要突破乡村界限，为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8—39页。——译者注

②③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1页。——译者注

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就必须在政治上依赖城市。农民在其社会关系上也是不单纯的：农民中的富农阶层自然力图诱导农民去同城市资产阶级联合，而下层农民则倾向于城市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其全体来说，是不能掌握政权的。

不错，在古时中国，革命曾使农民，或更确切地说，曾使农民起义的军事领袖上台执政。每一次革命的结果都是重分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皇朝，以后历史又开始重演：土地又重新集中起来，又造成一批新的贵族，又出现新的高利贷，又发生新的起义。只要革命保持其纯粹的农民性质，社会是不能走出这没有出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便是包括古代俄国史在内的古代亚洲史的基础。在欧洲，则从中世纪初叶起，历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都未能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只让市民阶级左派去执政。更确切地说，农民起义的胜利仅以设法确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为限。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的俄国，谈不上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

这样一来，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便成了区别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金石了。俄国革命能够进行多远，未来临时革命政府将具有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它将依照什么次序来解决那些任务，——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必须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性质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提出来；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决定的。普列汉诺夫装腔作势地固执地闭起眼睛，不理睬 19 世纪政治史上的实际教训，无论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现，资产阶级就要转入反革命营垒去的。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能使阶级斗争规律不起作用的办法。

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常常反复地说：“我们必须重视那些非无产阶级党派的支持，我们不可用‘鲁莽行为’驱使那些

党派离开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哲人以此类单调的说教表明：他不能理解社会的活生生的动力。“鲁莽行为”可以赶走一两个感情容易冲动的知识分子，但阶级和党派的结合或分离是全凭各自的社会利益的。列宁反驳普列汉诺夫道：“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自由派地主们会宽恕你几百万次的‘鲁莽行为’，但是永远不会宽恕你教唆人家夺取他们的土地。”不仅地主而已，就是因财产利益相同，尤其因银行借贷原故而与地主有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以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依赖大中财主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都害怕群众的独立运动。可是，要推翻沙皇制度，就必须唤起千百万被压迫者去从事英勇的、奋不顾身的、崇高的革命进攻。只有在群众自己利益的旗帜之下，即只有启发对剥削阶级，尤其对地主的不可和解的仇恨，才能唤起群众参加这个斗争。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反对派从革命的农民和工人那里“吓跑”，正是革命的内在规律，是“谨慎”或外交手腕所改变不了的。

一月比一月更加证明了列宁对自由主义的评价的正确。尽管孟什维克望眼欲穿，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来领导“资产阶级的”革命，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正在于反对这个革命。十二月起义惨败以后，那些靠短命的杜马走到政治舞台前面来的自由派，都在声嘶力竭地向帝制政府解释他们于1905年秋天，当最神圣的“文明”支柱陷于危险时，搞反革命活动不够积极的原因。曾与冬宫秘密谈判的自由派领袖米留可夫在报纸上说得很好，他说：在1905年底，立宪民主党人简直不能在群众面前现身。他写道：“责备〔立宪民主〕党当时没有召集群众会议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的人，……简直不懂得或不记得当时参加这类会议的民主群众中间流行的情绪。”这位自由派领袖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这政策引起了城市下层阶级、士兵、农民及一切被压迫者对苏维

埃的同情，从而疏远“上流社会”。孟什维克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他们为他们的 1905 年 10 月以后和托洛茨基搞在一起这件事再三向自由派辩解。孟什维克那位有才干的政论家马尔托夫所作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对群众的“革命幻想”让步是必要的。

在梯弗里斯，政治派别也是依照彼得堡同样的原则基础形成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写道：“粉碎反对派和赢得宪法，——这些目的，将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力量自觉的联合和统一领导而达到。……不错，农民将被卷入这个运动，并将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自然力的性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述那两个阶级，农民运动则给那两个阶级的磨盘注水。”列宁嘲笑饶尔丹尼亚担心对资产阶级采取一种不可调和的政策会使工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列宁说：饶尔丹尼亚“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他忘记了……农民！他看上了地方自治会中的地主，承认他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不承认农民有这个可能。这还是在高加索说的！”列宁这个反驳，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一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饶尔丹尼亚并没有“忘记”农民；而且从列宁自己的暗示也可以看出，他在高加索决不会忘记农民，因为那里的农民，在孟什维克派旗帜之下，正像风暴一样起来。但饶尔丹尼亚并不把农民看做政治的盟友，他是把农民看做一种政治上的进攻武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盟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个武器。他并不相信，农民能成为革命的一种领导力量，甚至能成为一种独立力量。在这点上，他并没有错。但他同时也不相信无产阶级能以领导者资格保障农民起义的胜利。这点就是他的致命的错误。孟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实际上是叫工人和农民服从自由派。这个纲领的反动的空想，是从下面的事实出发的，即阶级分化如此之深刻，

一开始就使资产阶级陷于瘫痪，不能成为革命因素。在这根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是对的：寻求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必把社会民主党推入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营垒中去。在1905年，孟什维克还没有勇气从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1917年，他们就把他们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于是他们就碰得头破血流。

在那对自由派态度问题上，第一次革命那几年间，斯大林是站在列宁方面的。但必须声明一点，即在这个期间，谈到反对派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甚至孟什维克下层分子大多数人也是更靠近列宁而不是更靠近普列汉诺夫的。对于自由派的轻蔑，本是知识分子急进主义的文学传统。但如果我们要探究一下柯巴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独立的贡献，例如分析高加索社会条件，或提出新的论据，或给予旧论据以一种新的提法，——那是完全徒劳无功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独立性，比斯大林对于列宁的独立性要大得多。流血的星期日之后，柯巴写道：“自由派的先生们力图挽救正在崩溃的沙皇宝座，是枉费心机的！他们想伸手援救沙皇，也是枉费心机的！……愤怒的群众却准备革命，而不准备跟沙皇和好。……是的，先生们，你们真是白费气力！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东升一样地不可避免！难道你们能阻止旭日东升吗？”^①诸如此类的话。柯巴不能飞得比这更高些。二年半之后，几乎每字都重复列宁的话，他写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

^① 《高加索工人们，是复杂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争。”^①然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后十年内，斯大林经过了一次完全的转变，以至1917年2月革命发生时，他竟赞成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与此相适应，他又主张同孟什维克合并为一个党。须待列宁从国外回来，才能迅速地结束斯大林这个独立政策，这个列宁称之为同马克思主义开玩笑的政策。^②

民粹派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做简单的“劳动者”和“被剥夺者”，同样关心社会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情认为上述那种社会学的分析乃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刻薄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者曾在这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好相反，正因为农民占居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问题有关的论文中都再三发挥了这个观念。

1905年9月间，列宁写道：“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着（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③，列宁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在某种程度上也把俄国乡村中半无产阶级分子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但他从来没有把全体农民看做社会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② 关于这一切本书其他地方已作了详尽的叙述。——著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222—223页。——译者注

主义同盟军。他以他特有的坚定性反复地说：“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①

1906年3月间，他又写道：“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完全耗尽他们作为农民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也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真正开始发挥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同年5月间，他重复道：“农民运动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而是替资本主义的基础清除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②我们从列宁的这一篇到那一篇文章，从这一年到那一年，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著作，都可以找到这个观点。文句和例证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则是不变的。这个基本思想不可能发生过变化。列宁如果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那么他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把革命限制在“工农民主专政”范围内，限制在纯粹的民主任务的范围内，就会毫无根据了。有时列宁指责我对农民“估价过低”。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说我没有充分认识（就列宁的观点说）：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能力，又有通过它去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的重新估价，是到了热月反动期间才开始的；这个反动大体上是从列宁患病和逝世时开始。从此以后，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

①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222—223页。——译者注

②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97页。——译者注

含有在苏联境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斯大林拿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世界革命论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

当然，可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经典的想法是否被事实证明为错误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将使我们远远地超出本附录的范围。目前，我们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即马克思主义把农民看作非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时候，从来没有赋予这一评价以一种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性质。马克思早已说过：农民有判断能力，也有臆断能力。农民的本性是随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现了影响农民、改造农民的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历史还没有彻底探明这个可能性的限度。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苏联的国家强制作用的日益增长，不仅没有驳倒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民粹派的对于农民的评价，反而根本证实了这个评价。现在，新政权建立了二十多年之后，无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级。

以上便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的不同立场。可是在这两种立场之外，早在第一次革命初期，就有第三种立场提出来了。这种立场，当时虽然实际上没有得到承认，我们仍须加以说明，——不仅因为它后来被1917年事变所证实了，尤其因为它在革命七年之后，在被驳倒之后，在斯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官僚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起着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

1905年初，我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分析1904年冬俄国政治局势的小册子。我得出结论：自由派的独立的请愿和宴会运动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把希望寄托于自由派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同自由派一起走进了死胡同；农民运动正为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能确保胜利；唯有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才能决定胜负；朝着这方向走去，下一阶段必须是总罢工。这本小册子名为《一月九日之前》，是在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以前写的。从那天开始的强大的罢工浪潮，以及随之俱来的第一次武装斗争，明确地证实了这本小册子的战略的预断。

帕尔乌斯替我的小册子写了序文。帕尔乌斯本是俄国侨民，那时已经成为有名的德国作家了。他是个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的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思想影响，也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别人。但缺乏必要的内在的均衡和勤勉，使他不能对工人运动作出无愧于他的思想和写作才能的贡献。无疑他对我个人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在以社会革命观点去理解我们的时代方面。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以前几年，帕尔乌斯就热烈主张德国总罢工了。可是当时德国正经历持久的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正在使自己适应霍亨索伦政权，外国人的革命宣传只能得到嘲笑和冷遇。彼得堡流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帕尔乌斯读了我的小册子原稿，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必然要起异乎寻常的作用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两人在慕尼黑同住了几天，谈了许多话，彼此增加了不少理解和私人的友谊。帕尔乌斯那时替我的小册子写的序文，就永远列入了俄国革命的史册。他用寥寥数页文字阐明了落后俄国的社会特点，这些特点固然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他以前没有一个人曾从中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帕尔乌斯写道：“大家知道，西欧各国政治的急进主义都是首先依存于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就是手工业者，就是资产阶

级中落后于工业发展、同时又被资本家阶级所排挤的那一部分。……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俄国，城市照中国的方式而不是照欧洲的方式发展的。俄国城市乃是行政的中心，带着纯粹官僚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至于经济意义，则不过是周围的地主和农民的商业市场。当资本主义过程结束城市的这种发展的时候，城市的发展还是微不足道的。资本主义开始建立它自己所设想的大城市，即是工厂城市和世界贸易中心。……阻碍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东西，反对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这就是俄国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的微弱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是直接集中在工厂里面的。……

“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将被卷入运动中。但农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增加那业已弥漫全国的政治混乱，从而削弱政府的力量；农民不能成为组织严密的革命军队。所以，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工作将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同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警觉性也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毅力也将迅速增长。……

“社会民主党将面临这样的抉择：不负起临时政府的责任，就得退出工人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如何，工人将视临时政府为自己的政府。……在俄国，唯有工人才能完成革命起义。在俄国，革命的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站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头的话，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肃清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过程将给临时政府从事政治活动提供肥沃的土地。”

1905年秋，正当革命事变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又会见了帕尔乌斯，这次是在彼得堡。我们两人与两大派别都没有组织关系；我们共同编辑《俄罗斯语言报》，这是给工人群众看的报纸；我们又

与孟什维克合办《开端报》，这是很重要的政治报。人们常常把不断革命论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只是一部分是对的。帕尔乌斯于上世纪末，当他走在同所谓“修正主义”，即歪曲马克思理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队伍的前头的时候，已经成为成熟的革命家了。可是他尽一切努力都未能推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更坚决的政策，于是他的乐观情绪受到了伤害。他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前途越来越采取保留态度。同时，他觉得：“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的预断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指出俄国将或多或少同在澳洲一样建立一个工人民主政权，在澳洲，以农业家(farmerist)为基础的第一个工人政府并不敢走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外去。

我并不同意帕尔乌斯的这个结论。在新大陆处女地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澳洲民主制，立即带有保守性质，而且支配着年轻的拥有一些特权的无产阶级。俄国民主制，恰恰相反，只能作为大规模革命暴动结果而实现，这个革命暴动的动力不容许工人政府保持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框框之内。1905年革命之后不久，我们二人意见就开始分歧了，到了大战开始时就达到完全的决裂。那时怀疑家帕尔乌斯已经把革命家帕尔乌斯杀死，事实已证明他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后来又做了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柏特的顾问和智囊。

在写了《一月九日之前》这个小册子之后，我一再恢复发展和论证不断革命论的工作。鉴于不断革命论后来在本传记的主人公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用摘录的形式在这里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是必要的。以下便是我的1905到1906年著作的准确的摘录。

“在现代的城市中，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城市

中，居民的核心乃是急剧分化了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基本上还不存在的阶级，注定要在我们的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比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获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机械地受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这一种思想乃是极其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国高十倍，可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于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不久之后对于世界政治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

“我觉得俄国革命将会造成这样的条件，使政权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尚未能充分施展其统治才能以前就有可能（在胜利情形之下则必然）落入无产阶级手中。……俄国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也不是不把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交给无产阶级。掌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阶级的解放者来解放农民。……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将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乡村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但农民自己不会把无产阶级赶走而取代它的地位么？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否定了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证明：农民完全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从以上所说就可以清楚看出我对‘工农专政’的思想的看法。问题并不在于我原则上承认不承认它‘要’‘不要’这种政治合作形式。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不能实现的，至少不能马上直接实现。……”

有人硬说这里阐述的观点是“跳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来人们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一说法，上面所引的几段话业已证明这种说法多么不正确。我同时写过：“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斗争，整个说来，是从资本主义来的，是资本主义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领导的，它

的矛头首先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障碍。”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用什么力量、什么办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用下面的说法限定一切革命问题的范围：我们的革命，就其客观的目的以及从而就其一切不可避免的结果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可以闭上眼睛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能动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靠革命的一切冲击力量推动自己向政权前进。……人们也可以以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而同时忽略这个思想，即无产阶级执政后，它的地位必然推动它靠国家的力量去管理经济。……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进入政府的，他们只靠这个办法打破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即把集体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产阶级朝着这个方向走多远，要看各种力量间的相互相关而定，决不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的意图而定。……”

“但我们已经可以自问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它打破这个框框后，能不能根据现存的世界历史情况期待胜利的前途？……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政府直接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将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将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这不一定导致悲观的预断。“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将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将赋予领导者以巨大的力量和手段，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历史已经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创造了一切客观前提。……”

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够执行其革命任务到什么程度，我在1906年写道：“欧洲的各个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已经发展了它们的保守性，随着倾向社会主义的群众增多，随着

这些群众的组织和纪律的效力提高，它们的保守性也愈加强烈。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的公开斗争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但我在总结我的分析时表示确信“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影响西方无产阶级，将激发它开始同它的敌人说‘俄国话’的愿望。……”

总结一下。民粹派同斯拉夫派一样，是从这种幻想出发的，即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则集中于证明俄国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历史道路在原则上是相同的。由此产生出来的纲领，无视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发展上十分真实的而远非神秘的特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除去其非本质的歧异和个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个胜利必然使自由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以后，民主制度将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比过去大得多的成效的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老大哥。

列宁的见解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的！经过“工农民主专政”取得的革命完全胜利，将肃清土地上的中世纪制度，将使俄国资本主义照美国的速度发展，将加强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将使社会主义斗争成为真正可能。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而且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夺得政权。

不断革命论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

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以上的概括的公式同样清楚地显示后两种观点是相似的，它们与自由派孟什维克的见解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显示后两种观点在革命必须产生的“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也有极其重大的本质差别。现在的莫斯科理论家的著作时常埋怨无产阶级专政纲领在1905年提得“过早”，这说得不恰当。经验证明，工农民主专政纲领也是提得“过早”的。第一次革命时期各种力量配合不当与其说有碍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说有碍于一般革命的胜利。然而，各个革命党派所依据的是对完全胜利的希望；没有这一种希望，就不可能有最高的革命斗争。革命的一般前途以及由此生出的战略问题是意见的分歧所在。孟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出错误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正确地指出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说得不正确。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知识的缺陷，1905年革命时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仅仅因为革命本身还没有进一步发展。可是，1917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改变他对革命前途的看法，而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发生冲突了。

任何政治的预断都不能自命像数学一样准确。只要它能正确指出发展的总路线，有助于指示事件的实际发展方向（事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主要路线偏左偏右），这就够了。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看到不断革命论完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最初几年，没有一人否认这一点，相反地，这个事实得到了若干官方出版物的承认。可是，当苏维埃社会冷静下来的上层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反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立即向不断

革命论开火了，这个理论比别的理论更加完全地反映第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公开揭露这次革命之未完成的、局限的和部分的性质。于是，在排斥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

Leon Trotsky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en and
his Influence

*Edi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Charles Malamuth*

Hap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1946